



不肯沉睡的记忆

俞安国 雷一宁 编



www.observechina.net
www.guancha.org

不肯沉睡的记忆

俞安国 雷一宁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2006

目 录

钱理群：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不肯沉睡的记忆》序	1
杜 峙：五律·五七赴北大荒	6
范亦豪：我的帽子祭	7
傅德惠：我将永远铭记	33
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35
雷一宁：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	64
李受山：我所经历的北京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	72
罗宗义：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	81
潘仲骞：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91
潘仲骞：右派咏叹调（组诗）	99
彭浩荡：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追忆	102
若 葵：父亲的“戏剧”人生	109
述 弢：哭泣的青春	115
述 弢：倒行人生路	134
辛桂彬：厄运结束已夕阳	141
徐美英：红色陷阱	147
许有为：丁酉五十年祭	154
杨碧遐：追念海琛	161
俞安国：运交华盖欲何求——我的右派生涯心路历程	164
俞安国：迟到的答辩	173
袁伯诚：丁酉之劫	180
袁伯诚：读《庄》自白书	186
张德文：忆海琛	214
张德文：迷茫与挣扎	220
张荣生：不堪回首的一九五七年	226
周沙白：“阳谋”织造的风雨人生	232
附录	
（一）恩师与风浪	250
（二）书信往来	258
（三）当年大字报选	266
（四）当年反右批判文章选	270
范亦豪：编后语	282
本书版权页	283
当年的“毒草”漫画选——选自《鸟昼啼》（略）	

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不肯沉睡的记忆》序

钱理群

这是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新华社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对于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在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会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一步的研究。”（2006年5月26日，《北京青年报》）

这里，其实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收藏的问题，对历史的研究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许多历史的资料散落了，这是不利于历史的研究的。

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历史资料为什么会散落，散落的又是什么历史资料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出了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刚刚读到的邵燕祥先生发表在2006年2期《随笔》上的文章：《民间的、个体的记忆》，一开头就引述了“很有见识的画家陈丹青先生”的一段话：“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历史资料的散落，显然与历史研究的遮蔽有关。

正是这种遮蔽，引起了许多历史当事人和关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人士的极大忧虑——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未来。

同时，也就有了用自己的民间、个体的记忆，为被遮蔽的历史提供鲜活的历史资料的努力。——如邵燕祥先生所说，这样的民间的、个体的记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现在放在我书桌上的这本《不肯沉睡的记忆》，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俄语系部分同学的回忆录，提供给读者的正是这样的民间的、个体的记忆。

书中的一位作者说：“在我二十岁那年，有幸遭遇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件大事——整风和反右。这次运动留给我的此后漫长的作为异类的日子。我以二十二年的青春和生命，实实在在体验和见证了古老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¹

回忆的是1957年的中国事件，回忆者是历史的受难者，回忆的时间是五十年后，当事人已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这本身就饱含着历史的沧桑。

1957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和重要性？为什么历史的当事人始终不能忘怀，而总有些力量要将它遮蔽和遗忘？——这正是我们感兴趣，并要追问的。

首先要说的是，1957年所发生的，实际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这一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的运动，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人们却忽略了在以北京的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等）为中心的中国许多大学的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运动。正是这两个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党内各种力量的巨大震荡，各种矛盾的交织，导致了最后的反右运动。

对民间思想运动的忽略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样一个民间思想运动是在响应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的号召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且许多学生是被卷入的，未必有那么大的自觉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运动的发动者与主要骨干，却是具有相当的自觉性的，而且在运动的发展

¹参看范亦豪：《我的帽子祭》。

过程中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与要求，在后来成为北大右派的大本营的《广场》的发刊词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这将是一场“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²。在另一篇编辑部写的文章里，则明确地自我命名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指明这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先兆”³。而本书中一再谈到的北师大所成立的“底层之声”，在其社论里也明确提出要“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要求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按：这是整风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即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的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人民权利与法律的问题，党的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这都显然要突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而要求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以发出“底层”的独立的声音⁴。

1957年的大学校园的民间思想运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如果说1957年的右派头面人物，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而这些右派学生（也包括右派老师）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于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现实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外，还包括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的宣言书。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说，真正体现了1957年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应该是这些右派学生、教师的思考。

而1957年的中国大学生，由于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大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把自己所发动的民间运动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不仅是一个策略的考虑，而且是表达了他们的一种信念的。因此，最能显示1957年民间思想运动的本质的，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林希翎在著名的北大演讲中所提出的“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在演讲中，林希翎还谈到她理解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⁵这几乎是代表了校园的“右派”的共识的。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都出现了特权造成的不平等，有可能形成新的特权阶级，从而构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威胁⁶；而广泛存在的违反民主、法制、人道的现象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⁷。因此，他们提出，不能仅仅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⁸而且宣布：“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

² 《〈广场〉发刊词》，《原上草》，1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³ 《北大民主运动纪实》，《原上草》，2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⁴ 参看收入本书的潘仲骞的文章：《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⁵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⁶ 参看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沈迪克：《谈谈无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钱如平：《论阶级的发展》，均收《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⁷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⁸ 龙英华：《“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原上草》，1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⁹

这样，这些 1957 年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的思考活动，就构成了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样的民间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所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并且始终处在被压制的状态，因此，所有的思考与言说（用大字报或公开演说的方式）都带有“急就章”的性质，而且大学生们尚处在学习的阶段，而由于当时中国总体上是和世界隔绝的，也限制了年轻人的视野：这些都使得他们的思考，必然是粗糙而不成熟的，但却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考水平。

我曾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 1949 年以后，由于国家所实行的对知识分子“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导致了大陆知识分子整体萎缩，除极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有的堕落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有的则噤若寒蝉，人云亦云，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与创造；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这就迫使这些尚处在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我曾称之为“半大孩子”）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平的代表：1957 年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如此¹⁰。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但惟其如此，这些 1957 年的大学生所留下的民间思想遗产，就显得特别珍贵，值得认真研究。

当然，1957 年的历史，其意义不仅是思想史的，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在新政权基本稳定以后，从 1953 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即所谓“治国”时期，这就面临着一个治国路线的选择问题。1954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先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的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法治国的道路。

但在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首先是党内出现了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将高、饶事件看作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因此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¹¹由此而产生的，是所谓“阶级斗争逻辑”，其核心是要在公民中（也要在党内）“划分敌我”，而“敌人”的数目也是可以预先规定的，而一旦被宣布为“敌人”，就要对之实行不受宪法、法律制约的群众专政。这样的“阶级斗争逻辑”，显然是与前述“宪法（民主、法制）逻辑”相对立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国逻辑与路线。

应该说，1955 年 5 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随即开展的“肃反运动”即是自觉地用阶级斗争逻辑治国的最初尝试。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中宣布，对被群众揪出来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且实行“舆论一律”，让他们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¹²在这样的群众专政下，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成社会恐怖气氛，知识分子更是谨小慎微，人人自危。

⁹ 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上草》，101 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出版。

¹⁰ 参看拙作：《民间思想的坚守》，文收《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 年出版。

¹¹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5 卷，140 页，153 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出版。

¹²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5 卷，158 页，159 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出版。

因此，1957年的鸣放，集中在对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的质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本书的许多作者都谈到他们介入运动，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都是源于对肃反的反思。因此，大学里的民间思想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反对“不尊重人权、民主与法制”的阶级斗争逻辑，强调要“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¹³这显然是自觉地要求重建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回到“依宪治国”的道路。

但掌握最高权力的毛泽东，无论是开始发动整风运动，还是后来发展为反右运动，他都始终坚持他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他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正是将前述以在公民中“区分敌我”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逻辑理论化，也是他发动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前后一贯的指导思想。本书有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谈到“肃反与反右比较”¹⁴，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反胡风与肃反都是阶级斗争治国路线的尝试，但其规模与影响都有一定的限度，而反右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全体公民中划分“左、中、右”，将数十万、数百万（一说五十五万，一说三百万）的人打成右派，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都受到牵连。其所提出的“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及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就是反党”的右派标准，以血统论、出身论为核心的所谓“阶级路线”，以及所制定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如“劳动教养法”、大学毕业生的政治鉴定制度）等等，都极度强化了高度集权（各单位与地方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全党与全国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的体制，到1962年又再度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逐渐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对整个国家发展的灾难性的破坏也达到了极致。而其直接后果是三年大饥荒，大死亡。

从以上简要而不免粗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反右运动在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它向上承续反胡风、肃反运动，往下与三年大灾荒、文化大革命，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既深远又广泛的，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因此，可以期待，对1957年历史的研究，必将带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而对1957年历史的考察，也必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也会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1957年学”这个概念的学术理由与依据。

我的这一倡议，在1998年提出以后，在历史的当事人，主要是当年的右派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而学术界却基本没有反响。前者让我感动，后者则使我感到悲哀，还是不说了吧。但沉默、冷漠，以至强迫遗忘，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一段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即使回避于一时，也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是，回避的时间越长，记忆逐渐淡薄，历史资料大量散失，后人来面对这段历史时，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岂不是又欠了一笔债？更重要的是，因为回避，历史的教训不能认真吸取，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传统不能继承与发扬，这又意味着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让我和许多右派朋友忧心如焚。但我们都是无权无势的书生和平头百姓，既然无法唤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做起，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是对社会做最后的贡献吧。就像我在为南京大学的一位右派朋友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我，以及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幸存者都已经老了，而且坦白地说，经历了无数的失望，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以清白的那一天了，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死不瞑目。但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对于历史的责任：我们要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证词。我们更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我们当

¹³ 刘地生：《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发展》，《原上草》，28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系南京大学教师，1957年因此文被打成右派。

¹⁴ 参看范亦豪：《我的帽子祭》一文的结尾部分，《肃反与反右比较谈》。

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历史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能替代的，我们将把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思考，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我们尽管历经磨难，但还是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就死而无憾了”。¹⁵

最后，我们仍然忍不住要向思想文化、学术界发出呼吁：

请重视 1957 年历史的研究，当务之急是要抢救历史资料——据我们所知，有些图书馆在“处理旧图书”的名义下，已经将当年的有关图书、报刊销毁；而历史当事人多已年过古稀，抢救活史料已是迫在眉睫。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与从事“1957 年学”的研究，特别是年轻学人的参与，使其成为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我们说过，“1957 年学”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研究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其研究前景也是可以期待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这是一切历史幸存者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是一切有学术良知的学者的职责所在。

2006 年 5 月 26—28 日

¹⁵ 钱理群《“何时能因鉴而止？”——读王林书〈诗鉴〉》。王林书的《诗鉴》，澳门学人出版社，2006 年 2 月出版。

五律·五七赴北大荒

杜峙

独停荒原里，
天地两苍茫。
风紧寒鸦侧，
阳斜瘦影长。
不闻渔樵唱，
唯见狐鼠狂。
惶惶顾四野，
何处是归乡。

我的帽子祭

范亦豪

- 一 为什么“跳出来”？
- 二 “何穆事件”
- 三 肃反论坛
- 四 “论坛主帅”
- 五 关于“反对政治第一”
- 六 对《人民日报》6.8社论的批评
- 七 早春的凄冷中
- 八 河泥与葱油饼
- 九 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十 又来了两支队伍
- 十一 难友们
- 十二 “三面红旗万岁”
- 十三 大地
- 十四 淘粪在鼓楼近旁
- 十五 牦牛、老鼠和我
- 十六 好一顶帽子
- 十七 肃反与反右比较谈

在我二十岁那年，有幸遭逢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整风和反右。这次运动留给我的此后漫长的作为异类的日子。我以二十二年的青春与生命，实实在在体验和见证了古老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回想起来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失忆，对一个人和民族与国家都是可悲的，然而从民族和国家看却远非“可悲”一语所能穷尽。一个人，不过活几十年，随即永远消失，此后再发生什么事情与自身就毫无关系了，然而民族和国家却会长久存在下去，如果它失去了记忆，就难免一次再次重新栽进和过去遇到的同样的或相似的陷阱，或者其实并没有爬出原先的陷阱，这就不但可悲而且可怕了。

反右距现在已近半个世纪了，我也已渐近古稀之年，趁记忆力还没完全衰退，把当年的一些真实情况，择其要者记一记应是亲历者的责任。尽管这些仅仅是宏观历史途程中的几颗小小的砂粒，然而其中必包含大千世界的若干本质。

一 为什么“跳出来”？

小时候，我算是有些调皮的孩子，到1950年上高中之后，我的调皮被升值为“自由主义”，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当年南开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很厉害的，加上那时大环境的影响，到上高二的时候我居然已被改造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团员。头脑里的一个大变化是从任性到听党的话。说来有点幼稚得可笑，那个时节几乎只要是个党员我一律崇拜。再一个变化是自己觉得有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为我是属于革命的，革命也是属于我的，我要无条件服从革命的需要。1953年考大学前，组织动员我们：当教师，可能一辈子又苦又累，但这是党的需要，你干不干？我真的没有犹豫，放弃了钟情已久的电影、戏剧和北大，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个驯服的乖孩子变得不驯在整风中“跳”了出来呢？

我想，如果没经过肃反，也许我还会继续驯服下去。

1955年夏继反胡风运动之后到来的肃反运动来势迅猛，宁静的校园顿时成了阶级斗争的大战场。运动不但轰轰烈烈而且草木皆兵，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地。人手一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编者按”当作照妖镜一照几乎人人都可以被怀疑。我倒是绝对平安的，我这个团干部成了运动骨干，作为肃反组长组织和主持两个班多次合组的批斗会，运动后期又是专案组成员审查可疑对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投入尖锐的阶级斗争，自我感觉是个革命战士，领导指哪儿我打到哪儿，让我批斗谁我就批斗谁。日以继夜的斗争倒把自己身体斗垮了，旧病类风湿大发作，只得休学。躺在病床上才陆续知道那些被批斗的同学竟然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全校也没听说谁是真的反革命。上面对反革命估计的比例和控制数字是5%，实际上是很容易突破的，一个运动伤害了多少人啊！

这使我头脑中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运动中残酷地伤害了那么多同学，我也是有罪的。从此挥之不去的是他们当时惊恐的眼神，茫然无助的表情。耳中还仿佛时时响着那位跳楼受伤同学的呻吟声。抹不掉的还有那些怀着一腔爱国之情回国却又失望去国的同学的身影。

我难道不革命？难道不忠诚？但是革命的忠诚的我却害了那么多好人！错就错在我太听话了，我无条件地盲目地听上级的指示，完全没有自己从实际出发的独立判断。

同时我对这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反革命的做法也产生了怀疑：阶级斗争能这样搞吗？！

如果仅仅停留在良心的自责上，我大概还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怀疑从而改变我思想和人生的道路。偏偏在这时苏共开了二十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付强力的清醒剂，它颠覆着我的盲目崇拜，开始复活了作为独立个人的自我。

在那个年月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看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但那公开发表的政治报告已经把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的我象惊雷一样地震撼了。

从五二年我开始追求进步，现实中我最崇拜的伟大领袖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斯大林了。五三年三月五号斯大林逝世，我哭得如丧考妣，当时很多中国人也都真心难过了一阵子。在过了许多天人们都不再为他佩带黑纱之后我却有半年之久仍然不忍摘下。

二十大给我的震撼首先是让我吃惊地知道原来伟大英明如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也会犯错误。而且由于他的专断杀害了许多革命领导人和无辜群众。尤其是肃反的扩大化成为苏联的一大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进行的。盲目的崇拜使他的错误不可能受到抵制和纠正，反而无限制地泛滥。

这件事使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不能盲从和迷信，尤其是不能盲目相信某个人。一个人，一个领导人即使很伟大也不可能事事正确，难免有失误的时候。唯一应该相信的是事实，是真理。领导者的指示和主张符合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服从，否则就不能盲从。因此必须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固然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未必就正确，但它是通向真理的必经之路，在这路途中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断用事实验证认识，改正偏颇。尽管独立思考可能发生很多误差，那也比迷信强一万倍，因为每个误差的纠正都使自己更接近真理，而迷信从它的起点上就是错的。

休学一年后，我的病虽然还没完全好，但当时的规定是超过一年就必须退学，我不愿意，于是又回到了学校。这时已经是1957年3月，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双百”“鸣放”这些词开始成为报刊上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那个年月关心政治是普遍风气，“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成了我们学生关注和议论的中心，至于怎么来帮助党整风心里还没有数，而且肃反的余威还让很多人有顾虑，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记得是在四月的一天，校党委书记向全校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他是照原始记录稿传达的。听了这个讲话，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心里没法儿不热乎乎地。那亲切，那开明，那诚恳，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让人觉得不积极帮助党整风，简直就对不起党，如

果再有顾虑就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印象较深的是关于王蒙的一段话。不久前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同学当中几乎人人读过，林震这个敢于反官僚主义敢于干预生活的形象成了年轻人心中的朋友。可是小说却受到了批评并引发了讨论。主要批评者有四个人，其中解放军总政的陈其通是大家熟悉的，因为刚看过他的话剧《万水千山》，他应该是挺有水平的，这么说象林震那样反官僚主义难道不对吗？真弄不明白。没想到毛主席连这件事也挺关心，他称陈等人的批评是“解放军围剿王蒙”，还反驳说“谁说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这是他老人家旗帜鲜明地为我们年轻人撑腰鼓劲。毛主席在号令我们除三害，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义不容辞地必须投入这场斗争。

然而，谁能预料，为了这盲目的忠诚和天真的轻信，我们这批年轻人将要付出多么残酷的代价！

二 “何穆事件”

领袖的号召力真是了不起，进言的顾虑解除了，思想的闸门打开了，宁静的校园沸腾了。

北京师大学生食堂和宿舍之间有一片不大的枣树林，这原是老乡的林子，五十年代初圈地迁校时把它保留了下来。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成了师大日后最热闹的是非之地，大约类似北大的三角地。此时，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的大字报就贴满了。

鸣放的第一个高潮是中文系外国文学老教授穆木天给党委书记兼校长何 x x 提意见引起的风波。人称“何穆事件”。

穆木天教授在整风之初批评何书记与一个外国文学女进修生关系不正常。这个进修生梳着金黄的发辫，虽不算漂亮，但有一种西方姑娘的风韵。何当时可能是独居，与这位女学生的接触过分亲密。这种风流韵事若在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新闻，但在当时则不然，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中党委书记不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且应该是完美的圣洁的。何书记竟然有这等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此事当真那就不能容忍。然而据说穆教授的批评受到压制，有的党员处长还为书记辩解，说这是“需要”。这位穆先生诗虽然写得漂亮，虽然能精通几种外语，是个学贯中西的专家，但绝对的不识时务，它不仅不收敛，反而提出抗议，在《光明日报》5月22日发表了《我的呼吁》，又被人把剪报贴在校园里，于是全校议论纷纷，大字报上也展开热烈争论。

一天中午，中文系学生党支部书记找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同学在枣树林开会，要我们成立一个社团，组织师生在论坛上以口头方式面对面发表意见，开一条直接辩论和反映问题的渠道。这个社团的名字就叫“群众论坛社”。成员大都是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大家戏称作“坛主”的是李镜春，他是个党员，中文系团总支的宣传委员。。我和同班的林锡纯都是普通成员，世樵受我影响也参加了进来。

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找到了为党的整风效力的最佳方式，使我们这些同学都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计划着将组织哪些主题的论坛。第一次论坛的论题一致认为为“何穆事件”。

当晚，就在枣树林，在西饭厅的台阶上放了个讲桌，拉了个电灯泡，贴了张海报，论坛就开始了。这块本来不大的空地挤满了听众，至少有几百人。主持人是李镜春，我首先朗读了彭浩荡同学的一首诗《站上来》，算作开场锣鼓。不用发愁没人发言，一个个讲者争先恐后站了上来，有教师也有学生。发言者有的追问何书记，有的则为何书记开脱。还有一位发言人，是穆先生的助教张钦尧，讲了半天不知所云。尽管论坛上不可能得出什么共同的结论，毕竟达到了畅所欲言交流看法的效果。作为那个时代民主进程中的新生事物——群众论坛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群众期望共产党保持纯洁的拳拳之心和对腐败的担忧真是十分感人的。

这次对何书记的批评并没有影响他对运动的领导，大约是过了两天，在全校大会上何书记出现了，他表示“穆木天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爱护”，欢迎继续鸣放帮助党整风。对他的接受批评和态度的镇定沉着，我不禁暗暗佩服。穆先生后来也没再有所表示。“何穆事件”似乎没有明确的结局，而大家的注意力也被其他的热点吸引。但反右开始后穆先生即被定为右派，他的夫人彭慧也划为右派。二十几年后我系统查阅现代文学的史料才知道，穆木天 1921 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创造社重要成员，三十年代是左联诗歌组负责人，抗战时为文协理事，是个很有成就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彭慧是个老党员，1926 年参加“三一八”运动时入的党，解放前从事工人、妇女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曾任左联执委，五十年代在北京师大中文系是外国文学教授。她为革命贡献一生，著译颇丰，当时还是师大党委委员，尽管如此也没逃过右派命运。更可惜的是两位先生后来双双死于文化革命。这是后话了。

其它给何书记提意见的人下场如何？据说反右时以何书记划线，所以都无一漏网。这一点我没有力量核实，但我知道我所在年级的一个班批评一个党员婚外恋的同学后来统统划成右派，以小见大，我以为那个“据说”很可能是事实，因为“反对具体的党员就是反党”是当时普遍遵循的逻辑。

三 肃反论坛

似乎没有任何争议，大家一致认为接下来要组织的就应该是肃反论坛。因为两年前这场运动给我们每个人的印象太深了，重要的是它的后遗症还没有消除，它的阴影还在。

在当时最大的阶梯教室新一教室里，我主持过两次肃反论坛。虽是自由发言，但对肃反运动的看法却没有什麼分歧，似乎是人同此心。

正好，我现在手里有当时发表在北师大党委机关报《师大教学》上的一篇报道，它真实地反映了第二次肃反论坛的情况，我全文引述在这里，让今天的人看看在这些肃反论坛上当年的青年学子是怎么“向党进攻”的。

中文系群众论坛第二次提出：肃反问题应重新总结

5 月 26 日下午二时，中文系“群众论坛”在新一教室举行肃反问题讨论会。会上有俄语系许之品等六位同学发了言，他们中有的被错斗了的，有的是肃反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一致认为我校肃反运动是“三害”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

他们以亲身的经历和具体的事例，说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性。历史系一位同学说，在肃反运动中有人带同学在吃西红柿，就被认为是“破坏运动”，遭到了斗争。中四马志纯同学说，我是肃反斗争的积极分子，还受了团支部的表扬，但这个表扬，是我心中的阴影，是心中的负疚。斗争对象的确定是毫无根据的，给人烟抽也说成是“腐蚀人，引人堕落”。政教专业一位同学说，我为什么被斗呢？因为我父亲在劳改，我历史上有些问题，过去也交代过，只是未作书面结论。就因为这样，肃反运动中被斗争了，我在校的一切进步表现，都被说成是“两面派”。这些都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后果，我不同意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说法。

他们对肃反运动总结和善后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受了斗争，至今精神还不正常，有的连处理会都还未开过。有的人心灵受到深深的创伤，积极性受到挫折。同学间的团结也受了影响。数四的一位女同学边哭边讲的指责了“三害”给她带来的危害。她说肃反时错斗了我，肃反后，说过我不是反革命，但思想上有问题，直到如今，同学还不了解我，去年通过我入团，有人还说不应该，我的一切别人都怀疑，至今未澄清，我要求好好评理。

肃反运动总结时，仅仅把错误归结为领导，而对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教育不够，是非界限仍没有弄清楚。政教专业一位同学说，在肃反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有的被吸收入党了，同学中有意见，是否仅仅根据他在肃反运动中的表现就评判他的德性呢？数四一位同学指

出，一些盲目跟从的人，因而“加官厚禄”，我痛恨这个：不因劳动而因奉迎官僚主义分子而得到荣誉。

肃反运动处理时，只简单的承认斗错了，但为什么斗错了，仍没有具体分析，因而是非界限不清，在同学中留下不良影响。有人在肃反前要求入团，肃反后有些动摇了，认为共产党太可怕了。有人肃反前浑身是胆，肃反后却浑身是病，为人处世也抱明哲保身的态度，甚至不敢与人聊天，怕将来“算总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所有这些，都是纠偏工作没做好的结果。同学们要求党委重新总结肃反运动。

讨论会在六点半休会，在 27 日继续进行。党委会的同志也参加了讨论会。（中四潘仲骞）

看得出这个论坛实际上是有中文、俄语、历史、政教、数学各系统同学参加的，不仅是中文系的论坛，它反映了全校的情况。从现在来看那时候大多数人只是就事论事，对肃反所存在的问题还很少从本质上寻根溯源，也极少有人从民主法制和人权角度评价肃反。

《师大教学》发表这篇报道是想扩大论坛的影响，鼓励群众鸣放呢，还是真的意在“引蛇出洞”？我不明白。但在反右中清算我的“罪行”时就把“组织‘群众论坛’疯狂向党进攻”列为一大罪状，“他想通过对肃反的攻击和否定，说明‘三大主义的严重性’”。（见《师大教学》1958 年 1 月 7 日《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范亦毫的反动面貌》作者任重。）我也不明白，如果三大主义确实严重，为什么不可以“说明”一下呢？

我感到内疚的倒是论坛害了一些发言者。杨开荣是个年纪比较大的同学，重庆人，很早就参加过反蒋活动，肃反运动里被冤枉。我们动员他现身说法。在第一次肃反论坛上他发了言。他很谨慎，发言稿事先都交给党小组长看过，讲演时语气很平和。只是客观地说了被误解的过程。但就这样也被认为是向党进攻，没有逃过“右派”的下场。

其它系的发言者后来怎样我不清楚，这个剪报里提到的一个中文系发言者马志纯我是知道的，他并没有什么别的言行，但在论坛上亮过相，定为右派，文革时因此全口牙被打得几乎一个不剩。

整理了那篇报道的“中四潘仲骞”，印象中是课代表，学习上是个尖子，政治上也进步，是他家乡福建瑞安市第一批团员，中学时就当过校团支书和学生会主席。他是在五七年夏毕业时补划成右派的，这篇报道可能就是她唯一的“罪行”。可是这篇报道是她按团委书记兼《师大教学》主编阙雄飞的指示写的，怎么也算不上进攻，但是那时没法儿讲理。潘仲骞后来分配到吉林一个县当中学老师，文革中又受冲击，岳父惨死，妻子逼疯。1980 年准予到意大利投奔他父亲，经过 20 多年艰苦奋斗，如今已是在意大利最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是为祖国干了无数好事的侨领。如果先前他没有被打成右派，他未必会决心走出国这一步，右派帽子对潘来说是福兮？是祸兮？命运真是难测啊！

由于我的类风湿病的拖累，后来的肃反论坛就没有参与，从校内广播喇叭中听到有何廷杰、罗志甫等教授在论坛上讲肃反对他们的伤害，是那个社团主办的谁主持的我就不清楚了。没过几天转入反右，群众论坛社也就终止了。

四 “论坛主帅”

在清算我的“罪行”时，群众论坛社是重要的一项。给我定下的罪名是我“决定了论坛的反党方向”，我是群众论坛社的主帅。我心里很明白，自己不是这个社团的头头，而且只做过两次论坛的主持人，显然不够“主帅”的资格，可是想想自己除了论坛还有别的事，右派是躲不掉了，正所谓“虱子多了不咬”，我拿定主意决不扯别人，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主帅”的桂冠。

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二十二年我才知道事情另有真相，我其实并不是“决定论坛方向”

的那个人，“主帅”也就当然是冒牌的。1979年“改正”之后原先的“坛主”李镜春来了一封信。他说多年来由于必须遵守的纪律有件事他不能说，原来这个论坛社自始至终都是校党委书记方铭领导的，是由他和方铭单线联系，每天中午在小树林与方铭会面，向她汇报工作进展，再把下一步的指示、部署带回来。反右开始以后李镜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即使被审查做检讨也守口如瓶。李镜春是毕业班的同学，毕业前同学们逐个过关，有的划了右派，有的受了处分，也有立了功留校的。该分走的都走了，李镜春却没让走，继续审查。然而没过几天突然让他离校，远远地发到青海，只是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

是不是有点儿微妙？我现在才明白如果不把他留下审查，他明明还有“坛主”的问题没说清楚，那就会在大家面前说不过去；如果不紧跟着就打发走，逼急了也许他会把真相坦白出来，而领导层里是有斗争的，方铭也许就有危险。先留又快放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也是领导的艺术。让二十岁的我名不副实地承担了“主帅”的罪责而换来方铭书记的平安，保护了一个革命领导同志，在我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的，尽管从道德上讲尊敬的领导不能敢作敢当，总有点儿不够光明正大。然而这是复杂的阶级斗争，道德算老儿呢！据说在我被“改正”的时候，组织上曾向方书记做过核实，她也坦率地承认论坛是她领导的。这桩公案总算有了结果，当然，是在危险期已经过去之后。

五 关于“反对政治第一”论坛

主持这个论坛纯属我个人行为，是我在论坛社之外做的一件事。

严景煦是我所在的中文系三年级乙班的同学，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当过志愿军，为人心直口快，有点粗鲁，完全没有城府。在整风当中教学班的一次会上，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多钟头，抨击单纯突出政治的荒唐和弊端，说到激动处竟然把桌子拍得山响。

会后严景煦找到我说，“你敢不敢给我主持一次论坛？”我觉得他的发言虽然有偏颇片面之处，但也有不少合理的东西，而且，即使不完全正确作为一家之言引起讨论总应该是允许的，我立刻答应了他。题目“反对政治第一”是他起的，在当时是够反潮流的。

论坛还是在新一教室举行的。其实严景煦并不是全面地反对政治第一，也说不上理论高度。他主要是反对把政治作为评价人和用人的首要的压倒一切的标准，举了不少实例，讲得慷慨激昂。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志愿军，都说是最可爱的人，我是志愿军，可没人爱。为什么？因为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引起哄堂大笑。

在严景煦讲话后我以主持人的身份归纳了一下他所谓“政治”这概念的内涵是“政治出身，政治资历，政治地位，政治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政治第一，这也是当时我能接受的，至于如何从整体和实质上看待多年来政治第一的传统，我没想清楚，也没有把握。

严景煦后来的厄运倒不仅因为他的这次鸣放。据云：事情发生在转入反右后的一天中午。严景煦一向在胃病食堂吃饭，那天同饭桌一个中文系四年级叫蒋欢然的同学为了别的什么事和他争吵起来，蒋欢然个头虽小，但懂得策略，他伸过头来指着自己的脸引诱严景煦说：“你敢打我吗？”冲动中的严景煦哪里懂得这个激将法的凶险，“怎么不敢？！”挥手打了蒋一巴掌。收获了 this 巴掌之后，蒋马上到卫生科要求包扎，脸上缠了一堆纱布把头包得大大的，然后跑到党委告状，说严景煦发表反动言论，我跟他辩论，遭到毒打，这是阶级报复！

很快地，这一巴掌就成了反革命事件，随后在西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宣布严景煦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跟着，公安人员上来，戴上手铐，在口号声中塞进食堂门口等待的警车。严景煦成了反右当中第一个走入监狱的同学。他被判十五年徒刑，发往黑龙江的漠河。这个地名我们是熟悉的，地理书上说这是我国最冷的地方。后来据说在劳改营里有个国民党兵痞总欺负他，严景煦忍无可忍又冲动起来：“共产党整我我认了，你他妈的国民党也

欺负我……”抄起铁锹砍了过去。兵痞没死，严被判了死缓，直到1980年才宣布无罪释放，整整劳改了23年。

那位蒋欢然因为这个巴掌成了反右英雄，当然的左派，留校工作。以他的专业水平实在没法儿教书，正好当管理右派的干部。听说运动过后不久蒋被调离大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后来又有什么英雄行为。文革之后同学们多次返校却始终没见他的踪影，但同学们只要提起反右就往往会想起他的形象，他似乎成了反右的一个漫画式的注脚。

六 对《人民日报》6.8社论的批评

在我的记忆里六月八日是永远抹不掉的日子。

这天清晨，我还没起床，楼道的广播喇叭响了，中央台用威严的声音播出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反映是：“怎么又来了？”这个社论的观点、推理方式、语言以至于语气都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反胡风和肃反。

很快，报纸送来了，几乎同时，林锡纯也来到我住的宿舍。林和我同班，同座，是我的挚友，和那时的我一样的傻气。我们反复阅读了这篇社论。社论显然是表明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一场阶级斗争，而敌人是右派分子。可实在是说得不大明白，没有把敌人的范围说清楚。这些年中国太习惯宁左勿右，若是运动的领导把阶级斗争说得太简单太单一，把敌人定得太笼统，很容易扩大打击面，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完全没有担心自身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十分自信是党的忠诚的积极分子。然而正因为这份忠诚，我们不禁担心党的事业又来一次肃反运动那样的失误。我们以为，如果真有居心不良的右派分子，挨整是应该的，但动机虽好，出言或偏颇或片面或完全正确而不顺耳，如此种种会不会都可能误为敌人？那么以后人们还敢不敢提意见？……想到这儿，我们决定给人民日报写一封信把看法提出来，同时抄成大字报在学校发表。即使人民日报不接受我们的意见，至少能在学校范围引起注意，或许有助于在运动中掌握好政策，搞得较有分寸，少伤害一些好人。

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时真是天真幼稚得可笑。在后来批判我们的时候校园中有一组大幅的连环漫画，第一幅就是“螳螂挡车”，画的是我和锡纯这两个螳螂携手企图阻挡反右的列车。这个比喻其实从某种意义看很恰当。回想起来可笑的是我们真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天大的误解。

不到中午我们俩合写的稿子就出来了。在院子里交换意见时很多同学也过来关心。李修生跟着就到宿舍来找我。他当时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学生会主席，这位老大哥从我一年级起就和他很熟。李修生忧心忡忡地劝我这个大字报不要贴，让我慎重考虑，不然问题可能很严重。我知道他完全是一片好意，是真心诚意怕我犯错误。但我这个小师弟很固执，他的话完全听不进。

我们的大字报标题是“这会造成什么？”，副标题是“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模仿着“6.8”社论的题目，用“这……什么”的句型显然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因为我们认为“全篇社论以政治斗争代替了它所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把阶级斗争做了简单化的解释”，“就会引导人们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我们担心这将“造成”：一，误伤好人；二，不敢讲话。

到了下午，两千字的稿子抄了十几张纸，贴在西北楼一楼显眼的楼角处，立刻成了轰动性事件。观者围了一层，议论纷纷，直到天黑之后还有一些人打着手电在抄写，我们心里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听说后来报社记者也来拍照过，这都表明它被重视的程度。

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数以百计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墙面，真有铺天盖地的感觉，内容几乎一律是批判我们的，让人真切体会到“舆论一律”的深入人心和党中

央机关报的号召力。批判的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逐步升级。走在最前头的是苏联文学研究班的“学习社”，一连发了六评。然而在下面同学们却不都“一律”，好多人表示赞同我们的意见，或替我们担心。有人好心地警告我们说这社论很有来头，劝我们小心。

接着的几天报上更明朗了，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几篇社论，风向明显陡转。可是我们还很固执地认为自己有理，自信完全是出以公心，是为了维护人民和党的事业，所以并不害怕。就是怀着这种理直气壮的心情，6月12日我和林锡纯在官方组织的全校论坛上继续阐明我们的观点，但随后几个上台的都是义正词严的批判，不再给我们辩论的机会了。论坛之后走出会场时有几个不相识的同学故意走近我们，悄悄地说：“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可是不能说了……”

现在回头再看，当年打成右派的552877个人（官方数字，实际受害者远不止此。）有几个是敌人呢？而反右之后面对荒唐的大跃进、罪恶的文化革命还有几人敢说个“不”字呢！这两个担忧都不幸成了事实，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能设想到的严重程度。在79年改正复查时我有点儿负气地对办事的人说，“请你们对这个大字报重新审查，不对了还可以批判。”那位同志苦笑了一下说：“这大字报，如果有错，那就是说得太早了。”

历史固然证实了我们的正确，但我完全没有得意的心情，反而走入了感伤、无奈和怅然。几十年前，面对民族大危机大灾难的到来，我们的确站了出来，说了真话，可是除了加重了自己的“罪行”，难道起了什么作用吗？我看不出。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我们的人太渺小了。历史有它自己的“道”，谁也无法左右它，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该纠正的都会纠正。那么我们个人难道只有耐心等待的份儿吗？难道只要学会自我保护就行了吗？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操守吗？

七 早春的凄冷中

五八年三月四号这天未必很冷，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是奇冷的一天，阴沉灰暗，还刮着风沙。

一辆兰白色的大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物理楼前，等着装运我们和行李。这辆车我不陌生，四年前它曾经载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团干部到清华园的礼堂去听陈毅的报告，两年前它曾送我们班到颐和园后边的村子里去野营。今天，它将把四十个右派学生和年轻教师拉到京西昌平县的西郊农场监督劳动，或曰“劳动考查”。

不会有人为我送行。所有的人都和我这个危险的政治麻风病人划清了界限，除了樵。樵在半年前毕业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助教，她那个班的党组织在她的问题上难得那么宽大，只给了她一个团内警告的处分，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樵都是一个最单纯的女孩，她的问题全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樵几天前从沈阳赶回北京，约定到棉花胡同我三姨家见面。偏偏那天三姨同院那家来了亲戚，是师大北校的一个女学生，我们得避开她。在师大，我的知名度太高了，我们俩背着组织的联系一旦被发现反映上去，后果难以预料。我这时才感到是活在一张弥天的大网当中。我们只能在护国寺后身僻静的小胡同里匆匆告别。风卷着一股股黄沙从胡同口吹进来，围着我们俩打旋儿，似乎也在趁机欺负我们。但这时的我们对这些尘土冷风已经全顾不上了，因为我们的心里更冷，更迷茫。

我几乎不忍心看樵的忧伤的眼睛。她最担心的是我这个严重的类风湿病人能不能禁得住农场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怕再一次把身体搞垮，而劳动这关过不去就没法儿证明你“赎罪”的真诚和努力。她还担心我不能打心里服罪，也就没法儿写检查，就永远没有摘掉帽子的一天。

对摘掉帽子“回到人民队伍”，我们谁也心里没数。这是个“新事物”，是领袖的发明，不知他有没有明确的打算。至于摘了帽子以后是不是就算赎清了罪可以平等做人了，我们当

时是没有怀疑的，直到后来才以冷酷的事实让我们明白。摘帽子的时间我们只能瞎猜，估计也许一两年，最多五六年。

樵将等我到那一天。我们之间已无需山盟海誓，樵从来没有把我们作为“你”和“我”分开来考虑问题，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都要共同面对。连续多少天对我的批判会她全都自始至终地坐在那里参加，但是没有揭发过一个字，甚至没说过一句话。组织上动员她揭发批判我，她回答说：“范亦豪的思想我都有，我是来接受教育的。”此时，为我送行的樵虽然忧虑，但比我坚定、沉着。我觉得她的眼睛是无边暗夜中我能看到的唯一的明亮的星，希望的星，也是生命的星。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正理解我，信任我，爱我超过她自己。为了她，我也要活着，活到能够堂堂正正地回到她的身边。掂量一下自己，我还没有丧失坚强，尽管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以为这错误是右派向党进攻时我不但没有保卫党反而给党提意见，助长了右派的攻势，保护了右派。）我真的为此难过，悔恨，但我坚信我是个好人，即使向这个社会证明也许是不起作用的，我要向樵证明，向我的心证明。

不想给樵带去一个颓丧的印象而为我担心，我打起精神，尽量不显得悲伤。我多么想在离别的时候和樵紧紧地拥抱一下，可是在那个年代的街上，又是一个带着右派帽子的我，那可太冒险了！

汽车开动了，车上有四十个年轻人，都沉默着，茫然地不知这个命运之车要把他们拉到何方。我们这些人是属于第二类处理的右派，大部分是极右。按上边的规定，极右分子是：一.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二.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三.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四.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这个规定，一看就知道掌握起来可以是很活的，并且不存在控制的比例。事实上，即使有主观制定的比例，架不住下边积极性太高，求功心切，是很容易超额完成的。我所在的班一共45个同学，严景煦是当作反革命抓的，另一个复员军人由静林怀石自沉昆明湖后是按极右的名号批判的。剩下的五个右派之中四个是极右。到了五八年初处理右派的时候，这五个人里只有一个留校察看，四个是二类处理，劳动考查。

我其实是有点儿庆幸被赐予二类的。仅凭我主持过几次论坛，写了批评人民日报6.8社论的大字报就足够达到一类标准劳动教养去了。何况还有“大量的反动言论”，如“宣扬独立思考，反对当乖孩子”；如“认为毛主席的话也不能盲从，要先想想对不对再执行”；如“党员应该比群众多吃苦多吃亏，这样私心重的人就不敢入党，可以保持党的纯洁”；等等，都被反复痛批，尤其是竟敢反毛主席，可见反党的疯狂程度！我是在最后关头态度“稍有转变”的。先前，既是迫于压力更是出于“为光明正大之事，做心迹坦荡之人”的信条，我已经痛快彻底地交代了所有的言论行动，包括内心的一切“不轨”思想活动，写了有几百页的材料，但就是无法承认我主观上是反党的，因为我无法解释得通。我忍着病痛积极参加整风，坦诚进言，完全是希望党克服缺点更正确更健康地领导革命事业前进，我有的只是忠诚，哪有丝毫反叛之心呢！可是若判为“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两个“特别”，就必是开除劳教，那就连今后为人民工作的机会都要剥夺了。然而我又不能说假话。幸好那时《师大教学》上刊登了团委书记周之良打成右派后的自我批判。他是按“修正主义影响”这个思路把思想根源和动机说圆的。樵劝我参照周的检查。那真是最难最苦的一段日子，可是一旦“想通”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主观反党”这个科研课题顺利推理成功。只要把自己设作修正主义者，所有原来思想里的“革命”“忠诚”“帮助”等等词汇都可以翻译作革命派眼中的“修正”“背叛”“搞垮”……因为你理想的党是修正主义党，你的一切目的都是把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这个“主观”不就是“反”吗！——真是一通百通！

于是刀下留情，虽然仍是两个“特别”，但“最近才稍有转变”一句话救了我。不仅如此，我还被任命为这40个右派的“联系人”。对我如此器重，我一直不知是因为什么，是谁的

主意。

汽车走的这一条路我再熟悉不过了，海淀、颐和园从小就是我周末、假日骑车旅游常常造访的去处。车过颐和园向北，路边有一个大场院，55年的夏天我们班就是在那儿扎下帐篷野营的，樵和我给同学组织西红柿晚会，大家的歌声笑声好像还没散去。西北旺的山头上有个望儿台，爸爸说那是余太君瞭望番邦想念杨四郎的地方。对这种古迹不能多想，它总含着一些伤感。……过了西北旺再往西是温泉，我曾经和朋友们去找过那废弃的温泉，然后登山远眺。……记忆从车窗外向我招手，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我又一次痛苦地意识到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永远弃我而去了，虽然现在我才是二十一岁。我要面对的将是现实的严峻和未来的渺茫。

过了挂甲屯有一条向北的大路直通西郊农场大牛坊分场。在场部前汽车把我们和行李抛下掉头远去。抬眼望四周，是难看到边际的灰黄的土地。西山看来不远，心理上似乎找到了一点儿依靠。不料这时却听到一个同学感叹地说：“望山跑死马啊！”一下子使我觉得可亲近的山也在远去。我们象是一车垃圾被扔在荒原上。

八 河泥与葱油饼

西郊农场大牛坊农场本是个农业单位，劳动者是农业工人。进入1957年成了下放干部轮番劳动的基地，而到这时又增加了一项附带的任务，就是监督改造右派学生和青年教师。

我们这四十个右派被分到下放干部的生产组里，每组大约分到两个。我和中文系的一个助教在一个组，和十来个干部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干部们来自北京市卫生局。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对敌人”决不施仁政”。我从高中二年级就患严重的类风湿性脊椎炎，55年肃反当中劳累过度类风湿严重发作，开学后执意坚持上课，被认为是立场坚定学习努力的好团员，成为党的发展对象，组织对我的健康也关怀备至。既然成了敌人，当然不能考虑这个敌人脊椎的骨膜是否已经破坏，脊柱是否已经强直，劳动去！赎罪去！

下放干部群里忽然来了敌人，来了需要群众监督的危险人物，对那些同住一室的干部们的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是个考验。

这是早春时节，地里刚刚化冻，主要农活是挖河泥，然后把河泥运到地里，准备晾干后施肥用。下放干部的蒋组长派一个最壮实的大汉老陈与我结对儿抬河泥。最大号的抬筐，黑色的湿泥，每次都装到不能再高。这已经不像窝头，而象个粗壮的塔，分量早已超过了我的体重。老陈执意在后边，这样就可以把手放在杠子上走得稳当些，省劲些。他还把绳子尽量往我这边推，让我承担大部分，给我更多赎罪的机会。对于我这个没有劳动过，瘦弱的类风湿患者，这无疑是很好的锻炼。我尽量努力争口气，让身子不要摇晃，可是身不由己，脚下没根，在泥泞的河滩上一劲打滑。于是后面就传来老陈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的申斥。

每天，我居然还能坚持到日落西山后收工的時刻。但一声收工令我就骤然失去支持的力气。脊椎和双腿的剧痛使我长久地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望着在暮色中渐渐远去的人们的背影，一步也挪不动了。

在生产组的下放干部当中生活，自然是绝对被孤立的。在集体的场合除了指派我向东向西干什么活儿，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与我交谈。可是在和我一对一的情况下，有的干部却格外和气，甚至主动说一两句关心的话，似乎有意地让我觉得他并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时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走过来，先前这位往往马上转过脸去收回笑容或者赶快藉故走开。有个三十来岁的小干部小王，大概算不得积极分子，整日对人堆着笑脸，和我从没说过话。一次在西瓜地用芦苇栽风障，我们俩一组，离开大家远些，他的话就多了，问长问短，没想到被发现，第二天会上就受到组长和积极分子的批评，从此不让他跟我一起干活儿。

刚来农场这些日子吃饭也很有意思。这是座高大的屋子，原来大概是拖拉机的车库，下放干部和右派学生一来改作了食堂。这里有些相当高明的厨师，其中有个大胖厨师据说曾经跟周总理去过日内瓦。名厨们多半是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到这儿来的。加上这个国营农场鸡鸭鱼肉蛋奶粮油要什么有什么，到了名厨手下，这个食堂一开饭老远就能闻见扑鼻的菜香。

但对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来说这却是难忍的折磨。我们虽然与下放干部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打饭却是另一个窗口。干部们打出来的是香喷喷的红烧肉、炸鸡、炸鱼、肉包子、白馒头，我们却是窝头、咸萝卜，加上一碗没有油星儿的汤，上边漂着几片菜叶子，天天如此，顿顿如此。最难受的是打得饭来，和干部都站在同一个八仙桌前吃，各吃各的。美味佳肴能看能闻却只见它们送进别人的口中大嚼，而自己吃进去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平时大家干的一样的活儿，或抬着同一付筐。

这时是58年上半年，还是能吃饱的，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通过生动的对比给我们的刺激相当强烈。毕竟我们都是大学生，过去在生活待遇上没有遭到过歧视，现在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异类，在生理上也让你在每顿用饭中体验异类应该受到的歧视。这种惩罚在当年对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学子来说也是挺厉害的。

对年长一点儿的干部来说，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差不多，日久天长有的人就不免产生怜悯之心，而忘了阶级界限。睡在我邻铺的老马，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职员，脸色红润，被太阳晒得脱着皮，眼神透着和善，平时很少说话，只是低眉顺眼地干活儿。一个晚上，已经熄了灯，屋里黑黑的，我还没入睡，忽然老马捅了捅我，嗖地一下把一包东西塞进我的被子。我睁眼看他，他已转身朝另一边睡了。摸摸这报纸包的东西，我已经闻出来，是一张葱油饼。我知道，这是他刚从家里带来的。他们干部的伙食那么好，完全没有必要带吃的来。于是我明白了，眼泪也下来了。蒙着被子，就着泪水，吃下了这张不寻常的葱油饼，然后，很久，睁着眼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而第二天老马与我并没说一句话，当着别人，他的眼光也尽量避开我，似乎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我想起史书的“道路以目”。事实上有的年代是连“以目”也要回避的。

老马同志，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你，清清楚楚。我知道，那个报纸包着的不仅仅是葱油饼，它包着的是许许多多老马代表的老百姓质朴的感情。

九 进城，以“敌人”的身份

在同学的眼中，我交了次好运。到农场两个月后的一天，管教的先生通知我次日和他们一起进城去听报告，同去的还有从团委书记变成右派的周之良。谁作报告，不告诉我，大概是保密的要求。

宣武门外白纸坊这个地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人也是陌生的。我被带进这里的一个礼堂。礼堂只有一层，很一般，但比较大，可以容一千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会，也不敢东张西望。

主讲人出来了，一个大个子，五十来岁，一眼就认出是彭真。彭真显然比以前发福了，肚子凸起，白衬衫外挂着两条背带。他嗓音洪亮，底气十足，嘴里吞吐着胜利者的豪情。讲到得意处，不禁仰天大笑，尤其是在讲到布下“阳谋”把我们这些右派诱入圈套一网打尽的时候。讲话开始时他宣布“这是个左中右大会”，还点了几个知名人士的名字。他特别提到“六教授”是不是来了。我转头扫了一眼也没看清那些头面人物坐在哪儿。我是觉得章罗、六教授据说都是我的领导，我这个小卒似乎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但我终于不敢多看一眼，因为管教的先生就在身旁坐着。我低下头急忙在笔记本上记录，以便把这些珍贵的训诫、生动的讥讽、深刻的批判带回去，给同学们传达。

散会之后，出乎意料地，先生告知我和周之良：“你们在城里有家，可以休假两天。”我们在农场按规定十天可以休息一天，但此前只在农场内休息，洗洗衣服，睡睡懒觉，从来不敢妄想进城。我这次真有特赦的感觉。在北京，家就是三姨的家了，在护国寺。我一个人从宣武门一路往北走，解放的喜悦立刻转化成贪婪的食欲。这条大街饭馆、食品店极多，我是见什么吃什么，馅饼、元宵、包子、奶酪……这个肚子真能装，走一路吃一路，没饱儿。到了三姨家居然还能吃三大碗。

三姨和三姨父邱老先生是绝好的人。（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老先生从前开过一个小药房，定为资本家。但他们没有什么政治见解，他们做人的信条很简单——凭良心，仅此一条。对我这个闯了祸的外甥二位老人全无一点儿忌讳，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而我这个罪人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回报。这是一个小院，三姨住北房，南房是邱家的亲戚，一位耳聋的老太太。在这里我觉得很自在，精神上也可以放松一下。

有两天的功夫，我可以到街上走走。一年来没有人叫我“同志”，在街上，在商店里，人们管我叫“同志”，听来很震动，觉得挺亲，又觉得有愧。我是不是在欺骗？我应该坦白告诉每个人“我是右派”，但我张不开口。

在理发店，镜子里的我是一付紫黑的脸膛。和旁边的顾客在镜中的脸一比，显得太怪了。我这两个月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大改变。后来才知道刚开始下乡都会晒得过分紫黑，然后慢慢再变得浅一些。理发员也奇怪地问我：“您怎么晒这么黑呀？”他当然是无心地问：“您是学生吧？”我非常矛盾，支吾了一句：“我下乡劳动晒的。”事后好久我还在恨自己为什么不敢对人说真话，这是不是不诚实？我想过要说老实话，但害怕对方知道面前来了个“敌人”时突然变脸，让我失去难得看到的亲切。

在那个年月普遍的习惯是相信党的话，而任何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出于对党的无条件信任，谁如果被上边定为敌人，很少有人不信。所以那时的右派真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个右派，在陌生的环境里，身份一亮，就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憎恨、蔑视和戒备，至少在精神上是一种可怕的酷刑，足以让你心寒心悸很久。因此在不是必须的时候回避谈到自己的政治身份，应该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吧？今天看来，当时的自责真是傻得过头了。

十 又来了两支队伍

大约过了三个月，上边决定把我们这四十来个学生从下放干部的生产组抽出来，集中编在一起，归入园艺队，成为两个生产组，可能是为了便于管理。

同时我发现农场里又来了两支学生队伍，一支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右派学生，一支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右派学生，都有四十人左右。我禁不住想，北京师大学生足有六七千人，右派划了几百，其中四十个作为加重处理发到农场比例还不算大。而体育学院学生最多不过一千人，政法学院学生数也不会太多，竟都整整齐齐送来四十人，这大概又是按指标下达的任务。只可怜了这些小学校的学生。

三个学校的学生不住在一起，避免互相联系，但在路上和地里也常能互相见到。有一天忽然看见政法学院的队伍里有个极熟悉的身影，瘦高的个子，留着平头。这不是王慈吗！他看见我也先是一惊。匆匆一个照面，只能叫声名字，问问身体，道声保重，马上分手。到底因为犯了什么事儿到这儿来的，在右派同学之间是从来不打听的，这太刺激，而且谁也说不清。朋友之间不该说违心的话，说真话又怕传出去成了“翻案”。

王慈是我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比我高一班，团总支的干部，没毕业就抽调脱产当了生活辅导员，负责学生工作。象这样的同学在团员（当时的团员可不象现在的）当中往往各方面都是拔尖的。在印象中他的思想比较活跃。他什么时候考上政法学院的我不知道，但在这里碰见他我并不难理解，不用问，一定是也犯了和我一样的毛病。1984年10月南开中学八

十年校庆我从青海回来参加活动，我们五个老右，包括王慈，在图书馆前合影，镜头里几个人开怀大笑，王慈也不例外。可是谁也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自杀了。没有留下遗书，原因不清楚。他这时已经从发配地贵州山区调回了天津，在市政法学校当副校长，也早已结了婚，有了孩子，按说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人估计是因为校庆时见到了三十多年前的恋人，感伤于不堪回首的爱情。大约还是太动真情而不能冷静地洞察事理。

政法学院队伍里还有一个学生也让我忘不了，是个身材瘦削面貌清秀带着副眼镜的小伙子。平时见过他几次，不知叫什么名字，只感觉是个学生气十足的一个人。一天场部开大会，叫三个学校的右派都参加，是一次批判会。被拉上台的原来是他。罪行是不认罪，信仰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声称最爱唱的歌是南斯拉夫的《深深的海洋》。最严重的现行活动是他居然趁休假进城之机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使馆拒绝。在会上登台批判他的主要是他的同学们，虽然也都是右派，但各个作义愤填膺状，有的批判稿用四六句写成，颇有《六法全书》判决辞的风格，很见文字水平。批判会的最后一项是他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吉普押送劳动教养，比我们提升了一级。

谁都明白：杀鸡给猴看。

我更喜欢看见的是体育学院那些健壮的运动员。一个个都那么壮实，皮肤晒得黝黑发亮，浑圆的肌肉让我羡慕。这么棒的身体把劳动是不会当一回事的。看他们在地里潇洒地挥着锄，在路上轻松地担着水，在场院上有节奏地扬场，动作都那么舒展，那么优美。他们里边有篮球运动员，高大的个子。有举重运动员，看那敦实的身材就知道。还有两个姑娘，大概是体操运动员，即使在那种境况中仍掩不住全身洋溢的青春和健美。搞体育的为什么也有那么多右派？当时体育学院学生都是从全国选拔来的尖子，而运动生命的高峰也许两三年三四年就会过去。我禁不住替他们可惜起来，可他们自己仿佛都乐呵呵地，也许真是头脑简单吧？然而如果真的头脑简单为什么也分配给他们这么多指标呢！

十一 难友们

把我们这四十个右派集中起来管理，我是欢迎的，觉得是一次小小的松绑。同学们在一起，都是右派，平起平坐，关系是平等的，心情可能舒畅些。

学校党委派两个干部来管我们，一个姓赵，一个姓马。我们已经从“同志”中开除出去了，无权叫他们“赵同志、马同志”，只能称之为“赵先生、马先生”。

赵先生也就三十来岁，好像是正职，主管政治思想，一脸的严肃，从来看不见笑脸。马先生主要管生活，不到四十岁，脸是圆的，黑边眼镜也是圆的。他对我们要和气一些，很少训斥，虽然也没敢流露出明显的同情。

我们这些人都犯了什么事，在日后隔不几天就开一次的思想检查会上慢慢都了解了个大概，不少在大字报上点了名的知名人士和本人也对上了号。在他们身上大体可以看出师大反右斗争的缩影。

有几位是因为反党委书记。“何穆事件”的轩然大波中有的人保书记，有的人对书记提出质疑，转入反右以后性质立刻分明，保的当然成了左派，质疑的必是右派。

胡风问题也是试金石。提出“胡风何罪”的，有的已经劳教，有的到了农场。谁说胡风没罪？这不！？害了多少人！

还有曾经“为教育事业鸣不平”的，想请刘少奇来北校参加鸣放会，自然是右派。

有个署名“呵欠伯”的大字报，题目是“岂不令人深思”，作者是数学系的高材生罗里波。起初他被批为反革命，从宽处理到了农场。他有严重的肺结核，脸上经常烧得发烫。没过多久实在难以坚持那种重体力劳动，就遣送他回家乡监督改造去了。但当我在一年多之后减轻处分的前夕，见他又回农场了。我问他：“病好了吗？”他说：“没好。”“那你为什么回

来？”他无可奈何地回答：“在那儿谁给我摘帽子啊！”双颊上还是两团红晕。此人改正后坚持回师大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也坚持要他。据说学成后去了美国，为美国输送了一个人才。

师大的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钟孙也害了一批年轻的数学才俊。傅是个忠厚耿直的老先生，在师大公认的德高望重。整风期间被上边的诚意所感动，写了一份意见书，曰：《中共失策之一》，批评过去的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说有些老知识分子十分伤心，以泪洗面。这一来上边勃然了，一脚踢翻了傅先生一生爱党爱国的所有功绩，那些功绩反而都成了两面派的伪装。傅先生成了重点整的对象。尤其是因为他在群众里威信高，更需批倒批臭。无奈在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研究生和助教不识时务，就是想不通，站出来为傅老先生辩解，于是一网打尽。这些人有的发配边陲，有的落到我们这个群体里。大约两年后为庆祝国庆十周年，昭示党的政策的英明和宽大，给少数几个罪行较轻的知名人士摘了帽子，这里边就包括启功、傅钟孙等人。没想到傅老先生经受不了这个自天而降的喜讯，一个激动，心脏病发作，溘然西去。留下他那些忠诚的弟子们还在继续赎那永难赎清的罪。

本来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培养目标是语文教师，在文艺创作上不需要太热心，偏偏有些同学痴迷于创作，不知文艺创作是最危险的事儿。北大出了刘绍棠是“由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堕落成右派”的才子，师大就不能没有。中文系四年级和我一块儿从天津来的魏锡林就定为刘绍棠式的右派。他是五七届的右派，在当年夏天就匆忙处理了，那时还没有劳动考查这一说，魏有幸分配到天津附近的学校工作考查去了。

五八届的诗人彭浩荡就不一样了。彭浩荡长在湘江边，和屈原同乡，天生的诗人性情。五六年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问世，他激动得不得了，用马雅可夫斯基体写了首诗《我们的》。那一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周末常举办诗歌朗诵会，一次臧克家正在主持，台上是名诗人或名演员在朗诵郭沫若、李季、郭小川等人的诗。彭浩荡闯上了台，要求朗诵自己的诗《我们的》。臧克家很理解年轻人的心情，也爱才，并不嫌他冒失，临时把他加了上去。这一朗诵还挺成功。他这首诗后来被收进臧克家编的诗集《北京的诗》。一个年轻人的名字与那些名诗人的名字并排站在目录里。

彭浩荡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未必能耐心地思考过什么问题，可是他好冲动。鸣放时第一次群众论坛“何穆事件”开始前他即兴写了首诗《站上来》，开场时我给朗诵的。这首诗当然成了毒草。反右时不知根据什么，只要是动员鸣放——虽然是毛主席号召的——都可以定为“煽风点火”。彭什么时候都是一片赤诚，自然不承认反党，于是“极右”，和我做了伴儿。

农村，对彭浩荡还是比较适合的，他身体也棒。暖和的季节他每天总是光着膀子，扛着一把铁锨，高高兴兴地唱着去上工。大自然的每个新鲜的变化都让他兴奋、惊喜。对农活他也感兴趣，农工师傅都喜欢他。但也免不了一阵沉默不语，特别是要检查思想的时候，因为对于反党他是不会想清楚的。只有一点说明他还不够幼稚，那就是他不再谈诗，一句也不再写。有一度他对诗重新燃起兴趣。是大跃进当中兴起了所谓新民歌运动，郭沫若、周扬一个劲儿地鼓动，还编了本《红旗歌谣》，为大跃进加油。于是社社村村的墙上都得写上墙头诗。浩荡和两个同学借了辆三轮板车，利用他们存的休息日兴冲冲地到各村去采风。转了一圈，抄录了一堆，发现那都是东抄西抄的，大同小异，很少有新鲜的东西，于是没有了热心。此后绝口不再言诗，认真专心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农民。

把自己的遭遇和别人比较常常是能使心理平衡平静的好办法。我一向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冤的，这么想的时候脑子里往往出现两个小同学的形象。

这两个小同学都是中文系的，整风反右到来时他们都是一年级，也就十六、七岁，个子都小，一脸稚气，简直是娃娃。小圆脸戴一副黑边眼镜的叫刘承立，湖南人，获罪原因是写电影剧本感兴趣。刚练着写出一个剧本，被拿出来一分析就成了反党毒草。在那个年月任何写出来的东西几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析成毒草，而且不容争辩，越辩则态度越“恶劣”。

所以这个孩子也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农场。

还有一个是徐福绵，东北来的，小小的个子，永远挺着胸脯，干活儿有股狠劲儿，从不示弱。别看他小，割田、担水、抬筐、翻地、除草绝不让身强力壮的大同学。在中学他就是学习尖子，聪明，爱写诗，记忆力好，能背诵大套的古诗、新诗。外语也出众，背俄文诗是他的专长。快人快语，锋芒太露，于是成了我的伙伴。

徐后来被罚到中国最西端的喀什，在二中教书。文革后成了特级教师。长年的辛苦加上高原不适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因为教得太好，当地坚决不让内调，现在还在新疆。直到几年前他才知道，他的右派完全是因为一个同学的诬陷。纯粹是无中生有，批判会上他非常激动、愤怒，他抗议，但没有用。把他逼得批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气极了说：“你们说吧，我什么都承认！”这个孩子，太没有政治经验，不知道这个“承认”的利害，这是一辈子的事啊！北师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作为特级教师被请回母校，离别了四十年我第一次和他重逢，同时第一次知道了他被冤屈的原委，我们俩在大庭广众当中抱头痛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泪眼中看到的他，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人，我能说什么呢！写到这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我是在为当年的小伙伴一哭，也为多难的中国一哭！

还有，就应该算是笑话了。我们的队伍到农场两个多月后补送来一位历史系的讲师。此人叫刘蓬，四十多岁，瘦弱的身子，还有些驼背，窄窄的脸上已有不少皱纹。看他岁数大身体弱，大家干活时往往照顾他。那时候的讲师都有相当的根底与学问，听他随便聊聊颇能受益。大跃进采风的那阵儿，他还带了几个同学去附近村子访问过还活着的义和团大师兄，西山一带是当年义和团的一个策源地。就是劳动当中再照顾他，那年月超工时超负荷的劳动也够他受的，劳动表现没法子突出。所以我提前减轻处分回校时他还和大部分人留在农场。直到1979年春我返回北师大交涉改正的时候才听到他的消息。他那时也从外地回到学校，要求改正，可是经管的人一查，没有他的右派档案——他根本不是右派。他的下农场是因为五八年学校精简下放一批教师，政治条件不好的往往下放到中学或外省市，当时决定刘蓬到内蒙。他不愿意，说宁愿去劳动，好，于是弄到西郊农场。既然到了右派圈里，这里的干部自然认为他也是右派，他自己也误以为划成了老右。二十二年过去，才查清缘由，这才真是错戴了帽子。但是不能“改正”，因为原来就不是，所以反倒没了办法。给右派落实政策的一切措施，他沾不上边，虽然过去他大大沾了右派的光。这位先生此时已有六十多岁，至于后来怎样，不得而知。

捎带着我想说说另一个人，那真是另一种人，与我们这些完全不是一路，我从来不把他算作“难友”。

此人姓常，名中，和我曾经同班。划成右派并不是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太讨厌。他平时吹牛撒谎成性，极端自私，不讲公德，就让所有的同学讨厌。到了反右，班干部们特别是女干部，坚决要把他办成右派。据说最初报了两次材料上边都给退了回来，说是政治性的材料欠缺，后来不知哪位终于发现了一两条能上纲的东西，总算划成了右派，但也只能算是一般右派。一般右派却受监督劳动的处分，这也是少见的。谁知在我们堆儿里，他却因此有了优越感。“你们是极右，我是一般右派！”由于高人一等，他得意起来。同学们在劳动上都很卖力气，有的是出于赎罪，有的想表现好早摘帽子，有的尽管不服罪却觉得为国家劳动毕竟也是好事，常中却极其怕脏怕苦，没有一天不偷奸耍滑。他有他的路子，就是汇报别人的问题，当带队干部的耳目。开始时那位赵先生把他当依靠对象，公开支持。赵先生把大家训了一顿：“你们骂常中投机，你们是投反革命的机，他是投革命的机，总比你们强。”有了组织的撑腰，他就更理直气壮地干起了陷害同学的事业。他走这条立功的路其实也蛮辛苦。大冷天的，晚上大家在屋里说话，他得猫在窗外作记录；一个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在村边散步、谈心，他需要藏在桥下边、草丛里监听；大家上工了，他要在宿舍里关心人家的日记、信；……。

我所以介绍这样一个人，是针对人们之中常有的一种笼统的说法：“右派都是正直的有

才能的人。”不，不能一概而论！只可以说“大致如此”。要知道也有丑恶如常中之流阴差阳错弄入右派队伍的，尽管很个别，却不可不察。

十二 “三面红旗万岁”

悲剧往往是从喜剧开始的，而我们这里却常常始自闹剧。

园艺队的活儿停了，因为让我们去砸铁，说是“钢元帅要吃饭”。这时农场场部前后已有几十座小高炉。大路两边，永丰屯、皂甲屯这些乡里，直到山脚，处处是土高炉。到了晚上大地上处处火光，如果从飞机上看该是无边的星海，是壮丽的奇观。农场到农村各家各户凡是铁的东西都献出来。这次的献铁活动之彻底，让我颇不应该地想起沦陷时期的“献铜”。那时每家每户的铜烛台、铜壶，连箱子柜子上的铜锁铜篋子都得拆下来，是为了“圣战”，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被迫的。这次却完全相反，虽然家家户户做饭的铁锅都统统上缴了，可老百姓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即使有些老太太掉了眼泪，那是落后。炼钢需要的是生铁，我最受欢迎的是铁锅，特好砸。我们从早到晚就是抡大锤给“升帐”的“钢帅”备料。有几个心灵手巧的同学则派出去学用坩子土陶小土炉的炉膛。政法学院的右派学生和一些干部农工还搞出了平炉（据说是）。到了晚上自然不能睡觉，我们轮番地拉大风箱，几个人才能拉动的特号的风箱。夜里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加餐，也是特大号的包子。

“出钢了！”“出钢了！”都争着敲锣打鼓报喜，车拉，人抬，把一块块土钢运到场部门前堆起来。厂部前立着两层楼高的宣传牌——“超英赶美”，我们的钢元帅骑着一步登天的指标箭头，把英美帝国主义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生产的钢，不管是什么钢吧，都为增加中国钢产的数字贡献了力量。全国人的心也像钢炉一样滚烫起来。

土钢的砣砣堆在场部房前屋后，并不见谁把它们运到什么地方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离开农场，已经被遗忘了的它们还堆在那里纪念着那些火热光采的日子。

把农民家的锅统统砸碎无需担心，因为几乎是一夜之间农村全都公社化了，农民都吃上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不但周围农村，连西郊农场也进了公社。本来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也不如“公社”时髦。农场和永丰屯乡等等方圆几十里组合成永丰公社。

我在大学里当过文娱委员，曾经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生广播合唱团，这点儿能耐现在派上了用场。在农村我教的第一首歌就叫《吃饭不要钱》。学歌的是农场新吸收的几十个初中刚毕业的合同工。

“哪里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社员笑开颜……”

后边的词现在我是忘了，但是坐在前排学歌的那些女孩子唱歌时兴奋的发红的脸和发亮的眼神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

既然实行公社化，组织上也要军事化。到食堂去吃饭也要整队、跑步、唱歌。我们这些右派学生是不是也成了社员，没有明确，但吃饭是跟农工、干部一视同仁了。这不能不感谢公社化。

没多久我们奉命迁到农场北边一河之隔的上庄，住在老乡家里。因为都是公社了，那里成了上庄大队，也算农场的队，吃饭就在上庄的食堂。社员们家里早没有锅灶，不但吃饭连开水都在公共食堂打。那阵子食堂的伙食相当好，吃饭管饱，只有一个限制——许吃不许带。一天晚上吃炸糕，一个就有手掌大。我的饭量算大的，当时一顿可以吃一斤半面，这种大炸糕也只吃了六个。而一个社员小伙子据说一口气吃了三十二个，也许是夸张了的数字。第二天早上知道有位老社员吃了十个，当晚就撑死了。

中国农民一向有勤俭朴实的美誉，现在，既然吃的是公社的，不是自己的，就无需小气、节约。58年中秋节这一天，食堂把八仙桌在过去地主的大院子里摆成几行，八个人一桌，鸡鸭鱼肉十二个大碗，吃得是喜气洋洋，热气腾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这么吃，还不好？

上庄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有名的温榆河从村南蜿蜒流过。水很净，北京水厂也用它的水。我们夏天干完一天的活儿，常在河里洗澡。一天下午，收了工，郭明亮从外边进来叫徐福绵和我：“老乡在河里下了鱼藤精，鱼都翻上来了，抓鱼去！”我们带上簸箕到河边。河面上到处漂着鱼，肚子朝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他们俩下了水捞，我在岸上装筐，一会儿就两大筐。我们把鱼交到食堂。路上看见在通往场部的石桥那里，社员把桥洞用藤条的围子挡起来，顺水漂下的鱼都在围子前堆积起来。他们一大帮人用铁锨把鱼只管往岸上铲，直接装上马车，一车车拉往食堂。经过这种灭绝性捕捞，河里的鱼会不会断子绝孙，何必操这个心呢！

于是我们的食堂那阵子连吃好多天油炸鱼，管够。

一天晚上在场部大饭厅也是大礼堂开社员大会。饭厅里人都站不下了，很多人只能站在院里，足有两三千人。公社书记兼农场书记在台上作传达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传达中央描绘的蓝图，告诉大家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毛主席给人民开出了食谱，每人每天吃多少牛奶、鸡蛋、肉、鸡、水果、西瓜……我们想不到的好吃的他老人家都给我们想好了，比外国人的日子好多啦！关于未来的分配制度，有三种方案：一是全供给制；二是半供给制；三是工资制。最吸引人的当然是全供给制。眼看物质生产就极大丰富了，实行全供给制有了保证，到那时货币不再需要，你想要什么只管取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老人家理想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已经近在眼前！所以书记在台上让大家对三种方案选择的时候，忽拉一下子，会场内外所有的人都举手选择全供给制，一致通过。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一个个的兴奋劲儿难以形容，谁也没想到共产主义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这时有人递了条子，问以前借了人家的钱，欠了人家的债，没了票子往后怎么还呀？书记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都各取所需了，还不还债还有什么意义！”又引起一片笑声。

夏收之后，据说各地都是大丰收，一个个高产卫星飞上天。不然怎么叫“大跃进”呢。报纸上接连不断报道高产新纪录。亩产千斤已经落后了，小麦已高到五千斤、六千斤……青海高原上的格尔木农场达到亩产 8585 斤。水稻就更高得了得。天津创造了亩产 12 万斤的纪录。报上有照片为证，小孩儿可以坐在稻穗上，掉不下来。“喜看稻菽千重浪”，毛主席走遍全国看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派丰收景象。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不解放思想你就跟不上，跟不上就得倒霉，更不用说怀疑和反对了，“前车之鉴”我怎敢忘呢？

我那时是生产组长，一个转业军人刘队长直接领导我。一天晚上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是打擂台，还是那个礼堂。一个个生产组要上台报告试验田的高产指标。既然是打擂台就得象参加拍卖会，一个更比一个高。光吹牛皮放大炮不行，还要有增产措施，这才显得科学。我很为难，里面开着会，我蹲在门外跟大伙商量。受报上的宣传和会场上气氛的影响，我思想也解放多了。考虑到农场的优越条件，加上措施得当，小麦一万斤亩产我觉得是可能的。刘队长说不够高，大家只好七嘴八舌地出主意。那时毛主席有个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我们就围绕这八个字想主意。深翻五尺，不，一丈。因为据说“麦根通黄泉”。肥，一层牛粪，一层马粪，两层人粪……豆饼、麻渣、颗粒肥、细菌肥、化肥……都上了，再煮一匹死马，连汤带肉浇在底下……。亩产三万，不行，五万，还不行……有同学提出大家全体出动，用棉球钓蛤蟆，一颗麦子底下埋一个。有的说再出去打几条狗，煮烂，给小麦吃。那就十万吧！不行，会场上又长了。我也想开了，反正都是吹牛，不吹过不了关，好，三十万！刘队长觉得这回心里有了点儿底，转身进了会场。可是没两分钟又出来了：“行了，不用报了，人家已经一百二十万了，得了冠军。”他似乎也如释重负。我挤进门，看见台上那位冠军戴上了大红花，正在接受着大家的欢呼。

这时天色已经发白，干劲冲天的社员抄家伙整队下了地。大跃进嘛，就得不睡觉。

我们的小麦试验田拉上了电灯，这是时兴的挑灯夜战。要求深翻一丈，实土一丈，挖出的松土就得堆两丈高，土要一级一级往上倒。这些日子每天劳动有十五个小时，入夜以后又累又困的人们都喜欢找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干活。躲在暗处，从远处看人在挖土，其实只是在比划，一锹下去顶多铲几两土。也难怪，谁还有劲呢！

夜晚我们是参加夜战，白天有些日子是跟车到圆明园牛场拉牛粪。部队派来了支援的军用卡车，车帮高，很能装。牛场附近是北大和清华，往南能看得见北大琉璃瓦的屋顶在阳光下闪亮，往东能看见郁郁葱葱的清华园，那里的同学在上课吧？然而对我来说大学校园已是遥远的另一世界，而背后那有着沉重历史沧桑感的圆明园倒更适合我目前的心境和处境。不过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去凭吊古迹和遐想啊，锄粪才是现实。

从牛圈起出的牛粪还是热的。两三个人装满一车以后要跟车回来卸车。人累极了，就在牛粪上铺上随身带来的那小块防雨的黄油布，躺在油布上软软的热呼呼的，车摇摇晃晃地，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至于粪水渗透了油布，弄湿了整个后背，有时人渐渐陷到稀软的粪里，都毫不计较。空车再去的时候，躺在靠车帮的坐板上，随时可能被甩到车下，这些危险我们谁也不在乎。我这才知道人最困的时候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要求就是睡觉，此时连死都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冬小麦试验田种上了，全队种了五亩，一层层肥料都不含糊地到位。没过几天出了苗，天还没冷已经疯长到一人多高，麦子没法儿站稳，东倒西歪，而且还在不停地长。因为是密植，太密，不透风，虽然有通风道还是沤烂了，只好全部割光喂牲口。但刚割完又象童话影片里的镜头一样，忽忽地又长了出来，直到严冬到来，冻死。冬去春来返青也特别快，又扶摇直上，大有大跃进民歌常写的“麦芒刺破天”的势头，然而长到一人多高又纷纷卧倒，又割，又长……终于，颗粒无收。那一带的各种高产卫星试验田大同小异。

受益于不久前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对大炼钢铁、大跃进、公社化当中的种种荒唐，起初我真的没有怀疑。直到积累了太多的印象，静下来的时候，心中才小心地冒出一个问号，而且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些问号。一向以说真话作为人格追求的我，在形势需要不能回避的时候也学会了跟着吹牛撒谎弄虚作假了。就这样，我卑琐地保护着自己。我的改造确实见了成效啊！

不仅我个人从反右受益，五七之后中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于是把荒唐推到了顶峰。时隔不久客观规律无情地报复了我们，无助的底层百姓饿死不下三千多万。然而却据说那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以我当年的印象，那三年是少有的风调雨顺，老天实在冤枉。有人呼吁为老天爷平反，不，使不得，老天爷把责任推掉了，那么该谁来承担呢！

十三 大地

是出于习惯还是美好的愿望，人们总是希望心灵美的人外形也是美的。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有意塑造了一个奇丑的嘎西摩多想来打破这种传统观念，这也同时证明了习惯的思维定势的不易改变。谁都免不了以貌取人。

我初到农场遇到的第一个师傅姓王。他是山东人，五十多岁，长期落户在北京，是北京四郊有名的“西瓜王”。我们那个生产组种着二十亩西瓜。种西瓜是技术活，王师傅是我们的技术指导。初见王师傅，他的特别的外貌让我暗暗吃惊，不说顿生恶感，至少难以觉得亲近，他实在太丑了。他的样子使我不禁想起中国传统迷信中夜叉的形象。身体黑瘦，骨头支楞着，背有些驼，头顶是尖的，两耳也是尖尖地立在两侧。金鱼眼，有点儿突出；豁牙。这个长相一下子很难和善良的感觉联系起来。

我找不到一个故事性的情节来说明我如何突然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首先让我感到的一点是这位雇农出身的老人对我这个右派却从没有当成敌人，没有一些下放干部们作出来的阶级仇恨状，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他给我和下放干部分配活儿的时候完全是一视同仁，说话的态度也与对下放干部完全一样，这对生活在歧视中而格外敏感的我已经很有些感动了：他把我当作人。

但是真的让我对他产生亲切的好感还是在干活当中他的形象。我想不到自己是从他动作姿态神情的美中喜欢上这位老人的。看到他干活的身姿难以想象他是个精瘦又驼背的老头儿。一抱芦苇在他怀中，只在跨出的大腿上一搓立即均匀散开，两下子就变成风障。给刚出苗的瓜地浇水不能浇明水，要劈沟浇暗水。他那闪亮的片镢在长出两片小叶儿的瓜畦里呼呼地劈出笔直的半边槽，嫩苗被擦头而过的镢片搨得微微颤动，却一点儿也伤不着。让我想起李白诗中“昔有郢中质，一挥成风斤”的绝技。浇水时看他怎么改口子。水滚滚而来，王师傅不慌不忙用镢一推一拨，口子的土只湿了一层皮，而干土却越改越多。我没见过谁有这个本事。几乎所有浇地改口子的人都手忙脚乱地在近旁地里挖土，浇完后的口子是个泥疙瘩。锄西瓜，别人是用小锄，师傅耍大锄，拉开架式，象武术家一样，他锄得又深又透又快，最后一招是“刷刷”一壅，畦里的土抹得光光的，轻柔地托着一窝窝小苗……我在这个时候把别的都忘了，奴隶的身份也忘了，只觉得这活儿干得真美。我琢磨着，学着。我学会了改口子的绝活儿，王师傅浇一天地白底布鞋上没有一个泥点子，我也能差不多。我也学会抡大锄干锄瓜地的细活儿。师傅的笑容是对我这个好徒弟的认可，我们成了美的知音。他肯定觉出我和他一样的感情。

我绝不是说什么劳动改造了我或什么劳动人民教育了我。我是在这个老人的艺术创造中被感动了，我忘了现实中屈辱的处境，走入了另一种美，也觉出了人的美……晚饭后我常和王师傅一块儿蹲在瓜地的水渠上。他托着小茶壶，无言地眯着眼看着面前这片一天一个样的绿色的瓜田，好象是用眼睛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瓜田被渐渐落山的夕阳涂上金黄、橘红，微风中瓜叶在悄悄地说着它们自己的话，我相信师傅是听得懂的，从他的笑容可以看得出来。白天在压蔓的时候我见他蹲在地里全身几乎蜷成一团儿。我知道他为什么成了一个驼背的老头儿，那是几十年瓜田劳动付出的代价。可是他要起铁镢和锄头却“动如脱兔”，无人能比，那是个绝妙的舞者，是魔术师。这里面同样包含了许多艺术的东西。

在上庄，他和老伴住在与我们相邻的一家老乡的院子里，住着一间小屋。他们有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小孙女。有时他老伴做好吃的，包饺子或大饼炒鸡蛋，常把我叫去，当成家里人。他身边没有儿子，也许他对我无言的感情里也含着一些父爱吧？

第一年的瓜田是大丰收。收获的时候，我和表伯诚结成对儿，抬着大号的架筐和大家一起把瓜抬到公路上装车，每趟都装一百多斤。干得紧张，我那本来已经压得结实的肩膀也有点压肿了。

休息时，在瓜棚下，师傅指点着地里他有意留的瓜，告诉我到瓜田里去摘那个“黑崩筋儿”，那个“三白”，那个“花绫”，那个“小日本”，那些都是最好的，他心里有一本账。摘来打开，犒劳我们，也留籽儿。那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第二年（59年）眼看西瓜就要大丰收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一天下午，我正休假在屋里大概是写自我批判，突然外边卷过一天的黑云，一阵冰雹下了十分钟，小院里铺满了蚕豆大的雹子粒。我赶快跑到地里，全完了，所有的绿叶都打光了！这时天已转晴，只见一个个圆溜溜的西瓜在太阳地里闪着光，瓜上伤痕累累。师傅带领大家挑伤势轻一点儿的赶快装上汽车往城里运，可是有伤的瓜人家不收了。再过了几天从瓜地旁走过，地里已经臭不可闻，全都萎了。常说“雹打一条线”，别的地里并没有多大损失，偏偏打了最娇贵的瓜地。

王师傅因此大病一场。我去看他，他躺在炕上，只示意我坐在炕头他的旁边，一句话也

没说。我就这样样默默地坐了很久，我相信这样他能感到一些安慰。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听一个当代美学的讲座，没想到碰见当年一起在农场劳动的同学翁柏青，于是相约一块儿去农场看望故人，重游旧地。我想起我们曾在房东谢家我们住屋的门上贴过一付春联：“此处水清心可洗，他年西山谢东风。”我并没有真的按谁的命令去洗心革面，也不想谢那个“东风”，但我真的想念那块共过命运的土地，想念我的师傅和那些与他一样善良的师傅们。那个院子还在，老房东早已去世，听她的女儿说王师傅和别的师傅都陆续回老家了。算一算，王师傅也许已经不在了吧。师傅走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他和善憨厚的笑，眯着的眼睛，张开的嘴，豁牙，这是不灭的亲切的记忆。

您，李师傅、马师傅、丁师傅、白师傅……和善良的老乡，你们是大地，承载着不幸的我们。

十四 淘粪在鼓楼近旁

当管理右派的两位先生在会上宣布我和另外三个右派减轻处分回学校的时候，我的心情还真难说清楚。当然，让我回去继续学习应该是离摘帽子近了一步，这也意味着我和樵重聚的希望增大了一些。何况我这一年十个月的劳动始终是带病咬牙坚持下来的，很难说我还能坚持多久，一旦身体垮了，我在这儿是没法儿继续赎罪的。

但是我担心回到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圈儿里对我的精神压力一定会大得多，日子会更难过。我在以前甚至萌生过一个想法：如果给我就地摘了帽子，我简直想在这条温榆河旁定居下来……当然，我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樵还在等着我，而且我的命运都只能由组织决定，去留怎么能由我自主呢！

五九年国庆过后，我和同一批回校的彭浩荡分到中文系四年级。这个年级比我们原来低两级，是五六年入学的，反右时他们是一年级，右派自然比高年级少。

当时打了几个右派，有的送去劳教，有的还在农场劳动，四个小班只有留校考查的两个一般右派。我们俩来得正好，填补了两个没有右派的小班的空白，给他们每班配备了一个反面教员。即使我没有进行任何“现行活动”，至少可以因我的存在而使班上阶级斗争的弦紧紧地绷起来，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贡献。果如所料，重回学校这段日子在精神上比农场生活的后期难受得多。我离开了那些把我当作“人”来平等对待的师傅们，老乡们是那么的“不习惯”不适应。

显然，在我们到来之前班里作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所以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空前的孤立。反右之后这个班阶级的等级非常分明，谁是左派谁是中派几乎一下子就能分辨得差不多。只用耳朵听声音就大致不错：左派较之中派一般音量大，频率高，底气足。从对我的态度也能准确地感知出来：左派严峻，中派回避。中间派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为表现立场鲜明在公开场合对我格外严厉，而有些被视为白专因而受压抑的同学私下里一对一的时候对我倒比较和蔼，但谁也不敢多说两句。

党组织指派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同学专门监督教育我，于是我可以经常聆听他的批判和训斥。他按支部指示要求我每天写一份思想汇报，必须写出新的反动思想活动。这是最难完成的作业。我如果真的写出可以分析为“反动”的思想，岂不是不断地罪上加罪，我还有摘帽之日吗！如果没写反动的思想活动，就是“不老实”，而“不老实”就是态度恶劣，就是坚持反动立场，那还能有好儿吗！因此写思想汇报的过程是一种艰难的创造过程，其中分寸的掌握是最重要也是最费斟酌的。（有了这种体验，日后写科研论文觉得轻松多了。）每天我都要编出一至几条可以称得上“反动”然而又不太严重的思想活动来应付。后来实在没有可写的，还即兴写些感想，譬如赞美一番学校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随即对比和自责一通。但立刻遭到批评，说我用“写散文”掩盖反动思想。实在无法，我偶尔品评一下身边的左派

干部，暴露自己的思想活动，因为这里就会提到他们的缺点，总可算是我的“反动思想”吧？谁知这下惹恼了他们，大会小会批判，我才觉悟到自己的不明智。我应该知道即使我犯再大的罪也不会比这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于是我的态度被上升到“不认罪”。对右派来说，最有杀伤力的打击莫过判定他“不认罪”，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改造之后，落个“不认罪”，这不是等于退回到起跑线重新来吗？幸而我比较理智，知道他们无非是在我的身上比“左”，锻炼拳脚，决定随它去。我照样挺直腰杆儿走路。嘴里还时不时地唱两嗓子来舒解精神的压抑。彭浩荡比我还苦，他是诗人的性格，不愿意说违心的话，天天处于这样的逼迫折磨之中，终于精神失常。

此时已经基本不上课了。一批资深的教授如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俞敏等都成了右派，一批打成右派的年轻助教有的被劳教，有的送劳动考查，和我同去农场的就有四位。右派当然不能上讲台，其它教师除个别的左派，大部分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被赶下只能由无产阶级占领的讲台。学生搞科研，学生编教材，成了教学时间的主要内容。我们四个右派学生是没有资格参与的，一到这时间我们就被分派去劳动。

四个右派在一起劳动精神上倒是得到暂时的放松，虽然除了有关眼前劳动的事别的话谁也不敢多说，怕万一哪句话犯了禁被谁汇报上去。我和浩荡毕竟是长期共过患难的朋友，可以互相安慰几句。劳动的内容大半是淘粪积肥。不知是不是与上等人蔑视厕所淘粪的传统有关，多年来让牛鬼蛇神淘粪扫厕所已成惯例。粪桶和粪车是由一个右派助教看管的，取出来后我们在校内各个下水道的化粪池里淘粪。我最感兴趣的是拉上粪车走出校门到城里去淘粪。天热的时候穿着背心裤衩，拉上架子车，上面装着用汽油桶改制成的两个大粪桶，招摇过市。进了豁口，向东不远就是鼓楼西大街，那年月旧式的四合院大都还是用传统的旱厕，需要经常淘。提着粪桶，拿着粪勺，挨家挨户去干全国劳模时传祥的干的活儿，我心里是坦然的，何况房东们对这些学生模样的淘粪工人还常常道几声谢谢呢。车上的大粪桶装得太满，碰到路面不平的时候，一晃荡免不了把粪水溅出来洒在身上，我们谁也不在乎。我们是右派，目前虽是学习考查，却不许有读书的奢望。我曾经不知深浅地对党支部管右派的干部表示我要求“改造学习并重”，受到严厉训斥，这让我清醒地明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我悲哀地感到生命被可怕地浪费着，然而再看看那些搞“科研”和大批判的同学何尝不也在浪费吗，当然，我们这些异类浪费就更彻底更残酷些。

不过我还是有过一度的幸运，那就是曾经让我为科研小组跑腿儿找资料。那个期间批判修正主义成了思想界文艺界的中心任务，中文系大学生责无旁贷，而且要走在前列。要批判就不能光批苏联的《一个人的遭遇》《第四十一》这些外国的东西，更要找中国的靶子。刘真的《英雄的乐章》、郭小川的《望星空》和其它一些作家的所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报刊上批得越来越热。巴金批判也打响了，北师大巴金批判小组很出了风头。此时，我所在的年级可能是根据上面的授意组织了个老舍批判小组，开始磨刀霍霍。让我干的是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把老舍的作品借全，说“这就是子弹”。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父亲喜欢老舍，我小学时就读了《骆驼祥子》，知道有个老舍写了好些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年纪渐长又学了中文，对老舍知道得多了，感情也更亲近了。现在却让我给老舍批判运弹药，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不能不遵命。我到师大、北大、北图借来了几大摞老舍的书，我趁机快速翻看，更喜欢更佩服了老舍，又愈加替他担起心来。因为象《猫城记》这种讽刺了革命党的作品在左先生们那里是可以轻而易举定为反共大毒草的。《大悲寺外》等小说当然是“反动的人道主义”。幸而过了些日子不知又是什么战略部署老舍并没有公开批判，我才松了口气，也避免了我的一笔良心债。没想到这次的“运弹药”给了我与老舍作品比较全面的接触机会，成了我日后从事老舍研究的一个缘由，这是那些指派的人不可能料到的。但这种幸运的机会在那时毕竟是太少了。

四年级毕业的考试当然是取消了，但过场要走一走，说是写毕业论文。创新的做法是可以几个人合写一篇，这确实是从实际出发的好办法。于是笔杆子吃香了，三四个人依附一个能写的，开始了毕业论文的合作。我没有参加互助组，一方面我估计自己没有资格享受这种优待，我不愿承受被拒绝的尴尬，一方面我以为这种近于自欺欺人的作法无法准确反映每个人的实际水平。我要自己写，也只能自己写。为保险起见，我选了当时评价甚高的柳青的《创业史》，用被大力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所谓“二革”）的理论分析这部小说，写了一万字。

毕业论文要经同学的小组共同评议，按五分制打出分来。别人的都评完了，我的论文大家也看了。因为我很小心地用当时最正统的方法，说的是最正统的语言，没让大家挑出毛病，可是及格还是不及格，多少分，谁也不表态。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哪怕仅仅给个及格也不合适，右派还能及格？不及格吧，论文在那儿摆着。于是矛盾只好上交了。估计后来业务课的老师还是通过了，给了个公道。临近毕业学校也给我办了毕业证书。但证书发到班上党支部书记发了话：“范亦豪的毕业证书不能发，他政治上没毕业！”直到1978年文革之后，这个原装的证书才寄到我手里，它一共走了18年。这18年里我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学肄业生。

分配前右派需要再接受一次评审，然后决定再一次的处分，最高的处分是工作考查三年。经过几轮声色俱厉的批判过后，给我的结论仍旧是“并没真认罪，其反动立场还是很顽固的”，被定为工作考查两年半，彭浩荡是三年，比我还厉害。也有轻的，另一班有个一般右派，整日大气不出低眉顺眼极其听话，他的处理大概是一年。我并不后悔，这个严厉的惩罚是我维护那点起码的人的尊严的代价。

但我感到惶惑：我还要赎罪到几时呢，谁能告诉我？

十五 牦牛、老鼠和我

后来我才明白所谓填报毕业志愿很大程度是走走形式，一个证明就是那些慷慨带头填报西藏的党员干部，不但一个没去而且差不多都留校当了大学教师，尽管有的人在业务上低得惊人（文革时其中一位老兄给人贴大字报，标题云“XXX包屁坏人”就是一例）。这有点象演戏，但当时是正常现象，大家都能理解。——这是政治第一的世界给他们应得的报偿。几个右派则无一例外地发往边陲，因为他们更需要在艰苦环境里的改造，好让他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政治上的关怀和照顾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家只有兄弟二人，哥哥大学毕业后已经去支援新疆建设，在那里因我的株连打成右派，我则戴着帽子发往青海，也算无独有偶了。

在祁连山中我先放牦牛，后当校工，然后做教师，度过了整整十八年春秋。当教师的我把全部的爱给了孩子们，他们也把爱反馈给了我。但政治的凶险始终伴随着我，我工作越出色，灾难反而越多。在经过多年艰辛取得“摘帽右派”的身份以后还三次被诬为反党集团头子遭受批判和追查。这让我明白摘帽右派实际上还是右派。文革中所谓“地富反坏右”就是包括摘帽右派的，这不是某些个别人的曲解。

十八年漫漫长夜的各种苦辣酸甜难以尽述，下面抄录从前写的一篇小文，由此一斑，即可窥全豹了。

牦牛、老鼠和我

小时候学过一首歌，叫《土拨鼠》，不知是什么打动了我，始终没有忘。它的歌词是歌德写的，贝多芬谱的曲。歌里唱道：“我从外乡来到这里，和土拨鼠在一起。吃过各色各样东西，和土拨鼠在一起。同在一起，同在一起，同土拨鼠在一起。”这简直就是一首儿歌。

我一直不明白，两位大师怎么写了这么个简单的东西，一个流浪汉和老鼠，这里能有什么深意呢？

是生活赐给我的机缘，让我对它渐有所悟。

生正逢时的我 20 岁那年被冠以极右，中止了大学学业，送到北京西郊农场监督劳动，两年后发到青海。我没有留在西宁的资格，因为我有罪，而且“罪行严重”。于是被分到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山里，行政关系属于县城的一所中学。按我的专业应该教书，可是让一个阶级敌人来培养革命接班人岂不荒唐！还是领导圣明，把我送到远离县城的大山当中放牛。

“牛鬼”放牦牛，门当户对。

海北地处高寒，从来没有夏季，冬季达到零下二·三十度。这里的县城平地海拔 3100 多公尺，我的山居又要高出几百公尺，再往上不远就是终年积雪的白色山峰。山上的气候条件可想而知。即使在夏天，平地下雨这里下的就是雪，更不用说秋冬了。

大山深处一处坡地，一个半地上半土中，用树枝草草搭成的窝棚便是我的住处。窝棚四处通风透亮，门是没有的，只挂了一个破棉门帘，风大时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帘脚就是了。窝棚外常有狼的脚印，夜里枕边放一把柴镰，聊以自卫或自慰。有个半截的铁皮炉子，上边是敞口的，可以在里边烧牛粪，用脸盆煮糊糊吃。当时我的粮食定量是一天半斤青稞面，只能吃稀糊糊。所以我脸和脚都严重浮肿，“胖胖的”，一按一个深坑，早晨穿鞋常常难把脚塞进去。有几次不知不觉昏倒，醒来才知道躺在地上。

在这个地方多少天见不到一个人，说话的能力对我已经是多余的了。孤独曾经被人们视为可怕的刑罚，然而我的感觉却完全相反。我觉得这儿是我求之不得的乐土。我不想见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只要有另一个人，我的地位就是“敌人”，我就必须按党的规定无尽无休地表示低头认罪接受监督，我就不是人。而和我相伴的十几头牦牛，它们不但温顺活泼，最可爱之处是它们看我时的眼神是平等的、亲切的，它们从不把我当坏人。我爱这些无言的伙伴。每天早晨我“shi-qiu, shi-qiu”地吆喝着送它们到山坡上。牦牛吃草，我打柴。傍晚，我们结伴回家。牦牛的性格与黄牛、水牛不同，它们跑起来摇头摆尾欢蹦乱跳。看着它们在前边跑，觉得像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我是它们的班主任。

黑夜里，老鼠成群出来，隔着被子感觉到它们在我身上窜来窜去。我任其驰骋，睡自己的觉。只在它们调皮地揪我头发玩儿的时候，才伸出手来把它们轰开。在这漆黑的世界里，老鼠毕竟是在我身边活动的生命，帮我舒解着孤寂。我和老鼠友善地相处在这大山中的窝棚里，也是缘分。有一天早晨，当我掀起被子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在我脚旁竟下了一窝小老鼠，足见老鼠对我的依恋和信任。

此时，我又想起了老朋友《土拨鼠》，我懂了。

在这寂静的大山里，给了我头脑的自由。每天，与这傲岸的、巍峨的、俯视一切的祁连山对话和亲近，感受着他的性格。他以无声的语言，使我渐渐悟出些于人生十分有益的东西。这又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十六 好一顶帽子

一朝中谋，二十二年恶梦。七九年三月从北师大拿到改正结论，我和世樵在王府井的北京照相馆照了张相作为纪念。在相片的背面我题了四个字：“炼狱之后”。相片上相濡以沫半生的我们已是一对憔悴的中年人。在日记里我说：“樵，我吻着你每一条美丽的皱纹，每一丝纯洁的白发——这都是我的。”

在距此 18 年前（1961 年底）我摘了右派帽子，电发沈阳，樵马上公开了对我的等待，爱转到了地上。我俩立即分头动身回京津结婚。之后，她以超常规的速度办了调动手续，翻山越岭，来到莽莽的祁连山中，我那间斗室（我想起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从此，我们再

不分离，在那里，我们共同博战生活的艰难和政治的险恶，她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换来了我的健康。她比我坚定，也比我清醒，她张开天使的翅膀，为我抵挡着风刀霜剑的欺凌，而对自己因此受的伤却不太介意。樵舍弃了人们艳羡的大城市和高校教职，甘愿和我在那山区学校教学，一千将近 18 年，直到文革结束，我们一起调到大学，她才重操外国文学教师的旧业。上天以樵赐我，是我今生的大幸，再多的苦难和冤屈都算不了什么。平静下来的我常常想，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平静下来的我常常想，回顾此生，如果我在当年不是因虔诚和轻信走了这条路，我将有怎样的人生？

我可能委委琐琐谨小慎微地过一辈子，有了平安，但失去了灵魂。我或者留着心眼儿而成了左派，因此还可能走上仕途，那我将会在无尽无休的斗争当中干下多少昧着良心的事，伤害多少人，欠下多少良心债！……不，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选择了一顶好帽子！

这并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右派这付重枷我戴了二十多个年头，当然使我失去了很多，可是我却因此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人生一世贵在体验，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因帽子而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砥砺我自珍，也迫使我自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有益。因此我远离可恨的腐败，值得庆幸。

——磨练了意志和胆量，开阔了胸怀。”曾经沧海难为水”，小漩涡乃至七八级风浪，已经不以为意。有时竟可达到轻生死的境界。

——不再有攀升的幻想，安心于在“卑微”的工作中实现人生价值。

——逃避了可以伤害人的位置，在翻来覆去的残酷斗争中只有挨整的份儿，不大能也不愿伤害别人，因此内心是坦然的，良心是无愧的。

——阅尽了鲁迅所说的“世人的真面目”，也深切感受着人间的真情。在无价的真情面前，歧视和冷酷都失去了分量。

——因为自己饱受误解和委屈，所以不愿轻易误解别人。多了些对别人的宽容，也多了些同情心。

——知道了生活的复杂，也有助于理解生活中的各种人。再延展一步，对理解文艺作品，对教学生，对学术研究也大有帮助。

——使我始终从平民的视角看取这个世道，从而静观大舞台上的表演，难再轻信谎言，而坚信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绝对必要，因而一步一步地明白了。

……

这些无一不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我选择了这么一顶好帽子，不后悔。

然而，这桩冤案毕竟是我的悲剧。

这个悲剧最深刻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被迫害，而是被愚弄，长期的被愚弄，并且是和全国人民一起。

当年我自以为崇尚独立思考，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的走出愚昧。在整风反右以及此后很多年，我主要还是当了个愚忠的角色。在领袖思想威力的作用下，在批判和压力下，我确曾以为自己是犯了罪。我虽然曾经说过“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也应该通过自己的脑子，想想对不对，再决定是否拥护”，而被视为大逆不道严厉批判，其实我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依照惯性无条件接受的，很少真正独立作出判断。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才因震惊而清醒，开始从迷信中挣脱出来。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在监督改造期间假如我没有用这份愚昧扭曲自己，不用说不能减轻处分摘掉帽子，很可能还会被送到哪家大墙里去。这么说，我的为上边

所需要的愚昧还保护了落难中的我，这不是更可悲吗！

巴金曾经自责说，“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无条件地重复，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在我们的中国有几个人不是如此呢！愚昧在中国传统迷信和现代迷信的深厚土壤中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这已是非常牢固的集体意识。五四的先驱们号召“冲破思想的牢笼”从而达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能无愧地面对先贤吗？

十七：肃反与反右比较谈

1955年的肃反和1957年的反右是中国现代史中两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57年6月8日我和林锡纯写大字报批评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个发动反右运动的第一篇社论。我们的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是基于肃反的教训作出的预测。我们预测如果这样搞反右必将误伤好人和阻绝言论，而事实比我们担心的后果严重得多，深广得多。

对肃反和反右这两次运动作些比较是个有意义的课题，从这个角度可以显现一些问题的实质。我以不同的角色参与了这两次运动，获得了亲身的体验，多少有些感悟，在这里扼要地谈谈：

从发动者的总体目的和客观效果看，肃反是远不及反右成功的。比较一下，至少有几点不同：

一、成功率不同。肃反和反右都是对敌斗争，都是揪反革命。肃反运动中审查批斗了130多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比例达四分之一，然而最后落实了的真正能定为“敌人”的只有3800多人，成功率不足0.3%。而反右中凡被批斗的最后几乎都成了“敌人”，不少没批斗过的也顺势擒获，成功率可以说超过了百分之百。反右一举俘敌552877人，这是官方数字，实际还要多，有许多未经上级审批的虽未在册，现实中却当右派对待，以致到79年竟无从改正。

二、有效期长短不同。肃反被批斗者中绝大部分（99.7%以上）不出一一年其反革命身份都被否定，大都了结了。而反右中定为敌人的有效期至少保持了二十余年。“摘帽右派”按规定为“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档案俱在，监控使用，家属亲戚填表时“亲属中有无被杀关管斗者”一栏中必填之。直至文革，所谓“地富反坏右”当然包括“摘帽右派”。

三、“谋”的充分程度不同，或曰准备工作的充分程度不同。肃反主要是查两方面材料，历史的和现行的，历史是死账，现行是活账。肃反运动前由于缺少一个充分暴露的重要环节，所以现行材料很难抓到，即使凑出一些材料也难达到必要条件。反右则不同，在运动之前先搞双百、鸣放，大张旗鼓动员，引蛇出洞，下面的文章就好做得多了。

四、定性的灵活程度不同。肃反定性不如反右灵活，这是不及反右的一大原因。肃反定为抓反革命分子，运动后期定案时，够与不够含糊的幅度有限（尽管也有不少搞错的），所以只好把绝大部分网中之鱼放掉。到了反右，“右派帽子”真是一个伟大发明，它能大能小，能伸能缩，能有形能无形，是个万能武器，可随心所欲。因此执行起来可操作性极强，不会束缚手脚，能充分大显身手，横扫一切不听话的，不顺眼的，挡事的，异己的……。原定5%指标超额一倍，这是重要原因。

五、震慑的广度和深程度不同

建国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较早的有反胡风运动。这个运动虽然雷厉风行家喻户晓，但毕竟被定为胡风分子的都是作家，于是非作家的知识分子则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担忧。肃反虽然扩大了搜捕范围，但既然是反革命就必须有组织或有现行活动，因此凡与此无涉的人们自然不会十分恐惧。而反右则让民众难以捉摸，好端端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忽而就成右派，这势必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这就不但震慑了知识界，让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变得老老

实实，而且震慑了全体人民，即使与右派没有直接关系的市民、工人、农民也都亲见了反右的厉害，统统不敢乱说乱动。更因为右派是思想罪，因此给人的教训是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应该甘于做听话的驯服工具。全国人都用领袖的思想武装头脑，代替自己思想，无条件服从，从“舆论一律”进步到“五个统一”，从而实现大治。（虽然从理论到事实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但在很长时期至少表面上是维持了这个局面。）于是一年以后的“三面红旗”和九年以后的文化革命这样历史性的荒唐就可以一声令下全国响应，没有人敢怀疑，也没有人能够怀疑。在中国大地上永远是领袖挥手我前进的大好形势。

六、在人民中划分“左、中、右”是专政手段的战略性发展，进而成为相当长时期的策略。

使群众自相制约。几十万“敌人”及与之有关联的亲属等数以百万计的人仅靠专政机关是管不过来的，划分了左、中、右，让非右派（左派领导中派）对右派实行监督，开展群众专政，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发展了群众斗群众的传统。

左中右的划分，对各派有的给甜头，有的给苦头，荣辱、祸福对比鲜明，分化后大大便于治理。这样做不但对右派有压力，对中派、左派也有压力，各有各的危机感。右派的出路当然是认罪低头，受尽冤屈而无怨言，甚至连“腹诽”以至一闪念的不满也不能有，同时还要检举揭发同志、亲友、师长以立功赎罪，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派的人数最多，但地位并不稳定，稍不小心就随时可能“滑到”右派里去，所以必须时时向左派靠拢，事事表现积极；对右派则要划清界限，严加监督。许多中间派在人前对右派的冷淡、严厉、深恶痛绝状甚至超过一些左派。左派们知道他们的位置也不是保险的，不经常“再立新功”就会从亲信的位置退到中间派去，甚至还会一不留神“堕落成”右派。所以需要旗帜鲜明再鲜明，行动积极再积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好在眼前有右派这现成的靶子，更有一批批新的革命对象，要想立功也还便当。

这种阶级阵线划分的不固定性，它的优越性远远超过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或土改时的阶级成份划分。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他们似乎都在空中悬着，听任权威的巨手指引、牵制和决定。这多么好治理啊，他们非听话不可，否则下一次排队就不知排进哪一队。

那么“右派”这个名称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名词是不是科学呢？当时政治遵循的原则不是科学而是实用。

右派从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起，它的特点就是保守的，立场是站在当权者一方的。激进的，要求民主和变革的是左派。在中国现代史中包括中共同样一贯这样理解和使用。这种政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界定早已在历史中形成和确认。

考察所谓右派在 57 年的主要作为其实是要求推动民主进程反对保守和腐败的，自然应是左派。其所以被命名右派乃因为一则在位一方已将“左派”作为自己的专有，于是凡与自己相对的一方自然是右；二则人民对右一向存有恶感，所以把这顶帽子扣在这些异己头上便于丑化他们孤立他们，便于在偷换概念的前提下随心所欲理直气壮地作文章。只是因为需要而且有权，就可以不讲理，不讲科学，哪怕是人所共知的常理，也可以颠倒。

如果真要为右派“改正”，首先就要改正这现代历史中最荒谬的误读。

历史将作出公正的回答，只是需要你的耐心。

然而，我却又坚信，历史将是另一思路。他的回答将是：执政者把公民划分成无论任何派而予以不同政治待遇的行为都是反人权的，非法的。

2005-12-20

我将永远铭记

傅德惠

XX:

收到你的来信，反复读了许多遍，很受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依然这么关注着祖国、人民、关注着共和国所走过的这段用鲜血与生命的写就的非常历程。对于反右的认识，我的觉悟是很晚的。在反右的当时，我的行为应当是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同志、朋友的那样的人。因为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对很多事情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有那也是某种框框里的。但并非不痛苦，在我们班里被划成右派的同学中，有的是我刚刚介绍入党的我所很信任，甚至很崇敬的朋友。面对这些我无能为力；我也批判过他们，也组织别人批判过他们，思想的麻木可见一般。毕业分配后，我几乎与这些同学完全失去了联系，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不知他们是怎样经历那些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经历了怎样精神上的摧残。打倒四人帮后，最早来找到我的是我们班的谷XX。他的被打成右派我是完全清楚的，他是党员，反右一开始我们班成立了“苦药社”（苦口良药，帮党整风），他为了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那样去做好同学们的工作，经过党支部的同意，他参加了苦药社，后来为“新今古奇观”写了一篇前言，整个的表现堪称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的正直形象。但在划右派时，则不论这些，先定了苦药社是反动社团，“新今古奇观”是反动文章，他的文章就是“大毒草”，是“向党进攻”，过去不管他表现多么优秀（学习、工作、为人却极好）现在他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他被划为“极右派”。后来的一切我不知道了，极右派的遭遇那绝对是很惨的，我有些害怕去问他们。可能是76年或77年了，他到北京来找我。告诉我右派问题已经摘帽，但他想平反，我当然赞成，因为，我可以说也是当事人，参加“苦药社”当时本来就是党支部同意了。跑了很久，得到的答复是右派只能摘帽，不能平反，悲哉！到了78、79这两年陆续回北京，回师大的曾经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不少，胡XX、郑XX、冯XX、丛X等等都和我们见面了，我却不敢去问问他们的经历和那些悲惨历程，不过我心里明白，他们都有一部血泪史。但他们却非常大度，对昔日批判过他们的同学，不计前嫌。不过我的内心是有伤痕的，知道自己曾经对不起他们，伤害过他们。而现在他们是用行动在救治我们，教育我们。丛X几次到我家，并提出想编全班同学的通讯录，他想要找到我们班的所有同学，当时我真有些不敢，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受到伤害的同学。最后还是在许多热情的同学们鼓励下，特别是丛X，我们许多同学开始分工，寻找那些只要知道一点线索的同学们的下落，就这样也是到2000年才算把当时被划为右派的同学们找到了，这时沈巧珍已被迫害致死。要知道她原先是一个多么自信、多么有才华而又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姑娘啊！她临死前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刚出生不久，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她怎么可能走上那条绝路呢？人世间的悲剧，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它使我们共和国失去了太多、太多的最宝贵的，最精粹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说是为了共产主义、为党、为人民奋斗了一辈子，有许多人在敌人残酷迫害下从来不屈服，但最后却是我们自己的党，自己的人民把他们划到了敌人的队伍里。有许多人被摧残致死，致残，许多美好的家庭被摧毁。他们所受的迫害是许多善良的人们无法想像得到的。我后来看了许多这方面的作品和回忆录，心里滴血。我自己曾亲历过一个长辈，他是我们班同学张XX的父亲，著名的翻译家张友松。在反右前，他是一名非常有成就的翻译家，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我们党的忠诚朋友，他曾反对过黑暗的国民党，曾救助过党的地下党员。反右时仅仅是因

为他为一位蒙冤的同志鸣不平，被划为右派。反右前他是一位职业翻译家，靠稿费生活，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工资。反右后没有工作，没了工资，没了稿费，是街道居委会管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极度贫困。他生活状况，真的让人看了惨不忍睹，他与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他住的是一间最小的不足 12 平方米的朝北的小屋，她夫人瘫痪在床，屋子里挂满了这位残疾人的尿布、尿裤（因为阳台在别人家），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偶而到他家去看他时，他却总是捧着一个厚厚的英文书，对窗大声朗读。文革时，他对自己看不惯的行为依然还是要站出来打抱不平，结果一只眼睛被打瞎，这是一位多么刚毅、正直的老学者啊，又是多么悲惨的遭遇，因为这些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撕心裂肺。面对这些，我能说什么，做什么，就像今天面对党的某些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我又能说什么！只有羞愧，连呐喊却没有。你们能编这么一本书，当然很好，写出你们的悲惨历程，写出你们的刚烈和正直，他能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曾经被麻醉的心灵，至少也算一声呐喊吧。我将永远铭记我的这些兄弟姐妹们的血泪历程，鞭策自己，警醒自己。

对于肖敦煌和沈巧珍我真的想写点什么，但苦于对他们了解太少，特别是他们划为右派后的遭遇，我几乎一无所知，97 年我找到肖敦煌后，我收到了他几封信，除了第一封外，后来的几封他几乎没有再谈他的不幸遭遇，加上他执着于他的事业，他的学生。他严重的心脏病，使他最后倒在教书的讲台上，他后来的信也就越来越简单。他逝世后，他儿子告诉我，他父亲还有近百万字的手稿，有的是翻译，有的是日记。我曾建议他儿子能否找敦煌学校有关领导找人帮他们整理一下，他父亲的遗作好像终没有成书。我很后悔找到他太晚了，而认识他的价值也太迟了。你写他合适，因为他遭遇的最悲惨的时刻是你和他在一起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把他寄给我的几封信寄给你（有个别的已在同学们的传阅中丢了）。你还可以与他儿子联系（湖北天门市师范学校肖劲槐收、邮编 431700）。对沈巧珍我了解更少了，大学时代的印象，她很美，很单纯，很独立，有思想、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而对她的后来的遭遇我却一点不知道，后来只听她姐姐告诉我，她曾给他姐姐说，57 年的那场反右运动将她烧光了。她姐姐现在与我们班许多同学都有通讯联系，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厚道人，她对巧珍的感情极深，我可以打电话问问她能否为你们的书写点什么。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想说的似乎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谈。

2003 年 9 月 18 日

脱胎换骨纪实

雷一宁

呜!“北京——兰州”的列车慢悠悠地启动,拖着沉重的尾巴,呼哧,呼哧,沿着京广线向南行进。

车厢里,一群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脸贴着烟雾弥漫的车窗,望着向后驰去的红墙、绿瓦、高楼、庭院、树木、行人……没有送别的人,一个也没有!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想到这一去,不知哪年哪月能再回到这从前魂萦梦绕的地方,不由自主地都在心里反复低吟:“……再见吧北京……再见吧母校……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不知不觉地,低吟变成了低唱,低唱又变成了放声歌唱;开始是一人,接着是两人、三人、四人……不一会儿,便成了全车厢几十人的合唱。徐美英主动站到列车中央,挥臂指挥;L君也拉起了那从南洋到北京形影跟随的手风琴。这是我们曾十分自豪地歌唱的《青年团员之歌》,然而,现在失去些进行曲的豪迈,多了些失落的忧伤,有人甚至流着眼泪。唱到第二段时,都异口同声地作了相同的改动。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啊!

.....

我们自幼向往的一切,
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捍卫真理。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北京,
请你吻别你的儿女吧!
再见吧,母校!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母校,
胜利的我们一定要回来!
再见吧,北京!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我们曾经魂萦梦绕的首都啊,北京!我们亲爱的母校啊,母亲!你们听到了吗?祝福了吗?

那是1957年11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多数入了“另册”的应届毕业生,在“没有问题”的同学离校三四个月后,终于结束了四五个月的学习、劳动和交代,拿着学校统一买好的车票,上了这趟列车。说是“毕业生”,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说我们是不合格的,是“废品”;说是“学习、劳动和交代”,其实是要我们承认“罪行”,做到“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更重要的是等待给我们做结论——作判决,也许是需要做的“判决”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吧,我

们离校前看到的并不是公安局铅印的、最次也应该是油印的“判决书”，而是一张可能是由党支部审议通过的（据说，没有党支部的班级，便由团支部执行这一任务），手抄的《XXX问题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或者干脆是《结论和处理意见》，要我们过目并在其上签字之后，便立即被收了回去。当时，谁都认为，那只是象每年都做的“鉴定”之类的东西，没有多大用处的，谁会想到，它竟是决定我们此生的命运和遭遇的“判决书”啊！所以都没有想到向“组织”要一份，以备后用。鬼使神差地，我看了之后却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上面写的不是真实的我，现在不允许我问，总有一天我得问个清楚。恰好衣袋里有笔和一片纸头，我便偷偷摸摸地把它抄了下来（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但是，下款的“审查人”等我竟没有写！当时我认为不会发生背着牛头不认帐的事，书本告诉我们，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之后，我们便走上了征途。尽管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和惘然，却仍然固执地认为，这只是孩子学步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对这样的孩子，哪个母亲不是说“不要紧，爬起来再走”的呢？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吗，“……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我们绝不认为，自己从内心相信和热爱的党、从内心尊崇的伟大领袖，会鞭答我们这些怀着满腔真诚，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孩子。

列车到了南行的终点站——郑州。一路上下去了不少同学，半夜里来到这个南来北去、东来西往的枢纽站，又下去了一批。原来挤了差不多一个硬席车厢的同学，现在更少了。当列车又呼哧、呼哧地启动的时候，在那黑暗的一角，传来了一男一女哀伤的二重唱：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嗨……嗨……
我们深厚的战地友谊，
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
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
……………

顺着歌声望去，女的是和我同系不同班的 S 君，男的该是她的朋友吧？没有见过。为什么两人都上了这趟车？在党号召青年团员帮助党整风的日子，聪明的女同学都弃党的号召于不顾，而忙于找个户口在北京或上海的男朋友，以便填写毕业志愿时，能借男朋友之名，名正言顺地永远留在北京或上海。只有单纯幼稚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傻瓜，才会为了使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而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并且在填写毕业志愿时，大义凛然地填上：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甚至什么也不填，只写一句活：祖国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那年西藏没有名额，不然也会填上“西藏”。就在这时候，同学中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说 S 君有个在总政歌舞团的男朋友，一个劲地追她，而她却全心全意地选择了在政治教育系的中学同学，并以为他献出她的第一行动，来回绝了那总政歌舞团的朋友。填写毕业志愿时，两人都填了甘肃。大概那便是她那学习政治教育的男朋友了。可谓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为什么？他也上了这趟车？

过了郑州，列车沿着黄河西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列车旁边时隐时现。从车厢里往外望，偶然能看到奔流的浑黄河水，有时能看到陡峭的悬崖和垂挂在崖上的枯枝，多数

时候却只能看到布满黄土、碎石的宽阔河床中，一条细细的黄水，似流非流地喘息，完全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澎湃气势。一种情绪又油然而生，痛苦？悲伤？凄凉？惆怅？……我也说不清。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永远记在心上，
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
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
你的源泉是来自梭罗，
万丛山送你一路前往，
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
一直流入海洋……

这歌声像是应和我的情绪，沙哑，缓慢，低沉，是 L 君拉着手风琴在自弹自唱。莫非这母亲河激起他对远方的母亲河的思念，想到慈爱的母亲，为未能回去孝敬妈妈而深深忧伤？一个华侨，怀抱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舍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告别白发苍苍的爹娘，来到这一穷二白的大地，竟落了个戴上帽子有家归不得的下场！

列车员报告，西安到了。许多人从行李架上拿下大包小包，下了车。L 君下去了，S 君也下去了，列车呼哧、呼哧启动之后，她的男朋友仍然孤零零一人站在车门前招手，久久地。看来，这对情侣分手了。为什么？自愿的？不可能。若是自愿的，早就可以分，还可以留在北京。那么，是强行拆开的？可能，但是不叫“强行”，是“爱护”，你划不清界线吗？组织帮你划清。这样的例子，我们班还有……

车窗外，白雪纷飞的天底下，广漠的黄土荒原之中，时不时出现一片片古旧的房屋，墙壁、瓦片都是土黄色。有时还能看到房檐下一串串金黄的包谷，火红的辣椒……终点渐渐近了，北京、母校、父母越来越远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路，有多长？怎么个走法……

只剩我们三个，肖敦煌、徐美英和我，背着还不算太重的背包，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还没有到达终点，眼前的兰州火车站被包裹在工棚之中，我们往哪儿去？背着背包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总算找到一间一面用竹蓆挡风的尚未盖好的旅馆，住了进去。还好，有徐美英作伴，否则真会吓得半死——凡有人的地方便不会没有色狼。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都还一直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空中楼阁里做梦，那么现在是脚踏黄土地，开始“生活”了。

次日，好不容易地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找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西宁的汽车票。随便地吃了两顿饭，每顿都是一大碗又麻又辣的羊杂碎汤泡大饼，倒是辣得冲跑了浑身的哆嗦。晚上又回到那一面是竹蓆的房中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早就起床（这“起床”只是个惯用语。其实既无需穿衣着裤，也找不到水可以洗漱），高兴地伸展四肢，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快到家了！

我们从火车站取出行李，一个从南到北紧跟着我们的铺盖卷，一点衣服，及用装衣服的箱子装的沉甸甸的一大箱书籍和讲义：我们始终认为，书本便是知识，知识便是力量，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不可须臾无的工具，宁可把别的东西丢了，也不能把它们丢弃。顾了辆架子车，从火车站拉到汽车站。

汽车是一辆新出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头后面是个大车厢，顶上盖了个两头透风的帆布篷。车厢里没有座位，更没有行李架。行李全得交给车站的工作人员，然后，由他们不由分说地扔到车厢里，不管里面装的是破衣服、臭书本、还是珍珠宝贝。再由他们把这些软的硬的、方的圆的、长的短的行李，从前到后，排成三排。两边两排靠着车厢两边的栏杆，中间两排则紧紧挨着。这便是座位。

乘客按车票的顺序上车。既没有踏板，也没有梯子。车厢里已经挤满了行李，车屁股的挡板也不能打开。唯一的方法是，跳起来双手抓住车栏杆的高头，再引体向上翻越栏杆，跳入车厢。这对于没有在军训中练过翻越障碍，在劳卫制锻炼中引体向上又从未及格的我们，是一大考验……

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乘客分四排坐在三排行李上。两边两排背靠车厢栏杆，脸向中间；中间两排则背靠着背，脸几乎碰到对面人的脸上，膝盖犬牙交错地紧紧相挨。

“嘀！嘀！”汽车开动了。多么高兴！我们快到家了。多么自豪！我们坐着我国自己出产的大卡车进藏了，就像当年文成公主一样！

朱总司令说，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号召有志青年去贡献青春，去把她建设得更美丽。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上发布这消息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青海的报道，还发表了画家董希文的好多油画，如《春到西藏》，《长征路线写生集》等。报道中、尤其是画中的西藏、青海美极了，犹如人间天堂。看了这些宣传报道之后，我们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这十分可爱的地方。我们三人不同班，可毕业志愿的第一志愿都是青海。现在，来到这十分可爱的地方了，我们睁大眼睛，要捕捉出现在眼前的美丽景色。然而，呼呼的刺骨寒风挟着粒粒泥砂，藉着汽车行驶的高速，从车头至车尾穿堂而过，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而且，双手渐渐不听使唤了——冻僵了；不久，双脚也冻得不能动弹了。更糟的是，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似乎在向我们示威：再不加油，就断了你们的卡路里。这才想起，一早起来，在兴奋和急忙中竟忘了吃饭。看看周围的乘客，头戴皮帽，还耷拉下帽檐；身穿翻羊皮大衣，还竖起宽大的领子，把整个身子缩在大衣里，几乎每人都拿着个黑糊糊的馒头还是饼子在啃。我们呢，身上不过是一件薄薄的棉衣，还是从家乡带到北京，穿了四年，现在又穿在身上的。衣箱别说不知坐在谁的屁股底下，就算能取出来，也没有比身上这身更能御寒的衣物了，除非拿出棉被……

“嘎吱！”一声，汽车停了，同时一声吆喝：“都下车！吃、喝、拉、撒。只是千万别睡，还要赶路。”

这一声喊可真及时，除了我们仨，所有人都“呼”地站了起来，翻过栏杆，跳下车去。我们仨，则互相帮助着，这里捶捶，那儿捏捏，好不容易手脚可以活动了，才僵硬地站了起来……

待我们脚踏大地，定睛一看，好家伙！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俨然是一片荒原，没有民居，连一棵树也没有，只有一些枯草的断茎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抖动。傍着把我们带到此地的公路，是一条细细而又湍急的水流。它们仿佛两根平行线，从这空旷而又昏暗的荒原中间流过，越远越细，一直延伸到灰蒙蒙的远山跟前，山脚下才依稀有些房屋。这里，有一点儿生活气息的，便是站在荒原中央大路旁边的，一间孤零零的四四方方的小屋，土黄的墙壁，土黄的屋顶，窗框门扇也都是土黄色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吃喝拉撒呢？

走到那孤零零的小屋门口，看到有人正端着大碗蹲在条桌前的条凳上呼噜、呼噜地吃，才知道这不是厕所。向小屋后面走去，转过拐角，便差点儿撞到一个正敞开老羊皮大衣撒尿的男士身上。我们的出现并没有使他心慌脸红，倒是我们心慌脸红了，赶紧转过身……远远地，看到与我们同车的除了我和徐美英之外唯一的一个女乘客，正在大衣的掩护下方便。于是我俩急不可耐地跑了过去，边跑边想：真是“天当房，地当床，大衣变茅房”了。可是，我们没有大衣！……入乡随俗，一切都会适应的，一切都会习惯的，一切都会有办法的。这便是现实，是改造我们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的客观现实。这客观现实并不难适应，在几十年的改造生涯中，我蹲过许多离奇又离奇的厕所，我们都适应了，难适应的倒是我们自己，一个自然的创造物的“我”，不断地要与要求进步的“我”抗衡。一双瘦弱的手，“娇生惯养”惯了，经不住酷寒的考验，张不开动不了啦，竟解不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裤。“徐美英，帮帮

忙！”我喊。“我也一样……这样吧，你帮我，我帮你……对了，这样看得清楚些……快！憋不住了！……”“憋住！千万憋住！不然，裤子和大腿就冻成一块了。……”下面的话我憋住了没有说出来：幸好你我都不在经期，否则……只是说：“我们要品尝冻掉耳朵的滋味了。”“别废话了。快给我挡一挡。”“挡什么？”“风和人。”“风，挡得住吗？人嘛……还是我们改掉这羞羞答答的资产阶级感情吧！劳动人民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这，也是资产阶级感情啊？”……

解决了吃喝拉撒问题，用九牛二虎之力翻上汽车。在开车前的片刻，才有闲情来观察四周。我们极目远眺，想要看到那油画中曾经梦幻般地吸引我们的墨绿的远山、翠绿的草地、青绿的树木、粉红的、蜡黄的、天蓝的花朵、穿红戴绿的藏族同胞。然而，无论怎么看，眼前还是只有看不出颜色的枯草，一间似厕所实为饭馆的土黄色的小屋，一条细细的水流，一条灰白色的漫漫长路，及隐隐约约的远山。天上没有云，也不是清洁鲜明的蔚蓝，而是灰黄的、昏暗的，混沌而且沉滞，看不到太阳。那看不到也抓不着的西北风，却在肆虐，它叫着，吼着，飞舞着，忽而勇猛地直驰，铺天盖地地疾走；忽而慌乱地乱卷，掀起泥沙的云烟；忽而肆无忌惮地横扫，荡涤着地面上的一切……那种不知道是痛苦、悲伤、还是惘然、惆怅的情绪又涌上心头……

下午四点钟左右，到了青海首府西宁。按规定，我们必须到省教育厅报到。没有地图，不知道有多远，路怎么走；加上这堆不多也不少的行李，我们只好顾车。车站内外，供初来乍到的外来人雇用的，只有脚踏三轮。我们问：“到省教育厅吗？”回答很干脆：“到。XX元。”我们一听，吓了一跳，这差不多是我们所带的人民币的一半了。我们以为一定很远，别无他法，只好上车。车夫踩着三轮车，在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慢悠悠地行走，穿过并不宏伟的黑洞洞的城门，不知是出了还是进了西宁古城，七拐八拐地，转悠了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到了目的地。后来的后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从汽车站到省教育厅，步行只需10分钟。这便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第一课。

与兰州火车站一样，青海省政府也在一片工棚包围之中。这使我们十分兴奋，一出校门便能投入祖国经济建设第一线，这有多幸福！十几年的苦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们早忘了自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出来的‘废品’”，等待着‘废品’的命运，只能是往垃圾桶里扔。

进了省政府，在门房放下行李，找到教育厅，找到专管人事工作的干部，交出我们的介绍信。他看了介绍信，眼睛从近视镜片上方，把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打量了半天之后，什么也不说，转身过去，叫来一个年轻人，耳语了几句，便出去了。年轻人倒是蛮热情的，叫来一辆架子车，把我们和我们的行李领到目的地后，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和徐美英的“家”是一溜三间平房中的一间。从外面看，都是一门一窗，墙是黄泥土坯砌的，屋顶上面抹了一层黄泥，没有瓦。“吱呀”一声推开房门，走进几乎碰着头的门洞，一股寒冷的焦糊味扑鼻而来。房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看清楚，这是一间横走、直走都只有六步的房间。上面可以看到房梁，没有天花板；下面是凹凸不平的黄土地，没有铺砖或水泥。四周是抹了一层黄泥的四堵墙，能看到黄泥中混合的麦秆。其中一面墙的墙壁上开了一个门、一个窗。窗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扇，只有窗框子和木条交错而成的方形小格，上面糊了一层白里透黄的薄纸，有的地方已经破裂，在寒风中忽闪忽闪地扇动。窗边是一扇没有油漆过的木板门，固定门扇的不是铁活页，而是古老的木制的“户枢”。门扇背面也有一个古老的木“门闩”。窗户前面摆了两张像是学生用的单人课桌，还有两张无法站稳的木头椅子。在与此墙相对的内墙前放的应当是床了，可是怎么这么怪？没有床头，也不见床板和床脚，一个不很高的四四方方的六面体，似乎十分沉重。用手一摸，才发现是用黄泥土坯砌成、上面抹了一层黄泥的热炕。不过，没有热气。房子中间一个铁皮炉子，前面堆着些方的、圆的、不方也不圆的黑块块，应当是煤了。

把行李拿进来，解开，面对着抹了一层黄泥的炕发愁。拆了吧，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可以代替它的床。想来想去，决定我们两条被子统筹安排，一条做褥子，一条做被子。这样，两人挤在一条被子里也暖和，反正不会在这里久住的。铺好床之后，在床沿坐下。才舒了口气，又为下一步该做的事发愁。想洗个脸，不知水在何处；想吃饭，刚才是给了我们一些饭票，但食堂在哪里？想开电灯，可是房内不见电线，抬头不见吊灯。模糊中看到桌子上有个墨水瓶，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盏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火柴，无法点着。

屋内完全没有热气，光线也愈来愈少。空气似乎冻结了，凝固了，却仍然威力无比，把我们呼出的气立即变成了烟雾。炉子是冰冷的，里面塞满了煤灰。地面上的煤，块大而邦硬，似乎都裂着大口嘲笑我们的无能。刺骨的寒冷，从赤裸的黄土地，穿透我们脚上的解放鞋，从脚趾到脚跟，到小腿，到大腿……向我们袭来。

“不能呆坐着了。得生着炉子！得填饱肚子！”炉子和煤都有了，但是没有火柴和木柴。怎么办？

刚才我们注意到，那守门房的，是一位六十左右的老头儿，看起来还和气，没有用另眼看我们。于是我们找到门房。那老头儿正坐在一个与我们“家”里的炉子一样的炉子前烤火看报。我们表明来意之后，他在桌上的报纸堆中翻腾了一阵子，递给我们半盒火柴：“呐，给你们。”我们问：“这几根火柴，能把那大煤块引着吗？”“没有木柴？”“没有啊！”“你们要到市场去买……呐，这么吧，”他边说边从床底下拉出一堆报纸，“把这些拿去！”我们莫名其妙，说：“我们……房里又黑又冷，没法看报。”“不是要你们看报，是要你们用它点火。”我们还是莫名其妙：“点火？怎么点？”“呐……”他拿起几张报纸，卷成筒状，放到炉火上点着。再打开下面的炉门，把着火的报纸丢进去，“看清楚了吗？就这样。在没有木柴的时候，就用纸，什么纸都行。先把煤砖砸成小块，放到炉子里。再用洋火把纸引着，丢到煤块下面。几张纸就能把煤引着了……没有砸煤砖的家伙吧？”他躬下腰，从床底下——这床底下似乎是个百宝箱——拿出一把似斧非斧的东西，“呐，把这拿去。过几天，你们找到砸煤的家伙，再还给我……去吧。得仔细检查检查，烟筒是不是漏气，炉盖是不是盖严，可别让煤气给打了。这种炉子，每年都要打死些人的……”当我们走出这并非密不透风的门房时，还听到他在喃喃：“……孩子，什么都不懂，可怜……”我们很想告诉他：“老爷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但是我们已经自食“祸从口出”的苦果，现在必须学会三缄其口。使我们疑惑的是，这是不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又一课？

我们很快便学会了生煤炉子，都是跟这和气的老头儿学会，或者从他那儿得到启发后，琢磨出来的。此地，老百姓一般都是烧麦秆或野草做饭和取暖，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能享受用木柴或麦草引燃煤的“福气”。树木在青海是稀罕的东西，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木柴是有钱也难买到的。于是，人们学会了偷。偷那些仍然在树上的枯枝或者活的树枝，是不算偷的；是偷树木的制成品，如看起来破烂的甚至是完好的桌椅板凳之类。入乡随俗，我们也有样学样啦，为了活着，为了脱胎换骨！在木柴或“类木柴”也无法弄到时，只有用废纸；在一点废纸也找不到时，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的“知识宝库”便成了燃料。我们也想开了，想通了，正如俗语所说：没有了脑袋，还要头发干什么？决定一切的是“客观存在”。

这样的炉子，这种生火的方法，我们整整用了30年，直到离开青海。既用它炒菜煮饭，也用它取暖，有时还用它烧点水偷偷地洗个屁股、擦个身子。有个顺口溜：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青海的房上能赛跑；青海的姑娘不洗澡……我们什么都能适应，什么都可以改造，唯独不能的仍然是我们自身，这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我”。

过了几天，教育厅那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把我们叫去，在近视眼镜后把我们瞅了一通之后，对我们说了一大堆第二个五年计划多么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贡献青春之类的话，然后话题一转，说：“在没有改造好之前，你们不能带着反动思想留在教育岗位。一穷二白的农村，极需要有志青年去建设，你们也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需要到农村去

改变你们的世界观。开春之后，你们就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去。现在这段时间，你们都到西宁二中去，参加西宁中学老师的反右运动。北京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这里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对你们正好，可以再次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不了解情况，不要紧，你们不用发言，只要用心听，并且联系思想实际检查自己，结束之后必须交出收获体会。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他还告诉我们：“你们不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不发给工资，只发生活费，每月 30 元。从现在开始，到财务处去领。这是组织对你们的关怀照顾，应当感谢组织，感谢党。”

回到我们的“家”，徐美英和我一头栽到“床”上，无话可讲，望着房顶发愣，脑海里却在倒海翻江……。在给我们的《结论》中明明写的是“分配工作，考查一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工作”吗？在校时，中文系那临时担任系主任职务的某老师一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我们走坦白从宽的路。还说，拒绝坦白者得不到“分配工作”的权利。我们这些老实坦白的、“罪行”轻的，都享受了“分配工作”的权利，而且考查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结果却是“带着户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实际是开除我们的城市籍，要我们世代当农民。都说贫下中农和工人一样，是领导阶级。可是，这些年来，除了需要“工人、农民说话了！”的时候，何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户籍制度（保甲制度），至今仍然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只有无条件地为城市为工业化提供物质资料和原始积累、为国家提供税收的义务，却享受不到城市人享有的住房、就业、劳保、教育、养老、医疗等的权利，而且是世代代！在大鸣大放时不是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吗？而且把它上升到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还是要扩大三大差别；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要实行封建法西斯的高度。尽管，话不是我们说的，苦果却要我们品尝了吗……不错，有志青年是应当到农村去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但是，有志青年应当是那些留在北京、上海的“左派”！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戴着这顶帽子，我们在农村能有所作为吗……

“……妈妈，你在盼着我去赡养；阿弟，你在等着我去扶持。……妈，你好可怜！……女儿不能为你尽义务了。……”徐美英在呜咽。她，来自上海，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早年去世，留下疾病缠身的母亲、她和年幼的弟弟。听说，她母亲病得不轻，十二三岁的弟弟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以她的学习成绩，满可以上北大、清华。但北师大吃饭不要钱，每月还有几块零用钱，她便爽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动员，报了北师大，上了中文系。在学校，她是青年团员，三好学生，系学生会主席，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和舞蹈队队员。每个学年开始，她都领着一伙同学，举着横幅到车站去迎接新生，因此师弟师妹差不多都认得她。她还以北师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在一次晚会中和周总理跳过舞。……是什么原因使她成了右派的呢？不太清楚，可能是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了个名，跟我一样，“对人家的右派言论加以同意和赞赏”；另外，还是和我一样，沾了“国门党”的光了吧！……我们班的 P 君和她一样：四岁时父亲出国谋生，九岁时母亲病逝。在老家浙江，只有爷爷、奶奶和他相依为命，因此感情特别深厚。同样的原因使他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却在毕业鉴定小组会上被扣上“右派”帽子。有泪不轻弹的男子，当场号啕大哭起来：……我再不能孝敬我奶奶了！奶奶啊，奶奶！你们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让我上了大学，可现在我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了。奶奶，我有罪！奶奶，你好可怜！奶奶，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为了脱胎换骨，我们必须抛弃这种“温情脉脉”的感情。然而……马克思也是人之父，当他的爱子爱女接二连三病馁而逝时，他也是悲痛的啊！能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吗？这是造物主造人时特别赋予人的感情。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靠什么来维系？

次日，我们便到西宁二中参加老师们的反右运动。时间并不长，只两个来月。收获倒是蛮结合我们实际的：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大概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此地的女教师，被划成右派后，便别无选择地立即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安家落户去了。据说，她来到此地后，教学上别具一格，颇受学生欢迎，但不受其他教师及家长赏识，说这是摆花弄样，讨好学生，目的是与党争夺接班人；再说，夏天她别出心裁地穿着一条花裙子招摇过市，仿佛过街老鼠；更奇怪的是，她竟可以弃置此地人祖祖辈辈使用的热炕不用，自己花钱买了一张床摆在炕上，把炕变成了放鞋和杂物的地方……在我们写的收获体会中当然写着“要以她为鉴，认认真真地接受工农的教育，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字样。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曾经为把她下放到农村的事做过抗争，但毫无效果。

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给我们的下一个通知的日子里，一天，那个把我们带到“家”的年轻人来告诉我们：“把你们的行李带上，搬到湟水边的干部招待所去，等待下一步的通知。”

这干部招待所，比起原来的“家”各方面都好多了，终究是招待干部的。干部者，有身份之人也。不久我们发现，这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来自北大、清华、华东师院等院校的右派学生，正在等候分配。这不禁使我们想入非非，莫非不必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一天，那主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又把我们召去。首先大谈了一通大好形势，接着说：工人农民给你们吃的穿的，供你们上完大学。你们却做出损害工农利益的事，忘了恩，负了义，今后可不能再这样了。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努力工作，来弥补你们造成的损害。……你们这一阶段的学习收获体会，我们都看了，收获很大嘛，我们相信你们说到做到。因此，组织上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暂时不到农村去了，就留在西宁，分配工作。可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他接着说：“语言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语文课是一门阶级斗争的学科。在你们思想改造好之前，你们会利用神圣的讲台向年幼无知的革命接班人放毒的，因此你们不能教语文。肖敦煌、雷一宁，你们两个这一阶段表现比较好，都到西宁高中去报到，这是现在西宁的最高学府了。学中文的肖敦煌，俄语很不错，能翻译俄文著作，你就教俄语。雷一宁图画画得好，就教图画。图画课并不多，你同时管理图书。除了这些规定的工作以外，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得违抗。徐美英这一阶段表现不够好，你就留在西宁二中，到教务处去，摇铃、排课表、刻钢板、印材料等等。你在师大是校篮球队和校舞蹈队队员，因此，你负责训练西宁二中的学生女子篮球队和舞蹈队，要把她们训练成全西宁甚至全青海最好的队……听明白了吗？……有什么意见？……好，那就这样。拿着你们的户口和铺盖卷到单位报去吧。”

尽管结尾这句话他说得就像“……扛起铺盖卷滚吧”，我们还是高兴之极，相约次日同登北山。——每当我们站在招待所前面的湟水边，低头看到的是冰凌涌动的滔滔湟水，抬头看到的是灰黄光秃的北山，山顶上孤零零地屹立着一棵树。好生奇怪！早想去看看个究竟。

次日，我们信心满满地开始登山，以为很快便会到达目的地。我们对准目标——树，迎着寒风，抬头挺胸，脚踏实地，前进！不管有没有路，只管向前！我们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向前！向前！！很快上了一个山头，可是，树还在前面的山头上！走过一段小小的下坡，又开始上坡。坡越来越陡，我们只得躬下身子，佝偻前行。然而，寒风好像故意要阻止我们向前似的，卷起砂石，锤打到我们头上、身上。一不小心，脚下的石子儿被我们的脚蹬掉，毫无阻挡地滚落山下。随着石头“哧溜溜”的滚落，我们也“扑哧”一声趴倒在地，连忙张开四肢，紧贴地面，才避免了象石子儿一样滚落山脚的命运。只得手脚并用，名副其实地爬。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又一个山头，抬头一看，树还在前面……如是者三，才爬到那棵树下。发现并不是一棵，而是三棵，也只有三棵。不知叫什么名字？红褐色捎带些许绿的树枝上挂着几片细小枯干的树叶；树枝不能折断，还是活的，上面挂着些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布条

或毛线，迎着凛冽的寒风摇曳。看来，它们是被作为神来崇拜的。可不是神麼！周围都是干硬的黄土，寸草不生，它们长得虽不怎么高大，树叶在寒风摧残下，几乎飘零殆尽，粗壮的躯干，繁密的枝条，却顽强地傲然挺立，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气节。

极目远望，尽是连绵起伏的土黄色山峦，山连山，山迭山，就像一大群羊。这便是所谓的“脑山地区”麼？这时，诗人肖敦煌的顺口溜已经溜了出来：

脑山，脑山，
山上有山，
山中有山，
山外有山，
不闻鸟儿叫，
但闻寒风啸；
不见住人家，
但见一群羊；
天上不见云彩，
只有一个昏黄的太阳；
地上不见草长，
只有尘土飞扬……

“噢！水呢？万物生长不能没有水……”

“呐！看背后。”

我们转过身来，西宁立即呈现在眼前。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盆地之中，东西长，南北短，四周环山，都是光秃秃的，真的“山上不长草”，也看不到树木。湟水，这条黄河的支流，不像绸缎飘带，倒像此地俯拾皆是的毛绳，从盆地中间白白流过，无法流到山上。那星罗棋布的一块块积木，便是民居。清一色的土黄，房顶都平展展的，的确“房上能赛跑”。肆无忌惮的寒风挟着黄土掠过盆地，在尘土的烟雾中，西宁古城时隐时现，似梦幻，似现实。那“十分可爱的地方”，那“色彩绚丽的油画”，和这风沙掩映的民居，这白白流淌的湟水的强烈对比，使我们又产生了那种情绪，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

我们又转过身去，对着神树思索它之所以能够茁壮生长的原因……

“啊！祖国——母亲！”一定是产生了诗的灵感，肖敦煌忽然伸展双臂，大喊。

“……祖国，母亲……母亲……母亲……”神了！仿佛千万头羊一下子都活了，在应答他的呼唤。

“来，让我们各自对着这神树许个愿吧，大声地。”徐美英一边用手掸着落在头上脸上身上的黄土，一边建议。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由她开始：

“啊，祖国——妈妈！女儿很快就会回到人民内部，回到你的身边！”

“……回到你的身边……你的身边……你的身边……”

“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要让琅琅书声响彻大地，你必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

“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一定要黄河水在你的心田流淌，让你披上绿色新装！”

“……披上绿色新装……绿色新装……绿色新装……”

接着，三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放声歌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

嘹亮的歌声在山峦上空飘荡，萦回，仿佛是千万人的大合唱；歌声中，三个年轻人仿佛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那最高的山顶上，迎风招展。

祖国啊，母亲！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1958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始，在57年反右大获全胜的基础上，很快掀起了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热潮，城乡全面大跃进，六亿神州摆开比赛的擂台，看谁最敢想、敢说、敢干。“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颗颗卫星在锣鼓声中升天，粮食产量由亩产千斤跃到万斤，再跃到十几万斤……我和肖敦煌便是在这大好形势中到西宁高中报到的。一到那里，便给我们各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校长沧石还在大会上这样介绍我们：“他们是出了家门，就进小学门；出了小学门，便进中学门；出了中学门，又进大学门。长期不与生活实际接触，难免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也许现在连鸡蛋怎么个炒法都不知道，不要紧，总要学会的。现在不是青年团员了，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入党……”这些话，说得我们心里甜滋滋的。几十年来，人们对我们讲的话多了，我大都已经淡忘，唯独这几句话始终铭记。后来才听说，这位校长有点“右”，专门喜欢搜罗这样的人。如他不久前就接受了一个翦伯赞的孝子贤孙。此人下饺子时，竟然把饺子放到冷水里去煮，煮成了一锅面糊糊……

我得好好干，否则，不要说别的，起码也会辜负了这位校长的期望。

在“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中，我没有办法一天献出几十条老鼠尾巴或几十只麻雀头，便不管卫生不卫生，撬开刚刚解冻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堆或粪便坑，挑出苍蝇的蛹或蛆来交差。

在“拔白旗，插红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的思想批判运动中，我继承“忠诚老实”运动的光荣传统，主动自觉地“向党交心”。

在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时，为了过关，我不得不抛弃做人的良心，从报纸上抄来假话、大话、空话，在大会上说违心的话。过后又安慰自己：在批判马寅初的汪洋大海中，我只不过增加了无关紧要的一滴。

在大办工厂的热潮中，我不怕强酸、强碱的腐蚀，穿上工作服（没有手套），到校办工厂去镀镍、镀铜、镀锌。镀出的零件几乎件件合格。

在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我被允许编入连队待命。一天下午，命令一下，我立即打好背包，背将起来，跟着队伍向互助县的一座黄土山开发。全校教职员工及学生，排成浩浩荡荡的长龙，吹着哨子，或者喊着“一二一”的口令，步伐整齐地向前迈进。从田间小路，走上山间小道之后，再也听不到哨子声或口令声了，听到的只是呼呵、呼呵喘大气的声音。夜幕降临时，队伍走到山脚下。一声令下，队伍开始爬山。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窄，越险。有时看一眼左下方深不见底的沟壑，便象小时候在公园里过独木桥那样吓得双腿发抖。我下定决心目不斜视，只管向前。一再告诫自己：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天越来越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了，没有任何照明用具，也只能前进，决不能后退。队伍前面传来命令，要大家都双手拉住前一个人后背的背包，紧紧跟着前一个人向前走，决不许掉队。在这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样没有了害怕的感觉，不管前头是十里平川，还是万丈深渊，都如入无人之境，感受到人定胜天的欢悦……半夜里，终于到达山顶。吃了人民公社招待的一顿饭（两个发粘的青稞馍及两疙瘩咸萝卜）之后，摸着黑在平地上铺上一层麦草，打开背包，倒头便睡。清晨醒来，眼睛、鼻子、嘴巴周围结了厚厚一层霜。再去看看晚上走过的路：哗！没有摔下去就是万幸！只见，一条羊肠小路，一边是高耸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深谷……紧接着，不怕累，不怕苦，

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为 1070 万吨钢而战。最后炼出的是一大堆黑褐色的布满了蜂窝的疙瘩，公社社员捐献的铁锅、铁铲，铁活页还依稀可见。

青海是高寒地区，历来只能种青稞不能种小麦，居然放了小麦亩产 8585 斤的卫星，而且见诸《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我没有亲眼看到这卫星是怎么升起的，但是对党中央的报纸上的宣传，我一向深信不疑。在党的多年教育之下，我相信人定胜天，并且身体力行。在参加“双抢（抢收、抢种）”时，我和公社社员同住、同吃、同劳动，还完成相同的任务。在收割麦子时，规定每人割六行麦垄。我与社员排成一横排，“开始”的命令一下，便与社员一起挥镰向前。没有人教我，我也不去求。我眼快手急，边看边实践，不几下，便挥镰自如了。问题是一介书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可是在那具体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考虑我的具体条件，我也绝不乞求，只有拼命。手的力量不够，便加上腿的力量；还不够，就加上腰的力量；腰实在痛得使不上劲儿了，便蹲着割，跪着割。随着镰刀的挥动，头上脸上的汗水雨般地滴落下来，我顾不上擦；腰疼得似乎要断，我从不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目的是，总要不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收工时，整个人仿佛散了架一样，腰直不起来了，还钻心地疼痛，手磨起了泡，膝盖磨掉了皮……我从不吭一声，还要强带笑容，向别人学习磨镰刀的方法：左手握着刀把，镰刀平放在大石头上或地上；往刀片上吐一口吐沫，右手拿着一块拾来的拳头般大小的石头，以吐沫作润滑剂在刀片上来回磨擦，直到刀口锋利，刀身锃亮。第二天爬起来，尽管仍然疲惫不堪，我还是继续拼命……终究是初生牛犊，不知道“虎”是什么，当然也就不怕。也许我后来腰痛的病，就是这样落下的。

在大放卫星的锣鼓声中，青海的第一所高等院校——青海师范学院诞生了，西宁高中也升格为师院附中，由未来的火车站附近搬到杨家寨青海师院旁边，土地面积比原来多了，于是校长给每个教职员工分了一小块“自留地”，要大家学会种地。这也许有点儿“右”的校长，预见到灾难很快便会来临吧。59 年，在 58 年大办食堂，放开肚子吃之后，粮食定量开始递减。由每人每月 30 斤，减为 28 斤，再减为 26 斤，再减为 24 斤。男士们开始喊肚子饿，女士们则还好，于是有人想到要打女士的主意。在女士中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不能也不敢说“不”的人。组织动员我，减少我的粮食定量来支援男士，从每月 24 斤，减为 22 斤，再减为 20 斤。一样的人，我哪能不饿啊！可我只能服从。为了活着，我必须另想办法。万般无奈，我只有请求远在广西的父亲和姐姐支援，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给我寄来。我知道，不是有意和我“划清界线”，而是由于诸多不可直言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的，在那年月，广西发生了人吃人的事。原因之二是，他们比我这始终不谙世事的饿糊涂了的傻瓜更清楚，如果寄来了会更糟。徐美英那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的弟弟，最近连破烂也拾不到了。饿极了，便写信给在香港的舅舅，诉说他和母亲的生活。舅舅寄来了许多食品。结果，不但全部食品都要补纳重税，还遭到无情的批斗，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连年幼无知没有任何“前科”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就更甭说了，这是一；二是，有一个人（并非右派，也非左派，可能是个内部控制的“中间偏右”吧）告诉我，他在香港的亲戚，用木盒子给他寄来一只煮熟的鸡，可是打开木盒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鸡头！……怎么办呢？决不能坐而待毙。一天，我无意间看到有人偷偷摸摸地钻到“自留地”里去……我豁然开朗，有样学样，我也钻到“自留地”里去，转那么一圈，总能在衣袋、裤兜里装点儿豆角、萝卜、马铃薯回来，在房里用小锅偷偷煮熟了填肚子。

中国人是聪明的，在那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日子里，为了战胜饥饿，还用小便、麦草之类的东西来培养一种叫做“小球藻”的玩意儿，还美其名曰“人造肉”。这，我也学会了，只是还没有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把它咽到肚子里去了？

.....

这一切，无论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的，还是自觉自愿地做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扔掉头上的帽子，早日回到人民内部。值得说明的是，这一切我是在强忍病痛的情况下做的。到青海之后，我经常头昏，甚至晕厥；经常流鼻血、拉肚子、发低烧。在医院里做过各种检查，甚至连气管镜、脊椎穿刺都做过了，什么病也查不出来。我认为可能是高原反应，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写信对父亲和姐姐说明情况，请他们设法把我调离青海。他们却给我寄来一抔家乡的红土和一些中成药。嘱咐我把红土煮沸后连水带土一起喝下去，说，这方法可以治水土不服；还要我安心治病，认真改造，争取尽快摘掉帽子。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十年大庆，也许是大喜大庆的日子都要大赦的惯例，也许是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与饥饿作斗争，上面作出了要给一部分确实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的决定。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是沾了特赦“战争罪犯”的光了。我们是和“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一同被特赦的。摘帽之先，本人必须在全校教职员面前做自我检查，然后再由大家评议、鉴定，看是否够格。我开始写这两年来自我检查。我满怀信心地以为，在这两年频仍的运动之中，哪一个运动我都是全力投入，不仅行动上紧跟，而且时时刻刻狠斗头脑中出现的“私字一闪念”，哪怕只是“一闪”，甚至连自己的粮食定量都无私地献了出来。当然，我绝不坦白我“偷”，谁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只不过是偷鸡摸狗之类，而且人人如此，比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简直不用提，何况，这是脱胎换骨的需要，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脱胎换骨？岂不辜负了党的期望？写到最后，遇到一个难题。在归纳自己取得进步的原因时，必须写上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多少歌曲都这么唱着：“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是改造我、挽救我的大恩人。我应当写“共产党就像父母一样……”可转念又想，不行，我不能这样写，我是狗崽子，狗崽子的父母只能是狗，何况实际上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是反动官僚。不能把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与腐败的国民党等同起来，正如你不可以把其他人称呼为“同志”一样，你与其他人——人民不是平等的。那么，应当怎么说呢？……对了，姐姐，就说姐姐。姐姐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解放后才从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共产党掌握的大学中任教。在父母把所有财产都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家庭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她不仅赡养父母，而且履行父母的职责，供养她所有的弟妹，使我们不仅能够活着，并且读完大学。曾经有人建议我们申请助学金，姐姐硬是不同意，说，国家经济建设正在起步，有很多困难，我们自己节省点就可以对付过去。为此，她自己却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和时间，至今孤身一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用她来做比喻，应当不会错吧！想来想去，我便在检查的结尾写道：“党就像我的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爱护我、关怀我，帮助我、挽救我、教育我，使我……”当我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念出这句话时，立即全场哗然，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雷一宁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官僚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雷一宁不投降，就叫你灭亡！”“砸烂雷一宁的花岗石脑袋！”“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竟等于你的姐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并且，祖宗十八代地揭批我的家底：曾祖父是大地主；祖父是国民党的大官僚，解放前夕逃亡台湾；父亲是国民党员，是反动县长；连解放前夕只有17岁的哥哥雷一松也不能幸免，由于他逃亡香港（其实他是到香港读书），后又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我又多了一项帽子：“里通外国（特务）”……这些我“向党交心”的东西，现在全部成了我的罪状！在北师大读书时，开展过一个“忠诚老实学习运动”，要求我们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将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问题全都交代清楚，组织一再说，做老实人决不会吃亏。那时我们并不“右”，相反相当“左”，组织的话在我们心目中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组织这么教育我们，我也这

么认为，把一切都向组织交代没错，交代得越彻底越深刻，越能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便是“向党交心”。现在回想起来，这实质上就是“宁左勿右”：为什么不强调“实事求是”，而只是强调“彻底、深刻”？没有“实事求是”作前提的“彻底、深刻”，可以是个无底洞啊！因此法律规定在给人定罪时，不能仅凭“说”，必须有旁证尤其是物证，就是要杜绝那种超越了“实事求是”底线的瞎说，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的瞎说。由于“宁左勿右”，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大义灭亲”，揭发了父亲的所谓反动言行。我因此受到了表扬，后来被选为学校的三好学生；在55年肃反时，是被信任的积极分子。当时我为“家庭出身”栏怎么填写绞尽脑汁：祖父和父亲都在日本读了大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祖父是个大官僚，父亲做过一年县长，也是官僚。于是便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支配下，填上“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又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毛主席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在解放初期实际划分成分时，也根本没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阶级成分也不是自己想怎么写便怎么写的，据说，那是土地改革时由土改工作队根据政策划定的。我家一直住在城市，没有参加过土改，根本没有被划过成分。事先，组织应当把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向我们这些单纯幼稚而又愚蠢的人交代清楚的，但是没有；那么，在我莫名其妙地背上此黑锅之后，组织也有责任指出我愚昧无知的错误，但是也没有。仅此一点，使我不能不怀疑，那记载着我的“罪行”的档案，组织是否仔细地看过？恐怕没有吧？这档案之所以存在，并且随着时日的增加而越来越重，只是因为那里面记载着我的全部“罪行”，及本来不是罪行的东西，经过“加工”后可以上升为“罪行”的材料。

那天，我被批斗了一通之后，回到宿舍里，只能用“悲痛欲绝，思绪翻滚”来形容了。

我怪自己投错了胎，生错了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我恨，恨死了我这官僚资产阶级的出身，恨死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家。正是这种恨，使我决心走得远远的，从广西跑到北京。满以为这么一来，我便与它划清了界线，脱离了关系。岂知，它给我烙下的阶级烙印是永远剜不掉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的路，还硬说我“死不悔改”？不是说，出身可以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吗？……

我恨死了北师大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个组织一再动员我报考的系，这个我响应祖国人民的召唤而选择的系！既然语言文学是阶级性很强的学科，连一个比喻也有这么强烈的阶级性，为什么要动员我们这个阶级的人去学？如果我学的是数理化而不是语言文学，充满我头脑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1+1=2$ ，我不需要去考虑那些已被实践或经验证明为不正确的命题，如 $1+1$ 是否等于 3 ，这些光荣、伟大、正确、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玩意儿，在头脑里就无立足之地……

我恨死了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读那些害死人的书？如果我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我根本不会上害死人的北京师范大学，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我恨死了我自己，如果我不以天下为己任，管你伟大不伟大，光荣不光荣，正确不正确，只管潜心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甚至还可以留在人人羡慕的橱窗——北京……

然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

我得感谢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在我的血缘关系及家庭教育中都没有“自杀”的基因，否则，恐怕我会自杀。这个家族遗传给我的是顽强，或者是你们说的“顽固”。我没见过曾祖父，据说，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有了钱不象一般人那样去吃喝玩乐，而是拿去办学，使那些穷人子弟有上学读书的机会。祖父雷殷，在南宁府立中学堂读书时，便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他原名凯泽，由于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被袁通缉。他改名殷，并逃到日本避难。在日本，他一方面入东京政法大学读书，一方面又与在日本的中国爱国志士继续开展讨袁活动……当我在南宁出生时，他是广西民政厅厅长。据说，任职期间做了不少“坏事”：禁烟禁赌，惩办贪污，兴建公路，督令乡村积谷备荒。在人们不愿读书时，他捐钱兴学，鼓励穷人送子弟读书；在人们不讲卫生成风时，他被指派为省府卫生委员会委员。以后，他被调到

中央国民政府任内政部常务次长，后又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逃亡台湾……记得我只见过他一次：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拉过我的小手，展开手掌，端详了好一会儿后，说：“你要好好读书啊。”也是那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把他人家送他的东西一边往屋后的池塘扔去，一边说：“……看你再给我送！……”我站在远处，看着满脸怒容的他，心里好恐惧。可是，我竟是他的孝子贤孙！对于父亲雷雨，我知道得多些，不过历来是畏惧多于亲近。他也是我行我素的人。由于我祖父的关系，他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又因为与我母亲的自由婚姻，与他父亲（即我祖父）脱离了父子关系（他就不是一个孝子贤孙！）。在任天保县长的一年间，他什么好事也没做，“坏事”倒做了一些，其中有一件是：修公厕，禁止随地大小便及吐痰，违者格罚勿论，惹得不少人因被罚款而怨声载道。最后，他这个始作俑者不得不以摘掉乌纱帽而终止了他的恶行。但是，他并没有终止求索，为了寻求真理——你们说是歪理，他到过日本，还想逃亡延安……最后还是找到了在神州大地土生土长的墨翟。为了宣传墨子的“兼爱”思想，他倾家荡产，连我妈妈的嫁妆也都拿了出来，办了一所天志中学。结果是债台高筑，全家人长期在饥饿贫困中挣扎，从我懂事时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要说恨，有权利恨这个家的首先是我！因为它剥夺了我应当有的幸福童年！你们却说我是它的孝子贤孙！……解放后，私立中学不允许存在了，父亲便把所有土地、房舍和图书，无偿地献给人民政府，他仍然希望，这些奉献能对培养后辈起好的作用……可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的话）的了。

宣传“兼爱”有什么错？为了世界大同，为了爱，只要自己愿意，为什么不可以“打我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让他打”？莫非宣传“兼恨”？“阶级斗争”是宣扬仇恨的吧？不是吗？以暴易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今天这一拨斗那一拨，明天那一拨整这一拨，有完没完？……修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那么，什么是“好行”？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便是，人是不随地大小便的动物。任何人，如果真要对一个国家进行考察，首先应当考察他们的厕所。因为，厕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窗口。莫非……我立即想到“双抢”劳动住在老乡家里，第一次上厕所的情形：厕所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平展展的地上铺了一层碎土块，房子一角的两面墙壁之间，横搭了一根木棒，上面蹲着十几只似睡非睡的鸡，看到有人来便立即警醒，有的飞落地面，有的则双目炯炯地盯着来人……怎么看也看不到拉屎撒尿的坑，我以为走错了地方，赶紧跑出去问房主人。房主人却一再说：“就是那里！就是那里！”我只好返回，仔细望着那铺满碎泥土的地面，不得不承认这便是茅房。此地人都有用泥土吸收粪便，再把吸收了粪便的泥土拿去肥田的习惯，并根据这习惯发明了相应的厕所。如，学校的厕所，便是一个类似南方的吊脚楼的二层楼房。楼上的地板上整齐地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洞，这便是拉屎撒尿的坑；楼下则是存放粪便的大坑。管理厕所的人，定期从楼上的洞里往下丢撒泥土，到差不多把下面的大坑填满时，便从楼下的门口进去，用铲子把吸饱了粪便的泥土铲起来，丢到架子车上运走（“文革”时我就做过这种“掏大粪”的工作）。现在这厕所之所以不同一般，一定是房主人很穷，无法盖那种两层楼式的厕所的缘故。仔细看，是可以看到一块块尿渍，一疙瘩一疙瘩羊粪蛋般的大便。我必须适应这种厕所，体会“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的艰辛。于是解开裤子，蹲下来方便，……这种经验是我终生难忘的：且不说小便撒到泥土里，紧接着反弹回来，溅得满脚满鞋都是小便和泥土，连屁股也不能幸免。受不了的是，那些蹲在木棒上的鸡，一下子咯、咯、咯咯地飞下来，挤到我屁股后面，抢食那还没落到地面的屎，有的还啄到我的屁股上了，吓得我赶紧憋住还没有拉完的屎，裤子也来不及系就往外跑。后来我才知道，此地农民家里大都是这样的厕所，尤其是在那年代，既可以多养鸡、多产蛋，又不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中国的农民是聪明的，这是为了活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鸡蛋，这场面立即呈现在眼前：一要吃鸡蛋，便恶心得想吐，幸亏那年代有钱也买不到鸡蛋！以后，只要条件允许，我也要随地大小便了，能够在墙角落、在灌木或草棵子丛中方便，那真是莫大幸福。怪不得

也！爸爸禁止随地大小便是恶行！祖父要改变不讲卫生的风气是反动！

这些，便是我的先人做过的事。坏事也罢，好事也罢；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我就是我，与我何干？为什么总要和他们联系起来？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想做的事？走我自己想走的路？……

这，便是我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家。我的先人，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没有想过要逃避，没有想过自杀。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人，是真正的强者。

这些，都是我“忠诚老实”地交代出来的。我得感谢我读了四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她使我明白，作为一个人，起码要保持做人的底线，这底线就是忠诚老实，说真话，做实事，永不伤害他人。我在黄药眠先生的美学课中，知道人应当是真的、善的、美的。我在穆木天先生的外国文学课中，从古代希腊文学中知道，神话不能等同于迷信，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人类——人类的童年时代的美好愿望。给我们上文学理论的是谁？想不起来了。他说文学是人性，反映的是永恒的人性，是永恒的爱，而不是恨。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如此。给我们上心理学的是谁？也记不得了。他讲得多好啊，造物主在造人时，在人的身体内放进了三种“非物质的东西”，一是理性，二是感情（或曰情绪），三是良知（或曰良心）。“理性”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感情”和“良心”是人心的延伸。人如果没有“理性”，不能实现人生的目的；如果失去“良心”，则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如果没有“感情”，则没有人生。……算了吧，心理学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研究心理学的人以及黄药眠、穆木天等也都入了另册，与你是一丘之貉！何况，在这“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时代，这底线值几何？……嗨！罪过！说你有颗花岗石脑袋没错！……

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

在这最需要扶持和帮助的时刻，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得到的只是扔向我们的石头……我想起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里发生的故事：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之后，立即被警察逮住了。这时主教没有向他扔去石头，反而对警察说，那是送给他——冉阿让的礼物，并且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怎么忘了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从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直到当上市长。为何在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国竟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莫非对人的援救和帮助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保留做人的自尊？自尊难道是应当消灭的资产阶级感情？他们在想尽办法摧毁我的自尊心的时候，不也摧毁了他们做人的自尊，堕入了假、丑、恶的深渊了吗？动物有自尊心吗？没有吧！说什么“人是能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应该说“人是有自尊心的动物”。有了它，人就会奋发向上；失去它，人便会堕落为兽，什么恶行都能做出来。摧毁不该摧毁的东西，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忽然，自从戴上桂冠离开北师大之后，一直伴随着我的那种说不清的情绪，似乎清晰起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是大傻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大大的骗局之中而不自知。究竟是怎么样的骗局呢？现在仍然扑朔迷离。但是，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跤摔得非同小可，绝不像我们想的，只是小孩学步摔了一跤而已。既然如此，我们到底算什么呢？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说什么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难道可以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吗？……

这一夜，我在这些没有结论的思绪中迷糊了一晚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过自杀，却非常想哭，放声大哭，可又囿于隔墙有耳，只能躲在被窝里、在黑暗中叩心泣血！

当黑夜过去之时，我又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既然不打算死，便得活着，可怎么活法？打那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在那以前，也许是由于修正主义校长沧石（这是在“文革”中赐给他的头衔）的庇护，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右派分子；有的人，也许还因为我是来自北

京而对我敬畏三分。这以后，我便成了过街老鼠啦！当我上图画课时，学生在下面叽叽喳喳，眼睛斜睨着我；当我坐在图书馆的借书窗口旁时，一个个鬼脸在窗前呼啸着闪过，有时还扔进一张借书纸条，上面写的是“打倒右派分子雷一宁”；当我在校园里行走时，土疙瘩或狗屎、马粪之类便莫名其妙地向我头上、身上飞来；当我走进并不了解我的商店时，总有一伙人围在一起指着我叽叽喳喳，还不时向我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我不禁想到那个我们刚来时展示给我们看的可能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女教师，可我没有穿那招人惹眼的裙子！她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莫非……偌大一个中国，竟容不下一个有个性的女人？……我又想到那并没有在这闭塞的西宁古城生活过的阮玲玉……啊，不！我决不能学她！

我除了上图画课，还有一个“不得抗拒”的任务：批改学生作文。这令我好生奇怪：我不能上语文课，是因为我会在讲台上放毒；这改不完的作文本我是可以改的，我不会在本子上放毒啊！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我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这“图书馆”，实际只是一个半大不小的书库。除了不多的几架图书，上面稀稀落落地立着一些经典著作、历代名著；便是几个报架，上面挂着几份报纸。不过这对于精神饥渴的人，总是一点精神粮食。书库对老师是开放的，经常有老师进来翻翻书，看看报。我只是个图书管理员，我的顶头上司是个比我小两岁的刚从本校毕业的女孩，刚结婚，蜜月还没度完呢！除了买书，难得见到她，图书管里经常是我一个人。有关图书的工作并不多，我经常是埋头批改作文。有个数学老师，特别喜欢到书库里面看书，一待就半天。我只是埋头工作，从未多看他一眼。有一天，他竟然把我的头使劲儿拧过去，要……我本能地跳起来，给他一巴掌说：“你想干什么？”随后我为这本能的动作吓坏了：这下糟了，他的妻是个“女强人”，什么教育局长之类的，若他歪曲事实去汇报一通……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语文组有一个 Y 老师，初来乍到时，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之下，我曾和他同台演出过一出滑稽剧，弄得全校哗然，使我醒悟，以后决不能应允这种事。有一天，他也来到这半大不小的书库。尽管我仍埋头批改作文，却本能地意识到一双猫眼在瞅着我，弄得我芒刺在背，忐忑不安，只想弃下工作往外跑……他渐渐走近我正在工作的桌边，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小瓶盐问：“这是什么？”我抬头看到他那贪婪的目光，下意识地说：“白糖。”于是，他不由分说，打开盖子，往手掌上倒了满满一把，倏地便往张开的嘴巴里送。紧接着“啊！”的一声，跑了出去。同时，我也“啊！”了一声——我又闯祸了，如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一天，徐美英告诉我，她快把篮球队带出了西宁第一的水平了，要我去看她们的一场比赛。基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理由，我怕给别人也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除了与组织联系，我从不串门，从不接受任何好意的或者非好意的邀请。连近在咫尺的肖敦煌，也只是见面时点点头，话也不多说一句，甘心做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但这次是非去不可的。人人都知道这样的故事：49年前的一天，马步芳（解放前总揽青海军政大权的“青海王”）偶然见到人家打篮球，站着看了一会儿后，说，十个人抢一个球啊！叫他们别抢了。呐，给你们钱，买十个球，一人送一个。现在，她居然能把一个篮球队带出西宁第一的水平，而且是个女子队，不知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我一见她就吓了一跳，她瘦了好多！在观看球赛时，我不断用话语激她，想听到她此中的甘苦。但她始终三缄其口，我注意到，有时泪花在她眼眶中闪烁。最后，意想不到的，她告诉我两个消息。一是，“北师大 58 届毕业来青海的同学，为了便于联系和沟通，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可竟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了。以后咱们少联系为佳。”二是，“还记得 S 君吗？她到了西安，又被再次分到一个县城，县城又把她分到一个公社。在那里，被人用枪逼着奸污了……”“啊……”我几乎喊了出来，但又随即放低了声音，“哎，女人！这便是我们这种女人的命运，逃脱得了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那个男朋友呢？”“男朋友？到了甘肃之后，又到了酒泉。也许酒泉就是九泉吧，以后就音讯全无了。……好了，不多说了。好自为之吧。你看，那边那个人在盯着咱们呢！”

也许是我们家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我想到逃，不是逃出国境，而是防患于未然，逃离即将到来的祸患。然而，逃到哪里？那时可不像改革开放的现在，大批贪官可以任意逃，而且是携带巨款，携家带眷地。想来想去，我只有求助于唯一关心我的父亲和姐姐，请他们设法帮我调回广西。那里终究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好山好水，到处是山洞，大不了就去做新时代的白毛仙姑，去重演“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X”的喜剧。于是我把这意思告诉父亲和姐姐（当然不包括最后这句话），可我没有白毛女的福气，他们的回答是，劝我安心改造，重新做人。说，像我这种情况，是没有人敢接纳的。看了他们的信，我才意识到，我天真幼稚单纯的病，是病入膏肓了；或者说，尽管我二十多岁了，却仍然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不知天高地厚！

也许上帝造我，真是准备降大任于我的吧，特意制造了“饥饿”来锻炼我。现在的饥饿已经不是通过内部调整可以解决的了，因此，上面发出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一个大办农场的热潮立即在全国/青海掀起。西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奔向草原，那里有广阔无垠的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青海师范学院前些时候就在草原上办了一个农场，农场的负责人是个北师大派来支援青海师院建校的老师。据说他把农场搞得一塌糊涂，多吃多占，克扣农场职工的粮食，发生了饿死人的事。农场要继续办下去，必须把农场的书记、场长和职工都换成新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农场。

1960年底，我扛起铺盖卷，坐上一辆无篷的解放牌卡车，沿着青藏公路西行。过了湟源，汽车沿着蜿蜒的公路，爬上日月山。当汽车到达山顶时，望着前方的茫茫大草原，往事立即呈现在我眼前：一千多年以前，文成公主曾经孤零零地伫立在这里，向后看，是郁郁葱葱的故国家园；向前看，是茫茫苍苍的大漠荒原。她大哭一场之后，狠狠地砸碎了可以遥见故都长安的神镜，决心永不回首来时走过的路，连泪水也领悟了她的决心，汇成了由东向西流的“倒淌河”，流入青海湖。文成公主啊，我追随着你的足迹来了！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也会和你一样，绝不回首来时路。

越过倒淌河，汽车进入了草原。但这里的草原并不平坦，坑坑洼洼的，汽车象摇簸箕似地上下颠簸，有人开始呕吐。我没有吐，不过屁股可能颠掉了一层皮。不知我坐的行李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出奇地硬。也许是书籍？哪个傻瓜还念念不忘读书啊！虽然出发前一再提醒我们：把东西都带齐，作好安家落户的准备。安家落户就安家落户，我决心与那害死人的书本决裂！因此我所有的书籍都放在学校的仓库里了，只带了一本《反杜林论》。

汽车驶上了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藏语的音译，意译为“台阶”），才到了广袤平坦的大草原。当草原广阔无垠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立即想到那有名的古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倒是苍苍、茫茫，可并没有可以把牛羊淹没的高而密的草，只有枯黄的稀稀拉拉的高不过踝的草。莫非古人和今人一样，也要歪曲现实麼？或者那是在想象中美化现实？……没有人烟，没有树木，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铺上水泥或柏油的公路，我总觉得司机是在无目标地乱跑。美丽优雅的黄羊似乎是草原的主人，时不时成群结队地从汽车旁边跑过；有时还站住，瞪大眼睛盯着我们，似乎在说：“你们为什么来侵犯我们的领地？”

我们的目的地是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河卡公社的青海师范学院农场，地处黄河西岸，海拔三千多米。当我们听说“到了！”放眼一望，却什么也没看到，既没有房屋，也没有帐篷。我们的“家”在哪里？草原上当然没有砖瓦盖的房屋，只有帐篷。然而，即使是棉帐篷，也抵御不了利刃般的风砂和刺骨的寒冷。于是人们在结实的草地上挖开一个个坑，把帐篷的大部分栽入坑中，只有帐篷顶露在地面，远远望去连个顶儿也看不到，这叫“地窝子”——我们的“家”。地窝子内，地面上铺些干草，便是床铺。铺连着铺，每人所占的宽度大概就是一市尺多一点儿。当然没有取暖、煮饭的家具，也没有桌椅板凳和灯，农场职工是不需要

读书看报或写字的。十个八个人住一个地窝子，吃饭、睡觉、政治学习、检查交代全在这“家”里。

和我同住一个地窝子的，全是女“盲流”。盲流者，河南、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以为青海到处都是金子，到处都有馒头，而盲目流入青海之人也。她们都只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应当上大学的年龄。个个都乳臭未干，梦想着只要、也只有上了大学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都自发地流到青海师范学院，满以为人民的大学理应人民上。没想到师院接纳不了没有粮户关系的她们，把她们下放到了农场。

在我们到来之前，地窝子里只住着一人，名叫徐雅群，也是盲流，不过年龄较大。我们的到来使她非常高兴，她也就当然地成了我们的“向导”。当场部来给我们每人发老羊皮大衣和棉帽子时，有的女孩瞅着那些纯粹是男人用的又大、又笨重的东西，拒绝接受。她在一旁反复说：“收下！收下！不然会把你冻死的……”大家吃完晚饭，回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家，倒头便睡。忽然一个声音喊道：“喂！徐大姐！茅房在哪里？”“天当房，地当床，草原到处是茅房。”“别开玩笑……”“绝对不是开玩笑。黑瞎嘛胡的，还不好办吗？跟我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不仅没有厕所，连手纸和女人来月经用的卫生纸都没有。不用说没钱买，就是有钱也无处可买。不久，在我们带来的一点点手纸用完后，也只能用石块、土疙瘩来擦屁股。好在一天吃进去的也只是一点点又硬又清的东西，不用擦也很干净。

第二天一早起来，便有人问：“到哪儿漱口、洗脸？”徐雅群说：“草原好，草原大，草原上面处处是草疙瘩，草原上面随处可以拉撒，草原姑娘不必洗脸刷牙……”“啊？！为什么？”“没有水。草原上的水比金子还贵。”……

吃饭的时间到了，大家拿起饭碗就往外跑。她喊：“别跑！”拿过一个姑娘的小碗，命令道：“太小了，找个大的。”“没有更大的了。不可以添吗？”“就是不可以。”有人开始找大碗，不过有人并不相信她的话，昨晚的一餐饭，吃的是饺子，管饱啊！等我们走到厨房跟前，人们都已经在吃了，那景象可使我们十分吃惊，想到我们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便不禁毛骨悚然：一个个瘦骨嶙峋、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人，蹲在地上，端着大缸子或捧着脸盆，呼噜呼噜地喝着一种什么汤；喝完了，便把头埋到盆里，舌头伸得长长地舔了一遍又一遍；如果食具是窄而深的缸子，便伸出两个手指去刮出来，再用舌头把手指舔干净。舔完了刮完了，眼睛仍然盯着盆子或缸子，喉结一动一动地，仿佛这么一来，饭就会喷涌而出。据说，这是因为“粒粒皆辛苦”，也是为了节省水。草原人清洁饭碗的方法，一般是用干燥的牛马粪擦。这些知识分子发明的方法比他们高明，既卫生，又省水，还认识了农牧民的辛苦，有利于脱胎换骨！轮到我们打饭时，我们的小碗，还盛不完一勺“饭”。赶紧吃完，“饭”已经没有了。我们这才设法弄大碗，有的是大搪瓷缸子，有的是还不算大得不像话的洗脸盆或洗脚盆。我的脸盆直径足有一市尺，大得实在不好拿出手，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徐雅群不知从哪里给我找来一个把儿丢了的大搪瓷缸子，胡乱找了一根铁丝，缠缠绑绑地弄了一个把儿，这便是我名副其实的“铁饭碗”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昨晚的那餐饭，是特意为招待我们而做的，饺子还是场长沧石亲手包的。我这才知道这三八式的老干部也下放到了农场当场长了。这里的“食”，在道路不被大雪封锁的情况下，是十来天个把月，由卡车从西宁运来的。青稞面、豌豆面、大头菜（洋包心菜、学名可能叫耶菜）、洋芋（马铃薯）、萝卜干，是主要的食物。西宁也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了，唯有发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精神来解决。农场成立了牧业队，养羊、养马；成立狩猎队，到山上去打黄羊、岩羊和熊。我们经常吃的是拌汤和馍馍。“拌汤”是用豌豆面或青稞面搅拌成的面糊糊，经常稀得可以照见自己的脸。上面飘着几片嫩绿色的（菜心）、深绿色的（外皮）或黑褐色的（干了！）大头菜叶子。青海出盐，盐是不会少的，但几乎看不到油。“馍馍”是黑灰色的豌豆面或青稞面馒头，经常是一个约八公分直径，五公分高的圆柱体，一般一顿只能拿到一个。没有发酵，或者无法发酵，硬邦邦的，一咬便

“嘎嘣”一声——冻了。牙齿好的人，嘎嘣、嘎嘣几下就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一贯牙齿不好，和姑娘们拿回“家”去，在床铺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小心地用牛粪马粪燃起一堆火，把馍馍放到火上去烧，去烤。烤焦一层，细心地剥下来，放到嘴里；再烤，再剥，再放到嘴里……一层层地剥，一层层地吃，既免去了硌牙之苦，又可以慢慢品味，仿佛在吃一种从未吃过的山珍海味！这样，我们便给自己增加了一个任务：到草原上去拾那黑色的金子——牛马粪。至于那“自力更生”的，往往要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羊或熊，则是特定的日子或节假日“改善生活”的原料。那顿味道鲜美的水饺便是这样来的。

我和这些盲流姑娘住同一个地窝子，也编在同一个劳动小组。那时正是隆冬，给我们的任务，是为伙房准备燃料。姑娘们和我，一人拿一条毛绳，一把锄头或镢头（十字镐），对着视线尽头的“黄土疙瘩”走去，然后爬上去，或者溜下黄河河谷去完成。草原上没有很高的草，更见不到树，在这光秃秃的黄土疙瘩的阴面，却长着一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小灌木。粉红色中带点儿绿色的枝桠，大都弯弯曲曲地匍匐在地面，叶子细碎，不用心看几乎看不到，远远看去，就象是许多粉红色的珊瑚。我们的任务，是用锄头或镢头把它们连根挖起。挖呀挖，挖得手起了泡，泡破了，流水、流血了，仍然挖不出来。经常要两个人同时挖，才能把它挖起来。原来，它的根须之长是枝长的数倍。挖够之后，用毛绳绑成可以双肩背的捆子，在另一人的帮助下，背到肩上。再走上漫长的路，回到场部交差。中间不能休息，一旦坐下休息，就会站不起来。假如遇到刮风天，背上的大柴捆就像一面巨大的风帆，迎着风，寸步难行；背着风，就会脚不点地地被刮走（回到起点）；要避风，连个避风之处都没有。唯一的办法是，佝偻着身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每当我艰难地挪动之时，我常想，面对漫天风砂，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逃”，别无他法。可这种被我们当作柴火的纤弱瘦小的灌木，千万年来，抗着肆虐的狂风，顶着漫天的尘沙，抵着几乎终年无雨的干旱，却顽强生长，繁衍不息。他们生命的源泉，就是将数倍于躯干的根须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吸收着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养分。为了减少外力的摧残，它们将树叶变得小之又小，还将躯干紧贴地面，表现了一种“外曲内刚”的顽强气节。那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在西宁北山顶上巍然屹立的三棵树，一定也和它们一样。人们把它们尊崇为神，正是尊崇这种顽强气节。然而，现在，我们却要把它们连根挖起！怪不得啊，褒义的“顽强”，都变成贬义的“顽固”了！不知道那三棵树是不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人啊！人！以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来破坏自然创造之物！这难道不会遭到报应——客观规律的报复吗？

准备燃料的另一个地方是黄河河谷。黄河在中下游几乎都是高出地面的河流，必须用堤坝控制住，她才不会横冲直撞。这里的黄河，却是在深谷中奔腾不息的水流，冬天不会结冰，仍然轰、轰、轰地滚滚奔流，只是水面上大块大块的冰凌涌动、翻滚，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两岸高耸陡峭，千沟万壑，怪石嶙峋，十分险峻。就在这沟壑之中，怪石缝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在冬天也还郁郁葱葱。这些灌木，便是我们要砍伐的目标。当我们看到那生意盎然的绿色，不禁都欢呼着冲下河谷。可是由跑，而走，而爬，最终只能颤颤巍巍地抓住树枝或藤蔓喊救命。以后只有到那并不太高的黄土疙瘩上去，挖那可怜的粉红色的“珊瑚”，直到把它们斩尽杀绝。

一个刮风天，我正背着一大捆柴火，迎着风，佝偻着身体吃力前行，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喂，雷一宁！”我艰难地转过身去，意想不到，是肖敦煌！他身穿翻羊皮大衣，头戴耷拉下帽檐的棉帽，手拿长鞭，赶着一辆马车。我喜出望外：“肖敦煌啊！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的后一批吧。到了有两个星期了。你还好吗？”“还好啦！‘同是天涯沦落人’，没有那么多始终不远不近地盯着你看的眼睛。”“来，把背上的东西卸下来，放马车上吧。”不由分说，他便帮我把柴捆卸下来了。我注意到大车上堆放着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以为他也是准备燃料——牛屎马粪，便说：“你的任务也是……”“拉水。”我看着那些麻袋迷惑不解地：“水？”“凝固的水。”他脸上现出了灿烂的笑容。原来如此！右派分子是不可以进伙房，不

可接触水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下毒药。现在把这任务交给他，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意味着非常信任他了。为了回应组织的信任，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他很快学会了骑马，学会了套马车，学会了挥鞭赶马；负责带一小组学生去拉水，地点在我们挖柴火的黄土疙瘩后面几里路的河谷里。那里的河谷比较宽阔，旁边还有一个天然的小小水库，里面的水都结了冰。他们就是拉这些冰，或者冰下的水。这时，正值零下二十多度的隆冬，他们驾上牛车或马车，从场部出发，走十几里路来到黄河边。背上柳条编成的背斗，拿上镢头、锄头和钢钎，小心翼翼地，有时手脚并用地，爬下陡峭的河岸。走到小小水库边，用镢头、钢钎把冰敲开，打碎，一块块装到背斗里。然后背着沉重的背斗，气喘吁吁地爬到岸上，把冰倒出来，装到麻袋里，放到大车上。再背起空背斗，爬下陡坡……等把所有麻袋都装满，衣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然后，老马拉着沉重的大车，哐当当，哐当当地在前面走，他们在马车后头摇摇晃晃地步行。等回到场部，他们的衣服又结成冰了。还得抗着弯不过胳膊的痛苦，把麻袋抱起来，扛进伙房，把冰块倒进一个大半截栽在地里的大木桶里，让它溶化为水。这大木桶里的游荡着似虾非虾的生物的水，便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圣水。人体 70% 是水，不可一天无水啊！这便是水比金子还贵的原因了。

大雪封山了，有事的或有家的都在大雪封山前离开了农场，留下的便是有家不可归却非常想离开农场的“盲流”和“牛鬼”。由于食物来源的暂时中断，给我们供应的吃食愈来愈少了。拌汤日见其清，清得可以见底；豆面疙瘩的体积日见其小，小得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饥饿难忍的人们，想方设法，要给欲望无穷的肚子一点补给。可草原上连在长征中救过红军命的草根树皮都找不到，补什么？除非去偷。但据说，凡有东西可吃的地方，都是荷枪以待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冒死去偷。这些日子就有一个消息在悄悄流传：附近某农场一个职工，饿极了，钻到存放麦种的仓库里，把生生的麦子饱餐了一顿；后来渴极了，又钻到伙房里，饱喝了一顿。结果肚子撑得老大，撑死了。他没有死于枪弹之下，却死于自己的欲望之中。宁为撑死鬼，不做饿死人，是中国人的传统呢！自古以来，被处死/赐死的人，都是饱餐一顿之后再行刑的。没有这么大胆量和本事的人，只能想别的办法。有的去捉老鼠来充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要咽得下喉，不足为奇了。但居然有人去逮“哈拉”来充饥，那也是宁为撑死鬼，不做饿死人的传统在起作用了。“哈拉”正规的名字叫“旱獭”，兔子般大小，和老鼠一样，在草原上打洞的本领很高，极不容易捉到。任何一只哈拉都可能携带鼠疫病菌，鼠疫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曾经夺去几亿人的性命，因此草原上禁止捕食哈拉。但其肉肥美鲜嫩，至今还在诱惑着人们去捕食，更不要说在那饥饿难忍的年代了。

一天，是难得赏赐给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地窝子的人都挤坐在“门口”晒太阳。这“门口”是从地面到地窝子的入口，由高而低有几级台阶，最下面是一小块通到地窝子内的平地。这天的太阳好暖和，真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午穿纱”的感觉。大家都脱掉了从不离身的老羊皮大衣，以便更多地享受太阳的爱抚。一个姑娘伸手到衣领里面抓痒，抓着，抓着，抓出了一个东西，一看便喊了起来：“我的妈呀！”大家转头一看，也都喊了起来：“妈呀！虱子！”一下子所有人都觉得身上发痒，都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挠，去抓。一会儿，抓出一个，用两个大拇指一挤，“毕”地一声，手上留下一滩血迹：“王八蛋！老子的血已经差不多了，你还要来吸！”一会儿，又一个，又“啪”地一挤……有人挠着头皮，拨开头发，说：“小 D，你帮我看看这儿。”那被喊作小 D 的姓邓的姑娘，一看以后喊了起来：“虱子！妈呀，好长一串！还有好大一片虱子蛋！”一下间，所有的姑娘都挠自己的头皮，都“毕啪，毕啪”地挤……我忽然想起《阿 Q 正传》中阿 Q 和王胡在日光下比赛捉虱子的情景，莫非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捉不到而生气，也没有放到嘴里去吃，终究时代进步了！根据这段时间在共同生活中的观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吧，她们尚能平等对待我，因此我也放心平等地对待她们。我走进地窝子，在我的行李袋里翻翻找找，找出

那把姐姐寄给我的广西出产的篦子（一种齿很密的梳子，可以把虱子梳/篦下来），递给她们说：“呐！没办法洗，篦一篦也许会好过些。”又抓住一个姑娘的两条辫子说：“干脆，我帮你剪了吧。”……一个年龄最小的四川姑娘，始终站着，两手抄在袖筒里，呆望着远方。一个原本很胖现在瘦了一圈仍然比别人胖的姑娘使劲儿按下她的头说：“坐下。我来帮你看看。”她挣开按压她的手说：“我不。我不能……”欲言又止。另一姑娘说：“啊，我知道了，你是来月经啦！”她一下子脸红了，说：“去你的！”“有什么好脸红的！人人一样。”她跺着脚，强调：“不是来了。是没有来！”“啊？是不是……”胖姑娘瞟了我一眼，说：“是不是像徐大姐一样，怀孕了？”她捶着她说：“打死你！我不是不要脸的人。我是怕我得病了……呜哇！我好想我妈，呜哇，妈，妈妈啊！我好想你。我要回家。呜哇，我要回家……”一个瘦小的姑娘搂住她，陪着流泪，说：“你别欺负她了，我也没有来。”好几个姑娘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也没来……”“我也没来……”原来这样，我也没有来！于是，我说：“不用担心了。上天造我们的身体是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由于营养太差，身体里没有这么多的血可以流，便自动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流血。只要营养改善了就会好的……”那胖姑娘说：“原来这样啊！我真羡慕你们，省了许多麻烦事，不用为买不到纸发愁了。我可愁死了。你们猜，我怎么办？撕带来的几本书！把大腿都磨破了。书撕完了，只好撕旧衣服。再来一次，就连衣服都没得撕的了。再说，完了连丢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任它在草原上乱飞……”“谁叫你不带来！”“谁知这鬼草原连买纸的地方都没有！”“我倒是带了些。向我磕个头，就给你。反正我没用处了。”……

在这议论中，我才知道徐雅群怀孕的事。后来，我在一个姑娘那里知道，她是为了填饱肚子牺牲了自己的贞操的，对象是一个又老又窝窝囊囊的炊事员。怪不得她随着大雪封山前最后一趟回西宁的车，离开了农场。这便是弱不禁风而又胆小如鼠的女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填饱肚子的特殊方法。唉，可怜、可悲的中国女人啊！

可能是除夕夜吧，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在帐篷被寒风刮得“噗噗、噗噗”地颤抖的窝子里，在牛屎马粪燃烧的微弱亮光映照之下，一群年轻人，耷拉着帽檐帽耳，双手抄在宽大的老羊皮大衣的袖筒里，瑟缩着身子，正在努力认真地听农场党支部书记有声有色的描述：“……我们，喝令三山五岳低头，喝令长江黄河倒流，喝令沉睡千万年的大草原献出粮食……我们，要用双手在白令海峡筑起大坝，要让太平洋温暖的海水流入北冰洋；让喜马拉雅山上的积雪溶化，流到草原上；让大草原四季如春，麦浪翻滚，让金灿灿的麦子堆成山，流成河……啊！那时，真正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麦浪见牛羊’……”他一边口若悬河地讲，一边用一根木棒在冻得梆硬的地面上画出地球、亚洲、美洲、南极、北极，然后伸手一挥，倏地一下，在亚洲和美洲之间飞起一架长虹，说：“这是白令海峡。这，便是白令大坝。”可是，在昏暗的光线下，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不知道盲流们是否听明白了？在他们读的地理课本中，恐怕连白令海峡都不讲的。不过那些听懂了的牛鬼蛇神们，倒是听得眉飞色舞，仿佛眼前真个呈现了河水滔滔、麦浪滚滚的景象。忘掉了呼啸的北风，忘掉了辘辘的饥肠，忘掉了头上那顶压得无法抬头的帽子，以为自己还是青年团员，正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战斗在祖国人民最需要的战场上。

那是个从肉体到精神都饥渴的年代，是个太真实太认真便无法生存的年代，是个不讲假话便办不成大事的年代。这一席话，无疑在这些历遭劫难而变得十分冷漠的年轻人的心灵里，激起了些许浪花，使他们在完全失望之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生活的要求是极低的。但不管怎么低，总要能看到一线希望，无论是可以成为现实的，还是乌托邦。若连一线希望也没有了，便会堕落为兽，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或沦为行尸走肉，最终走向死亡。祥林嫂不就是这样的典型么？

这些留在农场的人，是怀着对一线希望的期盼，迎来了1961年的。我们地窝子的姑娘们，脸上少了些许眼泪，多了些许笑容。肖敦煌是更拼着命地干，有空时还教大家唱歌。我呢，一改不再读书的初衷，写信给爸爸和姐姐，要他们寄菜种及说明这些菜的栽培方法的书给我，我要像当年的文成公主一样，让它们在草原落地生根，我也要象它们一样在草原落地生根……

有一天，忽然听说肖敦煌逃跑了。说，他是反革命，畏罪潜逃。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敢问，也不会有人告诉我。只是在心里想：完了！他是完了！他是逃不出去的，谁不知道，自古以来青海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啊！在人迹罕见的茫茫草原上，不是冻死、渴死、饿死，便是被狼吃掉，被土匪打死。“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还年轻啊，又多才多艺！他不应当死！我绝不相信他会自绝于人民，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由他，我想到徐美英，她现在可好？想起我们在北山顶上许的愿，那决不是小孩的儿戏，那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愿望啊！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为这些愿望的实现而奋斗啊？祖国啊，母亲！难道我们错了吗？请告诉我们，错在哪里？是什么使他走上这条路的？祖国啊，母亲！请你保护我们，保护他，让他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吧！

那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从他给同班同学的信中知道，他终于没有死。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话不适合今天的中国，或者说不适合于我们这些错了一步，步步皆错的傻瓜。戴着帽子时，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本可以大有作为的美好时光，在许许多多非人的折磨中耗费殆尽；“改正”之后，是离开你地球就不转的巨人，尽管已经步入人生的晚年，许许多多的工作又超负荷地压到你头上（详见肖敦煌的信）。他的心脏始终处在超负荷的压力之下，终于在1998年过早地停止了跳动。现在，我把他信中有部分摘录于下。

（1961年）元月16日，由我带着十几个同学去拉水。正准备下到山沟击冰取水抬到大车上的大桶时，有同学发现路边有死羊。略一搜索又发现几头。我们顿时大喜过望。我们估计，可能是藏民的羊（那里是藏区）被狼咬死了，已成为无主之物，是可以拾得的。在那样的年代，这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有的被狼吃去了内脏，但肉被吃得不多；有的还相当完整，仅仅被咬死。大家想，把这些羊抱回去，该会给同学们带去怎样的幸福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安心在农场，这些礼物，也许能帮助安定同学情绪。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一部分人击冰取水，一部分人去找死羊，都估计决不止这几头。当时我们的确攀悬崖，越陡壁，冒着生命危险去找死羊。大家热情很高，结果又找到几只。

偏偏这时候牧人赶着一群羊来了。这是师院农场的牧羊队。牧羊人是两个藏籍学生。他们也非常高兴，说按藏民习惯，这羊是拾得的，是可以拉回去的，这更扫除了我们的最后一点顾虑。但他们立刻拔出藏民刀，不由分说，很熟练利索地剥去了一只死羊的皮，并吩咐同学们拾柴烤羊肉。你可以想象，那年月，长期处在饥饿之中的同学们简直又回到茹毛饮血的太古时代，不等羊肉烤熟，便一拥而上，拿着带血的肉，大嚼起来。我那时学会谨慎了，同学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再说羊又是拾来的，按藏民的风俗，是可以占为己有的。但似乎又觉得不太好，应拖回去让领导处理。当时我虽身为带队老师，但师院的那帮饥饿的学生谁会理会我这个右派？大车上大桶里的水还没有装满。于是我叫了几个可以叫动的学生，只说吃肉抬水两不误，轮流抬。好歹把水装满了，但同学们兴犹未尽，又在烧吃第二只。我当时处境真为难。我不想吃，一来顾虑影响不好，二来那带血的肉，连盐也没有，我真咽不下喉。但不吃吧，又怕同学说我假积极，回去后领导批评，那就肯定是我告的状了。于是我也坐在他们身旁，象征地吃了几口，并且还装出很高兴的样子。饱餐之后，还剩下不少肉和内脏。一个同学见我没什么吃，硬割下一块肉塞给我，其余的内脏他们全分了。

这样一来，自然延误了拉水的时间。当我们返回时，太阳已西斜了。我们所在的队是二分队，二分队的负责老师见我们没有按时返场，恐怕出了问题，便带着十几个同学来找我们，

半路相遇了。问明情况后，勃然大怒。我拿出了同学塞给我的肉，同学们也纷纷交出“脏物”。我们原本满腔热情希望为农场立功，这时都成了罪人，垂头丧气地拖着大车回场了。

回到农场后，经领导研究一番，吃过晚餐，开批判会。领导的开场白给事件定性了。有阶级敌人破坏，同学们上了敌人的当，那个敌人自然是我了。我的罪名是阴谋破坏农场。接着是让拉水的同学揭发和自我检查。至今我还深深感激那些同学，他们几乎没有揭发，没有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只是检查自己。而领导和没有去的同学那批判也是令人难忘的。会后，我找农场党委书记说明情况，他不听我的。他要我深刻检查交待，并要我每天随队拉水，监督劳动。

我当时真是悲愤莫名，悲痛欲绝。我热爱这个社会，并决心把整个生命献给这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却把我往绝路上逼，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辗转反侧一夜之后，我决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悄悄离开农场，来到几里路外的黄河边，决心一头扑进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把我的冤情、我的冤魂全部交付给她！

但面对滔滔河水，我忽然想到这一死有什么意思呢？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自杀，不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潜逃。而我是无辜的。而且突然感到，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之身的。但我不回农场。于是我真的爬雪山，过草地，途中遇见狼，遇见土匪，九死一生，整整饿了六天，粒米未进，鬼使神差地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卡卜卡，那里离西宁不远了。我乘汽车到西宁，又乘火车到故乡。

回到故乡后，我只想到农村，我当时太天真了，想学古代的隐者。但那个时代允许你“隐”吗？于是我又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凄风苦雨的人生，我成了带“罪”字的农奴。

当山上的雪开始消融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农场，热闹起来了。苏联制造的巨型拖拉机——那叫做“康拜因”的玩意儿，轰隆隆、轰隆隆地由西宁开到草原。牵引着巨大的犁，轰隆隆，轰隆隆，千万年没有开垦过的草原被翻了个个儿。原本平展展的、枯黄色的大草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黑褐色的海洋。一块块肥猪那么大的土坷垃，一行行地向天边伸展，仿佛起伏的波浪。远远望去，倒也不失美丽。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要草原献出粮食，总不能在这坚硬如铁的土坷垃上播种啊！然而，拖拉机没有耙或碎土机可以牵引，只能弃置在地里，由牛鬼蛇神和盲流来行使碎土的任务。

我们排成一个横列，每人手拿一把“丁”字形的把儿很长的木制榔头，在那“肥猪”身上敲。嘭、嘭、嘭，咚、咚、咚……那是从未被粉碎过的冻土，在烈日下消融的只是表面的一层，每敲一下，细长的榔头把就猛烈地反弹一下，从手掌到胳膊被震得酸痛难耐。直到手掌、手指都起满了泡，或者细长的榔头把儿敲断了，才敲下了些许碎末……

接着，由一个农场职工（能撒种的青海师院的学生）负责播种。他左手托着一个簸箕的左侧，让簸箕的右侧紧靠自己腰部，右手从簸箕里抓起一把颗粒饱满的亮铮铮的麦种，成弧形地往右后撒去，同时身体也往右后转动，双脚配合着右手的动作，一步一步地向前迈。便这样一下一下地撒，撒完一行，向后转，又撒一行……仿佛是在表演优美的“播种舞”，直到把所有的麦种都撒到地里。我们这些站在一旁观看的饥肠辘辘的人，没有不在心里嘀咕的：这些粒粒饱满的麦种，不知道是多少农民辛勤耕耘，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一粒一粒攒下的，是真正的“粒粒皆辛苦”啊！也许，此刻他们也正在挨饿呢！……

然后，又是盲流和牛鬼蛇神上场。两三个人像牛拉犁似地拉着一个叫“糖子”的东西，在撒过种的地上拖，目的是让泥土把种子覆盖起来。这糖子也叫“耩子”，其功用和“耙”相似，是用粗柳条或荆条编织的一尺多宽三尺多长的长方形块状物，两边连着绳子，绳子搭到两个人的胸部或肩部，他们便像牛般地往前拉。为了耩碎泥土，必须增加这长方形的块状物的重量，因此其上站着两三个人。当前面的“牛”使劲儿在高低不平的肥猪身上往前拉时，站着的人必须互相拉紧，否则便会摔倒；即使如此，还是会摔倒。在我们劳动时，经常听到

有人尖叫，或大骂：“妈的，你不会慢些吗？”“哎哟！骨头摔断了！你来试试看。”……那便是有人摔倒了。拉的人也并不轻松，一天下来胸部和肩部都要磨掉一层皮，甚至磨出血，尽管都穿着棉衣。说我们像牛，是说我们必须像牛拉犁似地拖拽沉重的糖，其实更像黄河岸边的纤夫拉纤。牛拉犁是直立行走的，而我们，为了增加拉的力量，身体必须和地面成45度角或者更低，有时脸都要贴到地面了。绳子从胸口或双肩拉过，已经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高原缺氧，每走一步都会气喘心慌。因此，憋不住时拉糖的姑娘也会对着骂，尽管这样一来，氧气更不够了：“妈妈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你来试试！”“狗日的！连牛都不如！”为了公平，拉的人与站的人，定时更换，直至把整块地糖完。

麦子播种完了之后，又开始种油菜和萝卜白菜。油菜的种籽可以榨油，是青海食油的主要来源，因此是大面积种植的。萝卜及其他蔬菜则是为了满足农场职工生活的需要，种得并不多。

这时，我也把父亲和姐姐寄给我的菜种种到地里。离我们聚居的地窝子不远，有一个废弃的方形羊圈，三面有约两尺高的土墙围着，可以挡住寒风；由于做过羊圈，土地比较肥沃，我毫不迟疑地报告领导，选来做了我的试验田。至于种子发芽的必要条件——水，和其他植物一样，只能等待上天恩赐甘霖了。

一天，忽然听到地窝子外面有人跑着说，从西宁运来了几升大磨，可以磨青稞炒面，吃糌粑啦！糌粑是藏民最好的主食，我们早已垂涎三尺。可是来到草原后，只有一次，在观看藏民用手抓捏糌粑的图景、闻着糌粑的飘香中陶醉过，甚至不由自主地口角流涎，却从来也没有尝过。姑娘们和我连忙跑出去看个究竟。哇！好大的磨！足有一米直径。一个负责后勤的老干部正在指挥几个职工（不是牛鬼蛇神）安装，同时，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有意说给围观的人听，可能是有意的吧，因为声音不小，何况，作为一个老干部，怎么会不抓紧这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机会呢：“人吃牛羊，牛羊吃草……人吃牛羊，牛羊吃草……不可以省去中间这一步，直接吃草吗？”一个正在安装石磨的职工说：“从来没有人吃过草。”“有人吃过……我就吃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有那职工敢与他抗衡：“怎么吃法？”“把草磨碎，跟面粉拌在一起，蒸馒头，或者烙饼。”大家听后，垂头丧气地走回地窝子，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祈求上天赐给自己一个能够反刍的胃。

那几个职工，安装好石磨后，奉命用石磨磨草。可磨了几天，草没有碎，只是压扁了。大家当然没有吃上糌粑，也没有吃到拌了草的馒头。吃的还是那清得见底的拌汤和那黑灰色的铁疙瘩。至于那些石磨，至今一直弃置在草原上，如果有兴趣，去找找，包括那些栽“地窝子”的坑坑，都可以成为历史文物呢！

播种任务基本完成了，没有了拖拉机的轰鸣，没有了人们的对骂，可草原并没有变得冷冷清清，成群结队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来和我们作伴了。一定是上天知道我们的饥肠辘辘非人可以忍受也，特意给我们送来了食物。人们绞尽脑汁寻找橡皮、铁丝或木条，要做弹弓打麻雀。可办法还没有想出来，命令来了：收拾行装，准备到青海湖打鱼。

青海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其湖面比两个东岳泰山还高；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泊，其面积比太湖大一倍还多。倒淌河自东向西流入青海湖。如果说，倒淌河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那么青海湖的咸水就是文成公主的眼泪了，怪不得总是和悲剧连在一起。

我们要打的是湟鱼。这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鱼类，也是我国唯一在高原咸水中生存的鱼类，无鳞，正规名字为“裸鲤”。现在，年龄六十左右的青海人都会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青海湖的湟鱼救了青海/西宁人的命。在这之前，人们想吃美味的湟鱼，都是在万里冰封的严冬，到湖面去打洞捕鱼：用钢钎在湖面上凿开一个洞，水下的鱼儿，在洞外的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会自动跳出冰孔，束手就擒。这湟鱼也真幼稚、单纯、老实巴交，轻易地就中了阳谋的圈套啦！我们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青海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品尝湟鱼的美味，而是为了救命，因此是撒网捕鱼。不是那种小小的像雨伞翻倒过来的渔网，而是大大

的网，长方形，下有坠子把渔网拉到湖底，上有用来拉网的纲绳。渔网装到渔船上之后，把纲绳的一端固定在这头的岸边，即交到五六个负责拉网的牛鬼手中。然后，两个捕鱼的老把式上船，一个划船，一个撒网。船从这头出发，走向较深的湖面，再走向另一头的岸边。随着船在湖面上画了一个弧形，网也就在湖里撒了一个弧形。靠岸后，把纲绳的另一端交给等在那边准备拉网的牛鬼。接着两边的牛鬼一起用力拉，直到把网全部拉到岸上，网里兜住的便是湟鱼了。有个谚语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说的是湖里鱼的密度之大，那可能是远古的事吧，我们那时已经不是如此了。青海湖水奇冷，鱼的生长时间奇长，一尾湟鱼要长到尺来长，得用几十年时间，因此捕一条就少一条，一网能网百把斤就算是幸运的啦！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大规模捕捉，现在，青海湖里几乎找不到尺来长的鱼了。湟鱼，为青海/西宁人，可谓鞠躬尽瘁了！

鱼打上来之时，立即要进行处理，否则便会发臭腐烂。我们拿起宽大的菜刀，噼、啪，噼、啪地，鱼头便被斩了下来。除去鱼鳃，洗洗干净，丢到一旁的一口大锅里去煮“鱼头汤”。营养丰富而又构造复杂的鱼头，无论如何加工，都不能不长蛆虫，只好一砍下来就煮成鱼头汤，供大家食用。这鱼头汤就代替了那清得见底的“拌汤”，成为大伙的午餐和晚餐，不定量，随便吃。虽然除了盐什么调料也没有放，味道却鲜美无比。开始时，都端出在河卡农场用的大盆子大缸子，美美地吃，饱饱地撑，直到满嘴流油，弯不下腰。渐渐地，大盆大缸变成了小盆小缸，肚子上的油水厚啦！

接着，剖开鱼身，掏出肠肠肚肚，丢到另一口大锅里去炼鱼油。这些带着粪便的鱼肠鱼肚，在烈日及木柴和牛马粪燃烧的火的上下煎熬下，慢慢分崩离析，粪便沉到下面，脂肪飘到上面。站在旁边守候的我们，立即拿一把勺子，小心地、轻轻地、难免不带粪便地把飘在面上的脂肪撇起来，倒到盆子里，够多了再装到罐子或瓶子里。装够一定数量，西宁便会来汽车拉走，成为那时西宁人千金难买的食油。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人们知道这鱼油的生产方法后，恐怕会恶心得吐出来，不过，那是个饥不择食的年代，这鱼油是最高级的食用油啦！

掏掉肠肠肚肚的鱼身，用青海湖的咸水洗干净，挂在岸边搭好的架子上，靠太阳把它们晒干。然后，装到大麻袋里，等候西宁来车运走。如果遇到两三天没有出太阳，鱼还没有来得及晾干，苍蝇已经在上面下了蛋，很快，挂在架子上的和装在麻袋里的鱼，便会布满蠕蠕的蛆虫。但那时的西宁人，见到这样的鱼干，还是迫不及待地洗了洗，煮了煮，便填到肚子里去了。

这些，便是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和盲流在渔场的任务。住的仍然是帐篷，不过不是地窝子了，是在地面上的房屋形状的、刮风时无处不透风的帐篷。穿的仍然邋邋遑遑，衣冠不整。仍然不能洗脸刷牙、洗头洗澡洗衣服，尽管水就近在咫尺。这是咸水，即使在“午穿纱”的中午也冰冷刺骨。头上身上仍然虱子乱爬。吃的仍然是每顿一个黑不溜秋豌豆面或青稞馍，不过加上不定量的鱼头汤，不再有饥饿之感了。帐篷里不会有钟，我们是日出而起，日落而回，一天除了吃喝拉撒，都不停地劳作。但人们没有怨言，脸上也日见其胖了，斗嘴打诨的多了，高兴时还会五音不正地吼上几句“花儿与少年”。看着这些，我有时不免想到鲁迅在《祝福》里描写祥林嫂的话语：“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何其相似乃尔！然而半个世纪即将逝去了啊！我不能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仍然和盲流姑娘们同住同劳动，不过，除了上述劳作，还有额外的“不得违抗”的任务，不知到底应叫会计还是出纳？鱼干及鱼油卖出去的钱由我负责收，记账是我，收钱也是我，谁都知道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但在那年月，我只想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组织是这样教育我，我也这样认为的。何况，我相信我自己，我一心为公，绝无自私自利之心，绝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说实话，那时，我不知道害怕，只知道努力工作，以便早点把头上的

帽子扔到青海湖里去。钱收到千元左右，我必须把钱装进一个草绿色的挎包里，背上，徒步行走半天，到十几里外的供销社那儿，把钱存进去。我，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背着鼓鼓囊囊的挎包，赤手空拳，在茫茫大草原上匆匆行走，说不紧张是假的，但确实不是害怕。我相信人世间总是好人多过坏人，只要你光明正大地来，我就能光明磊落地和你斗，大不了光明磊落地死。我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最怕的是玩权术、弄阴谋/阳谋的弯弯绕……这便是我匆匆行走时的心理活动。直到钱存进供销社，提着的心才算落下。幸亏那时的人都这么老实巴交，要是现在啊，几条命也没了。

一块大石落了地，在返回渔场的路上，我才有闲情逸致欣赏这闻名遐迩的青海湖。看哪！青海湖，一望无际，天连水，水连天，蓝天碧水共一色。无风时，湖平如镜，静谧缥缈；有风时，滔天巨浪，滚滚轰鸣。湖边的草地，虽然也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却是一片使人心旷神怡的崭新娇嫩的绿色，上面点缀着各种各样野花，红的、蓝的、白的、黄的、粉的……仿佛是藏民们把他们手工织造的一大片美丽的花毯，平铺在地上一样。漫步在毛茸茸的、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草地上，呼吸着嫩草和野花的清香，仿佛整个人都要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那样飞起来了……飞起来了！我真的飞起来了！越飞越远，越升越高。啊，我看到了，这文成公主的眼泪汇成的大湖！像一面巨大的明镜，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四周环山，山脚到湖畔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大草原。湖中央的海心山，岩石嶙峋，景色旖旎。鸟岛，这鸟儿的天堂，栖息着数十万只候鸟。天空，无数鸟儿上下沉浮；地面，满是鸟蛋和鸟窝，鸟窝里鸟妈妈在孵卵，鸟爸爸还在一旁等待着小生命的诞生……我似乎也变成造物主创造的这一切美好事物的一部分，像飞天一样，往大地吹送着清醇的芳香，撒播着绚丽的鲜花……我恍然大悟，这大自然之美，一定就是古人创作“飞天”的灵感源泉，古人和今人对美的感受是相同的。……突然，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的问题跳了出来：我在“脱胎换骨”上可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呢？来到草原之后，也许是“民以食为天”的缘故吧，所谓的批判会、检查会以及政治学习等等少之又少了。但作为一个被改造者，不可忘记自己的身份，否则便有“翘尾巴”之嫌。向组织汇报是我的义务，虽然没有给我“定期”，但自觉改造者贵在“自觉”。我到底改造得怎么样了？我该向组织汇报些什么？……我的美感与古人相同，这不就证明我改造好了吗？不对啊！这证明的是我从来就没有错过，我何曾认为这些美好的事物不美过？但是，我只能像那些大右派们一样，只能说“是我错”！只能“低头认罪”。那好吧，我过去错了，现在回到人民内部了，因为我与你们有共同的美感了。这该没错吧！你们不是把敦煌壁画视为国宝吗？国宝者，国人——人民无不认为那是非常美好的/宝贵的事物也，因此才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大加挞伐……问题又来了，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掠夺”？他们“掠夺”了去，并没有把它烧毁、砸烂，而是把它保存在博物馆里，让人们世代共享之，他们也认为敦煌壁画是美的。因此，应当说，美感是古今中外相同的……问题又来了，这违背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理。这是什么原理？谬论。经不起客观事物的检验。别说深奥的，就说最普通的：我要吃饭——我是右派/敌人——你们/人民就应当反对吃饭。可事实是，你们不仅也吃，而且还要减少我的定量来饱你们……无论是人民还是敌人，都是人，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因此，这“凡是”就是荒谬的……多美丽啊！蓝天，碧水，绿草，浑然一体，真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多可爱啊！单纯、宁静、悠远，仿佛是一首动听的歌！这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后来才出现了生物，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多细胞生物，到水里的鱼，到水陆两栖类，到爬行类，到哺乳类，到猿，最后才出现人类。百万年来，人类在这些美好事物的耳濡目染之下，兽性日益减少，人性日益增加，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成为共同人性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这样吗？恩格斯早就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人之初，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不用争论的了；“弱肉强食”、“成王败寇”这些动

物王国的法则，便是天经地义的了。教育的作用，不正是要使人的兽性少些，再少些；人性多些，再多些吗？如果不要使人远离兽性的教育，如果摧毁使人远离罪恶的良心和自尊心，人就会倒退为兽……哎哟，不想倒还清楚，越想越糊涂了。真不该想，只能做“齿轮和螺丝钉”，做“驯服的工具”。可是，鸟生双翼，就是为了高飞；人能思维，就是为了要思维。如果弃置思维能力不用，与兽何异？还是又回到这里！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不是我的神经出了问题，就是众人的神经出了问题。为什么转来转去，结论都是：应当改造的是别人，而不是我？……罢了！罢了！！罢了!!! 说我不自觉也好，说我翘尾巴也好，总比说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好。“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还是糊里糊涂地活着吧！我们曾经梦想要与这一切旧的意识形态决裂，做一个有明确理性的人。这，也只能是个乌托邦！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了，一群群候鸟排成“人”字形或“丁”字形的队列，鸣叫着飞向南方。我们也和候鸟一样，扛起铺盖卷，坐上敞篷大卡车，奉命返回河卡农场。

当卡车“嘎”的一声停下时，我们抬头远望，看到的不是金黄的麦浪，仍然跟我们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一块块肥猪那麽大的黑褐色的土坷垃伸向远方。下车后，走到跟前仔细看，才看到地里稀稀落落地长着些麦子，大约一尺多高，上面结着几个小小的麦穗。掐下一个麦穗，两个手掌合起来搓了搓，吹掉麦壳，留在手掌上的是十几粒并不饱满的也不是亮铮铮的麦籽。这，便是我们辛苦了一个春天的收获吗？我赶紧跑到我那试验田跟前：空空如也，与我离开时一个样，只是地面上多了些羊粪蛋。看着这一切，我几乎要大哭起来，但使劲儿憋住了。我是自私的，我并不是为颗粒无收痛苦，而是为希望之破灭难受。我的希望是，要像文成公主一样，用使家乡的蔬菜水果在草原上落地生根的实际行动来告诉人民告诉党，我应该可以回到人民内部了。上次的实践已经证明，用词语来表达，是无法抹掉我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的。不仅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性等等是如此，连最最普通的词“好”、“怀”也不能例外。“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还能用什么词语来表现自己的进步啊？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语言，现在，竟然都翻了个个儿，真正是翻身得解放了！

一个留守农场的盲流，是这样叙述大批人马离开农场后的情况的：

“你们想，那些麻雀成群结队地飞来干什么？是来吃麦种的。另外，老鼠也毫不客气，哪儿有麦子就往哪儿钻。等到草原上十分稀罕的雨水降落时，麦种已经剩得差不多了。只在那些肥猪般的土坷垃的缝隙中、旮旯儿里，星星点点、稀稀落落地长出一些麦苗。好不容易盼得麦苗长高了，抽穗了，开花了，灌浆了，高原上短暂的夏天也宣告结束，降霜了。用累死累活地拾来的牛粪马粪在地里点火、烟熏，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里，年平均气温只有4—5摄氏度，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啊！”

“你那片试验地，就不用说了。那几种蔬菜，本来就不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加上气候奇冷，又干旱缺水。下了一场雨之后，是有些种子发芽了的，但大部分没等到长大就干死了。剩下的，正好叫羊吃。开始，我们像在大田里赶羊一样，也给你赶羊的。你想，赶得完吗？最后，还是叫羊吃光啦！”

“你们回来得正好，要不然，大田里的麦子也好，油菜也好，也会被羊或者牛、马糟蹋光的。那苏联制造的康拜因在那儿放着，差不多全生锈啦。就算有收割机又怎么样？这稀稀拉拉的鬼麦子，别说用收割机了，连镰刀都无用武之地，你们说是不？只有把你们调回来了。”

“现在青海湖还没有到不能打鱼的时候，是吧？……这个难熬的夏天啊，多亏你们送来的鱼干，要不是呀，我们两腿一伸，就……”

第二天，我们每人背着一个小麻袋，排成一个横列，开始神圣的收获——掐穗头。第三天，这排横列的程序也取消了，因为实际上无列可排。哪儿有麦株，我们就往哪儿跑；哪儿

有穗头，我们就伸手去掐。用两只手指，掐一个，装到麻袋里；再掐一个，装到麻袋里。我们，左手抓住搭在左肩上的麻袋之一角，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伸直身体，右手绕过头前（或绕过头后），把那珍贵的穗头丢到麻袋里。再低头，躬腰，伸出右手，掐，用劲儿掐……就这样，我们不停地跳着“收获舞”，一天下来，每人能装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麻袋的穗头。等我们抗着腰之酸背之疼，把麻袋掬到“家”之后，还得把麦穗脱壳成为麦仁。把麦穗倒在一块一米见方没有草的地上，手拿一根木棒，嘭嘭嘭、乒乒乓乓地打。然后盛到簸箕里，端起来，迎着世界上最大的鼓风机吹出的风——大西北的寒风，慢慢倒下来。呼，呼，呼，麦壳、尘土连带干瘪的麦粒一起吹走，能抗住风力垂直落到地面的麦粒，便是我们这一天的成绩了——没有这成绩，日子就不好过啦。用尽吃奶之力，一天下来，成绩好的，十来斤；成绩差的，只有几斤。不管好坏，总算交了差。在共同劳动的几十人之中，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我知道，为了回到人民内部，必须如此。至于这些干瘪的麦子，是用来喂饱饥肠辘辘的人，还是用来喂猪或者喂鸡，那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比起收麦子——掐穗头，收油菜籽就要正规得多了。可惜的是，收割之后，还没来得及碾场，就接连下了几天雨。草原上罕见的雨水，不早不迟，偏偏在这时候连着下，人们不得不想，也许是人们在草原的胡作非为让老天爷愤怒了。结果，多数油菜籽发了芽，不能榨油了。看来，人是不一定能胜天的，客观规律是不可以违背的。违背了客观规律必遭客观规律的报复，只是有时报复立即显示出来，有时则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罢了。

一定又是来了什么指示，1962年下半年，草原上所有农场全部停办，青海师院农场也不例外。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在这年年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自我批评，尽管是很不彻底的。紧接着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也讲了话，指出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当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可能在农场的人都多多少少与“知识分子”有点儿牵连吧，因此我们也就沾了这“脱帽礼”的光了。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卷起铺盖卷，坐上解放牌大卡车，返回西宁。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埋在农场西边、靠近公路的三个“人”。他们将永远与草原为伴，望眼欲穿地望着奔驰而过的汽车，期待着把他们迁回西宁或老家的一天。然而，这一天是那样渺茫，恐怕在他们的姓名和这三抔黄土都被狂风暴雨冲刮得干干净净之时，也不会到来吧？

这三个人，是于1960年初第一批来到师院农场的，都死于农场前领导的治下。其中两人是青海师院在校学生，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57届毕业生，名字是李经纬，也是右派，也许还是和我们坐同一列火车离开北京的吧？北师大的校史中是否有记录？他是北师大多少“右派”中的一个？是北师大多少死于非命的“右派”中的一个？据说，此人也是老实巴交的，和肖敦煌一样，认为自己有罪，诚心诚意地悔罪，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改造。本来身体就瘦弱多病，还要撑着日益瘦弱的身体、抗着辘辘的饥肠，没命地劳动，直到倒下为止。呜呼！三个本来可以对祖国人民大有作为的年轻生命！

在撤离农场之前，农场党支部决定摘去戴在我头上的“右派”帽子。在农场的两年我没有汇报过思想，因为真话我不能、也不敢讲，假话则还没有学会讲；摘帽前，也没有经过我做自我检查、全体职工给我做鉴定的过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看来，那份“判决书”上的话不无道理，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之认识太肤浅了，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句长期在青海流行的俗语：“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了，还在你脖子后头挂着呢，随时可以拿起来再戴到你头上！”后来的后来之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青海人民的创造发明。在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

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摘帽”，与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没有什么不同！更坎坷的漫漫长路在等待着我们。

2005年8月完稿，10月修改完毕

我是怎样成了“蛇”的？

——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

雷一宁

最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建校 100 周年校庆公告》及袁贵仁校长《致北京师范大学海内外校友的祝词》（下文简称《祝词》）、《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等文，知道 2002 年秋天为母校百年华诞。《祝词》中说：“你们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难以忘却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永远怀念那无悔的青春。”

《讲话》中说：“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名校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天翻地覆，我们需要用 2 年的时间来认认真真地消化、理解学校的风雨历程，学校的精神风范，任何轻率都是对学校的大不敬。”作为对这些话的回应，为了母校辉煌的未来，我特地回顾、思考、消化、理解我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尤其是那一段岁月的心灵历程。北师大是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每个灵魂工程师，都应当首先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心灵。

我母亲和我都是北师大的学生。我母亲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召之下，进入北师大的。我进北师大，也是为了“救救孩子”，不过，换了说法：做人类灵魂工程师。那是在解放之后，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热浪之中，为了迎接随后必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在组织（即党团组织）的一再动员之下，我和我的许多同学，抛弃了“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儿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观念，响应号召，报考了人们不愿报考的北师大中文系（“作了伟大事业的傻瓜”！）。然而意想不到，四年之后，我们被告知：“为了革命接班人的灵魂不受毒害，你们不可以登上教师讲坛。”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在我们毕业前夕，即 1957 年春天，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克服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滋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简称“三害”），共产党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民主党派及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我们这些单纯幼稚刚 20 出头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便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了（再次作了傻瓜！），结果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份《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附件一，简称《结论》）便是宣判。现在照录于后：

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1）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标榜自己为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对同学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抗拒组织的教育和批评。

（2）在整风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大肆向党进攻。写稿件攻击党员，在会上漫骂污蔑党的组织及积极分子，并写大字报“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为右派分子呵欠伯的反动大字报作辩护，并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堕落为团内的右派分子。

反右开始后，情绪抵触、顽抗，打击积极分子，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影响反右派的顺利开展。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

（3）自我检查只罗列了一般事实，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工作，考查一年。

那是 57 年 10 月底，办事的人（记不得是谁了）把我们一个个叫去，向我们出示这份手写的东西，并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在其上。在我们把不同意见写下之后，办事的人却什么话也不说，只要我签字，然后，立即收走了，并不给我们保留一分。我现在保存的，是我当时用颤抖的手偷偷抄写的一张纸。这张小纸，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官方/校方记录了——高度抽象概括地纪录了——我在北师大四年尤其是在整风反右中的言行的唯一纸张，但是，所有文字，除了吓人的大帽子，几乎全无具体内容。

第（1）部分，写我平时（即整风以前）的表现，除了“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一句有具体内容，其他我全不知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句话的具体内容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我是青年团员，在过团的组织生活时，我谈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及活思想：我是被动员上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现在我后悔了，我来师大中文系是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那给我上纲上线的人，在写上一句时，忘记了将要写的下文（论据）了，居然能从我说的“伟大事业”中抽象出“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的“罪行”来！

这部分提到的其他东西，大多与人的性格有关。性格就是个性，何罪之有？莫非要具体复杂的“人”都成为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物”？我向来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对自己认为不对的东西，能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意见，人又太直，不注意方式方法的情况是有的。也许这便是“粗暴”、“骂人”了吧？至于什么“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那是反右运动之前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词语。不说艺术作品，请看：1956 年 5 月 26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8 月 1 日至 16 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高校部分学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主要讨论了解决学生负担过重和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等方面的问题。10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够了，为什么独独我说“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就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第（2）部分的前一段，写我在整风中的表现。这里只有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具体的，不过在时间上也错了。我这张大字报不是在整风中写的，而是在反右时写的。给我写《结论》的人，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我在整风中任何够得上“大肆向党进攻”的言行，便只好移花接木把这张大字报栽到这里。我写这张大字报的时间，是在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在季羨林先生主编的《思忆文丛》中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中，有呵欠伯的《岂不令人深思》一文，注明写的时间是 1957 年 6 月 11 日，我的文章应当在这天之后。当时，《岂不令人深思》一贴出来，所有大字报都一边倒地说呵欠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我认为这是违反党和毛主席教导的：不是一再号召、动员大家鸣放吗？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而且怎么能仅凭一张大字报就给人家扣上这么吓人的大帽子呢？于是我准备以“正直人”的名分上论坛申明我的观点，后来论坛没有举行，我便以笔名雷鸣，写了题为《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现在也找不到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大字报中，我首先声明，我不认识呵欠伯其人，也不完全同意他大字报的观点，不是有意要为他辩护，我只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那便是，一个人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去看，不应当只看一时、一事、一张大字报，甚至一句话。结果，我大字报的命运和呵欠伯大字报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也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还多了“抗拒反右派斗争”、“义务辩护律师”等帽子。不知道写《结论》的人是否知道，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早就说过，“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到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

部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可能不是不知道，所以才在《结论》中，抽去了辩护的具体内容，只剩下空洞的“辩护”一词。不过这么一来，也就显出了一个逻辑错误：这张大字报不能成为“大肆向党进攻”的论据，而是为某人辩护的“辩护辞”了！

为了证明我“大肆向党进攻”，还用了另外一个论据：“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我不知道，在证明一个人有罪时，是否可以使用如下的方式方法：甲说 X，成为右派——乙同意和赞赏甲，乙也是右派——丙同意和赞赏乙，丙也是右派——丁同意和赞赏丙，丁也是右派……？我也不知道这种定罪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使右派扩大了 99.9% 的原因？可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抓右派的。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意和赞赏的一些“右派言论”，以及这些言论是怎样被上纲上线成为“罪行”的。

我们说或者同意：“为了有效地制止‘三害’，就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必须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这便是否定民主集中制，便是攻击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便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说或者同意：“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民民主。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便是诬蔑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不能以共产党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和明天也和过去一样光荣、正确。”这便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是反党。

我们说或者同意：“对胡风的批判是对一个复杂的人愚昧无知的表现，限制了人——公民的民主自由。”“某些共产党员党性有余，人性不足。”这便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论，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必须民主办校。不懂学校、不懂教育、不懂知识分子的人，不应当成为学校领导。”这便是攻击党员；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就是向党进攻。

我们说或者同意：“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嘴巴讲话。”“党员以教育者自居，脱离群众，缺乏真诚，甚至连笑都是皮笑肉不笑的。”这便是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漫骂和诬蔑党员，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的猖狂进攻。

我们说或者同意：“汇报制度像告密一样，加油加醋地说别人的短处，不仅带上个人成见，而且从不与本人核对，任何好人都可以被说成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汇报材料都会以书面形式存入个人档案，永远与本人形影不离。）“团的组织生活是形式主义地谈一套，谁发表特殊一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就会不被信任，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这便是污蔑和谩骂党团组织，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

我们说或者同意：“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作，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提到什么阶级斗争！”这便是抗拒反右派斗争，影响反右运动的顺利进行。

够了，不再一一赘述了。

第（2）部分的后一段及第（3）部分，写的都是我在反右时的表现，在我的“情绪”上大作文章。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合法？说具体了，是否可以根据“情绪”给人定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是人对周围环境和外界刺激做出的即时反应，它是人心的产物，有时会使人远离理性。“理性”是人脑的产物，正确执法需要的是理性。为了使“理性”不被“情绪”干扰，人类发明了律师制度。律师一般来说是远离“情绪”的，而当事人则很难做到。因此，无论被告还是原告，都有权利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我们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不存在律师制度，更不会有律师，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为自己或为别人辩护。由于我为“罪人”呵欠伯辩护，（声明一句，我的本意不是为他辩护，而是为了伸张毛泽东思想）做了他的“义务辩护律师”，无罪也成了罪人！更有甚者，我不仅为别人辩护，还为自己辩护，可能这便是说我“情绪抵触”的论据了？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说：“我们只是给个别党员或某个基层组织提提意见，并没有否定党的正确英明。”这便是玩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反革命伎俩；便是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我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动机是好的，是为了使党更伟大、光荣、正确。”结果我们被驳斥曰：“你们是借帮党整风之机，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社会效果是检验行为动机的唯一标准。你们的言行产生了什么社会效果呢？看，没有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说你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奇怪的“舆论一律”！这不正好是“共产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吧说话”的明证吗？）

我说“反不反，我自己最清楚。我一再扪心自问，回答始终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不能自欺欺人地说我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我们的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已经中箭落马，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是你们的阶级本能使你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路的。”本能？本能！本能者，天生具有的、不受心脑指挥的能力也。如蜂之酿蜜，狗之吃屎……阶级本能！我们的阶级出身给予我们的阶级烙印，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这，终于使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我们都来自旧中国，有的家庭出身不那麽“好”，有的社会关系很“糟”；有的有亲戚朋友在海外（含台、港、澳），有的自己就来自海外，与本人或为工人农民或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同学比（我们同学中有不少为调干生），都有一个不那麽“光彩”的过去。但是，解放时我们只有十三四岁啊！如果真有问题，实事求是地看，不是只应当属于必须救救的孩子吗？然而事实是，我们却是每个“运动”中被审查的当然对象。如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我班某同学被以“里通外国”（潜入的特务）的罪名批斗，仅仅因为他来自香港！结果弄得人人自危，有的跳楼自杀，有的回港探亲后便一去不返。

我们无言以对，我们只好沉默。这便是“情绪抵触、顽抗，……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我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对我们大会批判，小会批评，再加个别谈话……

我们只得说话了。我们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说出自己的活思想、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旧中国，目睹了旧中国的腐败黑暗，向往着新中国的光明美好，衷心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社会上有人叫嚣“要杀共产党人”了*，真正热爱党、相信党的人，都应当挺身而出，捍卫党。我们错了，错就错在我们上了这些人的当，被他们利用了。然而，这竟成了“……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甚至）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在批判会上还说我

*这是被篡改的葛佩琦的话。正如当时我们不知道人世除了“阴谋”，居然还有“阳谋”一样，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出骗局。葛佩琦，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后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营垒为党搞情报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其党的组织关系，由于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解放前夕被捕，一直下落不明，而不被承认，经多次申诉仍毫无效果。整风时，1957年5月24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党群关系提了些意见，原话为“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他在此校工作）的内部刊物《人大周刊》的报道中，把他的原话篡改为“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他看到后，立即找到校长、党委副书记，指出这是诬陷。对方回答说：“你不要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可是，不但没有更正，反而越来越离谱。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反右进军号的同时，再次登了葛佩琦的话，已经面目全非了：“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他看到后，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可是，毫无结果，相反，全国大小报刊立即掀起了大批大揭葛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当然，这些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当年我们所知道的仅是葛“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

们是在“继续放毒”，《结论》中略去了这种词语，也许是因为这些话够不上“毒”吧！

说我们“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纯属武断。我们考虑得太多了！我们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宣告，“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想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想到中国著名的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想过，作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作为有个性的人，有思维和爱憎的精神自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越想越认为我写的大字报所阐述的观点没有错，错的是大家。因此，当时我们多么希望能在全校展开大辩论，弄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现在，看到袁贵仁校长在《讲话》中要求北师大在校师生“再多一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劲，敢为人先、不甘人后的志向，和奋发图强，越挫越勇的精神”。

1957年，当我们还是北师大的在校生时，我们不是有一点，而是有很不少这种精神。袁校长接着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时，我们正是看准了才有胆量去闯的，用毛主席当时《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话来说，便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论》中的“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标奇立异，孤芳自赏，狂妄自大，标榜自己为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大概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抽象了，我能具有这种精神，得感谢领袖及母校的教育呢，何罪之有？

面对这一切，我们考虑再考虑；彷徨再彷徨。从古希腊的先行者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想到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再想到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得还不够多吗？几乎是一部人类历史！又想到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落后于存在的客观规律……我们始终相信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最公正的。想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中的话：“……理直气壮的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我们开始考虑选择“光荣的孤立”（又一次作傻瓜！）。

在所有“没问题”的同学都先后分配工作离校之后，为了使我们的“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我们被留校继续考虑、交代及认识自己的问题。直到此时，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只是像学步的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再走便是了，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鞭打孩子的。我们期盼着母亲——母校博大的胸怀，温暖的双手。然而，我们得到的，除了批斗，就是检查交代；听到的，除了全国大同小异的喊打声，听不到别的声音；看到的，除了始终不远不近地盯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别的眼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口诛笔伐的大战场。没有前人、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多如牛毛的书籍报刊，没有哪一本哪一篇能告诉我们，“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等等的谜底**到底是什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立无援。

**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同志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正式发表时，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内容酝酿于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已见其雏形，1957年2月27日于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出炉，3月再次向党内高干及党外部分高层人士传达和宣讲。普通百姓正式看到，是在反右斗争已如火如荼进行的6月19日《人民日报》上。然而，所看到的已非讲话的原文，除了一些谈笑风生的俗语被删除或修改，还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而且平白加进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之后，我们慢慢从报刊中捉摸到，近年到国外进一步在书报中得到证实的。此文作了很多修改，用心看就能看出来。如，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意思就是阶级斗争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又如，前面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后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可以讲，对于这个讲话，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就在此时，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的声浪中，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这全国瞩目的大会上，大右派们唱了一首“是我错”的大合唱：章伯钧“低头认罪”了，储安平“投降”了，罗隆基“交代”了，章乃器“检讨”了……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系那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出来了，他在反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后，给我们一个承诺（钓饵!）：“虽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与处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要宽大，必须看本人的悔改程度，看是否低头认罪，是否真愿改变立场，是否能大胆揭露自己与别人……”于是，在真正的动物本能——对死亡的恐惧支配之下，我们“低头认罪”了，并按师长的教育和要求，大胆揭露自己（自杀），大胆揭露别人（杀人），以示悔改。终于以灵魂的死亡，换来肉体的生存；以人性的返祖，成为贡献于神坛的“牺牲”。能够至终坚守人性，发出比“救救孩子”更深沉的呐喊“救救心灵”的，是极个别。而且，即使这个别，在被赶出校园之后，在“全国一盘棋”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最终也别无选择，只有沉默！沉沦！！沉沦！！沉默！！

这，便是1957年我们“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是我们这些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学生，在那段岁月中心灵的真实。

这样，我们这些一次次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响应号召的青年团员、三好学生、“肃反”积极分子、学生会或班团干部……总之，一个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具体、复杂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北师大培养出来的“废品”——被引出洞的“蛇”。不能得到毕业证书；没有母校的欢送，没有同学的话别；头戴无形而沉重的帽子，有的还戴着手铐，奔赴东西南北（不可留在首都北京）……

二十二年后的某天，我们突然收到母校寄来的毕业证书及一封信。信上第一句话是：“根据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你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大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见附件二）在我看到的别人的改正通知书上，尚能看到“属于错划”之类的字眼，可是这里连个“错”字都不提，言外之意岂不是：根据规定精神，不得不改正。正如当年根据指示，不得不抓，而且只可以超标却不可以不完成规定的指标；所定的“罪状”，也是从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得到启示，运用“抽象了再抽象”的技术加以肯定的，北师大一点责任也没有……行文至此，我突然喊了一声：“我真傻，真的！”师大党委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客观存在需要我们成为“蛇”!!! 不过，我仍然不能不担心，一旦那些冠冕堂皇的号召、规定或指标下达时，许许多多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又会变成“蛇”，历史的悲剧又会重演，因为，“诱饵”仍然存在。

母校啊，母亲！您可知道您的儿女展开这份改正通知书时的心情？有人泪如雨下，说了句“等了二十多年的，竟是这么一张纸……”便精神失常了，像当年范进中举后一样。现在，看到《讲话》中有这样的话：“母校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在一生中都在庇护着我们，关爱着我们……”那么，我能不能问，四十五年来，您可曾费神问过我们，这16425个日日夜夜你是怎么度过的？收到这迟来的毕业证书及改正通知书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母校啊，母亲！当时我们多么想到北京，到师大，投入您的怀抱，对您哭诉。可是，却接到这样的回话：“由于学校条件所限，不便接待，请勿来京。”（见附件三）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我们提起这些往事时，都被异口同声地劝导：“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现在，看到《讲话》中有这样的话：“离开北师大，一生中的许多环节都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那么，我能不能问，为了一九五七年的客观事实不再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北京师范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北师大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1957年9月出版），可不可以于师大校刊上再次公开刊登，并像当年我们曾梦想的那样，在全校展开大辩论？我这篇文章可不可以于师大校刊上全文刊登……答案很可能是“不可以”吧？那么，等1957年的“整人者”尤其是“被整者”都寿终正寝之后，这一切必定完全彻底地“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我们共和国及北师大的历史都将缺少极为沉重的一页，这不仅是对国家和“对学校的大不敬”，只

怕历史的悲剧将会在全民的遗忘中重演。

北师大诞生后的一百年，正好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现代化而奋斗的百年。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一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作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自由的、有人的尊严的现代人，北师大肩负的正是这培养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的重任。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眼看将要沦为奴隶，现代化的梦彻底破灭之时，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带动之下，北师大诞生了。建校之初，对学生的要求是既严格又开放的。最早的校风是“诚实、勇敢、勤奋、亲爱”，最初的校训是“关心国事，勤奋攻读、为人师表”。思想教育采用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有训育会议，训话，名人讲演，又有自治谈话，对话。最早到校任教或讲演的人，既有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邓萃英、马寅初，也有杜威、孟禄（二人均为美国教育家）。因此，师大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既勤奋攻读，又不忘国事，曾经出过许多有现代思想的、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是前半个百年的事了。

后半个百年，尤其是1957年之后，北师大进入“万马齐喑”的“运动”年代。仅以1958年为例吧：一月，下厂下乡运动；二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三月，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时掀起以稿臭个人主义、自觉向“红透专深”前进为中心的思想批判运动；五月，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五月至九月，群众性的教改运动。师生下乡下厂，土专家、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上台；六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下，掀起大放卫星、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八月，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八月，在“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的口号下，大肆批判老教师、老教授、老专家……在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师大说过一个“不”字吗？没有。相反，只怕落后。为了表现不落后，八月十四日，北师大特地邀请北京天津有关高校和科研机关的教师及研究人员，举行座谈，带头批判师范大学的必修课——心理学，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致使心理学被从师范院校中取消。十月，开学之始，北师大又带头取消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学衔……终于，在这些“带头”的言传身教之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师大出了个带头去山东曲阜“讨孔”、砸孔府孔庙的谭厚兰！在这些事件中，北师大有谁说过半个“不”字？现在，这些师大后半个百年的真实，在师大校史中有反映吗？北师大人，有对这许多在后半个百年中发生的事情，深刻地思考过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吗？北师大现在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九五七年之后，中国人民教师的摇篮——北师大，给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人师？师大百年校庆的主题是：“弘扬传统，促进发展，再铸辉煌。”这提法倒是很富于辩证法，不过，恕我问一句：传统有好有坏，坏的传统也要弘扬吗？

行文至此，听到一个消息，说北师大的百年校史已经出炉（见《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1年9月28日，《迎接百年校庆 重温百年历史——校史知识问答》），但奇怪的是，1957年竟然在校史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仿佛时间是从1956直接进入1958似的！而且，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亲手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提到的“六教授”之一的黄药眠先生，由于无处可放，竟然把他塞到文革，说他是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大叛徒’”的。呜呼！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1918年，在当时于北京高师任教的钱玄同敦促之下，鲁迅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大量作品。他“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1920年起，他先后兼任了北师大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直到1926年不得不开离北京。这期间，1925年，他支援了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推行奴化教育的正义斗争，参加了校务维持会，并担任委员，撰写和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后因抗议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而被免职。但他毫不畏惧，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揭露敌人的反革命伎俩。1926年，在段

祺瑞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于天安门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后，他又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来抨击敌人，赞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1929年和1932年，在他移居上海之后，又再次到北京大学、第一、二师范学院、辅仁大学、师范大学等院校，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真是为救救孩子，为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呕尽了心，沥尽了血！他深知这是一个复杂、艰巨而又持久的任务。到晚年，在病中，又多次在《上海的儿童》、《立此存照（七）》等文中，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还说，这呼喊要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随感录 四十》）之时才能停止。应当说，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便是这样的时刻。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被解放了的孩子，在57年春夏之交，才会响应解放了中国也解放了自己的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可是，我们竟成了被引出洞的“蛇”！

1926年，为师者的鲁迅，眼见孩子们无端在天安门前喋血，能够写出不朽之文《纪念刘和珍君》；1957年，眼见“孩子”的孩子由于讲真话而蒙受不白之冤，虽然也有为师者继承鲁迅的传统，说了公道话，却不再有人能够写出《纪念刘和珍君》那样震聋发聩的文章了；于是，1966年到1976年，“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不仅讨伐死了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也打倒了所有活着的师——臭老九；现在，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美好的明天，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之时，那些真实的历史，“难忘的岁月”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北师大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啊？

2002年8月1日完稿，2005年8月修改
（注释及附件于后）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

李受山

小引

一九五七年春天，来的特别温馨和煦。我们春节留校同学，有的在新春正月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家恭贺新春佳节。他热情款待大伙，喝茶吃糖。由于人多，耀邦同志只落个小茶杯，还没有把，不慎将茶晃出，烫了手。他便借题风趣地说：“我希望大家都要成‘大器’，不要像这个小茶杯，只要有点水就往外晃。”接着喝口茶又说：“你们要作‘世’罗庚”，不只是华罗庚；要作钱‘世’强，不光是钱‘三’强！”（可能这两位科学家刚来过，所以就借题发挥了）。说得大家都感到很亲切，又很兴奋。我们学校文艺团体，也去拜访了大诗人艾青同志、田间同志；还有老作家老舍先生，都有很大收获。至于本校的，尤其是本系的：黄药眠系主任、肖璋副主任、莱著岑教授、李长之教授、还有启功先生……启功先生还出示他翰林祖父的八股文考卷，给我们看。单就是那小楷真是字字珠玑，使人叫绝。总之，当时我们这些莘莘学子，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洛阳花”之感。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四月初，学校党委作了传达，更使人心温暖如春，热血沸腾。不久就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在校园燃起熊熊篝火，学前一女同学（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唱了一曲《桂花开幸福来》，接着中文系李修生同学朗诵了他的《献给人民教师》的诗歌，就像脆亮的鼓点，擂动我们的心弦。于是我下定决心，55年肃反以来，一切不愉快的委屈？目水、被污辱的窝囊气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吧！我就是一心一意地当一名人民教师就是了。

一、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

正当我们豪情满怀，在进行每周三政治学习的时候，忽然《光明日报》（五月廿二日）刊发了我校中文系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这可真是“一石击破井中天”，于是准备毕业考试的、谋求毕业分配到大城市的、筹划营造小家庭的等等等等，都宣告暂停，不到三天的时间，整个校园里的大字报就贴得铺天盖地，紧紧迫问何锡麟的绯闻（其中也有反对的），一时称为《何穆事件》。

所谓《何穆事件》，就是穆木天在《我的呼吁》中，揭露了何锡麟的绯闻事件。当时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口头流传的，说是某研究生（或进修生）夫妇，在即将毕业前夕，欲谋求留在北师大工作（当教授）。能决定此事的只有党委一把手（即何锡麟）。于是女方便以自己年轻姿色，谋求于何，以至达到“献身”程度，女的男友因吃醋气极，便跳楼自杀（学生楼西楼三层）。其时西楼刚建完，回填尚未夯实，因而男方自杀未遂。但却传扬出去了，有好事者还亲自去为之验证。

另一种说法就是穆木天《我的呼吁》揭发的，现摘抄如下：

“……我举出，某党员首长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我认为党委、行政不处理，这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已经处理过了。处理的内容就是自己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何）也不知道这女方是有爱人

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的事，这也不算宗派主义。”

另外，穆木天还有诗一首，题目就是诗的首句“何大官人有一宗”也提到此事。原诗是：何大官人有一宗，拔刀弄斧护幽情，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红楼薄倖名。

以上两种说法，虽都未经当事人的确认，但确在校园里刮起强劲之风。同时穆木天教授之家，造访者也络绎不绝。有些过激人员（以学生为主），还把大字报贴满何的办公室和家中，甚至连他坐的小车也被围堵，一直无法出去办公。

约过三、四天后，一天下午四点多，师大党委副书记张斧同志，到大字报区（大食堂的西边）看大字报，顺便约了一些社团负责人。临时在南宿舍（女生宿舍）的三楼中部（忘记门牌号了）北侧一宿舍，开了个临时座谈会，人员是自由参加。当时主要社团有：“底层之声”（苦药尚不成形）。我和丛鉴同学是后去的，室内已坐满了人！我俩便依门框站立，听张斧在讲：“大字报鸣放得很好，不过我要求大家不要老纠缠何书记的事（指绯闻），要向‘三大主义’或‘三害’进攻。”当有人问他“何书记的事情是否真？”张斧副书记叹了口气说：“运动一开始，党委就担心这件事，所以穆木天《我的呼吁》在《光明日报》一发表，我们就感到被动了。彭慧（穆的老伴）是中文系的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能瞒得住吗？何书记最不应该的是把自己办公室钥匙也交给女方一把，这使女方可以随时就去……不过这事已经处理完了，何不久就要调离，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再纠缠此事了，要集中力量，指向‘三大主义’猛烈开火。还有我们学校肃反方面斗错了许许多多好人，大家可以大量地提嘛！”会议开的时间不长，这时在楼道上也挤满了人。大家听张斧副书记说的很中肯，态度也真诚，便为他鼓了掌。同时也都表示今后要指向“三大主义”，不再纠缠这无聊的事了。张斧副书记说他这几天特忙，又要接待各方人员，又要答复各种问题，说完便匆匆离去，大伙也忙着进大饭厅吃晚饭去了。

二、“苦药社”的产生

自从穆木天《我的呼吁》问世，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有的以班级、有的以团小组、有的以宿舍、有的以同学友好、有的以个人等名义（如“夜行人”）。有的命名“底层之声”（中文系甲班）、有的命名“苦药社”（中文系乙班）、有的命名“霹雳社”（教育系）等等，都应运而生。这些社团大都是一“轰”而起，开始并没有什么严密组织，更没有领导或党团指示，而是自发成立的。通过一个阶段的活动，有的发展壮大，如“苦药社”、“底层之声”等，有的一“轰”而起，不久也“一哄而散”，这是大多数。“苦药社”初期，也是由郑景星他们一个宿舍“轰”起来的，以后发展由小到大，而成为中型社团。开始郑景星请我给写个刊头，我用隶书很形象地写了“苦药”二字，取“良药苦口而利于病”之义。受到欢迎以后，每期都由我题写刊头，我也就成“苦药社”的一员了。郑景星原为大伙服务收集稿件；又自愿跑腿去学校总务处，要笔要墨要大白纸等，就成了总编了。冯三浩会写毛笔字，又善于编排整理稿件，就成了编辑了。为了吸引人，他还为大字报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他用文言文写了个序言，又用章回体，一事一文，短小精悍，编写成类似小品文，以吸引观众，全校同学都拥挤争看。并曾引起中文系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的赞誉，说：“中文系真有人才！”这时“苦药社”还缺少一个上下沟通、内外联系的人，正好卫之祥长于此项，便自愿担当社长，于是这时的“苦药社”便成为学生中“有组织”“有领导”也有影响的大社团了。

大约在五月末下午的学习日，我们乙班由班、团联合开了一个关于我校肃反问题座谈会（有人又叫“诉苦会”）还请来学校团委周之良书记参加了。是否还有当时主持我班肃反会议的周纪彬同学（我们下届的）忘记了。主要内容是一九五五年夏，在肃反运动中我无端被

苦斗了一个多月（还有另一位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好发表政治性议论，也被批斗了），我还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座谈会一开始，同学们发言很活跃，有的还带有气愤情绪，一致指责我班肃反是毫无根据地乱斗好人、乱扣大帽子，又限制自由，谁受得了啊！虽然也平反了，但教训是深刻的，被斗人受的打击是惨痛的。大伙的发言使我的眼泪几乎都控制不住。会的后半部便是要我尽情地诉苦。我忘记了哪位女同学还特为我打来一茶缸开水，要我喝着开水慢慢儿说。我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半天才说：“我校的肃反运动，是斗了许多好人。我是一个学生，倒还无所谓；最不该是斗了那些老教授、老专家，还有许多任课的先生们，虽也平反了，但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敢大胆地发挥了，也不敢再说自己的真知灼见了，这个损失有多大啊，那是不可估量的。”我说完后，同学们便七嘴八舌谈起我校曾斗过不少老教授，特别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有的还被迫自杀了。这些人既然从国外回来，能没有海外关系吗？既然都交代清楚了，就行了呗，肃反还要惨酷地斗人家，伤了人家的心……嗨！真是太不应该了。大家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感到问题严重。最后一致认为：肃反是我们学校整风的主要问题之一。于是就决定成立“肃反专栏”，专抓肃反问题，并由我当编辑。理由是我在肃反中受的苦最多，理解也最深。我也就不能推脱了，就当“肃反专栏”的编辑。这时学校为了促进鸣放，除了上课、晚自习时间不占，每天下午课外活动都为鸣放写大字报时间。苦药社人员也增多了。大伙都认为：这是一项政治运动，不像以前那样自由散漫了，于是重新编组和分工。

卫之祥为社长。具体负责与学校党委及行政的联系（包括汇报、请示），同时也接待校内外来访，沟通情况。

郑景星仍为总编。负责稿件收集分配，物资（主要是笔墨纸张及少量用钱）的筹办和大字报张贴等。

冯三浩仍编辑《新今古奇观》并自己缮写、出版等，自己忙不过来也请别人帮忙。

李受珊编辑“肃反专栏”后，也改为章回体一人一文的《奇冤记》，自己改编、缮写、出版等，自己忙不过来，也请别人帮忙。

薛若安、胡家瑞等负责采访、收集材料，后又增加了一些人。

出版（张贴）时间：每天下午四时左右。

张贴地点：大饭厅西边大字报区。有固定地方，别人不得抢占。成为当时有秩序、有规律的活动，也是全校同学按时争看大字报的活动时间。这时也是苦药社最兴旺的时期，影响最大、名扬校内外的时期。

这期间，我因为编辑“肃反专栏”曾亲自去采访了政教系教授何廷杰先生，在肃反被苦斗的情况。回来编写了《奇冤记》第一回并出刊了（后又收入《苦药特辑》）。

据统计：《新今古奇观》共约编辑出刊了五十多回。（都是冯三浩主编）。

《奇冤记》共编辑十一回，出刊了七回（由李受珊主编，其中第七回是陈力编写，因而也当了右派）。

以上两个作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许多人建议出油印本，以便保存。郑景星又筹划出《苦药特辑》油印本并出售，两角一本，供不应求，仅出三期就停刊了。

三、沉闷的七月 鸣放尾声

六月七日，我们看到《光明日报》的六教授会议报道，还很自豪地认为：六教授我校就占两位——黄药眠、陶大镛。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及后来的《工人说话了》，还认为这又是教条主义那一套。但是，学校的形势有些变化，好像很“沉闷”。于是苦药社的人们便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苦药社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首先由卫之祥说：他曾亲自向方铭（明）汇报请示过。她答复说：“仍要继续鸣放”。也有人说：

“中央可能要‘收’了”。郑景星说：“我大概检查了一下，咱们发出的稿件，都有事实根据，没有什么大问题。”会上也有人提出：“要毕业考试了，要复习功课了。”其中多数人赞成这个意见。于是郑景星就决定：把手头的稿件清理一下，能发的就发，不能发的就收起来，看看再说（也包含指运动方向）。自此后，苦药社整风鸣放运动就基本告一段落。实际上大伙也都感到很劳累，也愿借此休息休息而复习功课。

也就在这几天，常看党组织通知党员开会，团组织也召集团员开会。回来都很少言谈。我的上铺便是一名党员，在鸣放兴旺时，我们很谈得来，现在却啥也不说了。过了不久，班级也开会，其中有一次开会的主持人是一名新入党的女党员，一开始她就宣布“还是要大鸣大放，要大伙积极发言。”可是很长时间大伙都闭着嘴，谁也不说啥。其中有一位是我上面提到的在肃反中因出身不好，又好发表政治性议论而挨斗的同学，突然被主持人看中。可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他什么社团也没参加，也没写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于是主持人就特别关照，点名要他发言。他站起来吭吭哧哧，半天也没说一句完整的话。最后说：“我还没有想好呢！等一会别人说完，我再说吧！”说完就坐下了。可是别人还是没有说的，于是主持人又再一次光顾他，并主题鲜明地指出：“你在肃反中挨斗了，难道没有意见吗？”说完就赶紧准备好了钢笔和小本，等待记录。可这位同学连忙站起来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才要坐，主持人又提出：“不会吧！肃反是把你斗错了的，难道没意见吗？”这回这位同学不知从哪来了灵感，铮铮站起来打开了话匣子说道：“斗错了党不是给我平反了吗？而且还给我赔礼道歉了！”于是便左一个“感谢党”，右一个“拥护党”。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已经打过就寝铃了，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便收起钢笔和小本回宿舍了。事后我才想起来，当我在苦药社作“肃反专栏”编辑时，他曾于无人处几次劝我：“别干了，天下哪里会有那么便宜事，给咱们平反就不错了！”我还认为他和党有异心，是落后呢！而今天演的一幕就是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或“阳谋”吧！

就在这时，我班出了传奇性事件，作了鸣放的尾声。

我们五班（小班），有个江西籍的姑娘叫沈巧珍。长得小巧玲珑，性格纯清如水，又爱好歌舞，因而班上都唤她“巧儿”。苦药社兴旺时，她写了一则《新今古奇观》，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曾引起全校轰动，因而“巧儿”也出了名。这篇短文不过六、七千字，取材她们团小组的集体采访，大厨房某管厨师傅供给的材料。原来我们新校因系初建，还没有围墙，只有简易的铁丝蒺藜权当围墙，以防周围尚未搬迁的农家之狗，进来偷吃厨房垃圾的鱼头骨屑等。学校曾买了几杆土枪，雇工巡逻，只让轰走，不准打死，以免伤了邻居关系。这时学校总务长是湖南人，特别嗜食狗肉。其下有个姓李的食堂管理员，身材魁梧，堪称“壮士”，为了讨好上司（即总务长），就将农家之狗打死了，还想借食堂锅盆炖熟，孝敬总务长，某厨师不让。于是李壮士以职权之便，硬是炖了，最后将狗皮送给某厨师，以期堵住他的嘴。等到“巧儿”她们去采访时，某厨师就将此事原原本本供了出来，并将原狗皮也出示给她们看。采访组听后非常气愤，经讨论就由“巧儿”执笔，写了这则短小精悍的《新今古奇观》。现在事已过了，又是沉闷时期，已无人再过问了。恰有我班（小班四班）黄家榜同学，是印尼归国华侨。在鸣放旺盛时，他因阑尾炎手术住院了。现在他出院回来，一看偌大校园，冷冷清清，一片寂静。不像他住院时听同学们说的情况，他曾不只一次自言自语地说：“帮党整风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正好有位同学向他说了沈巧珍这则《李壮士打狗孝主》的大字报，他就把大腿一拍说道：“此风不整，党何以堪！”当时就去找了大字报原稿抄清放大；又去大食堂找某厨师要来那张原狗皮，就在食堂前面单枪匹马召开辩论会。由于事过境迁，倒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他仍执着地宣讲不停，一手拿着大字报，一手抖着狗皮。有的好心人还劝他别管了，他也不听。三整两整，由于他过度劳累，手术刀口进发。于是他再次住进医院。等他再出院时，早有一顶“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帽子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了（后去香港经商，2004年9月去世）。沈巧珍呢？这个“自告奋勇”的右派，受到考

查一年处分，每月拿 20 元生活费，劳改了四年才摘帽，后分在四川自贡大安区第七中学，每月拿 40 元工资，教两个高中班语文，劳累病苦且不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66 年 7 月 25 日）的反动路线迫害下受尽了批斗酷刑之苦，扔下五个月的吃奶孩子及一个几岁男孩，投了自贡市濠溪河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四、反右初期我校的三个批判大会

我校整风鸣放第一期由穆木天《我的呼吁》（即 5 月 22 日）开始，到六月八日后一点，黄家榜的个人辩论，也就是一个多月就算结束了。我们准备的毕业考试，也未举行，这时常能听到的，就是给谁定右派（包括学校、系、及社团等）。看到报纸上也登有储安平“党天下”、“章罗联盟”等报道，校外也听说北大谭天荣等、人大林希翎等情况，心神很是不安。不久就听说，要给“苦药社”、“底层之声”定性，多数人对“苦药社”是认为在整风鸣放中“立有汗马功劳的”。于是有一天晚饭后，在大食堂道南一临时教室里，由苦药社作说明解答。参加人员是不分系、班，自由参加。也不拘限发言形式，可以随说随走，也可以有不同争论。我记得那天晚上人还很踊跃，几乎全都坐满了。教师有朱启贤、王汝弼等，都说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其中有个外系拄拐的同学，因排不上号发言，就写了一个纸条说：“苦药社的同学辛苦了！我校整风如没有你们的推动，是打不开局面的。我赞成你们立下汗马功劳的说法！”最后署名“窗外人”。通过这次会议，苦药社的人们，心情还好过些。可是过了不久，校党委（书记仍为何锡麟）便发布：“底层之声”、“苦药社”都为反动社团。这一锤定音，苦药社的人们，只好等着“受”了。

这时学校又开始了第二次鸣放，是在校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安排的鸣放。并且学校也准备好了新鸣放大字报专栏，要大伙张贴大字报。内容当然是直指“底层之声”、“苦药社”了，也有指向个别校领导、系主任，某教授的，当然穆木天、彭慧是大量的了。又不久，“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深、杨碧遐、罗宗义等，“苦药社”的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等，先后被揪上台去亮相示众了，并都开了大型批判会。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便不能自由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活动，甚至晚自习、看报刊、文体活动也不能参加了，只准在宿舍反省或写检查，有什么活动要随叫随到。有时候还强迫我们去看“新鸣放大字报”，回来还要谈感想、写心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张署名“一兵”的大字报，内容是：“何书记，你的身体很不好，工作又太累，为什么还不加强爱护呢？我建议，您应该好好保养保养了！……”我的一位朋友（从鉴）看后，轻轻拽我的衣领悄悄说：“你看，人家的大字报，提意见也带着溜须拍马屁，你会吗？”

下面再说这期间学校开过的三次大型批判会，我们都是奉命参加的。

1. 批判武兆发大会

武兆发是我校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有名的切片专家，全国性《生物学报》主编。解放初期回国，被我校聘为教授。因有国外关系，肃反被苦斗了。后纠偏平反，并赔礼道歉。整风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提意见，这是必然的。学校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及国内外影响显著，在反右开始，要抓他的典型。他因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就用自己使用的手术刀自杀了。因他是生物系的名人，我是中文系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上述情况也是听来的，不太准确（当时生物系尚在定阜大街师大北校）。批判大会由生物系主持，其中还有一位约三十多岁的女性。说是武的助教（或助手），曾被其强奸。该女性中等身材，穿身男式蓝布制服，面容粗俗，像一农妇。说话呜噜不清，要哭又无泪。她发言（或诉苦）完了，主持会议者让她从左方下去，她却胡里胡涂仍由上台时方向下去了。下面便是生物系有组织有准备的发言。这些发言，主要是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

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散会后，有的人借骂武兆发便说：“妈的！武兆发还是美国留学的，又是国内外名人。怎么去强奸一个像老母猪式的女人？怪哉！怪哉！”

2. 批判谢昕大会

谢昕是我校俄语系一女生（因年久不准）。在肃反中，因与其离婚前夫有某些政治问题（其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与其离婚后，便考入北师大读书），曾被逼供审问批斗，后平反，恢复名誉。整风运动一开始，她就去找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紘先生（曾是蒋介石派与中共和谈的五老之一）反映了她被斗情况。黄表示同情，并要过问此事（后在反右中自缢身亡）。因此我校就要抓她为主要攻击肃反典型。大会布置得很严肃，参加的人也很多。我们都奉命参加了，并被告诫要“严肃”。谢昕被揪上台后，耿耿直立。主持会者便高喊：“谢昕低头！”谢昕仍是原样直立。于是主持会议者便指示两个青年，一个拧其一支胳膊，硬是把她摁低下头，就勉强宣布开会了，发言者便轮流上台。时间长了，摁谢昕脑袋的两青年有些乏力了，不注意，谢昕一骨碌，又是耿耿直立。主持会议者再也没有管，将就开会开完了，又喊了一气“打倒谢昕……”口号就散会了。倒是两个壮男把她擒下台来，可能当晚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以后再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更不知她是死还是活。

3. 批判何廷杰大会

何廷杰是我校政教专业教授。前面已经讲过，我在苦药社做“肃反专栏”编辑时曾亲自去访问过他；并将他的事迹编写《奇冤记》第一回出刊了。现在学校党委要抓他为攻击肃反典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使我没想到的是当时住学生宿舍西楼一位素昧平生的名叫付日春的进修生（或研究生），不速来到我的宿舍，说是奉学校党委之命，要我写揭发何廷杰的材料。付日春约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我与他虽不相识，但党委之命却得完成。便问他：“那得怎么写？”他说：“你先写个初稿我看看。”又告诉我：他住学生宿舍西楼三层某号。要我明天中午就送去。第二天，我将初稿给他，他看完说：“这不行！你不能光自己检查嘛，要揭发何廷杰是怎么对你毒害的！”他又就我的稿子指出：“此处要如何如何写，某处又如何如何写……”最后还郑重地说：“老李，这是给你一个光荣而又难得的政治任务啊！”我明白了，这是要我陷害何廷杰啊！当晚我长时间也睡不好，一面想起我的老寡母常说：“孩子，你四岁就失去父亲，咱李家就你这一根独苗，可不能作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一面又寻思付日春所说的：“这是一个光荣又难得的政治性任务！”梦想：背不住我揭发了何廷杰能得到奖励，也许免于戴右派帽子呢。时间紧迫，机不再来，最后还是按付日春指点的写了。再送给付日春看，他仍不满意。一面叨咕时间太紧迫，一面将我的稿件勾勾改改，最后要我回去誊清，明天下午一点半在大礼堂，就按此稿发言揭发。第二天我按时到大礼堂，付日春看看我的誊清稿，就让我上台坐在一侧，不一会人就齐了，宣布开会，好几个人讲话后，才呼我上台揭发。我一上台，就看到何廷杰就坐在前面。一眼看他那病瘦身躯，憔悴面容，不由得难过起来了。不知我是说了些什么，胡里糊涂就把发言稿念完了，倒是得了一阵掌声。自此以后，每当我想起何廷杰的病瘦身躯，憔悴面容，就莫名地心怯气虚！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了，才明白：人是不能作亏心事的，这才能活的踏实。何况，我也没有得到幸免不戴右派帽子啊！

五、反右初期的两则见闻

一是关于“天、水、心”事件。

在反右初期有些奉有特殊使命的人便到处搜求过去的大字报，看有否漏网者，以便邀功请赏。这时，原鸣放大字报区早已拆除了，只有边边拉拉还有些断篇残角，就成为他们猎奇

的目标。这时在我们男生宿舍（北楼）后面，极为偏远的地方，恰有一张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题目是极为醒目《党主乎？民主乎》，完好的贴在那里。内容不过三、四百字，朗朗清晰。下面署名“天、水、心”。用心者如获至宝，当即小心翼翼地揭下来，迳送校党委。校党委很快就查明所谓“天、水、心”是中文系四年级（毕业班）丙班的吴云生、刘洪钧、余毅忠三人。经交代：在整风鸣放兴旺时，一天晚上吴云生下了晚自习回宿舍，看桌上正有笔墨和一张看完的报纸，便顺手写了这张大字报，当时自己还很感得意，想念给别人听听。正好同窗宿舍的余毅忠也下了晚自习进门来；另外还有他上铺的刘洪钧，早就回来就寝了，吴云生便把他推搡醒来，有声有色地朗读起来。很快就读完了，又问：“都同意吧？那就签名！”自己便拿起笔，说道：“咱们每人只出一个字，我姓吴，口天吴嘛，出个‘天’字”，说完就签个“天”字。又指刘洪钧，你出个“水”字，洪字旁不是三点水嘛！余毅忠就出“忠心”的“心”字吧！余毅忠当即应允。只有刘洪钧还在睡得迷里迷糊的，再三推问，才像说梦话似的说“行吧！”于是就由吴云生代添了一个“水”字。正好室外有浆糊，他便拎着走到楼下。一看大字报区都是下午新出的大字报，那不能盖。他转来转去，看到只有他们宿舍楼后还有空处，为了避免别人盖上，他又特意又离远些，才结结实实、稳稳当当贴在这里，真就保存下来。打这以后，他心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了，更没有想到会闯什么祸，现在可麻烦了。党委名之为“天、水、心事件”，他们三人也被称为“天水心分子”。吴云生才二十多岁，还未脱童稚之气呢！因自己是主犯，当时就彻底认罪了。余毅忠正忙着他的《寓言故事集》，还有单行本《鲤鱼告状》的出版，对此不太在乎，当然也承认了。只有刘洪钧认为他在睡觉，是稀里糊涂答应签名的，又是吴云生代笔，怎么也感到冤枉。此时又恰赶上他本人出了个婚姻问题，正在闹离婚。真是祸不单行，越想越冤，因而高低也不认罪。这样就先开小会，继而中会，最后便是全毕业生的大会，我也参加了。看他借李煜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向东流”在作检查，哭得实在叫人可怜，可谁也救不了他，最后闹了个“顽固”的右派，流放家乡河北涿县，不知所终。吴云生发配哈尔滨双城中学，改正后教学成绩卓著，多次受到重奖。

二是江、严“政治第一之争”。

江XX是我的同班同学，严XX也是我的同系而不是同届的同学，他两位都有胃病，同在胃病食堂用膳，又是同一饭桌。他两位性格上都有个特点，凡事好争论，而又各执一词，就是明知自己错了，也强词夺理，不能服输。其中严曾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又遇到个人婚姻问题，常有怨气形于言表。整风初期，严在吃饭时提出“还是业务第一”，江则马上反对“应该政治第一”，因而两人先由争论到争吵，后到动手——严打了江两个嘴巴子，江打不过严，便哭着去到学校行政告状，恰逢傅种孙副校长当值。本要下班吃晚饭去了，看二人来，便又留下。在倾听二人各诉情况后，便认为校内二人争论问题，时常有之，但严不该动手打人，又念及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最可爱的人”，便想把事压下，不再让发展。于是便以“长者”领导的态度安抚江，继又责备严，认错赔礼，双方都满意后，便下楼共进晚餐去了。不意，这则消息很快被《北京日报》某记者，以北京市委领导口气报道说：“北京师大某学生，因坚持‘政治第一’被挨揍了，学校领导竟然敷衍了事处理之”等等，于是不久，我们学校这位素称长者的民主人士，又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权威——傅种孙先生，后被报纸点名的右派，其中罪状之一是包庇打人的右派学生，其立场可见一斑。严呢，先被学校开大会公开逮捕，后发配黑龙江兴凯湖边某农场，长期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落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才被召回工作，现已退休。

六、苦斗一月 劳动五月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也是我们北京师大极为特殊的一个月——反右派“大丰收”的一个

月。当时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软禁在宿舍里，党团员、班干部及新上来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可忙得不可开交。干啥呢？定右派啊！我们在宿舍，不管谁被召唤，去时轻松光着头，回来时那怕是三伏酷暑，都戴上一顶紧紧登登的帽子，我班最多一天有六名。过程大致是：先经过全班批判，宣布定案；再经本人签字，这样一个右派就诞生了。当时主持我们乙班定案的，是我们下一届（或下两届）的可咏雪同学。他个子不高，年岁也不大，说话有些内蒙口音。有的还要经过他训斥一通——不知别人，我是经过他训斥的。他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右派，唯恐天下不乱”如何如何，我听得很反感。心想：天下乱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你们叫我们帮党整风的吗？大鸣大放吗？尤其对我们毕业班，不是再三要我们把宝贵意见留下来，以后好整改吗？现在你们全不认账了，反赖我们惟恐天下不乱！真是岂有此理！心是这么想的，但又明明白白口里是绝不能这么说的，就只听他一个人咋呼吧！他训斥够了，就再去我班某女同学处，现为整理右派案卷能手，为了卖弄自己有学问，给右派都起了个带有污辱性的外号。前面已经说过什么“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自报奋勇”的右派，还有什么“起义狗”右派等等，不一而足。我看我的案卷呢，主要是“攻击肃反问题”。但其中所列罪证，有许多都是1955年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筠（由副总支书记提为总支书记）在给我平反赔礼道歉的原话。为什么他说了可以升官走运，我便为“右派言论”，而定为右派分子呢？心里很不服气。但又想到，我就是提出申辩，也无济于事，干脆就默认了吧！看到最后定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我不由得火冒三丈，就向她质问：“请出示一个有折有扣的右派分子给我看看！要不，我不签字！”她无法，又去请示可咏雪，给去掉“不折不扣”四字，于是我就当了一个光是右派的右派。事后想想，我也是“多余”之举。

上面所述，是我乙班（小班4、5）定右派的情况，其他甲班（1、2）、丙班（3、6）详情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乙班共定了18名右派，计有：卫之祥、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胡同荪（女）、张孝存、黄家榜、谷兴云、王开烈、冯三浩、肖敦煌、汪智、陈力（以上4班）、李受珊、丛鉴、王文禧、沈巧珍、张平治（以上5班）占大班的30%，其中4班13人（附：中文系教授共18人，右派9人。其中一级教授两人：黄药眠、钟敬文。二级教授两人：穆木天、彭慧。三级教授三人：李长之（也可能是二级）、俞敏、陈秋帆。副教授一人：启功。）

八月过去了，右派也都定案了。毕业生（无问题的）也该分配离校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新生开始入学了，于是我们这些右派便被通知：自8月30日起都要搬离原宿舍，9月1日起，都集中到锅炉房大烟囱附近的一所平房去住宿。吃饭按大班排队进食堂，内有划定的界限，不得与外班同学言谈说笑，饭后即回住处学习报纸或写检查材料。同时也告知在原班老同学离校走时，不得送行告别。有必要送行时要请假，但也不能出校大门，更不能去车站。这时，我那位被引而未出洞的同学，也完好地被分配去西安北边一个县城中学（仿佛是高陵），正在忙着办理离校手续呢！我才深深感到我这位同学的高明，有远见。悔恨没听他的劝告，完全咎由自取而活该当右派！当然我不能去与他告别送行了。可是就在他要登车的那晚，他却背着行李，悄悄来到我们的住处与我辞行。我不由得两眼泪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紧紧与他握手。他却宽慰我说：“这一次我算是侥幸逃脱了，谁知道将来又怎样呢？希望我们各自珍重，好自为之吧！”我听完很不解他的话中内涵，于是他又压低嗓音说：“我们的命运早就装进小口袋里（指档案）去了。”说完就匆匆背起行李赶车去，事后还真不出他的所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抓了他个“漏网的右派”，由于“四人帮”倒了台了，还没来得及给戴上右派帽子。

且说这期间，学校既忙于接待新生入学，还要考虑下一届（58届）的反右斗争，有些顾不上我们了，我们倒也落得暂时轻松。不久，就有专职人员来管我们的学习、生活等等，并且联系了附近的农业社队，圆明园大队，五道大队，大钟寺大队等，参加秋收劳动。每天学校派出两台大板车，我们吃完早饭后再带上午餐，坐车去农业社，再由农社队长安排活儿，

实际活儿很轻，不过是抱豆子，捆苞米秸子等。我是农家子弟，干这些活儿不怵，还很内行，受到农民的表扬，右派们也来向我学习。时令又当秋高气爽，郊野秋色斑斓可人，所以心情感到很舒畅。午餐便由社队供热水或豆腐菜汤，也都吃的很饱，有的还加了饭量。下午四点多钟，大板车就接我们回校，晚饭后也能洗个澡、洗洗衣裳袜子、睡觉，也很安稳，所以大伙都感到，这段秋收劳动生活很不错，特别是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和痛苦了。就这样从晚秋到初冬，干了五十天，忽然告诉我们不再去参加秋收劳动了，按班组要进行阶段总结。内容有二：一是对劳动的体会，二是对划右派罪行的认识，会后还要讨论评议。于是大家为争得一个好的评议，都在认真准备呢。

七、尾声——发配吉林

十月三十日，忽又通知，都去文史楼参加重要大会，不得缺席不准请假。于是大家心里都在犯琢磨，能是什么重要大会呢？有些先知先觉的（也可能得知小道消息），便说：“什么重要大会，是公布处分呢”。结果一到会场，真就是公布处分呢！

首先，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筠同志宣读了文件指示，接着就是公布处分。因为右派案卷，早就整理完了，并各已签了字，现在只是公布每个人的处分，所以很快就完了（也是李筠公布的）。

我听了，好像“底层之声”的张海深、杨碧遐，“苦药社”的卫之祥、丙班的辛桂斌，还有谁忘记了，没有听到念名字，其他都公布了。处分最重的要考查三年，一般的是考查二年，最轻的是沈巧珍考查一年，而且全都分配工作。我与从鉴的处分，都是考查二年（相当中右或三类）。又认为考查是在工作中考查，二年的时间容易过，处分不重然而也有当场哭鼻子的。我和从鉴都想起他的好友甲班孙健孙同学，只为摆弄大喇叭，整风时常义务地帮人安装或调理大喇叭，今天也当了考查二年的右派，那才叫屈呢，可他啥也没说，就流放去江西萍乡了。

最后李筠又说，要大家都填写两个志愿是哪省哪市，以便分配工作，同时也指示，只限东北三省、内蒙古、西北的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四川、云南也可以，但京津、上海、广东、山东最好不填，有困难的可以提出考虑。最后又说：从现在起，大家就可以做离校的准备了。

我自小就听我爷爷说，长白山的大森林如何大，关东山的大棒槌（人参）如何值钱。就羡慕向往，所以就决定填吉林了。第二志愿是山东，知道去不成，也就更能保证我去吉林了，结果真的就批准，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自十月三十一日，学校已解除了对我们的限制，我们可以自由上街购物，买箱子、绳子，办理户口迁移，以至辞亲别友，甚至下个小饭馆儿也没有人干涉了。自打十一月二日起，就有离校的，起先还有人互相送行，以后人越来越少，大多是冷冷清清，苦苦凄凄，自个儿拜别了亲爱的母校大门，又自个儿奔向火车站离去。我因车票关系，一直等到十一月七日晚，正好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灯火辉煌，我只好雇个三轮车（当时尚没有出租车），绕过热闹场面，直奔永定门火车站，到九点才坐上去长春的快车，结束了我在北京师大中文系的整风反右活动，又在梦想着我将去长白山下的流放生涯，又会是怎样呢！

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

罗宗义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当时，我是北师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忙于“向科学进军”，准备报考副博士研究生；忙于“地下恋爱”。真是一个繁忙的季节。

一九五七年二月，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这是一个鼓励人们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一九五五年肃反以后，人们已经小心翼翼了，这个讲话，让我们思想解放了，大胆了。前些时候，我与一个“同案犯”通话时，曾对他说：“我们五七年‘跳了’出来，完全是被毛泽东的讲话煽动起来的。”他十分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这是事实。讲话的内容，都已经隔半个世纪了，有的，我还记忆犹新。比如，他老人家保护和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肯定其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当场，还问彭真：你们北京市委有没有官僚主义？彭真回答说：我不敢保证我们市委没有官僚主义。后来，这个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时，这段话通通删去了，还删去了许多原话——号召大量鸣放的话。而关于香花和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当时讲话只字未提。这个讲话，主题是“放”！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收”为主题了。当时，有人指责说这是“阴谋”，理所当然地成为典型的“右派”言论，讲话者却提出了“阳谋”说，我们就成了“阳谋”牺牲品。

几个月后，批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时，总要问：你当时自觉不自觉？也就是说，当时知不知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一个“同案犯”回答说：“我早知道要尿炕，我就不睡觉了。”太生动、太形象了！但这种解释，是绝对不可能过关的，于是，一种“本能论”就此诞生。即是立场错了，“本能”地驱使干这说那，虽然当时并不自觉。但“本能”却让你说反党的话，干反社会主义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本能”论，是通用的。我多次如此检查，也竟然过关了。上报的关于我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中，竟然写道：“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紧扣中央摘帽的文件精神，也就心照不宣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这当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当时都有遵循党委部署的习惯，各个班都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我作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成为其成员。但好长时间，都处于学习阶段，并未接触任何实际。记不清五月十天左右哪一天，我看见了《光明日报》登载的我校教授陶大镛的一个发言，称师大整风运动“无风无雨”，我很激动。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题为《也谈师大“无风无雨”》，借陶大镛讲话这个由头，把我四年来内心的感受，统统地放了出来，投寄给校报《师大教学》。时隔多日，毫无音信，我感到师大党委有意压制这次整风运动。当时还不知道“舆论一律”的观点，更不懂得“新闻导向”，认为《师大教学》也是一个阻碍整风运动的机构。

因为，我们快要毕业了，有同学提出：“咱们到教授家去拜访拜访，也算告别。”第一个访问对象是穆木天、彭慧。一个是外国文学老师，一个是俄罗斯文学老师。我对彭慧老师更感兴趣，知道她曾经是“左联”党团成员，也曾担任过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还选她当了人民代表，因此，我欣然随之前往。临时动议，临时出发，连与我恋爱对象的幽会预约，也忘却了，为此，不知遭到若干次的埋怨。到了穆教授家，他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

师生拥挤一堂，十分热闹。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中心议题，当然是学校的整风运动。穆教授十分激动，就像上课讲到动情处，手舞足蹈地讲开了：“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党委书记的屁股有屎，不干净！”这时在厨房忙着煮饭的彭教授，连忙赶过来：“说那些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穆教授站了起来：“我要说！我要说！”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关于他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传闻。说是周恩来总理请了几十个教授，开座谈会，其中也有穆教授。主持会议的总理刚落下话音。他就举手发言：“总理，今天我还有事，我先说，说完，我就告假。”总理点点头，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讲完后，拿起皮包，扬长而去。听到这个传说，我们都疑惑不解，再忙，再重要的事，有比会见周总理的事更重要的吗？我知道他是个创造社的小伙计，摆摆老资格，可太狂了！我的脑海正盘旋着，突然又听到了更为震惊的信息。穆先生说党委书记跟女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而那个女的还是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我认识她，她是我们红旗舞蹈团的编导，舞跳得可好了，她教我跳当时十分流行的乌克兰舞。听到这个情况，理所当然，群情激愤。平时，我对这位党委书记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不像个工农干部，倒像个公子哥儿，冬天，西装革履，穿呢子大衣，夏天穿丝绸装，走起路来，哆哆嗦嗦。这位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料想不到，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连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在吵吵嚷嚷。一个同窗自告奋勇地说：“回宿舍，我就起草大字报，谁改改、抄抄。”我当仁不让地说：“我来吧！”在学生会群众文化部工作的一位同学说：“我去拿纸笔去！”匆匆忙忙地走了。起草稿的人，是个快手，大概早就胸有成竹，我洗漱刚毕，他的草稿大功告成。接过看，题目叫《谜》，意思是，我校整风运动，为什么开展不起来，问题就在那个党委书记身上。时间太长了，原文记不清了。我的印象，笔锋是犀利有力的，语言是明快讽婉的，煽动性是很强的。我一看，宿舍唯一的书桌上，已经摆上笔墨纸砚，我就埋头抄写起来了。书桌旁围观了好多人，看热闹，他们嘴里嚷叫着：“好！好！这把火点起来了！”“堂堂大学校长，如此卑鄙无耻，太可怕了，不可想象，不可理喻！”听到的，全是支持声，无人反对，无人阻止。我一口气就抄完了，我看笔下龙飞凤舞的字，满意极了，得意极了。我在班里，是管宣传的，壁报之类，是十分熟悉的。我看着大家，商量着说：“贴出去，总得有个报头嘛，取个什么好名呢？”一个睡在上铺，已经脱了衣服准备睡觉的同学，从床上坐了起来说：“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是最底层的声音吧！”我觉得报名太长，也不雅，就说“叫《底层之声》吧，怎么样？”在吵吵嚷嚷的“好！”“行！”声中，锁定了《底层之声》这个名字。谁也料想不到，这北京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刊出后（比北京大学五月十九日的第一张大字报，晚了五天），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北京日报》的社论中，曾点过它的名；在批判它的大会上，竟然惊动了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记者们，在后来放映的记录反右斗争的记录片中，也竟然有批判它的那个大会的镜头。在批判它的大会上，对《底层之声》这个社名，发言者的批判竟占了很大篇幅。而为之取名的同学却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宿舍七个人，定了六个右派，却偏偏没有他。这个“漏网”的同学，后来我在上海见着他，我对他说：“当时，我们还不懂得揭发，我一揭发，你就跑不了！”他还满不在乎：“我只在团支部大会上说过：‘我不跟你，也不跟那个（指当时的左派），我是中间派。’后来划个中右分子就行了。”我提起当时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情景，他才恍然大悟：“哦，想起来了。我说过，我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就算最底层的声音。好像你觉得太长，贴出去，成了《底层之声》了！”后来，我和当时一个“左派”，谈到此事，她也大吃一惊：“是他？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当时是谁担这个罪责，也许是我！

料想不到，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就点燃了那一场烽火。五月二十三日这天，全校几乎所有楼的墙，都贴满了大字报。其实，不少师生的心中，都装满了干柴烈火了，只要有了火种，熊熊大火就燃遍了全校，真像火山爆发。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惹人注目的大字报不少。比如《党主乎？民主乎？》，这是对“民主”的强烈呼吁。这三位同学，是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同学，才华横溢，虽然觉得言之成理，但却容易让人找到

把柄，我是不会随之附庸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开为胡风翻案，明确地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而引申为“法制不健全”，更令人振聋发聩。尽管，这种议论，两年多来，偶而我听人说过，但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尽管不明事实真相，但凭几封信即可定罪的做法，不少人的内心深处里也感到十分困惑。但，钦定的大案，谁敢怀疑呢？谁敢责问呢？大家对五五年肃反，更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这往往对深挖“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根源有关，而涉及的面又很宽，因此，为人们所注目。肃反时被斗过的人，他们的大字报、发言，都称之为“控诉”。这个词，虽然有些刺耳，但同情面往往在被斗人一边。特别是，采访被斗教授的原始记录，更让人触目惊心。我仿佛记得，有一个姓谢的女的，是俄语系的学生，她的控诉，令人们泪流满面，义愤填膺。后来，她在《群众论坛》（这个社团，后来定为右派组织）上演讲，引起了更大反响。党群关系，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类似“墙”之类的说法，俯拾皆是。对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也让人嗤之以鼻。记得有一个总务长，每次学校演戏、放电影，总让自己的妻子坐在好位置上，引起大家强烈的不满。因此，党委书记的作风问题，引起大家愤怒，更是顺理成章。我常想，当时那场整风运动如果彻底进行下去，也许党的腐败现象不会像今天如此严重，如此积重难返。——其实仍是天真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底层之声》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位党委书记的身上。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党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不知顾虑什么，害怕什么，谁也不敢公开把这个问题，披露在广大群众面前，总是躲躲闪闪、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因此，《底层之声》连续出了几张大字报，如《评张斧同志的讲话》、《整风一周》等，都是把矛头指向党委，责问党委为什么老是包庇这个问题。提出，要搞好师大的整风运动，前提必须揭开这个盖子。

随着运动的深入，参加活动的，不是起初我们宿舍的几个人，还有外班的同学，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社团。定名为《底层之声》，选举三人组成编委会，只定了一个原则，我班两名，外班一名。当时参加会的，也就只有十多人，其中还有响当当的“左派”。我被选为“编委会”成员。这个编委会，形同虚设，没有开过一次编委会，外班那个编委只在开会时见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都是各自为战。据说，我的档案里，曾列为《底层之声》社长。其实，我们三个人，从来没有分过工。因为，我曾在学生会工作过，认识人多，对外的事，往往是我。什么党委宣传部召开各社团代表会议，我出席。领着全校各社团十八个代表，去访问彭真、胡耀邦，我带队。后来落实政策时，据落办的人讲，《底层之声》有三百多个社员，我也感到十分惊异。我说，人会并不需要填什么表，也不登记，更不发什么袖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自由的。跟我一起活动的，也就十来个人。其中一个人，我还曾为他鸣不平。第一张大字报，是我让他贴的，后来贴大字报的任务，可能，他都包了。他没有任何言论，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后来定为“右派”时说，行动比言论更危险。他贴大字报时，对其内容，都不甚了了，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把他划为“右派”，太冤了！

形势不断发展，《底层之声》也突破了原有的规模，成立了大字报组、油印报组、广播组，各个组还任命了组长。这次人事任命，并没经过编委会讨论、研究，也不知是那位老兄任命的。我从来没有问过，觉得有人干活就行。有时碰面说几句，也就算商量了。可见，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混乱的。特别是广播组，高音喇叭一响，哇哇叫，传得很远。除了广播《底层之声》大字报、油印报的文章外，谁都可以讲，无人审查。广播机器，就安放在我们宿舍，我们宿舍（西北楼 415 室），真成了一个自由论坛的场所。比如，访问胡耀邦的原始记录，经过大家核对、保存，当时团市委的一位同志，也参加一起核对。会上，一致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公开发表，只供内部传达。可《苦药社》的头头，没有经过大家商量，擅自将访问记录就在我们宿舍播出了，影响很大。为此，他也吃了苦头，被劳动教养，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按理说，我是带队的，核对材料会议是我主持的，团市委的同志参加会议，这也是我请的。至少，在广播前给我打个招呼吧。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也没问过他，

就是我的宿舍的广播组长，事前事后都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可见当时是十分自由的，纪律也是松散的。后来，就连落实办的头头也十分感叹地说：“说你们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看来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一次公开的活动，就是参加党委宣传部召开的关于《师大教学》的座谈会。会前，不知是谁，通知我时间、地点，我欣然前往。对《师大教学》，我早有看法，前已述说过。当时没停课，全年级，二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听课。课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全年级有什么事儿，趁着老师离开教室，即可进行。早晨，党支部宣传委员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下午、晚上访问教授的学生名单，涉及到全年级，让我念念。对党支部布置的事儿，我是十分愿意干的。念完名单后，顺便讲讲当前整风运动的形势，其中对《师大教学》讲了几句：“《师大教学》是保守的，阻碍了我校整风运动的开展，我们要办一个油印报来代替它。”真是有点头脑发热了，很有一点狂妄的味道。对我的讲话，有人鼓掌，有人离场，我自己觉察到，当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次，让我去开会，我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宣传我们观点的机会。到了楼前，就被一个人截住了，一看也认识，历史系一个社团的头头，他拿出一个改组《师大教学》的方案，让我过目。我看后，点点头：“好，好！挺好！”想退给他，他急急地说：“您拿着，您拿着，您要觉得可以，在会上，您说说。”我说：“你们整的方案，我们怎么能贪天之功呢？”他还急急地说：“你们《底层之声》影响大，他们听，我们社团没名气，说了，不管事。”盛情难却，只好从命了。料想不到，成了我的大罪。

宣传部长主持会议，我认识他，他原来是校团委书记。他的开场白十分客气，无非是说把大家请来听听意见，听听群众的呼声吧。我就当仁不让地把历史系的方案念了一通。其它的，都忘了，只记得改组《师大教学》编委会这一条。编委会由党委、团委各社团代表组成。好像就是“文革”中三结合的权力机构的雏型吧，这也算是一个创造。当时我还临时添了一句：各个单位人员多少，人员组成，还可协商解决。当时参加会议还有我校团委副书记，他支持我的发言，理所当然，他也逃脱不了那一场厄运。后来，他当了我校的党委书记，我见着他还问过他，还记得那次会议吗？他说一辈子参加的会议太多了，不记得了，我料想不到，参加这次会议，就成了我篡夺《师大教学》领导权的罪状。批判《底层之声》时，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一张床上，正在做梦，是要当《师大教学》编委的幻梦。画漫画的老兄，真有天才，那个“我”画得真像，矮墩墩，胖乎乎，有副天真的笑容。

学校开始有动静了，上面召开座谈会，下面各个班级也召开座谈会。我班的主持人是那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班上的议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党群关系中间有堵墙等等。一个肃反中被斗的女同学，传给我一个字条：要求发言，我签上同意发言的意见，传给了主持人。主持人看后，置之不理。多少年，我给这位女同学写信，表示道歉。并说：当时主持人不让你发言，客观上起了保护你的作用。你如果发了言，可能会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她父亲是全国著名的右派，即《乌昼啼》的作者，《人民日报》的《什么话》一栏曾转载过他的所谓右派文章。她贴了一张大字报，与父亲彻底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她没有发言，就没有攻击肃反运动的罪名；她对她父亲的那种态度，就救了她。虽然与我同时分配，但没有戴帽子，算是躲过了这一关。但肃反被审查这段历史，可能在档案里有所记载。她的后半生活得够苦了，没有过过安宁的日子，老挨斗，老大年龄才同一个离婚的老头结婚，无子女，现已患上脑萎缩之病，近于瘫痪。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有人曾对我反映说：“那个‘主持人’三害’严重，我们不敢发言，也不想发言。”为此，在班整风领导小组开会时，我就直言不讳了。我本心是善意提点意见，让别人主持会议，也许座谈会的效果会好些，有利于整风运动的开展。料想不到，那个主持人生气地说：“要不，你来主持好啦！”我无言以对，后来就构成了我妄想篡夺班级整风运动领导权的罪状。

整风运动从上而下，都有了发展。但上午正常上课，下午搞运动的这个生活步调，显然

不适应了，于是有人就提出“停课搞运动”的口号。特别是，教育系具名八个党员的大字报，震动了全校。他们透露了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若干限制，整风运动的气氛更为紧张了。不少社团，包括我们《底层之声》都先后贴出支持八个党员“起义”的大字报。群众原来的疑虑，更加严重了。各高校之间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开始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传来信息，他们学校的林希翎，要来北师大演讲，并鼓动人们上街。我当时十分紧张，与一些社团的头头交换意见，一致决定：整风运动，主要是管自己学校的事。不同意各校串联，并提出组织人员，关上大门，阻止其它学校的学生进校的建议，也不同意上街搞游行示威之类的行动。多少年后，与我共同做出这个决策的人，还对我说这件事，并说：“咱们哪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当时那么紧张，咱们是从大局考虑的。”我摇摇头：“于事无补了，于事无补了！”

但是，北大的《接力棒》的传单，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进来了。因为，晚上与女朋友幽会，这次后来被批为“反党联盟会议”（当时称为各群众社团联系会议），并未参加，因为，事先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后来听说有同学从北大带回了《接力棒》，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地点在我们宿舍，我们参加的人还不少，全都是《底层之声》的人，我回宿舍时，正赶上散会，被一个同学截在楼梯口。这个同学，是我入学时的大班班长，曾住一个宿舍的上下床。后来分小班，我在一班，他在二班，接触少了，关系还不错，互有信任感。我们在楼梯的一个台阶上，他轻声严肃地对我说：“刚才开个会，听说党中央分裂了，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咱们都是共青团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我不明情况，我也表示了态：“那当然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拼命，我们也要保卫毛主席。”后来反右斗争时，他让我站出来，用这次谈话，为他辩护。我说：“现在我说话，有谁相信我。我都自身难保，还能保谁呢？”当时，形势严重，是不是应和党组织打个招呼呢？尽管我对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有看法，但我还是把他看成组织。问问他，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他们宿舍去找他，他不知深夜还在忙什么，未回。后来，我曾想，如果这次汇报上了，也许，我就戴不上帽子了；后来又想，第一张大字报，被选为《底层之声》的编委，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不会因为一次汇报，就能改变我的命运。他们认为，这次“反党联盟会议”，我能不参加吗？查来查去，最后公布的名单，没有我。其实，这个会也是十分自由的，谁都可以参加，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同学也参加了，甚至后来成为响当当的“左派”也参加了。我们当时绝没有任何神秘之感，帮助党整风，这是响应党的号召，光明正大的事。也绝不知道，这是“阳谋”。当时一个著名的“右派社团”——《群众论坛》，据说，就是我校一位党委副书记一手策划办起来的。她联系的对象，是我系的团总支宣传委员，一个预备党员。每天中午单线联系，他们秘密在校园中的小树林见面，这正是北太平庄铁狮子坟的所在地。确实是当时的秘密场所。这位预备党员，每天都要向党委副书记汇报，谁发言了，发言都是什么内容等等。后来，这位《群众论坛》的头头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审查。他可能受到那位党委副书记的保护，没有戴帽子，仅仅延长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分手时，我们还远远招手，以示告别。其实，保护了他，也就保护了那个党委副书记。如果当时再反“右派”，深入查下去，扩大战果，保证完成数字，难免不把她暴露出来。如果她真是《群众论坛》的后台，能不受到牵连吗？这难道是“阳谋”？在广大群众十分兴奋十分热情地帮助党整风的重要时刻，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能是“阳谋”吗？这是一场阴谋，我们这些天真的年青学生，上当了。至于这个“阳谋”，是出于谁的授意，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当然是不可得知了，也许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也许，当时我太幼稚、太年轻了，睡了一觉，什么都忘了。第二天，六月三日早晨，在饭桌上，那位所谓的“反党盟主”（即张海琛）给了我一张名单，我一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数，一共十八人。他对我说：“昨晚的会，你没参加。会上决定：今天去上访北京市委、团中央，弄清昨天《关于胡耀邦谈话》传单的真伪。会上还决定：《底层之声》的对外活动一般都由你出面”。我就没拒绝。回到我们宿舍，已经满屋的人，我一一询问，还

点名检查，一共十七人，物理系某某未到。我征求大家意见，不能等了，出校门时，我再到物理系看看。一打听，这家伙，在物理实验室搞实验呢。我叫他，他说今天离不开。多少年后，我和他在一个学校工作，曾问过此事。他淡淡地说：“去了，不过多一条罪状而已。”真是一个“看透派”，我想，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为什么他也钻进了那张大网呢？

连我共十八人，真是浩浩荡荡，也理直气壮。没有任何经费，汽车费、中餐，都自备，大家却十分轻松，高高兴兴，说说笑笑。

到了北京市委，一个中年人，把我们领到一个会议室。他说：“你们有什么事？”我说：“我们要见彭真同志，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他说：“彭真同志不在。”我说：“那就见刘仁同志吧。”他说：“刘仁同志也不在。”我问他，“您，您是？”他明白我的意思，回答说：“一处处长。”当时我不知处长是多大的官，但是，除了彭真、刘仁外，党中央的事儿，与我们一样，他也不会知道。我站起来，环视一周，大家的眼神，也明白地告诉了我，有的还摇摇头，我果断地说：“走！”

拐个弯，走不远，就是团中央。一进门，说明了来意。一个同志热情地说：“耀邦同志在家，罗毅同志也在。你们去吧。”他详细地告诉了胡耀邦的住址。走不多远，真找到了。是一个黑漆门洞，开门的是一个老头。我说：“我们是北师大的团干部，找耀邦同志汇报重要情况。”他说：“原来预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们先等等，我进去问问。”不一会儿，他领着一个年轻人出来，向我们说：“胡书记请你们进去咧。”那个年轻的，正好与我们其中一个人熟悉。他是1956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分配给耀邦同志担任秘书。他俩是中学同学，又都喜爱文学，虽然相差一年，却十分熟悉。大家进门不远，就发现耀邦同志、罗毅同志都站在会客厅前迎接我们呢。耀邦同志让我与他坐在同一沙发上。我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地汇报了北大《接力棒》的内容与我校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特别着重谈到党委书记的问题是运动受阻的原因。他侧耳倾听，由秘书记录。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他从不打断我的话，也不询问我什么。我谈完以后，他就站起来来回走着，他好像没有坐着说话的习惯，边走边谈。我忽然记起，他在全国学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也是如此。当他讲到：“有的人不得了罗，眼睛长在眉毛上面。”他在台上边说，边走，边比划，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背对着我走时，我才发现他穿的裤子，有好多印迹。我当时笑了，这么大的干部，还不修边幅，那像我们那位党委书记，总是衣冠楚楚的。他说话的速度，时缓时急。谈到中央分裂这个问题，他说：“中央的事儿，党中央会自行解决的，你们就不要过问了，好好地读你们的书吧。”耀邦同志并没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真伪。后来，有的写一九五七年的，也提到这事，并说这是当时蛊惑人心的谣言。我却看到了一些资料，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时，党内有不少人不理解，表示反对，甚至于连苏联的领导人，也反对，这似乎又不是空穴来风。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真伪。但是，耀邦同志的回答，还是客观的。避开了事件的真伪，而告之正确处理的方法。

谈到了北大的《接力棒》，他就谈到北大的整风运动，他说：“我特别去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回来，我就想，民主、自由这个东西，不能无边无际，总得有个框框。你们想想，人死了，也得有个棺材把你框起来吧，你只能在棺材里活动。死人，都如此；何况，活蹦乱跳的活人呢？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民主、绝对的自由！”听了这段话，我“咯噔”一下，难道我们错了。因此，回校后，从六月三日 to 六月八日，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静静地呆着。这段话，也成了我教育学生的武器。“六、四”时期，我常常在全系大会上反复地讲这段话。后来，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我这么多年之所以一直没出大格，就是牢牢记住了您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这段话，影响了一、二代人，其意义可谓深远啊！

谈到我校的整风运动，他说：“你们的党委书记，没有和我一起工作过，情况不了解，无法表态。如果你反映的情况，确实属实的话，应该严肃处理。”我不知道在我们宿舍广播

纪录稿时的那个同学，是如何广播的。后来，那个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从来没有同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这是造谣！”当时的纪录稿，我是上交了的，也从无人询问我这件事，在我签字的处理书上，没有有关这个事件的文字。多少年后，耀邦同志的这个回答，我记忆犹新，认为是十分客观的。

我当天返回学校时，正赶上开大会。党委书记亮相，看着他那苍白的脸，没有神采的眼色，却产生一种有点同情他的味道。平时，他道貌岸然，趾高气扬，这时，变得小心胆怯，委委琐琐的样子，让人惊诧啊！

从六月三日起，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团。我班的那个党支部组织委员，拉起一些人，组织了《真理报》。明眼人一看，《真理报》是针对《底层之声》的。如果说，前一段整风运动，是一边倒的话；现在开始，有不同声音了。当然，仅仅是观点的不同，其争论是和风细雨的，没有火药味儿。后来，落实政策时，为《底层之声》平反，势所必然了。因为，当时不少的档案里，都有“参加右派组织《底层之声》”的字样。定为右派的人，有“改正”之说，而那些未定为右派之人，却找不到落实政策的地方，其中不少人还戴过“漏网右派”的帽子，这就把《底层之声》定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当时落办主任对我说：“我看了你们《底层之声》的全部资料，没有一句是反党的。《底层之声》应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但是，有阻力。”阻力来自何方？后来才得知，来自《真理报》的负责人。他也参与了落实政策，他说：“《底层之声》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那我们《真理报》是什么组织呢？”当场就有人回答：“你们也是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嘛！”这个信息传到我这里，我就说：“如果非要给《真理报》定性的话，可以定为极‘左’派的群众组织嘛！”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它毕竟是历史！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正沉醉于整风运动的人们，当然不理解，“阳谋”之说，也就诞生了。当时人们的观点是：你鼓励别人参加整风运动，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抓右派，就是“言者有罪”了，这是搞“阴谋”。针对“阴谋说”，就有了“阳谋说”。

“阳谋说”的观点是：明明告诉你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批判的，你非要跳出来呢？全国五十万万的右派分子（据新的材料公布是317万有多），就成了这“阳谋”下的牺牲品。除了公开的反革命言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难以掌握的，似乎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最为明显。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不多也不尖锐；田汉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多而且常常是火辣辣的。田汉被保下来了，冯雪峰却被打成了右派。其理论，是有的人是好人说坏话；有的是坏人说坏话。这好坏人，是谁定的？领导定的，标准呢？只有天知道！当时，理论上也是混乱的。给党员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丑化党员；给基层党组织提意见，不论正确与否，就是反党。因为，整个党，就是由一个个基层组织起来的，如果把这些基层组织都反掉了，这个党还存在吗？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可到“文革”，这个理论又翻过来了。只要给党组织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造反行动，革命行动；而反对给党组织提意见，也不论事实如何，就是“老保”，要是领导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说有理，婆说也有理；不知那些制造蛊惑人心的理论的理论家，是公，还是婆？当时民间流传着“右派是最早的造反派”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也就为后来右派的改正，奠下了基础。

沉寂了相当时间的党组织，又开始活跃了，团支部又恢复组织生活了。

对“六、八社论”，提出质疑的大字报出来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有不少人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有人让我签字，我摇摇头，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我不是不同意它的观点，耀邦同志的讲话还言犹在耳，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岂能发表不同的见解？这是党中央的声音，能怀疑吗？

在团支部大会上，更活跃。当时，有一个团员说：“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我认为，

在整风中，积极发言的，积极活动的，应该是左派；一言不发的，阻碍整风的，才是右派。”他的发言，尽管对我有利，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是我介绍的刚入团的新团员，他要有事，我也沾边。我又为他的发言感到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胡说八道，真不识相。当时的团支部已经拉开了阵势，一左一右，泾渭分明。有的人，公开亮明了“中间派”的旗帜。这时，《底层之声》油印报，还继续办着。我就写了《是非篇》交给油印报组长，他说：“你早应该写文章了，马上就登。”虽名为《是非篇》，骨子里是反对那场运动，但采取的似是而非的手段。含含糊糊，只是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一篇是整风高潮中，发表在《师大教学》上的《也谈“师大无风无雨”》；一篇是《是非篇》。前者，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后者，则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正反映了我的心态，是与情势的发展，紧紧相连的。

反右派斗争的声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处于危险边缘了，反右的鞭子将抽到我身上了。在一次团支部大会上，我痛哭流涕地检查：“社会上的右派猖狂地向党进攻，我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反击，反而走到了反面，跟着右派跑了，犯了严重错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泪流满面，旁座的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块手绢，我一面擦，一面哇哇地哭着。当时，我的检查是真诚的，确实认为自己错了，自己的检查够深刻了。但是，主持人却严肃地说：“罗宗义同志的初步检查，我们欢迎。但是，很不深刻，希望继续反省，深刻检查！”当时，我大吃一惊。如此检查，还不深刻，再深刻，非得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自知自己没有丝毫反党的意念。我在整风中，曾对我的女朋友说过：“这次运动后，该排上我入党了。”虽然，我对校党委，有某些怀疑。可我对北京市委、团中央、党中央，是十分信赖的，忠心耿耿的。当时，如果让我用鲜血来保卫毛主席，也会是毫不犹豫的。

不久，全校又开了一次全校团员大会。这次大会不像传达统购统销文件、揭露高、饶反党集团文件那样，在大礼堂关门、关窗，还有不少党员看管门窗。而是，都坐在教室听高音喇叭，不是团员的在操场也听得十分清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反右斗争动员会。会上，宣布开除我班那个“反党盟主”的团籍，宣布撤销若干团干部的名单，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听见了不少熟悉的名字。整风中，比较活跃的，都不能幸免。

从此，就不通知我参加团支部大会了。可我的女朋友仍然参加。有一天，我们约会时，她告诉我团支部开会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内容。不巧，碰见我系的一个助教，当时，还说了几句话。这个助教有意无意地告诉了他的女朋友，而那位正好是我班的一个团员，出于组织观念，汇报给团支部，结果，我的女朋友却以“为右派通风报信”的罪名，被留团察看。好在，她只是《底层之声》的一位普通成员，既无言行，又无文章。当时，她也想表现表现，但无啥可写，曾让我代她写一篇。我太忙，无暇顾及，好受她的埋怨，似乎我只顾自己不关心她。如果我真给她代写一篇。以她的名义发表，很可能她就带上帽子了，多悬啊！可见，当时参加整风的人们，都想表现积极些，那知道有一张大网正张着咧！

不久，就召开了全系批判大会。只批斗了三个人：“反党盟主”、“狗头军师”、“纵火大盗”。“纵火大盗”是我的别名，后来听说是某某取的。九十年代在一个小型的聚餐会上，我曾问过他。他矢口否认：“我没有那个水平。我只不过是倒霉蛋中的幸运儿而已。后来，我又是幸运儿中的倒霉蛋！”这是后话。当时专题批判我的人，也是《底层之声》成员，在整风中，我俩曾畅谈了一个晚上。套用外交词语来说，无论对学校形势还是班级形势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是由于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观点，选择了她。我仔细听了她的发言，除了我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公共活动和批判语言，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是我们两人谈话的细节，她也只字未露。后来，一九五七年“八、一”建军节，请杨成武做报告，由她负责看管我，坐在一个沙发上。休息时，我仍坐着不动，她主动说：“你到礼堂去看看吧。”因为，杨成武是传奇的英雄人物，当然想看看，她不怕我去谋害，可见对我还是信任的，我感激。几十年后再见面时，相处的十分融洽，也许还是保留了这份同学的真情。

好像第二天，就是全校批判大会。我一进大礼堂，就看到了巨幅画：一只巨手，抓住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批斗时，还算人道，前台摆上三套桌椅，我们坐着记录。批判会还惊动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引来了不少记者。不知是谁给大会主持人递上一张纸条，说是要看看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嘴脸。我不好意思走楼梯口上台，而是从台下爬上去又爬下来的。据当时在台上作记录，后来也划为右派的同学说：“你当时爬上爬下的动作，十分可笑。”我说：“你还笑咧！我当时的心情，你知道吗？想死的心，都有。”她哑口无言。

我们三个人上台示众时，下面有人喊：“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他们的嘴脸！”我刚抬起头，新闻记者真会抢镜头，“卡”、“卡”两声，我的尊容就拍下来了。当时，我的心凉了，完全绝望了，我被划为右派了，而且，新闻纪录片一播，全国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江东父老、老师同学呢？以后，台上说什么，我也不记录，脑里一片空白，一散会，顺着人群奔了出去，一出礼堂大门，回头一看，无人跟踪，我就朝学校大门跑去。其实，有人跟着我，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刚冲出校门，有人截住了我，我一看，是她！她拉住我：“往哪去？”我一听，才清醒过来。我冲出来，似乎没有什么目的，也许去当汽车下的冤魂！她把我拉到楼道里，因为正是开饭时间，整个楼无人。她哭了，我也哭了。她说：“开会时，我一直在台下，散会时，你脸色都变了，我就跟出去了。”我说：“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去干啥，也许撞上一辆汽车就算了。”她哽哽咽咽地说：“哪能呢，哪能呢，现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一死，就更麻烦了。”我无话可说，绝望

批判《底层之声》后不久，又批判学校第二个大社团《苦药》。我奉命参加会议。对《苦药》点名和上台示众的共十一人。当然，我一言不发，心理却有一丝高兴，毕竟已经有十三人跟我做伴。揪的人越多，我越清闲。令我交待问题，检查自己，揭发别人。可是既不检查自己，也不揭发别人，经常交不了差。当然，不能让我如此混下去，对我“打态度”的小斗争会，也就召开了。

主持会议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先由大家批判一通：什么“态度不老实”、“消极反抗”等等。后来，她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你反党的思想根源？”我从来没想过，一下子愣住了。后想一想，按照我已经熟悉的理论，讲了起来：“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旧社会生活了十三年，留恋旧社会。”也许我当时讲得很激动，也许他们曾经分析过我的情况，我如此分析，他们不以为然。从她笑眯眯的表情中，我似乎看到了同窗四年的友情。我那个已经到了零下的心，似乎温暖了许多。

后来，《教师报》的记者采访了不少人，其中也有我。发表时，题为《他们为什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其中广大段，说到我，说我因没有入了党，而对党产生不满情绪而发展成反党。其实，这也是“三害”之一——主观主义的判断。据我所知，比我表现好的一位同学，刚由党支部大会讨论，会上还发生了争议，那我就更排不上号了，那能有什么不满？还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些，也许能解决入党问题。至于“家庭问题”，我家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按富裕中农待遇。即使如我所说，是“剥削阶级家庭”，入团时，已彻底划清了界限，中学两年半，大学三年，一直毫无经济来往，全靠助学金养活我。谈不上什么留恋不留恋？我不过是找一个能够过关的说法而已。

找我个别谈话的人，也开始频繁了，什么学生科长，团委书记等等。有一个找我谈话的同学，是比我低两级的调干生，党员同学。我记得肃反时，他就是学生党支部的一个头头。反右斗争，他也可能还是一个什么头头。据说，他后来留校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还退党了。他问我的并不是什么整风中的问题，而是问我中学表现如何？我开始回答：“应该说，表现不错，不然，为什么在班里，我是第二个人团的？”后一想，说这些，有什么用，马上改口说：“那时候积极，今天看来，都是装出来的。”他对我的回答，并未表示什么看法。我想不到，四十多年后，我见到了当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学同学，他问我：“你

们学校去调查你。我开始以为是要发展你入党，来了解情况，后一想，不像，就知一九五七年，你着了。…‘着了’是四川方言，是“摊事”的意思。他说：“我说了你一大堆的好话，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说：“也许管用，中学表现好，处分就轻些吧。”当时，《底层之声》被点名的，共三人，那两人都被劳动教养了。而我，开始为“留校考察两年”，后才改为“分配工作，考察两年”。最后，我说：“我还得谢谢你呢！”

对我的调查，不仅是中学同学，还去我家乡去调查。我在毕业前夕，肯定要花钱，给家写了封信，要点钱。进大学后，我与家里，素无经济来往，突然寄来当时也算巨款的五十元，肯定会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因为，当时报载，中国人大的林希翎，曾受到民革中央谭惕吾的经济资助，称为“右派活动经费”。后来，我才得知，为了这五十元，北师大曾派专人去调查。这五十元，对当时农村来说，也是大数字。正巧，我一个叔伯伯哥参加抗美援朝后，复员时发了不少复员费，家里考虑，我毕业后即有工资，由我来偿还，就借了五十元给我寄来。这钱与“右派活动经费”丝毫没有关联，当时也无人询问我，我也就不知其幕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大概是八、九月份，我参加了我一生的最后一次团支部大会。这次大会程序十分简单，团支部组织委员念每个人的处分决定，然后，大家举手通过。全班三十多人，团员近三十，被开除的十四人，留团察看两人，受警告、记过处分的，还有若干人。据当时统计，全年级二百多人，受党团处分的，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划了五十二个“右派”，占全年级四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内部掌握的百分之五。当时有一种解释，从全校讲，也许到不了百分之五，从全国来讲，也许到不了百分之零点一咧！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啊！这次大会，是自己举手开除自己的团籍，被处分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发言权，只让宰割。从此，我们边劳动，边等待处分。十一月份，才把我们分配到各地。我们凄然地离开了这令人伤心的学校。

快近五十年来回忆那“不平常的春天”发生之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潘仲骞

1957年11月1日，我在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上签字时，抄下这份档案的全文：

潘平时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其反动立场也始终未斩断联系，表面靠拢组织，伪装进步，但一直背着历史包袱，怀疑党不信任自己。

整风初期，他认为党委不敢大鸣大放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整风，认为大字报推动了整风。参与主持“群众论坛”，利用论坛向党进攻，但又因自己有历史污点，不敢公开出头露面，但社内的反党活动他还是支持的。他还积极写稿对党进行诬蔑打击，写了《想到就写》、《学府与官府》、《不平之鸣》以及写第二次肃反论坛情况的报导。他还想写“群众等于落后，党员等于先进”的文章，后未写成。

他还反对汇报制度，诬蔑其为“偏听偏信”、“一鳞半爪”、“神秘可怕”。反对“政治第一”，企图在毕业分配上对历史有问题的人能“一视同仁”。

对黄药眠、钟敬文、“底层”等反动言论表示同意。

反右斗争开始后，参加反动社团“底层之声”写了一篇《“岂不令人深思一文剖析”，实质上起了掩盖“底层”反动性质的作用。

《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认为要“收”了，对反右派斗争抱消极态度。

处理意见：根据以上材料，潘是一般右派分子，考查一年半，给予分配工作。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委员会

审查总支书记 陈灿

1957年10月30日

同意总支意见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审查人：张斧（盖章）

10月31日

同意 副校长：何锡麟（盖章）

（盖校章）

10月31日

这个结论，都是从我的毕业自我鉴定中按其需要摘录拼凑而成的。而定罪的过程，先要经过鉴定小组。鉴定小组就是平时的学习小组，共十多个同学。同宿舍的8个男同学，再加几个女同学，为我开了三次批判会。第一、二两次小组会，我承认自己有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上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同学的批判也都就事论事，没有乱扣大帽子，有几位同学干脆没吱声。第三次小组会，班级领导从别组调来几个“左派”同学来“加强火力”，他们就无限上纲上线了，硬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帽子。我怕再不承认，还要开大会批斗，要留校劳动改造。就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下去必然会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鉴定小组会大功告成了，而我却从此开始了一辈子无穷无尽的悲惨命运！

对这个结论，我在1957年11月1日已经签字同意，现在也不想逐条加以辩解，下面仅就如何对待有政历问题的知识青年、对右派定罪的法理依据和处理办法进行反思。

(一)

《结论和处理意见》一开始就写

“潘平时有极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其反动立场也始终未斩断联系，表面靠拢组织，伪装进步，但一直背着历史包袱，怀疑党不信任自己。”

这里所说“与其反动立场也始终未斩断联系”，指的是我1949年暑假在瑞安中学读书时的一段政历。

我出身于瑞安湖岭山区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桂峰乡是浙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根据地。我在六科小学读书时，就见过红军干部来学校与老师夜谈，我也从旁听到了一些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1947年，我考入瑞安中学初中部，结识了一位同乡高中同学。他常介绍一些进步小说给我看，如巴金的《灭亡》、《新生》、《寒夜》，苏联翻译小说《母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瑞安解放前夕，我念初三，他秘密地给我看地下党的油印宣传品，如《新民主主义论》等，还叫我帮他散发革命传单，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1949年6月，瑞安解放后，他担任瑞安学联主席，叫我也参加学联工作。同年7月，瑞安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于8月被吸收为团员。这年寒假，我留校工作，我的班主任贾力政老师是中共派驻瑞安中学的党代表，他介绍我入党，并于1950年1月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升入高中后，我先后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

可是，我的同乡高中同学，他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接受了托派思想，而且还影响了我。1949年暑假我在瑞安学联工作时，他对我说“托派和共产党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但托派的路线更正确，是真理的代表”。他还给我看一小册油印的《叛逆者》，要我看后谈谈自己的读书心得。我在他安排下共参加两次小组讨论：头一次是我和他，还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中共党员；第二次是一位威信很高的高中老师。当时，我还是个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对共产党和托派都缺乏基本的认识。我萌发一点点政治意识，也只是感受到当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思想上要求进步，并参加了学联工作。他们对我传播托派思想时，我还以为是与共产党一样革命的呢。后来才知道我参加的小组讨论就是托派外围组织“读书会”，而托派是共产党坚决镇压的“反革命组织”。

1951年温州开展反托运动，迫于形势，我和那位同乡高中同学主动向瑞安城区党委坦白交待。此后，我仍在瑞安高中学习，并继续向瑞安公安局交待问题。1952年上半年我高中毕业，接受组织处理：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准予毕业并报考大学。

1952年9月，我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运动，我被“传讯”到公安部办的集训班再次接受审查。集训班约四十多人，有大学教师，报社记者、编辑，大多数是北京、天津的高校学生。学习方式主要是听报告和分组讨论。同时由组织再一次查清政历问题。次年5月，对我的问题作了结论：参加托派外围组织读书会，属一般政历问题，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送回北师大中文系继续学习。

我回到北师大后，被编入五三年秋入学的中文系一年级丙班。在大学四年来，我发奋学习，争取进步，学习成绩比较突出。我还担任心理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课代表。大三时被评为全系十名各科成绩全优学生之一，教育实习时被评为优秀实习生。整风反右前，据说系里还打算留我为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助教。

谁知我的这段政历——经过多次审查，最后由公安部作了结论和处理的政历，事过四年之后，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竟又被抓出来作为补划右派的主要根据！

托洛茨基派本是苏共党的思想观点不同的一个政治派别，后被斯大林作为反革命组织残暴镇压。1991年苏联解体后，已为托洛茨基派公开平反，但中国共产党却只在内部不再称托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毛著注释中也删去诬陷之词，也算是在道义上为托派平反了。这

当然是后话。但就是在 1957 年，按当时党对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政策，北师大中文系和学校党组织对我的政历问题的处理也是完全错误的。

《结论》凭空断定我“与其反动立场始终未斩断联系”。1949 年暑假我参加托派外围组织读书会时，还是个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少年，有什么事实证明我是站在反动立场的？从那以后，我又有哪些事实证明我“与其反动立场未斩断联系”？在大学四年来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可他们概不承认，还说我靠拢组织是“表面”的，我表现进步是“伪装”的。总之，有了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按这样荒谬的逻辑，我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与其反动立场”挂上勾，无限上纲上线，顺理成章地罗织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罪名。

按党的政策，对有政历问题的人要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可是当时北师大的党组织却用固定观点看问题，对有政历问题的人抱歧视态度。我上大一时，适逢 1953 年第一次全国普选，我深感作为共和国公民的骄傲，写了一首题为《十八岁》的小诗，登在师大诗社办的《诗刊》上。诗社负责人许有为同学认为是一首好诗，决定在一次诗社活动时讨论这首诗，通知都发出去了。班级党支部知道后对许有为说：“潘是托派，不能讨论他的诗为他造威信。”于是许有为只得临时把诗社活动改为到北海公园游园。这件事我本不知道，是三年后的一次整风鸣放会上，许有为同学作为党有宗派主义的例证提出来的。我听了也很气愤，就在墙报上写了《不平之鸣》短文，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准革命”。这篇小杂文也就成了我“向党进攻”、“对党进行诬蔑打击”的罪证了。

这不是某些党员干部的责任，这是极左路线的流毒。党的政策虽然明文规定对有政历问题的人要看现在的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要看本人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一贯的做法却是紧抓政历问题和家庭出身不放，作为整人的有力武器。这种做法不知断送了多少热血青年的青春和前途！

在北师大肃反和反右运动中，由于有政历问题或历史不清而受到整肃的同学不少。有一位同学年龄较大，出身不好，经历较复杂，怀疑他有严重问题，在肃反运动中把他揪出来审查、批斗，他被逼得跳了楼，却没摔死，摔伤了脊椎骨落下终身残疾。而政治问题却查无实据。还有一位印尼归国华侨学生，他在印尼是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出于爱国热情考入北师大深造，在校努力学习，积极上进，但党组织无法查清他的历史，按当时的极左观点，他这样一心一意做功课就是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白专道路”。在毕业鉴定时把他补划为右派。有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把他们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只言片语与其家庭出身联系起来，扣上“阶级立场问题”的大帽子……

以上仅仅举出两个例子，其实这种做法是极为普遍的。北京的高等学府尚且为此，全国各地的基层单位，更是“左”得厉害了。可见极左路线的危害是极为深重的。难道这还不值得当政者反思和吸取教训吗？

（二）

下面再看《结论》是怎样罗织我的“右派”罪名的。

（1）有言行作依据的：如“参与主持‘群众论坛’；“他还积极写稿对党进行诬蔑打击”；“写第二次肃反论坛情况的报导”；……但《结论》只列出篇名：《想到就写》、《学府与官府》、《不平之鸣》，没有原稿展示原文内容，怎么就凭空断定是“对党进行诬蔑打击”呢？

《想到就写》已记不清是什么内容了。《学府与官府》是批评北师大学术空气淡薄而官气却是十足。《不平之鸣》前面已说过，这些短文是贴在本班墙报上的，只有第二次肃反论坛情况报导是登在《师大教学》校刊上的。因为那次群众论坛是我作记录，会后《师大教学》总编叫我把记录交给他，他摘录后就作为我写的报导发表了。当时我也没有看到这篇报导，

是大前年我的同学到北师大查找五七年的资料才发现，并复印给我的。现也附在后面，算是确凿的“罪证”了。

(2) 把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掐头去尾，然后扣上“反对……”的大帽子：例如我在毕业自我鉴定中回忆自己的几次发言，写的清清楚楚。1957年6月5日，座谈会上有在肃反时被斗错了的同学，诉说他的冤情，我就这个话题批评某些班干部往往听信某些不实的汇报，一鳞半爪，偏听偏信，神秘可怕，这是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结论》略去我发言的具体环境，歪曲我的原意，扣上“反对汇报制度”的罪名。

又如一次座谈会，谈到毕业分配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有几位同学访问了几位教授，说上届中文系毕业分配，有的党员毕业生分到高校当助教，都快一年了还开不了课。这是只重“德”不重“才”，不利于教育事业。我接着说今年毕业分配要扩大民主，平等待人。《结论》用同样的手段给我扣上“反对政治第一”，还无中生有地联系我的政治问题，栽上“企图在毕业分配上对历史有问题的人一视同仁”的罪名。

(3) 既没有言论，也没有写出文章，只是我的内心思想活动，也被拼凑到《结论》中作为“罪证”。请看：

“他还想写‘群众等于落后，党员等于先进’的文章，后未写成。”

“对黄药眠、钟敬文、‘底层’等反动言论表示同意。”

既然“未写成”文章，怎么可以作为罪证？

我内心同情黄药眠、钟敬文老师，在毕业自我鉴定中写道：“黄药眠、钟敬文老师说自己有职无权，我很同情，认为这样有才能的学者未能发挥其积极性，……”我只是心里同情，也没有表示出来，怎么可以作为罪证？

中国古代有腹诽（同腹非）之法，“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见《史记·平准书》）没想到北师大的当权者竟继承了封建专制王朝的严刑峻法！不过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论死，只戴帽，总算与时俱进，宽大文明得多了！

(4) 所谓“参加反动社团‘底层之声’……”：在北师大整风鸣放期间，中文系四年级共有三个最有影响力的社团组织：“底层之声”、“苦药社”和“群众论坛”。

先说“群众论坛”。这是5月25日以“中文系一群”的名义宣布成立的。我是李镜春、徐美英邀我参加的，共有十多个同学，除我外几乎都是党团员。共举行六次论坛。5月25日第一次论题是“何穆事件”；5月26日和27日，第二、三次是“肃反论坛”；第四次论坛我没有参加，已记不得是什么内容了；第五次论坛是6月3日举行的，是要求党委进一步发动整风并妥善安排考试问题，实现整风学习两不误；第六次论坛是6月12日举行的，北师大6月11日已转入反右斗争，这次论坛的内容也不记得了。每次论坛都是先拟定论题，确定时间、地点，用海报形式贴出，到时就会有许多人参加，甚至人山人海，大教室都挤不下。我们事先也没有约人讲话，都是自发登台，即席发言，除学生外，还有教师职工。这确实是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新局面的绝好方式。可惜这棵民主之花刚刚开放就被暴风雨摧残了！在反右运动中，参加论坛的人多半被打成右派，我有言有行，当然难逃一劫。可“群众论坛”却没有被定性为“反动社团”，其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再说“底层之声”。在北师大鸣放期间，“底层之声”的大字报是最引人注目的，而且天天有新内容，都是从底层发出的要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当时我看了叶底层之声”社论《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非常赞赏它把整风鸣放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的认识。要求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的更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人民权利与法律的问题，党的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其它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社论要求把鸣放

提高到这样的高度，难怪“底层之声”被定性为“反动社团”，而社论的作者被打成“极右分子”了。

我参加“底层之声”的活动是在6月11日全校转人反右斗争之后。那天晚上，六班党员张明道同学（底层成员）找我与合写了《“岂不令人深思”一文剖析》，以“评论组”名义贴出大字报。该文在当时是被当权者认为“反击右派言论”的，但因为它“实质上起了掩盖底层反动性质的作用”，也就成为我的右派罪状。这是什么逻辑？只要定你为右派，对的也是错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就这样被北师大党组织定为“右派”。

以思想言论或文字定罪，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蓄意制造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阳谋”、“引蛇出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阳谋”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未必都很了解了。最近，我翻阅有关资料，才知道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是早有预谋的。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吸取教训，决心要把中国潜在异己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指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事件），蚂蚁也缩回去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可见早在整风反右之前，毛泽东已经心中有数，预计在全国抓出百万牛鬼蛇神。

同年4月，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说：“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土地改革、镇压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和肃反等政治运动，对整风运动都顾虑重重，不敢鸣放。于是毛泽东又安抚又引诱。同年3月18日他在山东济南的讲话中说：“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的内部矛盾。”同年4月11日，他还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上海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来位教授请进中南海，对他们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你们有甚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同年4月30日，毛泽东又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还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同年四月，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还说：“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唱对台戏。”这是对外故意放出空气，让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大胆出洞。

经过这样反复安抚、引诱，许多大知识分子也参加到青年学生的鸣放队伍中来了。报纸上也登了不少教授、专家、学者、名流的鸣放文章。但这是有意这样做的。同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文中说：“之所以允许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所以，从5月15日开始，党内高级干部都已知道整风鸣放要转入反右运动了，可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却还被蒙在鼓里。

全国的反右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就是《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接着，“工人阶级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全国掀起围剿右派的歼灭战。这时，人们才知道受骗了，上当了，但为时已晚了。

反右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方基层的反右运动比首都高校要晚好几个月。我是在北师大接受右派处理的，于同年11月15日被分配到吉林省农安县第一中学。这里的整风反右

还刚刚开始，学校党支部书记把刚从高校分配来的几个“右派分子”找来开会，说“你们是经历过运动的，知道什么是香花、毒草。在鸣放阶段，对错误言论，你们不要批判，让他们放个够。到了反击、批判的时候，你们再说话。这也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于是，我又观看了一场“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滑稽剧。农安一中在五十多名教师中抓出7名右派分子。

从上面所说“阳谋”的具体动作过程，可见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蓄意制造的文字狱。为什么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呢？

从人数讲是历史上最多的。我们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共221人，定为右派的50多名，“底层之声”和“苦药社”被定性为“反动社团”，所有成员都定为右派，连没有参加活动只给“苦药社”起个名的也不肯放过。反右运动结束后，还通过毕业鉴定查漏，补划了几名右派。不戴右派帽子在党团组织内受了处分的还有70多名。这届毕业生真是“全烂掉了”！

就全国而言，反右运动的档案尚未解密，还不知道全国的右派人数。通常说是552877人。实际上决不止这个数。按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一书的统计，大约有一百万，至少七、八十万“右派分子”，还有所谓“中右分子”，“内控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都不归入“右派”一类的，没有计算在内。但他们也是在反右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如果再加上五八年“补课”被定罪的“右派”，包括所有受株连的右派亲属，殃及人数就是一百万以上了！（据最新解密的材料公布是3178470人为原来55万的6倍）。

再从后果来看，反右运动的影响是最广泛、最深远的。中国历代的文字狱数清朝最多，从个案来看甚至有株连九族的，但其震撼力远没有反右运动巨大和久远。上百万身上不穿囚衣，脸上没刺金字的“犯人”，被流放、发配到全国各地，城市农村、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各行各业，都有这些“反面教员”在接受群众监督和改造，这是最有威力的永远的警示：谁还敢说话？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就从人民队伍中被开除出去入了“另册”，与“地、富、反、坏”一类，成为“五类分子”，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学生右派的处理有考察期限，但实际上所在单位的领导并没有都按期给予摘帽（没有上面的命令，谁敢给右派摘帽？）。这考察期限只是一种假定，实质上是“无期”，随意性极大。就是摘了帽也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当了右派，就一辈子成了贱民，甚至还累及儿子和孙子。右派的后代，在升学、就业、参军、提薪、评职称甚至婚姻方面受歧视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反右运动的影响就不止一代而是几代了。

反右运动之后，也确实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效果，那就是十亿神州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中国人只能“做驯服的工具”。这是中国历代的文字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仅用“阳谋”制造百万人的文字狱一项伟大政绩，就可令古今中外的帝王甘拜下风。

反右运动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这场反人性的政治斗争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形成的传统道德和人伦关系。（这种破坏到了十年“文革”，则越演越烈，后患无穷！）在反右派斗争中，无论是批斗已“出洞”的右派还是深挖隐藏的小右派，都是对每个人的人格考验。敢于面对事实不肯说谎，挺身而为蒙冤的右派仗义执言的人也不少；可是他们的结果都是自己也成了右派，甚至还招来牢狱之灾。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出现了儿女揭发父母，学生批斗老师，夫妻反目，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为虎作伥，……这一系列违背做人的基本道理的丑事。每个人都难免有人性的弱点，为了自保，违心地去批斗别人，情有可原，最可恨的是残酷的政治运动撕裂了人间的真情。此后形成的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能真诚相待的人际关系，人人只顾自己不管社会，毫无公德的社会风气，这都是反右运动的后遗症。

所以我说反右运动是蓄意制造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三)

再看对右派的“处理意见”。

当时对当年高校毕业学生“右派”的处理，除了个别送劳教或留校考察外，一般都是戴上“右派”帽子，分配工作，考查一年或几年，在考查期间不发工资，只给生活费，每人每月25元左右。毕业文凭也扣留在学校，“右派”摘帽后才有资格到学校领取。

有人认为这样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了。从中国历史来看，比秦始皇坑儒，比文字狱株连九族，确实文明、宽容多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将无罪之人，说成“有罪”，弄得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何宽大之有？对社会上划“右派”的人不说了，就是对高校“右派”学生的处理也有违反人性的专横野蛮的做法。分配到边疆山区农村工作，在本单位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这是最轻的处罚。还有押赴青海、甘肃劳动改造的，更有甚者，我班的辛桂彬同学更被逮捕法办，被判十年徒刑！刑满还要管制三年。请看1957年8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58）反字第778号所列罪状：“……1957年加入师大反动社团‘底层之声’，积极采访，编辑等反革命活动，并在群众中散布‘肃反搞糟了’、‘反右派是小题大做’等反动言论，……借党整风之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款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这份判决书中，有什么具体事实证明他犯了反革命罪而且要判十年重刑的根据吗？没有。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受尽非人待遇，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伙食很差还吃不饱，劳动时间长、强度大。60年在团河农场劳动时得了胃穿孔，差一点送了命。1967年12月24日刑满。本应释放，但他出了监狱仍被遣送清河农场茶甸分场“就业”。说是“就业”，仍是劳改。就是回到家乡广西桂林，仍按“黑五类”对待，不能安排工作。他为了生活干过泥水小工，拉板车，扛包卸煤，每天工资一元三角六分人民币。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他前后受到22年的专政磨难，如果说前十年是“依法”判刑，那刑满后十二年的劳改、管制，又是根据什么法律？这还有人权和法制吗？

高校学生中的“右派”被判刑、劳改的还是少数，但就全国而言，专为“右派”等政治犯而设的劳改场可不少。著名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从五七年十月开始，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到六一年十月上级决定遣返“右派”犯人时，幸存者已不到一半了！由此可见，对“右派”的处理也充满着野蛮、残忍和血腥。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而把右派分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则是从思想上清除异见，是虐杀人的灵魂的更为残忍的刑罚。说是“一个不杀，一个不关”的“仁政”，“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要求右派“在工作中戴罪立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说的那么仁慈宽大啊，可实际上是把右派分子发配到全国各地，或交给原单位，由群众监督、改造。这是以整个社会构成无形无边的牢笼，虽没有高墙、铁窗，但右派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千万只眼睛在盯着，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单位领导具有处理右派的无上权力。你如果稍有差错，或被认为“不老实”，看不顺眼，领导就有权再给你戴上“右派”帽子（所谓“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或者罚你劳役（如中小学教师去养猪牧牛，大学教授去扫厕所搞卫生），甚至把你下放到农村、山区穷乡僻壤，甚至把你送去“劳教”、“劳改”、“判刑”，而这一切都是不需要什么理由和组织手续、法律根据的。

人，生来就有思想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丧失独立自主的人格，乃是人生最大悲哀。群众监督、改造，是以“群众专政”的权威，迫使右派丧失人的尊严，丧失独立思考的精神，改造成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

在这样强制改造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退化、分化和变质。少数既得利益者成了权势的应声虫、吹鼓手，甚至充当整人的“文化棍子”；多数人则保有善良的人性和良心，视政治为畏途，退避三舍，保持缄默；是作家的封笔不写或干脆改行；研究社会科学的嘱咐

儿子远离政治；……这说明群众监督、改造具有无比的威力，已收到预期的效果。君不见，从五七年以来，还能保持独立人格，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名利所诱，始终坚持真理，敢说真话，敢顶逆风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有人戏谑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缺钙，脊梁骨都弯得直不起来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年之后，还出现这样空前的大灾难呢？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还没有保障。1954年新中国通过了第一部宪法。第87条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实际上不仅不付诸实行，而且还被公然践踏。一纸空文而已。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仍在全国到处肆虐。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师大尚且如此，地方的基层单位就更是无法无天了。

右派分子从定性戴帽，组织处理，服刑改造，摘帽“归队”，都是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件的规定作出处理的。

我被补划为“右派”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的：先是鉴定小组会的批斗，逼我低头认罪，然后逐级上报：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定案，再上报校党委同意，最后是副校长何锡麟同意，并盖上校印和私章。这逐级上报审批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一所大学的党组织有什么权力可以代替执法机构给老师、学生定罪呢？中国古代的文字狱还经过刑部审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公布了宪法的新中国，竟还发生以党代法、公然践踏宪法的违法行为，岂不令人深思？

时隔二十二年之后的1978年冬，全国为“右派”纠错改正，总数为54万多名，占总数的99%以上。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承认“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都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全国知名的大右派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是不能平反的，可是后来传出消息说，中央已承认“章罗同盟”并不存在。可惜章罗他们已经听不到了。

我是1979年春才接到“改正”通知的。我有了这张通知才批给因私出国护照，我才能到意大利定居，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我们今天反思反右运动，就是要永远牢记这段荒诞而惨痛的历史，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历史是最公正的，不容篡改，更不容抹煞。尤其是这段用血泪写成的历史，将永不褪色！

我们要从这血泪史中吸取教训，那就是“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权利，真正按宪法规定给人民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要树立宪法权威，公正立法，司法独立，执法严明。彻底废除以思想言论人罪的文字狱。废止各级党政首长干预司法独立。总之，只有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才能避免悲剧重演，中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列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

意大利 罗马

2006年1月3日

右派咏叹调（组诗）

潘仲骞

一、“阳谋”——引蛇出洞

神州天地暗，反右史开篇。
“右海”掀狂浪，秦坑冒黑烟。
“阳谋”当诱饵，鸣放出真言。
言者皆“无罪”，人人信更坚。
“蛇神”刚出洞，铁手尽围歼。

二、戴帽——精神枷锁

头戴“紧箍帽”，何须坐牢监？
惩人先夺志，驯马必扬鞭。
大众来监督，身心似火煎。
精神枷锁重，唯有泪涟涟。

三、劳改

改造惟劳动，年年苦熬煎。
冬寒晨运粪，夏热午耘田。
永日陪牛马，通宵伴鼠眠。
青春悲逝水，白发愁中添。

四、摘帽

摘帽空欢喜，仍和“反坏”连。
提薪常最后，运动总当先。
“翘尾”招人妒，低眉暗自怜。
心存千古恨，郁郁度余年。

五、世道千般怪

世道千般怪，无人敢直言。
儒冠如粪土，敝履值千钱。
外行充博士，奴才作圣贤。
一人能得道，鸡犬可升天。
举酒浇忧愤，模糊辨丑妍。

六、神坛上的祭牲

“文革”风云起，神州大厦倾。
黄钟遭毁弃，瓦釜似雷鸣。
世纪文明劫，中华左道兴。
神坛需血祭，“右派”作牺牲。

（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整肃异己（走资派），夺回“旁落”的大权，但实质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极端残暴，毫无理性的野蛮运动，右派分子，无论摘帽与否，一律成为这无比神圣和恐怖的神坛的祭牲。

七、自杀就是“叛徒”

不堪受辱毋宁死，自杀横加“叛徒”名。
狂狷介之操日月，魂归地府意难平。

八、狱中思亲

绝塞思亲血泪斑，千回园月狱中看。
年年野草抽新绿，心似冰河彻骨寒。

九、意人的玉照

姑娘玉照贴胸藏，泪水沾濡汗水浆。
廿载荒原音信绝，天涯何处觅红妆！

十、层层荒冢

新疆劳改杳无期，血泪斑斑染布衣。
多少先驱身殉难，层层荒冢草萋萋。

十一、临终的嘱咐

客死他乡恨不平，青春理想葬“秦坑”。
临终但愿春闺梦，永在花丛携手行。

十二、漏底棺

大漠浓云暗雪山，囚窗恰对鬼门关。
新坟旧塚层层迭，惟恐身装漏底棺”。

（注）（1）漏底棺：即无底空棺材，某劳改场，犯人死得太多，饿死、冻死、累死、病死，刑讯打死，自杀吊死……多得来不及打制棺材，就特制一口无底空棺，把死人放在板车上，罩上空棺，运往乱葬坑，

抬起空棺，推死人入坑掩埋。

十三、狗仔

摘帽新婚喜气盈，谁知从此祸根生。
夫因娶我难提干，稚子横加“狗仔”名。

十四、“改正”通知报黄泉

云开日出洗沉冤，“改正”通知往下传。
找到当年埋骨处，空留墓草报黄泉。

十五、教授“平反”上西天

高龄教授知“平反”，老泪纵横感万千。
激荡心潮心梗死，隆恩奉送上西天。

十六、痴心争民主

痴心只为争民主，半世图圉北大荒。
苦役私刑终不悔，铮铮铁骨傲风霜。

十七、血泪写春秋

人民民主大潮流，顺者昌明逆者休。
留得“阳谋”当笑柄，殷红血泪写《春秋》！

一九八七年六月“反右运动三十周年”

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追忆

彭浩荡

2002年9月8日，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校园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中文系的庆典在一间大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届校友，济济一堂。我给主席台递上一张条子：“建议在庆典仪式之前，为一百年来辞世的老师和校友默哀！”会议主持者紧急商议，结果没有被采纳。

庆典开始了，鲜花，祝颂辞，掌声，好像一百年就是这样一路辉煌过来的，什么令人遗憾伤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那么美好，校园的天空永远是蔚蓝的，没有飘落过一丝丝儿乌云。1957年春夏之交，曾在校园发生过的往事，那惊心动魄的往事，令多少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往事，没有一点反映……然而我的思绪却无法平静更难以欢快起来，一幕幕往事一个个人物在我心头浮现，不能自己……就在此时，一位六十来岁的小个子校友在人丛中出现了，座中有几位白发校友一眼认出，惊喜地喊了声：“徐福绵”，一把抱住他，相拥着呜咽起来，这是他们由人变鬼由鬼变人的隔世重逢，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尽在这一声呜咽之中。

那么我的追忆就从他开始吧。

往事一：为了这一句“再战两盘”，毁了他的一生

徐福绵是谁？这要追溯到1958年初。

师大反右斗争结束，数十名各个系各个年级“认罪态度恶劣”（即不承认自己的言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被送到北京西郊农场“劳动考查”，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徐福绵了，仅仅十八岁，但你可别小看了他，他的知识面相当广博，读过很多书，思维敏捷，言辞犀利，颇有才气，也少不了有点傲气。在这个右派群体中，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笑咪咪的，没有脱去少年人的稚气，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几年下来，“劳动考查”的同学陆续分批离开，星散四方。“文革”后二十年中当年的难友们相聚了两三次，惟独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新疆戈壁滩受了很多苦，且心脏常发毛病，因此我们最为牵挂的就是他了。

这次母校百年校庆，他作为全国特级教师，被学校特邀返校，中央电视台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四十多年后难友们重逢，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年的十八岁少年，而今已是满脸皱纹的花甲老人了。

他是1956年秋进入师大的。国庆节游行时，他要求安排到靠近天安门的那一排，当时喊“毛主席万岁”把嗓子喊哑了。1957年的一天晚上，在宿舍有两位同学下象棋，下得很晚，有人说别下了，他说了一句“再战两盘”，没想到开批判会时，同班的一个左派张X突然站起来揭发他：“徐福绵喊，‘我要战争’”，主持会议的头头声色俱厉道：“记下来，记下来。徐福绵你要老实交待，要战争干什么？”

他半个世纪蒙在鼓里，不知为何打成右派，就是为这一句“再战两盘”毁了他的一生。

61年年底他从西郊农场返校，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他深受鼓舞，万分高兴，于是自动报名到新疆去报效祖国，谁料同路的一位女同学出于同情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中文系的女头头汪XX临行前交给她秘密任务，要密切注意徐福绵的动向。他听到后，心凉了半截。到喀什二中后，他的教学受到学生赞扬，但总有一双极左的眼睛盯着他，鸡蛋里挑骨头，于64年捏造了有关他课堂上的“反动言论”。比如他说，“慈禧太后很凶狠经常谩骂汉族大

臣”，这话居然也算反动言论。当时他不服气，受到一女左派训斥：“右派摘帽与否，都是右派，你永远和普通群众不一样，你一辈子都要夹着尾巴做人。”到此时，一心认真改造的他，才知道自己过去太天真了，以为摘了帽就不会再被没完没了无事找事地纠缠了。

“文革”时，被勒令在戈壁劳动八年，放牧牛羊、种粮食、种蔬菜、盖房子、赶大车，有时揪回学校批判。他的“罪行”甚至包括他在大学时古典文学笔记上的内容，比如白居易的《长相思》：“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革命派在旁边加了批注：“思什么？恨什么：何其毒也！”他多次遭到毒打，轻则扇耳光，重则用汽车上铁管子拴了上螺帽往腰上抽，有一次被打后，他躺了一星期，至今还落个腰痛的毛病。70年“一打三反”中，有的揭发他对彭德怀的同情，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军宣队队长要他讲对彭德怀的看法，他说：“我至今不能舍弃对彭德怀的怀念。”队长说：“好吧，那就再接受一次群众的帮助。”立刻上来四个人，反拧着他的手，按下他的头，一顿暴打，直到旁边有人提醒：“不行呵，这样会出人命的！”他们才住手。；

如此挨整的徐福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在戈壁滩过三十六岁生日时曾写下一诗：“三纪忽忽过，世人皆欲杀。此心终不悔，苦苦恋中华”，祖国在他心中永远高于一切，他把对祖国的苦恋化成了育人的春风夏雨，1986年国家授予他“全国优秀语文工作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级教师”，他前后获得国家级省级十多个光荣称号，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及欧美澳，在美国就有二三十人。

当年诬陷徐福绵想要发动战争的张 X 同学，二十多年来，也许是良心上得不到安宁，于是在1980年秋天的某一天就发生了这样一场情景：晚上，徐福绵听到有人在敲门，他打开房门，那人进来扑通一声跪下，说道：“福绵，我向你认罪来了，我的一个编造害了你一生，我到处打听你的地址，你宽恕了我，我死也瞑目了。”

在我们亚洲，无论是一衣带水的东邻还是敝国国人，向来是拒绝忏悔的，当年同学中诬陷迫害徐福绵的还大有人在（端坐在校庆主席台上的就有一位），我不知他们仟悔没有，但我知道其中就有人在百年校庆时故意避而不见。对比之下，张 X 同学的忏悔，可谓大勇，令人肃然，听说该同学已不幸去世了，在此让我们祈祷，祝愿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国安息！

往事二：女右派们的枷锁，比起男右派们十倍、百倍地沉重。

首先，我想起的是中文系58届的竺亚青，在班上这位调干生大姐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活跃而深刻，善于辩论，这方面颇有点像北大的林昭。当八十年代我们劫后重逢时，让我惊悸的，是她那一头早生的白发，在师大女生中她经受的苦难最深重，被逼成精神病达七年之久。当年她也是在北京西郊农场接受“劳动考查”，农场离市区数十里，路上坑坑洼洼的，有时她晚上单独一个人步行进城，有人问她怕不怕？她凄然答道：“我已经不是人，我变成鬼了，鬼还怕什么呢？”这句话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它一语中的，反右斗争就是把这批新中国培育的大学生由人变成了鬼。

中文系57届的雷一宁，是因为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的，毕业时发配青海。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真切地描绘出她们当时屈辱的境遇。这是我们男生怎么也体味不到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如果说男右派们被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锁，那么女右派们的枷锁，比起男右派们是十倍百倍地沉重，被发配到青海后，我们就像一只赤身裸体的四不像动物放在笼子里展出，人们看我们的目光，就像一只饿极了的猫看着一条吊在梁上的肥鱼，不要说他们的污言秽语，不要说那不能见之言语的覬覦，单是这目光就能使被看者上吊。然而我们没有上吊，这也许是另外一个女性白毛女在给我们力量，‘我不能死！我要活’我们终于活到了今天！”

一想起中文系57届的徐美英，眼前便浮现出一个活跃、健美的阳光女孩的形象。她是

三好学生，学生会干部，校舞蹈团团长，校女子篮球队队长。当年有一件轰动校园的喜讯，1956年她作为北京市大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北京市第四届团代会，在晚会上她荣幸地和周恩来总理跳舞。正当她的蓓蕾花季时，57年打成右派，令她愤愤不平的是，当年一些社会活动中，大家为了一展青春风采，互相借漂亮衣服穿，她也同样，但到开她的右派批判会时，便挖出这些事，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败坏，把生活琐事上纲上线。毕业时她也发配青海，到了西宁二中，她打钟、刻钢板、扫地、开关学生宿舍电闸，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顶几个勤杂工，五年后摘了帽，待结过婚刚想过点“人”的生活时，又迫使她夫妻分居两地，让她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文革”开始了，学校向全校公布她的右派档案，摘帽右派仍是右派，与活佛、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一起游街批斗，开始了苦难的十年。对她刻骨铭心的有一件事：有一次，突然拉她去开批斗会，两岁的孩子没人带（右派崽子也没有人敢带），孩子跟着她走，连喊“妈妈”，一直哭喊着走进会场，有几个红卫兵狠狠地把孩子拎了出来。她跪在台上，耳边不断听到孩子的哭叫声，此时她心如刀割。待批斗结束，夜幕已经降临，她看见孩子独自坐在地上倚着门框睡着了，孩子的脸上还挂着一串串泪痕。“文革”中，学校里多次出现了反动标语，有一条贴在离她宿舍不远的一棵大树上。于是，她成了当然的重点嫌疑对象，会上逼，会下审，要她回答群众提出的几百个疑点，甚至半夜提审，设下圈套，诱骗她承认现行反革命罪行，以致逼得她神志恍惚，抑郁愤懑。她的第三个孩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生育和哺乳的，吮吸的奶水是苦水酸水，这就在孩子身上留下了后遗症——一度精神障碍，丧失了工作和婚姻的权利。徐美英说：“这笔两代人的精神账我找谁算呢？真是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哪！我为此终生有愧于子女，背上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这就是女右派比男右派的苦难更深重的地方。”

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徐美英，复出以后，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青海的教育事业上，她要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我不是牛鬼，我是精英。81年起她担任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十多年，被评为学会优秀工作者，对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有四所大学聘请她兼课，在十年中，她完成了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三级跳。她所培育的学生至今遍布全国和世界，当她执教四十年之际，学生们联名在《青海日报》登报祝贺。就此机会让我们说一声：“徐美英好样的！你所取得的成绩就是给当年整人者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以上三位女同学历经劫难，但总算活下来了，难友相聚时令大家唏嘘不已的是中文系的57届的沈巧珍同学。

巧珍天资聪颖，后天勤奋，1953年北师大中文系在武汉只招了五个名额，巧珍榜上有名。为帮助党整风，她在班级鸣放会上发言，被打成右派，毕业时安排到四川自贡七中“工作考查”。巧珍的姐姐怀珍大姐告诉我，当时巧珍积极争取摘帽，她向家里表示，不摘掉帽子就不会回家看妈妈。60年11月摘帽了，立即给妈妈寄去一信报喜，信纸上只有七个大字，“妈妈呀，我归队啦！”欣喜之情可见一斑。64年巧珍结婚，先后生下一女一男。安稳日子仅昙花一现，两年后“文革”开始，66年7月23日她被隔离，此时她的第二个孩子才三个月，尚在哺乳期，但头头宣布，不许回家喂奶。作为母亲的巧珍一心惦记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忧心如焚，强烈的精神刺激导致胃部痉挛，食道堵塞，连水都吞不下去。第三天中午，趁老师们在午休，巧珍从后门溜出去到了釜溪河边，慢慢走进河水深处，死时年仅32岁，抛下了一岁多的女儿和三个月的儿子，巧珍的尸体火化后，学校作出了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结论，吓得家属连骨灰都不敢去领取。当时远在武汉的怀珍大姐做了一个梦，梦中一身黑衣的巧珍嘱托姐姐把两个孩子带大。可厄运并没有结束，巧珍的女儿后来患上了忧郁症，有一天突然走失，不久人们在河边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幼小的魂灵寻找妈妈去了。而巧珍的小儿子长大后，也存在一定的精神障碍，一九七九年八月，巧珍的家属收到了《关于沈巧珍同志死亡再次复查结论》，千篇一律的干巴巴一段话：“沈巧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错误路

线的迫害下，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含恨去世，过去对沈巧珍同志死亡，历次作的结论无效，以此为准，强加给沈巧珍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倒。”悲夫，两条人命，一纸空文！

行文至此，我们怎能不伤心欲绝，巧珍呵，如果你有坟墓，同学们一定会相约带着鲜花来你墓前祭奠，但你的骨灰不知随风飘散到哪一个角落里了，我们只能泪眼仰对苍穹，透过清明节潇潇雨丝，呼唤魂兮归来，巧珍同学啊，你灵魂的永恒栖息地，是难友们的内心深处！

往事三：我国细胞学专家武兆发教授的自杀

师大百年校庆，每位校友都能领到一本装潢精美的纪念册，其中记叙了师大走过的百年历程，翻开第一页便是一长溜解放初期教授的名单，还有四张单人肖像照片，真个是名师荟萃。

教授的单人照有四位：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武兆发的照片上，西装领带，雄姿英发，一派学者风度。武兆发是生物系教授，没给我上过课，所以生前我不认识他，但是这名字四十多年来一直印在我脑子里，因为当年那一张张大字报声讨他的情景太可怕了。

那是反右斗争开展以后不久，教师中的右派也一个个揪了出来，据我记忆所及，有数学系傅种孙教授（副校长），生物系武兆发教授，俄语系胡明教授，历史系何杰教授，政治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逻辑学家朱启贤教授，而中文系打得最多，18位教授中有8人打成右派：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陈秋帆、俞敏。18个助教中有9人打成右派。而当时北大中文系教授中被打成右派的仅仅只有1位。因此后来流传一种共识，总结为四句话：在全国数北京最左，在北京数高校最左，在高校数师大最左，在师大数中文系最左。完全可以说，师大中文系是反右斗争的重灾区。当然，重灾区远非只此一家。

我记得有一天，在数学楼的墙上新贴出十多张大字报，全是声讨武兆发的，在武兆发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旁边是触目的斗大的字：“顽抗到底”，“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抗拒改造”，我这才知道，武兆发死了。这是我校反右斗争以来自杀的第一位教授，在火药味的空气中我闻到血腥的气味了。当时我的心怦怦地跳，人被逼死了，还要这样“声讨”，还要扣上“畏罪自杀”，“抗拒改造”的罪名。他本人永远闭上了嘴，无法申辩，而整人者却把逼死了的罪责抖落得一千二净。太可怕了，我当时想，今后不管遇到怎样的绝境千万不能自杀。再往下细看大字报，我更加感到整人者的卑劣了，他们编造了武兆发生活中种种的“丑闻”，称武兆发这位“切片专家”为“窃片专家”。要打倒一个人，先要把他搞臭，揭人隐私，百般丑化。这种伎俩是否是反右斗争时的重大发明，我不知道，但反右斗争运用最多，以后广泛采用，屡试不爽，操练得更加娴熟自如，也是中国特色吧。

后来，我在网上搜到武兆发的资料：武兆发，1904—1957，细胞学专家，组织胚胎和细胞生物学权威，擅长于制片技术，是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不知武教授在天之灵知否，您被百般妖魔化和被逼死的往事人们早已有意忘却，而仍用您的资历装点着百年名校的辉煌哩！

往事四：噩梦和大地

1951年元月，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从南方一闭塞县城来到北京，首都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世界，万千印象扑面而来，他敞开所有感官吮吸着，接纳着，于是他开始写诗了，1952年入了团，1954年考入师大中文系。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如日东升的生活感受中使他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从此学校的集会上能经常看到他朗诵的身影。1956年12月的一天，在共青团中央礼堂举行的“北京诗会”上，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歌颂第一辆解放

牌汽车的诗《我们的》。这个热情如火的小伙子，担任了北京市少先宫诗歌组辅导员，是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团员，师大野草诗社成员。这小伙子就是我，在1957年5月之前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中，痛饮了青春与缪斯酒杯。

那是1957“五一”劳动节清晨，师大学生的游行队伍从西城步行到东城，准备在上午十点往天安门进发，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在途中原地休息时，我接到一张散发的当天的报纸，头版头条《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赫然人目，当即很快读了一遍，我想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当然应该帮助党擦去身上的污垢，让党更加纯洁先进。

三天以后，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在师大操场举行营火晚会，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一堆熊熊烈火，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映红了操场旁边的“小树林”。教务长丁浩川在会上讲话，勉励同学们继承“五四”青年的光荣传统。卫之祥唱了一首歌，我朗诵了《青春进行曲》。这是一个燃烧着青春激情的夜晚，在同学们眼中，那熊熊的火焰就是民主和科学的火把，今天已传到我们手中，那熊熊的火焰就是我们的青春，在为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燃烧。就这样，这群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营火旁张开幻想的翅膀，憧憬美好的未来，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会是校园里最后的一场青春的盛宴。

也就在两个多星期后，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有批评某个校领导乱搞男女关系的，有批评“肃反”中伤害无辜者的，有批评宗派主义表现的，有提出民主办校的，所揭发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感到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不合理甚至阴暗的东西，而这种畅所欲言的气氛，让我充分感受到民主带来的生机和独立思考的可贵。

为了给鸣放提供场所，我和几个同学在阶梯教室设立了《群众论坛》，其中我主持了一次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的鸣放。北大“百花学社”来我校参观大字报，我参与了接待，还参加了学校主要社团“底层之声”召开的各社团联席会议。以上这些活动，我的初衷是出于正义感，出于帮助党整风的善良愿望，因此到了后期，听说党内有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鸣放而主张要收，我竟天真地说：“要保卫毛主席”。

没过好久，《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风向突变，反右派斗争开始，各个班级揪右派，开批判会，我班的由静林同学就是那时投湖自尽的。我的噩梦开始了，一夜之间从共青团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写不完的交待材料，挖不尽的家庭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昨天还亲密无间的同学立刻变脸，划清界线，有一同学以前曾主动送我一张照片，此时板着脸硬要了回去，这深深伤害了我人格的尊严。此时我陷入极大的困惑，我拿出以前的诗作来申辩，结果被当作认罪态度恶劣，送往农场“劳动考查”的根据。

58年3月，一起去农场考查的有几十个各系的右派学生，先在农场本部，不久转到上庄，农民师傅带领我们培育蔬菜，收割麦子，搭建温室和我们相处最久且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广才师傅了，他比我们只大五六岁，朴实敦厚，干得一手好农活，至今我们犹记得他手握木杈扬场时那虎虎架势，他和我们同吃同住，每天早晨安排农活。在他眼中，我们是有文化知识的年轻学生，干活也卖力，不是坏人。在那个不把我们当人的年代里，他把我们当人看待，因此，上庄也就成为温暖了我们心灵的圣地，这就不难理解，三十年后当各地的难友来到北京，一致约定要去上庄，而当我一眼看到李广才师傅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这是庇护过我们的大地，宽厚朴实的大地呵！

在劳动中，尽管对自己的“罪行”一直想不通，但仍是虔诚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59年下半年，我第一批被减轻处分回校，继续完成学业，没有想到随下面的班级就读的60届是最左的一年级（把徐福绵打成右派的那个年级），噩梦中最难熬的阶段开始了。当时年级里有一批整人者，如王X、张XX、马XX，一个个很凶，每个毛孔里都冒出一股极左的杀气，而王X、是整个年级四个班的总头儿，她的棉上衣敞开，不穿在身上，而是像佐罗的斗篷一样披在肩上，显得威风凛凛，我们几个右派的生死簿就掌握在她手里。当时“三年大饥

荒”开始影响到高校，吃饭时凭饭票定量供应了，有一次饭后我无意中嘟哝了一句：“没吃饱”，不知是谁听到汇报上去了，结果第二天全年级集中，王 X 披着上衣走到讲台前大声宣布：“右派分子彭浩荡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攻击”这两个字，一下子把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让我感到极度惶恐。在平时，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人格受辱的境地，例如刚上完课时，王 X 走到讲台前说道：“右派分子离开教室，同学们留下来有事情交待。”我们几个右派就在全年级歧视、敌视的目光中狼狈离开。又有一次，饭厅餐桌上摆着一张大家看过后扔下的“参考消息”，我拿起想看一看，立刻有+同学一把从我手中夺下，喝道：“右派分子不许看。”就这样，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你。而最折磨人的就是思想汇报了，时时要汇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更要汇报。（因此，78 年摘帽后我感到最大的解脱莫过于不要汇报了）。这种孤独压抑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后，本来活泼开朗的我开始异常，精神恍恍惚惚，思维断断续续（精神医学上称为“思维破裂”），尽管处在病态中，但我记得清一个人对我厉声咒骂，几十年后犹响在耳边，这人便是周 X X，他属一般群众，但“左”得突出，是典型的奴才（这在当代中国知识阶层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想通过极左的表现，取得主子的赏识，从而毕业分配可留在北京，安排一个好的单位。百年校庆时，我听到同学们说，当年反右派斗争他批判崔月蓉、徐福绵时，表现得非常恶毒，凶狠。

60 年 8 月临近毕业了，我被几名同学押送到内蒙。一位好心的右派发现我的病态后，告知了我远在上海的母亲。母亲把我接到上海精神防治医院治疗，夏镇夷教授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出具了证明，称该病是周围压力造成精神紧张所致。

在母亲身边休养了两年，我的精神恢复了正常状态，当时同一街道里和我情况相似的，有翁文生，北大生物系学生，前额宽阔，苍白瘦削的脸上深嵌着一双大而亮的眼睛。他身体文弱，和母亲相依为命，寄居在外婆家里。我和他来往过几次，有一天他对我说：“每次从广播中只要听到‘右派’这两个字，心里便会咯噔一下”。这的确道出了那个年月里右派们心惊胆战的心态。后来我有好久没见到他，一打听才知他自杀了。一天晚上他洗过澡，换了衣服，到厨房里打开了煤气开关，唉，如果事先他能向我透露一点自杀的意图，我一定会劝阻的。我完全能想像出，第二天早上，他妈妈面对独子冰冷的尸体时，会怎样嚎啕痛哭啊！

“文革”开始了，我们母子俩人被红卫兵遣送到千里之外的湖南农村，又是噩梦的继续。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人为的阶级斗争，人为的制造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仇恨。右派和地富反坏归在一起，被称为“黑五类”，他们的命运比不可接触的贱民还要悲惨，死了一个五类分子跟死了一条狗差不多。有一次，五类分子还被勒令戴上白袖章，我不禁联想起德国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标识的情景。此时，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母爱发出的慈光庇护着我，在狂风恶浪的民族大劫难中，这间草屋成了我的诺亚方舟。

在湖南农村经受噩梦的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大地，那片宽厚朴实的大地。挑粪的，烧窑的，拖板车的，成了我的患难朋友，他们也认为，我是有文化知识的大学生，不是坏人，这也就不难理解，几十年后，当我重新回到当年的生产队，设宴感谢这批朋友时，我举着酒杯说：“在摧残人性的年代里，我在底层找到了善良美丽的人性！”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漫漫的“无期徒刑”终于熬到了头，1978 年我接到右派改正的通知，21 岁打成右派，42 岁改正，当中最宝贵的 20 年青春年华就这样葬送了，用浙江诗人沈泽宜先生的话来说：“我是一条只剩下头和尾的鱼。”1979 年八月号《诗刊》发表了诗《是在我敲门》，同学们才得知我还在人世。难友范亦豪来信说：“二十年前一别之后，先是听说你被逼疯了，‘史无前例’中传闻你死了，我心里早已把你祭奠了几次。及至见到你发表的诗，才确信你活过来了，我又看见了当年的你，而不同的是灾难给了你以前所缺乏的深刻的东西。”

铁丝网……几十个人在默默劳动，我也在其中……高音喇叭……整人者的面孔……右派帽子仍扣在头上，遥遥无期……。几十年后，我仍不时从这梦境中惊醒，一身冷汗，心怦怦地跳着，我问自己：噩梦真的过去了吗？噩梦真的过去了吗？

四周的欢声笑语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的思绪又回到庆典大厅。恍惚中，我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身影，还是当年在师大中文系执教时那样，一生长袍静然肃立，脸上神情，依然忧愤深广，他冷峻的目光穿透吊诡的历史，一直在审视着今天，此时，我忽然感到惟有他和我们站在一起，却在鲜花和掌声之外。

父亲的“戏剧”人生

若葵（陈绍武之女）

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是，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话语间或在耳畔回响，恍如昨日。如今回过头来看他的一生，可谓曲曲折折、悲多于喜，其间遭受的许多非人的磨难、不公正的待遇和人情冷暖，怎能用一个“坎坷”了得？然而，父亲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他的善良和乐观，这使他能够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遭遇，摆平痛苦，以不变应万变、积极地生活，就像他常对我们说：“站在人生的高处俯视生活，而不是站在人生的低处仰视生活，很多烦恼就能迎刃而解了。”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他的“情商”很高，“逆境商”尤其高。

父亲朝气蓬勃、古道热肠。直到60多岁，他身上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他几十年一贯制地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党的执着，与当初“煽风点火、心怀叵测地向党进攻”的右派罪名真是不搭界。然而，就在1957年那个非常的年月，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却被不容分说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彼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年仅21岁。于是，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右派大军中，成为其中的一名“小字辈”。从21岁到42岁，这顶大帽子陪伴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21年。

其实，父亲当时也不是没有被从轻发落的可能，如果他能在组织的“开导”下，知趣儿地“顺杆爬”，违心地“认识”上去、“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并落实到文字上，并非一个字的“检查”都不肯写，或许最终不会被认定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也不会受到“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遣送劳动教养”的最重量级处分！可他偏偏“不识相”，在当时的环境下，父亲的实话实说为他招致的遭遇，绝不亚于灭顶之灾。

农场“坐科”

父亲儿时被爷爷奶奶带着，经常出入戏园子；上大学后课余时间也以光顾剧场为乐，为了能欣赏到一流艺术家的表演，不惜饿肚子、省钱买票，可谓嗜戏如命。巧的是，他被迫离开大学以后的经历，也富于戏剧色彩。

从高等学府到劳改农场，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带给父亲是体力上的透支、更是精神上的煎熬。一口200斤重的盐包，挑战的不单单是他这样一个从没干过体力活儿的文弱书生的力量极限、更是他承受精神压力的心理极限。好在他总能自嘲地“阿Q”一把。我想，正是因为父亲以积极的态度借鉴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非常时期支撑着自己，他才能从潜意识里遇事尽往好处想，试图从暗淡的境遇中挖掘出一丝亮色，找到某种“喜剧因素”，面对无望的生活却并不垂头丧气，在有限的生活空间里尽可能地学习、实践、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他总是希望着、努力着，这绝对是他面对逆境的一种智慧，其自我解脱已经升华为一种境界。

天底下有些纯属巧合或歪打正着却颇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父亲曾一心想学戏，未果；后来想由北师大转学至中央戏剧学院，亦未被获准，所以才想出“暗渡陈仓”的办法——回津取学历证件、私下报考中戏。不想成为某些人捏造罪名提供了可乘之机，招致了政治灾祸。眼看着这辈子与戏绝缘了，却意外地出现了“绝境逢生”般的奇迹。在劳改农场，他以京剧《铡美案》和《姚期》中的“西皮”、“二黄”两段唱，临

时被抽调到总场业余京剧团。闲时排练、演出；忙时回分场劳动。那段时间，他粉墨登场，在《智擒惯匪座山雕》中扮演李勇奇，在《三打祝家庄》中扮演孙新；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团“人才济济”，有叶盛长、黄元庆、万荣慈、郭世华等一些资历不浅的名演员。能和这些演员们朝夕相处，父亲当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戏曲知识的“营养”，演配角、跑龙套他也愿意，还当过导演助理、场记和司幕。因为和叶盛长先生属于“同类”，共同语言较多，在业务上也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剧团的工作因农事的忙闲而定，忙时劳动、闲时排戏。那几年，父亲几进几出京剧团，算起来在剧团呆的时间不少，对京剧艺术和剧团里的事儿，也算是个“半内行”了。

父亲是学文学的，有时也被指定编写一些配合时事或管理教育的小戏、小节目。巧的是著名电影剧本作家华而实也在剧团，父亲在创作上得到了他的诸多指点，有了长足的进步。分场成立了一个文艺小组，所以回到分场也不必每天下地劳动，他的工作是编写、排练文艺节目。那些日子，称得上是父亲的“幸福时光”——在“组”里，他又结识了原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所长黄若海、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艺术家戴涯、原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系主任徐步等几位电影界、戏剧界的名家，孜孜以求、耳濡目染，加上艺术前辈的无私传授，父亲学到了不少“真经”。“文革”以后，父亲辗转几个盐场劳动，但一直没间断了编写、排练文艺节目。这种连续性的练笔和“艺术”实践，为他日后从事文艺工作，特别是戏剧创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应该说是他不幸中的大幸。

回“乡”务农

虽然努力使自己保持着“阳光心态”，但日复一日被歧视、被冷落、处于夹缝一般的生活，也时时给“阳光”中投入“阴影”，郁闷是不会没有的；再加上大幅度的体力透支和极度的营养不良，父亲的胃病时常发作，轻时能忍，重时半个月二十天卧床不起。有很多年，父亲的体重一直维持在90多斤！

1970年，在大城市里土生土长的父亲被“遣送”回三辈无人的祖籍务农。一切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地无一垄、房无片瓦，瘦弱的他不得不学着打土坯，盖起两间房，权做自己的栖身之地。没过过一天农村日子的父亲从此开始了土里刨食的生活。那时，出一天工的满分是7分钱，他披星戴月也只能挣到5分钱！除了种田，他还在粉房里做粉丝；也为村上的手工作坊联系过“业务”，但无论做什么，最后都要折合成工分。几近不惑之年，百分之一百二地贡献了自己的体力，却不能自食其力，月月要靠妈妈接济。父亲是一个自尊心和责任感都非常强的人，无力养家让他感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拮据，更是对妻儿、父母的愧疚之情。

经济上的贫困尚可忍受，精神上的贫瘠和孤独却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煎熬。毕竟，在农场，他还没有彻底脱离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圈子；而在农村，他不得不把自己“脱胎换骨”成农民。可以说，父亲当初是忧心忡忡、极度茫然地回“乡”务农的，他担心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不过，父亲为人坦诚、平易，他真诚地接近农民。或许正是这段水乳交融的生活，让父亲看到了农民身上的朴实、善良，看到了他们对待贫穷的平和与韧性；也给了他心理上莫大的安慰，打消了他曾经的顾虑。那些不曾相识的“族亲”对他关心、照顾，没有人把他视为“异类”，没有人向他投去歧视的目光，父亲俨然成了他们中的普通一员。在经历了多年非常态的生活之后，居然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过上“安生”日子，即使是物质生活再艰苦，心灵上的暂时自由和心理上的暂时放松也让父亲“知足”。

还有一件比较幸运的事——在那么一个闭塞的穷乡僻壤，渴望能有一点文化生活的村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施展才华的空间。穷则思变，对任何人都是如此。爱戏如命的父亲

很自然地在“穷欢乐”上和村民们达成了“共识”。他进村时，村民们正在排练《智取威虎山》选场。有人举荐父亲为他们排戏，身为“再教育”对象，他谨慎从命、极尽全力。经过一个月的细抠，他为村里排出了不是原定的一折，而是这出戏的全部。他担任导演、还扮演李勇奇一角。这出戏从本村演到了外村，又从外村演到了县城。戏演“火”了，父亲在县城附近的十里八乡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若干年后，在他的命运有了转机之后，县委领导还几次三番诚邀父亲到县京剧团任团长，终被父亲婉言谢绝。

农村的演出是临时性的。在农闲又没有排练的那段时间，父亲就能回家住一阵儿，而不必如以前在劳教农场时拘泥于有限的几天假期。他除了分担妈妈的家务、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与年幼的我和弟弟，不是辅导我们的功课，就是自己看书写东西。他梦想着靠自己的努力或许能改变命运、绝境逢生，即便希望渺茫也不放弃。他写过小说，和朋友一起写过电影剧本。1975、1976年，还几次把作品亲自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本创作室。尽管其作品的主题都是昂扬的、向上的，艺术水准与当时银幕上的电影比不能算低，但结果可想而知。剧本创作室的负责人委婉地回绝了他——凭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即使写得再好，又有谁敢用他的作品？这可是原则性的立场问题！

创作之外，父亲也写一些申诉材料。那几年去北京，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到中央的有关部门上访。几次三番，每次递交的材料都如石沉大海，但他锲而不舍，相信总能为自己讨个说法。

铁窗生涯

文革中，曾经殷实的家被抄得一贫如洗，生活人不敷出，经常是变卖爸爸妈妈稍好一点的衣物维持日常的开销，就连他的结婚礼服也未能幸免。但最让爸爸心疼的不是那些珠宝玉器、房屋家具，而是他积累了十几年、被红卫兵装了几麻袋拉走的藏书。没有书看、不接受新的信息、不了解每天国内都发生了什么，比不吃、不喝、不睡更让他难受。在吃饭都是个问题的年月，父亲还是想办法买了一台收音机，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清晨6点半和晚上8点收听中央电台新闻联播的习惯。虽然身处社会的最底层、一文不名，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但他还是努力保证自己每天必须在第一时间听到“党”的声音、关注着国家的走向。他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国家好了，自己也就好了。

父亲绝不是一个适合从政的人，但对政治有着相当的敏感，且忧国忧民；加上他直率、“擅说”的性格，所以难免给自己招致祸患。1976年初，当“四人帮”在台上春风得意时，他对其祸国殃民的行为骨哽在喉，与对此有着同感的朋友一吐为快。不成想，这位朋友的妻子不久和他闹离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作为强有力的理由“离婚”。1976年5月19日晚父亲被传讯、20日清晨只身到派出所受审，当晚被转天津南开分局拘留所拘留。一个月后，下了正式逮捕令，被拘押在天津西监狱。

在狱中，他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对于“反动消息来源”，父亲只说是“从公共汽车上听来的、从火车上听来的”，都是些无从查找、一辈子可能只见一次面的路人。“进去”之前，他就做好了“可能会丢掉脑袋”的心理准备。对于“死”有了一份坦然，身上自然平添了不少勇气，父亲索性“破罐破摔”，百分之百地敢作敢当，并不伟岸的身躯和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所有的罪名。后来他和我们说：“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最不济也就是个死，一个人死总比几个人遭殃损失要小，所以绝不能牵连别人。”他希望自己的朋友都能好好地活着。爸爸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护了那些关心时政、并和自己有共识的朋友们。

离家之前，爸爸预感到此去难回、凶多吉少。他劝说妈妈，如果境遇险恶，最好选择离婚。这是爸爸当时能做到的、对我们最好的保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见。在无数个深夜，妈妈被公安局的人一次次地苦口婆心规劝、时而也有威逼利诱，可谓软硬兼施，目的

只有一个——要求妈妈与爸爸划清界限。不善言辞的妈妈不卑不亢，但对自己何去何从心中有数。多亏了妈妈始终“执迷不悟”，才能在1976年那个多灾多难的年月保住了我们这个家的完整。

“右派”之外，父亲又多了一顶帽子——“现行反革命”。在当时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中，‘他一人身兼“二职”，理所应当成为被揪斗的重点对象。短短几个月中，他被拉出去批斗数十次。当初的批斗会与今天的巡回演出有类似之处，出来一次就得游走几个地方，很像如今一些演员的“赶场”。所以，父亲胸前挂着大牌子被“斗争”了多少场，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那年月，逢年过节之前都要开批斗会，目的当然是提醒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那时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和上一年级的弟弟一听说学校要开批斗会，心就哆嗦。每次我们的头总是低低的，恨不能地上有个缝自己钻进去，那感觉与自己挨斗没什么两样；我们最担心的是其中会有爸爸，尽管我们日思夜想、经常对着他的照片发呆，却不愿意在这唯一能看到他的场合与之相逢。幸运的是我们稚嫩的心灵最终逃过了如此极度的摧残；而羸弱的奶奶却未能躲过此一劫：一天，她被街道代表招呼去开会，到了现场才发现竟然是斗争自己的儿子！

事过近30年，而当初周围人的冷眼，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不寒而栗。它是我们此生心中永久的痛！

爸爸所在的牢房中，他是唯一的政治犯。那些因偷窃等种种原因被囚禁的刑事犯，文化水平多不高，经常为一些小事面红耳赤、剑拔弩张。父亲每每以他的智慧化干戈为玉帛，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开导大家“既来之则安之”。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本能地逃生。但高高的围墙、还有围墙之上密密的铁丝网不说，单就牢房的铁门也是坚不可摧。跑，又能往哪里跑？于是，能藏身的牢内的大通铺底下，就成了犯人们别无选择的希望。刹那间一片狼藉、惨叫声不断。危急关头，父亲显出了少有的镇定，他提醒人们“别慌”，并让他们一个一个地钻进铺底下之后自己才藏。他后来和我们说：“藏和不藏没什么两样，该着死怎么也躲不过。”那时他的想法就是听天由命。

然而，他这一“消极”的想法却被犯人们看成是“壮举”，他们决定让爸爸每天夜里睡“横板儿”，也就是允许他在大通铺上平躺着睡，这可是很大的优惠！要知道，那张大通铺不足以让所有的人一个挨一个地平躺下来，如果有几个人睡“横板儿”，就得有相当一部分人睡“立板儿”，即侧身直着躺着，腿不能弯曲，这样才能节省地方；而且，一旦你起夜回来，很可能连睡“立板儿”的地儿都没有了。如此待遇，在彼时彼地，应该说是“享受”。还有一件事也令他们对父亲肃然起敬，那就是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他哭了，随即把自己的黑衬衣撕了，做成一个个黑纱分给同室的每一个人。他们不明白，“现行反革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他怎么会对毛主席的去世这么伤心？

父亲被关进西监狱之后，我和妈妈在每个月的某个星期二上午给爸爸送一次生活必需品，要什么爸爸都会在一张明信片上写清楚，如肥皂、香皂、牙刷、牙粉。那时的牙膏是铝皮的，怕犯人以此为自杀的工具，监狱里只允许送牙粉并且要从铁盒里倒出来、用纸包好。知道家里清苦，爸爸每每把自己的要求降到最低，不多要一点东西。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接到父亲的明信片，我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提心吊胆，生怕得到不幸的消息。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有了音信，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而爸爸实际上也是用这张明信片“投石问路”——如果收不到东西，家里就肯定出事了。

为了让爸爸放心，妈妈在一张比糖纸还小的纸条上面写了“全家平安”四个个，塞进衣服口袋的一角。这么做是绝对犯忌的，但又是仅有的给父亲报平安的办法，所以铤而走险。警察检查东西的时候，我心里敲起了“小鼓”，生怕纸条被发现。那位女警察比较仔细地查看了每一样东西，但还没有仔细到去翻每一个衣服口袋！终于蒙混过关了，我们确信这个消息能给爸爸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小小的成功当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喜悦，相反却是无尽的悲

凉与无奈，那感觉至今真真切切：高墙阻隔了我们，真的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 1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没对监狱封锁，爸爸听了广播后喜出望外，他又看到了自己的新生，高兴得像个孩子：“我没事了，可以回家过年了！”犯人们不明白了：“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爸爸只说了几个字：“你们等着瞧吧！”

1977年1月20日上午，我和妈妈在监狱外面冻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看到大铁门中的一扇小门开了，走出一个被剃成光头的瘦弱的身影，提着一个手提包。那就是父亲！在被监禁了整整8个月之后，爸爸被无罪释放！

笔耕不辍

1978年，经历了21年坎坷际遇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名正言顺地成为“人民队伍”中的一员，由农业人口转为国家干部，被安排在河北省冀县文化馆从事创作。那时，写作任务并不多，加上独自编一份报纸，对他来说工作量也不算大。但是，从恢复工作的那一天起，父亲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不停地运转着。毕竟，在逝去了青春年华、耽误了那么多时间之后，他终于又能名正言顺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他非常珍惜这用泪和血换来的工作机会，被压抑了20多年的激情犹如火山爆发一样从内心深处不可遏止地喷涌出来，一行行文字在他的笔下流淌。

写作是他的生命。两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笔耕，先后写出了京剧剧本、曲艺唱词、小说、诗歌等作品。有些作品，发表于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杂志上；也有的被搬上舞台，并被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后播出。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写了一场曲艺晚会！囊括天津时调、河南坠子、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单弦、相声等多种曲艺样式。他的写作面之广、速度之快和较高的艺术水准，引起了天津市文化局有关人士的兴趣。在严格地审视了他的一些作品之后，经过近两年的交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父亲于1981年初被调回了天津市。

回到天津，父亲主要从事戏曲、曲艺创作和京剧的研究工作，也写了不少评论等文章。这期间，他着手一项大“工程”，就是和叶盛长先生合作撰写《梨园一叶》。

父亲儿时于耳濡目染迷恋上了京剧，久而久之，欣赏京剧表演竟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青少年时代，他领略了难以胜数的各路京剧名家的技艺，其中很多出自喜（富）连成社的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但是，父亲对京剧的热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欣赏、写戏和撰写一般性的评论文章的层面上，他有计划地搜集、整理研究乃至抢救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们形成文字保存下来留给后人；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一项不可忽视的文化积累工作。因为，始创于清末民初的喜（富）连成科班，乃是我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产生影响最广的一个卓有功绩的“京剧艺术学校”。选择这样一个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的京剧科班作为研究对象，把它的兴衰始末、成败得失做一番认真的记载与总结，目的是从中引出可借鉴的经验教训来，以利于今天京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史为今用”。可以说，父亲是怀着这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去写这本书的。

基于这样的动机，父亲把自己的设想透露给叶盛长先生。不仅因为他们是共过患难的忘年交，更因为叶先生是富连成的毕业生、是喜（富）连成社创始人叶春善社长的爱子。对于富连成，他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感性记忆，而这正是研究这个科班的绝好的原始活资料。二人一拍即合。但是，他们二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何况还都有公务缠身，不可能集中拿出几个月的时间聚在一起边说边写。于是，从1981年开始了叶先生在北京对着录音机说往事、父亲在天津铺上稿纸做文章的工作。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书信是主要的交流手段；而父亲更是频繁地往来于京津之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自己的很多想法、疑问与叶先生当面

沟通。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扇，就连录音机也是最“原始”的砖头式的！那段时间，父亲在正常的工作以外，几乎每天都于不足 10 平米的斗室中挑灯夜战。三伏天，暑热难忍，他依然舍不得耽误一点时间，坚持伏案写作。背上搭一条湿毛巾、左手摇着大蒲扇、右手握笔爬格子；头上冒出了汗珠儿，顺着脸往下淌，他就停下来擦擦汗接着干。录音带越擦越高、原稿纸越积越厚

对于“白纸黑字”，父亲一向严谨，慎而又慎。他在叶先生口述往事的基础上，又翻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典籍，兼以走访了如翁偶虹、潘侠风等诸先辈知情者，询及或印证若干重要的事实，先后经历了一年的准备、两年的撰写、三年的修改，终于完成了这本 26 万字的、带有艺术回忆录味道的史料书《梨园一叶》，于 1990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以“叶盛长叙事、陈绍武撰文”的名义出版。

1984 年春天，在天津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搞研究的父亲被抽到正在筹建中的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当年的夏秋之交剧团正式成立，父亲成了其中唯一的编剧。从那时起，他就没完没了地写作。创作的大戏有《英烈千秋》、《红梨花》、《漂母饭信》、《杨玉环》、《窃符救赵》、《律斩萧何》、《荀灌娘》、《岳飞与杨再兴》、《大足石刻》等，其中《马嵬香销》，获得文化部“优秀剧目奖”，他本人获得编剧奖。而经过他亲手修改的传统剧目，近 20 年来可以说不计其数。

从恢复工作到去世，爸爸几乎没有一天不写东西：戏曲、曲艺、电视剧；电视节目的解说词、晚会的串场词；楹联韵语；艺术论文、戏剧评论、人物专访、通讯等各类文章。就连那些创作无关的文字也得由他动手，比如剧团的大型演出活动前的所有文字宣传材料、新闻稿、演员介绍，演出后的总结；还有演员们个人“十大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等荣誉的申报材料，以及他们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稿，无一不出自父亲的手笔。领导派给的“任务活儿”、报刊杂志急约的“待发活儿”、同行盛情的“委托活儿”、趋时当令的“应节活儿”、和有求必应的“人情活儿”，加上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从年初到年底，什么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节假日、双休日，全是他的工作日。因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这些工作日之外，爸爸还要拿黑夜当白天使、熬通宵，他的工作绝对是超负荷的，却并不在意透支着自己的健康。直到年逾花甲名义上退了休，实际上还是“退”而无“休”！应该说，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性格中的弱点。在人们做事大都要讲条件的今天，他的“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从不权衡“得到与付出不成正比”的行为确有点“傻”，但他能自得其乐、泰然处之。

细想想，如果他能圆滑一点、违心一点、世故一点、媚俗一点、识时务一点……他一生的际遇会比实际经历的要好得多。说到底，他是个文人，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学”一窍不通。对于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碍于情面不主动伸手；至于如何“经营”自己，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门也没兴趣。他满脑子都是戏、是写作，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不甚了了；他不愿意相信某些人的心地险恶，也绝不以恶意揣度他人；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从来没有。直到年逾花甲，他依然保持孩子般的天真，用他的善良、无私、真诚、热情、友爱和宽容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曾经有负于他的人。面对这个并不纯净的世界。他是这个大染缸一样的社会中的一个“不和谐音”，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他最终没有被污染，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值得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悲哀？

父亲的人生印证了一句名言：性格即命运。其刚直不阿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

2005 年 7 月 1 日

哭泣的青春

述弢

- 1 自投罗网
- 2 脱胎换骨
- 3 灭顶之灾
- 4 劫后余生
- 5 痛定思痛

向西，向西，向西……

公元 1968 年盛夏的一天夜里，年仅二十九岁的我，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西边是什么？是位于贺兰山麓的宁夏银川市郊的西干渠。我认准了那里是我生命最好的归宿地。我头也不回地向西走去……

自投罗网

时光退回到 1956 年的除夕之夜。

张灯结彩，笑语喧声。北京师范大学一年一度的新年晚会正在举行。著名教育家凯洛夫等苏联客人的到来，更增添了喜庆气氛。他们那热情洋溢的讲话引起一阵又一阵掌声。我没有让自己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我回到宿舍，刻意让自己冷静下来：千万不可飘飘然啊！

而 1956 年又最值得我留恋。

年初，我有幸作为俄语系的学生代表到新落成的新侨饭店参加新年茶话会。茶话会在大厅里举行。与会者围桌而坐，桌上摆着茶水、花生和桔子。北京市市长彭真、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等人和我们这些年轻娃娃欢聚一堂，殷切期待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中央首长接触。当时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彭真满面红光，气色很好。他笑容可掬地同大家亲切交谈，一起观看节目，记得当时还很年轻的于是之也作了即兴表演。杨述来到我们这一桌，我们向他请教如何争取三好等问题。

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总支干事。我曾在日记中记述吸收我入团的团支部大会。那是 1955 年的初冬时节，会议一结束，“庆贺你！”“祝贺你！”大家纷纷向我伸出手来，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由于屋里的热气，我觉得自己满脸发烫，直烫到耳朵根儿。会上对我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同学们出于好心送给我的笔记本、毛巾等等，我不好意思拿出来用，说明“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爱面子的思想”比较严重。这样的批评今天看来似觉幼稚可笑，从中却折射出当年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

这一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又对高级知识分子（讲师以上）实行了若干特殊待遇，这对年轻学子是莫大的鼓舞与鞭策。

这一年，我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校级三好学生。

这一年我年满 18 岁。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列出许多。

借用后来的一句歌词，那真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我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迎来了 1957 年。却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新的一年里会卷入一场政治漩涡，并从此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1957年三四月份，师大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来形容波匈事件在中国引起的反响。看来他当时十分自信。对我来说，听了也就听了，并未放在心上。

4月，我所在的俄语系三年级全部开赴北京市各中学进行教学实习。在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浓浓春意里，我来到距新华门咫尺之遥的一所中学实习。学生的年龄与我相仿，所不同的是他们比我还要天真幼稚。我受到了学生见我时九十度鞠躬加“先生”称呼的礼遇。我带着“任务”与学生一起开会，一起出游，一起爬香山，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踢球，最后还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当时哪里想得到，所有这些看似十分平凡、不足称道的琐事，后来竟成为只有睡梦中方可重温的与春天有关的宝贵经历。

实习期间，我在报上看到一些整风鸣放言论。当时也就看个热闹，并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原来，当年在4月27日和5月4日，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5月的一个星期日，我在师大文史楼旁边阅报栏看到中文系穆木天教授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我的呼吁》一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提到师大有个“黑暗王国”。我不免大吃一惊：原来师大也不太平！

又过了几日，师大校园开始出现大字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我早已深信不疑。想不到竟有这么多阴暗面！难怪中央要下决心开展整风运动，大反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啊。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党”早已成了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字眼。

我的家乡是四川省邛崃县，成都平原边上一个偏远的小城。这里解放得最晚，大约已到了1949年年底。那时我刚满11岁。我跑到大街上，看见头戴红五角星的解放军：感到很新奇。那整洁的军容同记忆中满身疮痍、瘦骨嶙峋的国民党大兵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小县城里渐渐热闹起来，成立了县学联（学生联合会）。我十分痴迷地跑去参加活动。跟姓马的解放军同志学唱“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毛泽东前进，跟随着毛泽东前进……”观看五十四师文工团演出的歌剧《刘胡兰》，对剧中胡兰子小小年纪投身革命羡慕不已。观看话剧《血泪仇》，又与剧中人同仇敌忾，誓报血泪深仇。

渐渐地，我对“革命”的向往，简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看到西干校的男女学员三三两两、手捧野花到遇难烈士的临时坟地来祭奠，也着实羡慕。我觉得他们的装束、做派、甚至情调都很革命，很浪漫。西干校即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解放初期一批热血青年在成都经过短期培训，奔赴西康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不料在从成都步行前往邛崃的途中遭土匪伏击，有人员伤亡。遇难者就临时安葬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空场上。

我还在学联办的壁报上发表了题为《I口崃人民站起来了》的小短文。县里开人民代表会议，我没别的本事，便分配到主席台上为代表们端茶送水，没想到因此又引出了表扬我这个“小招待员”的文章。后来喜欢吹牛的县学联主席还封我为所谓“邛崃县的招待先锋”。

学联要组织大家到附近的乡场去搞宣传。自然没有我的份儿。我却认为这是参加“革命”的大好机会，岂能错过，便跑到县委去找负责青年工作的饶同志和梁同志（均系女性），总算得到她们的首肯。我兴高采烈地回家打起背包，随队去距县城约30华里的乡镇搞宣传。局势不是很稳，夜间还能听到土匪打枪。谁知临到大家摆开阵势对老乡做宣传时，我却卡了壳：不知道从何说起。毕竟乳臭未干，会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仍然为能“投身革命”而感到兴奋和自豪。多年之后回到故乡，有人提起这段经历，称我是“老革命”，我唯有苦笑。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学校里掀起一股报考军干校的热潮。像我这样年龄太小、不够尺码的学生，绝无人选的可能。我们却并不甘心，冬天早上背起背包，喊着“一、

二、三、四”的口令在操场练习跑步，为有朝一日应征入伍作准备。

此外，革命文学作品、包括苏联文学作品也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儿子》、《真正的人》、《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一口气可以举出很多。书中的主人公或者说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保尔·柯察金那段脍炙人口的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渡过：当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成了我的座右铭。

大约是1955年的一天，在景山过团日，我忽然发现有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正向山上走来，其中一位白发老妇人特别像卓娅的母亲（《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我们便迎上前去，用半生不熟的俄语自我介绍，并邀请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做客。她果然就是英雄的母亲！激动之余，我在黑板上向全校同学报告喜讯：我们见到了卓娅的妈妈！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党的最高领袖在我的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我说来，共产党、新社会成了光明、进步的代名词，国民党、旧社会则是黑暗、腐朽的代名词，一团漆黑，毫无可取之处。

师大校园里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底层之声”、“苦药社”等社团应运而生，“群众论坛”成了大家各抒己见的场所。既然整顿三风是党中央的号召，下面又确有大量的缺点错误有待揭发，那我们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我也开始写大字报了，不过多是呼吁进行教学方面的改革，因不知内情，无从揭发。

一日，同屋党员在宿舍里说：肃反虽有缺点错误，其成绩却不可一概抹杀。我听了颇觉反感：明明冤枉了不少好人，造成了许多后遗症，干吗还要去肯定它呢？一时冲动之下：我写了题为《肃反“收获”剖析》的大字报。开头是：“某党员观大字报归来，曰：肃反虽有缺点错误，然其成绩亦不可一概抹杀。”接着便对肃反的收获一一予以批驳，最后得出结论：“可见，肃反运动的最大‘收获’是：后患无穷。”我这里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事实根据。根据就是我曾亲自经历的肃反运动。

1955年暑假，师大开展肃反运动。我当时本已事先定好假期学习舢板和射击两个军事体育项目，可以暂不参加运动。但我求“战”心切，遂中途退出训练，返校参加肃反。

我所在的班正好有一肃反对象，说不定还真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此人叫许之品。是部队转业来上大学的。平日表现与大家并无不同，现在将他定为肃反对象，是因为他“历史可疑”。许原是个孤儿，为生活所迫，进了国民党青年军的军校，后因思想进步，于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军。现在怀疑他是受国民党派遣打进解放军的特务，却又无任何真凭实据。只有对他进行轮番批斗，唯一的材料是他在国民党军校时的个人日记。我当时很希望他最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枉斗争一场。除了开斗争会外，还对他搞监视、钉梢，以防他有别的活动或者自杀。好端端的一个同学，却要当成敌人去斗，真有些下不了手。但又告诫自己：不能有温情主义啊。于是会上发言就力求尖锐、有力，内心里尽量把他当成敌人来恨。冷静下来时，即免不了担心：会不会白斗一场啊？万一他不是反革命呢？

一年之后，许之品的历史问题有了结论：政治态度中间偏左。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本人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只是没有表露出来罢了。1957年整风期间，他自然要出来鸣冤叫屈，言词激烈，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愤怒和抗议。作为一个曾积极参与其事、说得难听点是充当“打手”的我，感到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很为他抱不平。正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肃反的若干副作用，如伤害被斗者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造成新的隔阂等。这也就是那篇大字报立论的依据。

当时有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就是相当一部分平素对党紧跟、政治上十分积极的人这次却按兵不动。相形之下，我更感到自己是得风气之先，不像他们那样思想僵化、唯唯诺诺，而

是独立思考、仗义执言。我还写大字报，讽刺这些人，讥之为“乖孩子”、“绵羊”。

师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始终都是一边倒，都是揭发缺点错误。直到有一天忽然看见这样的提醒：“同学们，不要忘了毛主席昨天说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我却并未因此“清醒”过来，反而觉得这样的提醒纯属多余，而且可笑：谁离开社会主义了？我认为，大家都是怀着赤子之心，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给党提意见，谁也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啊。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其实毛泽东早在5月15日即提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

我却仍然执迷不悟，以《不要用大帽子吓唬人》为题写大字报，把人民日报对葛佩琦的批判说成是围剿。

有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你这篇讲肃反的大字报，党委宣传部可是拍照了。”我听了心里“格登”一下，这才隐约感觉到自己已经闯下大祸。

形势急转直下。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通篇的调子和我们三四月份听到的传达相去甚远，其中还提出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是过去传达的报告中没有的。从广开言路、鼓励鸣放到舆论一律、实施反击，这个弯子转得实在太大了。但因为那是党的号召、“金口玉言”，我辈便紧跟犹恐不及，一味责备起自己来了。班里有位女同学出身革命干部家庭，思想僵化得可以，反右斗争开始后，她在小组会上说，她对前一段鸣放根本看不惯，而且感到忧心如焚。我在日记里写道：“同是青年，为何感受截然不同？”痛感自己没有站稳立场，竟与右派共鸣，当了右派的传声筒。

师大的反右派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穆木天、黄药眠、陶大镛、傅种孙、胡明（俄语系主任）等名教授纷纷落马。“底层之声”、“苦药社”、“群众论坛”等社团头面人物也难逃厄运。我班只划了个许之品。这位当初弃暗投明的热血青年，躲过了肃反却躲不过反右，而前面等待着他的，还有牢狱之灾呢。

这次命运之神对我网开一面，虽有那么“尖端”、值得“存档”的大字报，却侥幸地未被触动。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学校放暑假，我回家探亲，在火车上遇到一位级别不算很低的干部，他说：“原来中央对大学生寄予很高的期望，是想让他们接班的，这次整风反右使中央感到失望，看来大学生靠不住了。”1957年9月以前，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点工资为行政21级，此后即降为行政22级。这也许是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之一吧。

在老家与中学同学谈起我在整风反右中的表现，他们都认为“问题严重”。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学校。系团总支改选，不让我参加。我背上了思想包袱，觉得自己前途暗淡。却绝未料到前面还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我。

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大约在1957年年底，突然通知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不许参加集体活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隔离反省”吧。此次来势凶猛，我自知凶多吉少。右派分子的帽子尚未扣到头上，我却已经“心悦诚服”地把自己归入敌人的行列了。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我“攻击肃反”就犯了“破坏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那还不是敌人？

自从隔离反省的那一天起，我就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友谊，也失去了自由。只有几个“人另册”的倒霉鬼可以在一起交谈几句。记得其中一位说过这样的话：“唉，我们都已经没有灵魂，成行尸走肉了。”这大概是受了毛泽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句名言的影响吧。

曾与我同车赴京入学的某女同学，反右中成了“响当当的左派”，一次我与她在空旷的溜冰场上偶然视线相遇，她那冷峻甚至蔑视的目光令我一直凉到心底。曾几何时，她还“亲切地”与我“共商”如何在团内开展“鸣放”的“大计”呢，如今却壁垒分明，誓不两立。

同若干年后我受到的野蛮批斗相比，1958年元月底那次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会，就显得太过文明了。就在我所在的班级的教室里，几位同学作了“愤怒声讨”的发言，与会者又喊了几句“坚决打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类的口号，便草草收场。从这一刻起，人人都和我“划清界限”。平日相濡以沫，情同手足，如今则视同陌路，敬而远之。这年的春节，寒风凛冽，校园里冷冷清清，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楼前席棚上，赫然贴着我的“罪状”，红底黑字，标题为《右派分子X X 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我独自一人，枯坐在教室里，咀嚼着“人另册”的滋味。当时尚未意识到，此生已注定当俎上肉，任人宰割了。

脱胎换骨

右派帽子戴上了。这敌人可怎么当？倒成了新课题。那个堪称“资深运动员”的许之品向我们传授经验说：要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身份。换句话说，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真是绝妙的紧箍咒！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他当然不会想到，因他的这一“金口玉言”被定为所谓“右派分子”的人，明明是好人，并非反派人物，却硬要他们被迫扮演反派角色，那怎么装得像呢，也只能“装腔作势，不大自然”了。“狐狸尾巴”（应作“绵羊尾巴”）总要露出来。拿我来说，所谓“翘尾巴”与反“翘尾巴”的斗争就贯穿着我的“改造”过程的始终。

“加冕”之后，发生了有趣的“换位”。整风反右前我曾充当班里一名广西籍同学的入团介绍人，曾反复开导他如何创造条件争取入团。如今正好来个角色互换：由他来做我的“联系人”，我得定期向他汇报思想。岂不滑稽？

有人交给我一封信，家母在信中义正辞严地对我进行了谴责，说我是忘恩负义。我颇感吃惊。暑期返乡，阔别数年之后母子团聚，儿子又是就读于首都的名牌大学，该是何等风光！家母只顾高兴了，做梦也想不到儿子早已闯下大祸。此事对她的打击之大，不言而喻。耐人寻味的是，我拿到手里的信居然已经拆封。校方既然迫不及待地将“喜讯”报告给学生家长，接到回复后“先睹为快”就是/顷理成章的了。幸而家母写的都是一通冠冕堂皇的话，未让校方抓到什么把柄。

事隔半年之后的这次运动，叫做“反右补课”，而始作俑者便是臭名昭著的康生。据说师大就是这个整人老手亲自抓的点，又据说他曾经说过：“铁狮子坟闹鬼闹那么厉害，怎么才这么几个右派？”（铁狮子坟系师大所在地）

令人奇怪的是，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三部分明文规定了六种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如“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而时隔两个月之后又突然决定进行反右补课，进一步扩大了打击的范围。

即以我所在师大俄语系54级，1957年夏天定了两名右派，1958年初反右补课中又定了六名，一共八名，占学生总数（约80名）的10%，可谓“成就辉煌”。这说的是数量，那么“质量”又如何呢？即使按照当时划右派的标准，也不敢恭维。其中至少有两位的右派定性是莫名其妙的。

一位姓罗的上海籍同学，鸣放中从未在公开场合表露过自己的看法，即“裁”在他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上。这封信并未发表，也未散布过，就是说并未造成任何影响。当时就凭光明日报原封转回师大党组织的这封信中“不合时宜”的观点，给罗定了性。

另一位女同学与我是同乡，而且在1954年同乘一辆卡车赴京入学。她同样从未在大会小会或大字报上陈述过自己的观点，即“裁”在与同宿舍三两女友“窃窃私语”上。一位

与她同乡、同室自然也同性的有心人悄悄地记下她的“言论”，日后这便成了给她定性的唯一依据。

八名右派，除一名上海籍女同学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外，其余七名均从轻发落，“留校察看”。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不仅使我沦为阶下囚，而且打断了我那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这是让我最感痛心的！

我的恩师刘媛娜先生原籍格鲁吉亚，婚后随中国丈夫来到中国，人中国籍，起中国名，过起了与普通中国百姓毫无二致的生活。我利用课余时间登门求教，多为步行，走到西单，再走回去，只是偶尔坐上几站电车。先生的发音绝对纯正不说，还特别清脆响亮，语速不紧不慢，听起来简直是一种享受。先生为我制定了系统的阅读原文作品的计划：先易后难，从契诃夫的作品开始，然后是莱蒙托夫、普希金……先生所说的“Чтение и практика——это вся ваша жизнь”（阅读和实践就是你的全部生活）我牢记在心，手不释卷，如醉如痴。甚至走在大街上，手里也拿着一本原文小说，口中念念有词地默诵着书中的语句。当时状态极佳，俄语学习突飞猛进，若假以时日，“攻下”俄语应该不在话下。如今政治风暴袭来，“改造”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业务学习只好靠边。

既来之，则安之。从此开始了无比漫长、没有终点的“改造”过程。有一首诗是对此绝妙的写照，诗云：

躬逢盛世复加冕，
弱冠未及已出圈。
终日悔罪终有罪，
可怜少年变老年。

这“改造”过程岂止没有终点，连起点也似有却无。当时的提法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或曰“否定旧我”。“旧我”统共十七八年，除去襁褓之中、牙牙学语、穿开裆裤、启蒙识字，真正记事也就那么七八年。如前所述，这七八年我都是在“跟党走革命”啊，何罪之有？况且我上中学读大学，均是靠人民助学金生活，用一句不太确切的话来说，是“党一手拉扯大的”。存在决定意识。我应该对党感恩戴德才是。话虽这么说，我当年可是冥思苦想，十分“认真”地深挖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无中生有、生拉硬扯。除了阶级根源，还要查思想根源。你不是学习拔尖吗？那就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一心成名成家，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甚至是“白专典型”。

五一节到了。照例是白天游行，晚上狂欢。我是1954年8月入学的。北京是千千万万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天安门则是圣地的中心。火红的朝霞中，列车徐徐驶入前门车站。我们站在正阳门外（当时还有城墙），远远地望着魂萦梦牵的天安门，却不能立刻前往，因为正在等候校车。校车把我们拉进和平门外的师大校园，扑面而来的是一条“欢迎你，新同学！”的红底白字大标语。匆匆吃罢午饭，我就迫不及待地朝圣地赶去。又不识路，好在知道那高高耸立的工棚是正在施工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就像灯塔一样引领着我。终于来到广场，实实在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天安门，一了多年的心愿。原来天安门城楼屋顶上还长着草呢！后来把这一重大现场发现写报告给远在四川的好友。那天实在太兴奋了，逗留的时间过长，还误了学生食堂的晚饭，只好在外面小铺买了个馒头充饥。也是事有凑巧，那年正开第一届人代会。入学不久，尚未等到十一国庆节，我们就“提前”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庆祝人代会闭幕的狂欢活动。一位女同学的发言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她说：“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如果学习再不搞好，真该打屁股了。”我们都把见伟大领袖当成在京读书期间最幸福的事情，甚至早就计算好了：上四年大学见八次（每年五一、十一两次游行）。每每行至金水桥畔，无不欢呼雀跃，“万岁！”“万岁！”的喊声震天价响，并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甚至干

脆停下不走，随后则照例是一溜小跑，去追赶前面的队伍。至于到天安门前当标兵（区分游行队伍不同方队的活标杆），则更是一件大幸事，人人趋之若鹜。因为每过半小时就可面对天安门城楼站上半小时，那看见领袖的机会就多得多了。我就曾无比荣幸地在天安门前当过一次标兵。入夜，广播喇叭里传来激动人心的舞曲，那歌词是：“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我们在广场上尽情地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今年不同的是，我没有资格参加游行，只能搬个小板凳坐在西单路口参观。这对我刺激很大。这下可好，连欢呼万岁的资格也取消了。我并不甘心，晚上又死皮赖脸地跑到中山公园去看焰火。远远望着广场上欢乐的海洋，思前想后，悔恨交加。我暗下决心：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

虽已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政治上的热情并未稍减。举凡向党交心、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育革命、劳动锻炼，甚至荒唐至极的“打麻雀”，统统积极参与。认为此乃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虽荒废学业也在所不惜。当时对党和党的领袖仍是无限崇拜，对党的每项决策从不怀疑。把自己的积极参与当成立功赎罪、向党和人民靠拢的表现。

如今人们一致谴责文革是一场文化浩劫，殊不知鄙薄知识、竭力贬低专家教授并不自文革始。早在1957年即已“蔚然成风”。当时校园里“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教授和专家！”之类的口号不绝于耳。党的领袖甚至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极端的命题。你说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还有何用？未出茅庐的学生苦战几昼夜即可编出教材。不但教授挨批，抬不起头，就连莘莘学子也未能幸免。那些好不容易躲过反右这场灾祸的学习尖子，纷纷成为“白专典型”，成为“拔白旗”的对象，被迫在大会上现身说法，沉痛地检查自己不问政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言犹在耳，眼下却开始了“斯文扫地”的“新时代”。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们惊呼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学术水平一代不如一代，多归咎于文革。其实，反右派斗争和紧接着反右之后的大批判，已使学术界、教育界元气大伤，那种万马奔腾攀登科学高峰的热烈场面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踌躇满志地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诚哉斯言，1957—1958年针对广大知识分子的粗暴批判对于我国科学教育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该“估计小了”。从此人人谈“专”色变（“专”成了“专心读书”的代名词），凡是过来人都不该忘记的。（国内一位学者将反右派斗争概括为五个字：最好的出局。此话不无道理。）

大轰大嗡之中，已到了1958年8月，临近毕业分配。平心而论，在师大度过的这半年右派岁月，是本人“人另册”后最宽松的时期与以后受到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受到孤立，谁也不敢亲近你，但除了个别“响当当的左派”的白眼之外，倒没有受到更多的歧视和打击。此间同窗数载，亲如一家，谁也不会想到要加害于你，同你“划清界限”也是出于无奈。系党总支负责人经常找我谈话，勉励我“好好改造”。

虽负罪在身，我在分配问题上倒是很“革命”的。我主动报名到边远地区，甚至在得知分到宁夏时还有些许遗憾，因为觉得宁夏不如新疆、青海艰苦。当时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我登上敞篷卡车离开师大，车上插有白底红字“建设共产主义宁夏！”的小旗。在前门车站，与同窗好友握手告别，给我的临别赠言是：“好好改造。”我在心里说道：再见了，北京！再见了，天安门！我一定以崭新的面貌归来。

经过两三天的颠簸，终于抵达银川。这是即将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不久前刚刚通火车，车站上只有几处草棚。市区内也一幅破败景象，土坯房随处可见。直到文革后期，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条街，两座楼（指后来新盖的邮电大楼和百货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公园里只有两只猴。”区党委书记马玉槐前来看望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大学生，勉励

我们要“死在宁夏，葬在贺兰山。”我们当时分配来宁夏，既未享受卧铺，也未住招待所，而是在教室里睡通铺。待分配期间，还几乎天天排着队、唱着歌出去劳动，有领导赞道：“你们真不愧是大跃进时代的新型大学生！”

初到宁夏没几天，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大学生正集合在政府礼堂准备听报告，突然有人在台上大声宣布：“右派分子出去！”于是我们这几个可怜虫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会场。还不能让你们太舒服了：都给我搬土坯！所谓土坯，就是未经烧制的土砖，用来砌墙、盖房，每个坯都有四五个普通砖头那么大。从此我就同土坯结下不解之缘：脱土坯（作土砖），搬土坯，住土坯房。这年的国庆节，本是普天同庆的好日子，还是这几个可怜虫，不但没有资格同大家一起去参加游行，而且命里注定要服劳役。记得那天天色微明我们即赶到工地搬土坯，一个个情绪低落，不声不响地埋头干活。

分配方案即将公布，我为了表示与“旧我”决裂、重新做人的决心，十分可笑地把从中学到大学的不多几张照片统统扔进火炉，付之一炬。

我被分配在宁夏师范学院。该校系在银川师范的基础上“戴帽子”组建而成。不久，我们这批新去的大学生领到第一笔工资。我的那个纸袋上原来也写有“同志”二字，后来经办人仔细地用铅笔给涂掉了。而且，右派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我领到的是三十二元五角。“好人”是五十六元。我领到钱后，到街上买了脸盆、暖壶等物，还特意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家有老母，还有四五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眼下却无法接济他们。

从具有水暖设施的北京师大，来到号称宁夏首府的银川市，生活条件可说是一落千丈。这里属高寒地带，冬天滴水成冰，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几度，住的是自己盖的土坯房，那封闭的室外蹲坑厕所，入冬后粪尿结成厚厚一层冰，叫你无处下脚。井水苦中带咸，不能饮用，用来洗衣服也会结上一层白霜。饮用水得靠工友到校外去拉。两年后迁至新校区，这里矗立着孤零零的两三栋楼房，没有自来水，暖气更无从谈起，周围则是漫无边际的西沙窝，荒无人烟，一片凄凉。风沙袭来，遮天蔽日。

白手起家办大学，困难重重。建图书馆也是当务之急。于是几个不能上讲台的右派便分去搞图书。没过两天，发现教材吃紧，我和另外一位又调去刻印讲义，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文抄公”生涯。当时全校三个班的讲义全部压在我们两人的头上，时间紧，任务重，得在蜡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出来，再由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刷。为了赶在学生上新课之前领到讲义，我们常常从清晨忙到深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而且对此甘之若饴，从不叫苦叫累。繁重的工作当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还要汇报思想，集中讨论，悔过认罪，深挖根源，对自己无限上纲。我实际上过着“两面人”的生活。一面是自觉自愿、毫无保留地为国效力；一面是扮演“敌人”的角色。把地地道道的好人先打成坏人，再将他变成好人，无论这个命题在今天看来有多么荒谬绝伦，我当时却一直在身体力行，不敢懈怠。“主动暴露思想”，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交代自己有过多么反动的思想，再进行自我批判，把自己痛骂一通。这种荒唐的做法有时也带来恶果。尽管工作中一贯十分卖力，无懈可击，就因为把自己说得太过反动了，让人家抓住把柄，一次竟在全校大会上把我当成“三类右派”点名批判，勒令我“站起来”，当众羞辱。

我的这位搭档，乃师大中文系的美男子。眉目娟秀，写出的字也娟秀，真是字如其人。他多才多艺。口琴吹得好，还会摄影。学习成绩优秀不说，又曾是校学生会军体部部长，几项校级运动纪录保持者。堪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学生。女友则是国内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舞蹈演员。两人已经私订终身。就是这样一对金童玉女，被无情的反右派斗争活活地拆散了。如今，他沦落为边远地区一名头戴紧箍咒的“文抄公”。终日愁容满面，形销骨立。

不久，调来一位女打字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三十多岁，有四个孩子。因为是党员，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领导，我们都尊称她为“老师”。

这位“老师”上任之初，便开始发难。原因何在？她拖家带口，当然受不了我们这种拼

命似地工作。说我们是“游击作风”、“工作效率不高”，坚持要搞八小时工作制。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她每天按时上下班，我们仍然“死不悔改”地加班加点。这倒无所谓，没想到这位“老师”的出现，给我的改造投下了阴影。

本来，我和搭档都是在师大当的右派，同病相怜，同心协力，配合默契。为了使印出的讲义字体清晰，不带油纹，我们还绞尽脑汁，反复摸索，舍弃市售的油墨，改用铅印油墨加煤油调制。

“老师”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我们毕竟是大学的优等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是工作骨干。这样就免不了与“老师”发生碰撞。一位老大姐看在眼里，找机会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你这个人忒老实，你老是钱着 X 老师，你看人家谁谁谁就不像你这样”。（老大姐比我们这些毛孩子大十好几岁，洞悉人情世故，是北京支边的资深打字员，至今还记得她那满口的京腔。）无奈本人生性迂腐，死活学不会。三天两头“老师”便开会批我。关心工作、出谋划策被说成“指手划脚”，甚至“不服罪”、“与党争夺领导权”。工作卖力说成“与党团员争高低”。甚至如实说出自己的出生年月，也因大学毕业尚不满二十而被讥为“吹嘘自己的光荣史”。我则对此安之若素，手捧笔记本认真记录。但本性难改，没过几天又故态复萌，“又翘尾巴了”。这右派的角色我就是演不好。

“天下黄河，独富一套”。“天下黄河富宁夏”。银川平原古渠纵横，自流灌溉，自古如此，从无旱涝之虞。就是这样一个素有“塞上江南”美称的鱼米之乡，1960年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物资匮乏、粮食奇缺的“低标准、瓜菜代”时期。明明是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主流话语中却硬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所致。粮食定量最低时每人每月26斤。为了采摘榆树叶，青年教师被迫步行前往数十公里之外的贺兰山，再如牛负重般地将树叶背回学校，过度劳累使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我仗着自己年轻力壮，仍是天天加班，终于得了浮肿病。有的好心人甚至怕我快顶不住了。当时物资匮乏到了极点，连饭碗也成紧缺商品，就用废罐头盒代替，打回菜汤来，加点酱油膏，再放到火炉上咕嘟一阵，似乎这样可以增加一点营养。加班加点，仅可得到几个土豆之类的“犒赏”。

早在1959年就有“右派摘帽”一说。但“摘帽”始终与我无缘。好像是在1961年，调来一位新的人事处长，女性，叫侯玲。她与盛气凌人的前任大不一样，通情达理，和蔼可亲。一次右派开会，她说有的人把自己说得反动透顶，给自己瞎扣帽子，这样对改造没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此说有点新鲜，原先的列位“改造者”全都是惟恐我“挖掘不深”、“暴露不够”。时隔不久，就听说准备给我“摘帽”。当然还得经群众通过。在讨论是否“摘帽”的会上，一贯左得出奇的“老师”和团员因知道上面的精神，一致同意“摘帽”，说什么“一项右派帽子压得他够沉的了”。倒是不明就里的非党人士不赞成，理由是“他至今不服罪”。好在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并无大碍。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侯玲的到任对我是个转机。我在多年右派生涯中，遇到的党员干部可谓多矣，她可能算是其中唯一的大好人。

当时以为帽子一摘就万事大吉，一了百了。从此便可恢复未定右派之前的一切待遇。还曾异想天开地向侯玲表示希望重新入团，她明知不行，又不愿让我太扫兴，便委婉地鼓励我“直接争取入党”。侯玲很快就调走了。以后再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自“摘帽”之日起，即可享受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试用期工资，比生活费多了24.5元。无帽一身轻，我迫不及待地写信四处报喜。还照了一张照片寄回家中。家母见我骨瘦如柴（浮肿病的后果），简直吓坏了，以为我受了什么虐待，甚至找人商量要把我“喊回去”。

1963年初，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胸前别着北师大毕业纪念章和苏联共青团团徽。自认为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亲友的面前。老同学向我透露，最近在搞平反甄别，你也可以提出来嘛。我答说我的问题严重，不能甄别。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中居然成重灾区，城镇居民的口粮一度降至每人每月19斤，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饿死人已不是什么新闻。家母和年幼的弟妹之所以挺了过来，主要是沾了豆渣的光。原来他们住在

一家酱品厂的宿舍，豆渣乃制酱品时的下脚料。回家第一天，家母用美味的肉丝面款待我，大概是因为吃得太多吧，居然拉开了肚子。

返程中特意绕道北京。天安门自然是第一个要去的地方。适逢师大一女老师带着孩子在纪念碑前游玩，他说：刘先生前几天还念叨你来着。我急忙赶赴先生家。先生一见面就用俄语说道：“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ы”这是久别重逢时高兴的问候语。还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我“bangla”，意思是说我长胖了。其实我那是浮肿病后的虚胖。依然是红茶相待。先生勉励我好好读俄文原著，还给我开了一张作品清单。可惜后来运动不断，大好时光全部荒废，辜负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此次返乡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家人团聚，度过严冬之后倍感亲情的温暖。忧的是家母和年幼的弟妹们连粗茶淡饭也难以继。返回工作单位后，我开始节衣缩食，接济家里。

灭顶之灾

毕业五载，学非所用。我强烈地希望回到本行。但俄语在边远地区除教书外派不上别的用场。我当时求“战”心切，主动提出去中学，甚至去外县也行。1963年8月，终于获准到附属中学教俄语。后来得知，为了让附中头头高高兴兴地收下我这个“处理品”，大学校长说我是“价廉物美”。

我所钟爱的俄语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记得开学典礼上，我特地用俄语向同学们致词，再由另一位老师译成中文。一时好不得意！我还精心设计了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好像是从每逢盛大节日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肖像说到学习外语的必要性。初上讲台，自是兴奋异常。学生刚进中学，对外语也感到新奇有趣。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第一学年教初中一年级，不知道如何将看似浅显的东西给学生教会，更不懂得怎样管理学生。情急之中，难免犯简单粗暴的毛病。教学效果也不理想。到第二学年再教初一，情况即大为改观。由于教学较为得法，学生成绩大幅提高。校方还让我去教新招来的第一个高中班。殊不知第一学年已埋下祸根。

1964年冬天，正当我志得意满地担任从初中到高中的三个年级的俄语课时，厄运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校方莫名其妙地停了我的课，让我准备“接受大家的帮助”。几天以后开全校教职工大会，平素对我还算客气的几位老师奉命在会上对我进行了强词夺理的批判。于是，简单粗暴上纲为“阶级报复”，关心学生成了“拉拢腐蚀”、“争夺接班人”。只字不提我在教学中的成绩与进步，这次批判对我无异于当头一棒。原以为只要“摘帽”即可“回到人民怀抱”，即可安心搞本行、钻业务，从此告别“终日悔罪终有罪”的生活。如今这一切又成泡影。依然是俎上肉，任人宰割。当权者随时都可以把你提溜出来收拾一顿。今后的路怎么走？我感到茫然。原来，这是所谓的“面上社教”的前奏。

我从此被赶下讲台，重操旧业——刻刻写写之类的事务性工作。1965年春天，校方决定创办农场，作为师生的劳动基地。派谁去呢？我自然被列入“首发阵容”。我专司积肥，每天赶着毛驴车往返十余公里到学校掏大粪。曾几何时，我还在讲台上充当所谓的“灵魂工程师”，眼下却低声下气地在学生上厕所的地方掏大粪，那真是“触及灵魂”。农场搞了不到一年就草草收场，我又回到学校打杂。

1966年夏天，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这便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我真乃三生有幸，躬逢盛世。年方十九即光荣加冕，如今又遇到这场狂飙，险些丢掉小命。

运动之初，也就是一般的学习讨论，批批“三家村”。到了开始“联系实际”，就不那么“好玩儿”了。教师们都相互揭发，人人自危。为了表明自己“革命”，为了响应号召，为了自己的生存，大家都昧着良心，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地写大字报彼此攻击。我自然成为“众

矢之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农场劳动时结识的一位老农工。此人解放前放过骆驼，当过长工，堪称苦大仇深。如今在农场放羊，正好和我住在一起。遵照毛泽东“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的最后的分界，就看他是否愿意并自觉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指示，我抱着“结合”、“改造”的目的主动同他接触，和他同睡一张热炕，同食一锅杂碎，还特意到他家去过大年，试图从中受到教育或者感化，然而除了增进个人友情之外，似乎并无其他收获。揭批“三家村”阶段，我可能在闲谈中说过曾去农场。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某位老兄就写大写报，毫无根据地说我“上串下跳，到农场煽风点火”。

学生也写大字报揭发我，都是一些牵强附会的内容。例如我曾说过 O 型血是“共产主义血型”，这就叫“诬蔑共产主义”；又如我说过当初经济不宽裕、准备高考时为了补充营养就买西红柿吃，这就叫“诬蔑社会主义”。

然而，真正在全国掀起打倒一切、乱揪乱斗、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狂潮的，是毛泽东写信支持并亲自接见红卫兵、林彪号召“破四旧”、《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条毛泽东语录。“我们就是要搞红色恐怖！”校园里一时间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我自知凶多吉少，在劫难逃。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独自一人来到银川西关外唐徕渠，想就在此一了百了。看到许多多少男女纷纷下水，游泳嬉戏，一片和平景象，又抱着侥幸心理折转回来，不料当天下午校园里就开始了乱揪乱斗。英雄们押着我们几个教员在校园里游街，让我们都牵着一一条染成黑色的绳索，暗指我们都是黑帮。一路上“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我是第一次获得“被打倒”的“殊荣”。不久前大学毕业分到附中工作的一位女老师，我曾热心帮助过她，眼下也跟着了魔似的，声嘶力竭地高呼打倒我的口号。

揪斗之后，意犹未尽。决定第二天召开斗争大会。勒令我们自己糊高帽子，并写上“打倒某某某！”的字样。这叫自备道具。斗争大会开始之前，我还对着镜子反复试戴，看看效果。有人路过，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斗争大会上，前面是一大排头戴高帽、低头站立的倒霉鬼，煞是壮观。

我们怎能忘记，
牛记集中营里
那阴霾乌黑的天。
供我们享用的，
是苦役、屈辱、皮鞭！

从这几句诗中可以依稀感到当时的血腥气息。我和另外几位教员很快成了“牛鬼蛇神”。我的身份又“升格”了：从“摘帽右派”变成“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牛棚”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牛鬼蛇神。

英雄们给我们剃了“阴阳头”，就是拿推子在你头上横七竖八地推几下，弄的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老师经这么一折腾，真叫惨不忍睹。这还不算，还得背上写有“X X X X 分子 X X X”之类字样的布条，成天在校内外服苦役，累得直不起腰，旁边还有英雄们皮鞭伺候。有一次我莫名其妙地挨了几皮鞭，回到牛棚，翻开《毛泽东选集》，望着夹在书中的领袖照片，抱头痛哭。仿佛在向领袖诉说冤屈。

且说那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女老师，教学有方，班主任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同学生的关系可说是亲密无间。却莫名其妙地被打成所谓的“反党小集团”成员，自然也入围“牛鬼蛇神”。于是大祸临头。她明明患有心脏病，英雄们却勒令她跑步爬楼梯，跑上三楼，再从另一道门的楼梯跑下来，直跑得摔倒在地为止。还左右开弓地打耳光，打得她满脸是血，甚至把月经带往她嘴里塞。可谓极尽摧残凌辱之能事。

早晨天蒙蒙亮，来自校外大喇叭那震耳欲聋的语录歌声就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我们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歌声中，拖着疲倦的身躯硬撑着起来，睡眼惺忪地开始一天的苦役。终日心情压抑，了无乐趣，甚至每日漱口时嚼到牙膏里那一点点水果味，都觉得是一大享受。

造反英雄们规定我们每天必须做出六百块土坯，那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完不成会怎么办呢？简直不敢去想，这时我又动了轻生的念头。原因很简单：活不下去。眼前这关就过不了。如何了结此生呢？到唐徕渠。有一天终于登上开往该处的公共汽车，却鬼使神差地“半途而废”，没走多远就折了回来。

总算没有出现特别恐怖的事情。但那是怎样的屈辱和折磨啊！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有个稍稍放松的机会，可以喘口气了：“看守”也得休息嘛。谁知门外闯进一位久违的英雄来，凶神恶煞地喝令我们乖乖地站好，我们顿时心惊肉跳，不知又会有什么大祸临头。只见他倒背双手，哼啦哈地训开话了：“你们都给我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吗？啊？都他妈的给我老实点儿！”那神态，整个一个银幕上的法西斯。一通煞有介事的训斥和警告之后，扬长而去。不料我们之中的一位受此惊吓，竟当场晕厥，不省人事。

当场晕倒的那位原是大学历史系教员，颇有功底，写得一手好字。本已在60年代初考取中科院历史所贺昌群教授招收的唯一一名隋唐史研究生，后遵照党组织“临走前整理整理思想，轻装上阵”的意见，将自己在困难时期的一些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向党交心”。这一“交心”不要紧，研究生的资格取消了，还不让上讲台，发配到附中来打杂。真是迂腐得可以。文革中他也因此得了个“修正主义分子”的头衔并进入“牛棚”。其实这种利用本人的“交心材料”甚至日记反过来整人的做法，文革前和文革中都并不少见。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我在斗争大会上交待罪行时，前面提到的那位女老师突然声色俱厉地高喊：“他一点也不老实！他还……”说着就振振有词地揭发开了，那揭发内容全部来自我的书面交代材料。

大概是为了表示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吧，英雄们挖空心思，为“牛鬼蛇神”提供最恶劣的生活条件。如本来可以搭床铺的，却偏偏要让你睡地铺；扣掉你的工资，只发十几块钱生活费。“斗争方式”也是花样翻新，反正是怎么狠怎么来，岂能心慈手软。

什么戴高帽、剃阴阳头、背上“什么什么分子”的布条，尽管搞得你人不人鬼不鬼，好在都是在校园之内，也就认了。可英雄们下令：到了校外，甚至大街也得背着布条走，以便“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其实我等出去只有一个目的：买点儿熟肉香肠，补充补充热量。苦役太繁重，颇有“人不敷出”的感觉。背着布条走，无异于游街示众；不背吧，又怕躲不过英雄们的“火眼金睛”。想来想去，总算找到一条“万全之策”：准备两件衣服一件带布条，一件不带布条，请假离校时穿带布条走出一段路再换上不带布条的，返校时也提前把衣服再换回来。办法倒是有了，但每次出去都是提心吊胆，幸好没出什么问题，大概英雄们也是鞭长莫及吧。

要问英雄们何以如此嚣张？那是因为他们有恃无恐。别看他们原也不过是普通学生，如今可是有“伟大统帅”撑腰，手握“雄文四卷”和其威力并不亚于“钦此”的诸如“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么温良恭俭让”之类的“最高指示”，确是今非昔比了，唯其对你越狠才显得越革命。当时身边就有过完全照着“语录”把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事例，那真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时间，什么良心、正义，什么道德、文明，无一不在“横扫”之列。所有灭绝人性、藐视文明的暴行，统统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发生的。

别看我们在牛记集中营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学习会上却照样唱高调，如有人说：尽管自己受点苦，但考虑到这是防修反修的需要，思想也就通了。防修反修居然要普通百姓受苦受难，这叫什么逻辑？

英雄们渐渐地对我们失去了兴趣，杀向社会去了。运动初期完全处于被告地位的教职工，这时也总算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到一起讨论问题了。主要的话题之一是所谓的“批判反动路线”。我们这些进过“牛棚”、所谓“受迫害最深的人”，一下子又成了香饽饽，有人争着来同我们套近乎。我便趁机会混迹于“革命群众”的行列，所谓的造反派组织也来者不拒地招兵买马，以壮声势。我曾写过几篇小短文，以小字报的方式张贴出去。都是围绕批反动路线的主题。

六八年夏天，军训营进驻我校。当时正在落实“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的“最高指示”。所谓的谈心，最终还是落实到向领袖表忠心上面。据说部队一通讯连战士谈心谈到激动处，声泪俱下，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心，不顾大家劝阻，硬是把一枚毛泽东像章别到前胸的肉上，弄得皮开肉绽。能够享受同革命师生一样的待遇，我颇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于是也在谈心会上“敞开心扉”，说什么自己本来有思想障碍，也不想说，因为老实人总是吃亏。这番开场白原本是批判自己的错误想法，没想到后来又成了我的一条新罪状，叫做“宣扬‘老实人吃亏’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

文革的特点之一是无法无天，胡批乱斗，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于是大家都谨小慎微，惟恐出事。我却懵里懵懂地干了一件引火烧身的蠢事。按理说，既然已经因言贾祸，打人另册，应该有所醒悟了吧。可悲的是，我对毛泽东的盲目虔诚并未因此稍减，甚至还在思想上步步紧跟。自作多情地把自己划入革命的行列，所谓的“不把自己当外人”。一有机会，就要表现自己是多么地革命。一九六八年，中央号召各派去掉派性搞大联合。我一时心血来潮，草拟了一份倒旗大联合的倡议书，四处征集教职工的签名，后来果然实现了教职工的大联合。我还为此感到沾沾自喜。岂料从此留下祸根。英雄们从社会上杀回学校一看，这还了得，堂堂造反派都倒旗了。除了重新打出造反派的大旗而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这个“罪魁祸首”揪了出来。后来，有人就此一针见血地说：“你可能以为你只是在‘圈儿’里跳，没有出‘圈儿’，其实你是只要一跳就出‘圈儿’。”我已是在劫难逃。

大难临头。怎么办？我的选择是：了结此生。年近三十，空怀报国之心却报国无门，成天被人七斗八斗，活在世上与行尸走肉无异，不过是充当“反面教员”（或曰“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已。我此去虽愧对老母，但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又能给她老人家脸上增添什么光彩呢？举目四顾，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等待着我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

主意已定，我就踏上了不归路。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地点选在住地西边贺兰山麓的西干渠，我虽未曾实地考察过，但知道只要纵身一跳即可。那是正准备对我进行“专场批判”的前夜。我将日记、信件等物一一别在身上，以防抄走。傍晚果然有人来抄，却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晚饭后，我一直捱到子夜之后，才将房门反锁，从窗户跳出，三步两步便上了西去的大道。此时万籁俱寂，我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谁知西干渠竟是如此地遥远，足足走了两三个钟头，至天色微明时方到。最煞风景的是那渠水的深度：仅及腰部，离没顶差远了。我把随身带的东西往水里一扔，将头部潜入水中，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唉，活着不易，哪晓得死也这么难。我又灰溜溜地爬上岸来。既然寻死不成，就得赶回去接受批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幸遇一顺路汽车，待我原路赶回，翻进窗户，门外已有人声，批斗会即将开场。所谓的批斗，无非是些陈词滥调，好在尚未触及皮肉。会上我一反常态，多年来第一次自说自话，没有服服帖帖地“低头认罪”，这更加惹恼了主事者，当场宣布对我实行“群众专政”（也就是私设公堂，私自监禁），还在校园里煞有介事地贴出“坚决粉碎X X X的猖狂反扑！”的大字标语。

“群专”之后当然不那么“好玩儿”。一日，我正在斗室里冥思苦想，忽听得楼上喊声震天，像是在开斗争会。心想此事与我无关。少顷，两名彪形大汉闯进房门，驾起我就押往楼上会场，从两边揪住我“坐喷气式”，在一旁陪斗。这事我总觉得有些蹊跷。若干年后，

才有人道出个中原委。斗争会开始前，那个一度拼命同我这个所谓“苦大仇深”者套近乎的同事，见敝人没有列席作陪，不禁义愤填膺，遂向坐在旁边的造反派头头进言：为什么不把某某某揪上来？那个头头起初没有答理，这位老师却紧追不舍，一再进言，于是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落井下石，以至于此，怎不叫人心寒。

我在传达室发现一封明明是家母的笔迹、却写给另外一位老师的信，便悄悄拿来。拆开一看，原来是我探亲期间在老家交的一位女友已经离我而去，家母怕我一时想不开，出现意外，便特意写信给我的同事，好有一个缓冲地带。家母自然想不到儿子几天前差点同她永别，却不是因为失恋之类的事情。

我的居室与造反派的“议事厅”仅一墙之隔。有一天隐隐约约听到隔壁传来的片言只语，好像是要就我的问题进行“内查外调”。当时觉得可笑，就我这点破事儿，哪值得大动干戈？

“内查外调”的详情当然无从得知，其后果我倒还是领教了。不是有人说我到农场煽风点火吗？造反派好不容易抓到了这根稻草，想必是根据这个揭发，按图索骥地去找那位农工搞了“内查外调”。我则完全蒙在鼓里。解除“群专”后，我特地带了一盒香烟去看望那个农工，不料竟遭到婉言谢绝。这才知道我这一倒霉，把他也牵扯进去了。

时隔不久，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正式开场，我荣幸地与数位清理对象住进“牛棚”，开始了“二进宫”的劳改生涯。这时已到所谓的“运动后期”，革命群众的斗争方式也大有长进。当时最令我等不寒而栗的，是所谓的“钢鞭伺候”。这在邻近的大学已是家常便饭。眼看厄运即将降临，却万万想不到就在宣布对我等实行群众专政之后的第三天，几名学生造反头头银铛入狱，罪名是将一名学生毒打致死。这一意外转折来得太及时了，我等因此免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然而精神上的折磨、思想上的压力，却给每个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几位年纪均在四十六岁左右的“专政对象”原来满头乌发，事后则无一例外地都两鬓染霜，形容憔悴。

“清队”开场时值深秋，“一阵秋风一阵寒”，朝阳的房子宁可空着，也要将我们关押在一间背阴的大教室，不能让阶级敌人太舒服了。屋内虽有火炉可供取暖，哪挡得住窗外刺骨的寒风。一位“专政对象”正好摊到位于西北角床位，有一天揭开褥子，床板上居然结满了白霜！此人系起义军官，按理是不该追究的，这时已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批斗他的时候，英雄们居然给他戴上了土制手铐。

当时早出晚归服劳役，必得经过一对新婚夫妇的房门，男方贵为“革委会主任”，一校之长，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小两口情意绵绵，卿卿我我，更加反衬出我等那几近绝望的悲惨处境。

人在走背字儿时总爱抱侥幸心理。就在终日意志消沉、完全绝望的时候，忽然有一天英雄问我：听说你美术字写得不错。我一时受宠若惊，异想天开，以为有什么好事找我。谁知给我派的任务是：分别用四张白纸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然后命令我们做成四面牌子，从此每天去食堂吃饭，均需排成纵队，分别举着牌子，一路上嘴里还得有节奏地高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广惹得附近的小孩都跑来看热闹。我只好心里暗暗叫苦。

当时全国都在搞类似宗教仪式的“天天读”。我等当然没有那个资格，但是每日三餐，均需先向领袖“请罪”后方可进食。买饭前把手里举着的领袖像放在窗台上，然后毕恭毕敬地站好，口中念念有词，无非是把自己骂得个狗血淋头、罪该万死。即使这样，有时也难逃英雄们的“法眼”。有一天我正对着领袖像历数自己的“滔天罪行”，不料站在旁边的英雄勃然大怒，他厉声说道：你为什么不老实交代当初是如何“点火于基层，策划于密室”的？原来，他是把毛泽东批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面人物的话原封不动地拿来，硬套在我的身上，令人哭笑不得。

一日，英雄把我叫去，关上房门，二话没说，劈头盖脸地把我狠揍一通。我又没犯什么

事儿，凭什么呢？可能是12月26日的《文汇报》套红印刷，搞得花里胡哨，我顺口说一句：不是不让搞红海洋吗？（所谓“红海洋”就是令人作呕地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据报载，毛对此颇有微词）不知是哪位老兄立功心切，打了个小报告，让我饱尝一顿老拳，冤哉枉也！

劫后余生

受审期间，我曾面临最严峻的现实，即所谓“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定案处理意见”。难友闻听此讯，为我的前途担忧：原来还可以刻刻写写，就你这一双瘸腿，真要去了农村，可怎么活得出来？要不学学木匠吧！我说腿抬不上去，无法使锯……后来据说是“上面没有批”，再后来是获得“解放”。至此，文革给我个人带来的苦难暂告一个段落，然而它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却远未结束。

1969年秋天，家母给我来信说：你在银川办喜事，我却在雅安办丧事。原来我的舅舅在“清队”中自杀身亡。他在雅安食品厂工作，早已弄清的所谓“历史问题”这次又翻腾出来，搞得他心灰意冷，绝望之中跳进了厂里的水池。撇下四个尚未成年的子女。

我的一名大学同学，小小年纪即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用英语向美军喊话。尽管有这样的光荣史，文革中也难逃厄运。当时她身怀六甲，一个丧心病狂的女老师居然狠狠地踢她的腹部，后来生下一个智力不健全的女儿，从此，女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身体病痛，无不牵动着妈妈的心，成了永伴终生、无法抚平的伤痛。

1978年冬天，听说中央下了文件，凡错划的右派可要求改正。起初我还认为自己“问题严重”，不算错划，也不敢申诉。后来在好心人的鼓励下，才鼓起勇气写了申诉材料寄到师大。1979年1月，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补领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补领了共青团团证。此时我已年届四十，一生中最宝贵的美好时光——二十一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残酷的政治运动白白地葬送掉，真是欲哭无泪啊。“还我青春！”我的内心在呼喊。然而，已经耽误的时间是夺不回来的。我惟有加倍努力，辛勤耕耘，方不虚度此生。

其实，1957年倒霉的岂止我一个，那真是成千上万啊！据说全国有55万之众（最近揭密说有三百多万），当年与我一起“入围”的学友，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且说那个弃暗投明，曾充当肃反对象的许之品吧。1958年分配至甘肃。1979年师大要为他改正右派问题，则始终找不到这个人。如果他还活着，为什么迟迟不来申诉呢？直到1981年，师大才收到他厚厚的一沓申诉材料。原来，他当年分到一个偏远县城教书。白天上课，晚上挨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便动了外逃的念头。于是他在一个假期从黑龙江某地穿越边界，到了苏联境内。他用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并取出曾在师大任教的苏联老师的照片，说他是想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自以为无懈可击。但对方不由分说地将他送回中国。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以叛国罪投入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铁窗生涯。刑满释放后不久，他以51岁的“高龄”娶妻生子。但好景不长，数年后罹患胃癌，不治而亡。

1979年的除夕狂欢夜，一个头上裹着围巾的老头来到我的面前，自称是李“农监督改造”的“定案处理意见”。难友闻听此讯，为我的前途担忧：原来还可以刻刻写写，就你这一双瘸腿，真要去了农村，可怎么活得出来？要不学学木匠吧！我说腿抬不上去，无法使锯……后来据说是“上面没有批”，再后来是获得“解放”。至此，文革给我个人带来的苦难暂告一个段落，然而它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却远未结束。

1969年秋天，家母给我来信说：你在银川办喜事，我却在雅安办丧事。原来我的舅舅在“清队”中自杀身亡。他在雅安食品厂工作，早已弄清的所谓“历史问题”这次又翻腾出来，搞得他心灰意冷，绝望之中跳进了厂里的水池。撇下四个尚未成年的子女。

我的一名大学同学，小小年纪即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用英语向美军喊话。尽管有这

样的光荣史，文革中也难逃厄运。当时她身怀六甲，一个丧心病狂的女老师居然狠狠地踢她的腹部，后来生下一个智力不健全的女儿，从此，女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甚至身体病痛，无不牵动着妈妈的心，成了永伴终生、无法抚平的伤痛。

1978年冬天，听说中央下了文件，凡错划的右派可要求改正。起初我还认为自己“问题严重”，不算错划，也不敢申诉。后来在好心人的鼓励下，才鼓起勇气写了申诉材料寄到师大。1979年1月，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补领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补领了共青团团证。此时我已年届四十，一生中最宝贵的美好时光——二十一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残酷的政治运动白白地葬送掉，真是欲哭无泪啊。“还我青春！”我的内心在呼喊。然而，已经耽误的时间是夺不回来的。我惟有加倍努力，辛勤耕耘，方不虚度此生。

其实，1957年倒霉的岂止我一个，那真是成千上万啊！据说全国有55万之众（最近揭密说有三百多万），当年与我一起“入围”的学友，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且说那个弃暗投明，曾充当肃反对象的许之品吧。1958年分配至甘肃。1979年师大要为他改正右派问题，则始终找不到这个人。如果他还活着，为什么迟迟不来申诉呢？直到1981年，师大才收到他厚厚的一沓申诉材料。原来，他当年分到一个偏远县城教书。白天上课，晚上挨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便动了外逃的念头。于是他在一个假期从黑龙江某地穿越边界，到了苏联境内。他用俄语作了自我介绍，并取出曾在师大任教的苏联老师的照片，说他是想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自以为无懈可击。但对方不由分说地将他送回中国。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以叛国罪投入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铁窗生涯。刑满释放后不久，他以51岁的“高龄”娶妻生子。但好景不长，数年后罹患胃癌，不治而亡。

1979年的除夕狂欢夜，一个头上裹着围巾的老头来到我的面前，自称是李梦光。李梦光本是师大的学友，大学毕业时不到三十。眼前这个老头牙齿全掉光了，怎么可能是他呢？然而，这的确确实是李梦光。他家本是三代工人，可谓根红苗正，57年鸣放期间，并没有“蠢蠢欲动”，可是架不住班上党员的反复动员，就到“群众论坛”去讲了一通。58年初定为右派。后分到哈尔滨教中学，也许是因为不安分吧，送进了劳教所，他居然胆大包天，从劳教地逃跑，在跨越中苏边界时被扣留，问他去哪儿，他说要去“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就成了在押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刑满释放后生活无着，只好在内蒙农村四处乞讨。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还有绘画“天才”，别的画不了，但可以给乡下入画画“炕围子”（即土炕周围的装饰画），这才开始“自食其力”，靠这个“手艺”混人家一顿吃。辗转到了1979年，他从报上看到右派改正的消息，便去公安局要求改正。公安局说，我们只知道你是反革命，不知道你是右派。可怜李梦光为了取得“我是右派”的证明，风尘仆仆地来到师大，又没钱住店，晚上就在北京站过夜（其实师大本可免费提供住处，但他不敢张口）。师大工作人员见他如此穷困潦倒，临走时送了他二百块钱。我问他牙是怎么掉了， he说是劳改中饿急了啃冻萝卜啃掉的。他还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犯人偷吃生玉米，拉出来还是整个儿的，别的犯人见了，扒拉出来拿水洗洗，照吃不误。他还在狱中遭到犯人毒打，打成内伤，改正后到省城医院就诊，医生说他的肠粘连的严重程度在全省数第一。

一位高中好友，品学兼优。1957年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三年级，一、二年级被评为班上优等生（条件是各科成绩全优）、三好学生、优秀团员，担任班团支部委员、系团总支委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当年五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北京四大院校（北大、清华、北航、人大）闻风而动，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好友所在的学校却按兵不动，一片沉寂。他认为为了帮助党整风，就要猛推领导跟上形势，于是在鸣放会上发言，要求领导向四大院校学习。自认为这是在维护党的领导。他后来积极参与反击批判社会上和校内大右派的斗争，还是全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57年底反右斗争告一段落，58年初开始整顿党团组织，这时领导却通知他，让

他作自我检查，后被定为右派学生，受到开除团籍、留校察看处分。59年毕业后，发配至山东莱芜铁矿曹村工区劳动改造。下井第一天厂部就来了个下马威：井口迎接他的是一幅《声讨右派分子X X X的罪行》的大字标语，支部书记作了介绍，要求大家监督他劳动改造。从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均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两个月没有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从事体力难以支撑的繁重劳动——推矿车，一行十二来人，每人一车，鱼贯而行，矿车破旧，轨道不平，坑道泥泞，灯光灰暗，脚底打滑（着布胶鞋）。实在推不动了，就俯下身子，用肩膀扛着矿车往前走，需推出好几百米，每天推好几十车，冬天也汗湿衣衫。一个班下来筋疲力尽，好不容易走回两三里之外的住地，一进房门就瘫倒在床，茶饭无心。住地系农家临时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没有取暖用具，室内室外一般凉。头一天的疲劳尚未消除，第二天上班的时间又到了。只有咬紧牙关，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一天地苦熬日月。工人都拼命干，人家是计件工资，他却只有区区26元的生活费，不到人家工资的一半。一年之后，情况才略有好转。一是自己拼命干，努力适应，体力增强，饭量大增，工作量和大家相近，调换几个工种都能胜任；二是和工友相处融洽，有了共同语言，休息时间为他们代书书信，修理收音机、钟表等，打扫卫生，做事勤快，受到大家好评。都乐于和这个阶级敌人接近。上面有人来了解情况，工友都给他说好话。然而，井下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几乎天天都徘徊在阎王殿门口，挣扎在生死边缘。好友就曾数次险遭不测。一次是掉人溜井。井下巷道密如蛛网，稍有不慎，即可能发生坠井事故。一次到陌生的工作面劳动，班长派他去拿工具，走过一个溜井口，因上口未盖好，又无明显标志和照明，一脚踏空掉了下去，溜井高达二三十米，很可能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幸而溜井里存有部分矿石，掉下去后只是身体覆盖了一层矿粉，感到皮肉疼痛。好不容易在漆黑的矿井里摸索着爬了出来，全身除几处擦伤处，竟毫发无损。一次是炮口逃生。中餐时间到了，大家都下去到休息室吃饭，好友到另一个工作面去拿工具。需经过一个深六米的垂直人行井，他顺着梯子往下爬，刚下了两三尺，即闻到一股火药味，愈往下味道愈浓，不好！该不是下面在放炮啊？他减慢速度，说时迟，那时快，还有一两米时，只听得下面炮声大作，拐过去两三米的地方，正在爆破一块大矿石，一二十个炮先后炸响。只觉得地动山摇，震耳欲聋，浓烟滚滚，熏得他差点晕厥过去。矿灯安全帽已不知去向，所幸头脑还算清醒，于是双脚站稳，双手紧握，屏住呼吸，张开嘴巴。下去吃饭的工友发现本该在人行井口站岗放警戒的人员竟擅离岗位，跑去吃饭，致使好友误入放炮区。炮声一响，大家都喊着他的名字，说道：“X X X完了！”炮声尚未停息，大家一起涌到人行井口，漆黑一片，浓烟滚滚，工友们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大家未见回音，便冒着浓烟从人行井下来救人，爬在最前面的人一脚踩到他的头上，只听他“嗯”了一声，说了句：“哪个？”于是在一片黑暗和浓烟中爆发出欢呼声：“X X X还活着！”大家七手八脚把好友拖上去，见他毫发无损，都很高兴。后到医院检查，耳膜未破，听力大受损伤。还有一次是手指骨折。好友带着一名助手在中段巷道里用深孔钻机打炮孔，卡钎器出故障，只好用人工卡钎，正当助手手擎钢钎卡住上面钢钎时，地下胶皮水管破裂，溅助手一脸一身，水雾弥漫中稍一走神，手一松动，上面几十根钎子（一两百斤重）全部滑落下来，扎在好友正在操作的右手上，中指几被切断。第三节指骨断成三截，骨着外露，血肉模糊。附近几个工作面的工友们纷纷围了上来，脱去他满是泥水的雨衣裤，将他的右手包裹起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送到井口的救护车上。好友不觉得剧痛，只感到天旋地转，迷迷糊糊，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家乡，看到了家乡的田野和亲人，手指奇迹般保留下来。劳动一两年后，好友逐渐成为班组里的劳动骨干，虽体力不如别的工人，但在技术性较强的工种里，他可以超过别人，劳动上也受到好评。帽子却始终戴着。上面对他们说：你们的右派帽子，要到四清运动后期才能摘掉。65年四清工作组进驻，66年文革爆发，四清工作组撤离，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批斗会上，跪在一旁陪斗。革委会成立后，清理阶级队伍开场，灾难降临。先从他们这些现行的阶级敌人开刀，然后挖出大批历史反革命。轮番揪斗，拷打审问，大

会小会，天天不断。有一帮职业打手，人称棒子队，一天不打人手就痒痒，轮到好友时，给他挂上大木牌，叫他跪上高桌子，然后棍棒皮带齐下，打累之后，抓起来罚跪，再让交代，不交代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直到实在跪不住坐不住了，才拖回宿舍叫反省检查。好友见自己已是遍体鳞伤，但还不算最重的，有人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到了上班时间，棒子队又来驱赶，让他们立即上班：爬也得给我爬到工地去！好友艰难地站起来，手扶着墙，慢慢移动步子，平时只要十多分钟，那天走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又是专案组审问，一进门打手们先扇上几个耳光，再叫你交代问题。每天除了大会批斗、小会审问之外，还得照常上班劳动。如无大会小会，下班后又集中在宿舍区劳动，打扫厕所、清理水沟等等，劳役长达两三个小时。除了睡觉，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呢？好几个难友都寻了短见，或者自己冲进炮已点燃的工作面，或者自己钻人飞驰而过的汽车轮下。更有人上吊于宿舍附近的柳树上，叫人惨不忍睹。好友真担心自己能否熬到出头的那一天。难友们互相鼓励，千万不能走这条路，一定要留得青山在，争取活到世道有所变化的那一天。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2月，好友接到通知：摘掉右派帽子，停止劳动，恢复公职。无期的劳动改造终于到期，17年的劳动改造生涯自此划上句号。1978年三中全会后，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好友原想有生之年尽最大努力工作，和家人好好生活，以弥补过去的蹉跎岁月。但好景不长。1993年，意外发现他身患胃癌。好友再次被命运推到了生死边缘。作了全胃切除手术，又经过近两年的化疗，虽然死里逃生，但元气大伤，于1996年提前退休。一个偶然的因缘，使他步入佛门，成为虔诚的佛弟子。他以普及佛法、讲解佛经为己任，使自己生活在清心寡欲、无怨无争、身心清净的境界中。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好的归宿，最大的福报。好友天资聪颖，颇具潜质，若假以时日，极有可能成为本专业学科带头人，讵料惨遭摧残，潦倒一生，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当时还有一种人，叫“内控右派”，或者叫“中右分子”，即不戴右派帽子，由组织控制。我班有位女生整风期间并无任何言论。仅因家庭出身不好和“情绪不对头”即被定为“内控右派”。这位生性活泼、爱唱爱跳的青春少女，从此坠入苦难的深渊。堂堂名校的优等生，却发落至东北一所偏远的“戴帽子”农村中学。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每月供应一两豆油，什么细粮、水果、肉、蛋，统统没有，清水黄豆汤加咸菜成了当家的副食。五八年正赶上大跃进，劳动代替了上课，且多是修大坝之类的重活苦活。体力上人不敷出。而且缺乏最起码的医疗卫生条件，师生同睡一张大炕，无处洗澡，长满虱子。几年下来，落下一身毛病：口腔溃疡经久不愈，肛肠病、妇科病更成难言之隐。到三年困难时期，挖野菜，吃干玉米叶碾出的细末，甚至还吃秋天扔进猪圈的菜根菜叶。因营养不良又得了浮肿病。除了生存条件极差之处，政治上也备受歧视与迫害。她刚到该地，“小右派”的名声就传开了。从公安局调任该校书记的某公，上台不久即把她当靶子，硬说她搞小集团，对与她比较接近的年轻老师搞分化瓦解，最后是将这些人陆续调离该校了事。文革期间，被隔离反省，受到批斗。怀孕临产期间，什么游行、活动、劳动，一样也不能免，休想得到任何照顾。因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又因受寒落下妇科病，直至三十五周岁才生下第一个小孩子。

痛定思痛

所有学生右派在1957—1979这二十一年间的遭遇，看似个人的悲剧，实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灾难的一个缩影。个人的际遇与国运的兴衰，原本就是密切相关、休戚与共的啊。

回首往事，我痛切地感到：个人崇拜害死人。与其说我是反右斗争的受害者，倒不如说我是个人崇拜的受害者。少不更事的我，早就对党的领袖无限崇拜，把他当成了神，认为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料事如神，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对他发出的号令、指示，紧跟犹恐

不及，更遑论怀疑了。因此才在肃反运动中冲锋陷阵，因此才在整风运动中积极“鸣放”，因此才在反右斗争中“反戈一击”，因此才在被推入右派深渊后反而感激涕零，感谢对我的“及时挽救”，“否则我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因此才在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文革中居然写出了“亲爱的毛主席啊，我们在睡梦中把您呼唤”这样的诗名。因此才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写信劝小妹“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小妹当时的反应是：哥，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明知自己已经永远开除出革命队伍、归队无望，却还笃信什么“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硬要去同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家母“划清界限”。相当一部分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其实很左、很革命，这一悖论或者说个人崇拜鼎盛埋藏的奇特历史现象，值得未来的史学家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回首往事，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最善于搞统一战线、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化敌为友的革命政党，为什么会在大权在握、万众一心的情况下干出化友为敌、化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的事情来？天真幼稚、老实听话、虔诚至极如我者，最终也为革命队伍所不容。我们的父辈都从旧社会过来，其中不乏学有专长、身怀绝技者，本可为国效力，却因种种原因，对这批人大多弃而不用。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冲击，几次运动下来，这批人已所剩无几。我们这代人按理说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总该信得过了吧？然而从1957年开始，这代人中即陆续有人受到冲击，后来则大多成了需要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与同龄人中命丧黄泉、精神失常、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穷困潦倒者相比，我还算比较幸运的，终于苟且偷生地活了下来。

反右斗争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文革距今也已三十余年，我们正在逐渐远离那个噩梦连连的荒唐岁月。如能从噩梦中真正醒来，如能铲除产生噩梦的土壤，我们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就不致白费，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青年幸甚！

1999年3月—2005年4月

倒行人生路

述弢

早上七点五十四分。车厢里凉飕飕的，开着空调，大约有摄氏二十五六度。北京至广州的 T15 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几位来自东北的女友正在话别，大有依依不舍的样子。广播里传来那首十分熟悉的舞曲。

火车永远是个奇特的去处。在有限的时间和狭小的空间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等汇聚到一起，这里可以看到五光十色的众生相。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在此发生碰撞，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我少小离家，十五六岁即同火车结下不解之缘。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此次乘车，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周围的这些旅伴，有男有女，均是二十至四十岁的年轻人。文化程度既有大学毕业，也有高中毕业。他们或是小有斩获的成功人士，或是正在积极图谋发展的初出茅庐者，都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都在追求自己更加美好的未来。对我这个小老头，他们不免感到有些好奇，看我既不像旅游者，又不像外出办事的，也许对我的潇洒劲儿还有几分羡慕呢。

仿佛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车上相遇，我所联想到的却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青春。面前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啊，他们哪里知道，我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由北而南，竟是专为就医。治疗自幼罹患的沉疴——股骨头坏死。他们更想不到，四十余年前，我也像他们一样地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偏偏就在腿伤未伤之际，已经“祸从口出”：稚气未脱的我，就为进了几句“逆耳忠言”，落得个“打人另册”的下场。此事与腿部受伤几乎同时发生。昨日还在天安门前面对偶像狂热地高呼万岁，转瞬之间即沦为“人民敌人”，那感觉无异于天崩地裂。尚未正式走上人生路，已被社会拒之门外。尚未正式取得选民资格，却已“破格”“荣登”右派分子“光荣榜”。

于是，所谓的“改造”自然成为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换言之，就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把地道好人先打成坏人，再将他变成好人，无论今天看来这个命题有多么荒谬绝伦，我当时却一直在身体力行，不敢懈怠。什么个人的理想、抱负，统统置之度外，更遑论小小的腿疾了。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此后二十多年逆境中无法避免的、作为重要“改造”手段以至谋生手段的体力劳动，只会使腿疾更加严重。年过花甲方来治小时候落下的病，看似庸人自扰，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倒行人生路”。

我在人群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另类”。大家都敬而远之，否则就会背上“划不清界限”的罪名。我已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爱和帮助。家母含辛茹苦将我养大成人，曾对我寄予厚望，我的落难对她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也只有家母没有嫌弃我。别的忙她帮不上，就趁我每次告假回家时为我多方延医诊治，小县城医疗水平极其有限，对付不了我这个疑难病症。不过总算起到了某种缓解症状的作用。那一张张药方、一张张单据，无不寄托着家母的一番苦心。“我交给学校的是一双好脚好手啊！”家母离开人世时，我年近半百，腿疾未愈，这也是老人家一块永远的心病吧。

有道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倒行人生路”在我，已是“历史的必然”，岂止治病一事而已。先凑合把老婆娶上，再挖空心思为老婆奔户口、奔学历、奔招工指标，则又是一例。

记得刚刚摘掉帽子那会儿，曾对同办公室的一位女孩产生好感，对方似乎也多少有点意思，两人有了一些柏拉图式的交往，好像还给她买过电影票。谁知“老师”（即文印室的那

位党员领导)连这事儿也管,在会上点我,会后又劝我“别抱不切实际的想法”。两人的交往也时断时续,后来则完全停摆。岂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此后再无这样的机会,谈婚论嫁之事便无限地拖了下来。

文革后期,我刚刚获得“解放”,即找工宣队队长请假回家探亲,并且明说就是想回去找个媳妇。队长得知我年过三十,尚未成家:“该解决了,该解决了”。返乡之后,我对家母说,咱们条件不行,就找个农村的算了。家母起初还有些于心不甘,可屈指一算,条件相当的城里姑娘还真没几个。在她的努力下,我终于在而立之年与故乡一位姑娘喜结连理。对方系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4年她年方十九,和许许多多男少女一样,稀里糊涂就下了乡。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月之后,听说他们的户口全都下到了农村,急得大家抱头痛哭。谁不知道那个“农门”是万万进不得的,一人“农门”,就意味着沦为“二等公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毫无保障,前途渺茫。原来在城里虽无正式工作,还可以干点零工贴补家用,如今回城就业已成泡影。妻子痛不欲生,曾独自一个跑到山崖上,可猛然想起老母亲日后无人供养,这才没有跳下去。

婚后生活倒还美满,次年即有了儿子。问题也接踵而来。妻子的农民身份,注定了我家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那年月,所谓农民身份,或者农村户口,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只能在当地挣工分、挣口粮,换言之就是基本没有收入,而且注定两地分居。说起来每年学校有两个假期。但探亲路费一年只报一次。那三百六十五天的分居日子太难熬。每年春节探亲回来,依旧孑然一身。四五月份,校园里的杨树才开始抽出嫩绿的幼芽,眼瞅着叶片渐渐长大,又由绿变黄,纷纷坠地,好不容易盼到朔风怒号、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方可开始下一次探亲之旅。妻子带上刚满周岁的孩子前来探亲,也不敢多呆。我送娘儿俩上火车,站在车窗外向她们挥手告别,路上妈妈问孩子:“爸爸呢?”孩子就用小手指着车窗。

老天开眼,忽然听说学校农场可进农村户口。我于是一趟一趟地往城里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春节探亲前拿到了准迁证。可是离家返校前,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开往成都的汽车上,我左思右想,反复掂量,想到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夫妻团圆矛盾重重,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最后还是决定迁的好。于是我从成都给妻子打长途电话,让她抓紧时间把手续办好。是年四月,妻子正式迁来。原想从此二人可以终日厮守,不料以后妻子却因此承受了更多的屈辱与痛苦。

一个年轻妇女,干的是最下贱的脏活苦活——积肥,每天掏厕所,有时背上还背着孩子,赶着毛驴往数公里之外的农场送粪。一次送粪途中,在捆绑套具时麻绳突然断裂,妻子仰面朝天地倒在地,还得忍着剧痛坚持到目的地,腰部遂落下毛病,久治不愈。农场修羊圈,派她去拉土,还订了硬性指标,因劳累过度,胃部出血,自此胃病不断,身体消瘦。为出工方便,妻子曾独自带着孩子住在农场,很不安全,险些出事儿。另有一次,有个顽皮学生将她住处门口的机油一脚踢翻在地,她出来抱怨了两句,不料竟挨了学生一记拳头。一家三口主要靠我每月六十来元的工资过活,处处捉襟见肘。普通人家拿着粮本到粮店就可以把白面买来,我们想吃白面,得从农场领出原粮——麦子,先用水洗去掺杂其中的泥土,晾干,拣出小石子儿,再用小车拉到磨坊去磨面。孩子很小的时候,磨面时便连孩子和粮食一起拉上。当时只求一家三口混饱肚子就行。有一次我去托儿所送饭,让工宣队队长碰见,他执意要看碗里的东西,看完大吃一惊,当下把我熊了一顿:“这怎么行呢?下一代——啊!”原来我送去的东西与众不同:一碗只有几片白菜叶的面条,见不着一星半点肉末蛋渣。生活之拮据由此可见一斑。孩子瞅着小碗里的鸡蛋羹,甭提有多眼馋了(至今提起此事他还觉得“刻骨铭心”)。夏天看见卖冰棍儿的,他明明想吃,却偏说:“妈妈,我们不吃冰棍儿。”当妈的心里一阵酸楚。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会跑会跳了,见什么车都想上去坐一坐。有一天起猪圈,他硬要坐拉猪粪的车,也不知那车上有多脏,妈妈心如刀绞,却只有暗自落泪。孩子跑到小

伙伴家里去玩，让他表演节目，他就一本正经地背诵道：“小时候，雷锋家里很穷……”人家听了觉得开心，赏他一碗白米粥喝，他便觉得美滋滋的。屋漏偏遇连阴雨，有一年辛辛苦苦养了一批小鸭，眼看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每天早上排着队出去觅食，却被贼人偷了个精光。

批林批孔期间，学校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某“老左”在一次我未参加的会上，含沙射影地说：有的人尾巴翘得老高嘛。新来老师不解其意，他趾高气扬地说：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啊，就是那个谁谁谁嘛，把我的“老底”全兜了出来。亏得校领导这时稍微清醒点了，我才幸免于难。邻家的小孩子与人打架吃了点亏，小孩他妈站在院子里破口大骂，骂着骂着把我也捎上了：“啊，那个老右派……”连家属都敢如此放肆，我在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生活如此拮据，环境如此险恶，我一直苦苦挣扎，寻找出路。当务之急是给妻子找个工作。可在当时的中国，谁要是农村户口，就与工作无缘。找人指点说，唯一的办法是上个学或者训练班什么的，可以改变农民身份。但说着容易做着难，往往不是晚了一步，就是被人挤掉，始终与机会擦肩而过。有一年好不容易听说师训班招生，我急忙跑到城里去找负责此事的局长，前后不知去了多少次，把他们家的门槛都踢破了，总算感动了上帝，获准进入师训班学习。只是有一样：社来社去。就是毕业出来还当农民。局长说：管他呢，先上了再说。妻子本来就没读多少书，成天同土坷垃打交道，原来学的那点东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好“恶补”了，辛辛苦苦、熬更守夜地念了一年，谁知毕业时又赶上“两个凡是”大行其道，据说汪东兴认为“社来社去”还应坚持。当年明明计委有招工指标，农村户口的就是不予录用。这可怎么办？总不能再回农场去掏大粪吧。只好回学校农场当个保管，按临时工对待，还吃农场的粮食。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了些日子。看来当临时工终非长久之计。我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搜索枯肠，费尽心机，百般争取。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苦头，跑了多少冤枉路。直到1978年年底，妻子才被录用为小学教师。如果从结婚时算起，为了给妻子谋得一份正式工作，前后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倒行人生路”，则是毕业二十年之后才来考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七年，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和极左路线大行其道的二十年，十年浩劫，更使国家陷入绝境。这二十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臭名昭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鄙薄知识，鄙薄文化，鄙薄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捧上了天，甚至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样极端的命题。大环境如此，再加上我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我多年不务正业，业务荒疏，将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到与专业毫无关系的简单劳动和重复性劳动上。四人帮倒台后，知识分子开始受到重视，学术成果渐渐受青睐，说来惭愧，毕业廿载，除了“水平愈来愈高”、“认识深刻”的认罪材料、交待材料之外，我连半篇像样的文章也找不出来。只可惜这些材料毫无学术价值，自然不能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1978年春，偶然从报纸上得知报考研究生的年龄放宽，凡1938年年底后出生者皆可报考。我说了一句玩笑话：其实我还有资格报考呢。不料在场的几位仁兄异口同声都鼓励我报考。当时头脑一阵发热，果真下了决心。晚上打开久违的专业书，一口气读到后半夜，接下来是报名和紧张的复习，要在短短几天内将荒废已久的专业拾起来，谈何容易，曾一度因劳累过度、人不敷出而晕倒。赶紧买点鸭蛋（比鸡蛋便宜）补养。其实我已年近四十，有人劝我说：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何必呢？也有人戏称我为“老范进”。在应该评教授的年龄去报考研究生，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作弄。其实也是瞎掰，右派问题尚未改正，即使考试通过，政审这一关绝对过不去。夏天，校方寄来一纸通知，说初试成绩尚可：平均分八十三点五。因名额有限，不能参加复试。后来得知，他们已经内定两名“嫡系”，我不过是“陪绑”而已。可是这样一来，倒有点欲罢不能了。听说北师大俄语专业来年要招研究生。冬天，中央下了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我请假到北京落实政策。傍晚抵京，次日中午来到师大。留校的一位同学告我：你的问题已在日前顺利通过。“你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趁此机会去看望了恩

师刘媛娜先生。听说我已把俄语丢掉先生感到惋惜和不解。并鼓励我考研究生，还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汉俄辞典和几本原文语法书。在京期间，得知来年的研究生报考年龄已限制在三十八以下，这对我大为不利，当时我已年满四十。俄语专业负责人杨老师说，你就先报吧。银川市招办的金老师知道我头年考得不错，给我行了个方便：绕过自治区招办，将我的报名材料直送北师大。谁知到师大又“卡了壳”，因年龄偏大不能报名。杨老师得知此事，便让那位留校的同学写个材料，介绍我当时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上年考研成绩以及让反右耽误了整整二十年等情况。师大招办据此报到教育部，教育部特批：准予报考。耐人寻味的是，想当初全班年纪最小的我，这次却险些因为“年龄偏大”被挡在门外。初试顺利通过，不料又横生枝节，系里在讨论复试名单时，有人以我年龄偏大提出异议，幸被驳回。是年九月，收到录取通知书。于是我在阔别大学校园二十一年之后，开始了似梦非梦的研究生生活。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大学校园，面对着满园的春色，体味到浓浓的春意，那春意仿佛穿过张开的毛孔，渗透到全身上下的每个角落，正所谓沁人心脾。浓浓的春意令我陶醉，我感到欢愉，感到幸福，更感到昂扬。真想张开双臂去拥抱整个世界。”

然而我并未沉浸在“浓浓的春意”里，我时刻记挂着57年和我一起落难以及历次运动中挨整的兄弟姐妹。

蓉城八月初识君，
天真烂漫正年轻。
历尽劫波豪气在，
不枉同为巴蜀人。

这是写给一位大学女生的诗。1954年8月，我接到北师大俄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异常，遂匆匆打点行装，奔赴成都。当年宝成路尚未通车，需先坐汽车到宝鸡，再乘火车去北京。我在成都盐道街师范学校的校园里，见到了这位含苞待放的花季少女。她也录取到俄语系。于是我们同乘卡车，沿途饱览了李白千古名篇中描写的“天梯石栈相钩连”、“猿猱欲度愁攀援”、“枯松倒挂倚绝壁”、“剑阁峥嵘而崔嵬”等绮丽画卷。57年反右斗争期间，花季少女不幸“榜上有名”。她满腹冤屈：自己并无任何公开的言行，凭什么获此“殊荣”？说来叫人难以置信，这都是另一位少女的“功劳”。一位与她同乡、同室自然也同性的有心人，凭着过人的革命警惕性和监听本事，悄悄地用笔当场记下了几位室友在宿舍里的私下言论，日后这便成了一发发炮弹，这些炮弹炸将下去，几位室友无一幸免：一位（即花季少女）戴上右派帽子（当然开除团籍），一位开除团籍，一位劝其退团。花季少女从此跌入万丈深渊，受尽劫难。所幸的是，有个“痴心汉”相伴身边，无论面临多大压力，“痴心汉”就是“和右派划不清界限”，铁了心要同花季少女相伴终生，白头偕老。至今两人仍恩爱如初。

我的入团介绍人学习刻苦，性格开朗。充满青春朝气。为人憨厚，有“傻小子”之称。57年因一篇《胡风何罪？》的大字报获罪，划为右派。这样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后却分至宁夏山区的泾源中学。我班的老运动员许之品分至甘肃一偏远县份工作，因不堪终日挨斗的非人生活，图谋外逃，四处写信联系。当时天真地以为只要用俄文写信，即可做到万无一失。一封这样的信寄至泾源中学，被校方截获，傻小子有口难辩。在60年的双反运动中他被揪出，受到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的处分。一年后在自治区文教厅长李微冬的亲自过问下，恢复公职，回到原校。却不准上讲台，长期监督劳动，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段时间曾一身而二任焉：既要敲钟打铃，又要下地干活。惟恐误事，便在锄地时旁边放个闹钟。直至1976年，才想起给他摘帽，可这时连有关摘帽的文件也难以找到。76年久别重逢，我发现他变得有些木讷，说话老带个口头语：“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像在交代问题。且不愿与人多加交往。这是多年封闭郁闷、担惊受怕的生活所致。右派问题改正之后，一天

听到室外有人高喊他的名字，他吓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以为又有什么大祸临头，原来人家不过是通知他：有你一个包裹。至今落下一块心病，那就是怕领导，大小领导都怕。残酷的政治运动，原来是可以如此扭曲一个人的灵魂的。

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会。后来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始终积极追求进步，争取入党，有位党员曾私下向他透露：你入党的事情快了。57年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讲过一句“出格”的话。运动后期，上面号召整理思想，他想到读高中时党总支书记曾一再告诫要对党忠诚老实，便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向党交心”，写了一份思想检查交上去。其中说到，当初觉得章伯钧罗隆基他们说的话好像也有点道理，自然紧接着就把自己狠批了一通。后来党支部书记对他说：真想不到你还会有这样的思想，不过也不要紧，别背思想包袱，你还是积极争取入党的嘛。谁知新学期开始，情况有变，党支部书记又对他说：老兄，恐怕你还得当一回右派罗。不是说要对党忠诚老实吗？既然党要自己当右派，那就当吧。一个行将入党的进步青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因为“向党交心”“交”出个右派来。从此被打进十八层地狱，历经磨难，穷困潦倒。直至六十年代后期才摘掉帽子。有同学借出差机会前去看望，见他家徒四壁、孑身一人的惨状，不禁潸然泪下。

浣纱溪畔喜相逢，
昔日幼童成老翁。
欲说别来坎坷路，
开言未及泪滂沱。

2004年秋草成此诗，说的却是1999年的事情。成都二中高33班学友相聚于杜甫草堂附近，一别四十年，沧海变桑田，颇有“相见不相识”之感。主事者提议每人简要介绍一下毕业后的经历。轮到我了，正要开口，竟一时悲从中来，掩面而泣。五年之后，学友们又在原地相聚。我以此诗示之同好。某君读后感慨系之，欣然唱和：

笑逐颜开喜相逢，
如烟往事戏毛翁。
不堪回首崎岖路，
六月雪飞水自流。

诗中头两句记录了2004年这次聚会的实况。几个老顽童嬉笑怒骂，以调侃的方式戏说那个荒唐的XX时代，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但诗的末句却叫人笑不起来。千古奇冤，六月飞雪，多年郁积心中的悲愤与痛苦，尽在其中矣。凡过来人读后，莫不为之动容。诗作者某君能诗善文，乃大学数学教授。57年因莫须有的罪名成为右派。多年被打入冷宫，或下放劳动，或批改作业，就是不让上讲台。改正后有了用武之地。但已年近半百，时日无多。往事不堪回首，偶有忆及，便怒火中烧，不能自己。

一位大学好友，也是同乡，彼此臭味相投，无话不谈。他学习成绩优秀，且兴趣广泛，对文学情有独钟。我自发配至宁夏后，与他断了联系，从此音信杳无。睽违四十年，北京重聚首。谈及别后彼此遭遇，不胜唏嘘。在我的印象里，他属于“好人”之列，57年毫发未损。可为什么会发落至甘肃省一个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多年藉藉无名呢？其实，我并没有真iE“读懂”自己的好友。他看上去生性随和、不显山不露水，到紧要关头却表现出桀骜不驯的独立人格。在那个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声讨右派的年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有之，见风使舵、沽名钓誉者有之，投石下井、谄媚领导者有之，超然物外、明哲保身者亦有之，却惟独缺少真正的男子汉。眼看自己的好友错划右派，他感到不解、愤怒，甚至公开与人

争辩，说：我对他太了解了，既然思想如此单纯的同学都成了右派，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是右派喽？那不是太荒唐了吗？在所谓的“教育革命”中，他舌战群儒，就新编教学大纲重政治轻专业的倾向向党总支某些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行，自然为体制所不容。当权者采取卑劣的手法，偷偷在档案里给他加上“漏网右派（中右）”、“同情右派分子”、“一贯与党对立”、“坚持走白专道路”等罪名。堂堂北师大的高材生，完全有资格留在兰州某高校任教。却分到一个人口不过十万、没有任何工业、没有电力、没有汽车、运货靠木轮牛车、出门只能步行、仅有一所初级中学的偏僻小县。生存环境本已极其恶劣。58年大跃进更带来了大饥荒。60年春节前后，该县农村已是饿殍遍地，死人累累，有的人家成了绝户，有的人家活人死人同炕，因为幸存者已没有力气掩埋故去的亲人。干部口粮降至原粮20斤左右，其中不少是发霉的薯干和带壳的糜子。教师中浮肿和肝炎病人成批出现，一位师大化学系57年毕业生连饿带病（不过是普通感冒），竟命丧黄泉。好友仗着身体素质较好，幸免于难。但也虚弱得只能坐着讲课，课后挪步都困难。教师们纷纷“生产自救”，在校园开荒种糖萝卜（即甜菜），秋冬以此充饥。因该物的叶、茎富含生物碱，害得他此后二三十年遭受胃病折磨。这年夏天，他和几位校友还演出了一场“饥饿大逃亡”。当时并不缺钱，缺的是粮。为了寻找无需粮票即可大快朵颐的地方，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一下火车就扎进饭馆，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好几碗面条，那真是“味道好极了”。1963—1964年，肚子问题初获解决，但好景不长，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教师惨遭劫难。全校二十来个教师，即逼死两人（一人上吊，一人服毒）。好友和另外两名出身不好的年轻光棍，则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将他们分开单独关押，成天批斗逼供。突然遭此横祸，又远离故乡，举目无亲，不禁产生轻生的念头。但日日受到监视，寻死不成。1969年春，走出牛棚的他被下放至更偏远的山区公社“戴帽子中学”（即小学设初中班）接受“再教育”。白天劳动或身兼数理化音体美全科教员，晚上则孤灯一盏，独守在破破烂烂的教师宿舍。一个巴山才子，为何会遭此厄运？他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文革中抛出的档案材料使他如梦方醒：原来自己除了原罪（出身不好）而外，还有上大学时“挣来”的那些隐性帽子。如今，好友早已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夜里做梦，梦到的永远是凄风苦雨，遭人冷落，从无阳光灿烂，儿女亲情。多年困顿生活留下的烙印实在太深！

文革中我所在的宁大附中，那些没有“人围”“牛鬼蛇神”的老师，也划成三六九等。一位女老师被划入“三类”，即所谓边缘人物，大字报围攻，剥夺政治权利，限制人身自由，抄家烧书，大会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拳打脚踢。分娩后不到百日，本是身体虚弱急需调养休息的时候，也得天天服苦役。产后不久的超负荷体力劳动，使她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终生疾患。服苦役期间，襁褓中的婴儿高烧四十度，妈妈心急如焚，向校领导请假，校领导为了保自己，竟往红卫兵那边推（当时若向红卫兵请假绝无批准的可能），人命关天，情急之下，女老师据理力争，始获准抱孩子去医院诊治。“士可杀不可辱”，她曾多次想到自杀，但怀里的婴儿怎么办？丈夫又不在身边，做母亲的情感与责任，成了忍辱负重、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女老师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官宦人家，自幼受家学熏陶，稍长曾经名师指点。解放前即阅读进步书籍，北平解放后，很快加入共青团，又当上团支部书记。抗美援朝期间，因社会工作突出，被评为北京市中学生中的模范团干部，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冯文彬的接见，给北京市学生干部作过报告，上过报纸和电台。1956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本校中国古代史研究生。1959年毕业分配，填写的分配志愿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满腔热情地奔赴宁夏大学工作。却万万没有料到，在这里惨遭迫害。事情还得从一次全校大会说起。1960年大饥荒期间，宁大师生度日艰难，这年的中秋节，自治区给大家每人供应半斤月饼。可学生并未领到月饼，许多学生质问校方。党员副校长在大会上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反而挖苦地说：“半斤月饼就那么重要？吃进去还得

拉出来嘛！”女教师听了顺口说道：“怎么能这样讲话？水平低。”有人汇报上去，副校长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从此埋下祸根。不久即让女老师在校办农场养猪，掏粪，种地。美其名曰“下放劳动”。时值大饥荒，在人不敷出、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从事重体力劳动，无异于雪上加霜。女老师本已浮肿的双腿病情加重，肾脏也受到损害，此后多年延医诊治，终未治愈。1961年回系里任教。又遇到一个不学无术、飞扬跋扈的党员教师。此人不认真备课，常念错别字，一次在黑板上画中国地图，竟将黄河和长江的位置上下颠倒。女老师给他指出，他竟怀恨在心。此人又是个胡花钱的主儿，每月工资花光不算，还债台高筑，长期享受困难补助，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女老师兼任福利委员，分管困难补助。尽管补助大多给了他，无奈此人欲壑难填，便迁怒于女老师，大言不惭地说：不把困难补助发给出身好的人（他自恃是城市贫民出身）乃“立场问题”、“阶级感情问题”。系里开总结会，女老师说，党支部应加强对个别党员的教育工作。支部书记则要他多看别人优点，不要只看别人的缺点。女老师据理反驳。这时，那个党员教师跳将出来，大声吼道：“我走那么多省市，就没见过一个小小的团员敢跟党支部书记顶嘴！”支部书记也说女教师：“像你这样的人，就是不好领导！”1963年开展“五反运动”，正好为那些人提供了报复的好机会，于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将女老师定为“反动教师”、“反党分子”。如女老师曾在会上就彭德怀问题发言，说矛盾与斗争不仅基层有，中央也有。五反时便说她“把共产党由基层到中央全否定了”。连响应号召为河北农民多捐些衣物，也被扣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女老师对这些罪名逐一进行反驳，却“态度不好”，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并把这些材料整理成单行材料，塞入她的个人档案。还将这些黑材料放入系、校、自治区党委及有关部门的文书档案中备案。从此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干些杂务，如烧锅炉，搞绿化等。1963年3月调到附中任教。文革开始，她再次受到宁大校党委、政治课党支部和个别党员的“关怀”，自然是在劫难逃。

2003年9月，我来到绿树成荫的师大校园，看望病中的夏志德先生。夏先生也是我的一位恩师。先生自幼生长在哈尔滨，加之勤奋好学，对俄语可说是运用自如，几与母语无异。先生博闻强记，饱读诗书，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长诗可以倒背如流。许多号称俄语专家的人均难以望其项背。可惜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师大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长期处于被冷落、受批判的地位，不让上讲台，只配做点编教材之类的“幕后”工作。文革后在师大相见，不胜感慨。1979年由先生领衔招收第一批俄语研究生。入学后先生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刚开学不久，先生见我九月底还穿着塑料凉鞋，问我脚冷不冷。她还风趣地说我此生总算有了一个“Счастливы хвостик”（幸福的小尾巴）。惜乎我生性愚钝，且人到中年，俄语学习终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辜负了先生的殷切期望。毕业离校后，多次登门求教。逢年过节，第一个要打电话问候的，非先生莫属。我常常操着半生不熟的俄语同先生对话。未了，她总是说：“Заходите！”（过来坐坐！）

听说先生身患癌症，且已到晚期，经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我前去探望，那天先生虽病卧在床，但精神很好，谈笑风生，说到当初上本科时先生们对我这个“小屁孩”的评价是：Миленький，Ръженький，Вундеркинд（可爱、黄毛、神童）。此话先生前从未对我说起过，是否她这时已经有了某种预感？一月之后，噩耗传来：先生病逝，我的耳边仿佛响起先生那天的谆谆嘱咐：“pischite, pischite o svojem zhizni!”（写写你的一生吧！）如今，当我的回忆文章变成铅字时，先生却早已驾鹤西归、无缘得见了。

厄运结束已夕阳

辛桂彬

五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对我来说是黑色的一天。当天在食堂吃晚餐时，大师兄许有为对我说：“系里让你晚自习到办公室刻钢板。”我私自庆幸组织上让我劳动了，心中升起了种昨被遗弃今被启用的感觉。饭后等到自习的铃声一响，我便准时到了系办公室门口，系支书让我刻写高尔基的“论童话”。这是被批斗后第一次给我工作，所以特别的激动，怀着感激的心情，认真、细致、全神贯注的在刻钢板。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人。直到人来到面前问我：“你叫辛桂彬？”才让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两个穿着白色公安服的警察一脸严肃地站在面前。我站起来回答说：“我是辛桂彬。”他说：“你犯了现行反革命罪，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说完拿出逮捕证，让我在上面签字。锒亮的手铐“卡”的一声，戴在了手上。我用颤抖的手握住笔，在逮捕证上歪歪斜斜地签上了名。这两名公安便一左一右将我挟持往外走。我看了一眼支书，只见他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眼光从镜片下瞄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当时我脑中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想，只是一片空虚。他俩将我押到宿舍，将我简单行李书籍一起搬上了吉普车，便呼啸而去。天空黑黝黝的，没有一颗星星，车在冷风中狂奔。车窗外黑黝黝的，到底将奔向何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根本不敢去想。最后停下来，警察将我带进一间房子，经过搜身，检查行李，并叫我在搜查证上签名，各种例行手续完备之后，毫不客气地把我推进了牢房。

这是一间十多平米的牢房，一进门一股臭气扑鼻而来。一只便桶放在门边，中间有条走道，两边是土炕，每边炕上有七八个人，都端坐在炕上。新来的，按规矩是睡在便桶边的。我按照规定在靠墙的边上放下被褥。便桶就在头边，一阵阵的骚臭味熏得眼都睁不开。放好了行李，也照规矩端坐在炕上。这时该牢房的“学习号”一开口便对我交代了这一句：“这是另一个社会。”接着问我“带色”没有，弄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看我不懂，便说：“有血债没有？”我说：“他们说我是右派反革命。”同监舍的押犯都透了口气说：“原来是右派，小事一桩。”

这里真是另一个社会，互相之间不能称名道姓，只能以XX号互叫，不能互通案情，不能交谈外面的一切事情，只能各人静坐，回忆，交待“罪行”，向政府交待未说清的“问题”，以求得从宽处理。而提讯都是晚上，在更深夜静的半夜。

几天之后才知道这里是赫赫有名的草岚子监狱，与上海的提蓝桥监狱齐名，是敌特闻名而丧胆的地方。这里关押的全是政治犯，每日坐在炕上，望着铁窗外墙上的日影，来估计开饭时间，牢中每人的希望便是能早日结案，得出个结果。

在这牢房中有的已在押五、六年了，有的是敌伪时期的汉奸，有的是制造惨案的凶手，也有连他本人也弄不清犯了什么罪的犯人。其中有一个是农村的老大爷，因在除“四害”时他说了一句“只要年成好，哪怕麻雀吃”就被抓进来了。虽然多次提讯，他就是这一句话。弄得他搞不清楚究竟要怎样交待才算完。

58年的春节，是在牢中过的，听到高墙外的鞭炮声，想到自己的处境与未来，连当时改善伙食的两片猪肉也无法下咽。这是个难忘的不能之夜，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58年6月的一天，将我叫出了牢房，带上了手铐，押上警车，不知押往何处，下车后才知道是押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过程很简单，因为一切问题在押期间早已弄明白了，只是完成一套手续而已。开庭后不久便将我送到了北京市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比较有点自由，不用整天关在牢房中，要参加劳动。我被“荣幸”地指定为该监舍的“学习号”，负责组织领导该监舍在押犯的思想改造学习。当时的劳动是书籍的装订，在这里学会了从护页、配页、手装、粗装锁线的一整套技术。

看守所的生活也有所改善，还有文艺活动，当时正提出超英赶美，我还参加了反美的活报剧的演出，也可说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了。

8月13日，法院到看守所对我进行宣判，判决书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XX）反字第XXX号。内称……1957年加入师大反动社团“底层之声”，积极从事采访，编辑等反革命活动，并在群众中散布“肃反搞糟了”，“反右派是小题大做”等反动言论……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特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款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宣判毕问我上诉不上诉。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就是判个无期也只能是感激政府的宽大，要是不服判决，只能落个死不悔改的后果。所以当时我只能表示不上诉，服从判决。但我的确知道，这一辈子算是报销了。

这一棍真把我打懵了，也把我打醒了。原认为“反革命罪必须是以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行为”，而我在整风中的言行，真的够得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吗？欲置你于死地，何患无辞。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呢。我其实是“指九天以为证兮，唯灵修之故也。”

刑已判了，什么想法也没有了，这倒使我可以冷静下来回想一下整风的过程了。

1956年，当时正是学习矛盾论，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时候。报上连篇累牍地宣传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结束，今后该是和风细雨的政治环境了”，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中央号召不要做乖孩子。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的《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这些书都促使人们，尤其是青年学子们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当时提出的整风是整党内的“三大主义”，党外人士自由参加，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欢迎给党提意见。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在报上表发，使得我们这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傻小子，以为春天真的来到了。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展开整风运动给党提意见。

一天早上第一节没课。我在宿舍中看书，当天的《光明日报》送来了，上面有我系穆木天老师的一篇文章《我的呼吁》，大意是说师大的整风未能很好的开展，还有一堵玻璃墙在挡着。当时乙班也有几位同学在看，大家一商量，认为应写一张大字报促进一下，动笔写成后，缺乏题目，我提出就写“迎风户半开”吧。大家一致同意，就这样师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炉了。接着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校园。本年级成立了“底层之声”与“苦药社”两个社团。我加入了“底层之声”。

都是希望能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将一些我们特别感觉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能纠正过来，至少也让党知道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于是就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写了，说了，运动也就展开了。这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人的注意，我记得当时有画家郁风，京剧艺术家李少春，剧作家马彦祥等五、六位知名人士，曾到宿舍来看望我们，对我们的行动大加赞赏，认为是又体验到“五四”时代的气息。记得当时校党委书记 X X X 曾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说：“这一段时期的整风运动，大字报是百花齐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得到党委的肯定与鼓舞，劲头更足了。在班级的讨论会上对党的发展新党员提了意见，认为班上四年来提出申请的同学不少，但结果只发展了三个，并且都是党员的未婚妻，我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班级的墙报上题目是“培养党员，还是培养老婆”。贴出后，得到班上绝大多数女同学的赞同，有的说：“你替我们出了一口气。”我在班级讨论会上提出 55 年的肃反是扩大化，把一些无辜的同学拿来批斗，我也是被斗者之一，结果证明都批错了。有一位香港来校的同学，被批后，趁假期放假回了香港，下学期开学就没有再回校。我说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在运动中对被批斗的同学进行监视，我说这些是违犯了宪法。对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我有同感，故对班上的“党主乎？民主乎？”的论点是支持的。也就是这些言行观点，在六月八号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马上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夜之间，我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从 1949 年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运动，无一不在反反复复、铺天盖地、无休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检举、揭发、批判、斗争、控制环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这种运动利用人们的内疚和启惭，制造恐怖心理，制造孤立的处境，紧张的情绪，加上持久的社会压力和反复的思想灌输，在摧毁一个人内在个性的时候，使被批判者屈服于权威，至少是暂时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

我便是处在这别无出路之中，经历无休无止的检查，反省交代，批判斗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里，具有两面性格的人增多了，一面凭良知支配自己的言行，一面却为促使自己去迎合极“左”需要而攻击他人，伤害他人。而我认为不论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中，做人说话都应有三条底线：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就应该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该伤害他人。我相信当时对我进行检举揭发批判斗争的同学，他们的发言，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三类的是出于被迫和不得已。对我虽有所伤害但也不重。在批判我的场面中，许多场景都模糊了，惟有 X X X 的发言，至今记忆还清晰，他当时义愤填膺，指手画脚，唾沫四溅，指着我的脸说：“你是吃着社会主义的饭，屙着资本主义的屎。”直至今日，半个世纪了，我仍然参不透，怎样能分辨出大便的阶级性。不得不佩服某君的政治嗅觉的灵敏，与阶级觉悟警惕性之高。此君惜已去世，在他未去世前，我曾携我小女乘我弟的车，驱车百余公里，到他家访问，他也曾趁出差之便，到我家回访，我俩是相逢一笑，举酒言欢，但他的“光辉”形象，却始终无法在脑中消除，可能是正如普希金的诗句所说：“而那过去了的，就成为亲切的怀念”吧。

从被批斗之日开始，我便成了另类，受到了孤立。往日的同窗挚友，现在视若路人。白天被迫绞尽脑汁深挖犯罪思想根源，交代罪行，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写没完没了的检查、交代材料；晚上躺在床上，扪心自问，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弄得自己都否定了自己，怀疑自己真的是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了。

宣判几天之后便被押送到北京监狱服刑（清河袜厂），这是一个生产《金双鸟》牌的袜厂。从原纱进厂到一煮炼一丝光一晾纱一拨纱一染色一导纱一织袜一锁口一烫熨一检查一修补一叠配一整装。这些工序，除锁口是由女犯操作外，其他工序，在这十年中，我几乎都尝遍了。所以对袜子来说，比起一般人来，可称得上是专家。

狱中的生活，倒是平静的，因为已知道自己的结局了，也知道日期了，就只有一天天的算还剩多少天了，真正体验到度日如年的滋味，那的确不好受。劳动强度不大，伙食也过得

去，尤其是有外宾参观时，那天的伙食是特别丰富的。最难受的不是身体上而是心灵上、思想上的。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最崇高的欢乐在于思想。人最大的耻辱，就莫过于思想的权力被剥夺，人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思想被压抑。而当你一进到监狱，管教人员首先就是要摧毁你的自尊心、自信心，你的人格，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外，还要伴随着每天的“改造学习”。人人都必须神态严肃地表态说：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立场，观点，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真像自己犯了什么大罪似的，精神受到严重折磨。这时，也只有这时才算是真正体会到“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深刻含义，才会衷心的羡慕白痴，精神病患者，因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人。

60年实行粮食定量，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吃的还是粮食。浮肿的，便秘的大有人在。每日收工后最大的享受便是“精神会餐”。当年我被临时调到团河农场种秋菜，因吃不惯高粱米，弄了个胃穿孔，疼得在菜地里打滚。随去的医师拿碘酒给我吃来止痛。但我仍然是疼得满地打滚。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恰好监狱长来团河视察，我得以坐他的轿车回到监狱。医生说，这是典型的胃穿孔，再迟几十分钟就真的完蛋了。连夜全身麻醉动手术，作了修补，一个星期便下床活动，前后十天便出院了。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病后连白砂糖都没有一点，也真算是命大。

在监狱中曾给同班的汪敏同学写过明信片（因狱中不让写信），企图告诉她我的行踪，并向她要一床被套，但却石沉大海，渺无回音。直到82年才知道我的明信片，被她校的党支部干事扣压了，并以此为凭证，认为她还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往来，对她进行了种种歧视，刁难，迫害。她本来在包头一中工作，藉此将她调到中蒙边境最荒凉，条件最差，生活最苦的地点去受折磨。这对我来说，是负上了永远无法赔偿的债务，内心的愧疚直到今天还无法消失。

文化大革命中，监狱成了保险箱，整天整夜听到戏曲学校的高音喇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活也停顿了，我被抽出来弄宣传，搞红色海洋，在监舍的墙上，用红油漆大写毛主席语录。一次我在墙上写四平方一个字的语录，从早上到中午只写了半个字，被教员看见，说我在磨洋工。我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个字顶一万个字，我半天写了半个字，不顶五千也顶四千字吧？这算磨洋工？”他只好瞪我一眼走开了。一直搞到67年11月离刑满还有一个月，被调到了出监队。都是刑期将满的犯人，集中起来，学习些出去后必须遵守的事情。我一到出监队，队长便对我说：“辛桂彬你以后还敢闹事吗？”我说：“一失言成千古恨，今后再也不会闹事了。”他说：“这就对了，今后就本本分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总算熬到了刑满这一天，这十年中曾经绝望过，因为一想到自身的处境，社会上的看法，对亲属的影响，以及今后的人生道路，会被永远压在阴山下，还要被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想到这些不寒而栗，失掉活下去的勇气。但一想到那就是所谓“自绝于人民”，准则不能变，否则一切都将糟糕不堪，我就不相信这种人鬼颠倒的社会能长久下去，我就要活着看个究竟，我相信历史总会有还我清白的一天，正是这种信念，支持我熬了过来。

出监后被遣送到清河农场茶淀分场就业。该分场是种小稻的，劳动强度相当大，举几个数字可见一般，拔秧一人一天定额一分地，插秧是一亩，割禾一亩。当地是盐碱地，需修排水沟，一天定额18方土。一到插田时，吃午饭都累得趴在地上吃，有一个教授给他儿子写信，叫他要继续学好外语，就被斗了，说仍然崇洋媚外，要儿子学外语，就是想当里通外国的特务，被狠狠地批斗了两天。

另一个是谈话时说了林彪的名字，这也是罪状，林副统帅的名字，是不能乱叫的，更不是这些人有权叫的，这是对副统帅大不敬。当时我被指定为批判的发言人。并要求尽量上纲上线，我也只好加大帽子，毫无具体事实的胡说一通。我想当年整风时，班上的同学对我的批斗，恐怕有不少也是与我现在一样，不得不为之。

69年战略疏散，又被押解回广西柳江县露圩农场。从北京押回的有二十余人，都是刑满就业的。一到农场在检查行李时，见我有一大箱书籍，管教人员说“现在只要有雄文四卷，就什么都有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影响你的改造，一起没收了。”可这一箱书是我大学四年各学科的讲义，参考资料及听课的笔记，是我大学四年学习心血的结晶，就这样眼睁睁地被拿走了，连一部辞海也没能留下。接着将每人身上的全国粮票也收去了。这才让我们与服刑的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犯人没有两样。该场有个糖厂，故以种甘蔗为主，到收割甘蔗时，每人每天的定额是连砍带捆运到田头过秤是六千斤。挖土方定额四立方连挖带运到五十米外。我计算过，一方土要挑38担。

七十年代以后，农场逐步清理刑满人员遣送回家。一批的走了，而我却一直未动。我从小就无母亲，在生我六十天后，母亲便因病去世了。我连母亲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是由祖母与伯母带大的，继母是在我七岁时到我家的。父亲已七十高龄，弟妹也一大群。我离家二十余年，的确很想回家了。我知道要需回家，需要家中与当地政府同意接纳才能回去，我便写信回家探探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地派出所曾到家中征求意见。结果是家中不同意我回去，来信说是弟妹们不同意我回去，继母也在信后写上，“我也不同意你回来”。这对我的打击比宣判十年还重，因十年后还有个盼头，而这一下什么都没了，只能在劳改单位终其一生了。这下逼得我不得不最后表态了，我回信说不管你们接不接受我，我都是辛家的子孙，今后死在农场，变成孤魂野鬼，仍然是辛家的鬼。这信发出后，经过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与邻居的劝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终于在75年回到了桂林家中。

本来十年刑期早已服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也应该在70年就恢复公民身份，但现在回来却仍然戴上帽子，是黑五类，受群众专政，每日要扫街，见到熟人亲友，只有旧帽遮颜，无脸见江东。

由于我的原因，继母的街主任职务被撤销了，弟妹们的升学、就业都过不了政审关，对家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们不欢迎我回来，我也能理解。现既然能回家了，就只有处处小心，看脸色行事，回桂后靠做临工维持生活。干过扛包，卸煤，泥水小工，拉板车等等，反正都是粗活、重活。而计件、工资高的不让黑五类干的，能干的就是计日的，每天工资一元三角六分，真是边干边想哭。

79年才获得平反，前后受了二十二年的专政磨难。一纸刑事再审判判决书便打发了。说是错判，现免于刑事处罚，但却实实在在一天不少的蹲了十年牢房。未得任何的补偿，连一分钱也未得到，还得从心里谢主宏恩，实在无法理解，这“免于刑事处罚”六个字的意义何在。真是“不冤枉一个好人”，要冤枉就是数十万人。唯一得到的后果就是吃了整整十多年的玉米窝窝头，使得我的血压、血管、血糖、血脂都正常，从57年到今，60年胃穿孔住院，72年在露圩加夜班抬石块，小腿骨砸断住院，93年因急性胃炎住院，这半个世纪只住三次院，平时连伤风感冒都没有，这大概是苍天对我的回报，让我多活些岁月，多看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也等是人生收获吧。

平反后由于我的申请，经母校分个名额到桂林，我才获得到中学校任教的机会。在评职称时，因实际教龄不到十年，不能评高级，只能评一级。有的同事说：“不是你不服从分配，不教书，是不让你教书，这样评法你不是太吃亏了？”我说：“整个命运都赔进去了，还在乎这职称！”我仅干了十年，到89年初便退休了。

执鞭从教仅十春，不爱逢迎不慕名。
三尺讲台酬壮志，一支粉笔寄深情。
夜阑好阅案头卷，晨静惯闻读书声。
孺子成长便是足，哪管宠辱与浮沉。

退休后不少朋友邀请我去上课，都婉言谢绝了，我要补偿失掉的岁月与欢乐，我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与国画。当然不准备成名成家。但看到学有所获，自我欣赏，也是种享受，家里人说我退休了，比上班还忙，的确是这样。

老来偏为书画忙，离讲台，进课堂。抖擞精神分秒惜时光，翰墨丹青骋驰乐。酬昔愿，此时偿。

莫道天际已斜阳，胆宜张，眉须扬。勤作书画晚节芳，自信勤劳能益寿。添干劲，斗风霜。

我还参加了市老干局的“常青艺术团”。经常排练节目，到各地演出。96年曾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中老年健身舞比赛，获菊花奖。还到过长沙、南宁，柳州等地去参加演出，退休后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日捧佳作研讨，
有时信笔抒怀。
任我知我老书呆，
人各行其所爱，
不嗜云烟茅酒，
最欢麻将扑克牌，
歌舞乐事自安排，
兴寄丹青墨海。

我直到81年才结婚，现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并都有小孩，我现已享有含饴弄孙之乐。在成就上，事业上，学业上比起班上的师兄弟，师姐妹来，是最没出息的一个。谁之过欤抑谁之罪欤？连我也说不清了。

我所以想写这些东西，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这半个世纪我是怎样过来的，回忆有时是幸福的，有时却是痛苦的，但不能因为痛苦而割断回忆，每当我忆起这充满灾难，充满屈辱，夹着尾巴当狗的日子，每当我揭开这血淋淋的心灵伤疤的时候，并非是让痛苦成为压迫我沮丧的包袱，更不会整日地泪眼涟涟，而想说明当一场反右浩劫来到，五十五万余人沦为右派，五十五万余家庭遭到不幸，牵连更是铺天盖地，我倒霉入狱不到而立之年，刑满已是不惑之日，到恢复人的尊严时已到知天命的时候，退休是耳顺之期，而现在却是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夕阳黄昏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年到喜寿复何求，夕阳人生自运筹。
窗前书画怡情趣，灯下读史觅源头。
高歌一曲抒胸臆，翩翩起舞展风流。
不为名利去钻营，优哉游哉度春秋。

2005年10月30日于灯下

红色陷阱

徐美英

所谓陷阱，那是“为捉野兽或敌人而挖的坑，上面浮盖着伪装的东西，踩在上面就掉到坑里”（其义出自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它的可怕性在于“伪装”，使目标物在毫无警觉的状态下向陷阱走去；其次，为了使捕捉物不能逃遁，往往又会在坑内设上一些机关如铁枷或绳索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掉将下去，任凭你怎样挣扎，再也不能逃脱了。都说人生道路多荆棘，其实荆棘并不可怕，我们常说“披荆斩棘”正说明荆棘是可征服的。

而人生道路上可怕的是人为布设的陷阱，那些深不可测的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虽步步小心也逃避不了。落人者往往是那些前进心切之人。因为他们往往单纯稚嫩，不谙世事，不会瞻前顾后，不知左顾右盼，还有一些存心险恶，落井下石之人在，他们的苦难就更深了。

我的青春命运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陷阱……

第一步 心向北京

父亲的政治生涯我并不完全清楚，只知道他是海南岛琼县人（现文昌市），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二十年代曾任国民革命军海军党代表，是个老国民党员。96年我寻根回海南省时，看到有一本《海南志》上面就有父亲徐天琛的名字，看来大小也算是知名人士了。我的记忆中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退出官场在家（上海）闲居，解放前夕，没去台湾而是自己去了香港、澳门，在49年时还参加以李济琛为首的蔡廷锴、邵力子、龙云、黄绍宏、卢汉等几十位民主人士，通电起义发表的《和平宣言》（《宣言》可查当时《解放日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之后，向人民政府提出回国的要求，随后上面发给他回国证，后因疾病缠身，56年病死在澳门镜湖医院。这时，正是我就读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有关父亲与我的来往信件，当时，我如数一并交给组织，自己未留片纸只字。

解放初，我家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房无产，八个姐妹兄弟的生活靠变卖家当维持生计，要说这个情况，与“城市贫民”相差无几。可是我却自填写家庭成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以此表明我自觉地把家庭当作革命对象，认为自己这是以革命的态度对待家庭，积极要求进步。殊不知，这个自划的“成分”后来终于成了我的黑根之据，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陷阱的边缘。

上海解放时，我上初三，十三岁。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师——张蕴实，也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张老师是东北汉子，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一口流利悦耳的普通话，一手潇洒流畅的板书，尤其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与学生一起打乒乓球等平和作风让我打心眼里喜欢他、敬佩他。他以上海市复旦中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介绍我入团，时在五一年（我十五岁）。他又是我高中三年（十四岁到十七岁）的班主任，在他亲切的关怀下，我积极投身于庆祝解放，宣传新中国的一切活动中。他是政治老师，从他那儿接受了最初的革命道理，他把我培养成校学生会干部和团的干部。在我人生关键的一步他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三年，周总理提出北师大需要大量优秀应届毕业生报考，改变调干生过多的状况，我就在他的推荐下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高中毕业时，我十七岁，在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我和其他青年人一样，开始编织着人生的梦。梦的中心就是北京，梦中的圣地就是祖国的首都，我渴望着走出上海，盼望着到北京上学，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学习。能到祖国的心脏上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与上海告别的那天晚上情景终生难忘。我的好朋友与我在霞飞路上话别。路旁的法国梧桐树叶似乎在沙沙作响，柔和的路灯照出两个少女的身影，路边高楼下的咖啡馆飘出幽扬的音乐声，我兴奋地望着未来，憧憬着到北京的新生活，快乐的心情压抑不住，好朋友羡慕我祝贺我，他们为自己不能进京上学而遗憾。

第二天，我抱着割舍家庭割舍上海的心情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这就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 上北师大

终于如愿以偿，五三年的秋天，十七岁的我怀着美好的理想迈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了。一切都甜蜜得令我陶醉，在下车当天午睡休息时，宿舍走廊上两个清洁工用清脆的北京话在交谈，竟然让我有如梦中看电影的感觉（因为在上海只有到电影院才能听到北京话），那种朦胧的幸福至今挥之不去。

北京师范大学前三年一直是踏着紧张而愉快的节奏，全身心地积极投入学校生活。我热爱北师大，我热爱人民教师工作，当时，毛主席的“三好”成了我大学阶段的奋斗目标，为了做到“三好”，我认真学习，门门功课都力争五分。我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踊跃担任社会工作。我努力锻炼身体，那一方面都不落后。我要求上进，因为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五三年到五七年大学的生活多姿多采，每年的五一、十一更是我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宝贵机会。我在那几年中（十七岁到二十岁）没有虚度青春年华，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似火。

生活也并没欺骗我，我几乎年年都评为三好生，还评选为校体育积极分子，连劳卫制二级证书也拿到了，还参加了校篮球队，当过队长，还参加校舞蹈团，当过团长。为了做好一介光荣的人民教师，培养自己广泛的业余兴趣与爱好。直到五六年我当选为北京市的团代表，有幸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还与总理跳舞共欢，这大概是对我大学生活积极努力的最高奖赏吧。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总理还亲切地问我是一所什么学校叫什么名字等等，并鼓励我将来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这件事没想到第二天轰动了北师大，学校广播站播出这个消息时，好多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来与我握手，向我祝贺，与我共享这份荣誉。

这份荣誉鼓舞我不能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要更加要求进步，更加听党的话，然而“陷阱”的危险已在不远……

第三步 整风运动

北京的红五月是和煦宜人的，但五七年的五月却有一场出人意料的狂风骤雨，改变了我的命运。

眼看七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们毕业班同学都忙于认真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大学中最后一次考试，同学们三三两两自愿结合，分散在学校各个角落复习。就在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信誓旦旦地保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知识分子都行动起来，北京——祖国的心脏当然得天独厚，北京的高校自然行动迅速。我记得当时学校领导召开动员会，记不清楚是那位或那级领导是如此“诚恳”动员的：你们快离开母校了，你们在学校呆了四年，对学校的情况也了解很多，所

以，你们应该带头帮党整风，把宝贵的意见写下来，是否积极帮党整风也是热爱党，靠拢党的检验。于是，毕业班的爱国爱党的热血的学生果然个个放下手中的书本，幼稚地认为学习只是个人的事，而帮党整风才是摆在面前的国家大事。无私无畏的同学走到了运动最前列，当然我也是这天真幼稚中的一个。

五七届中文系大都是各地区、各学校的好学生，四年来又受到一批名师（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启功、文怀沙等）的熏陶与教育，很快就进入整风运动的状态。有供民主发言的《自由论坛》，有的社团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大字报如《底层之声》、《苦药》的好些文章，一时间活跃了全校的整风。

我也和一些同学一样，关心运动中出现的话题与言论，毫无顾忌地讨论，毫不掩饰地发言，以青年人的真诚、坦率投入帮党整风。

谁知这种积极帮党整风的表现已使我离陷阱只差一步之远了。

第四步 反右斗争

人民日报六月八日《这是为什么？》社论是发动全国反右斗争的信号，可是我班范亦毫同学却贴出《这会造成什么？》这张批评人民日报社论大字报，我毅然地在大字报上签下我的名字，我认为范的观点是正确的，整风运动不应该草率匆匆收场。

这时，整风运动失去了往日的活跃，变得死气沉沉，给人一种危险降临的感觉。似乎一切在按某种规则在进行，可以说整风运动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我茫然了。好多同学也一下沉默了，都在朝一种思想观点、一张嘴巴、一个声音发展。同一宿舍的成了互不相识的陌路人，见了我像避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什么“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烟消云散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突然销声匿迹了。

一些“聪明”的同学纷纷放弃自己昨日的观点，人人自保，个个自危。而我这类执着地坚信党的政策的青年学生，依然天真地以为仅仅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于有人利用整风来反党与我无关，我仍然是四年级的学生，一切都会按毕业日程进行……

其实，这时已阴云密布、剑拔弩张，同学之间已“阵线分明”，一时间，共同生活四年的同学竟然谁也不敢跟谁讲话了，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路上相遇，也不搭理。当然，那时我们班是怎样确定右派，是按什么原则确定，又怎样在众多积极鸣放的同学中“挽救”那些人，“推下”那些人，我是一概不知的。沉默的态度形成沉闷的空气，沉闷的空气中暗藏着不是整风而是整人的“天机”。

此时，我已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了，可悲的是我竟全然不知！

最终 失足落阱

以我的右派档案材料为准。

五十年后，公布这份“红色档案”于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当时给一个二十出头的我贴上一张怎样的画皮。

无独有偶，看到同系同年级不同班，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的雷一宁同学的材料居然与我一个套路。其丑化的手段，夸大其词的上纲上线的可怕作法，令人不寒而栗，有如陷阱中的铁夹与绳套，使我一生伤痕累累，一动就血流汨汨。

材料详详细细四、五千字，现只抄出第二部分：结论及处理意见。

一、整风前一般情况

解放前家庭培养她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自大狂，解放后通过政治上要求进步来达到个人

野心。徐美英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留恋剥削阶级家庭生活，在长期的团的教育下，始终不放弃其反动阶级立场。肃反中很消极，对党对干部不满，56年听到反革命父亲死在国外时痛哭流涕，要为反革命父亲调查伸冤，并认为党没发给他父亲回国证，因而对党怀恨在心，对组织不满，甚至对立，回避立场问题，抗拒思想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败坏。

以上文字可提炼几个要害之处：

(1) 出身官僚资产阶级。上文说过，这是我自找的，而我的姐姐都没这么写，堂堂的组织竟以自划为准，对待政治问题是如此轻率儿戏！

有个反革命的父亲。上文说过父亲的政治表现，究竟能否定为反革命呢？现在是十分清楚的。

父亲去世时痛哭流涕。这是人之常情，但绝不会公然痛哭，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回国证中央已寄出，只是父亲重病缠身，抱憾病逝。材料说仇恨组织不发回国证纯属编造，肯定会有“亲近”同学当时在我身边见我流过泪，后因需要就无中生有捏造成“痛哭流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哪个人敢不跟右派划清界限呢？

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利用“自报成分”“自交父信”“自悲父亡”的单纯，挖出我对党仇恨这个黑根。果然，过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开出臭花恶果了，在青海湟沅畜牧学校，对我这个“充满仇恨”的右派再次打成了双料现行反革命，尽管后来都纠正与赔礼道歉了，可精神上的伤害与刺激，政治上的冤屈与迫害又怎样能抚平与补偿得了呢？

这份材料可怕的“威力”给我带来的灾难是一个接一个，真是“永世不得翻身”。

(2) 家庭培养我自大狂。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全部材料也无一具体事例证明，是空洞的概念，我在家庭中只生活到十三岁。“通过政治上要求进步达到个人野心”。更是荒谬可笑，昔日肯定与鼓励我政治上要求进步，今日为了某种需要，无限上纲上线，居然把我歪曲为野心家。

(3) “留恋剥削家庭生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扣上帽子是“道德败坏”具体事例呢？没有。

同样也是毫无依据扣大帽子，为了搞臭我，千方百计拼凑，材料上没有实例。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右派从政治直到生活上是全面反动的，是一群既无耻又穷凶极恶的坏蛋。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以往你的可爱成了可恶，平日你的不足成了你的政治问题，你的枝节成了你的主流，这样的手法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赤裸裸地表现，可见五七与文革同出一辙，是有深厚的渊源关系的。

二、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

整风中站在反革命父亲的立场上，否定肃反成绩，向党反扑。在她把持和操纵下的群众论坛三次组织肃反问题论坛，假借讨论肃反成绩为名来否定党的肃反政策，搜索肃反中被斗对象和假积极分子，向党进攻，使党委在学校的地位“摇摇欲坠”，使大家仇恨党，要搞垮党委，搞垮党。追逐海德公园式的民主，反对党委的报告，企图与党分庭抗礼，与党展开面对面斗争，跟党争夺群众，争夺整风领导权。佩服林希翎的意见，同意以“新五四精神”对待党的整风运动。徐美英认为三害的根源是制度，她认为“党变质了”“党三害严重不整不行”，党委委员一个个都没有党性，不如胡风（反革命分子），恶毒地把党分为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徐美英四处点火，还与右派分子联系，想开四、五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坛。同意“民主乎？党主乎？”的反动观点。

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真是“高抬了”二十岁出头的徐美英了，把我描绘成一个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的大右派。可结论上最终为什么又定为一般右派呢？可能正如当时“教育”我们所说：对自己的问题要从性质上去认识。原来搞的也是抽象与具体关系的玩艺儿，不看具体

事实，只分析性质。政治上的高压与诱导迫使我们只好对自己重新再认识，那就是按材料的定论去套自己一切表现，甚至要以材料为论点在自己一生中哪怕幼年时一个生活现象去找论据，要承认自己的“原罪”，是娘胎里就带来的。用这种无形的枷锁逼供你，还美其名曰“重新做人，脱胎换骨”。

三、反右派的斗争

徐美英反对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党中央小气，心胸狭窄，认为中央在“收”。同意呵欠伯的“反党不是反革命”的反动言论，为呵欠伯受批判而抱屈，同意雷鸣（即雷一宁）的反动文章的观点，反对彭真同志报告，污蔑反右派斗争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污蔑党中央对阶级斗争的分析，认为民主办校不是右派言论。对积极分子不满，污蔑进步社团，为反动社团“底层”辩护，不安心学习文件，经常出去看话剧、看电影，消极抗拒。

所说的几个“反对”，几个“污蔑”也是毫无半点事实。几个“认为”也是划成右派后，成天检查交心、认罪而逼出来的话语。先确定你是右派然后再从你自己写的材料找出“有价值”的内容去证明，去完善。这就是当时整人的手法。

毕业班的右派同学是每人只用一个半天就终审宣判了，不让你有任何自我辩解的机会。两个小时的批斗会是早已作了充分准备的。发言人与发言内容都有规定分工，会毕就让你去认识去批判自己；之后整整让我们写了近两个月的交心材料，交代罪行，揭发他人，其实就是众所周知五月下旬那些天的那点事情，已经再没什么可写的了。但却要你按着结论诱导着写，于是只能展开想象写，否则就警告你：顽抗，没有出路。当时我们的命运自己都不知到怎样，感到害怕、紧张，也不知道以后该怎样对待与处分我们，没人找你谈话，没人和你接触，只是自己埋头苦思冥想，挖空心思地丑化自己，简直把自己写成马上可以执行枪决的反革命了，单纯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四、交代的态度

“当组织上让徐英英检查交代时，徐英英不老实，不敢暴露，消极对抗，还向王XX老师摸底，企图蒙混过关。跟组织跟同志对立，和‘底层’右派分子却说说笑笑，臭味相投。她写了许多交代的材料，暴露了一些问题，但她并不能把交代过程当作转变立场的过程，在交代中写了许多大家对她的批判，扣了一些帽子，有些材料是重复的，躲躲闪闪地不敢给自己扣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实际上并不是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的表现。”

实在写不出什么了，叫“态度不老实，不敢暴露，消极对抗。”

打了你左脸，再把右脸转过来让人抽耳光，这才是同组织不对立。

立场问题更说不清了，哪个右派在写材料中就转变立场改造好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右派在写材料中肯定是转变了立场。

材料的最后，终于露出整人的狰狞面目，你没有低头认罪，你没有缴械投降。

究竟把青年学生变成“敌人”是为了什么？要让“低头认罪”重压背负一辈子。尤其在文革中，这种“右派是敌人”的理论恶性膨胀，使我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简直令人想像不到，甚至伤害到我的下一代，如今既然平反改正，那之前造成的恶果又有谁关心过呢？当初执笔整理书写材料的同学听到我几十年的灾难与迫害时又会有何感想呢？

这份红色档案就像“护身符”一样永不离开我的一生，幸好有一次偶然机会我把它抄录下来，否则付之一炬。即使在七九年平反后，右派的阴影也会始终笼罩着你。而在一九七九年只用千篇一律的一页小纸通知你：错划予以改正。形同儿戏，与当年整人时的情况一比，相差何其鲜明。

我61年摘帽后工资定为行政23级，青海领65.52元，因为我不是本科毕业生，只算本科肄业生，所以不能享有本科毕业生22级的待遇。直到七九年平反改正时，才给我定本科

生 22 级工资，而那时我已经毕业 22 年了，才拿到 22 年前应拿的工资，当我向省教育厅反映毕业 22 年的本科生工资已提到 21 级或 20 级了，某领导的答复是：“你现在拿这点工资已经很不错了，你不应和大学生比，应和农民比。”这就是五七反右斗争后对右派学生从政治、经济、生活上的全面专政与改造措施之一。拿到这份改正通知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我不知应该用什么思维规律，该用什么思想感情来看待改正，大哭？痛哭无泪。大笑？苦笑无声。无帽轻松了？不！更沉重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就这么一纸交代了，而且师大发出的每封信内容一样，只是填写上不同人名而已，毕业后至七九年，我已经四十三岁了。

材料上的“考查一年”那也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当我发配到青海西宁 X 中时，才真正体验到考查的含义。

北京的十一月应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可是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肖敦煌、雷一宁和我三个右派灰溜溜地背着一个破箱、和一个装茶叶箱的书籍离开了北师大，当我们回首再望师大校门的校牌时，我们竟以敌人、罪人的身份无言地离开母校，当年欢呼雀跃地进了师大，而如今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之差别。如此反差，内心的难受滋味，可想而知了。没想到离校前夕，组织上谈话时宣布“考查一年”，“好好改造都可重头做起”等等其实只是成了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奔赴高原的诱饵、谎言。实际上后来几十年的所谓改造路程证明：早已有个无边无涯的苦海正在等待我们去扑腾了。

在所谓考查的骗人鬼话下，实际上是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继续低头认罪，我和雷一宁、肖敦煌三人在五七年十一月分到西宁，然后我再分到西宁二中，每月只发 30 元的生活费，还规定每周每月要汇报思想，汇报的场合大小根据斗争的需要来定，每次汇报等于再接受一次大小不一的批斗会。如果工作上疏忽出现差错，那就要审视你是否继续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语文课是没资格教的，幸好我还有一点业余特长，就让我搞学生的文娱、体育活动，同时在教务处干活，排课表、打钟。当时是一个挂在旗杆上的铜钟，为了学会用长绳去敲响它，我还真着实练了一阵子，每次敲起悠扬钟声时，可看到老师和学生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因为这口钟要放在多通道的必经处才能使钟声传播全校。有了右派，原打钟的工友就让位了，每天十几遍敲钟故意向大家展示右派还继续存在，同时也用这方法不让你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刚开始我觉得很丢人似的，后来脸皮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敲钟的时间不准，敲钟的声音不宏亮这也都反映你改造态度的问题。全校的讲义都由我来刻腊板，才开始学刻腊板，刻错也要批判，课表排得不好或调错也要审视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除此之外，还兼做女生宿舍管理，负责每天起床的铃声和检查宿舍的纪律，原来由几个人的繁杂事务都堆在我一人身上，这还是对右派的照顾，否则下牧区劳动。

最有意思的是，业余时间没人会和我聊天没人会找我闲玩，我刚去时仅二十一岁，有时内心的孤寂实在撑不住了，只有逗逗学校教工家属的孩子玩，这该不会有问题吧，不！错了，如果你逗的是校长的孩子，思想汇报会上就要质问你是否有别有用，交代你的企图。跟学生接近，态度和蔼是拉拢学生，态度严厉是仇恨学生，不满情绪。汇报会上不挖思想，或提出问题没改进，那就用“抵触情绪”来归纳。总之，改造得每天低头认罪，埋头工作，独来独往，见人态度卑下，说话唯唯诺诺，这样才让群众满意。帽子是在群众手中，让你摘才能摘。警告你摘了以后还会给你带上，即便工作中做对了做好了的时候也会在批斗会上敲打你不许翘尾巴，继续挖掉剥削阶级的根子。

这就是考查的含义，这样，苦了一年又一年，我整整被考查了四年，直到六一年底才“同意”给我摘帽，那时我已二十五岁了。在刚毕业后最好的年月里，那些非右派的同学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又提了一级工资，有的已成家，而我却是一个摘帽右派，属于内控的右派，一切正当的待遇正常的要求想都别想，有个风吹草动，马上对你严加看管。六四年，西宁二中改为省实验学校，是省教育厅直属重点中学，我这个摘帽右派就不能留下了，尽管我怀中抱着吃奶的孩子（才半岁）突然通知我调到县城畜牧学校，没有商量的余地，硬是让

夫妻分居两地，直到七二年文革后期才又与丈夫，三个孩子团聚。

在考查中，我所在的一位年龄大的语文组长特别严加管束我，他本人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可能由于改造右派有功吧，不几年，组织上确定他为青海省到北京去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考查的补充含义吧。

这一场残酷的反右斗争就在我们青年学生大学时代那纯真的友谊上涂上红与黑的色彩，四十年后的一次再相会时彼此既熟悉又陌生，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又能对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只有将来上天堂或下地狱时大家再坦诚评论这段非凡的经历的是非功过了。

据说当年某位领导在反右中确定百分比后，北师大就根据此指标来确定右派数的，中文系教师已经在最大范围内圈定了，以黄药眠主任为首的，九位教师难逃厄运，但未达指标，于是目标就转到中文系四年级的青年学生中，当时五七届共 223 人，划为右派的 52 人，其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北师大在以后的工作回顾中，始终认为五七届尤其中文系是办学以来空前绝后的质量最差的一届。因而北师大的光荣史上从来避开这一届，保持与五七年反右观点一致。

像我这样的右派充军发配到大西北（连遣回老家改造的资格都没有）在大西北教育战线中含辱负重、历经坎坷，依然忠于人民教师光荣称号，耕耘了四十年，所培养的学生已遍及全国与全球，而这些学生今天，在不同场合却公开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庆幸他们能在青海接受这些右派教师的教诲，至今还怀感激之心，那么北师大学生质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口碑不正是与师大“最差一届”的论调大相径庭吗？现在北师大又有多少毕业生自愿到西北去呢？又有多少学生愿以祖国需要为原则到大西北去执教呢？究竟政治质量是以什么为标准呢？真让人糊涂！

我在青藏高原整整呆了四十年。二十岁去一九九六年六十岁退休。四十年来的历程，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磨难与迫害使我至今对这种特殊的红色恐怖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而结婚生子的女右派不权本人遭难，还株连家庭中亲人——丈夫和孩子，也给他们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恐怖烙印，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精神都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反右斗争是过去五十年了，可是给我带来深重的苦难却还在延续，我还要继续背着枷锁、带着伤痕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完我最后人生的路程……

往事并不如烟，往事可堪回首；历史不容掩饰，事实不应歪曲。晚年清贫的生活中回首往事，不是颓唐而是增强自己生活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这些曾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的精神。

丁酉五十年祭

许有为

1957年岁次丁酉。那个春光明媚的季节，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但在我们当时那批大学生心目中，已经是莺歌燕舞的阳春三月了。毛主席、共产党先是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接着就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手舞足蹈，乐得心花怒放，真的大鸣大放起来了。

谁知风云突变，鸣放还不到一个月，就改为反右派斗争，“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五、六十万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专家教授、大学生、党政干部、军官、民主人士、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一夜之间成了“人民的凶恶敌人”。

像我这样爱说话、直言不讳的大四学生，当然也在劫难逃。

二十多年的苦难从此开始了。下放、劳动改造、四清、文革、监狱、劳改……

家已破而人未亡，妻已离而子未散……

漫长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接着是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天辟地的三中全会、小平同志重新上台、拨乱反正……

合肥市委为我平反后，我于1978年秋分配到长丰师范学校工作。中共中央（1978年）55号文件决定，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改正。许多同学闻风而动，从全国各地回到母校北师大，住满了招待所。

正当我准备启程的时候，母校来信，说接待力量有限，劝阻57届被划为右派的同学不要回校，校党委将负责处理好每一个被错划的毕业生的改正问题。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北师大党委。时间在1978年秋冬之际。在这封信里，我详细回忆了被划右派的经过，以及后来经受的苦难。这封信比什么回忆文章都更为真实。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母校党委：

离开母校的怀抱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我作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正在为培养四个现代化的人才精神焕发地战斗在讲台上。我没有辜负我的亲爱的母校给我的培养与教诲，我没有辱没我的母校光荣的名字。

虽然我是含着委屈和痛苦的眼泪离开母校的，但是，我时时刻刻在想念您，亲爱的母校。我想念母校的党和党所教导的共青团，想念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以及那些战斗在图书馆、办公室、食堂、商店、锅炉房的广大后勤职工们。儿子是不会忘记母亲的。即使母亲过分地责罚了孩子，孩子还是依恋母亲的。这不是文学语言，而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政治语言。

的确，当我一九五八年春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到北京国营西郊农场劳动考查时，我的思想是不通的。虽然如此，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我还是以真诚“赎罪”的心情努力劳动，严格要求自己。这一点，带队的赵老师和马老师是知道的。（上述两位老师是政教系和教育系的。）一九五九年春，我和原师大团委副书记周之良等被提前减轻处分回校。我被临时分配在中文系搞资料员工作。一九六零年，我被正式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中学任教师，

同年冬天摘去帽子。一九六二年调回家乡安徽任教，直到现在。目前，我是合肥市长丰县师范学校语文教师（兼文史教研组组长工作）。

二十年来，“右派”历史问题使我吃足了苦头。婚姻破裂了，家庭离散了。亲友诟病，儿女埋怨。我自己始终想不通，在一九五七年，我会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当我回顾自己简单经历的时候，是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党与人民的敌人的。

我出身于一个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的参加者。我自己在解放前是中学生，解放后立即参加了革命，于一九四九年初进华东大学（校长陈毅）皖北分校学习，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青年团员。华大结业后，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锣鼓声中，我穿着军装，扛着枪，走在皖北区党委农村武装工作队的行列中，到乡村参加了剿匪、反恶霸、减租减息等斗争，担任工作组长。新区建立民主政权后，我担任了乡人民政府乡长。以后又任土改工作组长、县供销社社会股长、县人民政府科员等职。一九五三年，党选送我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调干生待遇学习了四年。我是党一手培养的大学生，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解放前我在高中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差一点被杀头。新旧社会两重天，我体会得最深。很明显，我理所当然地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热爱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热爱我们意气风发的六亿人民，而绝对不可能是这一切的敌人。所以，我进了师大之后勤奋读书，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在班上表现是良好的。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运动后在班级大会上受表扬。一九五六年教育实习中，我认真备课，努力做好实习班主任工作，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实习返校后评为“优秀实习生”之一，肖璋系主任亲自在年级大会上宣布了名单，给予了表扬。经班上团支部推荐，中文系学生团总支曾委托我组织一个编委会，编辑中文系学生科研刊物《谷风》（油印本），由我担任主编。系里则派党员助教张锐参加编委加强党的领导，启功教授和陈秋帆教授担任指导教师。我的工作情况，他们都十分清楚。

在一九五七年的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我是怎样被划为“右派”的呢？

第一、团支部和班委联合召开的鸣放会上批评了我们团支部和班会工作中的缺点。当时校党委委员方铭同志参加了我班的会，她曾一再动员大家“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说错了不要紧”。我在发言中不过说，我们班的社团工作有关门主义倾向，班上诗社活动对个别同学排斥、歧视。我是班上“诗社”负责人，但团支部不支持我的工作，给我造成困难。

第二、作为《谷风》刊物的主编，我根据广大同学要求，并经编委会讨论通过，主持出版了三期《谷风增刊》，作为同学们的鸣放园地。所有稿件都由编委会中的党员教师张锐过目。《增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活跃学术空气的，并无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

第三、我在日常的一些政治性言论中，有一部分赞美南斯拉夫社会政治制度的观点。我赞成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制度，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同意铁托总统在匈牙利事件上对苏联的指责；我认为铁托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家和反法西斯战士。我还认为，一九四八年开除南共出情报局是错误的。我觉得南斯拉夫在党和国家事务上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我认为自己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是受过表扬的积极分子，因而有权也有义务指出这个运动中的一些缺点。我在鸣放会上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运动在我们师大搞得过分了，以我们班为例，碰伤了一些人，搞错了一些对象，打击面扩大了，影响了团结。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关于“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言论。

我在一九五七年春季的言行，无非就是这么几方面。在我的定案材料上说我“带头起义”、“否定肃反成绩”、“出版谷风增刊为反党文章提供园地”、“吹捧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等等（具体结论不记得了，只匆匆几分钟见了一面）我又是迟迟不能“认识错误”，因而被定为“右

派”，而且因为“态度不好”（包括因委屈而痛哭），是“极右”。

关于划分右派标准的文件，我过去、现在都没有见过。亲爱的母校党委，我请求你们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重新给我在一九五七年的表现作出评价。我认为，我当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是敢于说真话、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一个正直、老实的青年团员。我的问题应该得到平反。

我请求母校领导注意并体会申诉人的迫切心情。

致以

崇高的敬礼！

申诉人 许有为（本校一九五七年中文系毕业生，现任合肥市长丰师范学校教师。）

给母校的信，很快有了回音。1979年2月19日，北师大贯彻55号文件办公室在给的回信上说：“你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师大委员会1979年2月8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你开除团籍的处分，按超龄团员处理。”

关于“母亲打孩子”的观点，后来被许多杂文家批评为错误的。他们说：“母亲打孩子有往死里打的吗？”但在1978年，我的认识只能那么朴素肤浅。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的确，过去未曾有，今后大概（也但愿）不会再有了吧！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万年以后，蒋介石的阴魂还会在各地游荡着。”同样，林彪和四人帮的阴魂，不说一万年至少一百年内，还会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游荡。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在这片古老国土上的根系是太深厚了。加深对历史（包括反右）的认识、总结就更有必要。

1962年我从北京调回安徽后，分配在长丰县下塘中学工作。从63年到66后四年间，我先后被评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先进教育工作者”，担任着语文组副组长。在此期间，我犯了两条“错误”。

一、我和本校64届一个毕业生，回乡大龄女青年谈上了恋爱，竟然订了婚。这是一种“阶级报复”。

二、我竟然说“毛主席整彭德怀是不对的”、“彭德怀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有功”、“杜鹏程写的《保卫延安》是一本好书，不是毒草，应该允许同学们阅读”。我因此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的孝子贤孙”、“为反党大头目彭德怀翻案”等等。

先是1965年“四清运动”接着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城乡烽烟四起，革命狂潮风起云涌，席卷神州大地。我这个“死老虎”又被打人了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被捕入狱。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的1968年冬，窃取高位的真反革命分子林彪“副统帅”下令“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全国掀起了一股公判反革命的高潮。11月5日，在省体育场的15万人公判大会上，我被判了八年徒刑。但我的罪名比反革命更为可怕：“叛国投敌”。在任何政权下，这都是足以杀头的罪名。

文革结束（其标志是四人帮被捕），我在白湖农场立即写申诉。一个管教干部用同情口气调侃说：“援古抗美变成了叛国投敌。你呀，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犯这种罪，真叫人又可气又可笑！”

一年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免于刑事处罚。”我稀里糊涂地恢复了工作，认为万事大吉。后来了解更多中央文件及人民日报文章后，才知道法院为我平反是不彻底的，留了“尾巴”。于是我在1979年春写了一份《再申诉》，寄给合肥中院。

在这份资料中，我详细叙述了我的冤案的前因后果。全文太长，删去了一些议论和引文，主要事实的原文照抄如下：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尊敬的庭长和审判员同志：

我在此向您们致意，并再次申诉、陈述如下：

一

一九六八年冬，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猖狂“砸烂公检法”，正常的司法程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我被合月巴市公检法军管组判处了八年徒刑，罪名是“叛国投敌”。这是一樁骇人听闻的冤错案件。四人帮被粉碎后，合月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审查了本人申诉，经过复查，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以（77）刑再字第3号判决书作出了“撤销原判，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一九七八年二月我重新返回教育工作岗位，现任长丰师范学校教师。

在新长征的进军途中，过去十年间的个人苦难完全被我抛到脑后去了。

虽然如此，我却不得不再一次向你们写这份申诉。迫使我写这份申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77年判决给我留下了许多实在是不应该有的尾巴。

1978年《人民日报》八月三日的文章在谈到“尾巴”问题时，既诙谐又严肃地说：

“人类早在若干万年以前就脱去尾巴了。但是，现在仍有人有尾巴。这不是笑话，也不是寓言，这是现实。不过这是早该截去的政治尾巴。”

本着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在今年元月组织全院贯彻三中全会公报时指出，“我省对冤、错、假案复查平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整个说来，进度不快，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有的同志存在着‘怕’字，有些该平反的还没平反，该纠正的没纠正，不该留尾巴的而留了尾巴，已经复查处理的冤、假、错案，有一部分还要重新复查处理。”

我这个已经在前年复查处理的案件就是属于需要重新复查处理的。我要求你们把77年判决中那些完全不该留的尾巴坚决除去，把那些诬蔑不实之词全部坚决推倒。

二

首先，仍然应该向同志们简单地报告一下事情的前因和后果。

一九六四年我在下塘中学任教时（三十多岁），曾在暑假和一个离校的应届高三毕业生（二十多岁）订了婚，双方约定，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我于开学返校后，学校个别领导人反对这个婚姻。理由是：男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女方是烈属等。无理地命令我和女方解除婚约，并叫我主动通知女方。我不同意这样做。个别领导不经支委研究，宣布我停职反省。后来，又通过女方地方组织对她施加压力：如再坚持不和男方解除婚约，就不保送她上安徽劳动大学，迫使女方和我解除了婚约，给我俩带来极大痛苦。

一九六五年四清工作组进校后，我把双方通信及订婚照片提供给工作组，使有关领导明了真象，澄清问题。结果，学校个别领导却会同工作组，对我进行更大的迫害。他们收集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论，主要是讲过“彭德怀同志保卫延安有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有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等，给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阶级报复”等罪名，企图给我一系列的置之死地的处分。但是，那个错误的处分决定始终没有得到县四清总团的批准，因而也就未能执行。

当时，县四清总团虽没有批准下塘中学工作组对我的处分决定，但工作组和个别领导还是在一九六六年春把我赶到校办农场，叫我去接受“监督劳动”。我虽认真而辛勤地劳动着，但思想危机却一天天加深，自杀的念头越来越严重。

我回顾一下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觉得自己因婚姻问题和几句话带来这么大灾难，实在是太无辜、太冤枉了。解放前，我是中学生。全国解放前夕，我参加了革命，于一九四九年初进入了华东大学（校长陈毅）皖北分校，结业时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在庆祝开国大典的锣鼓声中，我背着枪，穿着军服走在皖北区党委农村武装工作队的行列中，到肥西农村参加剿匪、反恶霸、减租减息等斗争，任工作组长，以后又在建立新政权中当了人民政府乡长，土地改革时任土改工作组长、队长土改后，到县直机关任会计股长、文教局科员等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九五三年，党又选送我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理所当然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识到自己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时，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后我被评为肃反积极分子，一九五六年被评为优秀实习生。调到下塘中学工作后，一九六三年被评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一九六四年被评选为“先进教育工作者”。难道为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姻问题，我在一九六六年就忽然变坏了吗？仅仅因为一个人（彭德怀同志）和一本书《保卫延安》问题上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好话，就成了“三反分子”了吗？我怎么也想不通。在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下，我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出路。我决定自杀。（当人们极度绝望时，就会采取这种手段。文化大革命中无数惨痛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从农场公物中拿了一根麻绳，暗暗藏了起来。

五月中旬，校办农场里一个老教师（王进法）自杀身亡，才使的我的头脑突然清醒了起来。保尔·柯察金和拜伦的作为像一盏明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一下子认识到，自杀不是一个正当出路。死，应该死得值得。六月初，美国侵略古巴，打死古巴哨兵。古巴政府呼吁包括我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志愿人员。我国政府宣布将一如既往，支持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这时，我才决定到古巴去参战，以战死来昭雪自己。我在给古巴领导人的信上说：“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教导的革命人民，对美帝侵略古巴不会置之不理。”表示自己愿意以志愿人员身份到古巴参战。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我带了信到达北京准备通过中国古巴友好协会转交使馆。公安人员查旅馆时，看我登记本上写明“到中古友协联系事情”，就对我进行询问，我如实说明了来意，并把信件给他看。公安部门当即将我收容在宣武分局，第二天转藏经馆收容站，经审查没有违法行为，电告下塘中学来人到京将我带回。（如我在京有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就要进行拘留。）但回校后，学校个别领导却将我送到县公安局拘留起来。接着文化大革命高潮到来，公检法系统被林彪、四人帮“砸烂”，正常审判不能进行，一张七十二小时拘留证，就把我关了两年半，到一九六八年竟不顾本人严正抗议和拒绝签字，不顾国家法律的尊严，将我逮捕判刑。……

我在一九六六年写给古巴领导人的那封信，在粉碎四人帮后进行复查，终于得到了正确定性。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策的威力，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胜利，是你们，尊敬的同志们——人民司法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的结果。

三

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即四人帮被粉碎后一个月，我发出了第一份申诉材料。一年之后，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原判决被撤销。正因为如此，有幸也有不幸。当时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初期，许多是非界限还不十分明确，中央的一些有关平反冤错案件的具体指示还没有下达，人们的思想还很不解放，各条战线包括战线在内的拨乱反正工作刚刚开始。所以，（77）刑再字第三号判决书留下了许多不应有的尾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例如彭德怀同志得到平反昭雪）以及个人历史问题的新结论这样一些的情况，77年判决书上的那些尾巴和不实之词是到了彻底推倒的时候了。……

其实，像我这样的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罕见现象。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下被剥夺革命权利的而不愿自杀的有血性的人，都会很自然地采取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动来作为对错误路线的抗议。请你们翻阅下《中国青年》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介绍的郑恩元、吴几滨两同志的事迹，他们也是因企图支援世界革命而被定成“叛国投敌”，分别被判处十二年、七年徒刑。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反林彪、反江青的英雄人物，我只是一个无辜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

七七年判决书最后结论是“改判免于刑事处罚”。意思是应该给以刑事处罚，不过是因为宽大为怀，免于处分罢了。我们的人事部门的确就是这么理解的。就这足够使我在回来之后吃尽苦头了。如果你们说那是曲解，免于刑事处罚就是因为无罪，那就干脆宣判无罪好了。

尊敬的同志们，两年前，你们作出的（77）刑再字第三号判决书，在当时是够认真的了。留下那些尾巴，也的确难免。许多有关事实还没有澄清（如“右派分子”、“三反”等等），整个形势还没有提供解放思想的客观条件。现在，重新复查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你们可以而且应该宣判我无罪了。

当然，事实上历史已经宣判我无罪。不过，这个结论必须经过你们的认可，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我迫切地、真挚地要求你们使用我们无产阶级自己手中的司法权威，旗帜鲜明地为受迫害达十年这么久的无辜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致以
无产阶级的敬礼！

申诉人：长丰师范学校教师
原下塘中学教师
许有为亲笔

1979年3月28

这份《再申诉》材料寄到合肥市中院以后，一直施了三年两个月。这三年中，正是三中全会后国家政治形势高歌猛进的历史转型期：小平同志重新上台、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入主中组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莺歌燕舞的年代呀！各级公检法老战士重新归队，组织人事部门日夜加班。这些同志们的办公桌上冤假错案申诉材料堆积如山，材料后面是千千万万双渴望得到公正的眼睛……所以，在三年多的等待中，我一点也不着急。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加工资、评先进、列为特级教师候选人之类，都有我的份，并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事实上，我的诉求已经成了待复查的已平反旧案，有什么急的呢？

当我差不多已经忘却了《再申诉》这件事，人已经调到了合肥，于1982年5月忽然收到了市中院的裁定书，裁定：“许有为未犯叛国投敌罪，因此结论应改为宣告无罪。”这份文件是（82）刑再字第134号。事情终于圆满结束。

“反右”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反右”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它实际上是后来1958年大跃进、三年大饥饿、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更大灾难的序幕。历史已经记下了这些灾难。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衰翁老妪今天旧事重提，无非是毋忘历史，吸取教训，让我们的后人以及今天的青、少年朋友们知道他们的先人曾经为我们共和国的振兴付出过多么惨重的代价，经受过多少骇人听闻的苦难。

至于我们自己，人都垂垂老矣，来日无多。回首前尘，应该少一点情绪化的宣泄，多一点理性的思考。这对于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曾是昔日的解放战争战士，今日的离

休老干部，自恃对革命有功，所以对自己的二十年苦难老是耿耿于怀，动辄骂娘，牢骚满腹，我的朋友们和子女们深不以为然。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但，历史绝不能淡化歪曲甚至忘记，重提历史 1 日事的目的，是为了让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悲剧不再重演，造福于子孙，造福于我们的民族。

悲观的哲学不属于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向前看，向前走，莫退后。灿烂的晚霞在引领着我们。

（2005 年 9 月 8 日于合肥赤澜桥之东）

追念海琛

杨碧遐

一

海琛同学和我相处最多，时间最长。在北师大整整四年半，后来到劳教农场，又是六年。在校时，我们学习在一起，吃住在一起，节假日和学习之余，海琛、我，还有李怀仁等常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探讨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言不及义的东西谈论甚少。

海琛和我是同时离开北师大的，那是 1958 年的 3 月 5 日。午后，学校用一部车子交由一名警士把我们押送到海淀派出所。在那里按公安要求履行一些必要的手段。短暂停留后，派出所的吉普车又把我俩和另外两三人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在那里又呆了 10 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汽车把我们两三百人送到前门车站。凌晨用专列押送到唐山附近的茶淀农场（又称清河农场）。人，很多情况下纯是由客观环境支配的，主观意志根本没有什么作用。这是我对这段生活最大也是最深的体会。

海琛和我很有些相似的地方。除北师大有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外，在北方我们一无亲故。我是 64 年元月离场回乡的，海琛是 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清河农场清理回湖南的。我在农场劳动了 6 年，海琛 8 年。其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看望过我们，我们也不曾离开农场一步。按规定，在有限条件下可以请假，但请假到哪里去？到北京？同学不会见我们，老师不会见我们，也不敢见我们，更不用说关心和同情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听任命运对我们的安排，忍受着残酷的命运给我们孤寂生活的安排，呆在农场，尽量排解内心的痛苦。

离校前一段时间，我在古典文学研究班接受监督改造。临行前，研究班党支部派了一个党员同学监督“护送”我到校门口，他用关心而又有几分教训的语气对我说：“希望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将来你也有可能回到教育战线。你是有能力的，我看你很有组织才能。”谈话中他还向我提出一些意味深长的话题。“好好改造”这一句我是听进去了的。至于改什么？那我就不大弄得明白了。我始终也不大弄得明白，因为我自己确实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相信“松树的风格”，所以在农场的 6 年我是比较安心的。我年年受奖，每个季度起码是受表扬，曾一度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性格决定我积极热情的生活态度，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再严酷的磨难我也能顶得住。思想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和反抗情绪。觉得有点委屈，但也并不觉得冤枉。整风反右和自己的遭遇我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共产党只有一个目的——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人民政权。在新中国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在法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错判一些人，甚至一些绝对是好人的人都是可能的。我和海琛等都只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有何可怨恨的呢？这都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这个打击面太大了。这种想法是不是自我安慰的阿 Q 精神呢？我看并不是。人，要求自己能生存下去，就不能不正视现实，否则就自寻苦恼，自己钻牛角尖，最终毁灭了自己。虽然受尽了种种磨难，但我觉得我生活得还不错，因为我敢于正视现实，敢于面对生活的挑战！

二

海琛和我同在一个农场，不在一个分场，难得有见面的机会，但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似乎心息相通。64 年元月初，我被批准遣送回四川家乡农村继续参加农业劳动。通知下来

后，我请了一天假去和海琛话别。那时我们都已是农场的就业职工了，大自由没有，小自由还有一点。在漆黑的夜里，我们漫步在茫茫的田野上，交谈数年来对生活的感受和对人生的体验。对于展望未来那完全是个未知数，他茫然，我茫然，大家都茫然。没有希望，但对生活仍充满信心。经过农村苦难生活磨炼出来的人，悲观和绝望似乎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缘分。他用欣慰和自豪的语气对我说：“几年来我学的东西真不少，不仅看了许多文艺作品，文学理论书籍也读了不少。”他的好学精神使我深为感动。他学习的动力是什么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很显然，海琛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有理想而又能执着追求的人。他善于拨开思想外沿的云雾，勇往直前地去追求未来的理想；他善于排解内心深处的苦闷，去发掘自身智慧和勇气的潜能。他热爱学习，热爱真理，坚持不懈地用知识来充实自己，用真理来照亮自己。他作风淳朴，富有求实向上的精神，也许，他还执着地相信总有一天，学得的知识仍有有用武之地。

海琛性格敦厚，对人诚挚。见面后的第三天早晨，风霜大，气温低。我离开原住地，搬着行李去总场办离场手续。待我去派出所办完户口回来，海琛已经赶到总场场部专程来为我送别。总场的一名工作人员盯着海琛用十分严厉的语气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到这里来干什么？哪个分场哪个队的人？请假了吗？海琛说明来意及其和我的关系后，工作人员冷峻地说道：你有必要到这儿来为他送行吗？马上回去！海琛和我都未作任何辩解，只是相互唏嘘，我俩各自靠拢一步紧紧地握着手，一秒、两秒、三秒……千言万语都堵塞在喉头……这是一次凄惨的握别！30多年过去了，哪知这就是我和海琛最后的告别！

三

海琛和我们这样一些人，确实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革命时期有不少义士，他们在历史上虽然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错误处理，但对党对人民他们始终是忠贞不二的。当然我们不能同那些革命义士相比拟，但其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特质，应该说是相通或相近的。海琛离开我们已九年了，今天可以说，这个久经磨难的同志，他的一生无愧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无愧于母校北师大的崇高荣誉。

海琛跟我一样，57年至79年间的22个金色年华，完全被白白地浪费掉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无法挽回的损失！落实政策的时候，海琛的机遇比我较好，步子也迈得比我要大。他在心底蕴藏了20多年的热情，埋没了20多年的才智，一下子迸发出来，像滔滔江水不可遏制地奔流。在衡阳师专任教并兼任了三年的图书馆长，成绩卓著。工作三年被评为讲师，不到8年被评为副教授，进步之快，令人叹服。90年春办理离休，因工作需要离休未离岗，享受地区县级待遇。办理离休后仍壮心不已，决心再在学术上奋斗十至十五年，计划写出论文几十篇，专著两三部，这样才了却他一生的心愿，照他的话说，“这才不枉在人间走一遭”。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卒！91年夏，海琛因脑溢血突然离开人世。斯人已矣，岂不哀哉！

四

79年，因落实政策海琛曾不远千里赶回北师大。来信中说：“到师大时落实办和校党委对我很好。当年在师大工作和学习的同志都闻讯赶来，对我慰勉有加。”信中特别提到黄药眠先生对他的深切关爱。黄先生学术渊博，师德高尚，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精神感人至深。现将有关文字原文录下，以供砚友们共飨，并以此缅怀敬爱的黄先生对我们的雨露之恩：

“79年到北师大，我拜会了几位老教授，其中对我最关心的，当然仍推黄药眠先生。我在黄先生家呆了三个小时。黄先生当时正病重，遵医嘱每天只能工作一小时，但却把我留下，垂询甚详。当我谈及我们的活动时，师生们多次哭了。回来后，我给他写过两次信，并

把我在蒙冤 20 多年中口头偷偷吟成的一些旧体诗词的一部分抄寄给他过目。没想到他老人家却抱病一首不漏地给我作了字斟句酌的修改，眉批、行批、尾批，麻麻满纸。另外，还花了五天时间，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在信中，从平仄，音韵，格律，到做学问和为人人都作非常详细的指数。末尾，他给我题了词：‘赤足锄田亩，铁手写文章’。我接到这些修改过的诗稿，信和题词，捧读之下，几次唏嘘涕垂，不能自己。最后，我按捺不住感情，给黄先生写下一封信和一首诗。诗曰：‘先生训诲一何说，语重千钧意更长。受益浑同花饮露，捧函不禁泪盈眶。依稀桃李春风里，仿佛弦歌晓日旁。未绍师承惭我拙，遥瞻北斗祝痊康。’我写给黄先生的信，后来被一位写黄先生报导的作者所摘引，发表在《西江月》杂志上，其中也有你的一封。黄先生给我的题词，我已拍成照片，永远珍存。”

五

一个人无论寿命长短，只要有头脑的人，尤其是有理想的人，最终总是带着各自的遗憾无可挽回地离开人世。海琛是一位传统思想较强的有志之士，根据他去世的年龄（刚过 60），经历和理想目标，肯定是带着种种遗憾离开的。其中，他想到一次四川，这是他晚年的一个强烈愿望。但先后两次因无法筹足路费未能成行，因而造成他终生遗憾。

87 年 4 月来信写到：四川是天府之国，又是古代文化灿烂的地方，那里的许多文物古迹，早已使我神往，至今没有机会涉足。今年暑假全国元、明、清文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已给我发来通知。我本想参加这个会，借以游览天府风光，凭吊司马相如、诸葛武侯、李白、杜甫、苏东坡、郭沫若……的故乡（故居），问题是路途太远，耗资较巨，……只能望洋兴叹。但我仍将竭力争取，如能成行，我将先期通知你。最好你能来成都，同时约集俞安国等，共叙离衷。这是我们阔别后的第一次聚会，也许是最后一次聚会。如能实现，弥足珍惜。

90 年 8 月来信说：最后还有一个希望，但愿在有生之年，我们能再度执手言欢。前年曾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全国《三国演义》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向我发出了邀请。可惜学校经费紧缩，自己又无力拿出这笔巨款，只好忍痛牺牲，假如那次能赴成都，一定会绕道去看你和俞安国等老同学，而且路线都规划好了，只因财力绵薄，无法成行，也许造成终生遗憾！

未了，他用了一个“也许”，这个“也许”今天却变成了事实。在写这句话的时候，难道在他的心灵上已经产生什么预感吗？后来在北京的两次同学聚会他都没有参加，实在太遗憾！他的遗憾也就是我的遗憾，是我班同学的遗憾！这里，我还有一个遗憾：海琛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没有得到我的回信。我曾两次提笔，因心绪烦乱，信总是写不下去，……那封未写完的信，至今还放在我的抽屉里。没等我的信写完，后来听说海琛已经匆匆地走了；即使当时写完寄出去，恐怕他已是看不见了。

海琛啊！你好好安息吧！

2000 年 1 月 16 日

运交华盖欲何求

——我的右派生涯心路历程

俞安国

我头上这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78年7月初的一天，由当年中央下达的44号文件一风吹掉的。戴了整整21个年头，其间，我也曾梦寐以求的企盼过，争取奋斗过，希冀能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可每次宣布摘帽名单都没有我，心理就有了个“希望——失望——绝望”的发展史，反躬自问：“我真的如此之不堪改造？思想会如此之顽固？”我只能仰天长叹：“命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当1957年某月某日的《人民日报》在新闻报导中点了我的名，当《教师报》在9月10日的第三版上登了记者张迈以《他们为什么堕落成右派分子？》为题目，并以他生花之妙笔，发挥丰富之想象和臆测，煞有介事地描绘了我和其他五个同学“堕落之轨迹”的消息和文章传到我家乡时，不仅仅是我的父母伤心难过，精神上增加了莫大的负担，也不仅仅是株连了我的弟妹，使他们在同学中马上陷入孤立，抬不起头，还要叫他们口头或书面上公开表明与我划清界线，而且可以说，在我们这小小的县城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认识我的师友同学中，有人感到惊诧，难以置信和理解；有人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和担心；自然，也有人认为我“罪有应得”，“本质决定”。理由是：“凭他那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凭他那读书时骄傲狂妄劲，凭他那总爱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观点的性格，不把他划成右派，谁该划成右派？”听我一个堂弟讲，他上高中时，大会或小会，一提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时，他们的校长就要以我为例：“俞安国，你们都知道这个人吧？是从我们这儿毕业出去的，天资不能说不聪明吧？学习成绩不能说不优秀吧？上的还是北京的名牌大学，可现在如何呢？身败名裂，堕落成臭而不可闻也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是不认真彻底改造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必然导致的可悲又可耻之下场。”如此，我当了若干年的反面教员——今天想来，如果我的例子的确能唤醒大家又能促进大家认真地改造思想，算是“废物”利用，也能说是大造功德之事吧？这，我倒心甘情愿的，无怨无悔的。可，并非如此。

其实，许多人，包括当时同情我和批判我的人，不说当时，就是至今也并不详细具体地知道我的“右派罪行”的，批判我的人中，他们之对我愤恨，诅咒，甚至有意或无意施加于我身上或心灵上的痛苦，只能用今天一句时髦的话来解释：“集体的无意识”，除了个别邀功者外，有的只是想用这种人云亦云的办法来逃脱运动可能带给自己的“劫难”，表明自己“站稳立场”、“敌我分明”的态度而已。这就是“大众的灵魂”，可悲啊！

今天让我主动来公布我在整风中所犯下的“反党罪行”吧，并以此为据，就给我戴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将我放到社会底层去，脱胎换骨改造二十一年，受尽身心折磨二十一年。归纳起来，有如下四条：

一、积极签名支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右派教授穆木天5月2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攻击北师大校党委的文章《我的呼吁》，该文胡说什么“党委有一宗派，竭力捂斗争的盖子，不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校开展整风运动”云云而写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打乱了学校的整风布署，积极响应并密切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一时，黑云压城，大大小小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

二、在班级召开的肃反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谬论”宣扬“我们班的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

应当说缺点是主要的才符合实际”的反动观点，“七十四人斗了八个，一个也不是反革命，最后还公开赔礼道歉，被斗的同学至今还神情恍惚，而人与人间变得互不敢讲真话了”，这是公开反对并诋毁党的肃反政策，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而反对肃反，实质上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划右派分子的标准之一（仅此一条就够了）。

三、到北大去参观大字报，尤其是还同北大的反动社团“百花学社”的右派头目有过接触，并带回他们编写的油印小报，其中以所谓“胡耀邦的谈话”最为恶毒，造谣说“中央高层对鸣放政策的看法有分歧，毛主席受到最大的孤立。毛主席愤慨地说他要拿着雨伞，背上包袱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这些“反动小报虽未散发，可其动机、其思想感情，完全是站在党的对立面，如果散发出去，其后果不堪设想，”“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北京出现不是没有可能。”

四、从1956年以来，“受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公开或私下里大讲特讲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对一切，甚至党的方针政策，领袖言论，也主张“应进行理性判断，不要盲目地相信服从。”实质上是喊大家不要听党的话，不要作党的驯服工具的遁词，企图摆脱党的领导，与党分庭抗礼、是闹独立性的具体行动。还散布一些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如什么“‘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是今天文艺界、思想界存在的普遍现象，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最大根源”，什么“反对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并不一定就是反党，得作具体的分析。如果个别党员或个别党组织不执行或不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对它，不但不是反党，而是捍卫党”，这实质上是在“耍”抽象地肯定党的领导具体否定党的领导的花招”。又说什么“红与专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红不能代替专，专也不代替红，政治上红了，业务上绝不可能自然而然就变精，不过问政治当然不可以，但空头的政治家，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毫无用处，然而可悲的是，将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后，空头的政治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这是“典型的反对政治，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倡走白专道路的胡言乱语。”

6月8日一早，《人民日报》送到学校，大家一看社论：《这是为什么》，立刻都惊得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提倡鸣放么？整风才开展一个来月就说收了，还说什么“少数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大家纷纷议论，结论是：也许的确有少数右派分子想混水摸鱼，破坏整风运动。我们同学都是一心一意帮助党整风的，跟他们搭不上界，大家又心安理得不以为意了，何况《中国青年报》还说了“共青团员都是左派”，我们的党是讲实事求是的，敌我是分得清的，我们绝不是右派！

然而，远不是那么回事，不久班上一些同学开始受到大字报的点名批判，并接受审查，我也在六月下旬后，被通知不再参加学习会和批斗会了，停止了组织生活，行动上也受到了监控，叫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写指定内容的思想交待和对别人的检举揭发，日复一日地写，写了交上，老说不彻底不深刻，退下又重写，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过程都得写上，挖空心思地去回忆，可以说，每天上几次厕所，尿量多少都得写清楚，否则就说你对党不老实，不愿意向党交待自己的问题。如此者达半月之久。然后，又日复一日地被叫到一个指定屋子，接受组织的审查，回答一些连自己也不清楚来龙去脉的问题，甚至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问题，如果你回答不知道，就斥责你不老实，狡辩，不想向党交待清楚自己的问题，顽固地坚持右派立场。学校或年级开批判右派大会，也让你去参加，具体地去“感受右派之孤立，反党之可耻，负隅顽抗者绝无好下场”之滋味。往日最亲密的同志朋友，路上遇到了不是投来仇视鄙屑的眼光，就是掉头他顾，完全成了敌人，总之，随时随处给你以难堪，让你情绪处于沮丧难受的状态，紧张得无所适从，承认自己的确是左右不是人，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更进一步要叫你产生“原罪感”，是娘胎里就带来了的。表面上没有将你抓进牢狱里去，实际上比在牢狱里身心受到的痛苦还甚，你想向谁诉说一下内心真实的想法也办不到，因为绝对不会有谁听你的。恶梦不断，常从梦中惊醒，泪水浸湿了枕头，我不停地十次百次地反问自己：我真的想过要反党吗？回答总是否定的。夜阑人静不能成寐时，我

将整风以来的所言所行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放了一遍，细细咀嚼，不留情面地挑剔，找不出半分一点反党的动机与念头。我感到莫大的委屈，怎么也说不清啊，泪水夺眶而出，禁止不住，想到政治生命将毁掉，浑身不寒而栗。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悲剧啊，是呀，当我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时，我还认为是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哩！想不到竟然说成是反党，这不是人生的悲剧么？我除了责怪自己天真幼稚，政治上的绝对无知外，还敢责怪谁呢？我也想到以今天我的遭遇来看，多年以来，党一再标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哪儿去了？党一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是成了骗人的伎俩？但我马上责备自己，我怎么能去怀疑党？我怎么能责怪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啊！永远光荣伟大啊！错的只能是自己，绝对不会是党。

八月中旬，毕业分配在即，对我们这些已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毕业鉴定与团组织处理合二而一地举行，既匆忙又草率，纯给人一种走过场的感觉。在批判会上自己念一下准备好的检查，抓几顶管他合适不合适的帽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左派”们声色俱厉地批判一通，所用的都是当时报刊广播上通用的词汇和句式，看似热烈，实际上空洞无一物，被处理的同学竟无半点申诉的权利，只能默然地任人宰割然后举手表决通过，统统都是开除团籍，这是早已预料中之事，三十二名团员占了十三位。这十三位中班团干部，积极分子，三好生就占了十位。我也举了手，不举手行吗？想不到我行使团员的权利的最后一次竟然是举手开除自己的团籍，真有点黑色幽默，可没有一个人笑得起来，泪水在往肚里流啊！

8月20日后，同学纷纷离校，我们年级50多个右派，（近四分之一）只能留下，听候最后处理。四十三年后的2000年9月，我们年级同学在北京聚会，出版了一本“青春、友情、人生”纪念册，“编后记”中有一段关于此时的情景的描写，虽然时过境迁，今天读来，仍“独怆然而涕下”。

在那密云笼罩的日子里，课停了，读书声咽哑，同学相见有如陌路。而这一切又正好发生在毕业前夕，离校时没有述志抒怀，也没有骊歌高唱，只有轻声细语和无语凝噎，但见一片冷落凄凉，带有各种“罪过”的同学，从此踏上了一条“炼狱”之路。

如此这般被折腾了两个多月，神经弄得麻木了，甚至近于崩溃，一副灰溜溜的样子，“调治”来已懂得“埋着脑袋走路，夹着尾巴做人”的生活“准则”了。十月中旬，一天，通知我到文史楼一间屋子，一跨进门，曾审查过我历史的一个人递了一份材料给我，是关于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材料，他对我说：“先看，如果有意见，可写出，然后签字。”我能写出什么不同意见呢？我敢拒绝签字？怎么辩解申诉也枉然，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还说你“顽固坚持右派立场，不向党低头认罪哩！”给我的结论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

“交待问题基本属实，但交待时态度极端恶劣，划为极右，开除团籍，分配工作，在工作中考察两年”。

在这儿，我得解释一下“态度极端恶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连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反党，会犯下如此滔天的“反党罪行”。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最多也只是认识上有偏差或情绪上有点偏激而已。审查我的历史一开始，我极其认真也极其相信党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会弄个一清二楚，我将整风时写的日记以及平日与朋友同学的来往信函，主动交给组织审查，但遭到的答复却是：“不相信这些，你平日伪装积极，骗取了党的信任，今天狐狸尾巴被抓住，怎么能再让你蒙混过关。”他们反复警告我：“你现在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反党事实，深挖思想上的反党根源，争取党的从宽处理。”我反问：“人的行为总有个动机目的吧，我反党动机是什么？目的何在？凭我解放后的经历，学生会干部，人民代表，青联委员，三好学生……党对我只有恩，只有情，我干吗要反党，这作如何解释？”他们反驳我：“你是丑表功，这次整风就暴露出你的原形，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们党要吸取的教训是，怎么用了人奶却哺养了你们这些吃人的狼。”我极其反感地讥刺：“这就是你们说理斗争么？除了挖苦，不讲一点道理？”“俞安国，你要放明白点，

你已是人民的敌人，对你们只能是无情的揭露与打击。”“毛主席不是说对思想问题不能用压服的办法？你们给我的结论不要下得太早了，要吸取肃反的教训，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冤枉了好人。”“什么？你敢同我们辩论？那么，好吧，就在辩论会上见面。”我也愤然赌气地回敬道：“辩论会，我怕么？奉陪！”我还天真地希冀在辩论会上用事实证明我不是右派分子。但辩论会始终未开成，推测原因，全校、全年级要批判的右派分子实在太多了（据说 500 多个），我是条“小鱼儿”，根本排不上号。

事后，有经历过辩论会的右派同学告诉我：“你真的认为是实质意义上的辩论会么？错了，说明你幼稚无知，是批斗会的同义词。会让你侃侃陈词么？绝对不会，只准他们批你，斗你，你只能乖乖地听着，点头认可，如果你稍有申辩解释，甚至脸上露出点不同意之色，招来的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帽子满天飞，棍子任意打，无中生有，连你也不明究竟的隐私揭发，非让你自尊心也好，人格也好，扫地以尽，不把你斗臭，说得你一钱不值不肯罢休，你怎么还敢提劲要奉陪参加辩论会？”这下，我才知道辩论会是如此之厉害，庆幸没能开成。

这就是我“态度极端恶劣”的由来。我的右派分子帽子就这样给戴上了。

写到这里，想起丁东先生在他的书评《也是传世之作——朱正〈1957 年的夏季〉》中关于这次运动所带来的恶果的一段话：

“反右斗争的恶果，不仅仅是一次‘阳谋’，使多少敢言之士中了‘引蛇出洞’的计谋，也不仅仅是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受 20 年不白之冤，而是中国一批先觉者改革努力的流产，是中国 50 年代中期一次思想解放的天折。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固然不少人确实冤枉，罪名本是‘莫须有’，硬被推进火坑凑数；不少人是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一些人本来很革命，‘左派’当作右派误伤；但有些右派，则是看出这个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真知灼见，这些涉及民主法治、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思想学术诸多领域的真知灼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中国 1978 年以来改革的先声。”

戴上了右派帽子来到了陕西省教育厅报到，被分配到渭南师范学校函授部，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没叫我改行（像我的好些右派同学一样，叫去总务处或教导处跑腿打杂），仍叫我教书，仍叫我教语文，我受宠若惊，简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右派身份也未在学生中公开宣布。“也许这是党改造人的策略吧？”我作如是想，“也许是党见我年轻，对我的宽大吧？”我又有点感激涕零。“不管受多大的委屈，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我当时这样想。我下定决心，认真踏实地干好工作，争着干，白日黑夜地干也不要叫苦，一是向党证明我的确无反党之心，是永远忠于党的，二是算是能接受党的考验的证明，有朝一日党会发现自己弄错了人，冤枉了人。总之，我要以最大的容忍量，最大的虔诚之心来对待加之于我身上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那管每个月发给我只二十几元的生活费，吃伙食下来，连买牙膏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我的工作量是好些人的三倍，但我从无半点怨言，既心甘，又情愿。

话说到了 1959 年的 9 月，我从报上看到了中央发布的《关于摘掉确已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心里暗自高兴起来，虽我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但从长计议，摘了总比不摘好，至少我精神上少受点压力，自认为自己当然属于“确已悔改”之列无疑。首先，我无历史问题，解放时才 14 岁，一贯是积极分子，我何曾有过反党思想，纯属“误会”，其次，我两年来在工作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一些不知我身份的学生还提议评我为工作模范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拼命干不计报酬；再次，给我的处分是“考察两年”，现恰是两年，也该考察取消我处分的时候了；最后，两年中没有犯过一次错误，按月给支部写了思想汇报，支部领导也从未说过我那里有啥不对的地方。

果然不久，学校支部叫我写一份两年来思想改造总结，我连夜写就交了上去，满心企盼也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摘帽子好消息很快地会批准下来，接连做梦都梦见支书在大会上宣读摘

掉我右派帽子的通知，大伙儿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向我进行祝贺，我热泪盈眶，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国庆十周年前夕，报上公布了一些摘帽右派的名单，都是头面人物，我心里暗想，“他们的‘罪过’总比我大吧，他们都摘了，我这小人物还不该摘？”我一点也不怀疑我的帽子将摘掉，只是时间稍后一点，不会见诸报端而已。我同班一个分在河南新乡工作也是右派的同学，就在此时写信给我，开头就兴奋地写道：“安国，我免冠了，我新生了……”我想我也快了，我也会给他写这样内容的回信的。等呀等，盼呀盼，然而，十月份过去了，一点也没动静，我的心开始有点变凉了，但还未失望，总要找点连自己也信不过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也许陕西省摘帽子工作缓慢点……十一月份又过去一半了，仍杳如黄鹤，我有点坐卧不宁，神情恍惚，茶饭不思，夜晚失眠了，又不敢向谁打听一下消息，内心的痛苦也找不到一个人去诉说，真是难捱的日子啊……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有个姓郭的工人来通知我，说是杨书记叫到我办公室去一趟，我怀着忐忑不安，又希冀着什么，又不敢希冀什么矛盾之至的心情来到书记面前，他示意我在桌前一张凳子上坐下，他默然无语地好一阵，没有正面看我一眼，然后，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抽着，我的心全凉了，感到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脑子里立刻成了空白。突然，他向我发问：

“你知道，这次为啥没摘你的帽子？”

我摇了摇头，茫然地回答道：“不知道”。我很不解地反问道：“两年来，我不是在努力工作么？我又没再犯过什么错误。”

他不屑又有点责怪的口吻说道：“只是工作好就行么？这就证明你改造好了么？”他突然一字一顿地说：“根本问题是，你毫无一点立功的表现。”“立功？”我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与立什么功扯上关系了？我天真之至地辩解道：“学校又没发生过什么失火被盗等重大安全事故，如有，我一定奋力救火，拼命捉强盗；又没有台湾来的特务联系我搞破坏活动，如有，我一定向组织检举揭发……”

他哈哈大笑起来，马上转为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错了，你连什么叫立功都不懂，怎么改造得好？我怀疑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是不是有意装糊涂？你所讲的不是我所讲的立功内容”，停了停，继续说道：“我问你，你平日同我们学校的老师接触过没有？他们的思想，观点，难道都正确，都无产阶级化了？他们在你面前一点也没流露过？不可能吧！可是，两年来，你向我们反映过没有？汇报过没有？你得承认一次也没有过吧！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包庇，暂且不说，至少说明你的右派立场还未根本转变过来，右派观点还根深蒂固，否则，你怎么嗅不出来，识别不出来呢？就有一些好同志们向我们反映过你接触过的人的错误思想观点，而且相当严重。”说完，狠狠地盯了我一眼。

哦，原来如此！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明白了，所谓的立功，就是要我成为告密者，以“反映”、“汇报”等冠冕堂皇的名义去告密，以出卖别人来换取于己有好处的东西，用一句旧话来说，“以他人之鲜血来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讲实在的，在我所接触的同事中，我不是没有听到过与当时报纸广播宣传不一样的议论，思想，即“离经叛道”的东西，如对公共食堂的非议，对大炼钢铁的非议，对亩产万斤放卫星的非议，对吆麻雀的非议……凭我的正常的理智与良知，我认为这些“非议”都是有道理的，是从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没有一点错，是符合现实生活的。难道叫我出卖一个人应有的理智与良知去告密不成？这，我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如果1957年，我出卖理智与良知，我今天不一定会划为右派。当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我已预感到我会划为右派，想到自己的前途，不寒而栗，心灵之痛苦难受无法形容，大会，小会，甚至私下里有人提醒我：“要大胆站出来，不要迟疑，检举揭发别人，以此来证明自己立场之转变，以此来立功赎罪。”然而，我断然拒绝了，我一直保持着沉默，于是才有今天的下场。当时，我只要把平日一些人闲聊时说的话交待出来，我们班34人中就不只13个右派分子，至少增

加到 20 个，如陈 XX 说“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毛主席写的按语，好些是断章取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表现”。周 XX 说：“匈牙利事件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实质上是学生的民主运动，拉科西就是个独裁者，如果在中国发生，我一定积极参加。”刘 XX 说：“我们班上的一些党员，总是以教师爷面孔出现，惟他是左，惟他才掌握了真理，其实他们只能背书上的政治名词，什么也不懂得”。王 XX 说：“我们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这儿丰收，那儿增产，南方天旱颗粒无收，饿死了好些人怎么不报道？一些村干部任意强奸妇女怎么不报道？”在当时，仅此一句话，右派分子的帽子就牢牢地给戴上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何清涟先生写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读到一段关于评议告密者的话，深有感触，何先生说得多深刻，也是多么沉痛啊，她说到了问题的本质。

“……这里还要看到 50 年代以来，历次运动中，鼓励人们虚伪无耻地告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者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可以说，这种破坏人性，尊严，使人丧失道德羞耻感的告密，早就在我国公众意识形态深处种上了道德畸变的因子，否则，不会有今天这种道德大滑坡的局面出现。”

至今，我仍能聊以自慰的是，当年我坚守住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应该有的道德良知的底线，没有违背或失掉做人起码的条件，没有为了摘帽而堕落成告密者。如果这样，我将无颜见我伤害过的人，在夜阑人静时，内心将深深受到谴责，并将抱憾终生。

1960 年底，我被“下放”了，也许是不思改造的原因吧，因为从那以后，我不那么努力干工作了，也从不去“反映”、“汇报”。甚至连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我也不写了，“下放”等于是开除公职回家，因为我不再领工资，要靠我的体力劳动才能挣得一碗饭吃。不过，回到家乡不久，我户口所在地的城关镇就将我安排到他所办的福利农场劳动。初到，场长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善意地对我说：“你是右派分子，我知道，你有文化，有知识，又年青，刚 25 岁吧？好好劳动，上面知道你劳动得好，我们再给你说点好话，帽子摘了还不是又出去干你的工作，一个月薪水比我多得多哩！”我内心里感谢他，可我已明白，光凭认真劳动是摘不了帽子的，叫我出卖良心又办不到，看来，只能如屈原说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劳苦而终穷。”只等有一天老天爷开眼吧！

几天后，我认识了同场劳动改造的一个姓郑的右派，他原是某小学的教导主任，因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再加以平日对生活中的问题发了点牢骚而被打成了右派，撤职降薪，监督劳动。“我是受不了那份气才自愿申请离职回家的”，他心直口快地对我讲道。我告诉了他场长给我讲的话，他以嘲讽的口吻说道：“你信？我刚来时，他也这样对我说，别太天真了，轻信人言而上当，是骗人的，是叫你卖死力干，他们得利，他们是恐惧知识分子，怕你说他们的短处和坏话。一个城关镇小小的农场场长，说话能有多大作用？上面看来，连放屁都不如。别听他的！”几个月后，我们渐渐熟悉了，他干活比我内行多了，人缘也好，他常在劳动上帮助我，指教我。

有一天在一处开会，闲扯到摘帽问题，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这顶帽子是一辈子摘不掉的，只能死了带进棺材了。开初，我也同你一样，想把帽子摘了好好工作和生活下去，然而不行。领导对我说，你得真心认罪，服罪，请问，我有何罪？既然无罪，我又如何去‘认’？如何去‘服’？这不是自欺欺人么？我绝对不违心去干自己绝对不相信的不存在之事。我只不过嘲笑我们学校某党员领导不懂装懂，把白居易的《琵琶行》说成是杜甫写的，就给我戴上反党帽子；说我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跟社会上的右派唱一个调子，再进一步，就说成反对党对教育的领导了。你千万别听那些当官的人的胡扯蛋，改造好了摘帽，谈何容易！你得出卖自己的良心，付出高昂的代价。就这样也不一定就能摘掉。你得挣表现，什么叫表现？就是违心地去干一些见不得天之事，或者你在干一些自己不愿干或干不了的事时，还要装着蛮高兴的样子，讨好领导，说奉承话，盯着他们的脸色行事，亦步亦趋，像小婆子似的，生怕领导就不满意你，对你有意见了，你说这活得苦不苦？累不累？太没意思吧，还有你还得

成为‘卖客’，卖客，你懂不懂？就是经常向领导或上级打小报告者，邀功讨好，人格丧尽，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其实，就是给你摘了帽子，又怎么样？在单位上你就说得起话了？不行，还是二等人三等人，是失过“节”的妇女，是补过疤的瓷碗，永远是另类人物，是摘帽右派，懂吗？档案里记得有你这历史污点，抹不了。这，我看得多了。领导还经常吓唬你：‘尾巴不要又翘起来了，帽子掌握在革命群众手里，既然给你摘得掉，照样给你戴得起’，活得太遭孽了，我是绝不争取的，摘不摘随你的便，戴惯了，不戴说不定还会害感冒哩！”

我不大喜欢郑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他这一席话也并非胡言乱语，的确符合当时的生活实际，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为了摘帽，出卖良心的人不用去说他了，我就看到了一些出于各种可以理解的，于人无损的动机目的而去争取摘帽子的右派中，他们反常态地活着，失去了人的尊严，人应有的羞恶是非之心，真是“忍辱负重”，买得了领导的欢心，拼死命劳动，超过常人的生命极限去干活，帽子刚摘掉或正准备考虑摘时，就一命呜呼丧黄泉了，叫人唏嘘不已，太不划算了。再仔细思忖一下，所谓思想改造好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连掌握摘帽权力的人恐怕也只凭个人感觉印象来判断吧——而且这还得排除掉个人的恩恩怨怨，如果领导不喜欢你，你表现得再好也枉然。正如民间讲的什么“实事求是”，是“说是就是”。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想到这里，我也不再去想头上帽子摘不摘的问题了。糊里糊涂地活下去更轻松潇洒些，我对自己说，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自然没有因希望实现而带来的欢悦，可也没希望没实现而带来的悲哀。别人是“虽死犹生”，我则虽生犹死，无所谓了，更何况回家后直到1964年，近四年的时间，没有谁过问过我的问题，好的是，不再写自己并不愿写的“月汇报”和“年总结”了，少点麻烦！

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去干许多不愿干也不会干的体力活，到西河坝捡灰石，到新仓库当苦工，洗肥料口袋，给酒厂运高粱，修桥养路，铸砖烧窑，……我学过的知识，本领只能荒废，束之高阁，成天泡在汗水里，同下层人民混在一起，干一天活下来，累得只想睡觉，什么帽子不帽子，什么改造不改造，根本没时间精力去思虑这些问题了，只有居民代表突然心血来潮，叫我跟四类分子一堆学习时，我才又感到另类人物的悲哀，才感到自己的凄凉，人生之不幸……

1964年7月上旬的一天吧，居委会胡代表亲自跑到我家来通知我：马上带上被褥洗刷用具和一个星期的钱粮到县工商联所在地（今我县的陆游祠）报到，参加全县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学习，她神秘兮兮轻声对我说：“你得认真学习呀，老实交待清自己的问题，听说对学习好的要摘掉一些人的帽子，你努力争取吧，不要太固执，死心眼儿，随和点不对吗？你才二十几岁呀，年轻，还是有前途的，听人劝，得一半”。我只能点头谢了谢她的好意，心里却苦笑着，我怎么能对她说：“这岂是我一厢情愿之事？”

这次学习是县委统战部组织的，当然是奉上级之命，目的为何，谁也不清楚，几十个右派经过几年的改造，已噤若寒蝉，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走错一步路，又招来大祸。见面时，不认识的只是打量一下对方，认识的也只是相互点头致意，不会开口也不敢说什么。那时，正是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最紧的时候，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已讲得大家担心不知生命会在哪天会突然结束。开头几天只是学习些报上的几评之类的文章，进行空对空的讨论；正准备转入自我检查时，一天中午，进餐时，两个武装民兵押送一个头发乱得像茅草，面目黧黑，上身穿着一件脏得不能再脏浸满汗渍的无领汗衫，脚上塑料鞋扣也没了，酷似农民的人来，有人暗地里惊讶地说：“他不就是罗XX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儿了？”午饭后，领导我们学习的X秘书将我及另三个右派叫到一间屋里，拿出一份材料给我们先看，材料很特别，是当时大便时常用的黄草纸拿黑木炭竖直写就的，字有点功底，文字也通顺。

县委：

我，何许人也？即你们所称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要问我近年思想状况如何，对不起，无以奉告。有诗一首为证：

人生至此万念空，苦乐悲欢又如何。
隐匿山林躬耕织，任尔东西南北风。

此致

敬礼

罗 XX

X 月 X 日

X 秘书对我们说：“这是一封反动之至的信，是对抗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的典型表现，叫你们来，是让你们先看看，今天下午开他的批斗会，你们认真准备一下，会上积极发言，将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也藉此教育大家，教育自己，不老实服从改造是没有出路的，你们的发言也可证明你们改造好了没有，不要掉以轻心，视为小事。”对 X 秘书的话，大家是心领神会的，是立功表现，争取摘帽的好机会。

午后斗争会一开始，罗 X X 就被叫到会场中间端正地站着，X 秘书叫他先交待对抗思想改造的罪行，及写这封反动信的动机目的何在。他那一副桀骜不驯旁若无人的样子，一言不发地呆站着，X 秘书催了几次，他仍一言不发，几个右派“积极分子”呼起口号来。相持五六分钟，X 秘书说：“再顽固下去没好下场”。他冷笑了几声说：“这样的会我见识得多了见惯不惊了。”X 秘书说：“我知道你成了老油条了，你说，你有啥要求？”他大声说道：“要让我谈，就得让我把话说完，不能中途打断我的话，我说完了，你们要怎么批判都行”。“你大肆放毒呢？”“哈，我右派分子早在你们眼中浑身都是毒了，我呼吸出来的气不已把周围的空气污染了吗？你怎么不觉得？”大家暗暗地笑了起来，X 秘书只好红着脸说：“那就让你说吧，大家注意点，看他能放些什么毒？”

罗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原来他是个小学教师，看不惯领导的武断作风，整风中提了几点意见，被打成右派，留校改造中，事事做得不能令领导满意，受不了折腾，被遣送回了乡下自己之家，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生产队常叫他干义务活路，又常毒打他，饭也吃不饱，他想一个人安静地自食其力的求生也办不到，他觉得生不如死好，他直至今天仍不明白他错在那里，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地对待他……

一席话，说得会场沉静极了。我心里不禁有点同情起他来，他也是被冤枉之人啊，而他今天的处境比我还悲惨还可怜，我怎能昧着良心再去批判他呢？我怎能忍心在他心灵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呢？我怎能无耻地为了从他的身上获得好处再踹他一脚呢？在别人发言之后，我又不得不说一说，可想而知，我的发言一定软弱无力，空洞没内容，连我都认为根本不是在批判他，而是在开导他劝解他，甚至在鼓励他要坚强地活下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的发言，X 秘书当然极不满意，他铁青着脸色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时时用白眼瞟我，我也管不了这些了。德模克利特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的性格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完全明白，我又一次失掉了挣表现摘帽子的机会，但我是自作自受，无怨无悔的。

想不到过了两天，我又被 X 秘书叫了去，他对我说：“我们准备帮助周 X X 一下，提高他的认识。你是他的学生，比较了解他，听说，最近几年你同他接触较多，你的发言对他定会触动很大，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再像那天的发言了，你也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岂能不知其言外之意？他所讲的“帮助”“提高”，绝非字面上的意义，实质是检举、揭发的同义语。这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读高中时，周 X X 是学校校长，教过我的

政治。被划为右派后，从副县长职务上撤了下来，劳动一段时间后，安置在文化馆管图书，我在劳动之余，也抽空到文化馆翻翻报章杂志，竟然同他相遇，讲了些别后各自情况及当前的处境，对敏感问题都是缄口不言，出于师生关系，他反复叫我谨小慎微，千万不能再栽跟斗了。当时他情绪低沉，对现实许多事物困惑茫然，他偶尔流露出他之所以被划为右派，绝大原因是他是县民盟的主委，从中央到地方，是划定了一条右派之线的，命中注定，改变不了。一次他给我看了他写的一首《四十初度》的诗，我记得其中有这样两句：“自谓年增渐知理，谁料不惑感更多”。现在叫我“帮助”他，我该怎么办呢？当天晚上，我将此事悄悄告诉了他，他沉默了一阵，脸上现出无可奈何又不无伤心难过之表情，语气缓缓地对我说：“凭你的认识去发言吧。”我坦然地说：“周老师，相信你的学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明白我该怎么说。”第二天，我的发言自然又令 X 秘书极不满意，会后，他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愤然对我说：“你令人竟然如此之失望。”集中学习完后，有几个右派因表现“积极”而摘了帽子。而我的右派帽子仍丝纹不动地戴在头上。难过么？不！我仍是无怨无悔，这是我的命！

不久之后，文革开始，家里被抄了几次，几十本读书时、工作时写的日记被拿走，至今没有下落，几百本藏书在院里烧成两大“灰堆”，我敢说什么呢？我也落人常被批斗和陪斗的苦难境界，身上还挂着侮辱人格的“身份牌”游街，和让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没再提摘帽的问题了，连想也不再去想了，我似乎也习惯于这种麻木的生活，有人劝我起来造反，我笑了，我敢造反么？命该如此。别乱想了，人啊，人，你原来是如此之卑微，如此之渺小……

往事已矣，然而往事的确又并非如烟，淡忘不行，忘记更不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知道，反右斗争其实是文革这场十年浩劫的序幕与彩排，反右这场灾难，绝不仅仅是造成个人的苦难，也不仅仅是造成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应该说，这是祖国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它开通了“大跃进”之路，“文革”之路，如果再不去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谁也不敢担保悲剧不会重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写下了上面这段历史回忆的文字。让我引用钱理群先生在《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吧。

“1957年这段历史的书写，如此的苍白、稀薄，如此的充满迷误，致使‘后来的年轻人’（这正是先驱者所寄以希望的）无从了解也无法理解，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欠账总是要偿还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历史的血腥气，有胆识冲破权势与习惯制造的各种障碍，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收集原始材料，认真整理，研究先驱者的思想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迟到的答辩

俞安国

为了撰写回忆录的需要，我曾多方设法搜集有关自己生平的资料，承蒙友人帮助，寄来两份在反右斗争中曾经提到过我的文章的复印件，一是收在《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中用北京师大火星报编辑部名义写的《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一文；一是《教师报》记者张迈写的，五七年九月十日登载于该报第三版的文章《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读了之后，思绪万千，真叫我怎么说才好呢？

近半个世纪前那场惊心动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运动，把近五十五万（最近听说是317万余）的中国知识分子打人另册，弄得几十万（几百万）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株连者不下两百万以上，历经磨难，受尽了炼狱之苦，体味了非人间之况味。二十一年后，又说是“严重的扩大化了”，给以“改正”。我不幸而成了其中之一员，肉体上精神上都吃尽了苦头，令人不堪回首。运动过程中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那大大小小竭尽侮辱人格之能事的批斗会，那长长短短揭人隐私百般丑化的声讨文章，像污泥浊水，劈头盖脸地向你泼来，根本不容许你有分辩解释的余地，哪些是凭空捏造，哪些是歪曲事实，哪些是捕风捉影，哪些是无限上纲，一切都是批判者说了算，因为你的话语权早已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只要你稍一解释，稍一分辩，就是“态度不端正”，就是“顽固地坚持反动的右派立场”，就是“不思悔改”，就是“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呜呼，这就是当年“思想问题不能压服只能说服”的实践，这就是“既要有正确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的实践。可笑么？笑也只能是苦涩的。

时过境迁，当年二十才出头之我，而今已是年逾古稀的白发老翁了，思之怆然，还有无对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水进行一下清洗的必要呢？反复思忖，拿不定主意。忽然想到了王允闻先生在《灵魂的拷问》一文中的这段话：“……坚定地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揭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丈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龊，灵魂之丑恶。这样，不仅有助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受其启迪，于是，提笔写此小文，算是答辩吧，可时光已过去四十八年有余了。真称得上是“迟到”了。而且还得加上“大大的”，我的思路只能按两文中强加给我的罪名来写，被牵着鼻子走，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先说第一篇文章：《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

文中点到我的名字有三处，第三处不计，根据我参加过无数斗争会的经验推测得出是会议组织者有意安排的，借一个同学之口警告我，说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知道更多的材料”，“应该站出来，彻底交代和揭露”，在当时，我只能交代自己，什么也没揭露，也无可揭露，因为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啊。其他一二处是：

“秘密会议快结束时，‘底层之声’的联络员俞安国从北大回来。并带回许多反动的造谣的油印刊物，这份刊物的名称叫‘民主接力棒’，是要由这一大学传递到另一大学。这样传递到全国各地去的。这是右派分子的阴谋，企图这样来促成天下大乱，企图取而代之。”（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散会后，‘底层’的张海琛，李国楠，陈修竹、俞安国，张德文又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秘密小组，由张海琛、陈修竹，俞安国组成，由张海琛全面管社务，俞安国负责和外校联系，陈修竹负责和校内各社团联系。”

写到这里，文章的作者马上煞有介事地惊呼，并耸人听闻地煽动大家道：

“看吧，底层的‘将领’们的行状不是十分明显了吗？谁说他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呢？不。他们是校内校外互相串连，在偷偷摸摸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多么蛊惑人心的文字！不明事实真相的人们，在当时的氛围背景下，能不相信作者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吗？能不痛恨我们这些拉历史倒车的魑魅魍魉吗？能不孤立我们仇视我们吗？反右斗争之必要和正确不是明白摆着的吗？然而，真的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关于“底层之声”这个大字报社团之成立由来，性质，组成人员以及不到二十天的活动情况。罗宗义同志在他写的《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一文中已叙述得清清楚楚了，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

文章的作者横加给我的“联络员”的称号，我要问：是谁任命的？或者是哪次会上通过的？根本没有过，“左派”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强加的。还是让事实来谈话吧。事实是我之到北大去，不是谁命令我去的，是我自己要去的，我去的目的并没有去与谁联络，而只是出于想看看大字报的好奇心而已。并且只此一次，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何联系之有？

是六月二日的午后，我回西斋北楼宿舍取物，其时，广播里正转播中国与印尼的足球比赛，路过415室，见同学孙健孙正同两个外校同学闲聊什么，健孙见了我，招呼我进屋，并向我介绍道：“他们是北大的同学，顺便来参观我们大字报鸣放情况。”寒暄几句后，一个瘦瘦的北大同学自我介绍说：“我姓樊，物理系天文专业的。”他指着另一个面色黑红矮墩墩的同学说：“他姓谭，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跟我同班，都是四年级的。趁今天星期没上课，沿着大学路到各校散发油印小报，到你们这儿散完了，也顺便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大字报。”我说：“听说你们的鸣放不错，真的吗？”“你从哪儿知道的？”“文汇报记者介绍过你们的民主墙情况，教我们楚辞的文怀沙先生也说值得去看一看。”“你愿意去吗？我们非常欢迎。”

“以后抽空来吧。”考虑大家并不熟，我婉谢道。健孙问我愿意去否，并鼓励我：“去吧，也去见识见识别人的整风鸣放情况，我可给你借辆自行车，他们俩也是骑车来的。现在才四点钟，最迟九点就返回了。一起去吧。”说真格的，我真想去见识见识，就对健孙说：“借得到车，我就去。”谁知健孙出去一下，就回来说：“给，钥匙，车在楼下。”我只好答应去了。

到了北大，进了校门不远，路的两边尽是大字报栏，红红绿绿，黄黄白白的蓝字报，贴得满满的，甚至教室墙壁，宿舍饭堂墙壁也贴得不留空隙，令人眼花缭乱。参观大字报的人熙熙攘攘，像进入贸易市场一样涌动。校园的好些小径小道上，用石灰水写上“民主路”、“自由路”、“真理路”。我感到，跟我们学校景象有点异样，声势规模令人有点目惊口呆。我心里在嘀咕：这样干不知道符合整风的精神不？整风就得这么干吗？但我没说。他们陪我参观一些大字报后，就说晚饭时间到了，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叫“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的大字报，马上驻足仔细观看。

是一个姓叶的同学写的，是说在团的三次代表大会期间（57年5月中旬召开的），北大的代表访问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谈到当前整风鸣放中出现的问题时，胡耀邦说：“中央高层一些领导同志，对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甚理解，不赞成这一方针。苏联是赫鲁晓夫当家，朝鲜是金日成当家，中国是毛主席当家，惟有毛主席这个当家人难啊，我们国家又大又穷，搞得不好，有出大乱子的危险。所以毛主席忧心忡忡不无愤慨地说，中央闹分裂了，不拥护我了，我就背上背包，拿上雨伞，重新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我直接被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惊呆了，因为我从来就相信我们的党自上而下，是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怎么会产生分裂呢？心里在分析是造谣吧，谁敢这么大的胆子公开指名道姓是谁说的？为什么这么几天了，没有人来辟谣？这么乱造中央的谣，公安部门怎么不进行抓捕呢？如果是真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就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我是共青团员，是接受严峻考验的时候了。我问两个北大同学，大字报内容是真是假，他们的回答也含糊：“说不清楚。”我叫姓樊的同学给我一张纸一枝笔将此大字报抄下，我要带回学

校想法澄清此事。我为此事而感到无限忧虑，因为我无限热爱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啊！

抄完，天已黑了。在他们宿舍坐了约半个小时，他们问我有何观感，我简单回答：“你们的大字报谈理论的多，我们的大字报就事论事的多，各校情况不同，自然有其各自特点，说不上谁优谁劣。”姓谭的给我几十份油印单篇文章（不是刊物），我粗略一看，有谭天荣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刘奇弟的《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周大觉的《论阶级的发展》，沈迪克的《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等，实际上这些油印小文章在我校大字报栏已张贴过，我已看过，是怎么传过来，由谁传过来，一点也不清楚。对文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是深表赞同的，认为的确符合当时的现实生活之实际，也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

看看时间不早了，有九点钟吧，向他们告辞，还是他俩送我出校门。路上，姓樊的同学对我讲：“明天，我们准备组织一些同学到你校来参观大字报，并争取与广大同学见见面，允许的话，发表演讲，互相通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除‘三害’，必要时，还应当上街游行支持毛主席的鸣放政策。”我马上警觉起来，感到这样搞，恐怕有点出格吧，因为打解放起我们都是按党组织的安排行事的，是甘心当“乖孩子”“驯服工具”的，婉言对他说：“这，我作不了主，我只是‘底层之声’的一般成员，我可以将你们的要求向头头说说。”离开北大后，从此，我没有到过北大一次，我个人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据我所知，“底层”与北大，与北京其它高校任何社团都无联系往来。什么“校内校外互相串连，在偷偷摸摸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纯属谎言！

回到学校，许多人在415室开会，开什么会？内容是什么？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会后也无人告诉我，我也没问过。文章作者说什么“秘密会议”，是“分析形势，部署更大规模、更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的会议，”真是危言耸听！415室的门大开着，人员进进出出，什么人都可去听，有什么“秘密”可言？说是有四十来人参加。只十几乎米的空间，四间床，及一张大书桌，已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空间，请问余下的几平米能坐下这么多人？太离谱了吧，太不符合真实了吧。实际上只有十来人。不久散会，我将张海琛叫到门外楼梯口，给他简略谈了到北大去的经过，主要是将我抄的“关于胡耀邦的谈话”给他看，他一看也大吃一惊，忙对我说：“这是个严重情况，你千万不能再给谁说，传播出去，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不好。明天，我们赶快组织点人去访问市委或胡耀邦，一定要把此事澄清。”关于访问市委和胡耀邦同志的经过，罗宗义同志的文章已谈得很详细了，我也不再赘述。我将北大的要求向他讲了一遍，他想了一下说：“最好不让他们来。”我说：“如果他们明天真的来了怎么办？”“你负责接待他们好了，只同意他们参观大字报，不同意他们发表什么演讲，各校情况不同，搞什么联合？如果他们鼓动大家上街游行，我们一定严词拒绝，必要时关上门不要他们进校。”“他们给我的油印小报如何处理？”“不要散发，你保管好。”这就是文章所说的“碰头会”。还成立什么“秘密小组”叫我“负责对外联络”，纯是子虚乌有之事，近于胡扯蛋，纯属编造、整人的。

第二天，北大同学没有来，以后也没来，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所保管的油印小报，文章中说是“民主接力棒”。反右斗争一开始，我就主动地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一张也没散发过。请问，如果我们是成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文章所说的“……‘民主接力棒’，是要由这一大学传递到另一大学，这样传递到全国去的，这是右派分子的阴谋，企图这样来促成天下大乱，以图取而代之。”能采取这样维护大局稳定的措施吗？能不想方设法大肆扩散出去吗？我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忧国忧民”的表现吗？可就这也是我“右派罪行”之一。他们的谎言编得多么离奇又多么巧妙，欲置人于死地，什么良心也没有了。这种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的做法，我们能从中窥出一些什么值得人深思的东西呢？

关于我带回的那几篇被文章作者斥责为“反动的，造谣的油印小报”，说真实话，在我保管期间，我又拿出来认真仔细读过，从中深感到文章作者提出的好些问题，观点新颖，犀利，发人深思，大胆、泼辣，一扫教条陈旧风，限于当时我的理论知识局限，以及长期被“思

想驯化”以及僵化思维模式的影响，理解是不深的，更看不出他们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甚至产生过一种“异端”、“离经叛道”的感觉。1998年出版由牛汉、邓九平先生主编的思忆文丛《原上草》一书内就收有这些文章，大家可以找来读读。看看是不是“反动的”“造谣的”。钱理群先生将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言论和北大1957年的这些文章作了对比后，曾作出相当深刻有力的判断：

“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后，却成了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见《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

为什么文章的作者会凭空捏造或不顾事实的本来面目瞎说一气呢？很简单，在当年反右大气候环境的影响下，“左”性使然。首先，是按“有罪推定论”先将我们划为敌人，既然是敌人，自然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是这指导思想。其次，思想僵化。看不惯一切的新思想和事物，凡与常规不太一样，就视为异端，就要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对，驱除而后快；再次，“左”先生们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允许别人有自己的思想，一切唯上，自觉和不自觉地做了某些人的应声虫，而洋洋得意地认为是紧跟了党，最后，他们仗势的是，即使怎么瞎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被批斗的人员不能也不敢站出来申辩解释一句，而且藉以证明自己立场坚定性鲜明，还可以邀功领赏。这是历次运动的一贯作法，宁“左”勿“右”是有传承关系的。归根结底，这一切不顾事实的编造，完全是为了当时反右派斗争运动的需要。哪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半点民主、半点法治的理念。

然而，他们忘了，谎言只能欺骗一部分人于一时，却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远。总有一天，是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今天来根据事实答辩就是个证明。可是，这些谎言毁灭了多少有为者的青春年华，毁坏了多少美好的家庭，更主要的是给人民，给国家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啊！这已是众所周知历史事实了，谁也否认不了。可，当年写批判文章的人想到了吗？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具体批斗我们的同学中，好些人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未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对政治斗争也天真幼稚，即便是党员也奉命而为，认为这就是热爱党的表现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忠于党的行为。文革中他们的经历，让他们看到了体会了“左”的危害性，也被批被斗，受尽非人的折磨。整人，被人整成了规律。他们具体看到反右斗争的错误，坑害了许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同学，他们中好些人觉悟了、清醒了。至今还为此也感到深深的内疚与忏悔。我听到他们中好些人这样向我讲述过他们今天的反思的结果。我只能聊以自慰地说：“度过劫波情义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现在来说第二篇文章，《教师报》记者张迈写的《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先说这篇文章的由来。

大概是57年的八月上旬吧，一天接到团委的通知，叫我，张德文，罗宗义和周作祚（都是同班同学）到数学楼某室进行谈话。当我们四人推开门时，一个陌生人已坐在那里，穿着白衬衣，三十岁上下，他面带笑容地指着他对面的几个位置叫我们坐。坐下不久，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教师报》的记者，我从学校团委那里了解到你们都是班、团干部，积极分子，三好学生，有的还正申请入党，可你们在整风运动中却犯了错误，说了些不利于党的话，做了些不利于党的事。”他停了一下，话锋一转，接着说道：“这没多大关系，上帝都会原谅年青人的嘛，更何况是我们胸怀宽阔的党！你们说是不是？改正就好了嘛！今天，我找你们来谈，是想从你们的这段经历中，看看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些什么缺点，以利

于今后改进。现在，你们就随便谈谈。”出乎他的意外，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不停地催促说：“谁谈？谁谈？”大家仍是沉默不语，有的低着头，有的望窗外，彼此都感到尴尬。是呀！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右斗争运动，大家都噤若寒蝉了，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阳谋”，不敢再领教了。现在已弄得身心憔悴，前途茫然，再说什么，不知道要受到什么更严厉的处分哩！这样僵持了十来分钟，他又开口了：“我向你们保证，请你们放心，我只是了解情况，不会写成文章登报的，即使写文章，也得上级批准才行，你们年青学生，不久就要毕业工作，也得保护你们呀！让你们抬不起头，左右不是人，也不是我们党的政策。”也许，我们太幼稚，太相信人了吧？也许，几个月来，我们心中憋着的委屈太多了，太久了，急于想找人发泄吧？张迈左一个党右一个党，我们就想：“也许党会听我们的倾诉，让我们谈出自己真的思想，来全面评价自己，减轻处分吧？至少让党相信，我们不是敌人，是一心为党的，只是政治上不成熟，被社会上的右派利用了。我们愿意用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永远是党的好儿女。”这不是一个机会吗？两个多月来大家经过的好些斗争会根本不让我们申辩一句呢，得到如此机会，述说一下内心想法吧。我们根本未意识到这就是审判学上的“诱供”。这下，我们就分别谈出了自己的思想，感受。谁知又受骗上当了，一个月后，文章见报了，张迈不仅违背了他的承诺“不提我们的真实姓名”，而且凭他的“丰富想象力”，用他的“生花妙笔”，肆意编造事实，颠倒黑白。描绘出了一条我们必然堕落成右派分子的轨迹。他知不知道，他的文章造成的影响多大！不只让我们看出了某些人虚伪无耻的嘴脸，言而无信的卑劣行径，让我们永不再相信口里“左一个党，右一个党”的，说得好听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际上是居心叵测的小人，而且给我们的亲人朋友看了报上的描述后带来莫大的伤害，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曾经无比信赖、喜爱的人怎么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还上了中央大报哩！他们真的如报上说的那么坏吗？

现在，我将张迈“大作”中有关叙述我的文字抄录如下，然后依据事实辩驳作者怎么妙笔生“花”的。

“找寻矛盾，干预生活。”

在师大还有一种右派分子，专门“找寻矛盾，干预生活。”“这种类型可以中文系学生俞安国为代表。俞安国平时对生活很有“兴趣”，喜欢探索生活的“奥秘”，他认为什么是生活的奥秘呢？那就是社会的阴暗面，他要干预的也就是这阴暗面的生活。他说：“光明的一面是人人都见着的，不足为奇”，他认为，“阴暗面容易被人忽视，而且里面蕴藏着社会的矛盾”，应该多看，他还说：“一个人要作到有独特的见解、不能随波逐流，非多看社会的阴暗面不可。”因此，他非常喜欢看这样一类的书籍，如右派分子刘宾雁著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等，对这些书里的主人公曾刚，黄佳英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为了找寻“矛盾”，获得新的发现，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存在的问题，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东西，都特别欣赏。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视觉：“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我们国家里无限光明欣欣向荣的生活，他却视而不见，个别角落的阴影，他却是一望无遗。因此，他在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公开叫嚣：“我们的社会生活非常黑暗，并不像报刊上登的那样英勇豪迈”，“对党的政策要创造性的理解，不能人云亦云！”“成绩不是主要的，对一切工作都要重新估计”！这样，他便深深地堕落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干预生活”时不从党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就会以薰为莠，以臭为香，像俞安国一样，铸成大错，变成逐臭之夫。

我不知道，张迈先生今天还健在否，如果还活着，我真想同他面对面地向他求教他“大作”中关于“叙述”我的几个问题，并同他探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求教的问题是：

“张先生，你大作中用引号的话，前面不是用上‘他说’，就是‘他认为’，甚至是‘公开地叫嚣’，请问：引用自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哪篇文章中？或者我鸣放时写的哪张大字报里？也或我的哪份交代检查材料？也或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你能明确无误地给我一个满意答复吗？”我肯定你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纯是莫须有，是你的编造而已。试问：“我们的社会生活非常黑暗，并不像报刊上登的那样英勇豪迈？”“成绩不是主要的，对一切工作应该重新估计”，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些话算是非常反动的言论，算是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极其恶毒的攻击了，然而，在划我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中却一句也没有，结论上也没有，不会是疏忽遗漏吧？这该作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然而，张迈先生在他的“大作”中，为啥凭空编造和这样写呢？我的解释有二：

一是张迈先生是奉命写作，在当时的大氛围下，按照上级意图斗争的需要，任意瞎编都可以，或者有一点“由头”甚至一点“由头”也没有，凭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任意“生发”开去也不无可以，尽量地把问题说得严重点，把批判对象描绘得越狰狞、越丑恶也完全可以。这就证明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迫切性，以影响一般群众的头脑，视听。起到最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就叫“为了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尽力丑化右派分子，证明他们一群是早已别有用心，本质极端恶劣，灵魂非常肮脏，野心勃勃的反动家伙，让不明就里的人仇视他们，孤立他们，进而打击他们。”是反右斗争，也是每次运动惯用的策略和手法。张迈先生具体熟练地运用了。

二是，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实际上是张迈先生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识产权”是张先生的，不属于我所有，而他既想发泄又不敢发泄，于是借我之口发泄出来了，真是一箭双雕！既公开发表了，自己又不担任任何责任。什么叫“深文周纳”？什么叫“无中生有”这就是具体例证。不敢说是张先生用心险恶之话，但至少证明张先生的道德有亏损，是违背一个新闻记者起码的良心的，也违背有良心的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准则的。这叫“血口喷人”，比“莫须有”还更凶恶。

张迈先生敢于如此大胆莫须有的编造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他肚里明白，右派分子的一切话语权都全部被剥夺了，只有挨斗挨批的义务，绝无申明解释的权利，谁也不会，不能，也不敢来质问他，追究他，即使上级发现是瞎编，在宁“左”勿右的观点支配下，反正对“敌人”就该“像冬天那样残酷无情”，整错了也没关系，也不负任何责任。“好人”打“坏人”，活该！错了也不是立场问题，成绩永远是主要的。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击永远是正确的。怕什么？没错！所以张迈先生就有恃无恐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在张迈先生“诱导”下我的发言的大体内容。我说在肃反前，我是绝对相信党，听党的话的，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从未讲过一点价钱。是绝对的“驯服工具”。肃反时，我是“打手”，积极“斗争”党指定的有问题的同学，肃反后被评为积极分子，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说斗争错了，公开向被斗的同学赔礼道歉，这给我很大的震动。看到那些被斗过的同学神情恍惚，沉默寡言，抬不起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异常冷漠，同志之间也不敢讲真心话了，相互提防，小心翼翼。想到被斗争的同学解放时才十三四岁，有的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员。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反革命？比如有人说“人民日报上登的文章消息不一定都正确无误”，就推论说，党的喉舌会讲错吗？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党就是反党；有人说他上过美国密苏里号航空母舰去参观过，很先进。就斗争他宣扬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有个同学知道要斗他了，吓得从三楼跳下，幸未摔死。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落个终身左脚走路不便之残疾。一个同学被斗后，借故跑回香港就不再回来。想到这些，非常痛心，都是不该发生的事啊！凡事都要多动脑子，独立思考一下才行，不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的。我听说有些地方工人在闹事，进行罢工，甚至上街游行，有些地方农民吃不饱，饿肚子，要求政府救济，可我们的广播报纸却不见这些新闻消息的报导。应当说，实际生活中并非都是阳光灿烂，鲜花铺地。正确与错误，先进

与落后，光明与阴暗，往往是并存的，我们是大学生，应该给我们以全面教育，错误的，落后的，甚至阴暗的也该给我们看看，这样，我们走向生活后，才不至于困惑，才会全面合理地去面对。鸣放初期，我从报上看到一些文章，一些人的发言，我也认为有问题，不正确，与党教导的不一致，并不同意。但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双百方针”的了不起，这就是民主，正确的错误都可以说。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党真伟大啊！我们党胸襟多宽广啊！真有点海纳百川之气概，相信经过这次整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蒸蒸日上。反右斗争一开始，我自信自己没萌生过半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念头，反不到我头上，最多检讨一下，也许由于自己政治水平不高，没有认清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实质，没有立刻站出来保卫党，反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实际上帮了右派分子的忙，太辜负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和信任了；仔细想来我的悲剧正在于，当我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时，我还自认为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鸣放，助党整风呢！我请党宽恕我，请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并请全面审查我的历史及在整风中我的所言所行，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到这里，我痛哭流涕，流下了真诚的悔恨的眼。目。其他三个同学在发言时，也同我一样，悔恨到极点，也流了泪。

这时张迈忽然问我平日爱看什么书，我说，除了专业书和杂志外，小说，论文是常读的，他问我《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读了吗？《在桥梁工地上》读了吗？我说都读过，“对书中主人翁有什么看法？”“现在，还有争论，我也说不全面，反官僚主义的主题是正确的。去年团中央号召大家读《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一书，提倡向娜斯佳学习，这次整风，‘除三害’中就有反对官僚主义一条。官僚主义的确对我们的革命危害极大”。谁知，在张迈的笔下却成了“他非常喜欢看这类书籍，如右派分子刘宾雁著的《在桥梁工地上》，如《本报内部消息》等等，对这些书里的主人公曾刚，黄佳英等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张迈先生还煞有介事地教导我们“在干预生活时”，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不然，就会以薰为菹，以臭为香”，我想，张先生显然是赞成“干预生活”的了，他这篇文章显然也在干预生活的，可他却深文周纳，不顾事实的加害于人。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利益”出发的，张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怎样，不清楚，如果因为他这篇文章而立了功，提升了职位，文革中他又被造反派斗了，他会不会有所感慨呢？我有一个左派同学，反右时斗过我，文革中她被斗，还剃了阴阳头，她写信告诉我说：“弯腰站在台上，听造反派毫无根据地向我泼污水，我就想到当年反右时我也毫无根据地向我的同学泼污水，这正如孟夫子说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有它哉！’我愧悔之心立刻涌上心头……”但愿张先生记住并回味这句话：“知耻近乎勇”。

前面我已说过，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的确无意同谁纠缠算老账，因为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问题，要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根本措施是要完善我们的社会制度，发扬民主，依法治国的问题，我只是想通过已逝去的那段岁月的回顾，来总结，来反思，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让曾经发生过的人间悲剧从此不再重演而已，这样，我们才能的的确确进入每一个善良人无不企盼的和谐安宁的社会，让子孙后代平平安安，国家富强，民族昌盛。

丁酉之劫

袁伯诚

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1956年底至1957年春季的整风鸣放时期，我一未“鸣”，二未“放”，没有上过论坛，没有贴过大字报，也就是说，没有帮助党整过风。说过一句半句意见，原因是我自1950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特别我于1952年由山东调到上海，做首长警卫工作，接触上层人物较多，中国的不用说，外国的尼赫鲁、艾登、西哈努克、赫鲁晓夫等我都侍候过，在接近中外大人物中，也明白一些世事，在经历的许多事事物物中，令我惊心动魄的是饶漱石竟然成反党头目，彭柏山（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胡风分子，潘汉年（原上海常务副市长）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这些人我都给他们做过警卫工作，他们待我这个“小鬼”都很好，我把他们当首长尊敬，他们在我眼里不像坏人。他们的被捕被关被批而成为“敌人”，对我产生的唯一影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太残酷，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坚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过也由此而变得谨言慎行起来，时时警策自己：出身不好，不能犯错误。这就是我在整风鸣放时期没有积极参加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呢？这叫“在劫难逃”，与我的家庭出身富农、我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有关。我在参军的前夜，父亲嘱我三句话：“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气节不可夺也。”或许就是这三句害得我当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一、在反右运动中对抗情绪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我就有抵触情绪，我对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当批判》极为反感，尽管社论说叫人鸣放不是阴谋是阳谋，而我眼见的事实却接受不了这种观点。有这样十几件事使我想不通，看不惯，说出来或表现出来，便构成我的右派“罪行”。

（一）我认为北师大党委极左，这与党委书记何锡麟有关系。凡是在鸣放中给何贴过大字报、揭露过他的错误的师生均遭他挟嫌报复而打成右派，我认为手段卑劣。

（二）逼迫生物系教授武兆发自杀，武自杀后，兴师动众在全校公布武的私生活，近乎下流无耻。

（三）中文系发生严景煦打江欢然事件。本来是学生之间争论引起的过激行为，血气方刚的作风粗暴，却纳入政治斗争，严景煦被打成极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因为严是中国志愿军战士，便令北京军区来宣布开除军籍，并在全校开大会批判，当场戴上手铐法办，一个郁郁乎文哉的高等学府，一时变得异常恐怖。在我当时看来，主持参与这件事的校党委与中文系党总支的某些人的手段近乎汉武帝手下的张汤、杜周之类的酷吏。

（四）辱骂盲从者。我班同学中有几个山东人，如林修、沈明礼、张麟书、胡大镛、王宪达、李保光等一帮子。我与林修、王宪达比较亲近，现在也是如此。因为林修是胶东人，与我有乡党之谊；王宪达是党员，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在第一学期当过班长，经常接触，亲如手足。林修鸣放时期很活跃，成立“喀秋莎炮团”贴大字报，瞎起哄，因为我毛笔字写得不好，拉我替他写大字报，我不肯。而反右开始一变又很积极，引起我的反感，关系疏远起来。学校要法办严景煦那天，党委布置下来要各系各班开会，贴大字报造舆论，制造出一种

群众性激愤，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气氛，以表明广大师生一致要求法办严景煦。我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中午我回到宿舍准备睡午觉，林修兴冲冲推门进门，要我起来跟他去写大字报声援法办严景煦，我说要睡觉，他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我恼了，出口骂：“我不愿当帮凶、走狗；你愿当你当去！严景煦有何罪，犯了什么法？”我说话的时候，宿舍里还有几位同学在场，大家听了都很惊讶，同情我的人，认为我“疯”了。想立功受奖的人却捞到难得的好材料，向年级党支部打小报告有了机会。后来知道，为这件事，王宪达在党员会上替我说了几句辩解的话，而受到严厉批评。而林修对我的这种语言也并不十分痛恨，也只认为我是山东人的暴脾气。但是在场的人多了，后来班党小组搜集我的反党罪行，他对这件事也不得不如实说。我至今与林、王二人有联系，我认为他二人的反右运动中仍未泯灭山东人人性中厚道善良的秉性。

（五）鄙夷忏悔者。我们年级二班有位叫刘同中的四川同学，人大学时刚十七岁，长得堂堂正正，身上颇有些文气，不像是工农家庭出身。鸣放时，很活跃，说了许多有深度的话，可是此人被年级党支部当作小孩子看待，是受右派分子煽惑的年幼无知者，经党组织的教育，幡然悔悟，痛作忏悔，请求救赎。转而痛骂右派，积极参加年级批判的活动。这引起我的反感。他原来在我眼里是何晏、王弼式才智童子，反右以后，我感到他比我当右派还可怜。他让人“争识安仁拜路尘”！茫茫大千世界，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单纯的善人或恶人。我并不怀疑刘同中鸣放时说话与反右后的忏悔都是真诚的。这使我想起《圣经》上说的，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应当具有向善的神性，但是事实上，人的罪恶很快就遭到上帝的惩罚。刘同中的从“鸣放”到“救赎”的过程，分明透露着另一世界的诱惑和召唤，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绝望，而彻底放弃对一切现实存在和现实手段的幻想，而去做“驯服的工具”。刘同中没有被打成右派，却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直到大学毕业，一直背到边塞新疆去。

（六）看不起依附权势有奴性的同学。我们班里有这样几位同学，在反右运动以前，才、学、识、德、貌都很平庸，引不起老师与同学的注目，他们也很自卑。但反右运动中在党小组的培养下一变而成为“鸡犬升天”的积极分子。譬如说，有位山西的王某，专门替党小组盯班里右派分子的哨，右派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干狗腿子的活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位姓邓的湖北佬，善长对右派分子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对待这类同学，我见到他们，就想到列宁同志的话：“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要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供应仆人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以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的主要特点就是虚伪与胆小。”这样的最诚实的而又是虚伪和胆小的奴才在反右期间，中文系里的教授、教师中也有，他们是我的师长，给我上过课，我点他们的名有些不太厚道，但至今，他们批判黄药眠、钟敬文、穆木天、李长之、启功时的那副奴才相，在我的记忆里抹之不去。

（七）拒绝登台发言批判黄药眠和李长之两位师长。我在入学第一年当班长，和系主任黄药眠有所接触，由于崇拜他，去过他家里，请教美学问题。李长之先生指导我读过《史记》，他在1948年写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在图书馆借不到，我向他借，他送我一本并给我一部没有断句的线装本《史记》（两函），要我从头点读，并圈出《史记》中的十篇传记，要我熟读成诵。我也多次去过他的家，替他抄过稿子，他是我的恩师。这二位教授都打成了右派，因为同学中知道我与他们两位有联系，所以组织上让我揭发他们的反党言行，我断然拒绝。我说：“人家是教授，与我不谈政治，只谈学问，我无有什么可揭发。即便有也不能上台去揭发、批判，那叫什么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我不做背叛师道的事。”这也是我对反右运动抱抵触态度的表现。同时，我对批判右派教授的斗争与大字报中肆意丑化，也极为反感。当时批判的范围不限鸣放时期的言论，而是扩大家庭出身曰：“地主资产阶级的孝

子贤孙”，联系历史问题曰：“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揭其隐私曰：“灵魂丑恶不堪，生活作风糜烂”；警学问曰：“不学无术。”如在批判武兆发，揭露出其有悖人伦近乎禽兽的男女关系，使其再也没有脸面见人而自杀。自杀后又让其妻子在全校性大会上作证词。中文系在批判启功先生的会上，有一位清华国学院出身、以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设祭时，他曾行跪拜大礼，令我曾崇敬不已的教授，竟然说启功先生不学无术到将太行山“念成太行山”，令我像叶公见到真龙一样的惊恐。揭露李长之的“罪行”中，有一位红色党员教授竟说其留学德国，后来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大学有纳粹主义思想，效忠于蒋介石，骂过鲁迅等等，我至今不敢相信是真的。事后，我曾问过李先生对这种揭露作何感想，他微微一笑说：鲁迅先生在《而已集·可恶罪》中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许多，是先因为被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句话包括之，曰：‘可恶罪’。”反右时中国没有什么法律可依据，只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指针。

（八）“偶语”招来的一顶右派帽子。秦始皇在“焚书坑儒”运动中有一条：“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谓“偶语”，为“相对私语”，即两个人在私下议论。我在1957年夏天第一次反右运动过后，与张麟书同学私下议论反右运动，说反右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失信于天下。张当时已打成右派，为逃避批判，立功赎罪，将我们的“偶语”向党小组密告，于是我被打成右派。

张麟书，山东平度县人，1956年毕业于青岛第一中学，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平时有点马稷的派头，是“楞头青”式人物，鸣放期间大发议论，和班里同学争吵辩论，明明不省世事，却自恃聪明，说起话来不知深浅，好大言欺人，是色厉内荏的伪鲁仲连式人物，他在鸣放时的形象很像司马迁笔下与荆轲论剑的盖聂，或与荆卿博而争道的鲁勾践。鸣放时很嚣张，反右时又如见秦王“色变振恐”的秦舞阳。他是班里揪出的第一个右派。

（九）反苏。1957年“五一”节后，与原上海市警卫处的同事，去看望陈毅，他访问东德归来不久，对我们说，他路过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对他反斯大林的做法表示态度。陈市长（我们习惯称呼）说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把马林可夫赶下台，并把他与几位忠于斯大林的老人物打成反党集团，是用阴谋手段，他上台，闹得社会阵营分裂，闹得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稳定。对中国摆老子党的架势，妄图指挥我们党，毛主席不听他那一套。中苏关系出现危机。

陈毅的话，我在与张麟书“偶语”中说了，并引而申之，预言中苏关系必将走向破裂。我又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在客观上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在主观上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即为苏联策动的，旧俄国侵占我东北与北疆大片土地，为什么不归还？这算什么社会主义？总之，我在张麟书面前发表不少反苏言论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1957年却违犯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标准”。

（十）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提出质疑。曾与徐振宗“偶语”到胡风，我认为胡风与鲁迅关系好，国民党把他当作“左联”分子。他的问题出在他的文艺思想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一致，他要在毛主席面前标新立异，哪里能成！要让他就范，只有用一顶反革命帽子扣住。以上十个方面构成当右派的“罪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应该说是绰绰有余了。

二、被划成右派之后的反抗

1957年九月以后，新学期开始，我的班长职务被撤换掉了。我越来越消沉，恶劣的政治环境，让我明白了沉默的重要。当时北师大已处在上帝与撒旦的两极之间，既不会离弃前者，也无法摆脱后者，残酷的整人斗争预示着生活在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善性的脆弱和毁

灭。被整的打成右派的教授、职员、大学生，多数已伏首认罪，像列宁揶揄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皇权惯了，没有俄国知识分子那份显示独立精神的骨气。在这期间，我时常想，反右使罪恶与知识分子人生俱在。我渴望知识，想变得更加智慧才来上大学，谁知第一次反右之后，我像夏娃和亚当偷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一样，大学成了我的初次堕落，我沿着这条路陷入了永久的地狱。

1957年夏天，为开展反右运动，北师大到8月1日才宣布放假，但打成右派的延长到8月10日才准走，十天之内写交待材料，集中受训，参加批斗会。我当时还没有划为右派，但为等张麟书一块回青岛，便留下来，所谓山东人讲义气。十天后乘上火车，立刻产生了一种自由、解放感，两人一路放言无忌。我的“偶语”之罪多是在火车上犯下的。

等张麟书一块回青岛，党小组及班里靠拢党小组的反右积极分子看到眼里。9月份开学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宣传越来越明确、越深人人的意识，当上右派与未当上右派的人都谈右变色，右派已入地、富、反、坏四大阶级敌人等级，我虽然头上还未戴上右派帽子，但在班里也十分孤立，过去与我关系亲密者，在教室里也不敢与我坐在一起。与他们相逢于无人的路上，偶尔看到他们会意地一笑的后面，接续一点“蛰伏状态”的善良而已。而随着“仁者爱人”的博爱理性的迅速破产，反右运动的发动者把斗争引到真理，同样也把背信引到真理。反右运动首先造成一种困惑：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意识的过分张扬使人性异化所产生的忠诚面具遮掩下对现世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受到惟有对于恶的暴力手段的崇拜才能安慰脆弱的人生。这样，以肯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为起点的整人哲学，从一开始就与极端膨胀个体的利己主义相呼应，它们相克相生，相生相灭的纠葛，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构成长久折磨着心灵的“自由的非逻辑性”。因此，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会产生出一小撮撒旦式的或敌人或斗敌人的人物，上帝允许他诱惑人，试探人，折磨人。

1957年底，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学校不放寒假，校园的大字报多起来，批判会多起来。我班又揪一个右派分子翁柏钦，此公在暑假批判张麟书时言语尖刻而颇有刺骨的锋芒，颇受年级党支部及班党小组的称赞。但也就在他批判别人的同时，写信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骂毛主席”。这样的弥天大罪，收信人不敢包庇，将信上交北京大学党委，很快就转到北师大党委，不必开会研究就定为极右分子，下达中文系党总支，很快翁柏钦被“看守”起来，搜查了他的书籍、笔记、日记、衣物、信件等等，让他写交待材料。此公是张东荪式的西化派基尔社会主义者，是我们年级少有的富有哲学思辩能力的学生。此公又是一位“独行侠”，很少与人交往，除上课在课堂能见到他的影子，平常很难见到他。一个人背着书包钻图书馆、阅览室，晚上都到别人睡着了，他才回宿舍。这样一位于人“相忘于江湖”而独钓寒江雪的福建山樵，一封私人信便被人剥去独立世外的神秘外衣，每天在积极分子的监护下去校园抄大字报。元旦后，班里第一个被批判的就是他。几十年后他对我说：班里党小组不想把他打成右派，是外边来的材料，他有点像启动先生的情形，启先生在中文系人缘极好，在北京画院鸣放会上转弯抹角地说了一番话，也是材料转来师大被定成右派的。这正是对于撒旦的最后剿灭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元月17日在教育楼二楼室召开批判翁柏钦的会，早八时我去参加。党小组长张本性同学通知我，不要参加此会，让我回宿舍反省，写思想检查，准备向全班同学交待问题。什么时候开会，等通知。

听罢张本性的话，马上意识到我当右派的命运已经定了。回到新楼宿舍，推门见王祯祥在里边。心想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会？王同学已摆出与我“割席”的态度，我也不与他说话，整个上午没有坐下来写材料，一直在思索如何应付这一人生劫难。心想只要人了“白虎堂”是甬想平安地出来。想到那么多的名人、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像黄药眠、钟敬文、李长

之、陶大镛、费孝通、钱伟长、钱端升等等，都默默地承担着这场苦难，我算什么呢？想到这里，反而比未接到通知写检查前轻松多了。原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整天像站“秦坑”边缘，恐怕别人把自己推下去，时下做“坑儒”已成定局。不知为什么，元人臧懋循赠吴稼澄的一首诗闪人脑际，我整上午都默诵它：

贝锦休嗟谤已成，
清朝难得是狂名。
鲜鱼归岂同张翰，
鸚鵡才原嫉祢衡。
色为棒心翻绝代，
璧因刖足转连城。
如云赋客徒推毂，
世路崎岖不可行。

默诵此诗，在想自己进大学一年半，所作所为太张狂。如班里同学在我面前谈起年级党支部书记杜衡同志，说他来自新华社，是“老革命”。我说：“他在新华社不过是一名提水扫地的小小勤务员而已，有啥值得羡慕的！”又如平房一号男生宿舍议论某女党员，进大学半年就与原来的男朋友吹了，我贬之曰：“女陈世美！”这些言论都被那些好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有意无意的汇报上去。所以，正如几年后，翁柏钦同学对我说的：“你是年级、班里党组织要把你打成右派的；我是因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失敬，校党委要把我打成右派，班里党小组并不想打。”

到吃中午饭，我去北饭厅，王祯祥跟着我，下午我到图书馆，他也跟着。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受命于党小组看管我的，发自内心的轻蔑地一笑：“啊呀！我的身份提高了，党组织给我派来警卫员。”我想到莎士比亚洞察过多少人的隐秘，在最后的传奇剧里把希望交待飘然而去的精灵。王祯祥进大学读中文系，没有学好莎翁而进戴氏之门。

1958年1月22日早晨，王祯祥“押”着我来到教育楼二楼东头临街教室门口，他进去报告，带我进去，教室的桌子摆成一个大长方形，全班同学围坐着，已严阵以待我这个敌人了。张本性宣布开会，令我作检查，我如实交待上文第一部分中的（三）、（四）两个问题，以及其它一些不能上纲上线的错误。当然我的检查不合乎要求。我想再深刻也没有用，还得挨批斗。我自问自己不是右派，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检查什么呢？

我的话未说完，党小组让大家发言，其实在我来之前，已经开过积极分子会，将我的“罪行”布置给他们，让他们作“炮弹”。于是，积极分子争先发言。揭发我反苏、攻击肃反运动、诬蔑反右运动，对抗党支部及党小组的领导，仇视积极分子等等。让我认罪，我不承认，便叫来张麟书对证。积极分子提出一条问张麟书：“这是不是袁伯诚对你讲的？”张俯首答曰：“是”。如是对证多条。

原来，我与张麟书在火车上“偶语”的事，张在返校后在党小组的威逼利诱下都写成揭发材料，以立功赎罪啊，原来舒芜就是这个样子，可怜！可怜！

批斗会结束，让我继续交待认罪，否则人民是不会宽恕的。中午到北饭厅吃饭，一张揭露我反党“罪行”的大字报在北墙上贴出来，标题为“揭露右派分子袁伯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署名中二（一）班学生。主要内容批斗会上的那几条以外，多了一条家庭罪恶：

（1）我父母均被“管制”，是地富分子；（2）我父亲参加过“黄道会”，土改运动中逃亡到济南，我在济南军队上包庇他；（3）我舅舅是流氓地痞分子被当地群众打死。我看后轻蔑地一笑。

三天之后（即元月 25 日）党小组再次组织全班同学批斗我。我就家庭问题作了以下说明：

第一，我 1957 年 8 月回家，我家上还挂着“军属”革命家庭的木牌子。

第二，我父亲在 1948—1949 年春在即墨县与青岛为共产党做过三件事我知道。一是胶东南海司令部有一位沙参谋通过我父从即墨、青岛国民党统治机构购买军火，直接用国民党驻即墨师部的名义用大卡车运到西杨头村（离即墨城十华里），解放军派大车来拉走。一是解放军的侦察人员多次到即墨城、青岛市活动，住在我三伯父在河南开的商号里。有一次一位牵牛来的姓李的刚走半天，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来到商号，将三伯父捉去，店内东西抢劫一空。后来我三伯父被花钱保释出来，商号却因此倒闭了。一是青岛解放前夕，据说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要进青岛，由我父亲利用他与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结拜兄弟关系，用小吉普车接送、进出国民党军设的“卡子”。

第三，关于我舅舅，当过共产党的村长，是地下党员，1947 年秋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被还乡团活埋。我说的以上几点可以到当地去调查。

但是我的解释遭到猛烈的批判。说我为反动的地主富农家庭喊冤叫屈，反攻倒算，妄图推翻伟大土地改革运动的成就，夺回贫雇农得到的胜利果实。

党小组长总结时说：“这是袁伯诚又一次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我们要坚决打垮他的进攻，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上午，中文系党总支找我谈话，在王祯祥的“警卫”下，到教育楼二楼总支办公室。总支副书记汪郁馥（女）先生拿出一张表让我看，原来是一张“右派分子登记表”，“罪行”栏目里，即批斗会上所谓群众揭发，组织认定的“五条罪状”。表上有一栏要右派本人填写的意见。汪副书记要我承认罪行并签字。我对汪副书记说：“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是革命者，我拒绝签字。”汪说：“抗拒下去，后果更严重。认罪签字，可以争取从宽处理。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还可以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汪副书记说罢，很生气，挥手让我走。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只记得是星期天晚上，在文史楼一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组织了年级三个班对我进行批斗，是由党支部委员卢志恒主持。每班指定几位积极分子发言，他们都作过充分准备，有发言稿，一班有邓先正和杨桂欣。其他二个班的发言人记不清了。杨桂欣同学在发言中说：“右派分子袁伯诚是美帝国主义、蒋匪帮的走狗，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一定要打着白旗去迎接！”这几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当即打断他的发言，大声说：“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在青天白日旗下，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呢！”杨桂欣同学听罢打了我两记耳光，（当时我也站在讲台上接受批判）我喊出：“卑鄙、无耻！法西斯，纳粹党徒！”

我这一骂，台下的人愣住了，会场静了两分钟，张本性才喊出：“极右分子！极右分子！”喊罢，她与卢志恒窃窃私议之后，宣布：“大家暂时不要动，待请示总支、党委再说。”并布置几位身体强壮的同学将我看守起来。

大约待了一个小时，张、卢引来保卫科的张科长，将我戴上手铐，带出教室，先回到宿舍，将铺盖、衣物收拾好，保卫科的两位同志拿到楼下，一辆小吉普车在那里停着，上车以后，因为给我戴的是背铐子，张科长给我打开手铐，我坐在后边中间，两边坐着保卫科的两个人。我问张科长：“把我送到哪儿？”张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大约在路上走了四个小时左右，车停下来，下车一看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大操场式的地方。有一幢西字形庞大的平房建筑物。西字形正中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北京西郊农场。

读《庄》自白书

袁伯诚

- 一、“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
- 二、“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 三、苦难的岁月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我于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做为一个摘帽右派被从北京分配到宁夏南部山区，内心里像一个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流浪儿，“去故乡而就远兮”“渺不知其所止。”于是，我感到孤独、苦闷而迷失的是精神家园。

我被分配到宁夏西吉县的一所中学教书，突然来到这近乎中世纪的带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氛围的少数民族地区，感到自己被党和人民彻底抛弃了，就像屈原被放逐到汉北江南一样，“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我终日寝馈在屈子的精神境界里，抱着一部《楚辞》不放。我所待的西吉县有古秦昭王修的长城。我经常在黄昏时分登临古长城，面对高耸的山岳和悠渺的苍空，大声朗读《离骚》或《昔往日》，有时不免热泪纵横，心迷意惑，不知所为。读《骚》并不能消融我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在当走投无路的时候，忽而想起清代人刘熙载说的一名话：“有路可走，率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原；无路可走，率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我反复琢磨这两句话，终于豁然顿悟。读《楚辞》，学屈原，在秦长城边彷徨抑郁，正是“登高吾不悦，入下吾不能的“无路可走”的景状。若“有五石之瓠”“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或有大樗树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而逍遥其下，不正是一条精神解脱的路吗？于是我翻出《老》、《庄》读起来。

我从1961年开始与老庄对话，首先听到他们说“你这个人呀，心里上有障碍而茅塞不通达，得学点我们道家的精神解脱法。”（《庄子·逍遥》“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从此我便堕入老庄的“魔道。”

从人生哲学方面讲，道家的庄子学派基本上是属于“逍遥解脱型”，充溢着悲观和游世的特质，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有顺应历史潮流而任其自然“以快吾志”的积极的一面。我当时身处逆境，庄子的人生哲学中的消极与积极的两个方面我都吸纳了。但是，我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接受庄子的超现实的人生理想，从而产生了一种人生虚幻意识。人生之累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飘忽和前途的渺茫。自己无法把握和驾驭自己的命运，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痛苦、磨难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压抑力量，逼迫我寻求一种不同于治平兼善的处世哲学和解脱方法，所以，读起《庄子》，与庄子的思想一拍即合。但时移世迁，我与庄子处的时代不同，庄子能解脱而我却不能，而我只能不断地辗转反侧于真实的人生痛苦和虚幻的精神慰藉之间，陷入了自由人格与客观现实的深刻矛盾之中，对我，人生只能是个悖论！

但《庄子》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对身处逆境的我仍然有用，即使作为“精神鸦片”也曾帮助我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庄子把超现实建立在“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以一种所谓“外曲而内直”的人生态度化解人生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在精神领域里再造一个适宜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力求以超越常态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达到与道相通的理想境界。庄子的这种人生观和生存方式恰是我当了右派被远徙边塞之后所需要的，并在我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之一。

这里可用我在宁夏西吉县的生活经历来说明之。我在西吉县中学教书之余，常常写诗和小说，因是摘帽右派不能发表，就用我弟弟的名字向报刊投稿，底稿留下来起名曰《呕血集》。社教运动初期即1964年12月，我被加上写反动诗和“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打成“现行反

革命”而被捕入狱。当我的作品经过中央公安部鉴定为“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不能作反动论”时，我已经坐牢一年，社教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我的“问题必须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一拖拖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无人管了，直到1968年7月我在狱中“奄奄待斃”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又拖到1972年5月才被正式宣布平反，恢复工职，这样，坐牢三年零八个月，“保释监外监护”三年零十个月。前后共七年半的“坐牢”、“监护”生活，能熬过来，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相信党和毛主席）和解脱苦难的方法（老庄哲学）是难以想象的。

在七年多的“囚犯”生活中，老庄哲学给予我化解人生苦难的方法，我把现实的人生导入虚幻的“逍遥游”的境界，以大瓠浮海的彷徨来消融“曳尾于涂”中的现实苦难。

进监狱不久，我向看守要书读，被允许读马列经典，我在不到四平方米的中世纪的土窑洞里，借着门缝透进的光线熟读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三种书我都读过三十遍以上，后来换了一位山东老乡当看守。他徇乡情给我拿来了《道德经》、《庄子》和旧本《辞海》，使我在狱中有机会再读《庄子》。

在狱中读《庄子》，我发现了全新的意义，《庄子》对于我，既是一种人生救助和精神实践，又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监狱和《庄子》使我懂得：生命的意义是在生死大限的拷问中吐露真实的。监狱曾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生死轮转的广阔背景下审度我的生的意义，《庄子》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消除过我的生的烦恼，并给我留下极其高深的生命智慧。更重要的是监狱和《庄子》教导我不要去相信任何他人的现实生活各种美妙的承诺，以自性的澄明去与宇宙和苦难命运抗争。在生死大限的严酷拷问中，使我对现世苦难有了深广的洞察以及对解脱苦难的方式有了确切的选择。

在逆境中，《庄子》哲学中有两点被我采纳并付诸于苦难的生活实践之中，其一是“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其二是“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一、“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

当右派之后本来就孤独。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投入监狱，作为政治犯，除了要服从武警、看守、公安、法院的管教和审问之外，还得接受号子内（囚室）的刑事犯的监视，在这种囚犯生活境况中，我已陷入绝对的孤独。我终日不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只能“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但是，这种孤独又是我获得精神自由、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在孤独中以《庄子》精神导游，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恢宏奇伟、瑰丽不朽的精神世界，因为从当右派开始了人生态度转变：为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解脱，寄沉痛于孤独，坐牢才使我在深刻认识现实的基础上开始追求超现实的人格独立的，但内心里总是充满着处世的忧患感。一进监狱便“入于寥天一”。从人生态度来看，这是一个彻底的遗世的孤独，似乎有点萨特式的单独的承担全部精神苦难的“绝对个体”，或者是近乎西齐弗式的荒谬。在孤独中逐步忘怀一切，产生种“坐忘”——“见独”——“朝彻”式的“心斋”体验，使我的精神与不可道不可名的“道”融为一体，心灵得到净化，因为狱墙一下子把功、名、利、禄等欲求彻底隔绝了。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记起人们曲解《庄子·大宗师》中“相濡以沫”的话的可憎，我才真正理解了“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话的沉痛内涵。

在顺境里曾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他评说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灌夫等坐牢的表现甚不以为然。太史公说：“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策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我认为这番话是他在为自己替叛徒李陵辩解所犯的过错辩护。等到我“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肤、受榜箠”，并亲眼看到囚犯们“见狱吏而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的样子，才明白“积威约之渐”、“积威约之势”、“安在其不辱也”的道理。进而认识到司马迁受腐刑之后，“所以隐忍苟活，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哲学是在《庄子》中学来的。“隐忍苟活”是“外曲”、“外化”，而“恨私心有所不尽”是“内直”、“内不化”。“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与“述往事，思来者”“垂空文以自见”统一起来就是“内直而外曲”、“外化而内不化”，就是真正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在生死大限的拷问中，司马迁为我的人生实践提供了榜样，他在《史记》中特别是在《报任安书》中对生命意义的广泛追寻，为我留下了正真坦荡的真与善的足迹。或许司马迁与我都从《庄子》的精神宝库中找到了某种适合自己的探索生命意义的武器。

在监狱里，我才认真思辨善与恶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回答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作为一种人生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践都包含着这样的真理：人对生命意义最高实在的追寻。记理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庄周贪生，司马迁怕死，在监狱里才感到他的话实在肤浅。一个无视生死大限的拷问的人，一个不去正视生命的时间内涵、价值轻重的人，一个对于死不辨泰山鸿毛的人，就必然会是一个蜉蝣般渺小而漂浮流宕于世流中的微生物。

在监狱里必须正视和回答严酷的现实对生命意义、生死大限的拷问。我在三年零八个月中，时时接受这种拷问。在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中，接受监狱代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拷问时，我每每想到《庄子》上的话。《人间世》篇专讲处世哲学，庄子借颜回要去卫国、孔子阻止的对话，以卫国暴政，卫君专横类如现实当权者专制残暴。颜回提出一套对付残暴专政的方法：“我内直而外曲”。并解释说：所谓“内直”就是和天（自然）同类，懂得自己和君主都属于天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人格方面是平等的。所谓“外曲”就是和人（社会群体）同类。例如执笏、长跪，鞠躬，这是人臣应做到的礼节。专制制度要求人们都这样做，我敢不做吗？庄子后学又在《知北游》篇中提出“外化而内不化”的说法，是对庄周的“内直而外曲”的处世哲学的阐发，特别提出“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的观点。“与物化者”就是司马迁说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承认和接受自然与社会组成的客观环境对自己生命的制约，只有随物应变，才不会逆来而受祸。“外化者”是“与物化”，“内不化”则是“一不化者”，即在与物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根本的东西（道）的不能变。

在监狱里必须“外曲”、“外化”即“随俗”才能生活下去。看守、武警“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而不可与他们“相刃相靡”。而对同号子的犯人表面上要随和，没有丝毫抵触不合，即“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大宗师》）每天早晚两次放风，每次十分钟，看守打开号门，犯人出门排成一列，有一个喊“报告班长（在高墙站岗的武警）我们解手？”这种角色经常由我担任。平时大小便都在号子里，“久入芝兰之室不闻其香”，号内臭气弥漫。我也象其它犯人一样，“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像《应帝王》里描写的泰氏睡时安闲舒缓，醒时逍遥自适。被提审出狱门要带手铐，我也习以为常；监狱长训话时要立正站着一二小时，哪怕是北风呼啸，零下十几度，我也能坚持；几年不洗澡，几个月不剪头，我也能忍受，逢年过节前要检查号子，进来一大批军警、狱吏、法官，将犯人的被褥衣物抛到院里的土地上，发现“违犯监规”者，“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虽然饥渴顿踣也能顺从。检查完毕，自己抱进被褥衣物，“则弛然而卧”“熙熙而乐”。一天两顿饭，一个半斤重的馒头，一碗（其实是小盆）萝卜菜，一缸子开水。刚吃完就觉得饿。遇到伙夫报复，在萝卜菜里多放超常的三十倍的盐，由于饥不择食，吃时狼吞虎咽，饭后奇渴难捱，为此，我和犯人者将自己的尿水洒到缸子里再喝掉以解渴。遇到同号子犯人违犯监规，带背铐子，不能吃饭，我得给他喂饭，并拿着他的生殖器帮他小便；他大便，我替他用土块擦屁股。在社会上不干的事，我在监狱里都干了。以上仅仅是略举一二事例，三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活就是靠“外曲”、“外化”的《庄子》两面处世哲学中的这一面渡过的。

我进监狱恰好是三十岁，虽然已到“而立之年”，但没有婚娶，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

要革命，早已和家庭断绝关系，当右派为了表示信仰坚定，更置饥寒交迫的父母、弟妹于不顾，（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对亲人那样残忍而留下终生恨与悔），所以进监狱没有什么牵挂。《庄子·天运》篇上讲过：“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新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是以道不渝。”我在监狱里无牵无挂，什么都忘掉了，不仅自己忘亲、忘天下，而且要让亲人和天下人忘掉我。这是坐牢生活里的一种彻底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以道不渝”——始终相信党和毛主席，我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我在监狱中恰如《大宗师》中女偶所说的悟道修持的过程，“吾犹守而告之，叁曰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我一进监狱就把生死置于度外，在没进监狱之前已把天下置于度外了，但并没完全忘我，有时不免“忧谄畏祸”。一进监狱，内心豁然明彻到了一种置生命于度外的“忘我”境界，似乎见到常人所不能见的大道。“道”——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寄于上述“外曲”、“外化”的随俗安命的事物中，对死无不欢送，对生无不欢迎，“中化”中的万物无不一面毁灭，无不一面生成。这就是《大宗师》里说的“樱宁”——道、信念是在生死的拷问后才形成的。

进到监狱里再来看社会上的事，会用另一种价值尺度。《人间世》上发生的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这些事物的变化，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叫“命运”的东西在支配着，而人们的智慧无法洞察它的开始和结束。一旦祸福穷通、生死毁誉这些在世间困扰的东西在监狱里被挣脱掉之后，社会上的一切变化都不足以搅乱我胸中的确和谐，也不让它侵入心灵的深处。譬喻说，1965年5月母亲与弟自几千里外的山东来看望我，西吉公安局领导不让见我。母亲哭着回山东。一个月后一位涉嫌贪污的商业局干部进大堡子（监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听了以后在内心埋怨母亲不该来。当时只想起《德充符》借孔子之口讲的一个小故事，孔子说，“我曾经出游到楚国，恰巧看到一群猪崽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瞬间它们惊讶地抛开母猪跑了。因为它们发现死母猪不会再看自己了，不能象活着的同类那样对待自己了。它们爱母亲，不是爱它的躯干体，而是爱主宰它躯体的精神。”我在当时已经“忘亲”了。但十天之后，我又象《大宗师》里的子桑那样若歌若哭的呼喊：“天乎！人乎！父母岂欲吾贫哉？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在监狱里仅仅靠“外曲”“外化”而安命随俗也难持久存活下去，因为常年关在黑窑洞里，见不到太阳，特别是饥饿难捱，在里边吃多少东西也觉得肚子饿。平心而论，西吉县监狱在六十年代对犯人的伙食还是比较重视的，数量不少，质量差些，但菜桶里还漂着油花，馒头还白而够半斤量的，就是这样，我也感到饥饿难堪，一般犯人熬不过，只有“自觉坦白交待”，争取早日判刑去劳改队，能见阳光能吃饱（？），一位姓陈的城关小学的教师，据说小学生揭发他在课上骂雷锋而歌颂蒋介石而被逮捕，在监狱里坐了三个月便将原来否认的“罪行”全部承认了，结果被判刑七年。而我在审问时“拒不坦白”，审问我的官员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见过硬骨头！在这里面，牛皮硬多用两把硝！押你三年看你承认不承认！”我的回答很简单：“你们可以押一万年！”一般犯人在号子里只有两件事，吃与睡，而我却坚持读书，读马列著作，增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读《老》、《庄》，寻找摆脱现实苦难的精神方法。

所以，我讲“外曲”、“外化”是以内心的独立人格为补充的。表面上的被动“曲”与“化”，内心里却要傲然独立以保持人格的高洁。我时常警告我自己，“监狱也是做人的地方，不能堕落、沉沦和颓唐！”这种独立人格是以孤傲为基本特征的。

我在监狱里始终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义正词严地拒绝“认罪”，公开向审问我的人声明：“我是革命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我不适应的！”刚进监狱不久，向一位张看守要纸

笔写材料，他认为我要交待问题，就给了。我借此写成《狱中上党中央和毛主席书》，结果张看守受到严厉批评，公安局长亲自提审我，怒不可遏，大骂一阵之后说：再不老实就上刑法。我说：“我看你这位小小的公安局长很可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懂《老子》上说的这句话，只骂：“坏家伙！你反动头顶！”我说：“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我，不能使我屈服！”他说：“我没有权力杀你的，但可以多关押你几年，让你皮肉受苦！”我说：“那好吧，我愿把牢底坐穿！”他最后骂了一名：“臭知识分子甭嘴硬！”就让看守送我回牢房。

二年后又是这位公安局长提审我，态度和缓而带有几分怜悯，说：“你能否多少承认点错误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放你出狱？”我的回答是：“我写诗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说反动只能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局长说：“不说反动，错误总有吧？”我回答说：“错误不是捉起来，带上镣铐审问说的，须要还一个地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认识的。”局长无言以对，只好说：“你不承认错误，长期在这儿（监狱里）待下去身体折磨坏了。”我回答：“还是二年前那句《老子》上说的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话到此结束，并获准戴眼镜，系裤带（在狱中不给囚犯腰带，怕自杀）。

这位局长前后态度的变化是有背景的，须要将当时的背景作一点简括的交待。

我被捕后不久，宁夏回族自治区举办“阶级斗争展览会”，我写的《呕血集》等被送往展览，摆在展览厅的一个显眼的位置上，大字标题为：“西海固地区匪首袁伯诚写的反动诗。”几位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其中一位姓杨，是组长）来参观采访展览会。他们翻看了我们诗集，问解说员是哪里鉴定的，解说员当然不知所云，说他们的一位负责人，公安厅某处处长在后边办公室里，可以去问他。记者们真的去采访这位处长，处长回答是固原行署公安处送来的，他也不知道是否经过有关部门鉴定过。记者，特别是那位有资望的杨记者建议说：“我们翻阅了这些诗篇，其中多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词语，摆在这儿展览不合适，效果会相反，翻看的人会问为什么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会是反动的？事后这位处长请示厅长，三天之后将我的诗从览厅撤掉，随即退还固原行署公安处，公安处退还西吉县公安局。这样公安局认为有必要送中央公安部鉴定。1965年末，中央鉴定下来了，抄录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65公文（字第 1163号）

宁夏西吉县公安局

八月二十四日公政字第 0 七九号函悉

关于袁伯诚所写《呕血集》等诗稿，经我们与有关部门审阅研究后，认为诗稿中有些政治性较强的诗，基本倾向是对的，有的还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有些诗小资产阶级情调较浓，但也看不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这部诗稿不宜作反动的结论。

特此函复

敬礼

一九六五年十月七日
公安部第六局（公章）

抄致：宁夏公安厅文保处
宁夏固原专署公安处

宁夏公安厅接到这份公函后，指示西吉公安局三点：一、立即放人，二、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三、恢复原工职，但固原公安处接到公函后，请示地委书记罗文玉，怎么办？罗批示错捉不能错放，可派人去西吉中学，搜集别的材料证明他还是有问题，逮捕他并没有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安局长提审我的。

在监狱中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中留下了 187 诗这也是“内直”、“内不化”的独立人格的体现，狱中没有笔和纸，为了把诗记录下来，我将自己穿的丝棉袄拆了，将丝棉捻成线，将衣领上的松紧扣取下来制做成针，用针与线在布片上绣字，用一年半的时间将写的诗全部绣在布上，除了我自绣以外，同号里一位叫王玉熙的县医院会计（因被指控贪污）也帮着绣诗，这些诗绣好后，又缝在一件棉衣里，准备让同号子临时关押的刑事案犯释放时带出去设法寄给党中央。后来被一位叫李文坛的商业局大库保管员（被指控贪污）告密，被公安局搜去，现在仍存在西吉县公安局档案里。这些诗可以说是我在监狱最能体现生命的意义的作品，是在生死大限的拷问中吐露的生命的真实，内容很广泛，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社会、宇宙、古代、当今等等方面，有所感、有所思，都以诗的形式记录下来。

在监狱里令人最讨厌的事是被逼迫、引诱揭发、检举别人。我在监狱里对那些在极左路线下深文周纳的阴谋勾当极其厌恶和警惕。我亲经建国后所有的政治运动，对那些阴谋阳谋一起搞的鬼魅伎俩早看穿了。一场场风暴，一件件冤案，从反胡风开始，而愈来愈广。就有那么一小撮人专看风向，承旨揭发批判别人，以出卖别人来立功受奖或求荣。卑劣的则以诬陷中伤落井下石为快事，屈从于权力者则往往以大势所迫来掩盖自己的卑琐。而搞政治运动的领导和积极分子也都深谙此道，充分地运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别人是认罪的开始”、“检举有功”、“老实交待包括个人和别人两个方面的内容”等口号、政策，鼓励某些品质恶劣的人出卖灵魂。我进监狱不久，西吉县的社教运动全面展开，所以经常有搞运动的人来提问我，让我检举揭发别人，有时指名道姓揭发谁，有时甚至拿别人揭发我的材料让我看，以换取我对此人的揭发，我对此只是轻蔑一笑，决不上当。有一次，一位提问我的人拍着桌子厉声说：“袁伯诚，人家都把刀子捅到你两肋上去了，你还讲什么仁义道德，不还击吗？”我的回答：“请原谅，你不能理解我把监狱也当成认真做人的地方。”从逆境中走过来，令我欣慰的是，我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给任何人写过材料，所以文革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没有人为给某人落实政策而找过我。我对那些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搞政治运动残酷整人而发迹者当然深恶痛绝，而那些经受不住压力、利诱、哄骗而捏造事实、歪曲事实或为保护自己而诬陷别人的没有骨头气节的人，我同样痛恨之。因为这种人破坏党的信誉，为害最烈。

在监狱里最能表达我“内直”的是唱叶挺在狱中写的《囚歌》。记不得谁为这首歌谱的曲子，我在 1963 年前后就学会唱的。进监狱后，我认为这首歌最能表达我是革命者拒绝交待“现行反革命罪行”的态度。当然唱这首歌，在革命监狱或人民监狱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有一次被叫出去受到严厉训斥，公安局的一位负责人说：“叶挺将军是在国民党监狱写的，你却在共产党监狱里唱，你不是在反共产党吗？真是反动透顶了！”我驳斥他说：“这首歌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气节，是千古不移的，它并不会因为时空的变换而改变自己的性质，你必须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是禁止唱的，因为这是一首革命的歌！”对方最后说：“好啦！知道你这臭知识分子嘴能辩！”

在监狱里生活近四年，之所以度过来而精神不垮，除了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外，就是“内直而外曲”的处世态度。这里包含了安命随俗与孤傲的独立人格两个方面。“外曲”是讲安然顺命，安然随顺外物（自然、社会、监狱、法庭）的一切变化，任何脱离和抗拒命运之必然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所以一切都应该因之任之。诚如司马迁所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他坐牢若“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外化”、“外曲”正是“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内直”或“内不化”，即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在万物纷纭变化之中不动心，才能做到面对死生巨变不变色，天塌地陷不在意，“内直”与“外曲”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外曲”（外化）是“内直”（内不化）的条件。而“内直”（内不化）是“外曲”（外化）的目的。因顺外物的自然变化是保证精神超然宁静的最好办法，是免除痛苦获得精神自由的重要条件。以我的人生处世体验去理解《庄子》的处世哲学，“内直”既是庄周保持独立人格实现精神自由的条件，也是他的独立人格精神自由的实质内容。我虽然自愧达不到庄周的境界，但我所处的时代与庄周生活的时代相比，哪个时代更自由些呢？这就是庄周可以当隐士而不与统治阶级合作，而我却办不到。我想，庄周能做到的，我也应该做到的是：在权力结构的笼罩下保持其人格的独立，避免沦为工具价值或市场价值，要从功、名、利、禄的网络中提升一级，保持其无欲则刚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

二、“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反右之后，对人生的体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东汉初窦融与隗嚣书中说的话：“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太过，以德取怨。”鸣放时期，帮助党整风，正是“忧之”太过而言之甚切，将以为德而反以取怨也”。反右之后，我的人生哲学发生重大转变，即由事业理想型转向逍遥无为型，从自身讲，这是由对现实生命的激烈反弹所引起的。我在反右之后，幻想通过生命的沉醉来抚慰在人生竞技场争斗中所造成的疲弊压抑的灵魂，实际上是“逃”向精神的避难所。庄子逃到“无”，陶渊明逃到田园，李白逃到月光下的小舟，而我逃到哪里去呢？大学毕业后逃到荒远的大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依然激烈，我发现庄子的“逍遥游”不是在思辨真理，而是在呼唤生命，眺望精神故乡。道不离物，日用伦常之间含有宇宙之大境界，精神家园就构筑在对感性具体的超越中。老子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而庄子则将它转化为心灵的境界，与人的关系扣得紧紧的。《逍遥游》最后的一大段是惠施与庄周的对话，主旨是讲“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反右运动以前对《逍遥游》中庄子与惠施对话的哲学寓意没有深入思考，仅仅同意明代高僧憨山大师说法。即与“逍遥”宏旨不相连的诙谐戏谑之文，所谓“无用之用”即若“至人以道自乐，是为余生养道之大用”而已。反右运动过后，我成了“中于机辟的”野猫子，开始羡慕庞然大物的犛牛，进而思考庄、惠对话的现实背景，认庄子看到他所处时代的人性异化的残酷现实。人生追求应世而有用，人性即被扭曲、异化、无用于世，则能保持人的主体心灵的自由淳真，为追求功名利禄而求有用，必然成为“待钩绳规矩而正者”，“待纆索胶漆而固者”，结果是“削其性”，“侵其德”，损害了自然之人性。《庄子·骈拇》篇就是讲的这种道理。鸣放期间，帮助党整风，那些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人恰是认为自己“有用”，有一种“舍我其谁予”的派头，中了儒、墨传文说教的毒太深。反右以后，我才相信老子说的话：“大道废，有仁义。”反右运动最大的功绩就是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仁义道德祸害之烈，正是这样由破坏自然纯朴之人性，进而破坏天下国家的，相演之后而成“文化大革命”，“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啊！我认为中国之反右运动是知识分子人性异化的开端，反右以后，读《庄子》正是因为看到人性异化，“使我感到有必须在老庄哲学的净水中洗染自己疲惫的心灵”，接受《庄子》的以无用为用之说。

反右运动之后，我真的成了“大瓠”、“大樗”，像清人宣颖解释“至人无己”那样，一切才能、学问、制作，到此都冰融雪释。人视其“缺然无用”，也恰恰“是由于我与大瓠大树相去无几何，”我的思想才从“正统”派革命者的体系中游离出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寻找另一种主义，“参乾坤，龠成物，方寸之际，浩浩落落，无有涯矣，”如是而乃为逍遥游也。

反右运动中以后国家对待右派分子的政策，正如惠子以有大瓠而至于困扰，因为原来想利用党内整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如惠子在盘算如何使大瓠为己所用：盛水浆不能（歌功颂德），为瓢又无所容（当驯服工具），又困于己无用而掊碎之。惠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所束缚，而大瓠已经受其害。同样道理，“大树”、“狸狌”、“斄牛”之喻，从正反两面说明对于身外之物抱着役使之心，则必然害物，而害物之结果亦必为它物害，相反，无役用之心，则物我皆得自由。

庄子在一般情况下是否定用“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事物的价值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谈有用，大瓠与大樗也有用，大瓠可“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大樗可以“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二者之用都是用于逍遥适性，即用来“乘道德而浮游”。不过这种“有用”是超功利性的。而我在反右之后被分配到大西北，可以说是到了“广漠之野”了，在中国母亲河——黄河的上游，刘家峡水库之滨，也可以说是“浮于江湖”了。到西北，我才明白《庄子》讲的以“无用为有用”的道理，它是以物各尽其性为前提的，我之所以被卷进反右运动，是以求功为前提的。从尽情，全生的视角看，在鸣放期间恰如“东西跳梁，不辟高下”的狸狌，而斄牛式的人物，在当时恰好相反，“物无害者”，不执着物对人是否有利，也许正因为他们在当时“无用”，才体现出后来的“大用”呢？也恰恰是樗树不中绳墨、规矩才免于遭砍伐之灾，它无用于世而为人们提供了彷徨逍遥的理想条件对国家当权派来说，可以在其下尽情地领略愚民政策的阴谋阳谋交替使用所创造出的至高无上的“逍遥”的“专政”境界。

反右运动之后，我才真正接受庄子“无功”的观点。“无功”并非否定一切功利。我经常记起《庄子·山木》篇中讲的两个小故事：大树与哑雁。这是两种看似矛盾实则辩证的事件，一是一棵枝叶茂密而又不成材料的大树，因其“无用”得保全天年，一是一只不能鸣叫的大雁却又因为不中用而遭宰杀。树与雁都“无用”，但他们的遭遇完全两样，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思。反右运动之后，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一问题：人生在世如树如雁，到底有用可以全生呢？还是无用可以全生呢？我思索庄周回答弟子们的话：“周处材与不材之间。”这话说得很玄妙，是一种模糊学，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把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材与不材”是很难界定的，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标准。庄子当然知道这种人生态度似是而非！仍“未免乎累”，不得不否定之。只有彻底摆脱人生之累才能免祸，什么是人生之累呢？就是名誉地位、财富权利，但这类“累”一般人是很难摆脱的。我当了右派之后，连“无誉无訾”都做不到，但遇事总是考虑“以无用为大用”与人相处，总是力争“处材与不材之间”。

1968年7月23日出狱。由固原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达文件由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席王自立（我的学生）将我保释，待西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再作正式处理。正如出来以后西吉中学群专组长马忠说的，我们还可以把你再送进去。但我心里明白，这是不可能事，因为我确实是无罪的。出监狱后，只剩下一颗被残酷人生揉碎了的心，前途茫然，反而忧愁起来。三十七岁的人，在人生的路上漫漫修远，我将怎样去求索？我感到自己必须以“无用为大用”，“处材与不材之间”去讨生活。

1968年7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年，学校、社会上派性斗争激烈，一切均处于瘫痪、混乱、无序之中，当时的景象诚如《庄子·齐物论》上所描述的：

大智的人阐明问题很广博，小智的人说明问题有条理。大言（说大话的）气势凌人，小言（说碎话的）喋喋不休。他们睡眠时精神交错，他们醒来时目开意悟。在他们相互接触中，整天勾心斗角。他们的发言，有的宽泛，有的深入，有的严谨。他们小恐时忐忑不安，大恐时失散魂落魄。他们发言如同飞箭，这就叫朝着对方要害攻击，评论是非。他们保留意见时，如同诅咒发誓一般，这就叫专门等待时机争取胜利。他们消沉时如同秋冬肃杀之气，说明他们日渐衰落下去；他们滞溺在行为当中，没有办法使他们恢复原状。他们厌倦世事窒息性灵，

可以说衰老到宁静的程度。他们心灵接近死亡，没办法使他们恢复元气。他们有时喜怒哀乐，有时忧虑感叹动于内而变其不动之心，有时轻佻放任表于外而为态骄傲；这些形态如音乐出孔窍（而无形），如地气蒸发成为菌（而无根）。这种情况日夜循环，但不知它们是从哪里产生的。算了吧，一旦获得了它，他们又会由此重生！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在当时铺天盖地，导致众人役役，迷失自我。纷争的造反各派都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齐是非，齐物我，真是“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争执、武斗的双方，“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各种势力的兴衰离合，瞬息成变，“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当时造反派的旗号繁多，“司令部”、“兵团”之类组织满天飞，有道是有枪就算草头王！所谓革命也不过就是一些派别胜利了，一些派别失败了，胜利者迫不及待进革委会抓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类。到了这个时候，人其实也就跟“人”没有多少关系了。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大吹大擂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还是就是捏准了利之所在往往趋之若鹜的道理，让那些以食为天的愚民们受驱使、受愚弄，好让他们安安份份美美滋滋地顺流当载舟之水吗？当时的野心家、阴谋家若不把“群众”立为天地之心，喊出“人民万岁”，所谓的“应乎人”就会导演出一种主义来。看来，人是永远不能摆脱那种做稳和做不稳奴隶的命运循环，这是历史！

在这样背景下，我怎么办？决定以“无用”、“不材”处斯世。出狱后的三个月内，对立的造反两派都曾争取我去做某一种事，我却一一谢绝，逍遥自处，安享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闭门读书，通过学生中造反派的领袖人物从学校图书馆拿出一套《资治通鉴》和《十三经注疏》，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三个月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我因不听从某造反派头头授意揭发原中学校长当时已沦为“走资派”的杨新民，而被群专起来，每次批斗会都得去陪场子。没有批斗会就得参加学校里规定的劳动，如种地、浇地、喂猪、放羊之类，这种劳动也颇逍遥，一大帮被群专的人在一起劳动，说说笑笑，聊以度日，而我稍有空闲即读书，这样度过了近四年的时日，最后一年搞基建，比较自由，在这四年中我读完《二十四史》与先秦诸子的著作，特别是前四史的研读下过很深的工夫。

1972年5月16日，中共固原地区常委会作出决定，形成正式文件下达西吉县委，宣布给我平反，恢复工职。当时的西吉中学的革委会某副主任认为我有学问也可利用，想留下教书，我拒绝了他的美意，坚持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要求调到离县城九十华里的兴隆中学去，在兴隆中学教书、读书，著书（写《司马迁与〈史记〉》、《李世民大传》等），颇逍遥自在，1974年，因为同校的山东老乡的外甥女考固原师范，我帮过忙，而这位老乡冲撞了兴隆公社党委一位管文教的书记杨希孔，把住通知书不给，我因此也受到牵连，这年暑假被罚调到离兴隆公社驻地三十里的山沟杨茂去教小学。我也安然去了，那里山大沟深，一所完全小学，三位教师六十名学生，因为早晚有狼群出没，我在这所学校里教全校《音乐》、二年级《算术》、五年级《语文》，大清闲了，在这里我有时间读书，读了大量的历史，文学典籍，重点是《汉书》与《史记》对读。在这种环境里无人打扰，三位教师轮流做饭，而我不会做，那两位都精于油盐柴米之术，做饭像“庖丁解牛”那样得心应手，但我也打下手，做粗活，相处和睦，所以能经常保持宁静和乐的心境，情愿游戏于污浊之中自快。可以说是在不幸的现实的地上幻化出了乐观主义的奇境。这种生活环境几乎与闹市隔绝，虽时有公社干部来视察工作，但有学校负责人应酬，我见他们点头而已。大约在这里教书一年多。为牛亦乐、为马亦安。化鸡亦乐，化弹亦安，我已看透了生死的区别，忘却了荣辱得失，超然自乐，悠闲放达。当时省上一位下放到杨茂蹲点的知识分子干部常来学校，他很欣赏我的旷达。

实际上我在杨茂教小学，安心随俗，是由于对客观生活的厌倦，对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反感，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希望，所以才逃到这割断自己与社会的一切联系的“乌何有之乡”

了。在这时我似乎忘却了任何人的存在（山东家乡的老母、弟弟、妹妹、西吉县的亲友），把自己托付给广大的自然，过一种超俗拔群，独与天地往来的生活，社会的严酷与个人的穷困使我感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人们只能安命随俗。在杨茂我时常想起《庄子·人间世》上的几句话：“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这并非滑头主义，也非是麻木不仁。当时的政治气氛，无论进还是退，对我来说，都有“危国”、“危身”之虞，若要有所作为，则“必死于暴人之前”，正像《庄子》说的：“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正是由于我在那时“无用”而“闲置”起来如“散木”，所以，我不管对什么都“和而不同”、“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也能过一种“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的生活。

在去杨茂大队小学之前，兴隆公社书记于志刚找我谈话，说调我去的原因是那里将来要办一所戴帽中学，那里是纯回族聚居地区，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公社党委决定派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去，所以选中你……云云。当我听罢，忽然想起《庄子·达生》篇上的一个寓言：

祭祀官穿着礼服来到猪圈前，对猪说：“你为什么怕死呢？我要凑巧豢养你三个月，十天作戒，天天作斋，（等你死后）垫上白茅，把你的肩臀放在雕刻花纹的祭盘里，你愿这样吗？”

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誉为“臭老九”，与猪圈里的猪之气味相差几何？当然，我当时更是臭气薰天了。我不动声色，不作解释，没有要求，不讲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调动决定”了。诚如评论家所言，为猪着想，不如用糟糠来饲养，圈在猪栏里，这与我当时刚结婚，不如圈在兴隆中学这所猪圈里，吃点糟糠也还可以苟活，但是，做公社书记，为自己着想，如果能有荣华富贵，死后放在彩饰的柩车上和棺槨中也愿意这样做。如果，站在我的立场上，为猪着想，不要那白茅雕俎，这与那般公社书记之类的价值观是判然有别的，他们就是生要轩冕，死要棺槨，那么逻辑推理所得的结论，他们和猪有什么不同呢？本来庄子早就说过：“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译文：那些凭智巧角力的人，开始明来明去，后来使用秘密的办法，太过了，使用阴谋诡计）。

由于对“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活学活用”不够，接到调往“无何有之乡”的杨茂去的调令之后，思想不通，这可能是自小受鲁文化薰染太深，山东人的劣根性又在此事表现出来了，很像《达生》篇上的鲁人“孙休者踵门而诘子扁庆子”（也是鲁人）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

我居住在乡里没有名声，说来不够好。面临危难而不站出来，可以说不够勇敢。然而，我在田原耕耘却没有好收成，在朝廷效劳也遇不上圣君，又遭到乡里的摈弃，被州县长官放逐，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遭到这种危运？

这实际上还执着于“有用”，没有看破生死，扬弃名位。临去杨茂之前，到县上去向一位朋友孙熙雍——诉说，他对我说了些宽慰的话，我们杯酒相对，彻夜相叙。回到兴隆公社之后，翻开《庄子》，啊呀！我的这位朋友说的话和鲁人扁庆子对孙休说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两位古今智者在教我“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思想豁然通达，杨茂对于我实在是个好地方。到杨茂小学去的精神上有了准备，这就是忘掉自己的心肝和耳目，茫茫然彷徨于尘世之外，逍遥自得于无所事事之中，虽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对小学的教学有所补益而不以主宰者自诩。去的最大追求是美化自己的心智促使愚童醒悟，修养身心把他人污浊的东西显露出来，“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能够保全了自己的身躯，避免了各种祸患，还算属于人的行列，太幸运了，哪来及怨天呢！

杨茂位于兴隆镇东三十华里处，即距好水河支流入葫芦河口处约二十多华里处。公元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二月西夏军在此伏击宋军，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好水之战”。杨茂曾经是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的古战场。当年西夏军队从折董（今宁夏同心预旺东进发）沿瓦亭川（今宁夏葫芦河）南下，进抵好水川。将主力伏于川口（今

隆德县的杨何到西吉县兴隆一带)，遣一部兵力远出，诱宋军入伏击圈。宋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闻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经怀远城，得胜寨（今宁夏西吉东南）抵羊牧隆城（今西吉东南隆德堡），出夏军之后，伺机进击。任福等进军途中，得知都巡检常折与夏军占于张义堡（今固原西南），遂转道南进（沿今西吉将台、马莲川）急趋交战地。夏军佯败，任福和都监桑恠，铃辖朱观，都监武英等悉力奔逐，相约会兵好水川口，合击夏军。十二月，任福、桑恠部至羊牧隆城东，见道旁有银泥盒数个，将盒打开，百余只带哨家鸽飞出，为夏军发出合击信号。于是伏于好水川口的主力出动，纵铁骑冲突，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奇袭，激战多时，宋军大败，任福、桑恠战死。同日，朱观、武英部进至笼络川（今隆德西北什字路河）口，亦陷夏军重围。武英等战死，唯朱观率千余人还。夏军获胜后闻宋环庆、秦凤路兵来援，遂回师。西夏军的行动路线恰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到宁夏后的行军路线。

而现在这里是一条异常寂寥的山沟，从沟口王沟上溯——杨茂——马家嘴（西吉县界）——杨河——好水——隆德县，好水川支流从中流过，川的最宽处不过五百米，窄处则不过百米。而杨茂算是百户的大村，背靠大山，面临川水，这是纯回族聚居地区，农耕兼放牧，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这儿处在半封闭的人文、生态环境里，充满着一种少数民族特有的原始古朴的风习。回族中多数老年人在冬季穿光板老羊皮袄，睡少席的土炕，喝浓烈的用瓦罐煮成的砖块茶。烧的是牛羊的粪便，民族的显著标志是一顶圆形的白帽，他们都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明里暗里做礼拜、念经，即使青年一代虽然跟着时流走，但民族意识也很强烈。从物质文明视角看，这儿比我原先教书的兴隆镇相差半个世纪，而西吉县比宁夏首府银川相差半个世纪，而银川又比北京、上海相差一个世纪。这儿就是《庄子》上所描述的“至德之世”，人们“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生）”哪里知道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人们睁开眼看到的是山，冬天光秃的，夏天则葱绿，山上没有小径、通道，水上没有桥梁，万物丛生，居处相连；禽兽成群，草木茂盛，真是“禽兽可係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闕”这儿的回族人都是非常真朴，如《庄子》说的“其行填填，其视颠颠”（行走时悠闲徐缓，视线专一不二）（《马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应帝王》）“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山林》），“织而衣，耕而食”（《马蹄》）“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胠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的而心意自得”（《让王》）。总之，本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这里虽然已经“人民公社化”，但古风未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这儿并没有引起天翻地覆地变化。文革期间，三十外的兴隆镇已是“乱天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昆虫）”（《在宥》）的动乱世界，更不要说造反派“喜怒相短，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的北京、上海等文明之世了。外面“天下脊脊大乱”，而达深山里，却没有武斗，打砸抢，依然是自耕自食，生活俭朴，自然恬静，精神自由自在的理想国。

我到杨茂的第一个印象是它有“原始时代的那种淳朴的景象”，“这是纯粹出于上帝之手的一片美丽的山光壑色”，它保留了原始时代的某些痕迹而显得特别恬静、和谐与幽美。我立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反思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张扬贪欲的运动吗？有贪欲而天下难足，无渊静而百姓难定啊！

我所任教的杨茂小学座落在一所废除的清真寺旁边。半亩校园，三个老师，六十名学生吃水到河里去担，自己做饭。由于是半牧区，牛羊特别多，春初吃羊羔肉，秋冬吃烤羊肉，宰倒一只七八十斤，三人吃不了分些带回家。（都在兴隆镇居住）在这儿，过于明察，过于聪者，过于雄辩者都用不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过分明察的，会混淆五色，分不清文采；听觉过分敏锐者，会混乱五声，沉溺于六律。三人虽然可以为“众”，“三人行虽然必有我师焉”，但我们之间，用不着在仁义上节外生枝的标榜自己的道德，蔽塞自己的性情来沽名钓

誉。当然也用不上“文革”中的“四大”，想想外边正在兴时的风派人物，叠词如累瓦，连意如结绳，点窜文句，潜心于坚白异同之间，拍着胸脯高叫革命，岂不是劳神费力争一时权势而争执一堆废话？既不需要愁眉苦脸忧虑世间的祸患（“蒿日而忧世之患”）也不肯使本性败坏而追逐荣华富贵（“决性命之情而饕食贵富”）（《骈拇》）。

在杨茂小学能引起我的哲学思辩的有两种事，一是隔壁清真寺的一棵老槐树和学校背后山腰间的一棵老杨树。一是两面山坡上的牛羊群。

清真寺做为生产队的仓库，门虽设而常关，异常空寂。唯有院内的老槐树枝叶茂盛，尚有不屈的顶天立地之气概。由于独立僻处，“春夏亡所争荣，秋冬已不见其摇落”，质朴无华，清韵过人，我刚到学校之初，熟悉周围环境，就被这老槐树深深吸引住了，问一当地八十九岁老翁，云此树已有九百年的寿命，“吁嗟空山万古一遗踪，颓如名将老龙钟”。老槐树的一根修长的粗枝伸到校园内，罩住我的居室窗前，每当傍晚，我一个独坐窗前，但有风吹，恍惚间一阵阵清越的琴声缭绕耳际，自然引起我的心灵的回响共鸣，这时，“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大宗师》）？如在“天风泠然露如洒”的氛围中，颇有不知斯世何世的超越之感。当地人称之为“真主”栽的“神树”，此树若枯死，川里人将死绝。1965年社教运动中，一位极左的公社干部主张伐掉此树以破除迷信，终于没有达到目的。据说村里秘密串连起十位七十岁的老人“献身护树”，若伐树即随树而去，由是这棵老槐树得以保存住。当然，我也有幸能寝馈其下。这棵老槐树由于生长在清真寺里，而“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但对于我，却被其恩泽，曾有一年多的时间，“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

由这棵老槐树联想到《庄子·人间世》篇上的一则寓言：

有一个名叫石的木匠往齐国去，路过曲辕看见一棵供社祀用的栎树，这棵树非常高大，它可以供几千头牛遮荫，树干上百围粗，树干高达山顶，好几丈以上才生树条，可以用来造船的旁枝就有几十根，观察的人群就像集市一样多，匠石则不瞧一眼，直往前走。

他的弟子饱尝了眼福，追上匠石问道“自从我拿起斧子跟师傅学艺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木材。师傅不肯看一眼，直往前走，这是什么原因呢？”

匠石回答：“得了吧，不要再说了！那是无用的散木。用它造船就会很快沉没；用它做棺椁就很快会腐烂；用它做器具就很快会折毁；用它做门窗就会流污浆；用它做房柱就会被虫蛀。这是不成材的木头。因为毫无用处，所以它才这样长寿。”

《庄子·人间世》中的社树就是我眼里的清真寺的老槐树。古人以“栎树为土神而祀之”，当地回民祀老槐树以为神圣。而我当时的处境犹如社树与老槐树，每当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我独坐窗前，掩卷沉思，如梦似幻，似听到栎树和老槐树在与匠石进行大辩论，甚至看到两位白发古稀者在寺院墙贴大字报，他们的话语清晰，声声入耳，他们的大字报也历历可观，似乎在说：

做为木匠你要用什么东西和我相比呢？要拿文木和我比吗？那些楂梨桔柚等结果的树，果子熟了就遭剥落，剥落后就被扭折，结果大枝被折断，小枝被扭下。这是由于它们能结果（有用）而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它们不能享尽天赋的寿命而中途夭折。这都是自己显露有用招来世俗的打击。万物没有不是这样的。我追求无所可用已经很久了，几乎要被砍死，到现在才保全了自己，这对我正是大用。假使我有用，我还能长得这么大吗？你是几乎要死的散人，又怎能知道散木呢？

听了这番精僻的议论，感到振聋发聩，顿悟“处昏相乱世”的做人之理。猛然醒来，真不知袁某作梦化为栎树，槐树呢？还是槐栎作梦化为袁某呢？总觉余音绕耳，不知我在梦中发出的心声，还是栎槐在警示于我？

是啊！栌树不过寄托于社神，老槐树也不过寄托于清真寺，以至被不了解自己的人辱骂，假使它们不做社（寺）树，十有八九要被砍伐了。杨茂小学犹如社寺，是我寄身的地方。才有有用者“以其能苦其生”，遭斧斤之患，而全生远害在于以无用为大用。《人间世》中还写到商丘大木都以无用而保其天年。“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不材”与“无用”可以不被人役使，不沦于工具价值。这与《逍遥游》里的“大樗”，《山木》里的“大木”，不遭斤斧之害而求“无所可用”，具有相同的寓意。相反“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的命运与这些“散木”的命运截然不同。“楸柏桑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树之患也”！有材有用者处于一个权谋狡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人间世，只能以无用为大用啊！

在杨茂小学教书期间，我本来是教高中语文的，堂堂正正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但我不能教五、六年级语文而让给一位青年教师教。“速阴速阳，无伤吾足”！（路途上荆棘行行，但对我行走无伤）我常常记起《人间世》结尾的几句话：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刚到杨茂那天，站在校园里一眼就看到北山半腰那棵孤零零的白杨树，一座千仞高的黄土山只有这么一棵树，我感到奇怪，我问校长，他虽然到这儿二年多，便对这棵神奇的树却不知所云。不久，大队支书来学校，我问他，他也语焉不详。后来问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阿訇，他风闻我是被罚下来的“大儒”（当时正在“批林”批孔批周公我被目为反动学术权威）才对我讲了这棵白杨树的来历。撮其梗概是说，清代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将陕西的回民驱赶到这儿，抓到一位反抗清政府的回族首领，在这座山上杀害了，在砍头挖心之后，血流在一个斗大的土坑里，三日渗不下去。清兵走后，举行殡丧仪式，一位新疆喀什来的阿訇在血坑里插上一根杨树枝，后来竟然成活为一棵树，说也奇怪，这棵树牛羊不啃，驴马不扰，飓风不折，雷闪不露，秋天霜来，川里的白杨树其黄而陨，而它的叶子却变得血红，经冬不落，开春时叶落芽萌，欣欣生意先于川树半个月。

阿訇老人讲得很神秘，并再三嘱咐我不能对外人道也，因为在社教运动中一位不识时务者讲了这棵树的来历，被以“煽动民族仇恨情绪为叛乱分子张本”的罪名管制起来。

虽然每天仰头可以看到这棵白杨树，却无缘到它跟前去。一是山高，“道阻且长”；一是怕引起监视者的疑心，怀疑我乱说乱动，图谋不轨。但是，我每天站在校园里遥遥相望，心里总是产生某种感应，也总是记起，甚至口中念念有词：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处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

我揣想庄公当年的思想境界，所谓“乘道德而浮游”、“与时俱化”云云，告诫门“弟子志之”者，当你“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的人生尴尬境地的时候，唯有将心思从物欲竞逐、斗争纠结的现实生活提升到理想的境里，以卫护自己的精神自由而免于沦为工具价值的奴隶地位。

兴隆公社的一位武装干部来杨茂蹲点，和我谈起，得知他与我都是当兵出身，我是1950年参加军干校的兵，他是1964年服兵役征的兵，由于都曾经是“赳赳武夫”，他对我少有戒惧之心，阶级界限划得不那么清，常约我同去山上打猎（他与大队民兵营长都有枪），有一次我提出上北山去，他虽然说此山无猎物只有狼群，但还是同意了，于是呼来三五民兵从学校背后登山了。他们上山如履平川，轻捷如飞，真是龙腾虎跃，而我却“难于上青天”了。待我到大树跟前，他们发现猎物已追到山顶，转眼不见人影了。这时大树对我有用了，我“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白杨树与我都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白杨树“不夭斤斧”，我“无所可用”，二者都又“物无害者。”也只有坐在白杨树下喘息、冥思、玄览，

才无所困苦。

古树一株，参天独立。我在其下彷徨、逍遥、仰首遥望远处春山和落日余辉，徘徊沉吟，不忍离去。我蓦然想起明清之际的画家项圣谟（1597-1658）画的《大树风号图》，并记得他在画的右上角上自题的七言绝句一首：

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

我想此时何得项圣谟式的画家，画出我在杨茂山上白杨树下的沉郁、孤寂、凄怆的思绪。

《大树风号图》中的形象一如我眼前这棵老杨树的形象，或者说，画中之树幻化成眼前之树，我与项圣谟千古同心了。古今老树，独立空旷的山野之上，它阅尽人间沧桑，饱经世上寒暑风雨。“仰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树叶虽经霜雪摧雕，飘零罄尽，但硕大的躯干，繁密的枝条，却顽强地傲然挺立，展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气节。这是一种真实的人格写照。是项圣谟，还是那位被左宗棠杀害的回族叛逆英雄？

据中国绘史专家鉴定，《大树风号图》大约作于清顺治六年（1694年）前后。上距清兵入关，明朝覆亡仅有四五年时间，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屠戮扬州十日之后，于阴历闰六月攻破项圣谟的老家嘉兴府城，项圣谟的堂兄前明蓟守备项嘉谟，带着两个儿子和一妾跳城内天心湖殉节。项圣谟家遭到清兵洗劫，他祖父所遗留给他们兄弟的古代法书名画，被焚毁或被掠走，项圣谟在战火中仓皇背着他的老母亲，携带着妻和子出逃，而对国破家残，项圣谟难以抑制住满腔的悲愤，尤其是异族的残酷统治，更增加了他对故国的缅怀，时常倾泻于诗画，《大树风号图》中的树下一老丈拄杖背向而立，而远景是隐约的青山，落日余辉，无不把人带向遥远的过去，苍凉中所透露出的孤寂，令我想到那被残杀的回族首领。同治元年（1862）5月，陕西回族首领洪兴、任武和赫明堂等阿訇，组成十八大营，控制渭河西岸，起义抗清，1863年清派兵入陕镇压，回族军被迫退往甘肃。1868年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率部西上镇压，经过十二年的血与火的搏斗，西北回族起义失败了。1869年6月，左宗棠率兵进军甘肃，命提督雷正綰等率部由平凉、固原北进，兵锋直指回族起义军的重要基地金积堡（在今宁夏吴忠市）。战争反复多次，在杨茂被杀害的回族起义首领当在1869-1871年之间。据当地回族老年人说，左宗棠的清兵所到之处，见回族就杀，一个不留，其凶残令人发指。

我在老杨树下，抚今追昔，对这位壮烈牺牲的民族英雄表示无限期崇敬。是啊，“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庾信《哀江南赋》）

在杨茂闲暇的时间非常多，教书、读书之外，就是沉思冥想，而在校园踱步也成为我必修的功课。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抬头总能看到山上的牛羊群，听到嘹亮的充满原始活力的西北“花儿”。偶尔产生“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君子于役”的情思，想到娇妻在兴隆镇伴着刚出生的女儿在盼我归去的情景。而经常思辩的是牛羊与牧羊人的自由自在的自然情趣。小时候听母亲讲伯乐相马的故事，反右运动以前也常以“乘骐驎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的骐驎自况，希望自己在驰骋时能遇到伯乐。现在谪居杨茂，时常见到牛羊马驴“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摩，怒则分指相踢。”诚然，“马（包括牛羊等在山上放牧的所有牲畜），蹄可以践霜露，毛可以御风寒，龄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高台大殿）无所用之。”这儿没有伯乐，牲畜自由自在，依常性而生活。与这儿的马牛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贺兰山军马场。刚到银川不久，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人事局组织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参观宁夏胜迹，我附骥尾而有幸参观以养马驯马闻名全国的兰州军区贺兰军马场，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儿从场长到驯马员——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伯乐。他们头上都贴着一个无形的广告：“我善治马。”为了改造马的“野性”（庄子曰“天放”），他们实行

用铁烧它，剪它的毛，削它的蹄，烙上印记戴上笼头和绊脚，用绳索把它们连在一起，编入马槽；然后，有意将马饿着、渴着，并让他们不停地奔驰、奔跑。训练修饰，整齐步伐，先有口衔镫嚼的祸害，而后有皮鞭竹筴的威胁，特别是那些驾到车辕里的马，等到加上车衡颈轭，装上了额前佩饰，马就意识到自己失了自由而反抗，回颈把轭摆脱，抵触车盖，吐出嚼子，咬坏缰绳。我看到马由于失去自由而拼命反抗，由反抗而生出的智慧——本性被扭曲的奸诈象强盗一样，在杨茂山上是看不到的。贺兰山军马场的马群遭受“檄饰之患”，“鞭策之威”是“伯乐之罪也”。

我经常由山上的马牛想到文革中的人。我被抓进监狱里，固然是应该“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连之以羈繫，编之以皂栈，马之死地得十二三矣”！而那些在外“陆居”的臭知识分子，蹲牛棚，挨批斗，戴高帽、挂木牌游街，坐土飞机，抽钢鞭，被无产阶级专政之后，“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檄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死者过半矣”！

在杨茂才真正弄懂“何谓天？何谓人？”这样的哲学中的大问题，时常看到山坡上的牛羊之群，便想到《庄子·秋水》篇上的话：“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马头被羈勒，牛鼻被贯穿，便失去天真的本性，当然就是失去自己。我的形骸已“破落（络）”，我的精神已被“穿”，在以人灭天的时代，何得“反其真”呢？

到杨茂的第二年（1976年）春天，将寄居在兴隆中学的妻子和小女儿（才一岁）安置好水河川口的王沟生产大队的张家堡的一座废弃的清真寺里，这样总算“安居乐业”了，不觉暑假已到。正当我“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的时候，西吉县文教局下一纸调令，将我调往县西北的白崖公社中学去任教，表面上是“政常性”的工作调动，实际上隐含着不同意兴隆公社党委把我从中学调往小学的做法，这也算是落实政策。白崖与兴隆相距130华里，一在西北天之涯，一在东南地之角。妻子在生产劳动，小女嗷嗷待哺，怎么办？县文教局“落实政策”的好心却给我制造了一重困难。但“我知道自己寄形于天地，享受阴阳二气，我在天地之间，就象小石、小树在大山上一般渺小”，不管从哪里刮来一阵风都可以吹去。在“灭文章，散五彩”的时代，我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过去的岁月不可强留，未来的时光永无休止，阴灭阳生，夏盈冬虚，终结了又开始。“一粟”的生长，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做什么不做什么，安而任之，必自变化。我将要离开杨茂，像一粒砂子被抛落到百里之外的白崖去也是“大义之方”，“万物之理”的一种“自化”。去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后期，“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只有服从而别无选择。服从调动，才是“缘督以为经”的生存方式。看到事物有盈有亏的道理，经历过种种人生苦难后的回眸，我在当时已经能做到，有所获得并不欢喜，失掉什么并不忧愁，知道得失是有一定的。懂得人生道路有急有缓有高有低，不管是谁，都要走一段坎坷崎岖不平的人生之路。对于我来说，走出监狱之门时，已经了悟人生之路，活着不感到高兴，死了不感到祸患，确认命运本来没有不变的，像刘少奇这样当过共和国主席的大人物，一会儿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内二号人物，一会儿若骤若驰即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像林彪这号人物，在党的九大被写入党章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会儿又仓皇出逃而成为叛国集团的头子。由此看来，又怎么能知道天地足以穷尽最大的领域呢？

但是，杨茂这个小山沟里的“马蹄”都令我十分留恋，因为它是读《庄》的理想境地，也是我读《庄》进入“境界”、收获最大的时期。或者说我在杨茂才真正进入庄子的“天人”境界和佛教华严宗之圆融境界。那种与造物者游，外生死，无终始，宏大而辟，深宏而肆，调适上遂，应于化解于物，其理不竭，其来不蜕的“天人”境界。当然，我在杨茂的精神境界也有超出《庄子》“天人”、佛教“出出世一乘法”的境界，应该说，我在应物的变化、“与世偕行而不替”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消极的“无为”，而是经由主体的自觉努力，把道德理性内在化，使个性合于道德性，以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主体性”，以挺立自己。

1976年8月27日骑自行车带着铺盖日用品，到县上文教局办理“行政”手续。28日，与两位去白崖公社的小学教师结伴南行，出县城而南至下寨北，东行三十里至下堡川口，翻越两重高山，至白崖川。疾行至中午直达目的地，暂住白崖中学，因校长出差，暂时不能分配工作。当然，县文教局对白崖公社文教专干有明确交待：我是去教高中的，等了三五天，熟悉了解当地情况，得知下堡小学今年招收一初中班，我萌生了想去下堡的念头，为什么要去下堡？当时考虑，此地离公社远，离县上也比较远，但又在固原至西吉县的公路旁，看起来偏僻，实际上交通方便。骑自行车沿川西去至下寨南折到兴隆六十华里，与在白崖相比，近四十华里，少翻两座山。偏僻，天高皇帝远，自由多些，比在公社跟前方便多了，可以少一层监视。这正是我隐于狗屠，函土粪而不辞的去处。再说娇妻爱女扔在兴隆张家堡子，悬念不下，要经常回去，在下堡大队就方便多了。经过沉思之后毅然作出决定：向公社党委提出请求去下堡！先说通教育专干，再去见管文教的公社马书记，此人有一面之识，73年冬，奉县革委会政治处之命赴白崖，帮助公社总结一份典型材料，在该公社住了半个月，由马书记带我去白崖大小队搜集材料，由此相识，他对我印象远不差，可以说在保持一定的政治立场的距离的前提下，还是友好的。因为，一方面他希望我在摇笔杆子时能多替公社说好话，写出他们公社党委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我坚持“外曲”、“外化”而表现得顺从、谦恭，时刻牢记《庄子·人间世》篇中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我内直而外曲”“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马书记经常不在公社里，经过多次探询，在一个晚上见到他，说一说自己的家庭困难，恳请去下堡大队小学，马书记答应与教育专干协商。二天后接到通知，当天卷起铺盖匆匆上道，怕白崖中学的校长周长庚回来挡住。周与我大文革前就认识，原为西吉县西二十里袁河公社小学校长，上海人，此人颇有事业心，虽然政治上属左派，但办学认真。

下堡小学校长是赵生瑶，58年西吉县初师毕业，长期在新营公社教书，写一笔好字，善于应酬上级领导，在那种政治氛围中对我还过得去。分配我教初一、小学五年级语文，初一外语。学校不开灶，为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五六个教师在社员家吃饭，由大队、小队指派，有时吃一顿饭要走七八里，或翻山或过河。当地是纯回族聚居区，为人厚道淳朴，虽穷困，但管饭则尽量给白面吃。在汉族聚居区流传的“老回回的饭吃得，老回回的话听不得”的话并不真实，我的印象是：饭也吃得话也听得。是中国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也是为了民放生存而斗争历尽苦难的民族。

在下堡小学最大的收获是精读了《前四史》、《读通鉴论》、《日知录》等名著。大约半个月回兴隆家里一次，最多来去三天。有时间就读古书，也无人干涉，读书是最大的乐趣。

记得有一次西吉县委副书记胡启立（赵紫阳当总书记时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文革后期贬谪西吉县工作）在公社书记、社长陪同下来下堡，到学校来视察，我正在卧室读《汉书》，看到许多人涌进校园来，有自己认识的公社、大队干部，心里想是来视察工作的，自己最好躲在屋里不出去。但一会儿赵校长来叫我到办公室。进门，胡启立说：“这是西吉县的大儒！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不知哪一位半开玩笑说：“是儒就该批判嘛！”胡启立笑着解释说：“唉？我说儒是知识分子，袁老师是我们西吉县的大知识分子，我还请他在县上编过《儒法斗争史》，怎么能批他呢？他在批孔批林，有贡献嘛！”我当时很尴尬。

应酬一阵子就退出去，回到自己的蜗室，想这位幽雅清秀、风姿卓然的县委副书记，时下也处在“材与不材之间”，不得不“外曲而内直”。据传闻他在西吉县委说话无人听，第一书记马德荣把他不当一会事，一些资历深的科级干部都比他有权威性，但他做事兢兢业业，不以谪贬而自惭。每见到他，便想起《庄子·人间世》中颜回的形象，“端而虚，勉而一”的作风赢得一般人的好评，恰是由于他“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当时正是文革后期，“道不欲杂”，一切都统一于毛泽东思想。当时的胡启立“所有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况且在当时，“德之崩溃智之横出”，在打倒一切，破坏一切的思潮与行为中已经都是

凶器。“德”的崩溃是由于求“名”——“天下老子最革命”，“是马克思、列宁的嫡派”，“智”的横出是由于争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狂热的个人崇拜、残酷武斗，疯狂迫害同志都是为争胜。这样，文革中的“名”是人们闹派性互相倾轧的根源，“智”便成为互相斗争的工具。胡启立在西吉县留下了美好的名声，恰恰是由于他“外曲而内直”的“不争”，因为他相信列宁的一名话：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一个痞子也会成为群众的领袖。

在白崖公社下堡小学教书半年。冬天，去县上见到当时的组织部长海生云，由他出面向文教局长郭茂权交涉，将我调往将台公社中学。大约是1976年12月初将调动手续办妥，回到兴隆王沟家里，与娇妻小女相伴渡过春节，春节开学去往将台中学报到，教高中二个班的语文，直到1978年秋天，调往宁夏固原师专，我的生活发生了新的转折。

1978年，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长徐大琛复职之后，到宁夏南部山区视察工作，到西吉县后，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便指示西吉县文教局长郭茂权：此人拟调宁夏大学或即将筹划成立的固原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你们不能阻挡，我对你们县委管教育的书记已经说了。徐大琛厅长直接来将台中学找我面谈。让我自己选择去宁大还是去师专。当时考虑到妻子儿女在农村生产队，需要照顾，我便决定去距家近的固原师专。

当我作出这种决定时，就意味着我读《庄》从此开始变调了。这是一种痛楚。正如《庄子·秋火》篇上孔子说的：“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徐大琛来将台，也使我想起“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的寓言故事。我虽然没有受到“愿以境内累矣”的抬举，便从此“宁生而尾涂中”的生活结束了，走上了“宁其死为留骨而贵”的“学者”道路。可悲也夫！可痛也夫！本来在逆境中，我时常从庄子的理想人格与实践人格中汲取精神力量，每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关于庄子事迹的记述，总是热泪纵横，不能自己。经常铭记庄子的警策：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在西吉县的杨茂、下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吾曳尾于涂中”，是“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吾志焉。”虽如“陷井之蛙”、“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跬陷井之乐此亦至矣。”厅长来将台告我进高等学院的消息有如“东海之鳖”告诉“陷井之蛙”“东海之大乐也”。我听了之后，确实“适适然惊，规规然有失矣。”从此，我便背叛庄子，抛弃他的人生哲学，扭曲了篡改了他的学说。

先秦时代的儒道孔老，虽然在人生哲学上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他们都力图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庄子胜于老孔之处，在于他在不否定现世人生的基础上，力求超越常态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达到与道相通的理想境界，把他所认为已经扭曲了的生存方式矫正过来，并在认识论和宇宙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顺物自然”的人生哲学。庄子所充当的社会批判和救世拯溺的角色，虽不能完全与统治者相分裂，不得不与环境相妥协，在精神世界中再适适然于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虽然不能成功，然而毕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良知。

在西吉读《庄》是为了生存，为了解决自己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可以说，读《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求生存的一种方式。当我进入高校把《庄子》作为“学术”去进行研究，我开始了大规模地传授《庄》学知识，批量地复制《庄》学知识，这样，在学术的神圣幌子下，无情地腐蚀、阉割《庄》学的个性灵魂。正像从“民间思想村落”走出来的学者那样，“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我从西吉县到固原师专十年，再到青岛师专八年，所走的道路正是：“民间思想村落”

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同时，我也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所吞噬。被高高低低地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特别是我对庄子与司马迁的研究，西吉县时代的“我”由于功名利禄的腐蚀而失踪了，历史实在残酷。正如《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寻人启事”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十年以前，我有问题，却苦于无学理；十年以后学会摆弄学理，却又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正是有了身份，却失去自己。我自觉惭愧，当我坐在青岛寓所的书斋里沉思时，我想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宁夏，最后还值得怀念的又是什么呢？精神生命已经死亡，而赋予我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黄土依然生气勃勃，充满原始的力。在宁夏西吉县，“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正如歌德所说的，“这是我的烦恼。”逝者如斯夫，在西吉县读《庄》至今留下些什么？……

三、苦难的岁月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这是我至今还没有思辩清楚的问题，我想有几点是可以说基本上清楚了。

首先，反右以后，我在拯救与逍遥的人生悖论中走向庄子。

1957 年末，北师大不放寒假，说要继续搞批判右派，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元旦之夜，班里也没有多少欢乐性的活动，我已感到孤独、压抑，整个夜晚是在四班一个熟悉的宿舍度过的。元旦刚过，年级党支部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始也让我参加。元月 17 日早晨去教育楼教室参加学习，突然党小组长张本性把我叫出去，传达党总支的通知，让我写检查，准备交待问题。我只身回到西北楼宿舍，在窗前小桌上铺纸握笔沉思起来，当时挥之不能去的是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头几句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凯豁。穷年忧元黎，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理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过去我虽然特别看重老杜的这首诗，那是从古代文学的视角，从人生的视角看，我于此时此境才真正读懂了老杜的这五百字。我开始坐而吟之，在“浩歌弥激烈”之后，在宿舍里来回疾走吟之，在忧端颞同不可辍时，便冲出门在空荡的走廊间大声吟哦。特别是开头的三十二句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迹。通知要我检查，就意味着北师大党委已确定我为右派分子，让中文系总支组织批判。当时的右派与左派真可谓：“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了。

老杜的这三十二句诗无端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慢慢思索当时的情景，感到老杜这三十二句诗在表达一个哲学命题，或者说是一个人悖论，即拯救与逍遥。稷与契所代表的是拯救，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巢父、许由是远古的隐士，代表逍遥。拯救者的特征是忠君、拯民、济世三位一体，逍遥者的特征是无君、弃民、避世三位一体。杜甫一生正是在拯救与逍遥所构成的人生矛盾中度过的，自许稷、契的政治抱负，“忧叹黎元”的民本思想，“葵藿倾阳”的忠君观念与理想的“濩落”生计的契阔，妻子号啕，幼子饥卒的悲痛所构的矛盾冲突，不外乎拯救与逍遥四字。

从通知我检查之日起，我也陷入拯救与逍遥的巨大人生悖论之中。元月 21 日让我在全班同学会议上作检查，我刚开头说了几句话，就被左派的叫嚷声打断，而转入批斗。有人直接说我是右派分子，当然这是班里党小组组长张本性预先授意的，早已向全班说了校党委的

决定。二个小时的批斗之后，回到宿舍。后来接连批斗了三次，定性为“极右分子”，送西郊农场劳动察看。

从当了右派之后，我就在拯救不得与逍遥不能的矛盾冲突中生活。后来听人说美国小学家辛克莱也曾生活在这种文化的两难境地。据说，辛克莱的老师曾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呢？还是愿意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这一问题恰恰是人生遇到的拯救与逍遥的悖论而必须做出的抉择。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唯一的。因为人们为了一张人的面皮，谁肯明确表示他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呢？但是在实际的人生中操作起来就不是唯一的简单的了。反右运动之后，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做了快乐的猪，不仅右派中有快乐的猪，左派中也有，甚至本不是痛苦的哲学家，却屈从于暴力的淫威，顺从思想改造的时流而逐渐变成快乐的猪。因为在对拯救与逍遥的必须选择其一时，他们放弃了“拯救”而选择了“逍遥”。其实在他们做出选择之前，国家的最高权威早已替他们选择了。因为反右运动的实质不过是“恒使民无知无欲，使知（智）者不敢弗为而已。”统治者当然不愿意知识分子都逍遥，因为他们需要工具与牺牲。但是他们更讨厌以拯救自命的知识分子，“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就拯救与逍遥的价值来衡量，统治者宁愿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逍遥而不愿意他们拯救，国君岂能安枕？鸣放期间，不是有一批“窃比稷与契”的人物出来叹息肠内热吗？弄得最高当局惊怒：“胡为慕大鲸，辄以偃溟渤”呢？误认为是在上窜下跳，兴风作浪，反党反社会主义！那班“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者是小节，是好人，那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者以驯服工具自诩，当然受到欢迎。

“拯救”必须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必然要“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为此，在行动上就要“慕大鲸”而“辄以偃溟渤”。拯救固然显得积极，它以神圣的使命感作为驱动力，以拯溺扶危作为价值体现，但古今中外以拯救为己任者有几人不是悲剧性的下场？当然也有例外。问题在于，当拯救仅仅停留在超验的世界里，即窃比稷与契作为一种人格理想，不向经验世界扩张，即不贯彻到实践人格中去，不落实到操作层面上去，这种“拯救”作为价值形态，和作为价值形态的快乐、痛苦、甚至逍遥，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区别呢？

“逍遥”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用庄子的话来说叫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其实庄子一生并不逍遥，因为他的并没有随遇而安。他一直在为改变人类的生存境况而奋斗，也是一位推崇拯救的思想大师。当然是一位痛苦的哲学家。庄子确有过价值使命，价值理想，价值关怀。他的所谓“拯救”不是杜甫式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是在哲学层面上去拯救被异化的人性。他不是通过依附于皇权而是独立于统治权势之外的精神型的拯救，在这方面，他比屈原、杜甫还要“浩歌弥激烈。”请看他不是在大声疾呼吗？对于被异化的人性，不免于号啕：“此比干之见剖心，微也夫！”（《山木》）“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徐无鬼》）为了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他过着很穷苦的生活，尝“衣大布而补之，正縻系履而过魏王”，他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竟向人贷粟，想也挨过饿的，当魏王问他：“先生，怎么这样疲惫呢？”他正言辩解说：“我是贫穷，不是疲惫。读书人有拯救社会的才德而不能实行，这是疲惫；衣服破了，鞋子坏了，这是贫穷，而不是疲惫。这就是所说的不逢时运。……现在处于昏君乱臣的时代，要想不疲惫，怎么可能呢？”这证明，庄子作为痛苦的哲学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拯救使命，所以他不承认自己在执行拯救使命时“有道德不能行”的疲惫，而只承认作为痛苦的哲学家，他“衣弊履穿”的贫穷。

庄子比辛克莱早二千年就“碰到”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一个痛苦的哲学家的选择。当时楚威王向他提供了做一头快乐的猪的优厚条件他拒绝了。上文提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庄子事迹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子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清醒地意识到在对拯救与逍遥、哲学家与猪之间，逃避与折衷都是徒劳的。庄子的逍遥是以拯救为内核的追求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逍遥；庄子的拯救是以对至人理想人格的追求为核心；以“逍遥游”为最高境界的拯救。

反右之后，我皈依庄子的“逍遥”，当一个痛苦的哲学家，我不够格；当一头快乐的猪，我又不肯。我处于拯救与逍遥之间，或者说，我处在以逍遥为外在形式的拯救之中。从反右以后，我认识到庄子哲学表现出来的最强烈的时代感就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这种有悖于传统的认识，我认为是深得庄子哲学之的。我参军，参加反右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恰是象衣以文绣，送上祭坛的牺牛，命运完全操在人家手里，明明是“许身一何愚”，扮演当工具的角色，却“窃比稷与契”。反右以后，我正是用“游戏污渎之中”的精神怡适来对抗、蔑视那些左派人物。我认为德行充足的人，生命自然会流露出感人的力量，外界的变化不能左右其维护自由的精神，这就是庄子说的“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作为右派人物在当时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坏得不得了，而只是内在的才质不故作显耀，即“才全而德不形”而已，我自认为即使我戴着右派的帽子“遮颜过闹市”，也会闪烁着精神的美。

在反右以后，虽然经历了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农场劳动，监狱受刑，饥饿冻寒，但在精神上我在作“逍遥游”。这是不得意而为之的事，是要摆脱当时社会现实所加给我的各种枷锁的绝对自由。在幻想中追求人类精神的解放和行为的绝对自由不仅是庄子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我度过苦难人生的现实目的，我与庄子虽然相距今古二千余年，但我俩在不同的朝代都目睹和身受各种人间惨剧，特别是都深切地观察和体验了士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所遭受的各种痛苦，因而由积极入世转而在精神和行为上寻求避世避祸之道，进而虚构一个独特的幻觉的天地，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这既是哲学家庄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也是“逍遥以游”何以成为我顶住人生苦难“溯迴从之”的现实目的和逻辑起点的真实原因。

逍遥——不做快乐的猪而做痛苦的哲学家，这是庄子所提出的中国人生哲学史中的一个独特的范畴。这一范畴把拯救和逍遥辩证地统一起来，集中概括了人类要求自由、要求精神解放的思想本质，它是庄子全部哲学思想的主体精神。逍遥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有二重性，过去人很看重它的消极性。因为它强调了人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强调了精神对现实的超越，体现出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我们知道，人不只是生活在现实的物质的世界之中，也必须生活在崇高的理想生活之中，把物质生活视为唯一的生活的只能是快乐的猪。精神生活的丰富并不完全依赖于现实世界的自由。在现实生活困顿之际，精神上的超越性有时确实能给予人以鼓舞，以安慰，以力量，以勇气，以快乐。逍遥游是苦难人生的精神源泉。试看庄子笔下的鲲鹏就是自由精神的化身。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高瞻远瞩，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遏者，唯其如此，才能冲决一切社会束缚、罗网从而获得自由，使主体精神得到解放。

逍遥与拯救，快乐的猪与痛苦的哲学家所构成的人生悖论，不仅在共产党于大陆建国后的五七年成为知识分子“雄关如铁”的选择。据广东中山裘其拉先生介绍，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海德格尔选择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周作人选择了日本侵华军的法西斯主义。

曾经推崇拯救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当年真诚地相信过纳粹之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正在拯救已经腐朽、颓败的西方（乃至全人类）文明的健康力量，新鲜血液，能够实现希望！中国的革命的左派总是不假思索地断定，纳粹党只是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岛上的恶魔。翻翻历史文献可以知道，纳粹之流“确实有过价值使命，价值理想，价值关怀；有过复兴，有过秩

序，有过健康的肤色，有过一切善良的人们相信他们确实是在拯救世界的一切可能性，它所缺少的只是，仅仅是，对个体本然生命的高度的——有时候简直以以至于是起码的尊重。海德格尔就曾经恶狠狠地说起过：人只有在这种人的本质中才成为本质。（《论人道主义》）于是乎顺理成章诞生的逻辑就是，例如，只要不是哲学家就一定是猪，就可以加以屠宰、焚烧之类，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惊心动魄么？

周作人，当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半壁河山，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时，他仍然想保持“逍遥”，结果会居然堕落到最不“逍遥”的历史地位上去。所以，刘小枫断定“逍遥”是价值形态的反动，人性的反动。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不肯随遇而安，不肯听其自然，换言之就是不肯当猪，如57年以后的大陆知识分子，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

反右和反右以后的中国官吏知识分子以及依附于权力的工具知识分子，都以拯救者自命以批判斗争别人作为价值的体现，以换取猪的快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当驯服工具为荣，离哲学家十万八千里。但他们象海德格尔真诚地相信过纳粹希特勒一样，反右和文革是一种正在拯救已经腐朽，颓败中国文明的伟大革命，他们相信只有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岛才能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于是乎顺理成章诞生的逻辑就是：例如，只要不是猪就一定是哲学家，就可以加“焚”与“坑”，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惊心动魄的么？

第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思索

伍立杨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国的反右和文革那样能在本民族内把人与人的彼此相残的程度发挥到如此恐怖的极致。”（《思之惘然》）从反右到文革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以扭曲人性为基本特征的，其理论的虚伪性，其实践的病态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我一直在思索，没有“圣人旗帜”的时代无疑是平庸的，但却未必是“灾难性”的；产生“圣人旗帜”的时代无疑是高尚而激动人心的，但却又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自1966-1976年的十年，是产生“圣人旗帜”的时代，无疑是灾难性的时代。文革初期，林彪陪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江青出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经常抛头露面，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形象，我总是戏剧性的联想起《新约·马太福音》上的一段警策的话：

你们要防止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时，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就是这群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在鼓吹宗教性质的造神运动。每当我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时，我的心灵深处必然响起大海轰鸣的声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它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哲学深意是：全世界没有什么上帝、圣人和救世主。而红卫兵运动就是寻求、推崇“救世主”式的宗教狂热运动。亿万无知的青少年学生跟着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把毛泽东同志吹捧上“救世主”的位子，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成为中国社会的祸源之一。把毛泽东以及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说成是能设计出一套有关人类社会整体，是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naiverationalism），对于一小撮阴谋家来说，则是一种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工程师式的心态”（engineering type of mind），是一种由超人重新安排社会的思维方式。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领袖伟人 to 芸芸众生，都“自称拥有一种绝对真理；但是它的历史都是一部有着各种错误和邪说的历史。它给予我们一个远远超出我们人类经验范围的超验世界的诺言和希望，而它本身始终停留在人间，而且太人间化了。”（卡西尔《人论》）文革中以强势意识形态为背景的造反派总是宣称自己手握“最终真理”，而对其他人、学说、思想、理论则宣布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异端，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横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以毛泽东思想为绝对真理的独断性真理论，可以说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之一。

文革期间的独断性真理论是以个人崇拜、宗教性狂热为表现形态的。在以“四人帮”为核心的野心家设计的“理想国”中，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航手理应位于社会顶端，而他们当然是手握绝对真理的贤哲辅宰，对国家实行绝对统治，并对被

打倒的反对派——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芸芸众生进行专政和严格彻底地思想改造和控制。为达此目的，个人（包括造反派）没有任何自由。“这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如其说是对真理的追求，毋宁说是愚民性的道德要求。而这种道德性要求实际上又转化为政治性强制。”文革中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打砸抢”在“造反无罪”的口号蛊惑下，用不顾一切的专横强暴手段来改造人，改变人性的企图，必定是一种可怕的罪恶。当时，以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作唯一的价值体系。使全社会道德精神高度一致的构想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闭性社会环境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其理论预设也是可以用一种巨大的力量来改造人，实现一种全社会一致承认的政治信仰，道德判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造人的设计中，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均高度专制，党的各级领导，几乎都是“至善”的“精神导师”，有权管理、控制、干涉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和思想，即便与他人毫无干系的纯个人事物和思想也要受到严格的管制。从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社会表面上高度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但人民公社化之后，从农民到工人——这些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主体阶级，不仅毫无个人自由和创造性可言，而且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正像穆勒所说的：“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约翰·穆勒自传》）中译本第126页）文革运动正是以真理的独占者自居，不能容忍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处于权力项端的权力绝对自握的需要，必然导致对异端思想和异己者的迫害。纳粹德国正是要维护“日耳曼精神的纯洁性”而由焚烧犹太人的书籍一步步走向焚烧犹太人的，文革中的红卫兵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而反帝反修，从超验世界向经验世界扩张，而焚烧古代典籍，破坏历史文物，进而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暴力打击的。

现实社会总是不完美的，而对完美、至善终极的永恒追求却又是人类无可更改的天性之一。这种深刻的矛盾，不仅是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精神根源，也是浪漫主义型的政治家、党派领袖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精神根源。在中国，这种深刻的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精神根源。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圣君贤相的拯救文化观念可以说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对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就必须要有个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救世主”来统治他们，在全能的圣人面前品德智慧都“残缺不全”的人们自然只能顶礼膜拜绝对服从，这就是文革期间，任何人无意中损坏一张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去坐牢的根源。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记述一个先造反，后跌下成为反革命的人，每听到锣鼓响应要高喊“欢迎九大胜利召开”。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就成了当时中国人头上的解不开去不掉的紧箍咒，荒唐的时代，制造了荒唐的逻辑。

建国后的大陆文化的性质可以1957年的时间界限划分为三个时期：一、1949年——1956年为自由社会主义文化时期，文化类型为“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二、1957——1978年为独断社会主义文化时期，文化类型为“独断文化”；三、自1979年至今开放社会主义文化时期，文化类型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或曰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所谓“肯定文化”的概念是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使用的概念，或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使用的概念。马尔库塞说：“所谓的肯定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现代文化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当然解放初期的大陆社会不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是由殖民地、封建主义社会向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作为社会转型的“中介”，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之所以也把57年前的大陆文化界定为“肯定文化”，是因为当时从解放区带的文化和从苏联引进的苏联文化，给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实然世界的幻想世界，并使人们在幻想中得到欢快和幸福的满足，平息人们的反叛意识，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社会功能是肯定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为现存的新政权辩护，引导人们同现存的秩序相协调。在这种

文化中，幸福成为现实的奴婢，革命的观念成为现实辩护的帮凶；它掩盖了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可能创造出一种更美好的物质生存世界（在其中，幸福可以真正实现）；在这种文化即使不幸福也成为屈从和默许的方式。（同上书，第 156-157 页）中国建国初期的“肯定文化”在根本上是理想主义的，对孤立的个体要求来说，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农民翻身、工人当家作主人）；对肉体的痛苦来说，它反映着灵魂的美（以黄继光、邱少云、王国藩、李顺达为代表）；对外在的束缚来说，它反映着内在的自由（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对于赤裸裸的唯我论来说，它反映着美德王国的义务（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肯定文化”“在新社会蓬勃兴起的时代，由于这些观念指示超出生存既有的组织方面，它们是革命的”；但是，它们在新政权的“统治开始稳固之后，就愈发效力于压抑不满的大众，愈发效力于能为自我安慰式的满足，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同上书，第 123-124 页）在中国，这种变化开始于 1957 年反右运动。从反右运动开始，国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命的领袖人物及其社会基础开始与自身的文化发展冲突，肯定文化的自我消亡便开始了。

中国自由社会主义时期的肯定文化，用对工农大众的解放的欢呼来与孤立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对立，用对美好灵魂的颂扬来对肉体作出反应。因此，尽管它使人们满足于有限的主人公感，沉溺于幻想中的幸福，安于现实极端贫困的生存苦难，对现实发挥着肯定的功能，“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反映，”但它毕竟使理想超越于现实，保留了内心自由，特别是那些浪漫主义型的自由知识分子，用这种文化对普遍人性的张扬来与残害个体身心的势力对抗，因而也保留着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角度，胡风事件，整风鸣放都来可以视为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角度的反映。

反右运动集中力量打击、摧残高层文化或曰精英文化。这种文化的阵地在高等学院，反右主要在高等学院内进行。从反右开始，打击摧残高层文化的力度不断加强，愈演愈烈，直到文革结束。从反右到文革是独断社会主义时期，文化模式为“独断文化”。这种文化消除了“肯定文化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使文化成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使之具有压抑主体意识、个性、创造性、独创性、想像力和压抑自由创新，自由选择的消极功能，成为平息知识分子反抗的意识形态工具，大部分文化生活领域被吸收并转变成控制个人意识的方面。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再生产的困难，以无力防御强大的自然灾害在 1959 年至 60 年所造成的“千村薜萝人遗矢”的惨象，而独断文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维持现状的一般趋势就越强大。

独断文化打击的目标是高层文化。反右运动以前，中国的高层文化（精神英文化，学院文化）与现实保持相对疏远和脱离。这正是高层文化保持批判性和否定性的根本原因，而反右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独断社会主义使高层文化失效，使它失去了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现实超越并否定了高层文化，使它成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教授、学者下乡劳动，或进干校改造，文化中心成了阶级斗争、权力斗争的前台，在艺术领域，工农兵的社会同化力消除了对立的内容而挖空了艺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价值判断，使作品成为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艺术因而失去了它的传统功能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文学方面，最为典型的八个样板戏的文学观念和形象及其命运，充分显示了独断文化是如何消除高层文化中的对抗因素的。总之，从反右到文革，文化异化为意识形态，成为统治和奴役的工具。

从 1979 年开始，中国进入开放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模式为“大众文化”。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是指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包括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融合了艺术、音乐、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方面，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混世意识。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工业”的内涵。文化工业中的“工业”所表示的特定性内涵应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即表示文化产品的“标

准化”和“伪个别性”。大众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中国自1978年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为文化、艺术的各个主要方面的商品化创造了条件，特别是80年代末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使这种商品化成为可能，进入90年代，文化在逐渐变成一种工业，利润动机转变成文化形式，越来越多的文化部分企业化，艺术产品变成商品，它象工业产品一样可以通过市场销售和交换。中国的文化产品虽然没有象阿多尔诺所断定的西方文化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商品”，但是“文化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的特征性愈来愈鲜明。

中国的大众文化受香港、台湾、西方的文化工业影响极深，由于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反映在文化上则是“跟着感觉走”。模仿、效法西方文化，奉为样板，到80年代中后期，港台的影星、歌星、球星在大陆满天飞，每一个城市都出现一批愚不可及的“追星族”。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开始急剧地变成商品，排除或否定了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文化艺术工作者主要关心的是经济效益，而不是关注艺术完善和审美价值，由此导致文化艺术的堕落或退化的现象出现了许多影星成为大款、富翁、富婆。许多剧团、乐团、剧院、文化团体文化机关企业化，或解体、或私人承包，甚至博物馆、艺术馆、展览厅也变成夜总会，卡拉OK厅、酒吧间。由于文化艺术界拜金主义盛行，文化艺术作品的好坏真伪不是取决于内在价值，而是取决于它的可销售和可交换的程度，价值的实现则以投资的效果为尺度，批判与敬畏都消失了，机构的鉴定取代了批判的职能。

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现在的艺术拒绝反映下层人民的事业，反映真正的普遍性，轻视认真地反映存在的苦难和压迫。”（同上书，第126-127页）在文学方面，尽管早期文学中某些形象或角色并未消失，但他们是经过改头换面之后才幸存下来的，又很象马尔库塞所描述的两方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的文学形象那样，在中国同样是：荡妇、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神经质的家庭妇女、歹徒、明星、超凡的实业臣子，都起着一种与其文化前身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只是想像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非否定。（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4-55页）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图书市场更是混乱不堪，精品、高层的图书出版困难，大量的文化垃圾充斥图书市场，黄色的书刊屡禁而愈多，音像出版更是色情的一统天下，即便是健康的东 西，由于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单等的标准化、划一性扼杀了个性和创造性，而出版界所崇尚的是模仿，书刊的伪个性或伪个别性在标准化自身的基础上赋予大众文化的生产以一种自由选择或开放市场的光环，图书产品并不反映实在的本质，大量的图书并没有真正的内容，并不能代表我们民族文化学术发展的水平，它们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模仿。音像制品、图书产品通过“不断重复”使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在工作休闲时都受之影响，特别是电视、节目、录相带、电影以绝对霸权的优越地位剥夺了大众对艺术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中国大众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之点在于它的直接为官方控制，特别是共产党的各级宣传部都掌有对文化的绝对支配，生杀之权。由于党对文化的绝对领导、控制，中国的大众文化正是履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职能。不可否认，目前中国大众文化还没有完全失去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们以精神享受的作用，但所谓党的领导即意味着文化在政治上标准化、划一性，就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在继续发挥作用，它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为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从而成为极权主义及共产党控制大众舆论，操纵人们心理意识的强有力的手段，把文化变成为现实为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这几举两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说明之。

其一，199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新版《鲁迅全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家内部刊物发表黄源、史莽的《警惕歪曲、污蔑、贬损鲁迅》，认为“浙江文艺出版社要把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推倒重来，用新潮派的所谓“十年来鲁迅研究、

现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来编辑、注释和出版新的浙版《鲁迅全集》，从而‘矫正’鲁迅，这决不是一件文坛小事。（重点号为作者所加，下同）如果我们不慎重、不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听之任之，将在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文学史的研究上，甚至在整个思想战线上引起混乱和纠纷，后果将不堪设想。”出版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作出强烈反应，称胡乔木（建国后代表共产党控制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指出：“《鲁迅全集》是国家法定的版本，如果地方出版社另搞一套，将会重新造成版本歧义，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政策性注释出现歧义，将会影响文艺界的安定团结，造成严重后果。”（以上引文出自《读书》中的“文事近录”，见1995年第12期P140-141）

上边的消息颇令人深思，通过强调《鲁迅全集》出版的“政治性”，论证所谓新版《鲁迅全集》，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上级主管部门发文来取缔竞争对手，这说明什么？中国已颁布《新闻出版法》，对浙江文艺出版社出《鲁迅全集》是否可被认为不正当？出版《鲁迅全集》本身就不是反对鲁迅，现在书还没有出来，有何根据说是反对鲁迅？针对各种反映，中国鲁迅研究会和《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专门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与新闻出版界人士通过座谈的方式发表意见，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王得后认为，这件事用三句话可作概括：1、学术是有理可讲的；2、出版是有法可依的；3、我们现在谁都只能说掌握着相对真理，怎么能说掌握了绝对真理，成为“国家法官版本”“难以逾越”了呢？八一年版需修改的注释有几百个、上千个，怎能说是极个别的呢？

“国家法定版本”，在中国封建社会曾有过，对《五经》，东汉搞过白虎观会议审定的《白虎通义》就是“国家法定版本”，唐初孔颖达等注释的《五经》都标以“正义”，也是“国家法定版本”。那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难道现在还要效法老祖宗搞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吗？“这决不是一件文坛小事”，它揭露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实质是官方操纵、控制大众舆论，履行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手段。

二、《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动态”栏内载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座谈会述评》的文章，这位“本刊记者”声色具厉地说，“国学热”之所以被“炒”起来，不是偶然的。“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即有少数人（反右运动中称为‘右派’，文革中称为“一小撮”）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试图从封建道统中重建“国学。”政治帽子大得吓人，政治棍子打得狠毒。这位“本刊记者”并以官方当权派的口吻质问，“是从精英文化或典籍文化出发；不是从现实生活中的活文化出发？是对传统文化作历史性的考察，还是作超历史、超阶级的解释？是面向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操守，还是回归过去，到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传统中寻找“一以贯之”之道，是有关“国学热”争鸣的方法论焦点。”这种质问使人想起文革初期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真是够“上纲上线”的了，这位“本刊记者”更“反攻倒算”，他说，“利用‘极左思潮’的恶名贬损不同意见，并习惯于借助外在力量的庇护解决学术问题，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其不良影响，人所共知。”他正是“习惯于借助外在力量（官方、政权、党棍）的庇护来恐吓学人的，又怎能逃脱“恶名贬损”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动态”背后的东西——文化专制主义、独断论的阴魂不散。

写这儿，我忽然想起林语堂先生不知在哪儿为什么发的一通议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能将舌头和拳头混合使用；天使绝对相信公理，禽兽绝对相信强权，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正因为如此，大兵的作用（1989年6月的北京镇压学生运动）就是能够把持不同意见者毫不犹豫地杀掉，只有那些无力强迫人家认错的人，才会用说话的方法。（《生活的艺术》）上文引摘的文化界，学术的消息，不免使人胆颤心寒，难怪不少知识分子在“落实政策”之后仍然三缄其口了。

大众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文化形态。道德理想主义者如张承志、张炜等对其进行猛烈批判，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文化价值系统持一种不太自觉的，缺乏理性色彩的双重态度，必然陷入批判的“误区”。他们虽然反对专制政治，憎恨文化专制主义，没

有背弃八十年代的精英传统，但是，由于他们对现代化价值系统（如工业化、世俗化、多元化、城市化、市场化、技术主义等）采取了激进的抵抗立场而对社会主义语境的判断上又是盲目的，在批判与否定大众文化的同时，却忽视与回避了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警惕。中国当今的文化价值建构、人文精神建设，其实都处在相当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其中对人文精神构成威胁的主要力量来自三个方面：顽固地盘踞历史舞台的政治文化（即文化专制主义）、商业主义文化、技术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三元，即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文化中，政治文化仍位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精英文化与商业文化都在政治文化的制约语境与许可范围内艰难地存在，而且呈现出与政治文化相妥协的明显倾向。道德理想主义者之所以能被共产党官方所容忍，在于他们的理想不是指向一种不合理的政治或经济建设的无序状况，也基本不涉及社会存在或物质生存层面，而是指向一种道德状态或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价值，人格操守，他们揭露、批判当前社会的文化道德中出现的震荡、滑坡与丑恶现象，官方是欢迎的，他们也在治理，也怕丢脸现眼，虽然在统治集团上层反贪污、受贿很无力，但对扫黄打假却很卖力。

中国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式的控制不再能驾驭现实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新的文化控制网络正趋于形成。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造成了精英文化的束手无策，直到文化“大腕”（电视剧作者、音像制作者、广告制作者、书商、周末版报纸的编辑、小报记者等）的出现，形成了新的文化阶层，他们靠分享国家媒介权力获得地位。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的附庸或工具。文化“大腕”的出现，使文化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大腕”的历史定位是模糊的双重身份，他们象双重奸谋身份一样，他们在大众面前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面前，又是大众的代言人。文化“大腕”导向的大众文化在中国有三大特征：一是过去知识分子圈子引导大众趣味的功能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大腕”决定、左右着大众文化的趣味以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引导和支配为特色，谁有钱谁的消费空间就大。二是从书的文化转向图像性，从“文字族”转向“音像族”。三是统一、绝对的声音发出，变成文化信息的无穷多发出。

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政治文化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强迫精英文化变形、妥协，商业文化服从、效力，文化“大腕”活跃类似西方文化工业的畸型文化。对于这种畸型文化不是几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批判所能矫正得了的。

面对当前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神话，重读《庄子》的《齐物》、《秋水》篇颇有启悟。《齐物论》与《秋水》等篇深刻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层次性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同层次都有其局限性，把人们引向一种不断追求，不断拓展，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崇高精神境界。《老子》上说“反者道之动”。道家从对立统一原则出发，积极提倡“绝圣去智”，否定圣贤权威，反对独断论，要求坚持“以此明彼，以彼明此”、“反复相明”的认识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容纳、涵摄不同的文化、学术派别的观点。批判、消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一元论，《庄子》的文化相对主义是极为有用的思想资料，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文化相对主义的选择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它既更接近文化发展历史事实，同时也有利于描述当下文化演进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文化观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多元文化论理论支点就是文化相对主义。17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格局基本上是由基督教、儒家、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多种文化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共同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文化进程，至于未来世纪世界文化的走向，也不会有“共产主义”的绝对统一，即使像“现代”、“现代化”、“现代性”这类似乎是全球性的价值追求上，其内涵和前景也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充满歧义。尽管由于交通和电子媒体的高速发展，世界被称为“地球村”，但各种文化间的价值距离并未因此而缩短，倒是由于获得信息的便捷和全面，使原先较少受到关注的各种文化价值的强烈反差空前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即使只为人类未来的前途着想，文化相对主义，也可以使我们在自身和各种异质文化之间保持一种批判发展的张力。

第三，苦难的价值命题

苦难对人生来说是一种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充实的象征。负担越重，使人在人生的路上流下的斑斑血泪，就证明我的生活贴近大地。相反，在良好的平坦的路上行走，没有一点苦难，日子过得轻飘飘的，也即离开最真实的生活，变得似真非真。只有当我从1957年背起那个沉重的十字架时，我才拥有世界上的真、善、美。在苦难中，始终把持最基本的道义立场，守护人类视为永恒和终极的价值，这正是我自1957年当右派之后所能自觉承担的职责，苦难指向一种道德状态，人格操守，它把目标指向一种高标准的、超越的、准宗教化的道德，是一种对苦难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正是在苦难中，我看到那班左派人物政治说教具有的虚伪性，他们斗争、改造别人的目的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是历史进步必须支付的代价。本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文化人李香兰，去年在日本出版一本题名为《李香兰之谜》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句话吸引着我。她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恶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作为反思，或者加以说明解释，也是幸福的。”西方一些人很看重历史愚弄人折磨人这一思想。如德国的著名历史学家F·梅尼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不久，写的《德国的洗劫》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哲人中看重历史愚弄人这一思想的只有庄周。他能深入到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之外俯瞰历史，把灵魂的、精神的悲剧从物质的肉体的毁灭中分离出来，建构自己的自由意识。

与我同时代的人中，有许多是悲剧人物——被历史愚弄和折磨过的人。我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四个五年，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国破家亡、社会动乱、政治运动，使所有人的命运无一例外的都遭受着种种曲折，承受着种种生命的重负，苦难与不幸。因此，当朋友、同事、亲人、仇敌、陌生人一一从我的眼前消逝，划出了他们在人世沧桑中所留下的曲折与沉浮，痛苦与不幸的生命轨迹时，我面对历史的冷峻愚弄，心里萌生出一种深沉的人生悲怆意识。人生的沉浮与幻变使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在强大的历史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和渺小。他们都曾经被历史无情的捉弄过、利用过、装扮过而沦为悲剧人物。普通人可能不足为奇，他们早就被历史与历史学家遗忘了，而那些大人物如将军、部长、总理、国家主席又怎样呢？难道历史肯宽容他们而不愚弄折磨他们吗？不，他们的生命力在强大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某种专制文化所酿造的横逆时势面前，也同样显得脆弱、无力抗争。汉代的司马迁早就看到了这种历史现象。司马迁在解释周文王、李斯、韩信、窦婴、季布这些大人物被愚弄被折磨的原因时说是“积威约之势”所造成的，其实老子说的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

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耳闻目睹过一些现代大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悲凄结局，也曾苦苦思索过产生这种历史灾难的原因，在向马克思请教之后，感到司马迁和老子的解释都没抓住要本，或者说他们只看到这种历史现象的负面作用。我认为历史愚弄人折磨人所造成的人生苦难和悲剧命运，做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它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伴随物，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痛苦，从积极方面看，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恩全集》第39卷，149页）没有文化大革命，哪里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局面！

作为历史进步的代价的“历史灾难”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呢？我想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梅尼克在《德国的洗劫》中指出，在人生和历史生活中是都潜藏着恶魔因素的。而且，它们平时潜藏在“社会的恶魔般的深处”，一到革命时代就化装脱颖而出，鱼目混珠。所以，梅尼克特别指出，每当一种伟大的变革现实的理论出来之后，“恶魔”总是会“同时作为推动者与受惠者也钻了进来。”梅尼克是从反思德国近代史上普鲁士军国主义成为希特勒运动所制造的人类空前灾难的历史——文化根源时总

结出来上述观点的。如果说“希特勒运动所煽起的追逐权势和享受的自私浪潮中，又使德国更美好的精神文化沦于毁灭”的话，那么，中国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场“反人文主义意识”，“造成了许多丰富的生活源泉的枯竭”的浩劫，林彪、康生、江青等恰是中国革命中潜藏极深的“恶魔因素”，他们就是在毛泽东的“变革现实的理论”出来以后，“作为推动者与受惠者”“化装脱颖而出”的。德国与中国虽然文化传统、社会制度迥然不同，但“历史中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东西之间，都“恶魔般地密切联系”在一起，却是十分相似，希特勒与四人帮都是人生和历史生活中潜存着的恶魔因素。

梅尼克不是阶级论者而是人性论者，他在解释“恶魔”人物制造“历史灾难”时说，是由于人身上的“神明成分和恶魔成分”并存，而“恶魔成分”这种人的动物性、非文化性，平时潜藏在“社会的恶魔般的深处”，得到一种条件就会出来做恶，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解释。但是他指出“许多纳粹领袖”和“他们所推崇的普鲁士军国主义”都是以“反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是“历来所未有过的最低的文化形式”，应该说是颇有认识价值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不也是“反文化型”的“最低下的文化形式”吗？四人帮不也曾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美好的精神文化沦于毁灭吗？是的，马克思说过：“在我们每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马恩全集》第12卷第4页）因而历史进步的代价的大小总是得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历史进步的代价并不是完全由客观趋势所造成的，人的主观错误、罪恶往往也是历史灾难，人生悲剧产生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时，既不能只看到这场浩劫所造成的“历史的灾难”的客观因素，而看不到这种沉重的“代价”所换来的“历史的进步”而陷入悲观主义；也不能只看到历史进步的补偿而忘记由于历史主体错误的主观选择而造成的这场历史浩劫所产生的毁灭性的负面作用，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的精神世界。而我们中国人的真正悲剧恰恰是把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历史灾难”完全忘掉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提供像样的历史戒鉴，当然也不会对我们正在实行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有什么深刻的理解。

1996年元月22日

附记：这篇自传性的哲学思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当然目前无人敢替我发表，有人说到台湾或美国可以发表，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所以只能著此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以补偿前辱之责，虽万破戮，岂有悔哉？我自信，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历史是严酷而公正的，权势与权术阴谋都对历史无可奈何？

忆海琛

张德文

—

亡友张海琛是我的湖南老乡。由于年龄和性格的差距，大学四年，我们接触并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只有那一身四季如一的灰布制服（那是解放初期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干部才能穿上的衣服）和一口除我以外谁也听不懂的衡阳话。刚入学，人生地不熟，他不爱说话。课堂讨论时却喜欢发言，而且是长篇大论。这可难为了他的听众，常惹得大家不耐烦，因为听不大懂。二年级，和平门外的中文系搬到德胜门外新校。我们住进了新盖的学生宿舍大楼。张海琛住在东斋 103 室、三年级搬入西斋北楼 415 室，这个寝室的同学团结、活跃，张海琛跟他们经常斗嘴开玩笑有时闹得沸反盈天，女同学笑他们是一群“活宝”。进入四年级，他们变得特别爱争辩。午休时，别的寝室一片寂静，张海琛等仍叫嚷不停，引来四处抗议声，他们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其实不独张海琛和他的室友，当时连女同学对争论问题也产生了兴趣。在餐厅里常听她们为一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就餐的同学都走光了他们还不肯走，还在你嚷我叫地争论。打扫卫生的炊事员只好前来轰她们。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1956 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2 月份，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5 月，陆定一发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6 月、10 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编辑部在 4 月和 12 月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围绕这些事件，团支部和班委会组织全体团员、非团员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双百”方针等进行了多次讨论。陆定一的文章指出，“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这样的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大家开始改变过去惟组织之结论是从和照搬讲义追求全部 5 分的做法，学着开动脑筋提出学术方面及关于国内外大事的属于自己的意见。张海琛和他的室友在我们班起了领先的作用，大家赞赏并且跟上他们的步伐。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校党委书记何锡麟随后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详细传达。毛泽东分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引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古人诗句形容波匈事件对国内的影响，当时人民内部思想状况，阐述了以“双百”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肯定了九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了发表在 1 月 7 日《人民日报》上陈其通、陈亚丁、鲁勒和马寒冰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兴奋异常，以极大的热情思考讨论入学三年多来我们所经历的种种事件，其中“肃反”是一个众多人关注的焦点。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海琛找我作了一次长谈。记得一天刚吃完晚饭，张海琛约我散步。我们一道走向操场。远处教学大楼已经灯火通明，近处平时说唱喧闹的宿舍楼则变得十分安静。晚自习已经开始了。在云缝中钻进钻出的月亮把整个操场蒙上一层薄薄的纱幕。我依稀看见张海琛一脸严肃的表情。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全是他在说话。回忆起来，他大概说了如下内容：一、《三国》、《水浒》里标举的“忠”、“义”等道德不能否定，应该继承；它们对于处理今天的人际关系有积极一面。二、咱们的肃反搞错了，我班两个批斗对象全都

不是反革命；结果弄得一个抬不起头来，另一个干脆跑回香港不来念书了。人与人之间不敢说心里话，人际关系遭到了破坏。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注重培养“驯服工具”“乖孩子”，没有自己主见的年轻老头，这是错误的。当时，我就属于“乖孩子”一类学生，对于老师的授课内容、组织上的要求和结论，从不加思考，更谈不上怀疑。对于张海琛的话，我感到吃惊，觉得似懂非懂。但隐约地感受到张海琛那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思考的深刻。

事隔不久，我们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次日（五月一日），又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了指示的全文。党中央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并欢迎非党人士自愿参加，帮助党整风。接着，报上刊登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批评党内三个“主义”的发言。5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校中文系教授穆木天《我的呼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党中央”“搭救王蒙”，“铁狮子坟的师大”，“黑暗王国”“一线光明”这些词语都引起了我们的联想：毛泽东的二月讲话、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标题《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里穆木天讲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内容的一部分）；文章所揭发的事实则令头脑单纯只知道生活美好的青年学生大吃一惊。

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穆先生文章见报的次日）早饭后，我从西饭厅回宿舍取书包，突然看见宿舍楼前一张刚贴出的大字报，醒目的标题《谜？》吸引了许多人，我也立刻停下来看。大字报不长，说的是师大整风运动开展不起来，是因为某党员领导乱搞男女关系，自己屁股上有屎，不敢引火烧身。署名：415室“底层之声”。顿时，一股怒火从胸腔直冲头顶，我三步并两步直奔415室，张海琛和他的室友正你一句我一句谈论他们刚贴出的大字报。我上前问张海琛大字报说的是谁。他回答说，穆木天先生告诉他们的是党委书记何锡麟，女的是俄语系维族（一说俄罗斯族）女研究生，一位有夫之妇。何锡麟带她坐小汽车兜风，她的爱人气得自杀，曾写信控告何。以我们当时的认识，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语），党员领导干部远比一般党员优秀得多；在非党群众心目中，他简直就是神圣得不得了而又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模范人物。联想到我当兵时所见那些师、团首长，做报告让你听得心服口服，平时跟战士们一起蹲在球场边看球赛，坐在炕沿拉家常，个个可敬可亲。而何锡麟毛料制服笔挺出现在大礼堂舞台上，会一散坐上小车一溜烟去了，再也见不到影子。他平时尽干些什么了？连乱搞男女关系这样肮脏的事都做得出来，他哪够格当党委书记！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海琛，他平静地说，师大党委三个“主义”不少，帮助党整风，必须把问题揭深揭透。

这张大字报所引发的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对“某党员领导”（有的直呼何锡麟的名字）纷纷质问谴责，语气十分愤怒。

张海琛等是去了穆木天家才写出这张大字报的。他们为什么要去穆先生家？一说是穆先生的文章《我的呼吁》引起了大家的惊诧，想去问个明白；一说是张海琛提议对老教授们做一做毕业前的访问，今后很难有这种机会了。据回忆，穆先生刚谈起何的事，他的夫人彭慧教授便忙来阻止不让说下去，穆先生说：“我怕什么？我要说。”可见积怨已很久，不吐不快。张海琛等去穆先生家的动机，可以断言的是关心穆先生所揭发的事情，是表现了极高的政治热情和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当时此类事情若能引起党中央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党内腐败现象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么严重的程度。

对于何锡麟的问题校党委委员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反对师生提起这件事，他们要维护党的威信，差别仅在于表态的语气不同，大多数强硬，个别人委婉一些罢了。学生的态度则分多种：或愤怒（对何），或不满（对批评者），或沉默。第二种自然是与校党委一致的，持第一种态度的同学称他们是“卫道者”，对他们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社团“大家放”，就曾遭到过这样的围攻。聚集在415室周围我们班的男、女同学是持第一种态度的师大学子的中坚力量（他们后来全都被定为“反动集团”“底层之声”的成员）。

他们以正义感为基础膨胀起来的政治热情，十分强烈，他们对校党委捂盖子反对批评何的错误态度由愤怒而变得失望了。自己干起来吧！不需要也没有任何组织动员、布置安排，大家自动地聚拢来，做着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一张专署名“底层之声”揭露校领导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一版版题名“底层之声”登载同样内容文章的油印小报出来了。措词也许有些过激，但作者的心意却很明显，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气氛是这样纷攘喧嚣而浮躁，张海琛却表现得十分平静。他常常独坐不语，似乎在想什么。别人来与他讨论问题，他也只是平静地叙述自己的意见。回忆他写过的文章、说过的话，他的观点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师大“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严重，群众意见大；第二、群众揭露“三害”的积极性高，师大整风成败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的程度；第三、要发动群众就要允许开展大民主，即让群众大胆“鸣…‘放’”贴大字报，适当时候停课也未尝不可。

这些观点获得了大家的认同。在反对部门党委领导的错误言行就是反党，揭露本单位工作中的问题就是反社会主义，指责本单位“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之类逻辑的指导下，张海琛和参与“底层之声”活动（包括本班和外班，与张海琛有或没有直接联系）的同学全都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分子”。稍后一点《教师报》上署名“本报记者张迈”的文章《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里这样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19 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 49 个是右派分子，70 多名共青团员（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49”，不知道是不是划定右派分子最后的统计数字。据我所知，415 室的李怀仁本来是批斗右派的积极分子并参与整理本班右派分子的材料，但后来查出他曾指责过本班的肃反，于是也成了右派。回民学生刘根生也是后来被划为右派的。“49”人是否包括这些“后进”者，不得而知，姑且以“49”论，则“右派”人数占了全年级总人数百分之 22.4 强，超过毛泽东所说百分之十的一倍还多。其中张海琛所属（也是“底层之声”所在）一班 34 名学生，共划“右派分子”13 人（其中极右分子 8 人），占全班总人数百分之 36.1 强（其中极右分子占全班总人数百分之 22.2）更是大大超过年级比例。根据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应划为极右分子。张海琛当然地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从那以后，我们就各自忙着检查交代，挖“堕落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我只在批判“底层之声”的全校大会上见过张海琛一面，因为是被勒令旁听受教育的，所以也不可能去细看他的模样。

同年十一月，中文系党支派人宣布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我们头戴沉重的“极右”帽子茫然而凄凉地乘火车离开生活了四年多的北京而去，相互告别已成了不可能，天南地北，各自东西，此后二十二年之间，再也没有见过张海琛了。

二

一晃就是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一个人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黄金时段的四分之一。终于到了一九七九年。

今年三月，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55 号文件办公室的改正通知。这通知的到来令我悲喜交集。静下心来，不禁想起与我遭受同样待遇的学友们，他们大概也收到了同样的通知吧！随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想法。

一天下午，湘潭电缆厂子弟中学传达室的老师傅递给我一封封面印有“衡阳师专”红字的信，上附“无法投递退回原处”字样。我惊异地拆开，从厚厚的一叠信纸最后一页的角落里看到了“海琛”的署名。多少年的恶习，总以为自己淌的血比别人多而且浓；这本该熟悉的姓名和字迹居然已经淡忘。读完全信后，油然而生出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去一趟衡阳。我向

一位刚分配来的衡阳师专艺术科毕业生询问海琛近况，知道海琛双耳失聪。给该科学生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欣赏课，下课铃已响多时，仍然眉飞色舞地讲解着，学生不得不上前大声告诉他早已下课。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贝多芬晚年指挥乐队的故事，心里一痛，去衡阳的打算更加坚决了。

期考一完，我处理好有关事项便请假到了衡阳。按衡阳师专传达室同志的指点，我找到了海琛的住处。那是一幢六层的教学楼，第六层略加改造，供单身教师居住。我气喘吁吁地往上爬，暑假还没到，全楼却静悄悄的。最高一层只有一位二十余岁的男教师在一个大木盆里用木搓板搓洗衣服。询问之后，才知道学校已开始实习，海琛早已带学生外出，他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锁。从那位教师敞开的室门看，室内面积不大、陈设简单（桌、椅、床、书架各一）。我不知道海琛居室内是否相同。果真如此，年逾五十的海琛在这里该怎样生活。第一次的拜望，却这样扫兴，怪我心急，事先未通知他。

同年秋，我利用国庆假日又去衡阳（此后曾多次前往）。因为预约在先，海琛早已在传达室坐等。他满面红润，看起来身体健壮。我笑着说：“你的身体比我预想的要好。”他回答：“活八十岁没问题。”这一次，他已搬进专为单身教师盖的宿舍楼，除居室外，还有数人共用的厨房。当晚住下，不用说几乎是通宵未眠。别后二十来年有多少“沧海事”要说啊！但大多是他说我听；因为我说话太吃力，不提高嗓门他听不见，只得中途插话择其要略说几句而已。

我终于知道了他别后的情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打发完去各地改造的“右派”学生，次年三月，他被送往清河农场接受改造。最难熬的是一九六〇年。饥饿与疾病夺去了他的健康。大病一场之后，他的耳朵已经全聋。六一年摘帽后，他留在农场。“文革”开始，他被送回湖南，安排在农场就业。当时揪斗之风大盛，他的弟兄担心他的安全，把他接回衡阳县农村。海琛与乡亲相处十分融洽，他简陋的住处常是大家聚集闲聊的地方。他的缸里有米，任何人可以随意盛一些去煮饭，一发现缸空，不知谁又会送米来。他笑说：“这倒像是‘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厂他帮助乡亲改良棉花品种，大面积丰产，连附近几个县都派人来取经。公社让他去讲解介绍，但不准报姓名，更不得泄露身份。人们盛传北京农业大学来了一位大学生技术员。一九七九年改正后，他来到衡阳师专政史科、中文科，从中国通史教到中国古代文学，专攻“元明清”段。为搜集资料，他每次出差，首先是跑书店。一次外出，在一家小书店居然看到一本钟嗣成的《录鬼簿》。当时在湖南，买这样一类书十分困难。他高兴至极，可惜店里只有一本，早已被一位小伙子当做鬼怪传奇抢在手中，海琛不得不向小伙子反复说明，才得到对方的割爱。为了研究《长生殿》，他整整一个暑假泡在图书馆里，每天八、九个小时，终于完成一篇论文，初稿三万余字，后来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发表在该校学报上。

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他有一个抽屉全部是学生的信。我看了其中几封，信里充溢着的是师生情、父子情。他工资不高，常因资助贫困学生而饭票紧张。他同学生谈学习，谈做人；学生也把心里话告诉他，包括家庭纠纷，个人恋爱婚姻等等。一九八三年暑假，海琛赴山东泰安参加学术会议。会毕，同行者急于返校，他却特地绕到浙江肖山去探望一位毕业生。有一位毕业生买好汽车票去单位报到，行前却又退掉票返回母校，为的是跟海琛再聚一天。为了学生的切身利益，他常仗义执言。学生宿舍大楼四周水沟堵塞，春季下雨脏水漫进了一楼走廊，砖头排成长龙都难以行走。学生多次呼吁，毫无反响。海琛实在看不下去，一天他把总务处负责人员叫到现场，不顾人们围观，指着对方鼻子呵斥：“要是你自己住在这样的地方，又会怎样！”并要求对方赶快解决问题。第二天，水沟果真疏通，楼道积水也已排尽。为此，师生对海琛更加敬重。

一九八四年，海琛调任图书馆馆长。当时，该校图书馆条件很差，藏书不多。他从筹集资金、设计建馆、添置设备、培训人员直到购买新书都全力以赴。学校的支持，加上利用过

去的老关系（海琛四八年参加革命，衡阳许多部门有他的熟人），他终于让校园内矗立起一幢崭新的大楼，里面装备了当时先进的传递设备以及防火防潮防虫蛀等设施。仅阅览室就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期刊、报纸以及教师专用等好几个。大楼里明亮、安静、舒适，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

最值得提到的是他对母校的感情。他敬爱教导过他的先生们，尤其是黄药眠教授。一九七九年他去母校，特地拜访了黄先生。那时黄先生的错案还没有纠正，仍住在两居室的宿舍里，外间堆放着工具，里间则是卧室。先生卧病在床，听完他简单的自我介绍，便坐起来，靠在床栏上与他谈话。二十多年的沧桑，两、三个钟头是怎么也谈不完的。海琛返校后，与黄先生还有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一天，海琛来湘潭看我，一同逛书店时，发现一本黄先生的散文集。海琛立即从书架取下翻看，告诉我这是先生接受“改造”时思考人生思想火花的结集，里面包含许多哲理。他当即买下，说是要细读并留作纪念。

海琛自己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的前妻留下的女儿与数百里以外的一位煤矿职工结婚后，为着他的原因，户口的“农转非”、夫妻分居、工作安排等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女儿带着两个男孩随海琛来到师专以“黑人”身份在校印刷厂打工。海琛再婚后，妻子又带来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全家人的吃用、住房、儿孙的上学、辅导等诸多问题一齐压在他的肩上。生活的艰难并没有改变他的做人的原则，他从不为私人问题找老朋友开后门。他对党的信念也丝毫没有动摇。一九八六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他教育找上门来的学生，劝阻他们上街游行。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他发病的当晚，还在写纪念党的生日文章。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晨六时，海琛从医务室看病回来蹲厕所时便往下倒。数人抬上车赶往医院抢救；但无效。中午便靠人工呼吸维持心脏跳动，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接到他家属的急电时，正在数百里以外的教学点主持毕业论文答辩，无法脱身，竟连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朋友和学生永不会忘记他。六月十日在市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校党政领导，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以及家人、亲友、学生代表等二百多人挤满了会场，一百四十多个花圈堆满了会场四周，仪式始终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他的老师刘靖安先生作挽联云：

“光明磊落，忧国忧民，哀人生多艰，华夏腾飞伤逝去；
诚恳热情，爱生爱友，喜事业有成，马翁含笑出迎来。”

张海琛去了，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永远地去了。但曾经与他一道遭受过厄运的老同学仍在继续努力，以自己出色的业绩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告慰他在天之灵。下面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

罗宗义，内蒙古赤峰师专中文系系主任，茅盾研究会理事，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三等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所著《茅盾文学批评论》、《回眸集》、《站立到明天》等获华北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各种奖项。

俞安国，特级教师，省优秀教师，享受政府津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中等师范学校教师三等奖，著有《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合著）。

周作祚，河南新乡一中教导主任，国家级优秀班主任。退休后竭尽平生积蓄创办华光高中，在当地享有盛誉。

王增佑，特级教师，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兆钦，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新编高中语文十用词语手册》《文学的模糊与语文教学》等科研成果获各种奖项。

张德文，省优秀教师，全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市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功臣，著《先秦儒家思想三论》，曾应邀赴台学术交流，1987年9月19日《中国教育报》有图片介绍业绩。

迷茫与挣扎

张德文

一九五三年秋天，我乘北上列车赴京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报到。这跟我第一次进京不同。那是一九五零年夏季，我参军去吉林四平路过北京，我只趁候车的间隙请假去看了看天安门。短暂的逗留，首都没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要在北京待上四年，我有了细细感受人民共和国首都风光的充裕时间。北京师范大学是有五十年历史的知名高校，北师大中文系拥有一批如黎锦熙、黄药眠、钟敬文等这样知名的大师。•我将利用四年宝贵的时间和学校优越的条件，创造我人生道路上的辉煌。我踌躇满志，信心十足。

第一学年是在和平门外南院度过的。这里曾是鲁迅执教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仍赫然屹立在教学楼中间的广场上。高高的钟塔、古老的图书馆、U字小院里参天的白杨和小院里不分日夜照料我们生活姓韩的胖大爷……新环境里的一切都给予我鲜明的印象。同学的籍贯遍布全国各地。在那些来自京、津、沪、穗等大城市擅长人际交往的同学面前，一种莫名的自卑感在我这个出生于南方小山城调干生的心里竟无端油然而生——尽管我有比他们丰富得多的经历，而且每段经历都获得过极好的评价。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赶上他们，争取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

第一学年的考试，我取得了全优的成绩，并被评为三好学生参加学校三好学生大会。我向党组织表达了争取入党的愿望。第二学年，我被任命为班长，进入团支委会。第三学年，我接受了中文系班联会主席职务的任命。这个类似系学生会主席的工作，其实只充当校学生会和各班班委会之间的中介。除了上传下达之外，日常的差使就是不定期地向各班分发免费观看校外文艺演出、电影放映、听取专题讲座等的入场券。因此认识了一些外系、外班的新朋友。

整整三年，我生活的车轮，一直在组织安排的轨道上行驶。组织上说要学好各门功课，于是我争取考试全优；组织上说要树立专业思想，于是我努力摒弃当作家当学者的思想，不光学好心理学、教育学，还积极参加教育见习和实习；组织上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于是我认真上好中学六年一直逃之惟恐不及的体育课，还加入班上的黄继光锻炼队，天天练习长跑，系、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每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的队伍里，都有我的身影。我不像有些同学，他们有自己某一方面的爱好和钻研，甚至已经有了相当成功的表现，如罗宗义的茅盾研究、张荣生等人的美学探讨等。这也许跟我的经历有关。我从小就接受家庭和师长做好孩子、好学生的教育，我自己也一直以学习拔尖、遵守纪律、听大人的话为荣。解放后，无论参军还是执教，我都把组织性、纪律性看做第一要求，听组织的话、服从组织安排，是我的行为准则。上大学以来，我把这些想法上升为一种信念：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这种缺乏个性色彩的生活理念，到大三下学期开始动摇了。

一九五六年，国际风云变幻，大事迭出。二月苏共二十大开幕，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揭露苏共党内的个人迷信；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作“十大关系”的讲话，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六月和十月，依次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震惊了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十二月，《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见报。进入一九五七年，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接连发表讲话的传达。这两个讲话，经多次修改，后来公开发表

时，许多提法已有了很大变动，还增加了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不变的是它的中心——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以“鸣”与“放”的方针正确加以处理。

这一系列大事吸引人的注意。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组织大家讨论。大家的视野扩大了。思维敏捷的同学，很快把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与本班大二时的肃反运动联系起来。那一年，大家批判，斗争，忙了半个月，没揪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倒是吓跑了一个来自香港的同学，还发生了一个同学因恐惧批斗而跳楼自杀未遂的事件。校党委组织全体师生聆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已永生难忘的大事。毛泽东批评陈其通、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发表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中的教条主义观点，对于一度遭批判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则加以肯定，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与此同时，一股倡导独立思考、共产党人凡事都要自己动脑不可盲从的清风吹进了校园，更加刺激了年轻人否定人云亦云，要求创新，自己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根据学校规定，大四时所有在系、校兼职的学生干部一律回班。我也移交了中文系班联合会的工作，回到班委会。我有了足够的时间与同学们一块儿讨论问题。我开始回顾自己三年来的生活。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老是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生活方式？我常常刻意压抑自己（当时叫“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很累？我渴望学会独立思考，不勉强自己做自己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做的事情，我要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生活，加入那些喜欢争论问题的同学的行列。从否定个人追求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应该是一种新的开始。不幸的是，这种选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走上了令我始料不及的一条崎岖坎坷、荆棘丛生之路，走上了一条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年华浸满了自己泪与血之路，我陷入了另一种迷惘之中。整整二十一个春秋啊！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举国欢庆“五一”劳动节。我与王增佑等同学参加体育大军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在金水桥前欢呼“万岁”过后，我们读到了当天《人民日报》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欢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和其他同学一样，我为这个历史性的决定欢欣鼓舞，并毫不犹豫地认为共青团员作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理应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

事情的转折点是刊发于这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上穆木天的短文《我的呼吁》。文末呼吁“请党中央像搭救王蒙一样，搭救师大吧！让黑暗王国有一线光明吧！”这句话显然套用了俄罗斯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评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大雷雨》论文的标题《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理论家不足三十年的悲剧性人生历程和穆先生授课时对他热情洋溢的评价，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穆先生关于“师大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套用杜氏的这句话却有所夸张且显然不合时宜。这件事理所当然地震撼了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们不知文章所指的详情：于是，四处探问者有之，直接拜访穆先生寻求答案者亦有之。结果是引出了西北楼415室同学的大字报《谜？》。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校党委书记何锡麟与俄语系女研究进修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以致不敢引火烧身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亵渎了共产党人的神圣称号，也震怒了共产党的青年追随者。大字报在早餐时贴出，同学们早餐完毕回宿舍取书包时，无一例外地被它所吸引，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虽然有的愤怒，有的疑惑，有的思索；但揭发校领导不正之风的大字报高潮迅速掀起，却成了事实。

我是最早卷进这一狂潮的人员之一。在我的体内，潜伏着路见不平拔刀而起的基因。我的父亲曾是辛亥革命新军的一员，后来直接接受黄兴的领导。他为人刚烈正直，对国民党官吏贪污腐化不思抗日专打内战的行为，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高声指斥。他对我影响极深，在我心灵深处播下了正义感的种子。这颗种子因我的中学国文教师周治平解放前夕的呵护而有

所萌发。解放后的组织观念教育和近年来“驯服工具论”的影响，压抑了它的生长。但一旦受到像大字报《谜？》这样的强烈刺激，它又爆发了。在部队当兵和任小学校长期间与部队领导和地方政府工农干部的接触，形成了我的思维定势：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朴素和蔼，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今何某的作为与我已有的认识反差太大，他怎么有资格担任校党委书记？我怀着满腔义愤参加了415室同学为核心以“底层之声”为名的活动：编辑油印小报，组织女同学采访学校某些员工。我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批评校方不正之风和周围党员的缺点错误。这期间，因为同乡关系，我与衡阳籍的调干生张海琛（后来被冠以“反党联合总部”“盟主”的“美名”）接触较多，个别文章出自他的授意。自然，这加重了我“反对党的领导”、“丑化党员”的罪名，并被列入了“图谋推翻党委领导”的名单。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我正在按照自己思考的结果办事。不料这却遭到了记者先生以“独立思考”为由头对我的攻击。那是反击右派一段时间“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之后，从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的团分支书记廖文慧通知我、罗宗义、俞安国和周作祚：《中国青年报》记者来采访，帮助查找思想根源，找出犯错误的原因；谈问题要实事求是。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犯下了大错误；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跳出泥潭，却又不知道应该从何做起。我把这次被采访当作一个机会，一个与组织重新结合的机会。现在看来，这次安排是一次颇费心计的非个人行为。为什么找我们四个人？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成绩优秀、平时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的共青团员，分别在校、系、班三级团组织和学生组织中担任了社会工作；而鸣放的表现已经构成了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极右分子”和“底层之声骨干分子”的帽子正等着在适当的时候套到我们头上。这正是他们所谓的“代表性”。剖析我们，正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记者张迈凭采访结果所写文章的标题）。我们怀着一丝希望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文史楼系办公室见到了记者。记者张迈用一种平等交谈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到不同于批斗会上硝烟滚滚的气氛，因而坦率地说出了各自反思和困扰的东西，并要求如果文章见报千万不要写出我们的姓名——这是几个年轻人希望保留一点自尊并为今后留一条出路起码的要求。结果如何，我并不知道。第二年，我在河北省坝上一所学校整理旧报纸时，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份的《教师报》上看到了张迈的文章（该文是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说我是“《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大右派”的“根据”）。文章开头写道：“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19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49个是右派分子，70多名共青团员（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说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权威性统计数字。我只知道中四<1>班划右派数字远比这要多；33个人划了13个右派，其中8个极右。右派数字占全班总人数39.39%，比张迈所统计的22.37%高了许多）。这些学生大都很年轻，为什么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记者在访问有关方面后，找出了答案。”原来张迈的答案包括四个方面：“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观点”、“所谓‘独立思考’”、“由不过问政治到政治上的反动”、“找寻矛盾，干预生活”。现照录其中第二个答案如下：

当然，这些学生之所以堕落成为右派分子，除了他们共同的臭味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原因。如底层之声的骨干分子张德文等在整风期间，口口声声地说：“师大的民主空气太稀薄了，同学们的思想受到压抑，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思想僵化”，于是他们就打起“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的旗号，高喊“必须抛弃盲目服从的顺民思想，抛弃相信大人物会替我们把一切都安排《良好的依赖思想》，要大家“开动脑筋，清醒头脑”，他们还慷慨激昂地说：“几年来，我们太盲从了，太相信党了，现在我们要独立思考，要大胆怀疑！”这些完完全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右派分子，所进行的“独立思考”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所大胆怀疑的都是正面的东西。譬如他们把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律称之为“教条主义”，把革命青年要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原则，看做是“束缚思想”，把伟大的肃反运动，说成“过火了，扩大了”，把生根于剥削社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称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总之，党委说是这样，他们偏说那样；党委说

是成绩，他们偏说是缺点；党委说是对的，他们偏否定，这就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当然他们并不是对一切问题都加以怀疑否定的，他们对于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的论调，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否定过，他们所怀疑、否定的，只是共产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由此可知，离开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片面地强调独立思考，这是多么危险啊！

这段精心编造的、四处搜寻拼凑起来的所谓“张德文”和“等”们的言论，即使都是事实也无法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的确，在当时他们的喊声有些刺耳，显得很不合时宜，那就可以定罪吗！好一个二十世纪的“腹诽”罪！

在对采访以后的事情完全不可预想的情况下，我选择了认真检查交代争取较轻处分的做法。我认真回忆了一个月来的情况：做了什么，写了什么，与哪些同学接触过……所有这些材料连同其他朋友的交代居然构成了署名“火星报编辑部”的文章《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戟的罪行》（《师大教学》1957.7.10）的内容。这篇文章毫无二致地采用了与张迈同样的手法：大胆想象、无限上纲。几个人在一块议论学校整风，是“有计划”的“密谋策划”；批评何锡麟等领导整风不力，希望同学们积极鸣放，是与党委“争夺领导权”妄图“推翻党委”等等。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被追问“你们心目中的党委委员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张海琛那样的人？”我们历来所信赖的组织希望给“右派”们再加上一条罪名：以张海琛（曾是团员，早已超龄）等取代校党委。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天大的笑话，张海琛连党员都不是，能成党委书记？我们岂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当然，我不可能承认这些罪名。但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组织上所作出的权威性结论，尽管迷茫，也只能沿着组织上给出的思路检查自己。

这是痛苦而荒唐的挣扎。

然而更痛苦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文系党总支干事宣布了除了张海琛、杨碧遐（被称做“底层”的“狗头军师”）以外的“底层之声”骨干分子的处分决定。我是情节和处分最为严重的人员之一。开除团籍，戴上“极右分子”帽子，分配到河北省教育厅，考查两年半，考查期间只能担任教学辅助工作，只发生活费。我与去陕西省的俞安国同行。在火车上凄然相对无语，只觉前途渺茫、凶吉未卜，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从省教育厅到张家口地区教育局再到张北县张北中学，各级领导干部都无一例外地说，接受艰苦条件的考验，彻底转变立场，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看来，这就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张北县是前察哈尔省察北专署所在地，但全城只有纵横交叉的两条街。在城中心的十字路口，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有人来往，买卖不断，此外时间则难见行人，一片寂静。间或有车徐徐驶过，车信扬鞭吆喝，留下点点马粪。冬天，大街两旁店面屋檐下蹲着头戴狗皮帽、翻穿老羊皮袄的当地人，他们晒太阳取暖，可阳光的照射毫无暖意。学校没有自来水，水井旁倒像溜冰场；厕所的蹲坑里高耸着粪冰山，只有天天刨掉粪冰，才蹲得下去。北风卷着雪片，漫天飞舞，人称“白毛风”。气温最低曾到摄氏零下四十度。春天来临，沙尘暴把白天变成黑夜，风沙打得脸生疼，更无法睁眼；风停后，室内到处是沙土。就在这样的地方，一待就是十七年。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外，还写、编、刻印校报，写校内外墙壁上的标语和语录，刻印试卷，编导大小戏剧、歌舞节目，偶尔也奉命写一、两篇文章。翻地、播种、锄地、割麦、挖山药蛋、刨粪坑、刷油漆、铲煤、运煤什么体力活都干过。人真是怪物，在外界超常的压力下，居然可以挖掘出想象不到的无穷无尽的潜力来。我愿意去农村干活。贫下中农的朴实、友善给了我温暖。虽然我不同于别人——他们是支农，我则是接受改造，但我从来没被善良的有传统良心意识的农民们歧视，没感到孤寂。最怕的是写、刻、印文章和校报：初稿要交党支部委员严格审查，他（她）们能从字里行间嗅出你的“立场问题”。对策是小心谨慎，一改再改；否则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得了！最无奈而绝不可缺少的经常工作，

是写思想检查和接受批判（美其名曰“帮助”）。思想检查必须在批判会上受到众人的审查，因此这是世上最难写的文章。写得简单或篇幅短了是态度不老实的表现；篇幅长具体事例不多又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企图蒙混过关。冷不防还有人提一条补充意见：某月某日你说了什么什么，那可是立场问题，你避重就轻。其实那是子虚乌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鸡毛蒜皮，哪谈得上立场？标准的写法是“彻底交待思想，深挖思想根源”。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为了这每月一次的检查，不知绞了多少脑汁，写了多少违心的话，内心里不知受了多少痛苦的煎熬。

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

开始是造反派炮打当权派、走资派。工作组进校后，下令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语文教研组成了“三家村”黑店，教研组长位正直的老共产党员成了“小邓拓”黑帮分子。当时我已摘掉了“右派”帽子，分在语文组。语文老师人人自危，为了自保，联名张贴大字报把我这只“死老虎”抛了出来，罪名是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抓语文学习是搞“智育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关心学生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母爱教育”，腐蚀贫下中农子弟。平日被赞扬受到肯定的东西一下子全都颠倒过来变成了别有用心，居心叵测。随之而来的是学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们从我批改的作文里挑毛病：把写有“毛泽东”字样的病句划掉，是“反毛主席”；批语里“毛主席”三个字因为提行的需要分别写在两行的行尾和行首，成了“腰斩伟大领袖”。如此愚蠢和荒谬，令人啼笑皆非。就是此类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组成了压顶的乌云，雷电轰隆地直压你的头顶，人们战栗不知所措。我也异常恐惧，但又存有一丝幻想。我已经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积极参加鸣放，是我作为人民的一员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此时唯一的选择。况且既然有人又要把你重新推到敌人那一边去，我也不能不自卫不揭发别人的问题。人本来跟动物差不多，在非正常情况下，也会你咬我一口，我就回敬你一口。但我还不想学别人那样乱打棍子乱扣帽子，我本着只摆事实不下结论的原则写了一些大字报，希望得到一个好的评价。但结果适得其反，革命群众说你记得那么多事，你平时一定记了变天账，赶快交出账本！还有人说：“你个老右派还不老实。（说明一下，如果以年龄说我“老”，错！那时我只有三十五岁！）你以为摘了帽子就没事了？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帽子掌握在革命群众手中，想给你戴上就戴上！”我糊涂了！不是说摘掉右派帽子就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来吗？那么，我现在究竟是什么人？我的位置在哪里？我真彻底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并非此时始。五七年批判的右派言论有所谓“独立思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但五八年中央报纸的社论，却堂而皇之地告诫读者要学会独立思考，要变成内行，不要当外行。五七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但五八年以来却说党员个人不等于党组织，党员的成绩虽归功于组织，党员的缺点错误却只能由他个人负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被卷进了这是是非非的漩涡中，怎样挣扎也跳不出去。

除了心灵的折磨，还有人身和人格的侮辱。有一天，我正在抄写毛主席语录，突然闯进一群红卫兵，一个抓紧我的手，另一个则给我推剪头发。等他们涌出门，我对着镜子一看，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天哪！这不成了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吗？我被剃了鬼头，我还怎么出去见人？更糟的事情接连发生了。我和“走资派”、“牛鬼蛇神”们被勒令唱“牛鬼蛇神歌”，还要不断打自己的嘴巴配合表演。边走边唱，一叫你停就停，一不满意，还得重新开始，直到满意为止。我受不了！想到了死。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我幻想着不同的死法。最美妙的莫过于溜出校门，登上火车，当列车驶到大桥上或悬崖边时，我推开车窗，纵身一跃，飘呀，飘呀，我的肉体化为灰烬，融入大自然。现场没人知道我是谁，单位不知道我的去向。一切迷惘、烦恼……从此一笔勾销。这时我已结婚，已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妻子从我的信觉察到我的心情，立即写信告诫我“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还要相信自己”。她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从她来信的字里行间我感觉到她正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不

仅在折磨自己，而且还折磨着我的家人。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让我的妻子和女儿成为现行反革命的家属。我要活下去，我倒要看看这一切的一切将以怎样的方式终结。

物极必反，重压倒会激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我终于支撑到了一九七九年。

这年三月我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改正错划右派的结论，恢复团籍按超龄团员处理的通知。没有任何理由，只告诉你是“错划”，要“改正”。然而这“错划”二字却颠倒了我二十二年的生活，耗掉了我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正像复出后的艾青回答北德广播电台记者斯维特其克·沃尔夫冈的问话时说：“现在人们承认，他们搞错了，每个字代表七年”。（杨匡汉、杨匡满《艾青传论》，上海，1984）今天我虽然还活着，但我失去了的是再也无法追回来了。二十二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二十二年？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岁月。

一九七九年至今又一个二十多年艰难的思考，我终于弄清了我一直大惑不解的问题。七十三年生活，我一直在迷茫中挣扎，挣扎后又陷入迷茫。无论是旧式的封建教育，还是新式的“无产阶级教育”都要求你只能听从一种声音，只能按照一个标准塑造自己。当然，目的不同，一个是为了家——光宗耀祖，一个是为了“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共同点则是决不容许人性中闪耀多彩的个性光芒。于是，价值取向单一化，千人一面，没有生气，没有创造性，人性被扭曲。人性再造的方向应该是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缺乏共性的个性，缺的是脊梁骨，是精神支柱；没有个性的共性，是苍白的，是不真实的存在。我们向往的是主流价值导向一元下的人性多元发展，个性合理张扬，创新精神被激活。育人思想一旦被阶级斗争牵着鼻子走，处处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那就会造成无数个人的悲剧，酿成民族的灾难。

五七年“反右”的教育太深刻了。仅以北师大五七届中文系毕业生而言，被错划为右派关进监狱，身心被摧残复出后难有作为甚至过早离世的已无法完全统计。当含泪咀嚼过去的痛苦，再一次感受沉重的记忆无法变得轻松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历史再也不能重演！让我们的后代健康，自由地成长！但愿！

不堪回首的一九五七年

张荣生

一

要从尘封的记忆中找出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在我是一种痛苦。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大鸣大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我和潘仲骞却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潘仲骞忙着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而我正艰难地写着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美、美感及其它》（此文登载在中文系的刊物《谷风》上）。

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几天，记得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沈雁冰谈有职无权的文字，突然心血来潮信笔写了篇短文《论以党代政》，主旨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结尾我还郑重指出，“我绝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写完后随手交给正在阶梯教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刘叔成，意思是让他提点意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反右斗争中的“左派”大字报社，《火星报》未告知我一声，竟公开发表出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汇报思想、写文章征求意见是思想问题；发言、发表文章则是政治问题，这就埋下了我被打人另册的祸根。说良心话，刘叔成当时也不知道其中厉害。按照阶级斗争铁的逻辑，权力已经精心布置了一个陷阱，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鲨鱼。

这篇文章，再加上班长王乾生留存的一份墙报底稿《随感》（我当年是班级墙报编辑，又是团员，天真地以为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于是写下了《随感》），这些就成为我既有言论又有行动，猖狂向党进攻的铁证。

对我的结论和处理意见如下：

结论及处理意见

张荣生，平时表现即脱离政治，只扣业务。对集体对组织格格不入。肃反运动时不积极，一贯狂妄自大，极端个人主义。去年国际修正主义歪风起来后，更要求绝对民主，大加提倡独立思考怀疑一切。对正确原则都斥之以教条主义。

整风开始即在班上散播谬论，污蔑党委搞肃反运动是“唐吉珂德式的英雄”“肃反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且犯了很大错误”要中央答复。并说“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事实上没找出胡风和国民党的联系”攻击班上党员是特殊人物，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并写反党文章“随感”“以党代政”等。

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群众斗争右派分子也极反感。对自己问题交待比较老实，表示愿意改造重新作人。

根据以上情况，为一般右派分子，决定分配工作，考察一年。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

审查人 杜慧民

总支书记 陈璨

同意总支意见 1957.10.30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审查人 张斧（章）

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章) 副校长 何锡麟(章) 10.31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大概是七月份吧, 因我写了《论以党代政》和《随感》, 团支部书记周仪庄通知我在团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 检查中我谈到了让炊事员上台批判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有点想法。竟想不到的是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居然变成了“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 群众斗争右派他极反感”, 两个“极”字的力度以后我才知道: 中央文件有这样一条规定: 同情右派者即右派。

“肃反斗争不积极”。我是 1956 年 1 月 14 日入的团。55 年肃反运动不积极能入团吗? 何况不积极也构不成罪行呀。

肃反按照延安抢救运动的模式, 弄得人人自危, 草木皆兵。这是群众普遍的感受, 但又不敢说出来。四十二年后, 我班丽莹在《g 匡段岁月, 那代人》中写道: “肃反运动一开始, 整个校园都充满了紧张气氛, 好似人人身边都有胡风分子, 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每个班上都有重点怀疑对象。但在我们班的‘对象’中并没有这位冯老。可是, 他胆小, 害怕, 竟在夜深入静时, 一个人悄悄地爬上了楼顶……(跳了下来)”(见《时代文学》1997 年第三期)。《随感》中写的就是我所在的北师大的情况, 冯老就是我们年级一班的冯展雄; 另一位同学区绍鑫, 肃反后回到香港, 就再也不敢回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斧在 1957 年 7 月的一个报告中说, 该校在肃反运动中, 有 129 人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追查, 168 人受到批判并审查历史, 146 人被审查历史及社会关系, 以上三项共计 443 人, 接近全校师生总数的 10%”。(于凤政《改造》第 421 页) 1956 年学校党委书记何锡麟代表党委在全校范围向斗错者道歉, 我们班级也向徐唯一、余伟光等同学一一道过歉, 这都是铁的事实。据我所知, 许多高校也都存在类似情况。肃反的时候, 冰心不在国内, “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 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 “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犯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 冰心的看法, 该是较为公允的吧。

1957 年 7 月 18 日, 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有这么一组数字: 第一, 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有八万一千多名; 第二, 一年多来, 由于肃反运动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第三, 在肃反运动中, 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见, 肃反波及到不是反革命分子的 130 多万人, 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一些吧。肃反是由胡风案引发的, 仅胡风一案就涉及 2100 多人。历史证明, 胡风一案纯系冤案。肃反运动, 运动群众, 波及大量无辜, 为以后的“反右”和“文革”开了一个坏头, 这种做法,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是不可取的。

“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的罪状也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是 1957 年 5 月 25 日在班级鸣放时, 我谈了党对知识分子积极性估计’不足, 打击了很多人。并说: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 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无机化学家高崇熙先生在三反运动中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结果国家科学规划中有无机化学课题, 却没有学科带路人。”(班级记录稿记的并不是我的原话)。1957 年 11 月 1 日上午, 看到党委对我的《结论及处理意见》时, 我就在背面写下了意见, 但结论仍然是“造谣说……”。死没死人应该以事实为依据, 难道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死得还少吗?

当时“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个雷区, 我之被打入另册, 估计和这一问题有很大关系。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了。历史已经证明我的正确, 而且将继续证明我的正确。

我还清楚地记得, 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彭真 57 年 8 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 以及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 我还属于基本群众, 甚至叫我晚上去看管受批判的同学, 这说明当时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北京师范大学分配面向全国, 我第一志愿填的

是青海，第二志愿填的是黑龙江，都是边疆。有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作为公民，完全有权对国家事务谈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可是在当时却成了滔天罪行，不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根本不核对事实，更不听取当事人意见申诉，仅凭这一纸字迹潦草、错别字不少的《结论及处理意见》（判决书！），就从政治上置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于死地，并受了二十多年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折磨，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对应届毕业生的做法是：在小组作政治鉴定者为内部矛盾；在班级作政治鉴定者为敌我矛盾。根据当时《教师报》的报道，北师大中文系我们年级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49人，受处分者70多人，我则是二班最后被揪出来的。

1957年11月4日，我以异类身份到黑龙江教育厅报到，教育厅分发到绥化县教育局，又分发到了第一中学。教育厅的意见是：不担任教学工作，只能担任教学辅助工作。

在绥化第一中学，起初是在教务处刻钢板，油印材料，编课程表。大跃进中又分派到学校鸡舍，独自承担全套饲养工作。

改造期间不给工资，每月生活费” .50元。北师大定为考察一年，实际上经过了五个年头（1957—1962）。在这五年里，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政治思想犯，单单好好劳动是不行的，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自己思想一闪念，时时记住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异类，把自己妖魔化，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越反动越好。所谓彻底改造世界观，就是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许有任何不符合当时政治风尚的东西存在。这一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过程自然是非常痛苦的。

1962年5月摘帽后，虽说回到了人民内部，但仍然是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工资被定为中学最低一级，即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工的工资，每月40.50元（别的同学就比我幸运得多）。到1977年，整整二十年，我的工资才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生刚转正后的工资水准，每月52.50元。

62年正值下放干部，而我不愿意留在绥化一中教学，于是下放到农村公社17年。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自然在劫难逃，以所谓“隐瞒地主成分”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又一次被打成了阶级敌人，甚至小时候随父母到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做礼拜就是基督教徒”，也成为一种罪行。

1970年插队落户做农民。

十年浩劫显示了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把你推了出去，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就保护了自己。十年浩劫中，像我这种异类，连死都不敢去死。一是担当不起“自绝于人民”的恶谥，二是妻子儿女将受到株连。

作为贱民，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在运动中，那种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局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二

恶梦醒来是早晨。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小平，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其中自然包括肃反、反右中的冤假错案。

1979年2月，北师大贯彻五十五号文件办公室经过讨论，决定对我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改正通知原文如下：

张荣生同志：

根据中央<1978 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你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师大委员会一JL—k 九年2月8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你开除团籍的处分，关于对你的改正结论，已寄给你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你档案中有关右派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撤除销毁。

希望你今后努力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致
敬礼

北师大贯彻五十五号文件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复审意见原文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张荣生右派问题的复审意见

张荣生，男，47岁，江西新余人。家庭出身牧师兼医生。本人成分学生原中文系学生，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受开除团籍和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1962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黑龙江省绥化教革办进修组工作。

张荣生被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及复审意见：

1. 张在5月25日班里的座谈会上发言说：肃反“师大党委不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想出强大的敌人，结果变成一出滑稽戏。真有点像堂·吉珂德式的”还说“肃反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且犯了很大错误。要中央答复”等等。关于这些话，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存在有根本性的错误。张荣生之所以产生这些错误想法，是因为他受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思潮影响，看到师大肃反中的问题，进而推想到其他单位及全国。但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恶意攻击党的肃反政策。

他还说“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事实上没有找出胡风和国民党的联系”。这话没有什么错误。

2. 张在六月十七日的“火星报”上发表，“评以党代政”一文。该文在党委委员方铭同志讲了帮助党整风也可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制度某些环节上的问题之后写的。写完后，经党支部书记刘叔成同志看后发表。文中有些说法是有错误的。如：“在我们国家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都存在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党政不分现象。”但这篇文章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3. 有些错误认识系张本人交待，不能做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张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虽有错误，但还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原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予以改正。撤销开除团籍处分，按超龄团员对待。撤销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

1979年2月10日

很明显，复审仍然给我留了两条尾巴：一是，我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存在根本性的错误；

二是，我的《论以党代政》一文中有些说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两条尾巴将跟着我一辈子了！

三

2000年5月17日，我写信给北师大党委，要求他们将我写的《随感》和《论以党代政》复印一份寄给我。

党委组织部的复信全文如下：

张老师：

您好！来信收到，经查您的《论以党代政》，《随感》没编进《北师大右派言论汇编》中，只从对您的处理决定中找到随感摘要，今将其复印给您，其它就没什么了，十分抱歉。

如有事，请和我们联系

北师大党委组织部 62208302

2000年7月5日

下面是他们寄来的《随感》摘要的复印件：

“随感”摘要（附件）

“几年来党由于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多党员开始忘记了过去斗争的目的，思想上慢慢沉溺于自己过去的一些功劳”，滋长起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教条主义、特权思想，渐渐忘记了自己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了。

说干部子弟学校（如育才学校）是贵族学校，“只能培养他们的少爷作风”。

“见党委如见官，很多地方所反映出这一点，师大也并不例外”。事件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对党员不能有意见，对师大党委不能有意见，否则就是反党。很多党员都沉醉于歌功颂德之中，反面意见是不听的，越来越把自己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把自己培养成一种特种人物。

说新党员“他（她）们是为了入党而入党，他们仅仅是面对党，而不是面对群众”。他（她）们入党后，就更加脱离群众了，就更加特殊起来了。

污蔑党的发展工作“党支部在吸收新党员时却偷偷摸摸的干，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

“今天吸收入党的又是对党积极，对群众不积极的积极分子”。

污蔑肃反，前期肃反“完全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师大党委不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主观里臆想出强大的敌人，结果变成一出滑稽戏，真有点像堂·吉珂德式的”。说肃反当时“那一个不是心怀恐惧矛盾，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试问有人上吊、自杀跳楼，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干的？这就是党委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随感》是我写的，这“摘要”是当时别人根据需要摘抄的，可能，我这篇文章的原文已经永远从人间消失了。我相信，那里面有些思想至今还是闪闪发光的。

以上就是当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罪证，而且都是些断章取义的罪证。动员、鼓励我们鸣放，鸣放一接触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我的言词确有偏激之处，所针对的大都是北京师大的情况；但哪一句话，哪一段话反对了党、反对了社会主义？权力

经常划出禁区，但权力毕竟不是历史，权力必须面对历史，权力最后毕竟得实事求是。如果说我的错误，那就是我不该有自己的思考，不该说真话，不该说出肃反运动存在的问题，不该就改善党的领导谈看法，以致为权力所忌。

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而且也是最为天真、最是幼稚的时代。每年的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我们曾多少次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呀！那时我们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有时是极其残酷的，不知道延安的抢救运动，不懂得社会主义道路上并不总是铺满鲜花，有时也会荆棘满路，有时还会六月飞雪。“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的身边，伺候着你一千回小心里的一回不检点，”在革命的名义下，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一下子就沦落成人间最为低贱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每当我想起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便不能不黯然神伤。

二十二年呀！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年，而且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二年！当小学生往我这个被妖魔化了的怪物身上扔土坷垃时，我的心是多么痛楚；当善良的人们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时，我的心在流血；如今我已头发斑白，还有人说：“你别和他在一起，他过去是右派”，一个担任过党总支书记的人公然当着我的面说：“就是不应该给右派平反”。天哪，还有完没完！

几十年来，我们默默无闻地在教育第一线，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而自己却在艰苦忧患中走了过来。有的辗转于监狱、劳改农场；有的做了工人农民，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的才算获得了一份工作。

作为个人，当然微不足道；作为个案，则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苦痛、坎坷、眼泪和无辜，难道不需要倾诉？所谓历史，无非是一点一滴加起来的许多故事的聚合，是无数蚁民生命留下来的痕迹。我辈的沉默留给历史的将是空白，于是我写出了我的这段不堪回首的人生。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2005年8月25日

“阳谋”织造的风雨人生

周沙白

1952 年从部队转业到武汉
1956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9 铁蒺藜围圈里的日子结束，长沙投母
“文革”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回到武汉
到武汉重操旧业
狼突鼠窜的日子
妻儿境遇无时不在眷念之中
回到秦淮河畔家中
到了上海妹妹的新居
缅顾近三十年
1977 “四人帮”下台，“凡是派”的怪影在中国游荡
1978 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册封“右派”之后，往昔在部队的同事，都异常惊讶地慨叹：1950 年部队进入川、康、青、甘边界剿匪之前，经历过政治上的整肃（不比延安整风期间，人人提心吊胆的日子，差得了哪儿去），意识形态的大整合，应该是经霜寒雀，学会了在任何风浪中三缄其口。自当明审乌云乱翻之际，保持岿然不动的态势，镇静、冷峻地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居然敢僭越雷池，自投罗网？讥我为不识时务的呆鸟，自讨苦吃：活该！

我何尝不知在历经惊滩浅底的冶炼后，明哲保身，皈依“中庸”“乡愿”之术，甚至丧心失操地随众吠声之必要！偏偏匹夫见义拔剑而起的孽根未除，在那不平凡的春天里，破土冒芽，向上疯长，惹下无穷后患。

—

1952 年从部队转业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担当播音员。由于未受过专业训练，凭藉与生俱来的一口京片子，未达到规范的普通话的标准，故在伦伦侃侃的工作中，重视加强业务能力的自修。

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的电台，强化政治引导和熏陶是无处不在的，我很自然地接受了共产主义观念。把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对于 1949 年以来亲身经历的土改、镇反、三反等政治运动，虽感到手段未免有些残酷，有失人道，但毫不怀疑它本身目的的正确性，诚是阶级斗争在终极意义上的需要。

在“舆论一律”的大旗下，主流意识形态浸淫风靡大陆。“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者的思想。”“物质生产的占有者，亦即精神生产的支配者”（上皆引自列宁语）。我也无从自国外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观念中吸取精神资源。可是在现实中看到“从龙入关”的新贵们趾高气扬、居功自骄，睥睨一世的作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从现实的体认中我朦胧地感到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当代执政者仍未能摆脱历史轮回的改朝换代的周期律。此念

萌生，即意识这是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世界观未得到彻底的改造。而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洗涤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如苏联一位作家所说：知识分子要循经一条苦难的历程，即用盐水泡、开水煮、冷水浇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争取脱胎换骨，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我无选择地在这一系统工程里尝试着，奋斗着，挣扎着，像个没头的苍蝇瞎扑腾。

以上讲述了 1957 年前的精神状态。

二

1956 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了大学生。

进入校园，环境宽松，有种解脱感，在朝气蓬勃的学生队伍里，焕发了精神活力。在师大那么多当代知名教授、学者的哺育下，在文学专业的领域里，经过不懈的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名学者型的人才的志愿实现有望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震动了知识界。群言群策，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活络了我锁闭的心灵。

波匈事变，反专制、要民主、争自由的呼声，震撼人心。

1957 年 4 月底，全校师生聆听由党委书记何锡麟传达毛主席当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及 3 月 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足足听了近 4 个小时。笔尖簌簌地在本上抢记下每一句话，兴奋得忘记了手指的疼痛。

国家元首慷慨陈辞，坦诚放言，谁会怀疑这是引蛇出洞，是“阳谋”，是诱敌深入，以便聚而歼之的策略呢！

毛泽东的讲话，引发全国地震般的响应，但见各界人士披肝沥胆，建言献策。

北京师范大学见诸报端的第一声回应是《光明日报》5 月 22 日刊出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穆木天的一篇不过几百字的短文《我的呼吁》。文中指出解放后历次运动，知识分子总是被整肃的对象。主政者多为不学无术之辈，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作者呼吁打破这黑暗王国的局面。

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天下午这篇短文被人由报上剪下，贴在饭厅后面的布告栏上。晚上饭厅后墙上满墙支持穆木天的大字报出现了。随之，围着饭厅周边，针贬时政，对校内党群关系疏离，非党干部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用人论资排等现象，揭露、批判的大字报，触目皆是。

谈论最多的，是对党委书记何锡麟与本校一位女研究生的暧昧关系在道德上的谴责。终结为何书记在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做了自我批判。

颇引人注目的是一起冤案。俄语系学生谢昕是印尼华侨，肃反期间，以特务间谍罪被捕，1957 年初假释回校。她在集会上控诉她无端受难的过程，引起群情激愤，书写大字报，要求建立法制，召唤人权。一本血色泼染的宪法书钉在此类内容的大字报的顶端，非常抢眼。

听说北京大学内的大字报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我和三位同学勃然起兴前往一观，以广见闻。

首都各高校首次出现大字报是 5 月 19 日（后被人称五一九运动），在北大的三角地，署名为“一群团员和青年”。内容是质询校团委：北大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贴出第二张大字报的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以展开争鸣，推动整风。随之中文系学生张元勋、沈泽宜等组织的“百花学社”的大字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三角地一带的围墙上、树木间拉起了长绳，吊挂着畅所欲言的大字报，矛头直指现实的弊端。北大刊物《红楼》编委，后被誉为 57 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头颅与脊梁、标志了北大精神的新闻系学生林昭（彭令昭）等一批生力军加入了“百花学社”，更震响了

鸣放的声威。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自建“黑格尔学派”，下笔千余言，署题《请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人之天下》直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之名，行封建专制之实。特别为之心应的是中文系学生刘奇弟写的《为胡风请命》的文章，为千古奇冤的胡风案呼吁，叩开我心中的郁结。

围观者最多的地方，是十余张整版纸抄录的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张贴的布告栏边，领略到斯大林时代惨绝人寰血腥大清洗的红色景观。

次日上午听完课，下午又到北京大学大礼堂听人民大学新闻系女生林希翎作目前形势的报告。内容繁多，可惜只记得关于胡风案件的由来，除触犯龙颜之外，还远涉到三十年代与周扬的积怨。稍晚又去清华大学看到署名罗兰《胡风冤案的面面观》的大字报，与林的报告内容互为补充，我对胡风冤案的来龙去脉有个粗略的了解：三十年代举凡与鲁迅接近的人，或不与周扬合作的人，意识形态不规范于党的文艺路线的文艺工作者，皆纳入整肃的范围。1949年前，对萧军、丁玲等作家之批判可见一斑。建国以后，周扬已成为中国文坛上的红色沙皇，以霸主的身份对“胡风集团”作整体扫荡，其势然也。

青年学生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开启了我蛰伏封闭的心扉，乃破门而出，于5月26日晨疾草一篇《把胡风事件真相布之于天下》的短文，张贴在大饭厅后门墙上。内容简括为：仅凭胡风往来信件中的片言只语，深文周纳，罗致人罪，清之文字狱，难望其项背……不曾料到，次日在我写的大字报周围，涌现满墙为胡风冤案呼吁的大字报。《支持莎氏（我写大字报的署名）对胡风冤案的控诉》、《还胡风以清白》、《把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有文章还誉我是为德雷福斯冤案呼吁而写出《我控告！》的当代左拉。这些声援，反使我感到事态严重。在北师大，我是为胡风鸣冤的始作俑者，一旦风云骤变，按“擒贼先擒王”的历史潜规，我是在劫难逃。

同班师兄黄铁华，久经社会磨练，早些时曾提醒我：直言贾过。现在，居然把他的提醒置之脑后，赤膊上阵，直指“圣朝”弊政，斥我迟早必遭乱箭穿身。还有位年方十八的小师弟邱成岱，虽未亲身经历政治上的风霜雨雪，在喧嚣狂热的声浪里，一直沉静清醒。见我已成出洞之“蛇”，连声叹我是历经多事不长半智的“小热昏”，痛惜地大而言之：“在不容异声的专政铁拳下，被辗为齑粉可能就是你的下场！”听了他们的良言相告，我从此敛气吞声，不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活动，但作壁上观。每日价不是泡图书馆，就是频频去北京人艺、青艺看话剧演出，也顺便拜候两院的名演员邵华、舒秀文等，他们多为早年出道于中国旅行剧团的。我曾在四十年代末加入该团，当年多承他们提携教诲。心想：如今后在北师大难以存身的话，拜托他们在剧院里安置个吃饭的位置。

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的第一枪。虽然，次日中文系学生范亦豪君疾书题为《这会造成什么？》的长篇大字报，以十多张整版纸贴满饭厅后墙，对该社论做出义正词严的驳斥，但是，此起彼伏的民主声势，怎能敌过专制政权组织起来的声势浩大的讨伐力量！到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来自御笔手示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更是字字千钧，锋芒尖利，“右派”已是瓮中之鳖了。全国性的对知识分子的大扫荡，立即取得了辉煌战果。

其实，早在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我已直感大势去也！此文是毛泽东三、四个月前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汇而成的官方文本，内部讲话与正式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上大相径庭，官方文本有个十分重要的添加剂，即在大鸣大放中如何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标准看来明确，实际上泛而无际，而解释权操于官方之手。

好个集封建社会权术之大成的运筹帷幄的战略家！鼓噪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言直抒胸臆的精神，然后“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以便“聚而歼之”，诱得天下右派英雄们“尽入吾彀”，玩弄于股掌之中，创造了历史上空前仅有的“阳谋”的法宝，令人

叹为观止。

我被小会批、大会斗，多轮轰炸，精神几陷入麻木状态。系里的右派学生被编成多个小组，在小组会上自我交待批判，互相揭发批判，争取立功赎罪。

这场运动把人性扭曲得奇形怪状，美好的品质被异化，蒸发腾飞，看到的只是无耻、告密、虚伪、残忍、狡黠、麻木、贪婪、野蛮、卑劣等恶毒的兽性、酷烈的狂轰滥炸。这是只有等到遥远的日后在历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上才有可能审理的、空前规模的集体犯罪。

下面，略微描述一下我们年级同学在反右斗争期间的面相。

年级党支书杜某，平素一副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风度，随着运动的滚滚恶浪，其残人以逞的狰狞面目，叫人大吃一惊。他在斗争我的大会上做了长篇的发言，仅有我为反革命胡风鸣冤一罪似嫌不足，最高当局以莫须有泡制出“章罗联盟”的荒唐之举，给他以启示与诱导，他乃依样画葫芦制造出个“莎氏集团”。我被封为首领，还有本年级同学陈绍武、刘哲侗、肖秉棠。我们四人都是戏迷，同在学生会京剧团同台演出过《空城计》，同去城内剧院看戏，还同去北大看大字报，仅此而已。陈、刘都是天津人，周六有时回家看望，就有了“天津放火”的罪名。在排练室中共同探讨演出事宜，不是“策划于密室”的性质吗？陈、刘、肖从未写过大字报，也未在鸣放会上发异声，他们的“罪行”，无非是从平日言谈中揪其一点一滴加以引伸，凭超级想象构筑罪状，演绎成“莎氏集团”的弥天大谎。

插叙一件令我感动之事。有位上海籍的同学孙炳全，平素与我没有交往，在反右斗争高潮中，在斗争我的会场上，见人们对我发出诬陷不实之词，竟站出来仗义执言：“周某为反革命伸冤，可以严厉批判，可有些向壁虚构的不实之词，无端地加诸周谋身上，有欠公平……”话犹未尽，便在一片乱吼声中，被赶出会场。就仅凭此一桩事，他也被打成“右派”，毕业后发配新疆。孙氏因我而遭难，至今怀疚于心。

我的反苏言论：抗日时期苏联不发一兵一卒，唯在1945年美国于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日本败局已定，方乘机出兵东北，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设施、工业装备，抢掠一空，且对东北人民杀戮奸淫、蹂躏掳掠，迄今仍窃据我旅顺、大连领土。

特别是无端捏造引起众怒的周某说“中共党员都是特务”，还直指我班一女党员说“她就是特务”。此纯属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下文将疏解厘清。

还有什么周某“混进解放军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一贯仇视工农出身的同学”……空疏无物的批判，就不一一缕述了。

看准时机，用别人的血，铺染自己的红色前程如杜某这类人虽不多，却起到了煽风造势的作用。

真可以算作“莎氏集团”成员的倒是有两位。一位王某，我写大字报时，他在一旁积极策划，关于文字狱、偶语弃市等语，都是他的主意。等到风云骤变，立即变脸，顺风而上，声色俱厉，揭发我的所谓反革命罪行，成了运动的骨干。另一位戴某，常与我訾议当朝弊政，一次谈及共产党员的操行，我说以前我在各个单位工作时都遇到个别令人不耻的党员，他们似是有种积习：对平素与人谈及的话题，不纠正，不劝导，却暗暗记下，并向组织汇报，遇有利时机便来个揭发，邀功领赏。戴某听后则一语论定：这些党员之所为乃特务行为。说话间恰有同年级一女党员经过，我忙示他噤声。不想反右期间，他反戈相向，把他的话语移植于我，义正词严地直指：周某说中共党员都是特务；周某直指那位女党员就是特务。这倒打一耙“戴冠周戴”的卑劣手段，出自一个平素看似很朴厚诚笃的青年之口，真叫我惊诧莫名，使我百喙莫辩。政治运动将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刹那间蒸发掉，转化为兽性竟那么快！

“右派”改正后，在北师大校庆期间，碰到那位女同学，我都难以启齿。不料她却主动对我多年受难表示关切，加以慰藉，弄得我非常尴尬。想厘清当年被诬陷之事吧，又想这岂不是让已位居名教授之列的戴某难堪？不说吧，那就坐定了那段诬她的公案，真叫我没辙了！

做点综合析议。趋吉避凶保存自己乃人之本能，随众吠声是最佳良策。于是“打倒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周沙白”、“坚决镇压反革命”……口号震天暴响，展示了义愤填膺的高涨的革命激情及忠贞的革命立场。这些为数不少的人，虽不是诚心也非有意，也没有昧着良心编造谎言、诬人以罪，但是，应当扼腕痛惜的是，他们也参与了这场亘古少有的织造冤案并导致受害者家破人亡的大悲剧的行列了，这总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吧！若多年以后能如巴金老人那样敢于自我解剖，升华一下自己的精神境界，那我就为他们祝福了。

那时，投身这场运动最前沿的积极分子中，也有良知未泯的人。这是二十年后与同学回首当年时了解到的。

一位同班任党小组长的倪姓师妹，平时就平易近人，与同学关系融洽，时常与同学交流心得，并不居功自傲，人皆称道。在反右运动中，胡风乃钦定罪犯，见我居然为之鸣冤叫屈，自然认定我属于阶级敌人，就凭这点简单的线性逻辑推断，不把周某这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蛀虫全部、干净、彻底的粉碎，则国无宁日。

但在那人性扭曲、兽性膨胀的疯狂年代里，她却未丧失起码的人的道德底线和良知。批判、斗争时她不越过我的言行范围去捏造事实。在宣布我是极右分子，处以劳动教养时，她对照当时颁布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从文件中文字的正面意义解读，认为对我的处分与党一贯执行的“对政治思想问题批判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相悖，于是在给我定案时，她在会上提出了质疑。多年后，与她同在专案组的同学告诉我，她对我的处分提出质疑后，人虽在专案组，已不再是核心成员了。后来，在经历了饥饿遍神州的大跃进的人祸灾难，及“文革”的血雨腥风之后，她追忆当年好似中邪般地在一股疯狂的热情驱使下，伤害了不少人，深感内疚痛苦。

“改正”以后，晋京参加会议，到文研所进修，或探候亲朋好友，总不忘拜候留校的老同学，尤其是在古代文学领域里孜孜不已地研究、硕果丰盛、有多部专著面世的彭久安老弟。二十年来，他一直关怀着我们这些在反右运动中遭难者的命运。在他府舍畅叙旧情新话，少不了会晤其邻舍留校任教的倪姓师妹，她总是回顾往昔那段沉重的往事，流露出诚挚的歉疚心声，弄得我真不好意思。睽隔千里，会面机缘不多，但在书信往还中，都能感受到她在精神层面上与我等有不少相通共感的话语；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她清晰的解读、思想的前瞻，我仍自愧弗如。

仅举上一例，可见当年同学精神状态嬗变之一斑。

然而，当年残人以逞，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仍以整人为业、嗜血为生的职业杀手们，随着风云变幻，与时俱进，不改其道，继续施其鬼蜮伎俩的变色龙式的人物，仍然存在。他们何以能绵延不绝呢？在于有培育他们的环境和土壤。变更环境，根绝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方为上上之策。然实施起来，真是难于上青天。

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后，我的行动坐卧，身边多了个“监护人”。1958年2月初，我和北师大第一批受劳动教养处分的右派分子，被押上了大客车，到海淀区公安局按下了十指纹印后，至宣武门半步桥监狱收监。1958年春节后，狱中待劳教群体，解送前门火车站，上了“劳教专列车”，直奔河北宁河茶淀清河农场。

劳动处境点滴：每日三餐窝窝头、菜汤，只在除夕这天一顿白米饭，大年初一有一顿饺子，年年如此。每两周休息一天，做个人清洁。劳动地点是本地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在地上挖排水沟渠，引进潮白河的淡水冲刷盐碱地，为以后置良田、种庄稼打基础。出工时间是两头不见太阳，即日出而动，日落而收工。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我们队的张队长所宣示：就是要在超强度的疲劳中侵蚀你们的思维能力，免得你们胡思乱想，搞什么反党活动。乍得此

言，不禁惊绝！好一个似冷水浇头怀里抱冰！

劳教人员无形中分成若干等级，右派当属末位。流氓犯、扒窃犯等群类可肆意嘲弄戏谑我们，他们倒炫耀自己是生活问题，比政治犯的我们高一截。国民党军政人员、军统、情报机构人士等，历史上曾反共，可现在拥护共产党，也比我们现行的反革命高一头。开会时，这群人会气势汹汹地声讨“右派”反革命罪行。此类荒唐奇绝的故事多多，容专文实录。

大跃进的人祸期间，教养农场可是重灾区。在住地院内，春季、夏季也是不毛之地，树上只剩光秃秃的枝桠，由于定量食物不足果腹，地上的草，树上的绿叶，都成了我们解饥之物。去医务室的人也多了起来，不是去看病而是装病，拿点药片以解饥。副食是看得见几片菜叶的菜汤，兑上大半盆开水，灌在肚内来个水饱，饭后大家都睡卧床上，互不交谈一语，避免胃肠蠕动，增加饿感。浮肿病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死亡者逐渐增多。这给活着的人造成一个“进补”的机会：死于寝室内，同室者不上报，照样领分配给死者的饭食，同室得分而食之，直到管理队长发现。有的队长斥责几句，可有的队长则罚同室者每人断食一餐。写到此，特别想起对我们劳教人员恩情厚重的殷队长。

一天，殷队长带队出工。行至大队部门前，有一只装猪食的大黄木桶，里边是剩饭剩菜和米糠菜根菜叶拌合的猪食足有二百多斤。大家一见，饿火中烧，什么卫生、纪律全抛之九霄云外，不顾傻气冲鼻，争相挤上去抢食。殷队长呼喊无效，解下腰中皮带，抽向抢食者的脊背。可这时谁还怕痛呢，况且大家都穿着棉衣！没多久，猪食就被抢食一空，最后还有两位跳进桶内，用舌头一舔一舔地把桶自上而底舔得干干净净。然后才继续出工。收工后殷队长点名时，不置一词，好像此事从未发生，只是次日大黄桶已被搬走了。

我和人称天桥一霸因斗殴被劳教的胡志安，经常合伙窃食以充腹。如出工时，我在大队部院墙外巡风，他凭仗手脚上的功夫，窜上高墙入院内偷几棵白菜，藏于怀中，出工期间偷空大嚼一番。有一回，小胡带上条口袋围在腰间，因预料这天出工在胡萝卜地附近，乘空我俩跑到有一片芦苇遮掩的胡萝卜地猛挖一阵，差不多已装了半口袋了，我们打算装满后把它藏在出工经常走的路边，待出工经过时取一点填肚子。偏偏又遇到殷队长走了过来，可他见四下无人，忙叫小胡把袋子背上，往地里走，路上殷队长只说了一句：“你们以后要小心点，别再给我惹事了！”回到住地让小胡把一代胡萝卜交给伙房，此事就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终结。

1959年春，我因一场大病住进了清河农场医院。二个月后出院，安排在老弱病残队的“585”分场。1961年5月26日，以保外就医之名，令我暂回家待命。铁蒺藜围圈里的日子结束了。

决定我劳教处分后，我多次苦求妻儿明确与我划清敌我界限，免遭株连之苦。妻咏芬甘愿患难与共无悔无怨，徒之奈何！离开农场时，我做了一个痛苦的选择：到长沙依四弟而居的母亲处，知道因此会对妻在心灵上是一种残酷的伤害，为了她有个长远的安宁生活，我的心在流血。

四

在长沙两年，间断地在当地学校代课，或拉板车、做搬运工。1962年底，派出所一警员对我宣称摘掉我的“右派”帽子，算是“摘帽右派”了。

1963年春，胞弟调到武汉铁路局工作，我也随同母亲到武汉，做了一年的劳工：修铁路、修公路等，旋又被介绍到中、小学代课。

“文革”开始了，我这个忝在牛鬼蛇神之列的人，自然被逐出校园。后来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小工时，一位老师傅可怜我的境遇，把泥瓦工的全套手艺，悉心传授，并道出他认准的一套生活真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以后不管那个坐了位，咱们凭手艺吃饭。”这学来的手

艺，就成了我以后流窜生活中的生存手段。

建筑工队不过百把人，按百分之五应在运动中被整肃的惯例，地富反怀右自然是首当其冲。斗争我的会上，我平素对“文革”中的是非从未置一词，就命我交待右派罪行，交待具体的右派言行也犯禁，因为那叫“继续放毒”。只得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大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扣，再说当时的流行用语：向毛主席请罪。

1967年夏，武汉的武斗升级，我被捉到某组织的江岸分部，遭到一群人的暴打，牙齿全部打得松动，几年后全部脱落（现在我口内全部是假牙）。在红色恐怖的环境下，遍体伤痕，即使亲人还能让我继续借住不忍下逐客之令，我也要知趣地离开了。

只得回到南京，妻的身旁。在夫子庙繁盛之区，我家坐落在秦淮河畔一条冷僻的小巷内，独门独院。我深居简出，妻咏芬调节人事关系颇有手腕，一时还不会给家里带来什么麻烦。与我有穿堂过户之交的郑医生，常来抚治我的伤处。他为人憨厚木讷，社会交往极少，只有到我家才不拘言谈，精神显得那么舒放，咏芬也待之情厚。我突生一闪念：现在灾祸方兴未艾，长此以往，不知弄到什么地步才会完结，何忍娇妻一生陪难？不如托付于郑，妻此后保有个安宁的日子。此念未敢向妻流露，知其明察秋毫，对我的五脏六腑洞若观火。

几天以来思绪云翻，夜间辗转反侧。她轻推了我一下，我知道糟了。果然，她噗嗤一笑道：“我阅人多矣！二十年前秦淮邂逅，至今我还无法解释我这历经尘世沧桑、洞彻世事之仙妹，怎么竟会中意你这混沌未开、不通世务、性情乖张的纨绔子弟，爱得那么疯狂且日久弥深。1957年后你一直怕株连我，这些时，又为我而折腾自己，但实在与他没有那种情缘，奈何！尔我合之则祸福与共、甘苦如饴；分则两伤。你果忍情离我而去，你会悔痛终生；而我或然如杜丽娘样含情饮恨而终。一念之差，悔恨终生，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的是咱们都难以承受的悲情结局。面对狂飙恶浪，不相弃、紧相随，等待云开雾散的一天吧。”一席肺腑之言，犹如懿旨纶音。二十年来总是把她的话儿，当作解我愚拙的灵丹。从我们相识之日起，为其高贵典雅，仪态万方的气质慑服，私许石榴裙下永做妆奁不二臣之盟。她就用她那上海方言谑我为“慧徒”、“阿木林”确也非妄诞之语。予我文化上的薰陶和引导，智力上的启蒙，滋养我的精神境界。故唯她之命而行，也成习惯。

是夜相拥而泣。

闭隐家中，所幸家中藏书在浩劫中未遭付丙之灾。她又从“革命组织”搜抄别人的“反动书刊”的库存里弄到不少读物，如《圣经》、《野玫瑰》（陈铨著）、《我的奋斗》、《铁幕下的悲哀》、以及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多部。在待晓鸡鸣风雨天的日子里，慰我精神的寂寥，尽享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乐。可算是独处小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浑不知时序转换已到了七十年代初。

“文革”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南京正开始清查国民党残渣余孽及阶级异己分子等，妻正是审查对象，我仍在此必会给她添不少麻烦。此时又得武汉四弟来函：母亲以北洋军阀眷属、满清贵胄后裔“罪行”正遭清算。妻闻之立即为我打点行装，送我到下关码头，殷殷至嘱：他们顶多折腾我一、两个月，给妈安置好了，赶紧回来。

五

到武汉方知母亲被折腾了几天，就被四弟送到湖南岳阳妹妹家中避难去了。

在武汉我是下乡对象，临时工没有我的份。一直到右派“改正”前，我最大的难处是无定居之所。亏得我家几代世交一直未断往来的辛亥革命元勋孙武之大公子，当时在武汉文史馆工作的孙刚，召去他家暂居。白天我带个小工，背个泥工袋，走街串巷到居民区、小厂家等地找点修缮活做。晚上睡在他家两间房中间走道上的一张条桌上。

1927年北伐成功，北洋政府瓦解，其中高层人士极少数人参加了蒋政权工作，大多数人都把蒋介石看做上海的白相人，耻为其效力。孙武住在北平史家胡同22号，两进的四合院的大宅门，常是北洋政府高层人士现在平、津一带的寓公们的聚会场所。父亲离开北洋政府后，在北平蒙藏学校教英语，目睹国家连年军阀战乱，曾抒情“天街上，细雨洒轻尘，报国有人心尚热，割地称雄梦如真，哀煞风城春”以抒胸中积郁。因我家与孙府仅隔几个胡同，又与孙家几代世交，故也是孙家座上常客，我在孩提之年，有时也随父前往。客人来往最多的是直系人物，如吴佩孚、陈宦（原陕西省督军）等。聚谈内容印象较深的是：辛亥首义元勋孙武及各地协同发难的功劳卓著的名将，被海外归来未参与辛亥革命一役的孙中山等一批同盟会诸人坐享其成，反而把他们冷落一边，不免满腹怨尤。又道北洋政府不乏干练通达、文武兼备之能人，若中山先生不拘一格、无派系成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则国势兴旺，不至于形成今日之混乱局面。

三十年后在武汉的孙武长子孙刚家常来的客人中，也有北洋政府人员的后辈，还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客人。每每从自身的体验中谈到，我们这些后辈，因成份出身问题，在各单位工作，都得夹着尾巴做人；遇有政治运动，就成为“革命”的靶子。

隔墙有耳。居委会主任来孙府调查往来客人的身份，常居的我，自然成为主要对象，知道是呆不下去了。正像在1965年，由至亲胡老师介绍我在学校代课，居住于胡家，在“文革”中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怕连累胡家，不得不出走一样，该换个地方了。

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经历了如《红楼梦》中“锦衣卫查抄宁国府”的变故后，我以天地为家的流浪生活，在任何变故下，历练出极强的存活能力。我背着一个毛毯压在泥瓦工具之下的背包，到小店铺、厂家、居民区，总能揽点零活做。晚上抽出毛毯，半铺半盖找个无定的晚宿点。地点经常如下：候船室、候车室、大屋檐下、火车货场空车厢内、公交车内、长江岸边。冬日到姑嫂树一带农家稻草堆，其暖也融融，睡觉只要睡得香甜，与豪华大厦绵软的席梦思有何区别呢？

这样的处境对母亲、兄、弟、妹都讳莫如深。因为老母也无法扭转此逆境，徒让她伤心。一日去看望母亲，听到弟弟说：“前几天省里来人找到家里，问你在孙家的情况，听说你在建工队做工，让你到省接待室去一下。”闻之一惊，细致疏厘一下在孙府所经历情况，需要我出面证实的可能有两件事。（一）“9·13事件”，林彪喋血蒙古，此时事件发生已有两个多月，正在查证林彪有关人员、事件。林彪之堂兄与孙刚同在湖北省政协参事室工作，常来孙府作客。曾闻孙家称1949年后，林彪老母不愿去京居住，在黄冈乡间，每月林彪寄回200元给其堂兄，托堂兄照料其母。此事与我关系不大。（二）孙家与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交往密切。孙武家居北京，有四子三女，有二位少爷、二位小姐在上海上大学时，都住在孙家公馆。沪上明星范雪朋、张织云、蓝苹（即江青）是上海孙府的常客，而蓝苹常在孙府与孙家小姐、少爷们打麻将。我父由京去沪偶在孙府小住，在牌桌上结识蓝苹，曾在她单人艺术照背面题有“艺冠群芳”手书，当即交给蓝苹本人。艺术照送给孙家小姐们，一直保留在孙府。在孙家避难居住期间我都看见过。“文革”伊始，就听说江青示人，举凡在上海那段历史时期有关的一切资料，一律细查收缴。此次省里对孙家的特别关注非同小可，若把我牵连在内难卜祸害到何等程度，不如暂避一时为上。思忖再三，决定去祖籍观察一番再作道理。

祖籍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农场大周湾。三代前迁籍北京，五十年代我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曾去大周湾探望周氏族亲，全湾皆周氏族人，见到背井离乡几近百年血脉同源之近族的我家有人来归故里，都似迎迓自己家里的远方游子归来那样，嘘寒问暖，热情相待。现在，经过十几年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亲不亲，阶级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的强化精神滋补，又处在“文革”张扬暴力、激发兽性的红色恐怖气氛中，如果乡里出现了地覆天翻的局面，会有我的好吗？反正已落得如此地步，去了见机而行吧！

万没想到，这次返乡，湾里见我落魄穷途而归，忙收拾我祖屋一间，还在厨房备置了水

缸、锅碗瓢勺等生活炊事用物，营造了一个使我生活安定的所在。我得到如此优厚的接待，可能就是亘古传延的家族观念，在周氏一姓聚居的湾里，尤其在外部环境不安的情况下，自然有个“保境安民”的意念，使周氏族人不受侵害，形成了个集体无意识的合力行动。湾里未出五服的堂兄弟们带我到各家论述长幼辈分关系，还介绍我到农场设在湾里的孵化室去帮忙，学了孵养鸡鸭的本事。

过了没几个月，省里的专案组还是到乡里找到了我。一个下午的询查，我光是用白天在外做工，晚上到孙家借宿来敷衍他们，并谈及一些生活琐事。话未说完，他们拦住了我，似乎他们已然知晓孙家内的一些活动，直奔主题问道：“说一下你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尤其是与孙刚接触的朋友的往来；还有孙家有些你应该知道的违禁的书刊、画片、物件等详细说说……”

我的回答大体如下：

（一）我与孙刚及其妹侣凡、侣芹（我称大姑、三姑）谈得最多的，是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当政时及下野后在京津一带的寓公生活的轶事。

（二）林彪之堂兄我连名字都不知晓，他与孙刚是同事，来孙宅作客，我不但未参与他们谈话，还避到另室，谈话内容无从知晓。

（三）江青（蓝苹）与孙府诸人交往于上海，当时我还在北京上小学，成年后听家人提起，方知有互赠照片之事，孙家人胆小，可能都烧了。

专案组人员交代，把所叙写成书面材料，明后天来取，还有事让我配合。他们走后，我开始撰写书面证言。次日凌晨，湾里的队长（我的堂叔）来了，脸色很沉重地说：“沙白，从他们的语气里透出事情比我想象的严重，无辜的你，可能要成为他们政治角逐中的筹码，生死都由他们的利害关系决定，事不宜迟，走为上策。他们再来由我顶着，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走！毫无选择。

六

来到武汉重操旧业。又开了个新睡点，疲惫之极时，买张到九江或安庆的船票，几天的乏累，在长睡中解除。船上同室旅客见我从白天到晚上长睡不起，忙推醒我问是不是不舒服，我顺口答应是发烧，他们给我拿来感冒药，端杯开水，我忙谢之不迭。一个政治上的专政对象暂时转换成与革命群众同等的角色，能不有点儿精神慰藉吗？

十年“文革”对我最大的浩劫就是无足睡之地。住旅馆我无必要的工作证、介绍信；买间小房，买卖双方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谁敢卖？单身又无固定职业的中年男子，即使瞒过政治身份，谁敢租我房住？看过《古拉格群岛》的读者会知道，给你整日整夜地睡不得的惩罚，比皮鞭、夹板的酷刑还惨。什么毒刑都能挺住，唯独这“不准睡觉”难耐。当审讯得不到所需要的口供时，不用任何刑具，只要用日夜不停连轴转地审讯让被审者不得睡觉的妙招，那就要什么样的口供都可轻而取得。我现在就是想，哪怕是虎狼之地，只要给个窝能睡个安稳觉，即使次日成为兽群的美餐，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叫做以身饲虎的胆量吧！

说是苍天有眼吧！还真给我提供了一个君子们会视为蛇蝎之地的安乐窝。我且慢慢道来。

有次入宿来到江边候船室，找好了睡点铺上毯子，坐下来抽烟。忽然走到我面前的一位女性呼我：“沙白”。仰头一看，声音怪不得那么熟悉，原来是“文革”初解除教职后，在江岸车站作苦力时同工的杨姐。听工地上人说，她丈夫四、五年前以反革命罪被逮捕以后，从此杳无音讯、生死不明。她带着一子一女，靠做临时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文革”一来，做工只能间断断续，为免遭断炊之苦，只有间做点黑市生意。她此时到江边来总不会把我当作选择的客主吧！我含糊地应道：“我在这儿歇会儿，杨姐……”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清楚我现在的处境，忙说：“沙白，不嫌弃的话到我那儿去住。”见我有些踌躇不安，又道：“我那几间破屋，给你一间单身住房。”只要有个睡觉处，什么也不要想了。

她家在湖边坊，是这个城市社会底层的居民聚居的地方。狭窄的路面，不规整的简陋的砖瓦房和板壁房混杂一起。她的房子在一条没有路灯之深巷的尽头处。共四间房，上学的儿女住一间，她一间，一间做厨房，堂屋是吃饭和活动之地。我就在堆放杂物的一间，拼几条木板，用条凳一支，就是大开心颜的睡窝。如漂母饭信似的这一贫妇赐榻的仁慈关爱，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会让我终生难忘此大恩的分量。

天蒙蒙亮起身外出做活，深夜归来，避免和邻居接触。有时参加别人小队伍到市郊做几天，夜宿工地上。大多都在武汉单干。

杨姐有几天晚上归来都很晚，孩子们都睡了，我先就给她烧好了几壶开水，准备她洗浴之用。她回来了，就一起操劳起家务事，见她疲倦的样子，就抢着洗衣服，问她是不是白天做工太累了。又忙着把我做的宵夜吃食递到她手上。她说：“累倒不累，就是捣腾鸡、鸭、鱼、肉、蛋这些国家按量分配的计划供应商品在黑市上交易，有时被工商所查缴，弄得财货两空，有个帮手就好了……”我当然是最佳人选，可她怕累及于我。此时我还讲什么身价？就合伙搞起了不法勾当。在湖北、湖南等农村鸭棚、渔场、鸡场……等处收货，该打点的打点，贿赂主管人员，逐渐走熟这条黑色通道。只是还找不到顺利的销售通道，暂时就是东退西进的游击战。我骑部三轮车，上面装满货，用帆布盖严；她装上一小提篮子货，离我有十几米的距离，若被捉住也不过一篮之失。这样操作起来，险象环生。她还真心疼我，怕我深陷黑洞难于自拔，她又找了个合作者，预防她被捉将官里。保住了我，她的两个孩子就有了可靠的保护者和抚养人。在她家我一直思考着，她丈夫是指望不了了，改变她家的命运，应寄托在儿女上，我有意地亲近她的儿女，从儿女课本上的课文引申生出动人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经过我蓄意的文化滋补，他们把能看得懂的故事、小说、《十万个为什么》等看得着迷。长久缺乏父爱的孩子把我当作他们家庭一员的意绪，尽管还是那么朦胧，凭着女人的直感，杨姐当然意识到了，自然在临危之际产生托孤之意。

在硚口三米厂做室内隔墙时，结识了也在该厂做木工的许师傅。交谈甚洽，知他原为国民党军中一团长，1949年随军去台湾，妻儿皆在大陆，因思家心切，于1951年经香港潜回大陆家中，1952年被捕判了八年。在劳改场中学会一手木匠活，释放后，作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商之于我共同组织个小建筑队，他走南闯北熟谙各地风土人情，到各地村镇做活风险小些。决定了就办，不几天十多人的队伍组建成功，泥工、木工、电工、辅工尽皆齐备。我特别请来一位在武汉干“撵兔子”行当的王某（注：“撵兔子”的活就是在小旅社门前蹲守，遇有外地客人进出，则向前搭讪，问询有无货品需要搬运。外地县、乡来武汉贩货的大多是几吨货，国营搬运公司不屑于接手，就让“撵兔子”的人操办）。此人原在国民政府户政人口司任司长，1949年在武汉某机关供职，1960年全国性的精简机构时，被“精简”为民，“文革”初与我同在建筑队当小工，在红色恐怖巅峰期能与各派人物周旋，对现实发生的各种险情能应对自如，保护了自己。请他到队里做总策划，该是最佳人选。我特把杨姐拉来说，月入少说也有两、三百元，结束那整日鬼鬼祟祟黑市交易的营生，把孩子托其表舅暂为照料。我们这个由一些另册、副另册、社会边缘人物组合的群体，游走于鄂、赣、皖、江、浙等省乡镇，做起了葺墙筑房的黑勾当。

业务接洽由许某出面，王某一旁出谋献策外，兼之每到一地专门留心观察当地的政治气候。我则设计施工图纸，计算材料，布置施工。

七

一年多来狼突鼠窜的日子里，几多惊滩浅底，噩梦人间，似是擢发难数，略记几则异象

悲怆的画面如下：

那是在江西吉安、永新之间的农村为一生产队修建牛奶厂房，晚上总有不少乡亲来我们工棚内听我们天南地北地讲笑话，三侠五义是他们最爱听的段子。有两天来客渐稀，在他们面部略显踌躇不安的神色中，有着高度警觉性的王某直感到是不祥之兆，即从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口中探听到，上面布置了要在本地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连根铲除，不留后患，以净化红色政权。前此，我们就听说在广西某地就发生过大规模肉体消灭“敌人”事件。四十年前井冈山那场暴力活动的基因传承到今日又要重振雄威了吧！王某道明我们生死系于刹那之间，顾不得结清账目，决定连夜出走。坪口上已见有荷枪的民兵，幸亏王某每到一地都仔细地观察地理方位、形势，遇有突变，先准备好多种撤退之路。此时他带我们一路东行，走田路，穿过丛林草莽，翻越丘陵地带，沿着山谷下一条小溪，直爬上公路已是次日上午了。搭上了一辆大货车，下午抵南昌，大家才算舒了口气：“捡了一条命。”

再铺叙一生中至今忆及犹令我胆颤心惊的一幕。

在安徽亳州一个村落，为一人家扩建两间砖瓦房及用土坯葺个猪圈。动土开始，邻家说侵占了他们的房界，引起了争执。这一家仗着宅口人多，在乡间交往广泛，还算有点势力，置邻居意见于不顾，仍叫我们放手做活。两家纠纷与我们无关，智多星王某谓不然：面对自己的房界被占，对方决不肯善罢甘休，但慑于这家的势力。对方最现实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从我们这些人下手，控告这一家找一些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此搞“资本主义”。王某建言祸事将临，可我们队里多数人谓之危言耸听，置王某预警箴言于不顾，后来发生之事终被王某不幸言中了。

十几天后的一日凌晨，两名警员带着几名荷枪佩戴红袖标的小伙子，闯进工棚查核我们的身份，得知我们是一群没有介绍信和工作证的人员组合的地下黑施工队时，有位警察一声断喝：“全是一些牛鬼蛇神，带回去审问。”

派出所的一间房子里，我们站着，对面的一张条桌后面正中端坐着被称作所长的人，两旁坐着警员，左右两厢，站着戴有红袖标手持木棍的壮汉。

所长主审，我们分别如数家珍似地回答各自的经历，这正是当时被认为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的群相，以至我们话犹未尽，早已激起所长等革命群英的义愤。一阵拳脚相加之后，所长宣称：全部关押，即日送劳改农场。我们队里竟有几人连声称谢，还有位曾在国军任连长的兀自跪下说：“承蒙所长恩典”。警员等愕然，所长似觉回答的语音和出奇的动作含有嘲谑之意，乃勃然大怒，劈手抓起“连长”，两个耳刮子之后，吼道：“你们想干什么？找死！”我们交叉地诉说：“文革”乍起，工作无门，在当地迭遭批斗，饱尝皮肉之苦，居无家，食无着，只得游窜四方，做小工求得一饱，有七、八个人到过曾服刑过的劳改农场请求收留，因无正当手续，不被接纳。说实在的，劳改农场是我们向往的天堂，它有安定的居所，冬季发新棉衣，夏领单衣，被褥齐全，一日三餐有保障，且无性命之虞。您送我们去劳改农场，怎不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呢！其中又穿插着杨姐的苦诉，不知是哪里来的胆子，竟敢在此场合把满腔愤怨倾泻无余，其情疾之语常出言失序。现在把她之言归纳如下：五十年代丈夫以反革命罪捉将官里去，我这个反革命家属靠作临时工，抚养两个子女，“文革”以来临时工很少有做的，要维系三口之家，不得不做些黑市生意，实是无路求生。参加这个建筑队，凭劳动多点收入，孩子们上学有指望了……当施工面临当地权势者的逼压时，为护佑建筑队，多次以胴体作代价，换得我们暂时的平安。受如此的肆虐凌辱还不算，队里还有那么几个有“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卑污心态的丑类，平素骂我无耻下贱，尽情以戏谑的语言伤害我。一天夜间，竟然有两个禽兽，跑到我工棚住房内，欲用暴力手段把我当成他们泄欲的工具，我操了把泥工刀对他们边骂边砍，骂声惊动隔壁的队友。队里不乏正义之士，涌进屋中，把这两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痛打一顿，后来把他们赶出了队伍……

我们陈述的时候，气氛显得特别凝重。众警及两厢“红袖标”们一副革命激情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气势，似渐渐淡化而变得有点儿怜悯的脸色。最后所长语言沉重地发问：“你们活儿做完了吗？”答：“还没有。”所长似思索了一下：“回去赶快做完。”我们齐向众人致礼告别。刚出大门不远，所长追了出来让我们停一下，猜是怕变异发生在不时之间，会累及他们。我们忙道：“你的好心，我们心领了。干脆！您最好是押我们去劳改农场，要不然我们即刻离开此地，以免给各位招来麻烦。”所长摆手说：“不是，不是。”稍顷又道：“你们回去快点把活儿做完，要碰上什么话，来找我好了。”真恰似黑暗王国中一束人情的闪光，我们多人噙着泪水向所长等再次揖别赶回工地。我与许、王计议，久留必变，会发生所长等无法承担的也无从逆料的叵测之灾。两三天内匆匆结束了建房工程，猪舍未动工，免得再让主人与邻居产生纠葛，向房主表示歉意并愿扣去工款。房主怜悯我们境遇，仍全部工款照付。

离开亳州又在各地做了几个月。这个团伙全靠我与许、王三个苦心经营，以我们的威信调解内部人员的多发性矛盾，累得我们心力交瘁，我们不在乎收入颇丰这个热点，只图个躲灾避难，仍未如所想，只能决定暂时散伙。众人惜别伤感之情，不作细表，祝福各自保平安吧！

杨姐去长江中——武汉，我到长江尾——上海。我送她到芜湖船码头，我再次谏言，以她的经历，识别男性人品素质应该说是双慧眼，所具女性的魅力，诚善的心地，会得到某些男性的赏识，只要对方为人厚道，善待于你，早成眷属。两个孩子都有求学上进之心，千万别耽误他们的学业。在她家借宿多时，起居饮食，悉心照料，几次欲以补偿，均遭斥绝。故借此机会，送她上船，临开船之时，我把个有几千存款的存折硬塞进她内衣怀里，算是报答“漂母”借榻之重恩。下船时道：“他日到武汉再拜候恩姐。”她一再叮嘱：“遇有麻烦尽管到我家来！”

船启动离开码头，我在趸船上凝视她倚在船栏上对我挥着手，双眼泪珠儿依稀可辨，四目相对渐离渐远，思恋的情怀如江水涌动，此起彼伏不能自己。

八

妻儿境遇无时不在眷念之中。到上海先到小沙渡妻妹家询问一下金陵的妻儿近情。阿妹说最近有专案人员正严查妻的海外关系，就是四十年代与李香兰（山口淑子）的一段交往。阿妹当时在上海读书不知其情，以后其姐也未和她详讲过。李香兰在1942年参加过中日合拍影片《万世流芳》的演出，以后退出影坛，定居上海，进入歌坛。妻咏芬因是同行关系，由曾在日本进修过声乐的著名影星谊同姐妹的白光介绍，结识香兰，曾参加香兰在兰心剧场和大光明大戏院两次隆重的演唱会，盛况空前。咏芬有机缘得以拜识香兰，即有似曾相识之感，情意相投。香兰出席各种场合演出常邀咏芬伴同，在歌唱声乐上对咏芬悉心指导，着意提携，咏芬即以师侍之左右。而香兰年长四岁，愿以异姓姐妹相处，亦师亦姐相伴，情逾骨肉。以后咏芬在歌坛上才艺双馨，名噪宁沪，皆出于香兰全力扶掖之功。师情难酬，恩德铭于肺腑。1946年香兰回日本，五十年代初，咏芬曾几次奉邮问安，后在频繁的政治运动气氛下，咏芬再不敢用笔，嗣后音信断了。之后每次政治运动都使咏芬忧惕不止，深恐因香兰而蔓连到咏芬与汪伪政府较高层的文职人员皆有交往事。自1946年曾授业于咏芬的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为国民政府处决后，她再未与任何一方政治人物来往。1949年以后，着力弥合过去痕迹，在动荡的岁月里一直有惊无险，平安度过。可这个社会偏偏对这样不招谁惹谁甘作奴隶生活的女人老找麻烦呢！我得去南京探个究竟。

到了上海火车站前，突然遇到了在清河农场同遭劳教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右派学生赵某。他劳教解除后，四处联系工作，可象样的单位皆避之若蛇蝎。只得个人闯荡江湖，凭力气讨生活，练就一身钢筋铁骨似的身体，正拟到浙江肖山探母时，不意间经上海当了搬运工。他

买了些酒菜，邀我去他的临时“公馆”：天目路上一座未完工的大楼内一间无门少窗的大屋里。我们席地而坐，交杯换盏，畅谈别情新事。他介绍目前的职务就是每天买张站台票进入车站站台，给下车的旅客背包提箱，独行独揽，颇感寂寥，邀我作伴。我应承了体验一下这陌生的环境，不料又惹麻烦了。

有一天，我俩给雇主扛包走出站外，被三、五个壮汉围住。他们目露凶光，不由分说把我们挟持到站侧不远处的一间小屋内。先是一阵拳脚算是下马威吧！然后由坐在屋内的大汉发话：“小赤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简答：“卖力气讨生活。”问：“懂规矩吗？”答：“我们初到贵地没几天，给您添麻烦了，我们走可以吧！”大汉左右打量我们一下又问：“看你们这副模样，不像干这行的，你们都犯过什么事吧！”赵竟然把我们因言获罪而流浪十多年沦为无业游民的经历和盘托出。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位操山东口音的中年人，屋内人都欠身向他打招呼，似是这伙人的领军人物。问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是来抢生意的两个右派，正在打发走呢！忙拦手道：“别价！两位原来是当年敢说真话的壮士，两位要是一时找不到好去处的话，就委屈你们跟我一块干，怎样！”山东人的豪爽好心溢于言表，盛情难却，我俩入了伙，每天就跟着大伙儿站里站外忙活。

有天晚上下了工，山东大哥到我俩居住的天目路的空楼的破室中“视察”，但见我们地上两副铺盖还有两个小包外，了无其它，惊道：“没想到你们哥儿们混得这么惨。”说罢，抓起我们的铺盖让我们跟他走，没多远就是恒丰路。他的家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一间是大哥夫妻的住房，另一间是厨房，就在厨房里在四条长凳上铺几条木板，算是我们的床位。大哥特别叮嘱有什么洗洗涮涮的都拿给嫂子，别客气。大嫂也接着说：“晚上下了工，回家来吃，要不我可怪你们！”山东梁山好汉所禀赋的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的性格基因，数百年后在他们身上得到延续和承传。

这里没有泯灭天良以残暴施虐他人有趣，以出卖、构陷、制造血泪、置人于死而后快的魔鬼。有的是相濡以沫的和煦氛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患难与共，坦诚相交的兄弟之谊。大哥的呵护，大嫂的温情关爱，恰似身在红色海洋恶浪中的一叶诺亚方舟。

思家心切，我与赵向大哥夫妇及众好汉告别，大哥特别关照：“碰到什么麻烦，就到我这儿来，总有你们一口饭吃，不是大哥夸口，到这儿没人敢来为难你们！”确非虚美之词，平时就看到，铁路的员工及车站警务人员见面总要亲热地打招呼，可见大哥在此地位非同一般。

九

回到秦淮河畔家中，了解我最揪心之事的原委。前些时来了两名外调人员责成咏芬交待与川岛芳子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汪伪高层文化人士交往的历史，他们是把李香兰误成川岛芳子了。对这两员颐指气使怒发冲冠的蠢物，只得耐心疏解香兰与川岛乃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关于与汪伪政府中的文职人物的交往，只是从他们那里领教一些文化知识而已，此事可见诸本人档案。其事已息。“文革”时期组成的外调人员，大都缺乏起码的社会常识和历史常识，我也曾碰到过，跟他们打交道，可真是应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那话儿啦！

家里几起外调人员的光顾，深感那污秽的话题，伤害孩子稚嫩的心灵。咏芬早把孩子送到在山东济南市郊一中学执教的他堂舅那里去读书去了。

又回到两个人的自由空间，一直怕她数落怕她伤心，数载之间于长江两岸所经受的嶮巇人生经历，还是不敢隐瞒吞吞吐吐地一一道出。她在我身上连捏带捶地说不该放我离开。回首梦魇往事，可以演绎出在那命悬一线的流窜生活中，随时都会发生生命断送之虞，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抚琴弦鸣奏出魂系归来哀江南的一曲终身误的悲歌！

有鉴于此，宁厮守共度难关，再勿蹈未卜生死的艰辛之路。固守家园，摒弃一切芜杂，

静心读书，在精神世界中滋补。闲时附近走走，贡院街上，青年时期随中国旅行剧团演出过的飞龙阁剧场，门庭冷落一片萧条景象，波澜往事思之酸楚。如北京天桥似的民俗文化艺术集汇地——夫子庙，早无往日兴盛，散排小商品的拐角处，有家门脸儿不小的旧货店，所售货品多芜杂，令我惊讶莫名。在店内我居然淘到了康熙殿版线装本《史记》全套，郑孝胥题签的全套《词源》，《双照楼主诗文集》以及上海孤岛时期柯灵主编的《万家》杂志多册，还有储安平主编的《观察》1948年合订本等等，无意得之，大快朵颐。之后打听到“文革”期间抄家“破四旧”所获战利品，部分辗转到市财政局，而财政局遂将旧物交其所属在夫子庙这家旧货店处理。该店“封、资、修”的货色应有尽有，什么西服、旗袍、美式军装等等，看得人眼花缭乱。作为当时的罪责之物，竟公然由国家经营的商店出售，令人大惑不解。

一天在新街口，碰到了咏芬单位的一男一女，其中胡大姐是咏芬的至友，赶前招呼我：“沙白，来出差的吧！”灵敏的政治警觉性立即辨识出这是胡大街发出的警号，照着她引导式的发问，我顺声回答：“我正要去下关买船票。”我忙强作热情地和两位男士寒暄并歉意地说，我要去赶船了。自反右运动后，我促咏芬与他单位表明与我划清界限不再来往。暂保妻儿一时的宁静，一直小心在意，没什么纷扰。此刻回家立即将所见男士的模样描绘一番。咏芬连连点头，先引用了雅斯贝斯所言：“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能变成完全预想不到的东西。”接着说：“‘文革’培育了许多残人以逞的丑类，你见到的其中一位男士，正是虐人为戏整人为业的家伙。胡大姐与我情同姐妹，她那眼色的用意，分明是叫你暂时避开即将到来的风波。”

当晚我们盘计一下如何应对的方法。咏芬想到了上海的妹妹。她说：“妹妹在上海徐家汇有个小亭子间，暂借给一位上海的同事住，明早打电话给她，让她把亭子间腾出，她听到你要去，定会即时行动，克日奏功。我们经济上不愁，千万别到车站瞎折腾了。要是闲不住的话，有个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到我的老家川沙镇（现为上海川沙区），那里有个孵化小厂，现在的领导和职工，多是我姐妹儿时的伙伴，你也有孵化工作的经历，在那儿呆个时期，我招呼你时，立即返宁。”

谨遵懿命。

十

二日后到了上海西藏路养仁坊妹妹的新居门前，心里不禁发怵。咏芬已告知妹妹我在上海车站当搬运工的事，妹妹一向对我敬爱有加，当知我瞒她之事，她那暴烈的脾性，我如何面对？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进屋挨训吧！果不其然，一见面，她一边数落埋怨我，一边雨点般的拳头直落在我胸前，眼中的热泪尽沾衣襟。我任其发泄胸中的气愤，我若稍加辩解，那就更招她生气。接着她带我去城隍庙我喜欢的小吃店进餐，回到她家，拎起装着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包直奔徐家汇。不过十平方米的小亭子间，布置得整洁有序。锅碗瓢勺、油盐酱醋茶准备齐全，还有小书架上排列有序的都是我心意的书刊。难得她慧心为我精巧的安排，她特嘱我，一周内她来一次问我所需，无急事别去找她。我领会其意，因妹夫似患了运动恐惧症，对另类人员避之若蛇蝎。我知趣地未再叩其门。

独处亭子间成一统，每日价全部精神投入读书的乐趣中，荣辱皆忘，往后的命运凭之于天吧！

民间孵化鸡鸭的作坊春日开工，仲夏收工。这年春节过后不久，咏芬专程抵沪携同妹妹一起送我到川沙镇，由镇上的咏芬的一位族叔领着我们去那个村办的综合厂：属有茶园、果园、孵化室、编织室等各项生产业务。厂长不过稍长咏芬几岁，按辈分却是咏芬未出五服的堂叔。咏芬坦言我的身份，对她堂叔说，若有为难的话千万不要给爷叔惹事。堂叔很痛快地直言，如今斗来斗去，越斗越穷，人们都烦厌了，都在经营自己的天地，嘱我安心在此，

但切忌谈政治话题，防小人作乱。几天来咏芬姐妹穿梭似地拜候乡亲父老族亲，意是为我营造一个安稳的居处环境。临别时姐妹再次叮嘱，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回来不得违命。还告诉我上次离宁不几天，果然那位惯于兴风作浪的同事，向组织汇报谓咏芬敌我不分，但其单位领导似是患了运动疲惫症，对与己无关之事，懒于过问，不愿添乱。以挑事者无趣而告终。

在孵化室工作的间隙，常到不远的小河里游泳，平畴绿野，秀丽江南景物，叫我心境豁然。在全国性的文化生活贫瘠的环境中，常和父老乡亲们天南地北地论今叙古，侃域外风情，议异地轶事，大大丰富了这个小环境的文化生活，憨厚朴实的乡亲们对我生活悉心照料和关爱，厚重的乡情、亲情、友情、地派人情，更使我诅咒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现实，魑魅魍魉横行的社会，羡慕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谱吟归去来兮隐居南山的潜翁。逃离只有恐惧的自由之环境，在此小镇终此一生的心态，频频萌生。

季节性的孵化工程暂告段落，人员都转入茶场、果园工作，我不谙此业，堂叔厂长及多位乡亲留我做点打杂事体，那会给人添累赘。堂叔知我心意，乃抚慰我说：“沙白，外边那么乱，离开这儿，免不了随时都会碰到麻烦。就在我这里，有我这个大红伞的保护，没人敢把你怎么样，你放心呆在我这个安全窝里吧！”此时我思家心切，乃说：“爷叔厚恩，愚侄永铭胸怀，异日气候好转，定常来乡间拜候！”

十一

缅顾近三十年前我还是一个混沌未开不谙世务又近于弱智愚拙的浪荡子弟，金陵与妻邂逅，蒙其陶冶煦育，赐我以文化知识的启蒙，开拓我人生的视野，塑造了我的人文品格。在劳动教养期间，大病住院疗治后，身体虚弱，从右派教养队调到“585”分场老弱病残队，这正是“大跃进”人祸之际，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尤其是老弱病残队，隔不几日就有到“586”去的（“586”距“585”不远，是死人的坟场，“586”是死亡的代称，已成当时劳教人员中的流行语。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书中及不少右派改正后回忆清河农场的经历，常用到“586”这个词语）。我当时大腿浮肿，自知去日无多。妻知此情，凑到当时极为稀罕的压缩饼干等食物，迢迢千里来清河农场看我，以后源源不断寄来食物，拯我于死亡边缘。1957年以来累及她受了多少屈辱诟骂。六十年代初，其影坛至交白光在香港给他办了去香港的手续，她舍不得丢下我这个孽障在大陆受难，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甘愿相濡以沫，共患甘苦。忆及初次结缡所盟：永侍妆奁，承欢裙下之誓，竟成虚幻，每思念及此，如乱刀刺胸，徒唤奈何！急如星火奔向金陵。知家中一切如常。

时值1975年年底。听到中央颁布了对伪满、汪伪及国民政府在押人员一律实行特赦，释放后可以自由选择国内外居留地点的消息。由此推衍了我们这批“五七战士”也想沾点龙恩改变现实的非常处境，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咏芬讥我痴心妄想。听一下咏芬的解释：“六十年代初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陈毅就提出对学校中的右派要宽大为怀，周恩来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均遭驳斥。七十年代初，周恩来为右派的工作、生活要妥善安置专文上书，得到的御批是‘右派有罪’。批者在青年时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形成的敌知情结，在潜意识中萌芽，随着岁月而茁壮成长。1949年此公大权在握，对知识分子加冕为资产阶级，视为改造的对象。1955年借对红楼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之名，开启了扫荡知识分子的序幕，接下来钦定‘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文艺界未能恭顺称臣的大批有为的知识分子痛加讨伐。1957年整风运动衍化为一场反右斗争，使用了亘古未有的、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的‘阳谋’招数，将那些‘敢为圣朝除弊政’的诤言，认作叛逆之声，言者一个个纷纷中箭落马。这全国性的围剿知识分子的运动，为‘文革’谱就了一阕序曲。‘文化大革命’顺势而来，此公终于使出浑身解数，导演出一部史无前例的威武雄壮血腥遍野的民族大悲剧。‘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有生之年妄想命运有所转折，无异于与虎谋皮。”妻之一席谗论，切中

肯綮，启我愚塞。咏芬见我心情沉重之状，乃找些开心的话抚藉我的心灵说：“这批特赦人员，还有 1959 年的特赦人员，如真也得到自由选择居地的话，其中不乏与我交往非泛泛的人士，况我亦有亲属在国外，托他们偕我同行，尝试一下把你也捎带上，不是完全不可能。走出苦难之门，你肚皮里那点儿破烂，或许有用武之地。”哪怕是虚幻美丽的诳语，也能疗治一下我的沮丧心绪。

我的户口所在地是武汉，我的一切问题之解决都要在此原生地，咏芬叫我到武汉叩候一下从 1957 年以来一直牵挂我苦难命运的母亲，也探听一下我寄以希望的大赦令的有关情况。她一再叮咛：与社会上的江湖团伙要保持一定分寸和距离，其中不乏一些豪侠之士，一旦投身其中，未能障显的隐形恶果潜伏滋蔓，后患难以预测。必须恪守自身品格价值。遇到一时难以决断的大事件，先虚以应之，速回金陵，让我来筹谋良策，要不然你又会犯傻气。你在我眼里总是我怀里一个懵懂的小囡。于是我乖乖地乘船西上。

四十年代家遭巨变，骨肉兄弟流离各地为衣食奔波，母亲经历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以后，至于 1949 年后家庭成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挫伤、折磨，都能泰然相对，唯于“文革”期间，我被武汉那个赫赫有名的专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造反”组织毒打，胸部背部血污狼藉，面部血肿，牙齿松脱，母亲见我惨状悲恸欲绝，我也即刻走上东窜的逃亡之路。几年未见，母亲深知在金陵她那洞察世事、人情练达、久经风尘、应对各种事变从容不迫、周旋有术的贤媳的庇护下，定无生命之虞，所以就没有特别为我担心。

在我们一群另类分子浪迹天涯谋生于亳州时，拯我们于厄境作了一次类似于“羊脂球”作业的“中国的羊脂球”——杨姐，已纠合多人穿梭各地倒买倒卖各类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地下交易市场逐渐形成气候。我估量是这年初周总理逝世，批邓妖风席卷全国，朱老总西归，唐山大地震等对时局的影响，地下市场的蓬起，已是当局难以控制扼杀的局面。杨姐极力撺掇我入伙做她的心腹帮手，我不忘贤妻忠告，托词谢绝。杨姐又热心帮我张罗住地，由她朋友介绍，终于在武汉球场横街购得一间小阁楼，面积不过二十平方，卖方也不在意我的身份。这是前些年难于办到的，否则我也不会有那多年无处栖身，流窜长江两岸的险恶遭际。

十二

“四人帮”下台了。1977 年“凡是派”的怪影在中国政局里游荡着。可是以前报刊中屡见不鲜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的文字却很少见了。“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正在重新审查，翻案势头方兴未艾，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群右派，也会随之拨开云雾见青天呢？传闻在京上访人士如过江之鲫。于是右派哥们邀我偕同晋京上访，我虽不认为此行会得到实质性的效果，也愿助兴同行，藉便到故里北京一行。那是在异地闯荡多年，历尽沧桑世变灾难生涯中总是魂牵梦绕的故里，在这儿我度过那无忧无虑率性恣肆的青少年时代，三十年来它不断鲜活地在我的记忆中回荡闪现，寻觅三十年前的梦影，抚慰创伤的心灵，整合一下芜杂的意绪。决定就此前往。

抵达京城，同伴们张罗着寻门申诉。我则首先来到东单象鼻子中坑十三号（1949 年后改称春雨胡同）故居门前。庭院房舍依旧，只是物是人非，追忆 1946 年家遭如“锦衣卫查抄宁国府”的祸事，祖屋封缴，家人被扫地出门，同时在南京城左营三山里的宅院也被藉没。忆畴昔少年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饜肥之日，顾今茅椽蓬牖，兀自门前长久对立，似是魂魄凌飞之状，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同伴中有俩上访“油子”，到京转了几圈，回来告知我们：接待部门的招待所已是人满为患。他们拿来多条被褥，带我们一行人到永定门附近一幢楼层已建好现已停工的楼里，随便找间空房，茅草铺地，几块木板把门窗一堵，算是我们安身之地。白天各自奔走，晚上凑在一起交流信息。

自劳教解除后，平均算来每年都有两次上书中央申诉。或直接邮呈毛泽东、周恩来，大都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统战部、人大常委会，一直到此次晋京前从未间断。上书主旨明确，按毛泽东主席对于反动分子都要给出路、给饭吃的政策，我这个反动分子就是讨碗饭吃，总不为过。但从未得到一纸回文。关于给饭吃的政策，曾得到派出所给我一个权威性的解释：“现在你不是一直是哥哥、弟弟周济吗？政府正是通过你兄、弟的工资给你饭吃啊！”一时使我瞠目结舌，无以应对。真是“如听玄乐耳不鸣”，内中蕴含着这样的玄机，叫我真是开了窍了。所以这次上访我不抱什么希望。可是既然来了，就去陈诉一下吧！上述上书之处我分别都去面申鄙悃，都受到热情接待，好言抚慰。可是当接触到如何解决我现实的处境时，接待员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到中共中央组织部，进门才说了两句话，就叫那位“相府门前七品官”给轰出来了，不过他撂下一句话：“这种事找统战部去。”再到统战部试试吧！

统战部的接待员，很耐心地听我陈诉。不知为何，我竟忘记贤妻至嘱谨言慎行的教诲，口无遮拦地直斥加害者的残暴，说到大关碍处，由于室内还有其他正在谈话的来访者，接待员忙拉我到一间无人的小屋内，怪我出言有欠分寸，太莽撞，本来可以顺利有成之事，自己把它搞坏了……最后郑重地说：“二十年都熬过来了，全国积案如山都逐渐处理，由近而远，你们的事是全国性的，相信你已感觉到一些积极的政治气氛了吧！总得再等等吧！总体的办理，头绪繁多，得周密筹措。你冷静思考一下，会得出积极的答案的。”我领略话中的寓意，昭雪冤情之日不远了。

一天，在永定门的宿窝内交流信息时，爆出一件“拦车喊冤”事。缘是一些有心人打听到了邓颖超所乘轿车的牌照车号，乃汇集了二、三十人，在西长安街新华门不远之地，见该车行驶，乃齐奔到马路中间拦下该车，后面车上立即出来几个荷枪的警卫，枪口对准这群“暴徒”大声喝斥：“干什么的？”他们举起双手高呼：“我们要见邓大姐。”于是邓大姐下了车挥手叫警卫们收起枪来，问有什么事。后面就是“拦车喊冤”者的陈述：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春天，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们这些当年在校的大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国家昌盛富强放言直谏，不料被诱入“阳谋”的陷阱里，都受到劳动教养的处分。释放后，没有任何单位收容我们。我们只能长城内外，长江两岸，流亡在最底层，政治上的歧视，身心所受的凌辱折磨，不堪卒述。早知二十年来会受到这些非人所能承受的磨难，我们在当年立即会选择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今天只求邓大姐实现周总理生前的意愿，解除右派的苦难。邓大姐表示同情、理解我们的处境，将会全力以赴地实现总理的遗愿。

他们唯妙唯肖地叙说了当时的情形，与我从统战部得来的信息正好互相应合，就如是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听到雄鸡的鸣声了。

文化方面的解冻，虽说是乍暖还寒，还是可以购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古典名著、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在琉璃厂、隆福寺等古旧书店，还淘到不少珍贵古旧版本书籍，这是此次晋京最大的收益。

十三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颁发。

10月20日，组织上决定我到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任教。心想我根本不是教大学的材料，组织上也是瞎了眼，愣把废铁当钢材，去就去吧！

10月22日到学校报到，校方接待人员见到我，说：“您是周沙白同志吧！”久违了的“同志”两个字，有道是“如何仙乐耳暂明”，乍一听还真有点儿刺耳。互相寒暄几句后，我被安排在中文系担任文艺理论课。自知胜任不了，厚着脸皮应承下来。当时根本没有教材，幸

好我还存有在北师大学习时钟子翱编著的《文艺学概论》在手头，凭此书日夜备课，不遗余力，总算敷衍过去了。

1979年春。除我一人外，学校中文系十余名右派老师都得到原处分单位的“改正”通知。我乃上书北师大质询此事，得回复：“来函满纸怨懣之情，希望加强学习，思想上要正确对待自己……”似我又犯了新的“言论罪”，何谈“改正”！

是年暑期，去襄阳参加文艺理论讲习班后，北上京城，到了北师大落实55号文件办公室质疑。一位中年女性很友好地接待我说：“暑假期间，你问题的相关同志都不在，俟暑假后，他们上班再研究决定。”多少年来，我听惯“研究”这个词语的含义就是拖延不办的同义语。

说真的，改与不改，当时我还真不在意。一天在北师大校园中碰到当年为谢昕冤案呼吁的历史系的那位教授，听说我还未“改正”，十分讶然地说：“全校右派差不多都改了，他们如此刁难你，到中央去告他们，最好能找到胡耀邦，那解决问题就笃定了。”经他一说，我的劲又来了。还没去上访，碰到当年同学时任北师大中文系办公室主任的王宪达，给我指明一条有效的方案，去找中文系书记刘谟，直接面谈，人怕对面嘛！按他所示地址，跑到苏州胡同拜见了刘书记，先说明我的来意，对“改正”事讨个说法。刘书记称：“你的事是要解决的，只是暑期，有关人员没到齐，开学之后拟出结论，给你寄去，如何？你放心好了。”这该是一锤定音了。

回校不久，得到“改正”通知：“周沙白同志在1957年整风期间，有些反动言论，只是思想问题，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留下一个“有些反动言论”的尾巴。

据知，我的右派罪行主条是为胡风鸣冤。1979年胡风从成都解禁回京休养，尚未得到公开平反昭雪，仍是悬案未定，我的“改正”也因之多了那条尴尬的尾巴。直到1980年胡风冤案平反见诸媒体，从而我也接到北师大不留任何附加语的“改正”通知。1983年又接到北师大寄来的毕业证书。

1981年兼教马列文论，实感力不能逮，当年暑期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文论进修班学习，师从蒋培坤。1986年至1987年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有机会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悉心指导，术业大进。结业后，藉学习听课纪录的两、三百页笔记资料，从中扒剔疏厘，统摄袭用，铸制新篇，每年都有专业性的论文发表，终于鼓捣出个高级职称。

1993年退休。

以上乃是在1957年夏全国性的围剿知识分子那场浩劫中，我被“阳谋”所坑后，罹难二十余载，未敢稍加穿凿伪饰致失其真的实录。

2004年12月初稿

2005年11月修改

2006年4月定稿

附录（一）

恩师与风浪

张锡金：谔谔一士傅种孙

启功：反右风波

谔谔一士傅种孙

张锡金

1962年1月，著名的数学家傅种孙突发脑溢血辞世，距他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仅仅一个月时间。他最后留下这样悲愤的话：“有些人就是不要一士之谔谔。”展现了傅种孙那圣洁的精神品格。

一

傅种孙（1899—1962）江西省高安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并留校任教，后来曾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22年傅种孙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算理哲学，对罗素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积极的贡献。

1945年傅种孙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考察，与英国的同行探讨、切磋学术理论，于1947年回国。他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通报》总编辑。他在教学的同时，潜心于学术研究。他撰写的学术专著《初等数学研究》是几十年教学经验的结晶，在数学界有很大影响。

1949年春，北京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5月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黎锦熙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傅种孙为教务长。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后，在百忙中亲自到北师大教授汤臻真家里，并由他点菜设宴，宴请汤臻真、黎锦熙、傅种孙、黄国璋等人。傅种孙对中共领导人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表示敬佩，积极地投入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群众运动中。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陈垣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何锡麟为第一副校长，傅种孙为第二副校长。1954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傅种孙担任主任委员。

二

195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5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但是，很快就风云突变。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就作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新部署，并说，“最近这个时期，在

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傅种孙作为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在5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对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严肃的批评。同时，傅种孙还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其题目是：《中共失策之一》。这些文章与讲话，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的诤友、挚友的可贵的精神风貌。

傅种孙提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解放后每次政治运动，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伤害。他说：“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跟党走，过去有时就走糊涂了，在三反、肃反的时候，就走糊涂了。”又说，“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给知识分子扣上“旧”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来根据建国后7年的社会实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评价，强调要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毛泽东又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

傅种孙说：“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他反问道：“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中共中央不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在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虽然，现在没有知识分子失业，都在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呢？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

北师大党委偏听偏信，党群关系紧张在于党员独断专行。他说：“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

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北师大党委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不信任他们。他说：“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问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要学生批判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傅种孙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目睹旧中国的黑暗腐败，心系共产党，一直追求光明，追求解放。他响应党的号召并且出于公心，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对党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情况提出许多批评性意见，有些意见是相当尖锐的，有的是十分刺耳的。然而，在主张“舆论一律”的社会环境中，且不说他批评中央领导人是犯了大忌，即使是批评北师大党委也是越了“雷池”。因此，傅种孙的这些“逆耳”忠言竟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接着大会、小会批判，强迫他交待有险恶的政治目的，将他划为右派分子。

1957年9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座谈会，批判社会科学界的右派分子。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100余位专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讲师在批判发言中列出了长长的一串右派分子的名单，傅种孙也在这份黑榜上挂了名。发言者说：“由于章罗联盟的大将与谋士们的疯狂闯阵，到处点火，再加上社会上的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呐喊助威，曾经在那么一段短短的时间里，弄得高等学校阴风翻腾，飞砂走石。在这种气氛里葛佩琦、林希翎……傅种孙等等牛鬼蛇神，纷纷出现。这群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污的家伙，张牙舞爪向党、向社会主义猛扑。这种突然的袭击，也曾引起一部分中间分子的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但是，这阵‘妖风’与‘邪气’并没有维护多久，就被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正气压下去了。”

三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1958年，5月，中共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

全国》的社论，这样，“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的锣鼓敲响了。在中央号召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提出口号：“要坚决拔掉学校阵地中的资产阶级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于是，各个系科排查重点人物，而在全校范围内，傅种孙被推到了前台，并对傅种孙 1957 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再追究，加倍算账。师大数学系发表《拔掉数学界的一面白旗》文章，最初刊登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后来又经过加工，使之带有更浓烈的火药味，刊登在全国性的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前者署名为“数学基础组”，后者改了署名，为“北师大数学系学术批判小组”。

这种批判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只要读一读文章的内容，就不难明白它究竟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批判？在此，读者不妨将它看作两篇文章，加以比较对照阅读，这样，就可以看出批判文章是何等的武断了。

解放后，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学术领域里思想理论的争鸣风行于一时，傅种孙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这种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他说：“我学的是数学，数学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这种实实在在的话在背熟阶级斗争词句的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署名“数学系学术批判小组”的文章从政治上“上纲”，将傅种孙与解放后一直受到批判的罗素联系在一起。其实，英国学者罗素是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曾来华考察访问讲学，解放初，他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这样，罗素的政治观点且不说，即使是他的数学理论也被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一类。将傅种孙与罗素挂上钩、批判者的意图可见一斑。文章说：“从傅种孙的一系列的议论里，我们看不到一点新鲜思想的闪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罗素早已破产的谬论的翻版。”“事实上，傅种孙是中国数学界贩卖罗素货色的老手。早在 30 多年前，他就已经拜倒于罗素的门下，成为罗素的哲学观点在我国的忠实的信徒和狂热的传播人。”

傅种孙的重要著作是《初等数学研究》，他在这本书中论述了“科学的数学化”方法，强调用这种方法研究科学的重要意义，认为“研究各种科学之专家，为欲将科学使之数学化，则须就该科学所研究事例问题之关系，精细分析，考究其中之因果，使归诸少数简单基本之原理而后已，基本原理如果获得，此后遂可本基本原理，形式地演绎其他定律（如数学之由公理以演绎定理然）。此等定律既为基本原理推出之必然结果，基本原理又为该事例所必合，则此等定律之真确，虽不经实验，亦可断言。此所谓科学之数学化也。”

署名“数学基础组”的文章在引用了傅氏上述的话后，想当然地写道：“这段话透露出傅种孙和资产阶级逻辑主义者的一个反动企图：把所谓‘数学化方法’夸大为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用‘形式逻辑推理’代替辩证法。这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之一，这一思潮之特点在于数学方法——所谓公理化方法看成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普遍方法片面夸大数学方法在科学中的作用。这种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简单化、机械化、形式化的倾向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数学系学生过去几年来就是在傅种孙这种‘数学方法’的训练下，思维方法被训练得片面机械。对于他的这一个观点必须展开彻底的批判。”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段批判傅种孙的话，后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发表时，被编辑部删掉了。这并非是编者感到它的无力，没有打中傅种孙要害，而是另有一番隐情，觉察到批判文章的作者自己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原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有关著作中，对数学方法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同时，恩格斯还强调，未来科学的发展，数学的用途将大大的拓展，数学方法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事实说明，这是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并且得到了证实。一些人不读恩格斯著作，或者是对恩格斯著作不甚了了，竟不懂装懂，胡乱地批一通，结果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多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的编辑把住了这一

关，否则要闹出大笑话的。因为把矛头指向恩格斯，批到恩格斯的头上，说得轻一点，那是一时的疏忽；说得重一点，那可是在天上捅下了一个大漏子。这个错误，依照当时《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可要“戴帽子”的啊！那样，人们才会明白究竟是傅种孙，还是谁人？最终成了历史的笑柄！当然，了解这样一段历史的陈迹，也可以知道当年以无知批有知的怪事多多，此处仅仅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而已。

傅种孙肯定形式逻辑推理在数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批判文章却说：“资产阶级学者傅种孙之流尽管可以随意约定一些公理系统，推来推去，造成不可胜数的‘数学门类’，然而这些东西，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只能是符号游戏，因为，其对社会实践的价值等于零。如果依照傅种孙之流的道路去研究数学，那么数学就会真正成为一门伪科学。”

批判文章最后作出政治性的结论：在反右派运动中，“傅种孙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已经遭到广大群众的彻底揭发与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貌已经完全暴露。…‘但是，由于他多年来长期控制着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讲坛，以初等数学特别是几何基础权威自居，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大量散布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歪曲数学科学的本质，引导学生脱离政治，在师范大学数学系广大师生中间以至全国广大中等学校数学教师中间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希望数学界特别是中学数学教师们充分认识重视这一问题，和我们一道努力，坚决彻底地拔掉数学界的这面白旗。”

学校对傅种孙的批判，除了贴大字报、撰写许多文章外，党政军采取了其他例 如编教材的方式。在一份《关于在数学系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数学”讲座的几点初步意见》报告中说：“傅种孙长期以来一直传播罗素对数学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宣传康德的先验主义和罗素的逻辑主义……资产阶级的谬论流传，至今未受到彻底的批判。”对于这类讲座，数学系党组织给予支持，认为“这课的设置应该是数学科学中一面红旗，在教学计划中是一条红线，用这条线把各个数学科目连接起来，今后将用这个讲座展开对数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

四

傅种孙在一派批判声中熬过了 1957 年。1958 年，他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创。从此打入了另册，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同事的疏离，学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为一个学者的傅种孙既然心系中国数学的发展，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他就只能为坚持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付出沉重的代价，蒙受着苦难的折磨。1960 年 9 月中共中央给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公布出来的那份名单中没有他。到了 1961 年 12 月，傅种孙摘去了右派帽子，让他稍稍地松了一口气。然而，身心遭受无端伤害的傅种孙却被另一场灾难击倒了。

1962 年 1 月 14 日下午。傅种孙的学生赵慈庚与闵嗣鹤登门拜访傅种孙。师生相见，傅种孙分外激动。师徒们三句话不离本行，谈到共同关心的 1958 年教学改革中的是非问题。

傅种孙重提旧话：“我这个罪人不该多说话，就拿教改来说，好处在哪里？”

闵嗣鹤回忆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要打倒柯西的极限定义。和这并提的还有函数的定义问题。当时很有些人因为实用上没有连续而无导数的函数，就说没有那种可能。给出具体的函数让他们看，他们说这不符合联系实际的原则。如果照他们的说法，必须有连续导数的函数才是函数，那就只有解析函数是函数了。我于是反问他们，如果从这个连续而不可微分的函数求不定积分，那么，这积分是不是函数呢？他们没法再说了。”

傅种孙听了，气愤地说：“想出一着，竟不顾自相矛盾。我想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谏谏。……”

话刚说到这里，傅种孙突然用双手指着两个太阳穴，身子也歪倒了，这是他突发溢血症。15日凌晨，傅种孙转到阜外医院，抢救无效，于18日离开人世。

傅种孙所发出的谔谔之声，是作为被批判资料保留下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批判他的人是错的。

80年代初，傅种孙的右派问题平反。他生前希望获得的这份公正的结论，终于在辞世18年后到来了。

（原载《纵横》2004年第6期）

反右风波

启功

1957年北师大由陈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我是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的，而且划定单位也不是我关系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而是中国画院。而且别的右派大都有“言论”现行，即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给党提意见，说了些什么。我是全没有。事情的经历和其中的原委是这样的：

我对绘画的爱好始终痴心不改，在解放前后，我的绘画水平达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国画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事业比较顺利的时候，心情自然愉快，我和当时的许多画界的朋友关系都很好。

后来绘画界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中国画院，要组织这样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组织，必须由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人物来出面，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学者、书画家叶公绰先生。此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当时叶公绰先生住在香港，周总理亲自给他写信，邀请他回来主持此事。叶先生被周总理的信任所感动，慨然应允。回来后，自然成为画院院长的最热门人选。叶先生是陈校长的老朋友，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识，而且有些私交。如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为母亲买装裹（人殓所穿之衣），路过荣宝斋，见到叶先生，他看我很伤心，问我怎么回事，我和他说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们孤儿寡母的艰辛，他安慰我说：“我也是孤儿。”边说边流下热泪，令我至今都很感动。又如他向别人介绍我曾夸奖说：“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所以承蒙他的信任，有些事就交给我办，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画院的有关情况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筹办中国画院，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样，在别人眼里我自然成了叶先生的红人。但这种情况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美术界还有一位先生，他是党内的，掌有一定的实权，他当然不希望叶先生回来主持画院，深知叶先生在美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一回来，大家一定都会站在他那一边，自己的权势必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借这场反右运动把叶先生打倒。而在这位先生眼中，我属于叶先生的死党，所以要打倒叶先生必须一并打倒我，而通过打倒叶先生周围的人也才能罗织罪名最终打倒他。于是

我成了必然的牺牲品。但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要找点理由和借口，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但怎么找借口呢？正应了经过千锤百炼考验的那条古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罪状：我曾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来形容称赞他代表的这一派画风在新时代中会有新希望。于是他们就根据这句话无限上纲，说我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那次会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叶公绰先生，还有我称赞过的徐燕荪先生当然也都按既定方针打成右派，可谓一网打尽。至于他们二人打成右派的具体经过和理由我不太清楚，不好妄加说明，但我自己确是那位先生亲自过问、亲自操办的。当然这场运动胜利之后，他在美术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热，呼风唤雨了。

我也记不清是哪年，大约过了一两年，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我之所以记不清，是因为没有一个很明确郑重的手续正式宣布这件事，而且当时是在画院戴的，在师大摘，师大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当时政策规定，对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现行右派分子了，而叫“摘帽右派”——其实，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右派。我虽然没有这个正式名称，但群众哪分得清谁属于正式的“摘帽右派”，谁不属于“摘帽右派”？当时对“摘帽右派”有这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再戴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日久天长就成了口头语，比如冬天出门找帽子戴，如发现是别人替我拿着，我会马上脱口而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如自己取来帽子，马上会脱口而出：“帽子拿在自己手中”。不管拿在谁的手中，反正随时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险，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吗？日久天长，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冬天出门前，都询问：“帽子拿在谁的手中？”或者我自己回答：“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或者别人回答：“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呢。”

有人常问我：“你这么老实，没有一句言论，没有一句不满，竟被打成右派，觉得冤枉不冤枉？”说实在的，我虽然深知当右派的滋味，但并没有特别冤枉的想法。我和有些人不同，他们可能有过一段光荣的“革命史”，自认为是“革命者”，完全是本着良好愿望，站在革命的或积极要求进步的立场上，响应党的号召，向党建言献策的，很多人都是想“抚顺鳞”的一旦被加上“批逆鳞”的罪名，他们当然想不通。但我深知我的情况不同于他们。当时我老伴也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我就这样劝慰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幸好母亲她们刚刚去世，要不然让她们知道了还不知要为我怎么操心牵挂、担惊受怕呢？”这里虽有劝慰的成分，但确是实情，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可冤枉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老伴非常通情达理，不但不埋怨我，而且塌下心来和我共渡难关。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我的右派才算彻底、正式平反。我当时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系总支书记刘模到我家宣读了正式决定，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原来的不实结论。我当时写下了几句话，表达了一下我的感想，其中有“至诚感戴的教育和鼓励”。在一般人看来，既然彻底平反，正式明确原来的右派是不实之辞，那还有什么教育可谈？所以他还问我这句是什么意思，以为我是在讽刺。其实，我一点讽刺的意思也没有，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从今我更要处处小心，这不就是对我教育吗？而令我奇怪的是，摘帽之后，那位给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和我寒暄周旋，真称得上“翻手为云覆手雨”，“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时候陈校长都帮助了我，援救了我，但这次政治运动中他想再“护犊子”似的护着我也不成了。可陈校长此时的关心更使我感动。一次他去逛琉璃厂发现我收藏的明、清字画都流入那里的字画店，知道我一定生活困难，才把这些心爱的收藏卖掉，于是

他不但不再开玩笑地说：“这是给我买的吗？”从我这儿小小不言的“掠”走一些字画，而出钱买下了这些字画，并立即派秘书来看望我，询问我的生活情况，还送来一百元钱。这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安慰，再加上亲人、朋友的帮助，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摘自《启功口述历史》）

附录（二）

书信

沈遂生给潘 XX 的信

张海琛给杨 XX 的信

肖敦煌给傅 XX 的第一封信

肖敦煌给傅 XX 的第二封信

肖敦煌给傅 XX 的第三封信

沈遂生给潘 X X 的信

XX 兄：

四月末收到来信、诗作和照片。“五一”长假期间每天要陪孙儿（九岁）玩，今天孙子走了，才执笔回信。

关于这篇《社论》（即《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现在还记得一些情况。“底层”原是甲班张海琛、罗宗义他们搞的一个壁报。后来李国楠（团支部宣委）动员我参加，我和他在六班同学中征集签名，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校团委副书记周之良动员团员们去访问老师们，我们先是去穆木天先生家访问，回来后就写大字报支持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的呼吁》。后来又访问了文怀沙、杨敏如、叶苍岑、高向夫、陈友松等老师，在“底层之声”上发表了十多篇访问记，也发表过编辑部交来的其他稿件和同学来稿。六月初，张海琛宣布我当“大字报组长”，从5月28日到6月12日，“底层”的大字报都是我经手编排的，也抄过不少，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段时间的大字报目录。

《社论》起因于6月2日，北大物理系两个同学带来一些北大“百花学社”的传单，他们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后提出：师大也该像他们那样讨论一些“根本性质”问题。到底该怎么“鸣放”，是像我们这样访问老师们征求对党员的意见，还是像北大那样搞？6月4日晚上罗宗义、卫之祥、李国楠等几个同学由我们班刘德璋带路去访问了胡耀邦。第二天，罗宗义跟我们讲了访问的过程和胡耀邦的谈话，大意是说，“大鸣大放”不只是谈小的问题，大的问题也要谈，真理越辩越明，要展开争论，在争论中明辨是非，纠正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我当时就表示拥护，提出可以在“底层”上展开这种讨论。张海琛、罗宗义就要我写“社论”把胡耀邦同志谈话的精神传达出去。这篇草稿是6月5日晚上写出来的。在吴云生他们寝室抄写大字报的时候，吴云生和别的几个同学边看边议论。我在抄写时临时参照他们的意见加上了两句：“我们要做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抛弃盲目服从的‘顺民’思想，抛掉相信‘大人物’会替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依赖思想。”我还没抄完，吴云生既不打草稿也不跟任何人交换想法，提起笔，铺开张，就开始写《“民主”乎？“党主”乎？》。6日早晨一起贴了出去（“底层之声”第17期）。这两篇东西的确在全校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其实，胡耀邦谈话的精神也就是这样。《社论》末段说的要坚持的16个字“原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它成了定我为“极右”的主要罪证。

现在回想起这些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反思当年的“天真”、“热情”，真令人感慨万千，

啼笑皆非啊！

3月收到一宁师妹的来信后，在不能参加写回忆文章深感歉疚之余，去了几次系资料室和校图书馆，搜寻当年的有关资料。结果只能找到5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文——何锡麟向全校作的反右斗争报告。其中点名批判了十位教授和周之良，学生中的反右只提到“底层”和“苦药”。卫之祥在电话上告诉我：《中国青年报》当年七、八月份有一篇关于北师大学生反右的长篇报道。我相信这篇东西就是薛若安提到的那本书上的那篇，可惜在我的资料室、校图书馆和北碚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当年的《中国青年报》。记得那篇提到的学生右派名字最多（大大超过北大、清华和人大），罗宗义、张海琛、卫之祥、吴云生和我等都名列其中。我给薛写过信，但没有回音。我还要继续想办法找到这篇东西……

退休后一直不停地上课，但不是在系里而是在“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给外国留学生上汉语课。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68年“文革”高潮时出生的次子，周岁时一场重病（当时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后留下残疾，无法自食其力，我要在离世前尽可能为他将来的生活作点安排。这几年我都是每个星期上20学时（每天4节课）。既为学校，也为后代做“贡献”。好在身体还能支持，不算很累。谢谢你的关心！

望保重身体。祝全家安康、幸福。

沈遂生 2005年5月8日

张海琛给杨XX的信

XX老友：你好！

接读来书，至为欣慰。

这些年来，你一直勤勤恳恳为桑梓教育服务，做出显著成绩。受到当地领导和学校的信任、器重，获得很多政治上的荣誉，人生只此足矣，何须计较名位之高低，地区的开通与偏僻。希望你今后在注意健康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为学校为社会做一些有益工作，特别在传统文化上，应发挥自己专长，写出一些论文或专著。

与北师大的同学，有一部分恢复了联系。但大部份仍然隔绝。由于衡阳市地处交通要衢，有些同学来看过我。如张德文、孙健孙、王乾生、罗宗义等。前几年，我经常去外地出差开会，也j顷道去看过一些人。如北师大的梁仲华、刘明芝，上海师大的刘叔成、赵文兰、顾嘉炽、胡凌芝等。与另外一些同学有过书信往来。如廖文慧、俞安国、李镜春、范亦豪、王世巧等。此外，从上述见过的通过信的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同学的工作地方，单位和近况，但没有直接联系。从已知这些同学的情况看，可分两类，原来是左派分子的情况略好，但成就也不甚大，有的一样碌碌无为；原来是“右派”底子的，近十年来，大部分都阔步赶上了，比“左”的毫无逊色，部分的还有后来居上之势。世情沧桑，人事浮沉，并不完全决定于政治处境。所可惜者，孙健孙已于前年患癌症作古，闻讯之余，不胜伤悼！幸存的除赵文兰和你我三人已经离退休外，其余诸人，尚可干二三年或四五年，也许他们还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目前最有希望的要数张平治、罗宗义二人。他们一则年岁小，二则已有一定成就，或许在三五年内爬上教授宝座。其余诸人，在高校的恐怕只能当上一个副教授，在中学的评上一个高级教师，如此终身而已。

我从79年平反恢复工作后，面临两个前途：一是搞政治，这是我进北师大前的老底子。在84年前后，政治上呼声甚高，省市方面，曾预定我为市级领导班子人选；以后又众望所归，一致选我为衡阳师专校长。这两次都被我坚决拒绝了，原因是：第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耳朵搞聋了，失去了吃政治饭的基本条件。另一前途是指教育与学术。这是我平生素志。在开始几年，步子迈的较大，成效较显著，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被评为讲师，尔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被评为副教授，也就是说，在不到八年的时间内连爬两级台阶。而与我同期评副教授的，大多花了三十多年以至四十年的时间。而且，在校内或校外的影响，我比他们大得多。当时以为再花四至五年工夫，戴上一顶教授桂冠问题不大，但从85年起由于情面难却，我被拉住当上了图书馆馆长。一脚陷进去，再也拔不出来，一耽误就是三年。同期，我女儿一家迁来学校，接着我自己又结婚成家。和你信上讲的情况一样。户口虽然迁来了。但工作无法安排，两家八口吃饭，四个孩子上学，靠我一人负担。于是，我陷入极端困境。而且为了给爱人和女儿找工作，给孩子们找学校，几乎课余都要往外跑。这样又耽误了近三年。总之，这五六年来，除了应付教学外，很少有时间和心情搞研究写文章。目前，这些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岁月不饶人，我已到了离休年龄，并于今年初正式办了离休手续。但仍在上课，并负责带两个年轻讲师。估计这样还要干一二年。等有青年讲师能独立主讲后我就全休了。

离休后，在政治上享受副师级（相当地市）待遇。经济收入和物资供应上，比在职时略优。每月净收入250余元。上课按课时算，每节课7—8元，每年可额外上课100节左右。

目前，我身体、精力尚好。小毛病虽有，大的病状尚未发现。估计也许还能活15—20年。其中准备拿出10年左右时间再拼命一击。钻研一点学问。写几十篇比较像样的文章或二三本专著。也不枉在人间走一番。许多同学和学生建议我写一本自传体小说，目前尚未拿定主意。如写，在北师大和清河农场那段如诗如恶梦的岁月。当然是重要内容之一，到时还得请你多帮助。

最后，还有一个希望，但愿在有生之年，我们能再度执手言欢。前年，曾经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全国三国演义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向我发出了邀请。可惜学校经费紧缩，每人只有80元学术活动费。而到成都一趟，往返至少要400元，自己又无力拿出这笔巨款，只好忍痛牺牲。假如那次能赴成都，一定会绕道去看你和俞安国等老同学。而且路线都规划好了，只因财力绵薄，无法成行，也许造成终生遗憾！

炎暑灸人，望多珍摄

顺颂
健康

海琛顿首 1990年8月20日

肖敦煌给傅XX的第一封信

XX大姐：

在拆开你的来信之前，我好好地猜测了一番，但真猜不出是何人缘何事给我来信，我这

几十年的生活也许太寂寞了。拆开信看到你的名字后，我真有喜从天降之感。一下子我又回到了那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岁月，我仿佛又有了灿烂的青春，有了青春的友谊，青春的幻想，青春的抱负和追求……那段岁月，有如绚丽多姿的浪花。可惜在我的生命长河中只是仅有的几朵浪花，太少了！太少了！

1957年离开母校后，我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的青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那段日子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忍受，什么鄙视，什么批判，什么艰难，什么痛苦我都能忍受。不是因为麻木了，而是因为当时我的确在真诚地悔罪，并进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改造，哪怕受了最大的委屈，我的心几乎要爆炸了，我也能冷静下来，提醒自己：我是罪人！于是就忍受下来了，心理得到了平衡。

记得是到了1961年的元月份吧，那时全国处在大饥馑之中（官方的说法是“特大自然灾害”）。青海省委号召有条件的单位都到草原上开荒种地，与饥荒作斗争。青海师院也在草原上办起了农场，师生轮换去开荒种地。我校是附中，老师也轮流参加劳动。60年12月初，我去了几百公里外河卡草原师院农场劳动。同去的还有也分到附中的雷一宁（她是与我们同年级的六班的，也是右派）。到农场后，我依然埋头苦干，毫不吹嘘，真是在忍饥挨饿地干，拼着性命地干。曾受到某位老师的不点名的赞扬和同学们的好评。

你越怕事，倒霉事越会落到你头上。草原上饮用水是个很大的问题，农场百来人，每天由十来人拉着大车到十里远的山沟去拉水，一天两趟，有时一趟。元旦过后，农活少了，我们基本上在休息了。元月16日，由我带着十几个同学去拉水，正准备下到山沟击冰取水，抬到大车上的大桶时，有同学发现路边有死羊。略一搜索，又发现几头。我们顿时大喜过望。我们估计可能是藏民的羊（哪里是藏区）被狼咬死了，已成为无主之物，是可以拾得的。在那样的年代，这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有的被狼吃去了内脏，但肉被吃得不多，有的还相当完整，仅仅被咬死。大家想把这些拖回去，该会给同学们带去怎样的幸福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安心在农场，这些礼物也许能帮助安定同学们情绪。于是大家一致决定，一部分人击冰取水，一部分人去找死羊，都估计决不止这几头。当时我们的确攀悬崖，越陡壁，冒着生命危险去找死羊，大家热情很高，结果又找到几只。

偏偏这时候牧人赶着一群羊来了。这是师院农场的牧羊队。牧羊人是两个藏籍学生。他们也非常高兴，说按藏民习惯，这羊是拾得的，是可以拉回去的，这更扫除了我们的最后一点顾虑，但他们立刻拔出藏民刀，不由分说，很熟练利索地剥去了一只死羊的皮，并吩咐同学们拾柴，烤羊肉。你可以想像，那年月，长期处在饥饿之中的同学们简直又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太古时代，不等羊肉烤熟，便一拥而上，拿着带血的肉，大嚼起来。我那时学会谨慎了，同学们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再说羊又是拾来的，按藏民的风俗是可以占为己有的，但似乎又觉得不太好，应拖回去让领导处理。当时我虽身为带队老师，但师院的那帮饥饿的学生谁会理会我这个右派，大车上大桶里的水还没有装满。于是我叫了几个可以叫得动的学生，只说吃肉拾水两不误，轮流抬，好歹把水装满了，但同学们兴犹未尽，吃了一只，又在烧吃第二只。我当时处境真为难。我不想吃，一来顾虑影响不好，二来那带血的肉，连盐也没有，我真咽不下喉。但不吃吧，又怕同学说我假积极，回去后领导批评，那就肯定是我告的状了。于是我也坐在他们身旁，象征性地吃了几口，并且还装出很高兴的样子。饱餐之后，另一只羊还剩下不少肉和内脏，一个同学见我没怎么吃，硬割下一块肉塞给我，其余的内脏他们全分了。

这样一来，自然延误了拉水的时间，当我们返回时，太阳已西斜了。我们所在的队是二分队，二分队的负责老师见我们没有按时返场，恐怕出了问题，便带着十几个同学来找我们，半路相遇了。问明情况后，勃然大怒，我拿出了同学塞给我的肉，同学们也纷纷交出“脏物”，我们原本满腔热情希望为农场立功，这时都成了罪人，垂头丧气地拖着大车回场了。

回到农场后，经领导研究一番，吃过晚餐，开批判会，领导的开场白给事件定性了。有

阶级敌人破坏，同学们上了敌人的当，那个敌人自然是我了。我的罪名是阴谋破坏农场。接着是让拉水的同学揭发和自我检查，至今我还深深感激那些同学，他们几乎没有揭发，没有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只是检查自己。而领导和没有去的同学那批判也是令人难忘的。会后，我找农场党委书记说明情况，他不听我的，他要我深刻检查交待，并要我每天随队拉水，监督劳动。

我当时真是悲愤莫名，悲痛欲绝。我热爱这个社会，决心把整个生命献给这个社会，可是这个社会却把我往绝路上逼，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辗转反侧一夜之后，我决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悄悄离开农场，来到几里路外的黄河边。决心一头扑进我们民族的母亲河，把我的冤魂全部交付给她！

但面对滔滔河水，我忽然想到这一死有什么意思呢？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自杀，不知我死者以为是畏罪潜逃。而我是无辜的，而且突然感到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之身的，但我不回农场。于是我真的爬雪山，过草地，途中遇见狼，遇见土匪，九死一生，整整饿了六天，粒米未进，鬼使神差地来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恰卜恰，那里离西宁不远，我乘汽车到西宁，然后乘火车回到故乡。

回到故乡后，我只想到农村，我当时太天真了，想学古代的隐者，但那个时代允许你“隐”吗？于是我又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凄风苦雨的人生，我成了带“罪”字的农奴。

但当时有一点我是清醒的，我不做“黑人”。到农场不久，我给青海师院附中写信，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说明我是无辜的，大概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要我回去，保留我的工作籍。但我已决心在农村了此一生了。没有回青海，附中把我的档案寄来我所在的天门县，我的头上依旧是一片黑暗的天，直到1978年。

拉拉杂杂地写得太多了，几十年来，我不对人们谈辛酸的往事，甚至对我的孩子们也只字不提，接到你的信，不知怎的，像看到亲人似的，不觉得唠唠叨嗦起来。

提到那段辛酸的历史，你千万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连共和国主席，连功勋彪炳千秋的彭德怀元帅等都含冤死去，普通党员有什么责任。当时如果我们换一个位置，我也会听党的话，积极投身到反右派运动中去的。从1957年到现在，我一点也不怪罪你，更不要听你们的什么检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受害者。收到你的来信，使我仿佛又处在了青年时代的和煦的友谊之中。在这里，我愿真诚地、温暖地轻轻呼唤你一声：“大姐！”远在千里之外的你虽不能听到，但你一定能感到，一定的！

现在虽有很多不尽为人意的事，但至少头上的这天是明丽了，前方的路是宽敞的。虽会有曲折，但不会有陷阱，虽会有艰难，但不会有暗箭。我们的社会已开始步向了理性的时代，虽然还只是开始。

岁月真不饶人，“弹指一挥间”，垂垂老矣！虽然常常暗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其奈“暮年”二字何！

前天收到你9月23日的来信，此前你们寄来的39人大聚会的照片同学通讯录至今没有收到。望收信后立即补寄一份给我，我希望很快见到他们，照片的背面一定注明他们的姓名，照片上没有出现同学，请尽可能介绍他们的情况，起码要说明是生是死，拜托了。

见到去年你们几位同老师们的照片，我有意先不看反面的说明。首先认出的当然是肖璋、启功和钟敬文三位老师。同学中首先认出的是胡同孙，胡家瑞，你是猜出的，我想照片上肯定有你。然后是陈兆林，他还是那忠厚善良的模样。其他的人是看姓名后才回想起来的，张希奕留在我记忆中的笑总是真诚的，甜甜的，但照片中的表情却不是那样，不知她近况如何？

正像你来信所说心中有说不完的话，如果信笔写下去，不知要写到什么时候，赶紧打住，以后再说，你见了昔日的同学，代我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祝愿。

祝平安

肖敦煌 1997年10月3日

肖敦煌给傅XX的第二封信

XX大姐：

你的第二封信和昨日的贺年卡均已收到，复信太迟，深为抱歉。

近年来，与昔日好友们的联系多起来了。人活在世上，怎能不需要友谊呢？特别是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那种纯真的友谊对于如今老去之身愈觉温暖无比，正因此，就愈觉“刻骨铭心”这一词语含意的丰富。过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回忆起来也弥足珍贵。看到照片上的王德厚，我就想起他唱歌时我笑他在“说歌”的情景，并不禁油然笑了，更不消说我和他冒雪去中山公园照相的傻模样。不知王君今日安康否。总之，过去的美好时光一幕幕抢着映到面前，真令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又每每生出一种凄怆之感。“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青年时代，真诚地认为生逢盛世，所以满腔的报国热忱；而且不仅是“热忱”而已。从二年级起，整整三年，我很少午睡，利用这个时间自学俄语。四年级时，又开始偷偷自学英语，学习“列宁说过的语言”尚有忽视政治之嫌，学习帝国主义的语言自然只能“偷偷”了。那时我多想成为一个博古通今的学者，为我们的祖国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叫“不识虎”吧。生活在伟大的大救星时代，却被摧残“成泥碾作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变成“少壮思努力老大更伤悲”。身已老矣，却一事无成。面对老朋友，常有愧色。朋友们来信，每每迟迟地不能提笔，这就是我复信迟的原因吧。

有一点可以告慰大姐的，愈到后来，即文革期间，环境愈险恶，处境愈艰难，我愈不消沉，或者说顽强吧（当时叫“顽固”），我不顾影自怜，怨天尤人，连共和国的主席都被迫害致死，遑论小人之辈。我愈益坚信历史一定会还我清白之身的（决不是事后诸葛亮，当时的确这么想），那时是一个自己也不敢对自己说真话的时代。我不甘心“躬耕于垄亩”，在繁忙的劳动之余，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人偷偷翻译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居然翻译了一百多首。78年成为自由之身后，还没来得及修改，我国这时出版了魏荒弩先生译的涅氏诗集。我只得作罢，后来在师大编的《苏联文学》杂志1981年第4期（具体期数记不清了，反正是那年最后一期）刊登我译的涅氏诗一首。78年底恢复工作籍来天门师范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乌克兰大诗人舍甫琴柯诗近百首，当时曾寄给北京文联出版社。该社有出版之意，并请专家审阅修改。但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戈宝权先生翻译的该诗集，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吧。

既已恢复工作，也许大姐以为我不务正业。到师范后，我非常珍惜这可贵的难得的机会，拼命工作。除最初几年，只偶尔被评为先进教师外，以后直到退休，几乎连年被评为先进，老师们戏称为“专业户”。但冲力有限，最高荣誉只是地区级先进教师。我说这些并不是夸耀。比起你们的成绩来，我只有汗颜。我说这些只是想请大姐和昔日的同学们放心，历尽劫波后，我没有消沉，没有颓废，没有怨尤，正如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所说的：“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

95年我六十岁退休。如今中等师范由三年制逐步向五年制过渡。我校于该年办起了大专班，要求我留教，我平生最怕人求我，只得留下来一直到眼前。陆游老先生教导说：“位

卑未敢忘忧国，论定犹须待阖棺”。我每周八节课，应付差事，本是轻松。但贼心不死，业余时间，全部用来涂鸦，颇觉紧张。几年下来，居然有几十万字，自我感觉尚可，但这不仅仅是凭自我感觉的事，不管将来是否兜售得出去。现在只管做，好在有一句话在安慰我，“重在参与”。那就一直“参与”到死吧。

看到你们的照片，感慨万千。你问是否美，让我真心地回答：过去你们青春粲然，令人赞叹爱慕，但终年披着的总是那“革命”的灰皮和蓝皮，又使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如今你们都是老太了，但却青春仍在（请相信我，决不是阿谀之词）。这青春不仅表现在你们花色各异的衣着上，而且表现在你们的眼神里，你的几次来信，你们的照片，使我感到你们的话里，你们的眼里，你们的心里，没有过去那种“革命”的云翳，因此显得格外真诚，格外纯洁，格外年青，因而也格外美。因而也真想有一天能面对你们喊一声：“我的亲爱的姐妹们，你们现在真美！”

记得过去参加舞会时，常与邓遇芳跳起快三步沿着整个礼堂飞速旋转。不知邓老太太的步履轻捷如昔否？大概此生难有机会当面问问她了，你若与她联系请转告她。

提起沈巧珍，真叫人悲痛莫名。她为人热情，有理想，曾跟我学过一段时间俄语。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有冤不能辩，有苦不能诉，有心不能剖！最近这些时，一想起她临死时呼天不应之情景，实在是痛断肝肠，太可惜了，沈巧珍，忘不了她！

遵你之嘱，赶照了几张相，因技术问题，还没有洗出来，可以先把信发了，照片洗出后寄来。

你和梁仲华君等（忘记他们是几班的了）发起组织编写“57年毕业同学通讯录”，非常好！表已收到，即日寄去。如今我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绞痛是家常便饭。来信相约三年或五年后聚首北京，这给了我极大鼓舞和奋斗目标，我一定争取活到那个时候。通信录似乎不见沈君磐，张孝存，安治琪，王平，戴雨池，常教裳等人的名字（还有唐吉亮）。

谨视

阍府安好

敦煌

97年12月16日

肖敦煌给傅XX的第三封信

XX大姐：

你的几次来信和寄来的通讯录等均已收到，非常感谢你的殷殷之情。说来惭愧，有几次竟没有复信。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心脏病，我现在完全不能激动，一激动就易心绞痛。记得第一次收到你的信时，我一连几天发生心绞痛。收到卫之祥的信时，亦是如此。此刻当我给你写信时，想起我往日的同学，想起你提到的王德厚的遭遇不禁心头隐隐作痛。

现在我坚持服药，坚持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我的最高目标是力争活到2003年，届时前往北京，去会我的亲爱的同学们，共叙这五十年来风雨人生。

卫之祥也曾邀我作三峡游，我恐怕不能成行。你们如早去三峡，欢迎你们到我这里作客，

遇见卫之祥兄，代致歉意。

退休后，还在学校代几节课，今年准备彻底退休，安度晚年。

你若遇见了往日的同学，首先请代我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祝

暑安

问候你的全家人！ 敦煌

98年7月21日

附录（三）：

当年大字报选

穆木天：我的呼吁

天、水、心：民主乎？党主乎？

呵欠伯：岂不令人深思

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底层之声》社论

我的呼吁

穆木天

数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们心里积压了千头万绪的苦恼。直到最近这几天，春风才算吹进了铁狮子坟的师大校门缝儿。尽管学校当局召开了几次教授座谈会，可是，教师还是顾虑重重，不敢大胆提意见，怕再遭一吹无枉之灾，因为，在师大，教师被发配、降级等等之类的阴谋报复，是早有前例的。

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师大几年来一贯的传统。这次运动，当然，我也有很多顾虑。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终于鼓起勇气发了言。

就在上周一次座谈会上，我把我的意见只说出几十分之一，可是，主持会议的某党员首长把我的意见都给打了回票。

我提了党领导者一些宗派主义的行为。如某党员教授刚到校不久就把他过去写的半部中国文学史交党员首长，不经过教研室和系的研究，由这位首长直接推荐给教育部出版。而李长之教授真正在师大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水平比那位党员教授的要高的多，却不被推荐。又如教研室初成立时，非党员教研室主任是单午，而党员教研室主任继任时，则先由校长出马调动某讲师作秘书等等事例，我认为都是宗派主义行为。我还举出某党员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事。我认为党委和行政不处理这件事，也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教授去年才恢复党籍，不算宗派主义。至于另外那位同志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已经处理过了，处理内容就是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也不知道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因此而动刀自杀事。说这也不算宗派主义。

我很不会说话，更不会巧辩，一气之下，只好退出会场，直到今天，我没有勇气再参加这些会了。事实具在，而作为领导整风的首长，还敢于巧辩，师大的这个运动的前途不能不令人担忧。

我呼吁：请党中央像搭救王蒙一样，救救师大罢！让黑暗王国有一线光明吧！

1957年5月17日于铁狮子坟师大

（原载5月22日《光明日报》）

民主乎？党主乎？

天、水、心

我国的民主凭良心说始于 1949 年。

1949 年至今已八年，保障人民主权利的宪法也颁布了。有脑筋的人想一想，民主生活是否充分？答案是否定的。所谓“民主”者空有其名。人民除物质生活有保障外，其他一切民主权利既无保证，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者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替。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而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有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的领导人，均有可能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毛主席说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然而党包办专断一切，民主党派只是充当傀儡，人民民主其名，一党专政其实。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一千二百万党员的代表大会选举的，然而党中央向全国六亿人民发号施令，人人均得服从。

宪法规定政府向民主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然而实际上政府的一切政策均由党来决定，政府只对党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空有其名。

我们是要党的领导，但坚决反对党独断独行。我们不反对“党主”（因党也有作主权），但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有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

（师范大学大字报，6 月 6 日）

岂不令人深思

呵欠伯

我本想用“反共就是反革命吗？”来做标题，但考虑到那些没有头脑的读者断章取义，也怕那些稿费爱好者把头砍去领赏，因而采用这个不太醒目的标题。

首先举一个不太客气的例子，设想英国工党说：“反对工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这是很可笑的。但难道英国工党不正是如此宣传的吗？难道他们不能找到一些工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他们这一论点吗？也许以英国工党比共产党不大雅观，我们另举一例：当年斯大林在没有头脑的人的“乌拉”声中，岂不也是神气十足，有多少由于反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见解而被当做反革命砍去了头（“胜利者代表大会”参加者在会后两年之间被砍去了一半，选出的中央委员 70% 被杀了头）。“反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来已是可

笑的了，但在当年却奉为天书，谁敢说个不字。

“共产党”就其观念来说有两种：抽象的绝对正确的共产党和具体的在某一时间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共产党，抽象地给共产党下定义时，总是用着漂亮的字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者的战斗联盟”等等。这样漂亮的党，我们干吗要反对？美好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何必要离开它？面对如此理想的党，整风岂不变成“无的放矢”了吗？但在某一国家具体到某一时间，由一定的人组成的共产党，并不像他的定义那样单纯。份我目前的知识来判断，在1927年说“反党就是反革命”是正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初期，共产党的确接近于定义。（我不得不如此赘述）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党在去年10月前，就说它很符合于共产党定义的要求，很难说反对它就是反革命。（某些敏感的读者，会在这里嗅到了似乎我赞成十月暴乱，如此我劝他快去领赏，但他犯了明显的逻辑上的错误。）很多报上的文章用共产党的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及以后也和过去一样正确，这是很自然的，但都很不对头，同样的一个党如果也像斯大林那样念念不忘他的过去，看到了党员的见解便认为是群众的见解，看到了工人的见解便认为是农民的见解，在各种副职的名义之下总揽一切特权……这样纯粹由张刚、张斧、彦平、孙伟、金铎、郭琪[1]之流所组成的党，那便很难说它符合共产党的定义，请问反对这样的共产党怎见得是反革命？！

也许有人问：是否应该反对目前的共产党呢？共产党不领导又由谁来领导呢？请同志们不要闭着眼睛回答。虽然最近几天报上“工人”说话了，“觉悟的”工人群起而应战，大叫“这是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意见正在偷偷撤退，然而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1957年6月11日）

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

《底层之声》社论

近一个多星期以来，我校广大同学响应了党中央，毛主席“大鸣大放”的号召，通过各种形式揭露“三害”，积极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从已经揭露的事实中，看到了“三大主义”危害的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个伟大运动。这充分表现了广大群众对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对于党的无限热爱和信任。

但是，目前我们的鸣放还只是停留在揭发本单位，本校的“三害”上，而且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某些单位还没有充分放手地发动群众，领导和群众都存在着顾虑，不敢“大鸣大放”；学校党委的领导还远不能适应运动的发展，而且在某些具体措施（如同学考试问题）上不但不能使运动深入发展，反而会起到阻碍群众充分鸣放的消极作用。为了使运动更健康更蓬勃地发展，为了使运动免于停滞，就有必要在要求党委改变某些不利于运动开展的具体措施的同时，把我们的鸣放提高到新的阶段！

党的事业关系到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党的事业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广大非党群众自觉地参加党的整风运动是非常自然的事。由于“三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根本对立，党的反对“三大主义”的整风运动就必然同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关系到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它的影响将遍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大主义”不整掉，社会主义将受到严重损害甚至瓦

解。而且事实证明：要根除“三大主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只是对某些党员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进行批评所能达到的，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作必要的调整，才能根本消灭“三大主义”，保证“三大主义”不再复活，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宪法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与法制问题，党的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这些总是都和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自由讨论，必然有助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从理论上探讨“三大主义”产生的根源，对于我们根除“三害”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做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抛弃盲目服从的“顺民”思想，抛掉相信大人物会替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依赖思想。）把我们的鸣放提高到这些重大问题的广阔领域，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讨论和争论，以达到真正的“大鸣大放”，把运动向更高阶段推进。

在“大鸣大放”的总方针下，我们要坚持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在继续进一步揭露“三害”的同时，从一系列重大的一般性或理论性问题上大胆争鸣，展开自由讨论，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

1957年6月6日

附录（四）：

当年反右批判文章

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

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

张迈：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

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

师大火星报编辑部

前一阶段，师大俨然是一个“黑暗王国”了，这个“黑暗王国”的开国元勋，自然是穆木天。而“底层”和“苦药”的“英雄”们一开始就充当了右派先生们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他们在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把师大搞得乌烟瘴气，大有天之将倾之势。与此同时，这些右派先生们把自己打扮成“忧国忧民”的“义士”，高喊“社会主义前途危险”，借以煽动群众，他们的阴谋企图，的确曾经欺骗了不少的一部分人，有人做了右派的俘虏，有人摇摆不定，有人悲观失望。看来，右派先生们要唱凯歌了。

但是，尽管黑云乱翻，太阳仍然存在，牛鬼蛇神们的命运是注定不美妙的。现在是应该直捣右派的老巢，肃清其毒素，铲除其恶劣影响的时候了。

近两周来，中四党支部、团总支和各班团支部召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会、揭发批判大会，在各社团的配合揭发追击下，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眼睛愈加明亮，揭发了大量的材料，对“底层”和“苦药”的面目也日益认识清楚了，以“底层之声”为首的组织部署向党进攻的联合总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揭露出来的。但目前还有一些“好心肠”的人们，总还认为“底层”是有功劳的，或者说功劳和错误各一半。总还相信他们真的是主观上帮助党整风的。“好心肠”的人们，你们看错了，请看看近日来揭露的事实吧！

“底层之声”的矛头，自始至终都是指向党委，狂妄自大地以整风的领导者自居，竭力和党委争夺领导权。他们的行动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先把党委逐个搞臭，进而把整个党委搞垮。“底层”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就分析哪些党委是有问题的，他们进攻的次序是何锡麟、张斧、张刚、孙伟、黄彦平……。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经常分析形势，部署更大规模、更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据张德文的交代说，6月1日，何廷杰在群众论坛所谓“血泪控诉”之后，火炬社的王兴华草拟好一篇“宣言”来念给张海琛、卫之祥听，张海琛说写得不好，没有力量，冗长，建议另写一个，张海琛、卫之祥、王兴华便确定论点，指定由张德文执笔，卫之祥指点着说：“语气要尖锐，可多用反问句。”他们又商量要把力量组织起来，决定：第一，多次播送何廷杰的录音，使同学深深认识“三害的危害性”；第二，马上召开各社团联席会议，“加强社际联系”。张海琛、卫之祥、王兴华便分头去联系一些社团。这次张、卫、王的商谈，实际上是6月2日秘密会议的筹备会议。

6月2日晚上3时至11时，秘密会议在“底层”编辑部召开。据孙其伟、王水泉、许耀曾，

张洪生、张志诚、张德文、王增佑的揭发交代材料，说明这是组织部向党进攻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社团和人物有"底层"的张海琛、王增佑、陈修竹、周作祚、杨碧遐、李国楠、沈遂生、张德文、孙健孙等，"苦药"的王开烈、薛若安、卫之祥、郑景星、汪智等，"小论坛"、"呼声"的高瑞兴，"狂飚"的彭浩荡，"火炬"的肖立广，"马特尔"的丁楚平、戴立淼，"霹雳社"的张洪生、张志诚，"X光社"的孙其伟、王水泉、许耀曾等，还有中四三班的许有为等等共四十多人，人们会问，当时的进步社团"展望"和"战斗社"为什么没有被邀请参加呢？这并不奇怪。古人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充满右派气味的"底层"、"苦药"，自然只能是找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同道者。

张海琛主持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后，就作了如下的策划：

①监督党委，要改组党委会。呼吁市委，中央来救救师大。

②争取群众，争取实现"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口号。呼吁教授支持减轻考试和课业负担，开一次论坛，请胡明来讲话。

③多次放何廷杰、朱启贤的录音，从感性上和理性上来武装群众。把一二三年级鼓动起来。

④从各方面刺激党员，"争取"党员站到他们这边来。

⑤改组"师大教学"。由"底层"、"苦药"等大社当编辑。

⑥成立总部，各社推出一个联络员，以"底层"、"苦药"为联络站。对外不宣布各社有联系。

⑦以后各社互相通气，互相支持，一有"卫道者"和"逆流"出来，就形成浩大的声势，把他们打回去。

秘密会议快要结束时，"底层之声"的联络员俞安国从北大回来，并带回许多反动的造谣的油印刊物，这份刊物的名称叫做"民主接力棒"，是要由这一大学传递到另一大学，这样传递到全国各地去的。这是右派分子的阴谋，企图这样来促成天下大乱，以图取而代之。

散会后，"底层"的张海琛、李国楠、陈修竹、俞安国、张德文又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秘密小组，由张海琛、陈修竹、俞安国组成，张海琛管全面社务，俞安国负责和外校联系，陈修竹负责和校内各社团联系。

看吧！"底层"的"将领"们的行状不是十分明显了吗，谁说他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呢？不：他们是校内校外互相串连，在偷偷摸摸的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秘密会议后，"底层"人物到处活动，废寝忘食，以夜为昼，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势。右派头目有这样得力的"将倾"，终成大业，有何忧哉：张海琛不是以"盟主"自居，犒赏三军吗？看看他们的"功积"吧！

"围剿""卫道者"，打击"逆流"。

人们知道，那些敢于批驳右派言行，强调帮助党整风要实事求是、和风细雨的社团和同学，都被"底层""苦药"斥之为："卫道者""逆流"，并深恶而痛绝之的。"围剿""卫道者"，打击"逆流"，这的确是"底层英雄"的能事。运动开始后即出现的政二黑板报，就是"底层"人物孙健孙去联合"苦药"把它压下去的。当"大家放"出来后，杨碧遐就大喊"这是逆流，是阻碍运动发展的"，并马上写了"读大家放之类"，用化名签名张贴出去。张海琛、杨碧遐还鼓动"底层"社员写些短小精悍的标语，不用"底层"名义，而用个人化名，这样张贴出去，造成"围剿"的声势。接着，就出现下面这样的大字报："看吧，'纠偏者'一个跟着一个地出现了，他们不是来除三害的，而是鸣'不平'的，他们在指责群众了"。"请'大家放'，对准三害，拿出货色来！"这些都是王增佑、张德文、吴兆钦等的"功劳"。据说陈修竹也写了一张，因为谩骂得太露骨而没有张贴。这些标语是由王增佑在中午当人们已经午睡时才偷偷地贴出去的。王增佑真能干！难怪"底层"主帅张海琛要当众表扬他为"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了。这种"围剿"方式，的确独出心裁，并得到"苦药"主将汪智所赞同，也为"真理报"人彭明勋所鼓励。这样"围剿"

还不够，而且怀恨在心，到处攻击，张德文不是经常说，“我恨死‘大家放’吗，为什么‘底层’对‘大家放’有这么样的深仇大恨呢，原来‘大家放’一开始就高举左派的大旗向右派反击的，这又哪能得到右派的‘底层’的欢迎呢！”

“底层”对“火星报”也并不放松，“火星报”还在筹备成立过程中，“火星报”第一期还没有出版，“底层”就一片仇视之声，煽动群众，说这是官办的，是出来针对“底层”的。说求也奇怪，若不是自己“作贼心虚”，为什么要这样敏感呢，他们还要组织行动小组；来和“火星报”对抗。并且写了一封极其阴险惑毒的“贺信”，抄成大字报，贴在高高的墙上。多么好心肠呀，给我们“祝贺”来了。人们可以从这里认识一下两面派的狡猾手段。对不起，“底层”的“英雄”们，我们对你们还要穷追猛击呢！

人们知道，“展望”是对党委的边整边改做了一些报导的，这不是很好吗？可是“底层”“苦药”的看法却与众不同，认为这是歌功颂德的，并且兴师问罪，卫之祥、王增佑等就写了一张大字报“问展望”，署名是“大大的一群”。秘密会议后，何副校长作争鸣齐放的报告的前夕，主帅张海琛发下一支“令旗”。旗上写着：①把“展望”打回去，②对党委要加大压力。这个勾当由陈修竹交给“x光社”去干。“底层”的确不很美妙，帮助党整风的招牌这次被翻底了。

听说何副校长要在星期三（6月5日）下午作报告，张海琛和卫之祥马上勾勾搭搭，鬼鬼祟祟的策划，卫说，“要贴标语。把胡明的演讲录音在报告之前放，压他一下。”“如果报告不好，就当场要求发言，把报告会变成论檀会。”并把这个做法传到各社团去。后因何副校长有病，报告改在6月6日晚上举行。他们又重新策划，卫之祥说：“在报告前放访问胡耀邦的录音吧！将何锡麟一军。”陈修竹也从霹雳社带回来消息说：“霹雳社已经准备贴标语，何副放长报告不解决考试问题，就要递条子，要求当场答复，要求‘底层’也这样配合。”张海琛马上表示“这样子很好！”并立即行动起来。他指挥“底层”的一部分人马都坐在最后，递条子时要打开，让传递的人都看到条子的内容，借以鼓动群众。会场的确被他们制造得非常紧张，何副校长每讲一句话，张海琛就递一个条子，张德文也写了两个条子。但邪气终究是敌不过正气的，何副校长出报告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底层”有一部分人也是拥护这个报告的，这当然是不如主帅们的心意的，于是就造谣煽动，说什么何副校长的报告空洞无物。杨碧遐还说：“今天这个会很像斗争会，何副校长手也发抖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

“底层”一开始就看中了“师大教学”，扬言“师大教学”是软弱无力的，要以“底层”的油印报代替它。并到处造谣煽动，说“师大教学”是一个宗派堡垒，必须夺取过来，使它成为群众（实际是右派）的论坛。在“师大教学”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底层”主将罗宗义都进行了篡夺活动，他要求“师大教学”要走在党委的前头，这也就是要“师大教学”脱离党委的烦导。在会前，张海琛和杨碧遐就唆使罗宗义和“火炬”、“苦荡”联合提出改组“师大教学”，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会上，“火炬社”王兴华提出改组方案：编委由党委、团委一人，教授三人，学生社团代表三人组成。罗马上支持王的意见，但这次会上他们的企图未能实现。6月4日胡明在群众论坛发表了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演说（这是秘密会议的策划出实现），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要胡明回答，后来“师大教学”问论坛的主持者彭浩荡要来发表，彭不给，汪智在旁说是“师大教学”抢稿，违犯宪法。陈修竹马上跑回“底层”，这回大有文章可作了，他俨然像个活蒋干得意忘形地说，“师大教学”和“狂飙”抢稿，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迫使“师大教学”改组。”而王兴华已经在造谣说“师大教学”改组了。张海琛也向北大的同道者宣扬这一点，并得到他们的赞赏。“底层”真是妙想天开，罗宗义不是在做着做“师大教学”编委的美梦吗？

“底层”在向党委进攻的同时，也向基层党员进行分化。他们煽动说：党员没有受三害的害，对揭发三害不坚决。党员的党性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党性？）。他们在分析党员的动态，把党员分为三类：积极投入运动的（也就是跟着他们跑的）；

旁观的；阻碍运动的（也就是反对他们的做法，批驳他们的错误的）。这样进行孤立分化。夸大歪曲党员的缺点，制造对党员的不满情绪，拉拢中间群众，说在运动中党群关系的墙更厚，沟更深了。真是从各方面"刺激"党员。当校四王继民等个别党员表现出动摇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出大字报，高喊着："欢迎你们，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教育"全体党员应向王继民等人看齐。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不难理解，他们不是在秘密会议上做出决定要争取党员吗？

秘密会议不要进步社团参加，"底层"排斥党员和左派，这是源出于一个道理。张海琛是极力抵赖，不承认他是排斥党员和左派的，但纸不能包火，谜底总会揭穿。据张德文的交代，5月25日晚张海琛、杨碧遐、张德文、罗宗义、周作舫在操场开了一个会，酝酿第二天改选编委的事。五个人都对李万钧甚为不满，原因就是李和他们意见分歧，尤其是罗宗义特别不满，罗说："我在核心组（指班上的核心组）老挨批评。"又说"今天工作很乱，我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杨碧遐鼓动他说："没有关系，明天开个会，检讨一下，把编委选出来就好了。"同时他们还决定不要先把张斧同志的讲话发表出去，先压一下，等张海琛写好详细评论才一开发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是按他们预定的计划进行的，改选编委，李万钧、梁仲华被选掉了。在会上他们实际上用各种方式来围攻李、梁二人，有脸红脖子粗的，也有花言巧语的。杨碧遐就属于后者，他说："我们知道梁仲华很忙，不一定参加底层工作，但我们欢迎他采指导。"看，杨碧遐多么会为梁仲华设想，而且又多么尊重梁仲华的指导啊！真的是这样吗？不！他在骗人。在改选完后，杨碧遐就曾得意地对别人说过："这下子好了，改选了！"杨碧遐还挑拨班上党群关系，煽动对党员的不满，并企图搞散班上核心组，这又是居心何在呢？杨碧遐两面派的嘴脸，这回揭穿了。

张海琛到师大四年，长久以来是以自由主义者自称，对团的工作并不积极主动，和党员的关系是明地里一套，暗地里又一套。他以前常说身体不好，上课没精神，有一些团内会议也不参加，但这次运动中却空前的积极，废寝忘食，累垮身体也在所不惜，这种突如其来的反常现象，的确令人费解。原来张海琛的野心不小，不仅要把师大搞垮、而且还要从这里出发，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干什么呢？他二天在北饭厅和范亦毫谈话，其中谈到应当到农村去，说农村问题很多，干部水平低，三害严重，农民觉悟低，民主生活不够，要去给他们宣传。张海琛这下子一变而为国家大业的"耽虑者"了。既然是帮助党整风，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呢？"底层"之声6月6日大字报的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说："反对'三大主义'的党的整风运动就必然同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它的影响将遍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张海琛提出应该到农村去和社论提出这个口号，难道是毫无关系的吗？

成立总部之后，张海琛一跃而成为"盟主"了。一天，"底层"有这么一个对话场面：孙健孙说："海琛！这下子做'盟主'罗！"张海琛悠然自得地说："那里！那里严看来'盟主'有点飘飘然了，他不是曾要罗宗义枪他找爱人，以'底层之声'负责人的名义去找吗？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用'盟主'的名义呢，答曰：因为总部要保密，不便说出。

"底层之声"的奇闻谣，放出了不少"奇闻"，其中有二则，一曰戏票，一日包厢。前者是说总务长孙伟同志在梅兰芳先生来校演出前一天，到工会办公室要三百张戏票，工会干部问他作何用途，回答是解决内部矛盾。后者是说北饭厅的电影放映台两旁的大窗户，是孙伟同志要开的，目的是为了看戏的方便。这二则"奇闻"已有人做了考证，证明是造谣。但"奇闻"出自何人之口呢？现证明是陈秋帆先生。身为"为人师表"的陈先生，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学生面前编造"奇闻"呢？这只能请陈先生自己来回答了。

7月5日中四党支部召开揭露批判张海琛、杨碧遐的大会上，同学们非常愤慨，揭发了大量材料，说明杨的言论和胡明、朱启贤的言论完全一样。他在"底层"是一个到处放火的人，他曾经说过，"不除三害就活不下去了"，人们追问，杨碧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活不下去，那

么他在解放前是怎样活的呢，什么人今天才感到活不下去呢？李万钧说，杨碧遐对我们党是怀着极深的阶级仇恨的，他是个右派分子。

对于张海琛的面目，也日益认识清楚了。许乃妍说：“我过去受骗了。”她表示一定要彻底揭露他，她还指出孙健孙，张国英、陈修竹、杜峙、俞安国等知道更多的材料，应该站出来，彻底的交代和揭露。赵尔聪递了一个条子说：“从刚才揭露的材料，说明张海琛就是我们共青团内的右派分子，可是他在检查中还不老实交代，我建议为了纯洁我们共青团的队伍，应该把他开除出去，像他这样的入是对我们共青团的污辱。”当主席念完这个条子后，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会上有许多人要求发言，有人建议晚上继续开，有人建议开全校的群众论坛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这两个右派分子和反动社团“底层之声”。

最后，主席表示再召开大会的时间另行决定，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就看他们自己如何行动了，只有彻底交代才是出路。也希望同学们进一步准备揭发和批判。

（原载 1957 年 7 月 10 日《师大教学》第 154 期）

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四（四、五班）

师大中四（四、五班）在七月初揭露了反动“苦药”社中的反动小集团，他们完全披资产阶级思想生活方式俘虏。生活腐化堕落，贪图享受，追求低级趣味；对组织由疏远到对立；对政治活动由厌恶到抗拒，一直对组织对集体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

他们长久以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对共产党仇恨；对社会主义事业不满；在整风中掀掉了他们的假面具，原形毕露了。

小集团中四个人在整风中，共同站在右派立场，支持和宣传右派言论，在运动中，他们彼此间保持同一的看法——尖锐、大胆、有力量、痛快。

这四个人在整风中对党采取了同一行动，猖狂向党进攻，打击积极分子。

这四个人在“苦药”社中掌握了人事、对外联络、访问，出版……连“苦药”的社长右派分子卫之祥都说：“苦药的工作不通过他们是行不通的。”

小集团入物简介：

郑景星——苦药社总编辑，大资产阶级家庭的纨绔子弟，是团组织的害群之马。

胡家瑞——苦药社访问组长，对外联络，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下流无耻的恶少，擅长于“鼓动”。

薛若安——小集团的军师，出身贫农的流浪汉，他已被资产阶级俘虏了，一贯敌视党，混入团内，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宣传成套的反动思想，主张“空想共产主义”。

胡同孙——苦药社的一员女将，大资产阶级出身，狠毒，刻薄，打击党贝干部和积极分子，对资产阶级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严重不满，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

这小集团在决定“苦药”社方向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一）小集团在道德上的堕落

这小集团一入大学就勾搭上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的结交是为了“找老婆”，平常好吃懒做，在宿舍更是荒淫无耻，说不入耳的话，做见不得人的事，侮辱和谩骂班上每个女同学，说这个女同学形式好，内容不好。那个女同学内容好形式不好。而另一女同学形式与内容能统一……胡家瑞就曾骂我班某女同学“臭烂了”。胡同孙这员女将则把女同学私生

活向某些男同学散播。身为妇女却无耻到这种地步。够了，以上揭露的只是他们腐朽生活微小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是难以启口的，就是这一部分不也使我们闻到臭味了吗！事实很清楚了，这小集团是如此的肮脏，如此的齷齪。一个新中国大学生，无耻到这种程度不能不使人吃惊，也不能不使人气愤。对他们说来也没什么奇怪，他们还把自己的姐姐和嫂子作为彼此嘲笑的内容呢！

他们不但自己说，也引诱和怂恿别人说，使得一些思想糊涂的人逐渐受到影响，尤其极端恶劣的是，他们还打击有志丢掉资产阶级脓疮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小题大作”并恶意攻击这些同学说，“你现在也学会了达套了，假门假事”。好像他们这种行径，他们这些道德败坏的话语是不该受到批判的。

这几个资产阶级的儿女，虽然经过了解放后几年的教育，但还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本性，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尊重人，更没有尊重人的习惯，而侮辱人、欺凌人、戏弄人就是他们在生活中追求的“乐趣”。

他们是怎样侮辱人呢，最平常的是给人取外号，他们无人性地嘲笑一些同志生理上的缺陷，胡家瑞就把一个女同学叫“斜眼”把一个有花白头发的同学叫“花皮猫”，郑景星把他认为不美体形较胖的女同学叫“大南瓜”，过去还把体育系女同学叫做“乱七八糟”。他们就习惯于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同志们忍受这一切，好心的对待他们，但他们这些无耻之徒反而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为了他们的乐趣，他们伤害了多少同志，使不少人忍气吞声，使不少人受到压抑，自尊心受到损伤，甚至减少了生活的信心。今天在反右派的声浪中，我们眼睛亮了，勇敢起来了，我们愤怒地指责他们，摔诉他们，坚决彻底的清算他们。

他们对华侨同学也肆意嘲弄，把他们叫“洋瓜”，看到他们打羽毛球也说是“打洋球”。同样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对兄弟民族同学也不放过，胡家瑞口口声声把回族同学叫“回子”，当回族同学王文禧有事到大饭厅时，胡同孙恶意地对他说：“在我们这儿吃吧，别客气！”华侨同学、少数民族同学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处处受到温暖和关怀，但这些流氓成性的人竟侮辱他们。违反和破坏党和国家对于国内各兄弟民族和海外华侨的政策。我们能容忍他们吗？为了华侨同学的荣誉，为了我们兄弟民族的尊严，我们不能不痛恨他们。

这小集团的人，甚至对辛勤教导自己的老师也横加污辱，他们把每个老师都像商品一样地评价一番，他们把自己瞧不起的老师辱骂成“草包”“不学无术”“混饭吃”“……”在这方面他们不正和他们的祖先——那些资产阶级吸血鬼一样鄙视别人的劳动吗？

够了，这些只是一小部分材料，已经够说明他们是怎样的人了，我们要坚决的责斥这些一贯横行霸道的流氓分子。

他们的流氓行为也是一贯成性的，胡家瑞在中学时就组织过流氓小集团，难怪在整风中江欢然遭右派分子严景熙殴打后，胡竟说“江是该挨的”，本来，他与严同出一宗，他的利害就不难与严一致了。胡家瑞还经常露出他那流氓嘴脸，说：“若是前两年我不给你两耳光才怪呢。”你看他的阶级本性多么根深蒂固啊！

当这次“大家放”社尖锐的批评了“苦药”错误后，小集团怀恨在心，竟想约“大家放”赛球，准备在球场上撞他们。这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多么可怕和露骨的地步。达伙人的品质恶劣到达种地步，还配做个新中国的大学生、未来的人民教师吗？他们简直是我们大学生中的败类。

（二）政治上的反动

这个四人小集团，从道德上的堕落到政治上的反动，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不可能得到满足，他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对党对社会主义就有了仇恨。四年里，他们一贯破坏党的领导，挑拨离间党群关系，恶意指伤同志，打击积极分子，在同学中搬弄是非，阻碍班集体的前进。

1. 否认党的领导，打击、讽刺，辱骂党员同志

他们打击、讽刺，辱骂党委、党员，耍两面手法，骂有些同志是“靠革命吃一辈子”。攻击我们班的党员都是“教条主义”，同意把这些“教条主义者”送去打台湾。辱骂支部委员傅德惠是“太上皇”，说她“什么事都不懂却又什么事都要管”，并经常夸大其词的宣扬傅德惠同志的缺点。这个小集团经常是抬高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在这点上，女将胡同孙更有其独到的手段。她经常使用甜言蜜语抬高张曦奕，打击和贬低傅德惠，有一次胡同孙在宿舍里无中生有的拍桌大骂，诬蔑傅德惠说她有“国民党官老爷的作风”，这样就影响厂一部分不了解傅德惠的同学对傅的看法。了解傅德惠的同志，都认为她是一个无私的，对人很关怀的有原则性的好同志。他们当面谈周家驹不错，背地里又说周是拍马屁入党的。

薛若安当面说张曦奕是可敬的同志，而在最近交代说，他想打击她，要求她和他一样的无原则。郑景星还带着极端仇视的感情说过，“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先进阶级来说，就是不服气的。”这就看出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党的领导了。

2. 对团组织工作的抵抗和破坏

过去小集团反对团组织，采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每次组织生活或一般活动，事前征求意见时，小集团里的人物总不发表意见，而会后就故意挑错，煽动同学发牢骚。在会上，这几个人中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胡同孙是唱脸红的，总是打着积极的幌子，对支部工作进行老爷式的挑剔。再有一种方法就是沉默。同时他们还对团干部进行打击，这与其说是手法不如说是本能。又如上学期支委向同志布置工作准备开支部会，会上身为团小组长的胡家瑞不提任何意见，会后却又在群众中骂组委邓遇芳，说“她一上台就想出这鬼花招来整人”。

他们的目的是想取消组织生活，郑景星就把上次因实习取消空出的六个礼拜说成是他在师大最幸福的时期。小集团的军师、素来擅长于“理论”，分析的薛若安就主张团小组没有存在的必要，认为可以临时性的自由组合，把青年团当成娱乐性组织，不是他们要把组织生活搞成娱乐性的吗，这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在蓄意取消组织生活吗，薛若安这鬼主意严重的影响了同志们在政治上的进步。总之，四年来这小集团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团的工作开展，这小集团过去一直是班上团工作中最棘手的一环。

3. 恶毒地攻击积极分子

另外，他们为了达到孤立党的目的，就恶毒的攻击积极分子，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积极分子说假话”，辱骂积极分子是拍马屁主义者。这种恶毒的攻击特别在整风中就使得一些积极分子不敢接近党员。

薛若安污蔑积极分子说“进步快的都是假的”，说他要“稳扎稳打”，从而又从理论上找到根据，他主张“工作政治”，反对“口头政治”，实际上他是要使积极分子离开党，反对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其实质是反动的。

4. 小集团对各种重大政治运动的态度。

用薛着实自己的话来说，“过去各种运动我是积极参加，空洞拥护，事后找错。”他们对各种重大政治活动是不感兴趣的，“十一”“五一”的大游行他们是很少参加的，当别人在天安门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们却蜷缩在宿舍里高谈着低级下流的东西，他对选举杖认为要不要没多大关系。这种充分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他们都不感兴趣，为什么他们又要向党争民主争自由呢，啊！原来他们争的民主、自由与我们是不相同啊！胡同孙不是认为“三反”“五反”逼得上海资本家走投无路吗？她对这些资本家有多大的同情心，直到今天胡同孙还在为这样无法无天的资本家流同情泪哩！对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怀有极大的抵触情绪，胡同孙就经常诉苦说自己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不如以前了。郑景星家里寄钱来时，他总慨叹地说“幸好我家里还有点股票”，你看他们多么留恋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固守着资产阶级的衣钵。可惜这种生活已经被人民埋入坟墓了。这也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社会主义了。

为了满足他们资产阶级的利欲心，不改变现实怎么能行呢？因此他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学习时不约而同的一致赞成搞大民主，薛若安一再坚持大民主的“必要性”。这就看出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他们阶级本能在支配着他们。所以整风一开始他们就表现了空前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跟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的步调是多么谐和啊！

（三）小集团在整风中向党猖狂进攻

和许多右派分子一样，小集团的分手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活跃起来了。他们觉得现在讲话的时机到了。薛若安就极端仇视党，扬言“我不靠你共产党吃饭，我靠自己吃饭。”他又说“我的解放不是靠你共产党的力量，与你共产党无关。”郑景星不是也怀着仇恨地说“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先进阶级我是不服气的”吗，你看他们对工人阶级对党怀着多么刻骨的仇恨。

快要整风了，善于窥测政治气候的女将胡同孙，首先在班报上发表了“肃反成绩应当重新估计”的带有煽动性的反动文章。从此，在班内展开了对肃反问题的争论。薛若安、胡家瑞、郑景星、胡同孙又积极地在各处点火，煽动群众，为那些被斗者喊冤，为那些曾经被批评者翻案。

他们真是“有一套”，在疯狂向党进攻前就大肆攻击班上党员和积极分子。骂入党的同志都是拍马屁拍上的，积极分子都是拍马屁主义者，骂坚持原则的同志是教条主义。整风中女将胡同孙就曾利用一位女同学尚未批准入党作借口，挑拨党群关系，煽动群众对党不满。把这位女同学没有入党的原因之一说成是因为接近群众，代表了群众意见的原故。他们这样作企图达到拉拢群众，孤立党的目的。

火是真点着了，并煽大了。当资产阶级右派疯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穆木天放出了第-支毒箭。这个小集团就推波逐浪，组织了“苦药社”，用“一个血泪控诉”“又一个血泪控诉”在全校掀起了一股腥臭的歪风。

从“苦药社”成立第一天起，他们就是中心人物。夺取了社里的大权，把编辑部掌握在自己手里，由郑景星担任总编辑，胡家瑞担任了访问组长、对外联络。“苦药社”的人事大权也是掌握在小集团手里，几次社里负责人变动的名单是由郑景星安排的。他们的手段是阴险的，自己不出头露面，别有用心地利用党员和别的人，这突出的表现在选举社长上。他们选卫之祥担任社长；而平日他们对卫是非常不满的，并曾骂卫是“浪漫主义加流氓主义”。另外，他们又把心目中认为是无原则的党员选为副社长。人们不难看出，他们如果真是诚心帮助党整风的话，竟会选出自己心目中瞧不起的人当社长吗？他们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搞垮党，用薛若安的话说，“要按我们的意志来改变党”。

他们到处散播右派言论，小集团女将胡同孙，在何廷杰发表了反动演说即所谓“控诉”以后，就到处宣传，拉人去听录音（她自己曾连续听了两次），公开宣布要作何廷杰的义务宣传员。胡家瑞就恶意指“张刚、王文枢是“没有人性的家伙”。葛佩琦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那么露骨和恶劣，可是小集团的成员却同声赞扬。胡同孙说葛讲得“有道理”并积极宣传，特地破例的亲自为同学找报纸，并说葛提得“很尖锐”。薛若安也说葛佩琦的澜言“大部分是合理的”。

在我校展开对右派的斗争，大家叠力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胡同孙公然在会上倡导“苦药”主要是整风，不反右派。至此，我们就更不难了解他们为什么赞扬右派言论了，因为他们和右派原是气味相投啊！

他们像是一簇人影，随时都在同学中间游荡着，对于党委，这个集团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攻击态度。党委书记何锡织同志第二次向叠校报告时，他们就采取各种手段施加压力，此如写反动标语，准备散发反动传单。总之，像胡家瑞说的那样“布置气氛”。此外他们对整风和毛主席大肆诬蔑。

在讨论何副校长第二次作的报告会上，他们反党情绪异常“激昂”，有意煽动群众对党不满，胡家瑞说：“这么一说（指何副校长的报告）我的心都碎了。”接着胡同孙也说“我的心都发抖了”。看吧，何副校长的那个报告，使广大同学都感到振奋，感到增强了力量，而他们却“心发抖了”“心碎了”，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谁才害怕“争鸣”“齐放”呢，难怪薛若安说“党员不发言是无形的压力，无声的报复”。这就看出，他们和党是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

他们向党进攻，制造了两支毒箭。一支就是丑化党的领导：一支是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这正是我校大右派分手黄药眠，朱启贤等人向党进攻的手法。企图以这两支毒箭搞垮师大党委。所以，胡家瑞一手制定了访问计划，专门寻找那些仇恨党，心怀叵测的分子，你们看，他们访问的绝大部分都是右派分子，黄药眠、冯亦代、林传鼎、傅种孙……究竟为什么选择这些人呢，他们选择这些人，就是专门借这些所谓“学者”，“专家”的名义，煽动、拉拢群众，并为这些右派分子摇旗呐喊，向党进攻；他们不单访问，并且还和那些右派分子勾搭在一起，接受他们的指示。

臭名昭著的何廷杰的“血泪控诉”，这一反党高潮的信号发出以后，小集团的人纠合了一伙人声称要为何廷杰“申冤”，声言“要彻底打倒三大主义”。他们并下了决心，不打倒三大主义不回家、不考试，就是考两分、不毕业，多念一年也可以。他们说的“三大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我校党委，看他们对党仇恨得何等深啊！

打着何廷杰的“血泪控诉”，达伙人就推波逐浪，他们去到北校，企图把北校同学拉入反党逆流中来，在薛若安事先与胡家瑞等人商量好的发言中，把师大党委说成是“三害”的集中体现，是黑暗统治”。极尽污蔑、捏造之能事。

本来他们对于肃反就是一种仇视态度，整风前胡同孙就公然提出要重新估计肃反成绩，薛若安造谣诬蔑肃反被斗的都是党点名后找材料的。薛若安要党公开档案，他又说：“黄药眠可以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调查档案，我们怎么办？”可见这个进攻正是对黄药眠一次向党挑战的响应。薛若安也几次散播过党团员是便衣警察的反动观点，难怪，薛若安，胡同孙那么同意葛佩琦的谬论，原来是“英雄”所见略同。”

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了。他们野心未死，利令智昏，他们企图能出现第二个何廷杰，未掀起第二次反党高潮。好梦不长，好景短促，他们的企图破产了。

看来他们是要退却了。实际要转守为攻，在小集团制造的党委在“收”的论调的同时，胡家瑞又提出了三条路綫，一背起书包回家去，即所谓软下去；二搞大民主；三是干到底，考试不及格或不毕业都在所不惜。薛若安提出什么要“韧性战斗”，这不能不说是小集团在向党进攻的一个策略。从这里，难道能嗅到一点点帮助党整风的气味么，对党搞大民主就是他们帮助党整风的“诚意”么！

这种向党进攻的企图，并没有如愿以偿。它早被大部分同学识破了，在群众压力下，他们不得不答应检查。然而他们不仅想搞“攻守同盟”来蒙混过关，并且企图推卸责任。

在我校我班反右派的声浪中，他们的假面具被揭穿了。原来是实实在在的四株毒草，是毒草就要拔掉。话怎么说呢？胡同孙，郑景星似乎后悔了，说什么“我不参加整风，就不会暴露出来”。胡家瑞、薛若安也认为自己“上当了”。章伯钧不是也说他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吗？正如人民日报所说的，我们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事情很简单，有些人当失于戒备的时候，就会说出内心已有的话来。一个人站在什么立场，而就会说出怎样的话做出怎样的事来。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看清楚了，这是一个由流氓小集团堕落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小集团，在整风中，他们对人民犯下了弥天大罪，我们一定要彻底地清算他们。

然而，从前一段，对他们的斗争看来，他们还没有一点认识错误的诚意。并且吹嘘说：“总有一天他们要向我们道歉。”他们究竟指的那一天？他们指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一天，告诉小集团的成员们，这一天是永远不会有的。

他们曾经说他们“做了四年的狗”。我们说这话并不假，他们的确做了四年资产阶级的看

家狗，现在仍然没有失去资产阶级看家狗的本能。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绝路。赶快由你们那资产阶级看家狗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人民立场上来，只要你们不自绝于人民，幡然悔悟，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你们是敞开着。猛省吧！是悔过认错的时候了。

（原载 1957 年 8 月 1 日《师大教学》第 174 期）

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

张迈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219 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 49 个是右派分子，70 多名共青团员（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这些学生大都很年轻，为什么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记者在访问有关方面后，找出了答案。

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观点

这些学生之所以堕落成右派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丑恶灵魂，那就是坚持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据了解，这些右派分子，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家庭里，他们幼时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解放后，他们的思想没有很好地得到改造，剥削阶级的意识仍很浓厚，他们处处对党不满，对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怀着极大的抵触情绪。如右派学生胡同孙就经常“诉苦”夸耀过去的幸福，说“现在的生活不如以前了！”另一右派学生郑景星在家里寄钱来时，总是慨叹地说：“幸好我家里还有点股票！”可见他们对剥削阶级的家庭生活是多么地留恋！同时，他们在剥削阶级的家庭影响下，养成了自私自利的、强烈的想向上爬的思想。例如右派学生罗宗义，他从小就爱出风头，一心想做大人物，在四川华阳中学读书时，但想组织第三党，成为党魁。全国解放了，罗宗义的反动“理想”幻灭了，他便死钻功课，伪装积极，混进了青年团，想借此作为向上爬的阶梯。到师大后，他被推选为班级团支部的宣教委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更抬头了，他一心想骗取入党，做中文系团总支的委员，从而在毕业后留下来，由助教而讲师，由讲师而教授，而系主任，而文学家……他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是年轻的文艺批评家，以杜勃罗留波夫自居。由于这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他在入党问题没有解决时，就心怀异志，大为不满，利用整风大放大的机会，恶毒地攻击党、诬蔑党，并组织反动的社团——“底层之声”，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想借此来炫耀自己，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取得政治地位。这个右派分子所经历的道路，说明一个人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坚持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而不进行思想改造，必然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右派，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不容情的。

所谓“独立思考”

当然，这些学生之所以堕落成右派分子，除了他们共同的臭味之外，还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原因。如“底层之声”的骨干分子张德文等在整风期间，口口声声地说：“师大的民主空气太稀薄了，同学们的思想受到压抑，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思想僵化了，”于是他们就打起“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的旗号，高喊“必须抛弃盲目服从的顺民思想，抛弃相信大人物会替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依赖思想”，要大家“开动脑筋、清醒头脑”，他们还慷慨激昂地说：“几年来，我们太盲从了，太相信党了，现在我们要独立思考，要大胆怀疑！”这些完完全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右派分子，所进行的“独立思考”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所“大胆怀疑”的都是正面的东西。譬如他们把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一律称之为“教条主义”，把革命青年要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原则，看做是“束缚思想”，把伟大的肃反运动，说成“过火了，扩大了”，把生根于剥削社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称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产物”。总之，党委说是这样，他们偏说那样，党委说是成绩，他们偏说是缺点；党委说是对的，他们偏说是错的，这就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当然，他们并不是对一切问题都加以怀疑否定的，他们对于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的论调，却从来没有怀疑过。否定过，他们所怀疑、否定的，只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由此可知，离开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片面地强调独立思考，这是多么危险啊！

由不过问政治到政治上的反动

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生里的右派分子中，还有一些是平常不声不响、表面上好像不过问政治的，他们成天埋头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对一切活动都没有兴趣。但是，在今年五月，中国整个天空黑云乱翻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向党放出了一支支的毒箭，变成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中文系的另一反动社团——“苦药社”的编辑，四年级第四班的一个毕业生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他虽是个共青团员，但对组织生活却很反感，别人讨论问题，他从不发言，不论什么会，能够不参加，他就不参加，他认为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学问才是真的。他非常讨厌政治学习和听政治报告，他说：“这是白白浪费时间”！“讲来讲去，还不是这几句话，早就听厌了！”又说：“我既然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还唠叨些什么？”他对马列主义基础等政治课，也非常蔑视，公开地说：“在考这些课时，只要答上‘唯物’二字就可得三分，加上‘辩证’等字眼就可得四分，再加上‘联系实际’就可得五分了。”因此，他在大学里虽然受了四年的教育，虽然经历了很多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改造，相反地他的思想却越来越落后了。肃反后，师大有些被斗的反革命分子在暗地里叫冤叫屈，对党的肃反政策大肆污蔑。这个学生听了，“恻隐之心就油然而生”，对师大的肃反工作开始怀疑。尤其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起了根本性的动摇。这样，他便逐渐同党对立，与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了。在大鸣大放期间，他写了“奇冤记”和“新今古奇观”，对党恶毒的进行污蔑和攻击。由于他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从不关心政治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分子，这件事应该引起所有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警视，深省！

“找寻矛盾，干预生活”

在师大还有一种右派分子，专门“找寻矛盾，干预生活”。这种类型可以由中文系学生俞安国为代表。俞安国平时对生活很有“兴趣”，喜欢探索生活的“奥秘”，他认为什么是生活的奥秘呢？那就是社会的阴暗面，他要干预的也就是这阴暗面的生活。他说：“光明的一面是人人都能见着的，不足为奇”，他认为，“阴暗面容易被人忽视，而且里面蕴藏着社会的矛盾”，应该多看。他还说：“一个人要作到有独特的见解，不能随波逐流，非多看社会的阴暗面不可！”因此，他非常喜欢看这样一类的书籍，如右派分子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等，对这些书里的主人公曾刚、黄佳英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为了找寻“矛盾”，获得新的发现，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存在的问题，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的东西，都特别欣赏。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视觉：“明察秋毫不见舆薪”。——我们国家无限光明欣欣向荣的生活，他却视而不见，个别角落的阴影，他却是一望无遗。因此，他在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公开地叫嚣：“我们的社会生活非常黑暗，并不像报刊上登的那样英勇豪迈！”“对党的政策要创造性地理解，不能人云亦云！”“成绩不是主要的，对一切工作应该重新估计”！这样，他便深深地堕落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干预生活”时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就会以熏为菹，

以臭为香，像俞安国一样铸成大错，变成逐臭之夫！

必须指出，师大这些学生所以堕落成为右派分子，除了他们的阶级出身以及没有很好改造自己之外，北京师大的右派教授黄药眠、穆木天、彭慧、钟敬文、陈秋帆等对学生的毒害和影响是很大的。这些教授在平时教学中散布毒素，留恋旧生活，对现状不满，攻击党委，对煽动这些学生的反党情绪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原载 1957 年 9 月 10 日〈教师报〉）

《不肯沉睡的记忆》编后语

范亦豪

抚摩着这摞即将付印的清样，抬头仰望窗外深邃的星空，不禁涌起太多的感既。

这部文集凝聚着一批五七学子长达半个世纪不肯沉睡的记忆和由此引发的思索。古稀之年的我们拿起笔来书写当年的遭遇，已经绝不是为了吐口恶气或怨气，倒是都还有些当年的傻气，自以为是有一种责任——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时时在催促着自己，伞令我们把这些痛苦的记忆留下来，对时代作出一个交代，否则，我们的心难以安宁。我们深知自己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曲折经历，因此对这段历史我们无权忘却，也无权把我们亲自体验和见证的浩劫掩盖起来。

自然，我们所写出的只能是这场由“阳谋”制造的火灾难的一角，然而，从部分可以透视全局，而积之以众多的部分则可以更清晰地构成全貌，这正是许多亲历者和研究者已经和正在做着的。人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所参与的无疑是关系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的事。

遗憾的是很多难友已经被命运和岁月夺去了生命，再也无法开口。而幸存的我辈讲述当年从心灵到肉体受到的残酷折磨也有各种难以尽述的艰难。有的同学感到的是重又撕开，日日的伤口，让鲜血汨汨淌出，再次体味彻骨的疼痛。有的同学写到悲惨处伏案痛哭，浑身战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有的同学患严重的老年白内障，是一遍遍摸着写成的。有的同学子女还在上大学，他白天不得不外出挣钱，写稿子熬了多少个通宵。有的是儿女怕父母再受刺激重犯精神失常，极力劝阻。有的是子女坚决反对：“你们难道忘了教训，还要再株连我们一次吗！”他们是偷着写的。而有的文章则是女儿含泪替不在人世的父亲写的……

回想起来，五十年前这些人还都是二十左右的孩子，天真单纯，满腔热诚，只会用稚气的眼睛看世界，那里懂得“谋”的玄机，他们只属于祖国大有希望的一代。不料，一夜之间竟成异类，和全国右派一起，遭无妄之灾；十多年之久，无尽无休地受歧视，侮辱，折磨，摧残，还株连了数不清的亲人。读着这些蘸着血和泪写的文字，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思索，都会发问：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悲剧会不会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重演？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愿我们乐观地相信和注视未来，让清醒和思考与我们同行。

应该提到，文集中也收入了当年曾是左派同学反思的文章，我们对这种面对历史面对真理的良心和勇气真心钦佩和感动。

我们的友人钱理群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这是一篇警世的大文。我们的老师，又是五七同科的文怀沙先生题写了书名，表达了他热情的支持。另一题签是林锡纯同学书写的他也是我们的难友。很多同学、朋友一直关心和支持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给了我们坚持的力量。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也以此书回答那些幻想以民族失忆为灵药的先生们，如果确有这样一批人的话。



本书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肯沉睡的记忆——57学子的往事 / 俞安国 雷一宁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0
（百家论丛）

ISBN 7-5034-1728—5

1.不… II.①俞…②雷… III.纪实文学集—中国—当代

IV.G.6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359739 号

责任编辑：刘剑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081

印刷：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610000

装订：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610000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X1092 毫米 1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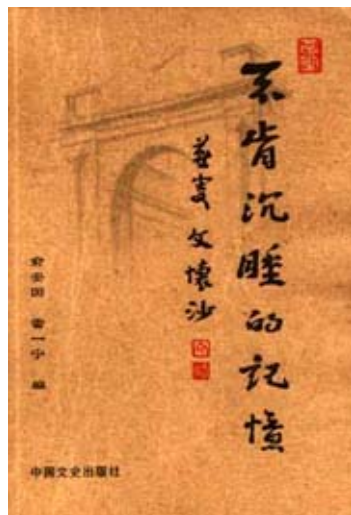
印张：22 字数：550 千字

版次：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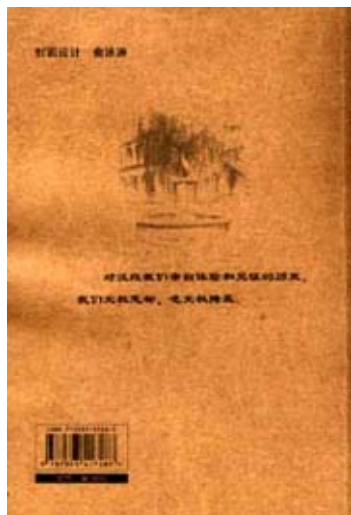
印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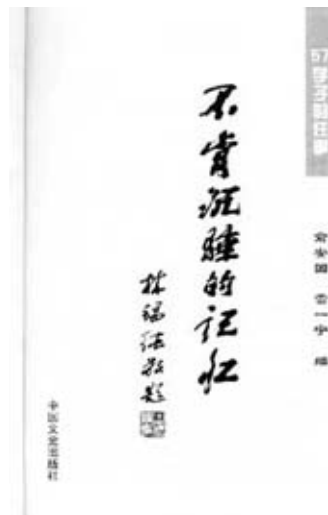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原书封面



原书封底



原书扉页